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金陵新传 (2)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 内容提要

朋友，你知道蒋介石曾三度密谋“反攻大陆”吗？这些行动计划因何搁浅？你知道海峡两岸曾有过三次和谈秘使来往吗？其密谈的内容是什么？你知道对峙中的两岸曾发生过数次举世瞩目的海战、空战、登陆与反登陆战吗？其起因、经过及胜负如何？你知道中、美、苏等国曾因台湾问题而展开了一幕幕出神入化、精彩绝伦的外交大角逐吗？你知道昔日仓皇离开大陆的一代国民党大员的不同归宿吗？你知道台湾当局的新图谋吗？

《金陵新传》生动地再现了上述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断，全景式地勾勒了一幅变幻莫测、扣人心弦的台海风云图……

## 金陵新传

## 第四章

北面停战，毛泽东重提“解放台湾”。解放军“清理门户”，美蒋签订共防条约。两军首次大海战，陆海空合攻一江山岛

### 第一节 美台预谋协防条约

#### 台向美方提出缔约建议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至此，历时3年多的朝鲜战争宣告结束。

然而，停战协定的墨迹未干，美国便与南朝鲜于同年8月8日签订《美韩协防条约》（草案）。前一天，杜勒斯发表声明，称他与李承晚达成了协议，不排除用军事手段来统一朝鲜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感到危险将临的台湾当局，也积极通过外交途径，向美方提出缔结防御条约的建议，以便借助美国的力量来与共产党抗衡。

美国出自本身的利益考虑，既需要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同时也担心台湾利用沿海岛屿频繁对大陆采取袭扰军事行动，最后将自己卷入与中共的直接冲突之中去，所以觉得有必要订立一个条约来约束国民党军队。于是，双方进行了频繁的接触。

这一系列事态的发展，都在告诉世人，美国政府的目标不仅仅为了朝鲜半岛的枪声停下来，而是为了扭转杜鲁门造成影响美国战略全局的被动局面，最终仍要执行遏制共产主义的“遏阻战略”

#### 毛泽东重提解放台湾

10月，中共中央军委在杭州召开会议。

会议首先听取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杨勇关于朝鲜形势的报告。

毛泽东一边津津有味地吸烟，一边聚精会神地听着，时而微微点头，时而淡淡一笑。

杨勇报告完毕，毛泽东一面吞云吐雾一面说：“朝鲜停战了，我们身上的担子一下轻了很多，不过，恐怕还不能大意，要有所准备，防止战火又起，备而无患嘛。这两年我们那位在台湾的蒋先生，趁我们抗美援朝无暇他顾之际，仗着有‘山姆大叔’撑腰，很是兴风作浪，在那里做反攻的美梦哩！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腾出手了，我看该集中力量去解决台湾的问题了。从现在起，就应该就此着手准备，要长治久安，不解放台湾不行。请诸位就此发表高见。”

毛泽东在这时提出解放台湾问题，在座的军委委员中也有不理解的。

首先，三年朝鲜战争使新中国耗资巨大，已经损失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元气尚未得到恢复。如果渡海解放台湾，必然需要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对于国内的经济建设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极为不利。

第二，人民解放军经过朝鲜战场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较量，陆上和空中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可是，面对台湾、金门的福建省，无一寸铁路，无一个机场，空军、炮兵入闽极为困难，后勤供应无法保障，而海军发展还刚刚起步，十分薄弱，不利于实施大规模渡海作战，特别是台湾得到美国的大量

军事援助，使台湾、金门的防御力量远超过 1949 年，实力已大大提高。

第三，当时整个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如在台湾海峡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不利于国际形势的缓和，也不利于国内建设。更主要的是美国插手台湾事务，第 7 舰队在台湾海峡游弋，使台湾这一中国的内政问题复杂化，行动很可能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应。

解放台湾所面临的困难毛泽东是十分了解的，提出这一任务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毛泽东认为：“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目前，如果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不有所作为，任美国肆意活动，搞“一中一台”、“两个中国”或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阴谋，随时间的推移，给世界造成台湾与大陆分离的既成印象，这是一生致力于祖国统一的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因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纯属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毛泽东甚至考虑到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不惜再战的可能性。

### 朱德建议“清理门户”

“我完全赞同主席的意见。”国防部长彭德怀和以往一样，率先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现在朝鲜局势已经稳定下来，我看应该把空军移到福建和浙江来，首先夺取沿海的制空权，这样才能确保渡海部队的安全。”

“毛泽东点点头并补充说：“还有制海权。没有这两权，我们的战士跨海作战的安全就难以保证，要尽快地把这两权夺过来。”

“主席和彭老总的意见我都赞成。”朱德建议说。“我认为可以分两步来走，首先是‘清理门户’，也就是把沿海那些还被国民党占领的岛屿解放过来，把我们的门户打扫干净。这样，既解除了对我东南沿海的威胁，打通了海上的南北航道，也砍掉了台湾的手脚，使我们下一步解放台湾时没有后顾之忧。”

“‘清理门户’，说的好。”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举双手赞成。”

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提议说：“我认为‘清理门户’可以从大陈岛开始，它是浙江东南沿海岛屿国民党守军的指挥中心和防御核心，攻克大陈岛就能击中敌人要害，浙江东南沿海其它岛屿就有可能不战而克，这样我军可以用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胜利。”

大陈列岛位于浙江台州湾外，包括蒋儿岗、东矾山、高岛、头门、上大陈、下大陈、琅玕山、龙金岛、一江山等 20 多个岛屿，其中上大陈、台州岛、下大陈 3 个岛如一个等边三角形紧靠在一起，面积共有 100 平方公里，相互之间最远距离只有 2.2 公里，所以一般人把这三个岛混为一体，通称为大陈岛。

从上海往南到镇海、厦门的船只都要经过大陈岛水道。因大陈岛被国民党军所占据，所以新中国的南北航运被截断，以大陈岛为基地的国民党海军舰队，对长江口、杭州湾是个很大的威胁，并控制舟山渔场，而从大陈军用机场起飞的飞机，不用半小时就能飞临上海。

大陈岛确实是新中国的心头大患。

“大陈岛就交给你陈毅了。”毛泽东说。“你们华东军区先拟定一个作战计划，报军委批准后实施。一定要拔掉这颗钉子。”

1954年1月，华东军区几经研究，提出了陆海空三军联合攻打大陈岛的战役计划，报中央军委批准后，立即着手进行作战准备。

## 第二节 史密斯失态日内瓦

### 日内瓦会议的由来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准备解放台湾的同时，在国际上，为了防止美国利用朝鲜问题欺骗世界舆论，推行他们的反共“遏阻战略”，中国政府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磋商并征求了苏联政府的意见，一致认为，只有召开同朝鲜问题有关的非参战所有国家的政治圆桌会议，才能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及其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这不仅对朝鲜的和平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于促进远东和世界和平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中朝的建议，美国先是抵制，后又利用它在联合国的霸主地位，在同年8月17日召开的七届联大第三次会议关于朝鲜问题政治会议的辩论中，强行通过仅由交战双方参加谈判的决议，但允许苏联参加。

为了不使朝鲜问题政治会议中途夭折，中国政府于1954年1月9日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苏联政府主张的召开五大国会议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的建议，并认为由即将在柏林召开的四国外长会议，导向有中国参加的五国会议来促进迫切国际问题的解决，将会有利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及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

同年1月25日至2月18日的柏林四国外长会议上，苏、美、英、法达成了由苏联、美国、法国、英国、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有武装部队参加朝鲜战争并愿意参加会议的国家的代表于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以期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和讨论印度支那的和平问题。中国政府接受了与会邀请。

### 周恩来醉酒莫斯科

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参加的第一次重大的国际会议。党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多次召集会议研究有关的原则、方针。身为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从我国被邀参加日内瓦会议初步议定之时起，就着手布置各项准备工作。

师哲在《在历史巨人身边》一书中这样回忆：

在这段时间里，总理的外交秘书陈浩常常晚上打电话把我找去。我去西花厅时走大门进去，谈完工作后，往往已是后半夜了。陈浩把我从西房后的夹道送出来，边走边解释：大家都睡了，大门已关了，只好走小夹道。当年的陈浩是个年轻的女同志，做事十分认真负责，细心周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切安排就绪后，周恩来和少数同志先行到莫斯科，同苏联方面协商有关事项。

在出发之前，李克农和师哲应约前去西花厅看望邓颖超。她祝愿代表团一路平安、一帆风顺到达日内瓦，并杰出地完成任任务。然后，又极其关心地讲了周恩来的近况、工作与生活习惯。她说周恩来时常流鼻血，嘱咐李克农和师哲对周恩来多加关心和照顾。

周恩来到苏联进行工作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商议和协调中苏双方对日内瓦国际会议采取的方针、政策，以及对会议进展情况和可能取得的成果进行分

析和估价。

经过会谈，双方达成了一致的看法，由苏联同志草拟具体方案。于是，周恩来决定回国向中央汇报工作，然后率代表团到莫斯科。

临行前的一天晚上，赫鲁晓夫设宴招待中国客人。席间，赫鲁晓夫等人不断地向周恩来劝酒。周恩来虽酒量过人，却患有肝脏病，过量地饮酒引起了不适，加上赫鲁晓夫等人不断同他拥抱旋转，终于出现了呕吐。见到这种情况，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一时失神，手足无措。莫洛托夫急忙同张闻天，把周恩来送上汽车。莫洛托夫边走边说：“这是我们的过错，没有照顾好你，我们感到内疚！这是我们应当汲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在我们。”这些话是诚恳的，因为他深知周恩来将作为他的战友，不久以后将在同一条战线上带领一支友军与他协同作战，怎能不关怀友人、同志的健康呢？！

回到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8号公寓，周恩来已停止了呕吐，但仍然昏昏沉沉。随行人员让他喝了两口浓茶，把他扶上床，让他安睡。同时，请来了皇宫医院的一位老名医给他诊断、医治。医生检查之后说，他的肝脏可能受过亏损、得过病，所以经不起酒精的刺激。现在应该使他安静地休息，明日他再来探望。然后，给了一点药，就走了。

第二天清晨约8点左右，周恩来醒过来了。他说自己比昨天好多了，只是还有点头昏脑胀。接着他问翻译师哲：“我昨天都说了些什么？有没有什么出格儿的地方？我是说了一些话，但具体内容一点也不记得了。”

师哲回答说：“没有什么出格儿的话。讲的都是非常的应酬话，涉及个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一人，而且是善意的。你说你在1928年中共召开六大时，见到莫洛托夫，他对中共代表们讲了话，你们向他学习等等。我想，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只是错误他说成莫洛托夫而已。”

“还讲了些什么不妥当的话？”

“没有！确实没有！”

周恩来说：“我昨天晚上离开席位，在大厅转了一阵儿就头昏脑胀，不清醒了。”

师答：“在外表上看不出来，周为言语、表现都很正常，甚至看不出有多少醉意。否则，早请你回寓所了。”

早8时半，那位医生又来探望周恩来。医生检查后，说一切正常，但建议好好休息一天，绝不应跋涉长途。周恩来本来打算当天回国，于是只得留下。上午他在寓所休息，下午进行了参观，次日启程回国了。

周恩来回国的主要目的是向中央汇报会谈情况，确定在即将召开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上我方的立场、态度、要求和会谈的方针、政策、策略与各种谈判方案，以及中、苏、朝、越四方代表之间的合作、协调等问题，以便更有把握地搞好合作，配合行动，开好会议。

汇报结束后，周恩来专门向毛泽东作了个别汇报。

“主席，这次我还犯了个错误，要向你检讨呢。”

“什么错误？”

“我在宴会上喝多了……”

“比重庆喝得多？”

“吐了，回来的日期也推迟了一天。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喝吐了，丢了丑，这是我的错误，我向主席，向中央检讨。”

“哈哈，”毛泽东笑出了声，轻描淡写地把手一挥，“喝酒的人喝醉了，



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要是换成我，我不跟他们对酒，我跟他们比吃辣子，以己之长，攻彼之短。”

“恩来，你这次率团出征任务不轻啊。”毛泽东转移了话题。

“主席，我想听一听你还有什么指示。”周恩来望着毛泽东说。

“我还是政治局会议上的那个态度，争取两个成果，至少也要有一个成果，不过，说不定杜勒斯不给你周恩来这个面子，让你空手而归。”

周恩来听完毛泽东这番幽默的话语，会心地笑了笑，他感到了此次日内瓦之行的责任。

4月21日，周恩来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这时，他已是精神抖擞，情绪高昂，谈笑风生，他对师哲等不曾离开莫斯科的我方人员说，他向主席作了汇报，承认了错误。

起初师哲等不明白周恩来指的是什么，谈完后，他们才明白。师哲不以为然他说：“多喝了一杯酒还值得向中央汇报？！如果这样，那些苏联的酒桶们恐怕得三天两头儿向中央作检讨了。”

周恩来说：“那不同，那是他们。”

周恩来再次来到了莫斯科，代表团又用了两天时间，除协调与会的方针、策略和校对口径外，还研讨了需要整理和研究材料。这时，胡志明、范文同也在莫斯科。周恩来和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胡志明（化名丁同志）一起研究了印度支那问题。

利用逗留两天的机会，中苏双方举行了各种座谈会，邀苏联外交部的若干人，包括葛罗米柯，到8号公寓来座谈，回答中方代表团提出的各种问题，并介绍在各种国际会议中的斗争经验和应注意的事项等等。

座谈中，中方代表提出的问题很多，苏联外交人员回答得也比较细致。给中方代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如何保密，如何防止被偷听、被窃取、上钩、上当、走漏消息，或受骗等。

葛罗米柯说，我们的对手是狡猾的，会用一切手段刺探我们的意图和动向。因为他们比我们更了解“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而且要用一切办法把我们置于他们的掌握之中。现代技术已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使各种窃听、窃取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因此，我们要行动检点，注意保密，尤其应该随时注意，不论住旅馆、公寓、沙龙或别墅，都难以防止或发现他们事先早已设置的窃听器，或其他窃密装置。

### 机舱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因为日内瓦会议是我国第一次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为了练兵，我方有意多派了一些同志，共约200多个工作人员，是第二个大代表团（苏联代表团有近300人之多）。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都是代表，王炳南力秘书长，雷任民、师哲、乔冠华、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黄华、龚澎、吴冷西、王悼如、雷英夫为顾问。张闻天、王稼祥没有参加完会议的全过程。李克农由于不懂外文，而主要负责代表团秘书、机要、警卫、翻译、后勤等内部事务。一切工作安排主要是由周恩来亲自负责主持。

4月24日上午，我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前往日内瓦。飞机在东柏林短暂停留。民德总理格罗提渥到机场迎送。当代表团正在机场中心大楼进餐时，

有人通知说，莫洛托夫的专机即将来临，请大家加快进餐。大约在莫洛托夫到达柏林之前十多分钟，中国代表起飞继续前进。

登上飞机后，中国代表团才发现机舱里多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个身着军装的年轻人。经了解，他是一个美国士兵，来执行任务的。原来，东西方之间有个协议，从东柏林起飞的苏联飞机，飞经西柏林和西德领空时，一律得事先照会在西德的美国驻军，西方驻军派一名观察员随机飞行越过西柏林和西德领土上空。那位不速之客，就是执行此项任务的。看样子，他只有20多岁，红红的脸蛋儿，满脸的稚气，笑眯眯的容貌，惊奇地张望着机舱里的乘客。中国代表团谈笑风生，你来我往，亲密无间。他受此气氛的感染，不由得独自笑了起来。他可能是第一次见到东方人，对机舱里任何人的言行表现，无不觉得新奇、惊愕。

24日下午，我国代表团抵达日内瓦机场。刚一下飞机，各国摄影记者发疯似地拍摄镜头。周恩来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书面声明。声明说，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解决上述亚洲迫切问题的可能。”

随后，代表团驱车到驻地——城郊莱蒙湖畔查尔索瓦镇的万花岭别墅。

到驻地不久，周恩来又带领必要的人员到机场迎接莫洛托夫。这回机场上的气氛更加热烈，不少外国代表团都到机场迎接。莫洛托夫一下飞机，就同周恩来握手、拥抱。

莫洛托夫在机场对记者发表谈话。他说：“不能不指出这一重要事实，即：所有的大国——法国、英国、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代表最近几年来首次共同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苏联代表团在会上将竭力促成用和平的方式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的朝鲜，以符合巩固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利益。同时，苏联代表团认为，尽速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保障印度支那人民的自由和民族权利是日内瓦会议最重要的任务。”

讲话完毕，他同周恩来并肩而行。二人边走边谈，十分亲热。这时，外国记者、摄影师爬满了机场通道的栏杆周围、墙角和窗口上，乱吼乱叫，要求给他们留一个镜头。莫洛托夫对周恩来说：“我们稍微走慢点，站下来，略谈几句话，给他们留下几个镜头。”于是，周恩来、莫洛托夫走走停停，边说边笑地并肩步入候机厅。事后外国记者们报道，中苏两国外交代表在日内瓦机场上所表现的姿态，是当代外交史上的创举，是真正兄弟般友好的楷模。

## 美国恐吓政策的失败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国际联盟大厦开幕。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英国外交大臣文登轮流担任大会主席。每个会议主席可以选两名助手坐在主席台。当莫洛托夫担任主席时，宣布葛罗米柯和师哲为他的助手。美国代表一看中国人走上主席台，大惊失色。

出席会议的国家有：中、苏、美、英、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

亚)、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等 19 个国家，其中有 14 个国家参加了以美国为首的侵朝的联合国军，再加上大韩民国，都是朝中人民军队的手下败将。他们对中、苏、朝的态度是可想而知了。会议的成员国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没有几个。中国代表在活动中自然受到了限制，遇到些困难。但周恩来这位杰出的外交活动家，在那样的环境中，却丝毫没有感到什么不方便，也没有受到旧时代外交界遗留下来的那些陈规俗套的约束，他以极其机敏的智慧、超凡的目光、宽阔的胸怀、灵活的手法和无产阶级政治家、外交家的气魄，顺利地打开了局面，不仅使中方代表没有陷于孤立地位；而且还帮助有些国家代表团打开了局面，争取到不少新朋友，沟通了我国与许多国家的关系。

关于日内瓦会议，当时“政治顾问”（实际任务仍离不开俄文翻译），离休前是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局长兼外文出版社社长的师哲，后来回忆了以下几件他终身难忘的事情。

这次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为了促进朝鲜和平统一，撤退在朝的一切外国军队，举行朝鲜自由选举，朝、中、苏三方代表在会上同以美国代表为首的一方进行了顽强而艰巨的斗争，提出了一系列和解方案。

但是，美国根本不顾朝鲜人民的利益，拒不从朝鲜撤军，要求根据李承晚的宪法，由联合国监督全朝鲜选举。他们忘了美国是打着联合国的名义参加侵朝战争的。联合国已失去公平处理朝鲜问题的地位。美、韩顽固坚持不解决问题的立场。

美国人依仗美国是金元帝国，在会场上蛮横无理，横行霸道。开会时，他们不顾礼节，将两只脚跷在桌子上。有一次，李承晚的代表卞荣泰讲了句话，不符合美国的口径。因为卞荣泰想多少解决一些问题。美国代表马上跳起来，当着大家的面呵斥他，如同在家里呵斥自己的孩子一般。弄得卞荣泰尴尬万分，下不来台。真是有强权无公理。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是顽固的反共分子。资本主义各国基本都看美国人的眼色行事。加拿大是跟得最紧的一员。

会场休息室摆了咖啡、糕点、水果。休会时，大家一边吃一边谈，可以随意走动。这也是各国代表交谈、接触的好机会。休息时加拿大的代表悄悄对中国代表说，他听了周恩来的发言，认为很合乎情理。中方代表对他的态度信以为真，反映给周恩来。周恩来听了也很高兴，以为他会讲几句公道话。谁知休息过后，加拿大代表发言，又将杜勒斯的提案大加发挥，并重复美国对中国的攻击、污蔑，骂我国挑起朝鲜战争，是侵略者等等。散会后遇见中方代表，他又主动同我国代表握手，请我国代表原谅，说他必须听美国的话，照美国的意图讲话，不能越雷池一步。

中方代表这才知道这些人都是没有灵魂的傀儡，也由此发现他们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于是也随之调整了对他们的政策，采取利用矛盾、分化瓦解、争取多数的策略。

在中、朝、苏三国联合斗争下，美国的恐吓政策失败了。5月30日，杜勒斯就离开日内瓦回国，留下副国务卿史密斯出席会议。

### 史密斯拉周恩来的衣袖

史密斯多少有点民主作风，但他不敢破坏杜勒斯不准同周恩来握手的规

定。休息时，周恩来同莫洛托夫谈话，师哲为他们翻译。史密斯一手拿着咖啡杯子，一手空着，在旁边转来转去。不一会儿，史密斯挤进来，同莫洛托夫握手，然后用手拉了拉周恩来的衣袖。这样表示既不破坏杜勒斯的规定，又向周恩来打了招呼。

周恩来始终没有主动和他握手。中国代表早已知道了他们的章法和规定，所以从容不迫地应付了一切场面。

6月15日的大会，斗争十分激烈，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已是第51天了。这天是由艾登担任会议主席。

首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日外相提出新的6点建议。

周恩来发言表示同意。周恩来说：“我们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已经取得了不少一致和接近一致的意见，我们应该把已经一致和可以一致的意见肯定下来，然后对分歧之点，继续讨论，以便对各项问题达成完全的协议。”“照目前会议的情形来看，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对和平统一朝鲜的问题达成协议，我们也应该努力对巩固朝鲜和平的问题达成协议。为了朝鲜人民的利益，为了巩固远东及世界的和平，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讲话中，周恩来揭露了美国不容许日内瓦会议成功的阴谋，并呼吁“我们没有理由不可能在南日外相提出的6项建议的基础上达成适当协议。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本会议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7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

最后，莫洛托夫发言，提议与会的19国发表关于不威胁朝鲜和平的共同宣言。

这3个建议一下子打乱了美国的阵脚。艾登宣布休会。美国等15国及南朝鲜紧急磋商。复会后，首先史密斯发言，否决苏联的建议。泰国宣读《十六国共同宣言》，企图强行结束对朝鲜问题的讨论。

周恩来再次发言，深感遗憾地说：就连这样一个表示共同愿望的建议，都被美国代表毫无道理地断然拒绝。会议已开了这么久，我们不能功亏一篑，建议“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他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周恩来说：“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和有关国家所拒绝，那末，这种拒绝协商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

比利时外长、老外交家斯巴克为周恩来的诚意所感动，起而响应，说：周总理的意见有合理成份，可以研究。并说：“周恩来外长的建议和十六国宣言精神不矛盾。希望以后恢复对朝鲜问题的讨论。”

周恩来抓住时机第三次发言：“如果十六国宣言和中国代表团的最后建议有着共同的愿望，那么，十六国宣言只是一方面的宣言，而日内瓦会议却有十九个国家参加。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共同协议的形式来表示这一共同愿望呢？难道我们来参加这一会议却连这点和解精神都没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我不能不表示很大的遗憾。”

斯巴克接着说：“我本人赞成大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这个建议。”

史密斯又气又急，瞪着眼睛看着斯巴克。但是比利时毕竟不是南朝鲜，史密斯不好发作，急忙派人送了一张条子给斯巴克。

这时，艾登主席说：“比利时代表认为中国这个建议表达了本会议工作

的精神。如果大家同意，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为会议普遍接受。”  
会场短时间的寂静，没有人表示反对。

### 英国人气急败坏

史密斯仓惶站起来说：“在请示我的政府以前，我不准备表示意见，也不准备参加对刚才有人建议通过的决议。”

周恩来以缓慢和沉着的语气第四次发言。他说：“我对比利时外长所表现的和解精神感到很满意。会议主席的态度也值得提及。然而我必须同时指出，美国代表立刻表示反对并进行阻挠，这就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

会场鸦雀无声，静得让人心跳。周恩来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要求把我刚才发言载入会议记录。”这马上得到会议主席的同意。

周恩来的入情入理、机敏智慧的发言，将美国政府顽固好战的立场揭露无遗。

这场舌战真是妙不可言。

后来，史密斯私下表示：会议结束后，他就辞职，不愿再干这个副国务卿的差事了。既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又不能根据事实真相办事。

### 第三节 拉开解放大陈岛战幕

#### 我军决定先攻一江山岛

为了打击美国人在日内瓦的嚣张气焰，5月15日至20日，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部队先后攻占大陈列岛的东矾山、头门、高岛、龙金岛、雀儿岱等岛，拉了解放大陈岛的战幕。

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认为，下一步应先攻占一江山岛。

一江山岛位于浙江省台州湾外东海中，由南江、北江两个小岛组成，相距110—250米，中间相隔一条江，形成南北对峙，这就是一江山岛名的由来，岛上面积共1.7平方公里。其北江岛稍大，东西宽1900米，南北长100—700米不等，面积约1平方公里；南江岛东西宽约1010米，南北长约300米，面积约0.7平方公里。该岛西北距浙东陆地黄岩县海门镇（现为椒江市）30余公里，东南距大陈岛16.6公里，北距头门山9公里，为上、丁大陈岛的前哨阵地。

我国大陆解放后，国民党军残部纷纷撤逃，一部退踞浙东近海岛屿，同大陆人民解放军形成隔海对峙的态势。虽其兵力有限，但其用心良苦，企图以大陈、披山、一江山等岛为依托，屏障台湾，进而实现反攻大陆之黄粱美梦。因为一江山岛的地理位置的重要和地形的险要，台湾当局对它更是倍加关注。国民党“国防部长”俞大维说：“一江山岛是大陈岛的门户，大陈是台湾的屏障，一江不保，大陈难保；大陈不守台湾垂危！”他还和美国军事顾问一起专门对一江山岛作了防御部署，配备守军1100余人，岛上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有较强的火力配备。蒋介石对一江山岛设防特别关心，提出了“保卫台湾，必先固大陈；要守住大陈，必确保一江山岛”的口号。为守护这扇大门，宋美龄曾代表蒋介石亲临该岛“慰问”官兵。蒋经国也在台“国防部长”的陪同下，到该岛巡视。

#### “解放台湾”口号响彻神州

日内瓦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渠道，向全世界表示解放台湾的决心。人民解放军的海空力量逐步移向东南沿海，精锐野战部队也在陆续调入东南沿海地区。

195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一定要解放台湾》中指出，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台湾苟延残喘，不断向大陆挑衅，破坏公海航行自由。中国人民再次向全世界宣布，一定要解放台湾，决不允许有侵犯中国领土的事存在。

7月24日《人民日报》在《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任务》社论中指出，人民解放军的任务就是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消灭蒋介石残存集团，解放台湾。

8月1日，朱德在纪念“八·一”建军节大会上讲话指出：不要忘记台湾还未解放，不消灭蒋介石集团，不解放台湾，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就没有完成；台湾一天不解放，全国人民、全体解放军就没有洗清身上的耻辱。

8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发表《解放台湾联合宣言》，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国

干涉，号召全国人民全力以赴完成这一光荣的历史任务。大陆的词作家和作曲家也谱写了激昂的歌曲，顿时，“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和歌声响彻神州大地。

## 战前周密准备

1954年8月2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主持召开了解放浙、闽沿海岛屿的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总参谋长粟裕、作战部长张震、铁道部长吕正操、通信部长王净、海军副司令方强、空军副司令王秉璋和沈阳军区副司令邓华以及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等人。

张爱萍在会上作了解放大陈列岛战役作战设想——首先攻占一江山岛的专题汇报，同时佯攻披山，得手后，全力进攻大陈本岛。彭德怀对此方案表示同意，并说要充分准备，慎重初战，攻则必胜……

8月24日，彭德怀又听了华东军区“进攻一江山岛的登陆作战方案”的汇报，并对此次作战问题作了很具体、很详细的指示。并说：“轰炸大陈岛的那一天，要想尽一切办法查明大陈港内及其停泊在那里的美军军舰，如有美舰在那儿，我们暂时不攻击，等他离开以后再打，这样可以减少很多麻烦。我们的原则是，既不惹是生非，但也绝不示弱……”

华东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和彭德怀的指示，对一江山岛渡海登陆作战作了战前周密的准备和精心的部署。同时在宁波组建华东军区浙东前线指挥部，由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浙江军区代司令员林维先、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彭德清和参谋长马冠三任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参谋长王德任参谋长。浙东前指下设3个军种指挥所：空军指挥所，由聂凤智任司令员；海军指挥所，由彭德清任指挥，马冠三任副指挥；登陆指挥所，由陆军第20军副军长黄朝天任司令员，海军舟山基地政治委员李志明任政治委员。

确定参加这次作战的部队有：步兵第20军之第60师1个团又一个营，地面炮兵1个多团，高射炮兵1个多团，火箭炮兵2个营及喷火兵和工兵各一部；海军航空兵7个大队，海军第六舰队，鱼雷快艇、登陆运输船艇各一部和部分海岸炮兵；空军航空兵15个飞行大队又1个夜航中队。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浙东前指组成后，张爱萍要求部队进一步摸清敌情。于是，参战部队立即从空中、海上、地面对一江山岛进行了详细而周密的侦察。运用多种侦察手段，实施多方向、多层次、多种方式的侦察。主要有：航空侦察，先后共进行了8次航空照相，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抵近观察，组织了7次侦察分队，抵大茶花礁、百夹山、雷鼓礁等处，对岛上进行侦察。其中，由登陆指挥员亲自率领侦察人员，以打渔为掩护，化装进抵岛1000余米处直接进行观察。另外，还通过隔海观察、越海捕俘、谍报侦察、雷达侦察、海面巡逻侦察等手段，进行反复敌情核对。

9月，浙东前指举行作战会议。张爱萍宣布作战计划：

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夺取战区制空、制海权，掩护参战部队进行战前训练，同时创造孤立，围困，封锁大陈岛国民党军的战场条件；第二阶段为实施渡海登陆作战阶段，以4个步兵营，隐蔽进入进攻出发海域，尔后在海、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下，对南、北两个小岛同时实施登陆突击，主要突击方向是北江岛的西部和西北部，辅助攻击方向是北江岛的东北部和南

江岛的西部。规定登陆突击应是在白天满潮时进行。

他分析解释说：这次登陆作战，第一，登陆地段只能选在登陆条件差的岛岸突出部，以避开岙部滩头地段敌火力封锁，这样既可出敌不意，又能利用地形直接迅速登上岛岸各主要阵地，割裂对方防御体系，各个歼敌。第二，我军是首次举行联合渡海作战，缺乏经验，夜间登陆突击难度大，而白天能够准确掌握登陆点，减少因登陆地段狭窄而造成的混乱，有利于三军协同作战。至于担心白天渡海可能遭国民党空、海军袭击问题，由于我军已有夺取制空、制海权的把握，也就可以放心了。

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始了，只俟时机成熟。

作为大战的前奏，双方的飞机、舰艇频繁在空中、海上纠缠格斗，都想把制空、制海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 美台加紧缔约步骤

在人民解放军紧锣密鼓的备战过程中，台美之间共同防御条约也在加紧筹划。

1954年5月，美国国防部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和海军部副部长托马斯·盖茨来到台湾访问，他们是就双方缔结防御条约的问题，代表美国政府来与蒋介石交换意见的。

威尔逊说：“我国政府对贵方所提缔约的建议，认为很有这个必要。我们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想就此彼此交换意见。”

“好，好。”蒋介石微笑颌首。“我们愿与美国重修抗战期间的旧盟，在西太平洋上对付共产国际的侵略，成为中美两国共同防御的责任。我们中华民国参加这个安全体系之后，不独其能弥补太平洋防线的空隙，且能强固我后方基地，更可使我今后反共复国事业立于不败之地，并获得事半功倍之效。”

“我国政府也认为，缔结防御条约是有益于我们双方的。”威尔逊表示说。

蒋介石点点头说：“美国在东亚应该拟定和奉行一种摆脱老殖民主义影响的政策，否则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叶公超说：“中美之间缔结一个条约，是在日本、韩国、菲律宾和中华民国这四个最直接有关的亚洲国家之间进行一种集体安排安全的先决条件。”

威尔逊点头表示同意，随即说道：“根据目前台湾现状，我们向总统先生提个建议，能否全面自大陈、马祖、金门等外岛撤退，集中兵力防守台澎。我国政府认为，如果双方缔约，条约也只适用于台湾和澎湖地区，而不能包括其它地区。”

蒋介石收敛了脸上的笑容，美国驻台顾问团也曾提出过这个建议，已被他断然拒绝，现在对方又将此提出，他心里自然感到不愉快。

“这些岛屿，是我们反共复国的前哨阵地，是不能轻易放弃的。尤其是金门、马祖，它们不仅是前哨据点，也是防卫台澎的屏障。对这些岛屿来说，不存在撤退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强防的问题。”蒋介石停了一下，告诉对方说：“我刚刚下了命令，派部队增援大陈、金门。”

“我们可以理解。”盖茨插上来说。“我认为有必要提醒一下总统先生，



目前我国在远东的海空力量因需保护巡航地域很广，只能顾及台澎地区，如果要将范围扩大到贵国的全部岛屿，除非从美国本土再增派海空力量到远东来，而这是不现实的。”

叶公超说：“既是两国之间的缔约，似不宜将一方的一些领土摒弃于条约之外。”

蒋介石也强硬表示不能接受。

威尔逊无可奈何地耸耸肩，随即又提出台湾方面未经美国同意，不能对大陆采取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

“反共复国是我国既定目的，”蒋介石不容置疑地说。“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是我们中国的内政问题，不应列入防御条约条款之中。”

威尔逊与蒋介石先后进行了3次长时间会谈，都不能就这两方面的分歧达成统一。

对于美国坚持未经它的同意，台湾方面不能采取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蒋介石为了尽早签订条约，决定作出让步。

6月28日，叶公超通知蓝钦：“如能缔结共同防御条约，蒋总统同意在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之前，先征求美国同意。”

8月24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美国已决定协助台湾防守台湾本岛和外围岛屿，并正考虑与之缔结一项双边协防条约，建立一个东北亚的安全体系。

## 新中国的抗议

为了打击美国当局政府的侵略政策和制止国民党军对东南沿海的侵袭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福建前线部队：在美蒋预谋签订条约期间，对金门国民党军实施惩罚性打击，以炮火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9月3日下午1时50分，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向大小金门、马祖发起猛烈炮击。顿时，金门、马祖岛上硝烟滚滚，火光弥漫。

我军的强烈火炮摧毁了国民党炮兵阵地7个，击沉炮艇、拖轮各一艘，击伤猎潜舰3艘，击毁水上码头一个。这一炮把蒋介石打懵了，他一时摸不清中共的真正意图，这是准备解放台湾的前奏，还是只为了阻止美蒋签约。

同日，晚7点，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安德森将一份关于共军炮击金门的报告放到了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上，艾森豪威尔大吃一惊，感到台湾问题终于来了。

小小的金门一下子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在美国国内，政坛各界众说纷纭。美驻台“大使”蓝钦等官员倾向协助蒋介石保卫这些岛屿，但最好秘而不宣，让共产党捉摸不透美国的意图。

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为代表的军方多数人则主张采取强硬立场，派海军防卫这些岛屿，并出动空军轰炸大陆。

陆军参谋长李奇微反对美国介入，认为“美国对福摩萨（台湾）的防务能力上说，这些岛屿在军事上并不重要；没有美国支援，中国国民党人不可能守住它们。”

国防部长威尔逊也认为，要守住这些岛屿就必须打击大陆上的军事目标，使美国卷入中国内战，这样，对西方盟国美国无法解释为什么为了几个小岛而同中国开仗。

## “新西兰提案”流产

9月12日，星期日，金门炮战仍在进行。艾森豪威尔在白宫召开特别会议，与会者有杜勒斯、雷德福、威尔逊、李奇微等高级官员。

会议一开始，这些美国官方当权者就为金门等几个小岛争论不休。一阵舌战后，个个弄得面红耳赤，但仍未有结果。

“先生们，”艾森豪威尔制止住会议的争吵，说道：“我提醒诸位注意，如果我们要进行一场全面战争，合乎逻辑的敌人将是俄国，我们需要在那里进攻，而不是在中国。作为美国的总统和武装力量总司令，我认为应优先考虑的是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不能为几个小岛而陷入与中国的战争，从而削弱我们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与苏联抗衡的力量。”

会议沉寂下来，杜勒斯感到这一问题使美国处于“可怕的进退两难”的境地，他考虑再三后说道：“中国共产党人正进行试探，除非我们制止他们，否则，任何的示弱表现都将导致在日本、南朝鲜、台湾、菲律宾及整个远东的灾难。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定下一个方针，直接参与金门和马祖的防务，我们将会发现除李承晚、蒋介石欢迎外，我们处在没有盟国支持的情况下单独与赤色中国交战。”

杜勒斯故意停顿了一下，又说道：“因此，我建议采取一个变通的办法，我们把沿海岛屿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意在获得一项维护原状和实现福摩萨海峡停火的指令。不管苏联否决还是同意这一计划，美国总有所得。”

杜勒斯的建议是折衷方案，同时也是一个十分狡猾阴险的方案。假如苏联在安理会否决这一提案，美国国内、盟国及世界的舆论就会对美国有利；假如苏联同意，美国也就不必再面对这些“该死的小小”岛屿了，从而也使赤色中国在世界舆论面前处于理亏的地位。

杜勒斯是利用联合国来达到既能取得停火，又不使美国卷入同中国的战争，更重要的是这些是以台湾国际地位未定为前提，为以后分裂中国准备了条件，这是一箭双雕。

艾森豪威尔立刻批准了杜勒斯这一方案，并指示杜勒斯尽快实施。

同年10月，杜勒斯代表美国政府立即飞赴英国、新西兰与两国政府进行了紧急磋商，达成美、英两个常任理事国的支持，由非常任理事国新西兰向安理会提出杜勒斯这项提案，并为这项提案取名为“新西兰提案”，又称为“神偷提案”。

当然，这个精心炮制的“神偷提案”在提交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之前，还必须获得蒋介石的同意。

“神偷提案”在蒋介石那里碰壁了。10月9日，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带着这项提案访台。尽管罗伯逊在长达7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会谈中使出了他的全部招数，做出了种种许诺，仍未打动这位冥顽不化的委员长的心，他仍坚持要不借一切代价固守这唯一能表示他仍是全中国最高统治者象征的地理联系上的纽带——金门。蒋介石毫不客气地否决了杜勒斯的提案，强烈反对将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他认为这个提案只能对共产党人有利，外岛停火和中立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台湾中立化，再下来中共进入联合国，最后台湾就要由共产党接管了。蒋介石气愤地说：“如果台湾赞同这个建议，那么对国民党人，对我们的士兵，对生活在本岛的百姓，对

海外侨胞及大陆的中国人将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这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当蒋介石拒绝“新西兰提案”的消息传回白宫时，艾森豪威尔冲着杜勒斯十分懊恼地说：“约翰，我真不明白，这位委员长是怎么想的？他误解了我们诚实而又认真的建议。”转过身，艾森豪威尔冲着桌上的地球仪咒骂道：“这些该死的小小沿海岛屿，有时我真恨不得让它们都沉下去，在这地球上消失掉。”

由于蒋介石的坚决反对，“神谕提案”最终流产了。

艾森豪威尔有他的考虑，他担心向蒋介石施加太大的压力，使其可能在绝望之中放弃整个斗争，“就目前而言，中国国民党人的士气对我们是重要的”；“抛弃蒋介石，我们可受不了”，这样会严重损坏美国在亚洲反共国家面前的信誉。因而，他不得不在蒋介石的强硬态度面前作出了某些妥协，安抚一下台湾当局，加快了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进程。

原来，美蒋在条约中最有争议的是最大的适用范围。现在达成了妥协，把美蒋共同防御范围扩大到台澎之外，美国做了让步，暗示美国可考虑承担台湾、澎湖之外的中国领土义务。但在何种情况对那些领土适用未作解释。美国让步了，他也要求台湾作出让步。美国主要担心台湾当局擅自采取军事行动把已承担条约义务的美国卷入其中，因此美国要求台湾未经美国同意不得采取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蒋介石虽不满意，但为了条约能签订，只好作出让步。同时要求美国不要将这写入条约正文，美国立即同意以换文的方式来表达。

从9月3日始至11月3日止，人民解放军共轰击大、小金门和大、二担岛47次。但炮声并没有阻止台美协防条约的制定进程。解放军浙东前线指挥部按照预定的作战方案进行实施。

11月1日，解放军空军轻型轰炸机在米格15战斗机的掩护下飞临大陈岛，猛烈轰炸岛上设施及泊港舰艇。头门岛上解放军炮兵则用岸炮轰击一江山岛。

11月2日，国民党军出动F—84战斗机攻击头门岛，解放军空军则出动轰炸机投弹一江山岛。

11月3日，国民党军派出轰炸机猛炸头门岛，解放军也派出轰炸机再次轰炸大陈岛。

这种胶着的战况，无日无之，构成了一江山岛战役的前奏曲，11月14日，解放军海军击沉国民党海军“太平”号军舰则奏响了这前奏曲中的最高音。

## 第四节 海峡两岸首次大海战

### 鱼雷快艇设下埋伏

1954年10月下旬，我军设立在高岛上的海军观通站向前指报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即国民党海军护卫舰“太平”号经常行驶在温州湾、三门湾和台州湾一带窜扰。其实，在当年的5月和8月，海峡两岸舰艇已经先后展开了两次小型海战。

1954年5月，国民党海军炮舰“楚江”号（系日本投降时接收的日本驱潜舰49号）偷偷驶往硬门岛“接运国军地下工作人员”，被我巡防的数艘炮艇发现并围堵、打退。

8月初，台湾国民党海军“联仁”（107号）、“联智”（106号）两舰曾到我海区窜扰。当时的“联仁”号舰长为汪希苓（中尉），这个后来担任台湾情报局中将局长的台湾第六届“国军英雄”，主要“战绩”即为当年8月窜犯至我福建省的铜山港，对停泊于此的我海军舰艇部队和港湾设施进行火箭袭击。我军在国民党炮舰偷袭下奋勇出击，将“联仁”、“联智”这两舰联合编队的海上突袭进攻击退。

高岛海军观通站将“太平”号活动规律掌握并呈报前指后，为了不打无把握之仗，前指司令员张爱萍于10月25日抵达高岛，在通观站亲自通过观通镜核实这一情报的准确性，通过与前指及下属的三军指挥所负责人研究，终于定下了攻击“太平”号的作战决心，并制订了严密的战斗组织方案。前指很快批准了这个攻击计划。

“太平”号军舰是美国在1946年送给蒋介石集团的。全长289.5尺，宽35尺，6000匹马力，排水量（全载）1430吨，舰上配有3寸口径50倍身长平高两用炮三门、40公厘高射机关炮4门、20公厘高射机关炮11门和9个深水炸弹投射器。

1954年11月1日，我人民海军鱼雷艇31大队的6艘鱼雷快艇由浙江省的定海港启航，向高岛海域开进。为了寻找有利战机，我鱼雷艇编队利用岛礁和渔船群作掩护隐蔽，悄悄地埋伏在海上……

### 离弦之箭飞驶目标

11月13日，浙江海面的天空降着蒙蒙细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部队的舰艇在汹涌的海浪中巡逻着。水兵们的衣服都被雨水淋湿了，寒冷的海风阵阵吹到他们的身上。但是年轻的水兵们不顾严寒，仍然警惕地站在破浪前进的舰艇上，仔细地观察着祖国的海面。晚上，海上的风浪已经平静下来，但水兵们还是保持着守卫祖国海洋的警惕性。到14日凌晨1时许，指挥员的作战命令忽然传到舰艇上：“在大陈岛和渔山列岛之间的海面上，发现国民党军舰一艘向我骚扰，准备出击！”

水兵们日夜盼望着的战斗就要来到了，舰艇上立即沸腾起来。马达声、机器转动声和水兵们要求任务的报告声响成一片。蒋军舰在海上抢劫渔船、商轮，屠杀渔民，炮击我沿海岛屿和大陆的罪行，也再次重现在水兵们脑海里，他们决心要用英勇的战斗来消灭祖国人民痛恨的国民党军舰。

按照军礼，各舰艇举行了升旗仪式，庄严的五星国旗在旗杆上飘扬着。

各舰艇列成战斗队形，在大海中奋勇前进。这时，平息不久的海风又刮起来了，大浪一个接一个地打来，浪花翻上甲板，海水打在水兵们的身上。尽管海水从脖子一直流到脚跟，但负责了望的水兵孙锡田不时地抹去脸上的海水，继续观察着海面。忽然，他向指挥员报告：

“右舷发现闪了一下火光！”

“加强观察！”指挥员回答。

不一会，孙锡田便看见在远处海面上出现了一个长长的黑影，从舰形上判断，它就是蒋海军的“太平”号军舰。

我军舰艇继续迅速地向其靠近，这时我军已经看到了蒋军舰舰首上的锚爪了。他们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1时30分，指挥员发出了向蒋军舰攻击的命令。各快艇立即组成了进攻队形，并加快速度向前驶进。离蒋军舰越来越近了。指挥员刚发出了“预备——放！”的口令，各舰艇立即向这艘军舰展开了猛烈的轰击。蒋军舰受到突然而猛烈的打击以后，舰上的炮毫无目标地发射起来。

在我军连续不断的猛烈轰击下，这艘蒋军舰当即被击中了，舰头部分冒起的黑烟笼罩了驾驶室和舰桥，从舰两旁冲起的巨大的水柱也顿时漫没了舰身中部。这时，蒋军舰上残存的大炮更加慌乱地发射着。

我军勇敢的水兵们在完成战斗任务后安全地迅速返航。他们回头望着仍在盲目发射着炮火的蒋军舰，兴奋地说：“尽管打吧！等一会你就要沉下海底去喂鱼啦！”

## “太平”号沉入大海

这艘蒋军舰被击中后，在海面上顺着潮水飘荡了3个多小时。拂晓时候，守卫在前哨海岛上的指挥员、战斗员们都兴奋地跑到海岸上去观望。他们迎着露出海面的朝阳，欢腾地观看着这艘蒋军舰正在下沉的灰影。下面是他们的叙述。

14日天明后，在波涛汹涌的大陈岛东北海面上，有一艘蒋军舰拖着逐渐下沉的“太平”号护航驱逐舰，缓慢地向南移动，在它旁边，还有几艘蒋军舰和炮艇在慌乱地来回打转。这时，“太平”号的舰头已经沉进水里，驾驶室只剩下一点点痕迹露在海面上，那根挂满旗帜的桅杆，倾斜得好像一门半升起的高射炮的炮筒。

7时15分，“太平”号的驾驶室已绿全部沉入海里，那根桅杆只剩下一个顶端露在海面上。这时在前面拖着它向大陈岛爬行的那艘蒋军舰慌忙地松开了铁索。蒋“太平”号军舰一失去依托，翘在水面上的舰尾部分就迅速地沉到大海里去了，舰上惊慌失措的蒋军纷纷跳水逃命，周围海面上立即浮起了很多黑点子。7时30分，这艘美国造的1430吨的“太平”号护航驱逐舰就全部沉入海底了。

这时大陈岛信号台上的蒋军还在慌乱地打着旗语，因为停泊在锚地里的蒋军炮艇和驳船，都吓得披上了防空伪装，在大陈岛附近乱窜。直到上午10点多钟，大陈岛上蒋军才从慌乱中逐渐沉寂下来。

台报对“太平”舰被击沉的报道“太平”舰被击沉的消息传到台湾，台舆论界一片哗然，下面为台报对其“太平”舰被击沉的有关描述：

民国43年（即1954年）11月14日深夜12时5分。

我海军作战舰队之“太平”护航驱逐舰在台湾温州湾外执行轮值监视任务中。舰上之官兵有 180 名。

为了了解这一带国军军舰之动态，中共海军东海舰队第 31 鱼雷快艇中队，在大陈岛的对面地区配置了 6 艘鱼雷艇。第 31 鱼雷快艇队指挥官并搭乘一艘鱼雷快艇在高岛登陆，登至展望良好之山顶，以无线电指挥鱼雷快艇部队。

第 31 鱼雷快艇中队的“155”、“156”、“157”、“158”等 4 艘快艇，已经在 10 月 31 日完成出击准备。

此时，这 4 艘鱼雷快艇在暗礁、岛影、渔船群的掩护之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了“太平”号驱逐舰；47 分钟后，鱼雷快艇已悄悄地驶至“太平”号驱逐舰之巡戈水域。

凌晨 1 时 28 分（时已 11 月 14 日）。先头的鱼雷快艇“155”号之炮手在右舷发现了灯光但却是一群在附近水域作业的渔船。

另一方面，“太平”护航驱逐舰上的“SC”雷达屏幕上，却无法识别出隐藏在渔船夹缝中的已迫近的 4 艘共军鱼雷快艇。

此刻，在高岛山顶了望的鱼雷快艇队指挥官，以无线电通知第 31 鱼雷快艇中队：“敌舰在右方 30°。”

第 31 鱼雷快艇中队指挥官即将所有兵力“155”、“156”、“157”、“158”号鱼雷快艇分为两个部分，进行波状攻击；中队长令成“左梯队”阵势，进行突击。

4 艘鱼雷快艇同时发射 4 枚鱼雷，并再一连发射 4 枚，一共发射了 8 枚鱼雷。这绝对是奇袭作战。8 枚鱼雷中的一枚命中了“太平”护航驱逐舰的舰首，立刻掀起了冲天水柱。时为凌晨 1 时 37 分，天色未明。

那时“太平”护航驱逐舰上的官兵以为是中共军机临空攻击，即以舰上装配之 40 公厘机炮进行对空防护射击，当时台湾海峡的制空权是由国军的美造 P—47 战斗机所掌握。但是由于国军军机航程、油料所限制，不能一天 24 小时的临空掩护，中共空军军机仍不断地出现在台海上空。因国军军机自台湾北部基地加满油料升空巡戈，至东海温州湾一带空域。只剩下返航的油料，只好立刻返航，中共空军军机遂有地利之便，国军军舰必须保持一级战备之态势。

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战史可知，被一枚鱼雷命中后即沉没之护航驱逐舰之例有之，重伤后依然幸存者之例亦有之。由“太平”号护航驱逐舰之状况来看，起初大家均以为它一定可以撑得下去。

3 个小时后，友军的 3 舰高速赶至作战水域支援，开始收容“太平”舰上生还的 152 名官兵。

但是，将近 3 小时的驳接、援护之后，11 月 14 日早上 7 时 15 分，“太平”护航驱逐舰浸水日增，舰上及友舰官兵奋力抢救之后，终于无力回天，而宣告弃船。

现在尚存有“太平”当时不甚清晰的遗影，她在汹涌的波涛之中，左舷缓缓倾侧的舰姿，个人伤心。

7 时 24 分，奋战力尽的“太平”护航驱逐舰舰首首先沉没于滔滔白浪之中。其地为高岛之南 18 海里之海上。

“太平”舰上载之 180 名官兵中，有 28 名官兵（含中校副舰长一名）战死，行踪不明；舰长子获救返台后即前往慰问阵亡官兵遗属，以表哀悼之意，

并藉

### 表崇功追思之情。

“太平”舰官兵阵亡人数不多之主因为中共鱼雷快艇所发射之鱼雷，所命中之部位为乘员较少之舰首仓库。

这一次海战被命名为“第一次东海海战”；“太平”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海战之中被击沉的第一艘驱逐舰以上之战斗舰艇，亦为世界海战史上第一艘被鱼雷快艇击沉之主力舰只……

### 美蒋感到十分惊慌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国民党当局在“太平”号军舰被击沉后的24小时内，接连举行了两次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付这种局势。蒋军事头目还对蒋海军部队发出紧急命令，要他们提防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的攻击。

“太平”舰被我人民海军鱼雷快艇部队一举击沉后的第二天，即11月15日，蒋介石为给被震惊的“全台军民”鼓气，立即颁布了抚恤令和褒奖令给毙命和生还的该舰官兵。

褒奖令号召“建舰复仇”，并派人组织台南工学院等大专院校学生发起了一个“建舰复仇”运动。

国民党驻美国“大使”叶公超也出面发表谈话说：“‘太平’舰的沉没，无损于中国政府的领导，三分之二的中国人民仍大力支持我政府……。”

同日，国民党当局还和美国当局商量，要求给予更多的军事援助。

大洋彼岸，对“太平”号军舰被击沉有一片“狼来了”感觉。

合众社说，“太平”号军舰的被击沉是一个“惊人的行动”，这艘军舰是蒋海军的骨干之一。合众社还说，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显示的攻击力量，“使得台湾的军事当局感到越来越惊慌”。

美联社也说，“太平”号军舰的被击沉是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的“重大的胜利”，它“使国民党人大吃一惊”。

华盛顿方面对蒋海军遭到的这一沉重打击也感到非常不安。

据路透社报道，华盛顿方面人士表示，“太平”号军舰的被击沉“证明共产党中国现在拥有很大的海军力量”。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评论员柯斯特洛14日说，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日益强大的力量，肯定会构成对蒋海军的“严重的潜在威胁”。

### 参战部队受到欢迎

击沉蒋海军“太平”号军舰的人民解放军某海军部队，15日在返回海军基地时，曾受到部队首长和战友们的热烈欢迎。

15日晨，几百个海军人员就排列在基地的码头上，等候某海军部队胜利归来。

当这支海军部队的舰艇在远处海面上出现时，欢迎的人群就热情地向他们挥手欢呼。

不久，这些舰艇排成一路纵队徐徐驶进港口。舰艇上的五星红旗迎风飘

扬。参加这次战斗的某海军官兵怀着兴奋的心情，站在甲板上向岸上的人们挥手答礼。

码头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口号声。停泊在码头附近的某军舰上的水兵们，也在甲板上为战友们创造的光辉胜利欢呼。

当胜利归来的水兵们走上码头时，欢迎的人群拥过去向他们献花，和他们热烈地握手、拥抱，并把他们高抬起来。在码头上迎接水兵们的海军某部首长，也向他们表示了亲切慰问。

当晚海军某部为胜利归来的水兵们举行了欢迎大会。海军某部代表在会上宣读了部队首长的慰问信。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领导机关 14 日通令嘉奖浙江前线击沉蒋海军“太平”号军砌的海军部队。

通令中说：

直接击沉蒋贼护航驱逐舰“太平”号的部队应予记功。

通令中并勉励海军参战部队应戒骄戒躁，不断提高技术、战术，积极地连续地打击蒋军，争取更多的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海军司令部通令表扬协助我人民海军舰艇击沉蒋军“太平”号并荣立集体三等功的浙江前线某雷达站全体人员。

通令中说：

由于你们辛勤地忘我工作，及时地发现了蒋贼军舰的行动，准确地协助指挥员下达了作战的决心，使我人民海军英勇的舰艇能以迅速、突然的动作取得了击沉蒋贼军“太平”号军舰的胜利。

通令还希望雷达站全体人员再接再厉，提高业务水平，以便配合其他部队更有效地打击和歼灭蒋军。



## 第五节 解放一江山岛

### 美蒋达成共防条约

经过较长时间的协商和互换意见，1954年12月1日，美台谈判达成协议。

12月2日，台湾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分别代表台美双方在华盛顿签署了《台美共同防御条约》。

这个条约共有10条，前面有一个序言。

新华社在12月4日发表文章，对该条约的序言和全部条文进行了揭露，指出：

条约的序言包括了一大堆掩饰美国的侵略意图的谎言。说，缔约国重申他们“对联合国宪章之宗旨与原则之信心及其与所有人民及政府和平相处之愿望，并欲增强在西太平洋区域之和平机构”。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话。美国通过美蒋条约无限期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而且公开宣布要用武力来干涉中国的内政，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作战，这完全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的行为。至于所谓缔约国双方希望“增强在西太平洋区域之和平机构”，人们知道，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从来没有建立过什么“和平机构”，反之，它已经建立了一系列的侵略性的军事集团——东南亚公约集团以及美国和李承晚集团、菲律宾等国家订立的侵略性的双边条约，美国企图通过一系列条约在西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由美国控制的军事侵略体系。美蒋条约显然不是为了增强这个地区的什么“和平机构”，而是为了增强美国所策划的军事侵略集团的体系。

序言还“公开和正式宣布”了美蒋双方为“自卫而抵御外来武装攻击的共同决心”，“并愿加强两国为维护和平和安全而建立集体防御的现有努力”。这就完全暴露了所谓“和平相处”、“增强之和平机构”的虚伪性。原来签订这个条约的目的之一就是所谓“抵御外来武装攻击”，也就是说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但是中国人民要解放台湾是中国内部的事情。在中国领土上的中国人民进攻在中国领土上的蒋介石反动集团，无论用什么理由也不能说明这是所谓“外来武装攻击”。很明显，美国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就是干涉中国的内政。美国这种侵略行为，与“维护和平和安全”毫无共同之点。

条约的第1条说：“本条约缔约国承允依照联合国宪章之规定，以不使危及国际和平安全与正义之和平方法可能牵涉两国之任何国际争议，并在其国际关系中不以任何与联合国宗旨相悖之方式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这一条不过是美国在它所签订的许多侵略性的条约中共有的一条装饰。事实上。美国介入朝鲜战争和长期侵占台湾的记录已经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表明了它的所谓“和平方法”和“不以任何与联合国宗旨相悖之方式”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且这一条文经过台湾“外交部”次长沈昌焕的解释，更清楚地表明对台湾当局进攻大陆并无任何限制，却不许中国人民自己来解放台湾和澎湖。

条约的第2条说：“为期更有效达成本条约之目的起见，缔约国将个别并联合以自助及互助之方式维护并发展其个别及集体之能力，以抵抗武装攻击。及由国外指挥之危害其领土完整与政治安定之共党颠覆活动”，是这个条约中最重要的一条。一言以蔽之就是：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和澎湖。为

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就要加紧对台湾受到攻击时出面进行武装干涉。此外，美国还要竭力扶植台湾当局加强其暴虐统治，防止这具已经没有生命力的政治僵尸在台湾人民愤怒的反抗下完全垮台。

条约第3条说：“缔约国承允加强其自由制度，彼此合作以发展其经济进步与社会福利，并为达到此等目的而增强其个别与集体之努力。”没有人不知道，蒋介石统治下的台湾是一个特务横行的世界，所谓“加强其自由制度”，实际上就是加强警察和特务统治。至于所谓美蒋“合作以发展其经济进步与社会福利”，不过是美国侵略集团进一步掠夺台湾经济资源而已。

条约第4条规定，美蒋之间“就本条约之实施随时会商”。这一条的规定实际上为了使美国便于随时利用这个条约来遂行其侵略战争政策。

条约第5条说：“每一缔约国承认，对在西太平洋区域内任一缔约国之领土上之武装攻击即将危及其本身之和平与安全，兹并宣告将依其宪法程序采取行动，以对付此共同危险。”这就是公开宣布，如果中国人民要解放台湾，美国就要对中国人民采取行动，也就是进行战争。不但如此，这一条还规定：“任何此项武装攻击及因而采取之一切措施应立即报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此等措施应于安全理事会采取恢复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之必要措施时予以终止。”这更彻底暴露了美国想重演侵略朝鲜的故技；操纵联合国来强迫其他国家跟着它一道来进行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并且把战争扩大。

条约第6条规定：“为适用于第二条及第五条之目的，所有‘领土’等辞就中华民国而言，应指台湾与澎湖；就美利坚合众国而言，应指西太平洋区域内在其管辖下之各岛屿领土。第二条及第五条之规定并将适用于经共同协议所决定之其他领土。”这是这个条约中极为重要而且极为露骨的一条。据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蒋介石的“外交部”次长沈昌焕的解释，所谓“其他领土”不但是指现在被蒋介石集团盘踞着的沿海岛屿，而且是指已经解放了的中国大陆。这就证明美国侵略集团随时可以把它的侵占中国领土的侵略行为从台湾和澎湖扩大到中国沿海岛屿直到中国大陆。这一条暴露了美国侵略集团签订这一个条约的长远目的是要支持蒋介石集团在全中国复辟，从而把全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

条约第7条说：“中华民国政府给予，美利坚合众国接受，依共同协议之决定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为其防卫所需要而部署美国陆海空军之权利。”这实际上就是把中国人民的这些领土完全听任美国军队占领，把它们作为美国进而侵略中国大陆的跳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占领部队中除了台湾和澎湖经常驻扎的海、空军外还包括陆军。

条约第8条说：“本条约并不影响且不应被解释为影响缔约国在联合国宪章下之权利及义务，或联合国为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所负之责任。”这实际上就是说，美国在其他地方利用联合国名义进行侵略时，不受美蒋条约的影响。

条约第9条规定：美蒋条约应由美国和蒋介石集团“按照各自宪法程序批准”，并将于“在台北交换本条约批准书时生效”。

条约第10条规定：“本条约将无限期有效”。这就是说，美国将以这一条约为根据，无限期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和澎湖，并利用蒋介石集团作为进行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和挑起世界大战的工具。

总而言之，这个条约全部十条本文外加序文彻头彻尾地暴露了它自己是一个侵略中国领土、破坏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强盗条约，是一个违背

联合国宗旨、违反联合国宪章、破坏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安全的战争条约。

12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

美国政府不顾中国人民历次的反对和警告，竟在1954年12月2日同逃窜在台湾的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政府企图利用这个条约来使它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并以台湾为基地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和准备新的战争。这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的一个严重的战争挑衅。

现在，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公敌。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完全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国干涉。任何战争威胁都不能动摇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只能增强中国人民的愤慨。蒋介石卖国集团没有任何权利同任何国家签订任何条约。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根本是非法的、无效的。它是一个出卖中国主权和领土的条约，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如果美国政府不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仍然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美国政府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的这个“共同防御条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侵略性的战争条约。美国帝国主义是敌视中国人民的。美国政府不甘心于它的帝国主义政策在中国的失败，1950年6月在发动侵略朝鲜战争的同时，便武装侵占台湾，庇护和指使蒋介石卖国集团对中国大陆和沿海岛屿不断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现在，美国政府看到由于朝鲜战争已经停止，不能再用来作为侵占台湾的藉口，于是索性制造了这个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来公开霸占中国的领土台湾和澎湖。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防御性的条约，它是一个露骨的侵略条约。美国侵略集团和它的追随者诡称这个条约是防御性的，但是这种说法丝毫不能掩盖这个条约的侵略实质。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美国政府在它自己参加签订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条款等国际协议中承认了这个事实。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国政府在1950年1月也曾经承认中国对台湾行使主权，美国不拟卷入中国内争。现在美国政府要在远离美国本土5000英里以外的中国领土台湾和澎湖设防和建立军事基地，庇护已为6万万中国人民所唾弃了的蒋介石卖国集团，阻挠中国人民去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这是明目张胆地背弃国际信义、霸占中国领土、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绝不能说成是防御。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是真正的防御行为。日本军国主义者也曾经把他们在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的行为说成是自卫。但是，这种说法从来就没有人相信过。谁都知道霸占别国的领土，侵犯别国的主权，干涉别国的内政，就是侵略。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胜利斗争中久经锻炼的中国人民，决不会容忍美国在防御的名义下侵略中国的台湾和澎湖。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是一个企图扩大侵略、准备新的战争的条约。这个条约同维护和平毫无共同之处。美国侵略集团和它的追随者企图用各种各样的论点来掩盖这个条约的战争目的，但是这是掩盖不住的。谁都知道，美国政府自从武装侵占台湾以来，一直在支持蒋介石卖国集团对中国大陆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现在，美国政府又企图利用这个

条约使美国海空军侵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并取得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陆军的权利，以加强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基地，美国政府在这个条约中公然企图以战争威胁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同时又为它侵略台湾以外的中国“其他领土”作了安排。毫无疑问，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加深了美国对中国扩大侵略的危机。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他 12 月 1 日声明中公开宣称，这个条约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建立的所谓安全体系中的“另一个环节”。这就说明，美国侵略集团不仅要侵占台湾，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而且还要准备新的战争。不久以前在美国策划下签订的马尼拉条约，增加了在东南亚的战争危险。美国侵略集团现在显然是要把这个美蒋条约同马尼拉条约和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其他战争条约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东方侵略体系。美国侵略集团的这种做法，是同它在欧洲策划签订巴黎协定、复活德国军国主义、扩大西方侵略体系的做法互相呼应的。它的目的就在于加深世界的分裂，奴役这些地区的人民，和加紧准备新的世界战争。

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在这个“共同防御条约”中追求的目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事实上，美国侵略集团目前正在抄袭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故技，而有人竟希望中国人民忘记历史的教训，按照他们的意志接受美国侵占台湾的现状。但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1931 年沈阳事变所造成的灾难，永远不会忘记 1937 年卢沟桥事变是沈阳事变的发展。对 1941 年珍珠港事变记忆犹新的亚洲和太平洋各国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当年姑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政策产生了怎样惨痛的结果。同样，欧洲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恰恰就是纵容德国军国主义侵略的慕尼黑政策导致了第二次世界战争。历史的错误不许重演。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这个危害中国安全和亚洲和平的美蒋战争条约，也坚决反对危害欧洲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巴黎协定。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在远东造成了新的紧张局势。有人说，这个条约可以导致远东局势的和缓。这完全是一种颠倒是非的说法，美国政府在它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加紧干涉印度支那战争的同时，武装侵占了台湾，这原来就是它在远东制造紧张局势的一环。由于朝鲜的停战，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远东局势开始有了和缓。为了进一步和缓远东局势，在日内瓦会议之后，我们又明确地提出美国应该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武装力量，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但是，美国政府不仅没有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武装力量，反而指使蒋介石卖国集团更加猖獗地对中国大陆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事实上，不断制造紧张局势是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几年来，是美国的武装力量不断地侵犯中国的领空和领海；而不是中国的武装力量去侵犯美国的领空和领海；是美国派遣间谍分子到中国大陆上来进行颠覆活动，而不是中国对美国进行颠覆活动。在朝鲜停战中，朝中方面忠实地执行了停战协定和遣返战俘协定，而美国方面却破坏了遣返战俘协定，劫夺 20000 以上的朝中战俘，编入李承晚和蒋介石的军队，至今尚未交代。对于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中国方面保证了日内瓦协议的执行，但是美国方面不仅拒绝了参加对于协议的保证，而且还签订了马尼拉条约，并正在准备武装和训练保大的军队，来破坏日内瓦协议。现在，美国政府又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了这个侵略性的战争条约，企图在远东加强战争威胁，制造新的紧张局势。这就证明，远东紧张局势不能和缓的一切责任完全在于美国。

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不得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这项原

则是国际和平的基础。美国政府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的这个条约，正如美国策划签订的其他所谓防御条约一样，照例都要重申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信念。但是所有这些所谓防御条约根本就是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背道而驰的。这些条约只能导致战争，决不能促进各国间的和平相处；这些条约只能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嘲弄，决不能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保障国际和平。与此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坚持保障民族权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中国同印度和缅甸共同倡议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完全符合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我们坚信，如果世界各国能够遵守这五项原则，努力建立和扩大和平地区，避免制造分裂局面，那么，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就能够和平共处，世界的集体和平和安全体系就能够建立起来。刚刚闭幕的莫斯科欧洲会议就是朝着这个方向作了巨大的努力，它已经得到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广泛支持。但是，美国侵略集团和它的追随者却竭力破坏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百般阻挠世界的集体和平和安全体系的建立，使目前国际局势不论在东方或西方都日益严重。我们认为，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有责任制止国际局势恶化的发展，为保障国际和平加紧努力。

为此目的，中国人民愿意向全世界郑重宣告：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只有把台湾从蒋介石卖国集团的暴政下解放出来，中国人民才能完成自己祖国的完全统一，才能进一步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一切关于所谓台湾“独立国”、台湾“中立化”和“托管”台湾的主张实际上都是割裂中国领土，侵犯中国主权和干涉中国内政，都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为了和缓远东局势，为了消除对中国的战争威胁和保障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美国政府必须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美国没有任何理由远涉重洋来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

中国人民坚决地反对战争，但是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吓倒。如果有人硬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一定要对干涉者和挑衅者给以坚决的回击。

中国人民热烈地要求和平，但是决不会拿自己的领土和主权作代价乞求和平。牺牲领土主权，只能导致进一步的侵略，决不会得到真正的和平。中国人民懂得，只有反抗侵略，才能保卫和平。

对美蒋的缔约，苏联政府也作出了强烈的反应。8月16日，苏联外交部就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发表如下声明：

1954年12月2日，美利坚合众国和躲藏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在华盛顿签订了一个所谓“共同防御条约”。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泄露了这个条约的侵略性质，他说：“我希望，这个防御条约的签订将会一次地、永远地消除关于美国会以某种方式同意把台湾和澎湖列岛交给共产党控制的传说的报道。”

从上述侵略性的条约的全文和杜勒斯先生的谈话中可以看出，美国的目的是要从中国手中夺去台湾和澎湖列岛，在这些中国的领土上建立自己的统治。

美国这种行为悍然违反了它在国际协定中所承担的义务，这些协定确认中国对上述历来属于中国的领土的合法权利。

大家知道，1943年美国 and 英国都参与签了字的开罗宣言庄严地宣布：“日

本所窃取于中国人民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这一决定又在 1945 年的波茨坦公告中予以确认，美国，以及英国也在这一公告上签了字。日本投降以后，台湾和澎湖列岛重归于中国大陆。

随后，美国政府曾一再声明，美国对上述领土没有任何侵略意图。例如，1950 年 1 月 5 日杜鲁门总统在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中说：“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者特权或者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目前的局势。……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的援助或意见。”

但是在 1950 年 6 月，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同时，美国政府就命令自己的军队进驻台湾，而实际上直到现在还占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一部分领土。

美国和蒋介石集团 12 月 2 日签订的侵略性的条约，目的是为美国武装部队非法驻扎在台湾和澎湖列岛找藉口，是为了保持美国对这些领土的占领。

美国政府和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签订条约，是悍然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因而也就是破坏联合国宪章的行为。宪章第 2 条第 4 款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既然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自然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是中国人民的主权。

假如不是由于美国武装力量的干涉，台湾的重归中国早就已经实现了。

美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侵略，打算以武力手段夺取它的一部分领土，而且企图以显然站不住脚的关系美国安全的论调为藉口，为它的这种行动辩解。

这种论据的笨拙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和美国隔着一个太平洋，而台湾距离美国在 1 万 1 千公里以上。

从上述美国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侵略条约中可以看出，条约的规定不仅适用于台湾和澎湖列岛，而且也运用于“经双方协议所决定之其他领土”。这就是说，美国政府把台湾和澎湖列岛看作将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远东和东南亚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进行侵略的军事基地之一。美国方面的这种行动，没有疑问会使远东的属势恶化，并加剧国际紧张局势。

缔结以复活德国军国主义、把西德拖入军事集团为目的的巴黎协定，建立以维护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为目的的军事集团，美国同南朝鲜李承晚政府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实际上是美国在远东建立一个新的军事基地的条约，美国同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缔结和中国人民为敌的条约；所有这一切都是美国阻挠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加速准备新战争这一政策的整个锁链中的各个环节。

大家知道，苏联政府对于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的侵略政策的态度已经在 1954 年 10 月 12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联合宣言中表示过。在这个联合宣言中说，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进行的直接的侵略行为，特别是它对中国领土台湾的继续侵占以及它对中国人民公敌蒋介石集团的军事和财政的援助——所有这一切，都是同维护远东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任务不相容的。

苏联政府声明：它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在 12 月 8 日的声明中所表示的态度：美蒋条约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对中国领土完整的侵犯，并且威胁中国的安全和亚洲和平。苏联政府完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要求：美国军队必须从台湾、澎湖列岛和台湾海峡撤走，停止对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中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要求，以及中国人民解放这些地区的决心，是为苏联人民所理解的。

苏联政府声明：美国和蒋介石集团之间缔结的侵略性的“共同防御条约”的后果应由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负完全的责任。

1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不解放台湾决不罢休！》的社论。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以极大的愤怒反对美国侵略者公开强占我国领土台湾、准备世界战争的滔天罪行。1954年12月2日是美国侵略者公然同蒋介石卖国贼以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的形式强占台湾的日子，中国人民绝不能忘记，中国人民绝不会让美国强占台湾这个事实存在下去。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这是公认的历史的事实。美国签了字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确认了这些，并规定台湾应归还中国，而且事实上台湾已在日本投降后归还了中国。但是美国背弃了国际义务，于1950年武装侵占台湾，现在又企图利用同蒋介石卖国集团缔结“条约”的办法“无限期有效”地占领台湾。“条约”第7条公然规定“中华民国政府给予，美利坚合众国接受，依共同协议之决定在台湾和澎湖列岛及其附近……部署美国陆海空军之权利”。谁都知道，中国人民早已推翻了蒋介石的万恶统治，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人民唯一合法的政府。蒋介石卖国集团这样一副腐臭了的政治僵尸已成了美国侵略中国的工具。它出卖祖国领土主权已经是罪大恶极，美国侵略者利用同它签订的“条约”侵占台湾，更是破坏一切国际法规的强盗行动。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美国这种明目张胆地掠夺中国领土、侵犯中国主权的侵略行为。

杜勒斯所谓美蒋“条约”是“纯防御性的”说法完全是谎言。美蒋条约的第2条和第5条公然规定美国将不惜以战争赌博来干涉中国的内政，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不仅如此，这个“条约”还公然鼓励蒋介石卖国贼侵犯大陆来挑起大战。美蒋“条约”第2条第5条所包涵的武装侵略范围，根据第6条的规定，还“将适用于经共同协议所决定之其他领土”。美英反动舆论这几天来忙于为美国侵略者掩饰和欺骗人民，他们硬说条约是为了和平。但“条约”中的这句话却打了他们一个响亮的嘴巴。事实上，美国侵略集团的战争阴谋明显得很。杜勒斯公开叫嚣说“条约规定了美国在台湾的基地权利”，美国“必须可以自由动员它的部队……进行报复”。杜勒斯还说“这个条约将成为美国同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国家已经缔结的各种集体防御条约所建立的集体安全体系中的另一个环节”。他说“这些安排合在一起构成西太平洋自由国家人民抵御共产党侵略的中心体制”。世人皆知，并没有任何国家侵略美国，侵害美国的安全，反倒是美国在到处强占别国的领土为军事基地，并企图把全世界的海洋都变成美国的内湖。另一方面，苏联、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却是一贯努力谋求和平，主张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等五项原则。因此，侵略究竟来自何方，世界公正人士和广大人民已有答案。杜勒斯所谓的“防御”、“安全”和“抵御共产党侵略”等等，无非是学希特勒的办法来掩饰他们的战争政策，这还不清楚吗？从这个“条约”的条文来看，从杜勒斯的这些话来看，美国企图把美蒋“条约”和东南亚侵略集团以及策划中的“东北亚联盟”和其他军事条约联结在一起，扩大对中国和亚洲的侵略，准备把一些美国的追随者拖入军事冒险中去，挑起战争，这还不

明显吗？由此可见，美蒋“条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准备侵略战争的“条约”。

杜勒斯公然表示，如果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挑衅进攻的话“从技术上说并不构成战争”，因为“战争状态只存在于两个互相承认的政府之间”。这实际上就是为美国侵略者随时以任何藉口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立下了逃避法律罪责的藉口。但是这种藉口是毫无用处的。美国侵略者这种横蛮做法完全是承继了日本军国主义者过去侵略中国的陈旧衣钵。人们知道，日本军国主义者过去侵占我国的东北作为基地时，就说它的侵略“并不构成战争”。而在1937年向中国大举进攻之际，也说他们对中国的侵略“并不构成战争”，因为不是处于“战争状态”。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和亚洲各国的惨痛教训，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至今记忆犹新。美国侵略者竟敢于认为中国人民会忘记了这种历史教训，它竟以为伟大中华人民共和国6亿人民可以欺侮，亚洲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可以蒙蔽，那他们就大错而特错了。如果美国侵略者一定坚决要走日本军国主义的老路，那么，这一次要受到历史的沉重鞭打的仍不会是中国人民，而是疯狂的美国侵略者。

美国侵略者一面强占中国领土，准备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另一方面竟企图把联合国宪章来作为他们的罪恶野心的掩饰。美蒋战争条约的序言在一开头就毫无羞耻地说：美蒋“重申其对联合国宪章之宗旨与原则之信心”。这种鬼话只能被认为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最大的嘲讽和污辱。体现了各国爱好和平人民意志的联合国宪章，明确地规定了它的宗旨和原则是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且规定不许任何国家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然而，美蒋战争条约既然明目张胆地侵犯了中国的领土，并且是以准备对中国的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为目的，这就露骨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上述庄严规定。美国侵略者无论如何都推卸不了他们的破坏联合国宪章的可耻的罪行的。

事实很显然，美蒋条约的签订势必引起远东和亚洲局势的恶化。美国侵略者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的进一步勾结不但是对中国人民严重的战争挑衅，而且也威胁着远东和亚洲各国的安全。目前台湾问题已成为维护远东和亚洲和平的关键问题。一切真正愿望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对美国侵略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破坏远东和平、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做法都不应该熟视无睹。对战争政策的忍耐和纵容就是对世界和平的危害。历史已经无数次的教训了我们。人们在这样的关头必须有所选择。

面对着美国侵略集团公开进行战争挑衅的局势，英国政府却对美国这种作法采取支持的态度。英国政府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另一面却又公然支持美国侵略集团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公然认为中国的叛徒和卖国贼可以窃据台湾，这不仅是道义所不能容，而且也违反了国际关系的准则。12月1日，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就美蒋签订战争“条约”发表谈话说，很久以来，英国政府对美蒋战争“条约”的谈判“一直获悉一般情况，并且就远东一般局势同美国政府经常保持接触。”美国方面又说“条约”文本早已给英国看过。这就证明美蒋战争“条约”的缔结不但得到了英国政府的同意，而且英国政府还参与其事。英国发言人还说台湾存在有所谓“未来的地位”问题，主张这个“地位必须为直接有关各方所接受，并且必须同他们磋商”。谁都知道，英国这句话显然是指所谓“台湾中立化”或者“台湾独立国”。可是，台湾的地位早就确定，台湾在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中国领土。现在的问题，只是制止美国武装侵占台湾，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



政，撤出美国武装力量。中国人民决不容许用所谓台湾“中立化”或者“独立国”的办法来侵占台湾。这是十分明显的事。

中国要解放台湾的正义立场英国是知道的，它这种态度显然是明知故犯，甘心不顾它自己的利益追随美国对中国人民采取不友好的态度，而且违背英国在“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担承的国际义务。英国应该记得23年以前日本对我国东北的侵略是怎样发展成为世界战争的。那时候，连英国也遭到严重的损害。难道英国政府今天还在追随美国战争政策来重复这种经验吗？难道谁还能再认为今天伟大的中国人民是可以被作为对美国侵略政策的牺牲品吗？外国帝国主义决定中国事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谁不想正视这样的铁一般的事实，谁就要犯天大的错误。

必须指出，有一些人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也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是中国的内政。但对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和蓄意以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行为却默然不置一词。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正义斗争将会造成紧张局势。这实际上就是想以牺牲中国的领土主权，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在台湾的中国人民的利益，来屈从于美国的侵略行为，其结果只能是对美国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纵容。历史上也有过这种对侵略别国的行为采取默认态度的做法。但是这恰恰使侵略战争扩大以致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连默认侵略者也深受其害。中国人民特别深切地了解这一点。中国人民主张和平，曾用一切办法来谋取和平。但是，中国人民从自己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用光辉的事实证明，只有坚决地击败侵略，捍卫祖国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决不能拿牺牲自己的国家主权和人民的利益去乞求和平，更不能拿默认和听任美国肆行侵略的办法来使和平遭受危害和破坏。必须制止侵略，才能保障和平。因此，中国人民对美蒋签订的战争条约决不能置之不理。

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正是为了我国和一切国家的主权领土不可侵犯，为了保卫我国和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也就是为了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这个真理是极为明显的，接受这个真理，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行为，就会对世界和平事业作出很大的贡献。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保卫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不移的政策，是我们神圣的责任。任何外国干涉都不能阻止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决心。任何恫吓和威胁都不能丝毫动摇中国人民保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保卫和平的坚强意志和行动。中国人民必须以不可动摇的意志，更紧密地团结一致，加倍努力，为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因而坚决斗争到底。中国人民不解放台湾，决不罢休。如果美国侵略集团，竟敢于进一步来实行武装干涉，那么，美国政府必须负起一切严重后果的责任。

毛泽东指示解放一江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的抗议，并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同年12月中旬，毛泽东指示华东军区浙东前线指挥部张爱萍将军，根据美蒋缔约这一新情况，决定在近期解放一江山岛，并一再强调一定要切实准备打好解放一江山岛这一仗。解放军浙东前指认真研究中央军委的指示后，确定于1月13日至19日之间最后完成三军联合进攻的战斗准备工作。

1955年1月9日，浙东前指出动3个轰炸机大队百余架伊留申28轰炸机轮番猛烈轰炸上、下大陈岛，使大陈岛遭到巨大损失。

第二天，台湾急令海军对大陈岛实施运补，夜间，解放军海军鱼雷快艇出动，对护航的国民党军舰进行攻击，450吨级的国民党海军巡逻舰“临江”号和“瀛江”号，相继被鱼雷击中，“临江”号当即沉没，“瀛江”号负伤被拖返，使国民党海军在遭到“太平”舰厄运之后，再次受到重创。

正在台北参加表扬大会的国民党军“战斗英雄”、一江山防卫司令王生明，急匆匆连夜返回一江山，一江山岛守军眷属及妇孺也撤至台湾和大陈岛，准备与解放军恶战。

此后一星期，解放军海空军频繁出动，不断袭击大陈舰艇，国民党军舰在遭到连续的打击后，为免遭损失，被迫退出南鹿岛外缘，浙海门户洞开。

一江山岛，岛上光山秃岭，地质坚硬，有203、190、160、180四个高地，可控制全岛。岛的四周多系陡壁岩礁，岸高10至40米。海水多回旋和岩头浪，岛上守军构筑了以永备型和半永型备工事为骨干的较完整的防御体系。

阵地编成为三线：

第一线，以西山嘴、海门礁、乐清礁、三三礁、向阳礁、守固村及南江的巩固坡、田吞湾等突出部为前沿支撑点：

第二线，设于山腰各突出部，筑有辅助堑壕及地堡，并以交通壕与前沿及纵深相连接，组成锁闭工事；

第三线，以203、190、160、180各高地为主要核心据点，筑有土墙与永备发射点，形成坚强的环形防御。

此外，各阵地支撑点有交通壕相连接。各突出部及重要支撑点前沿设有铁丝网、地雷等障碍物。全岛共有四层火力配系。

战前，我军对岛上进行侦察，在查明岛上的地形和守军的设防情况以后，解放军登陆部队有针对性地投入了战前练兵。主要抓了海上适应性训练、打活动靶训练、克服敌工事障碍训练、合成军兵种近似实战的作战训练。

1955年1月18日，我军拉了解放一江山岛的战幕。

### 解放军战鹰揭开战幕

由第20军之第60师4个步兵营组成的登陆部队，从穿山起航，18日拂晓前到达头门山、金门岛等命。

6时58分，绿色信号弹升上瓦蓝的天空。顿时，机场上马达声震耳欲聋。空中指挥员、第一中队长机马连成率9机长阵依次起飞，接着担负掩护任务的空军第85团拉—11歼击机随后起飞。

几分钟后，编成整齐的战斗队形，按预定航线隐蔽出航，直奔战区。

8时，空军3个轰炸机大队和2个强击机大队在歼击机掩护下，准时飞抵一江山岛之上空，实施第一次火力准备。敌高射炮向我机猛烈射击，我机进行反高炮火力机动飞行，对北江岛的中山村、中心村、了望村、重要村和南江岛的胜利村、180高地，猛烈轰炸扫射，准确无误地将54枚250公斤爆破弹投向预定目标。在蔚蓝的东海上空，只见解放军成群结队的轰炸机、强击机在歼击机的掩护下，炸毁敌气象台、导航台各一处，115高地炮兵阵地和环形围墙130米。海军航空兵预先航空火力准备和直接火力准备，为登陆部队扫除了障碍。

与此同时，以轰炸机和强击机各1个大队，飞抵大陈岛上空，对“大陈防卫司令部”实施猛烈轰炸扫射，霎时，一江山岛和大陈岛上浓烟滚滚，尘

土乱石飞扬。8时15分，空军又对北江岛的前沿阵地实施轰炸扫射。

此时，一江山岛上空弹光此起彼伏。炸弹的爆炸声和飞机的尖啸声响彻海天。事后证实，首次航空兵突击行动，摧毁了一江山岛敌军的通信系统，直到登陆成功后，台湾国民党当局才知道解放军攻击了一江山岛。这次轰炸打了个国民党军措手不及。

“自从你们开始轰炸，我们的指挥系统就全部被打乱，无法同部队取得联系。”敌突击4大队长被俘后说。

9时，支援炮兵实施炮火准备，50余门火炮对准一江山岛上的目标进行射击；13时16分，海军舰艇开始进行破坏射击；13时至14时，火箭兵群和直接瞄准炮兵群向预定目标发射。一群群炮弹，以排山倒海之势，呼啸着飞过海峡，准确地命中目标，打得一江山岛山崩地裂。先后进行了7次火力急袭和5次监视射击。共发射炮弹1.2万余发。打得岛上守军丧魂落魄，指挥瘫痪。

### 陆、海、空协作登陆成功

12时15分至13时22分，登陆部队第一梯队3个步兵营，分别从高岛、蒋儿岙和头门山岛起渡。110余艘舰艇，输送着5000多名官兵，分两批、成三路防空队形，相继向展开区驶去。此时，天空飞机护航，地面炮声隆隆，海上火力支援队和护队在登陆输送队的先头和两侧掩护，浩浩荡荡，场面壮观……

当护卫艇和船载57战防炮驶至距一江山岛3000米时，向守军前沿火力点进行压制射击，两个船载火箭炮营对岛上主要阵地进行齐射，协同航空员、地面炮兵，掩护登陆输送队成一、二梯队展开。

13时55分，大陈岛上的国民党军炮兵突然向我登陆部队进行拦阻射击。张爱萍立即命令海岸炮兵和已经升空的轰炸机实施反击。仅5分钟，即把对方打成了“哑巴”。

由于我登陆输送队有空军、炮兵的强大火力保障，另外，大陈岛与台湾的通信联络又被截断，故国民党军之海、空军不敢出动，所以整个航渡进展顺利。

当登陆输送队一、二梯队临近展开线时，指挥艇上升起了信号旗，各编队立即迅速地进入了展开区域。

14时整，空军、海军之轰炸机混合编队，对一江山岛守军实施第二次航空火力。船载的10门火箭炮（卡秋莎）对北江岛进行第二次齐放，暴风骤雨般的炮弹，铺天盖地地倾注到190高地守军之阵地上。轰炸机再次对南、北江岛各主要阵地再度猛烈轰炸。强击机对岛之前沿阵地实施轮番俯冲轰炸扫射。

14时10分至19分，登陆部队第一梯队在火力支援掩护下，按预定计划，以7个突击连28个突击排的兵力，完成战斗展开，同时向南、北江岛7个登陆点实施冲击。

登陆第三大队（步兵第178团突击营），乘28艘登陆艇，在大茶花一线完成战斗展开。该营第5连，在连长毛坤浩和指导员洪阿毛率领下，直扑第一道铁丝网。他们一边爆破一边前进，动作迅猛，转眼之间，即越过守军第一道堑壕，又迅速向了望村之守军前沿支撑点冲击。14时29分，该连首先

在乐清礁登陆。随即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它向指挥部报告“占领滩头阵地成功”的胜利喜讯。

“前指”司令员张爱萍立即用报话机：向5连登陆成功表示祝贺！向陆、海、空三军表示祝贺！

在紧张登陆突击的关键时刻，三军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积极主动地互相支援，密切协同作战。

在乐清礁登陆突击的部队，在靠近岛岸时，岛上守军在前沿利用石缝内的暗火力点进行疯狂射击。海军指战员临危不惧，冒着岛上火力杀伤和登陆艇沉没的危险，奋力把步兵送上岸。在靠岸过程中，212号登陆艇艇长负了伤，操舵兵柏文冒立即代替艇长的指挥，炮长负伤了，枪炮兵魏福根立即代替炮长射击。魏福根亦负了伤后，他咬紧牙关继续坚持战斗，直至登陆艇靠岸。

在海门礁、西山嘴、黄岩礁登陆突击的部队，指挥艇被岛上的暗堡火力封锁，艇门无法打开。该部另一艘登陆艇上的战防炮立即开火支援，把这个暗堡火力点打掉。当步兵登陆抢占岛岸突出部阵地时，岛上守军利用其有利地形拼命射击，扔手榴弹，致使有的部队登陆上岸受阻。海军舰艇的指战员，以猛烈的火力进行压制射击，使支援登陆部队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

在南江岛登陆突击的部队，临近靠岸时，遭到国民党军的猛烈射击，无法登陆。要求航空兵火力支援，顷刻间，空军强击机群临空，向南江岛前沿守军阵地俯冲攻击，登陆部队乘机靠岸。其中一艘登陆艇在靠岸中，又遭守军火力封锁，艇门无法打开。艇上重机枪班班长吕有库立即英勇地进行猛烈还击，掩护本艇打开大门。吕有库在还击中多次负伤，腹部中弹。他以无比坚韧的毅力，用棉衣堵住自己的伤口，继续坚持射击，直到掩护该艇指战员冲上了岸，而自己终因流血过多，献出了生命，战后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 守军司令毙命阵地

第一梯队登陆突击队，先后经过31分钟的激烈战斗，全部占领了预定的登陆场。

随即，进入了纵深战斗，迅速扩大战果。一江山岛坡陡、路窄、怪石鳞峒，又多悬崖峭壁，向纵深攻击十分艰巨复杂。由于岛上地形的限制，一些登陆分队的战斗队形被割裂，形成犬牙交错。正面敌人凭借有利地形拼命顽抗，背后残潜之敌又以冷枪袭击，使登陆部队伤亡增多。指战员们立即以灵活机动的小群战术，互相协同，猛打猛冲，穿插分割，迂回包围，迅猛地向敌纵深内预定的方向推进。登陆之第一梯队3个步兵营占领守军第一道堑壕之后，在支援炮兵、直接瞄准炮兵和护卫舰艇火力支援下，不停顿地向岛上守军发起纵深战斗。

担任主攻方向上的第178团第1营，在黄岩礁、海门礁等地段占领第一道堑壕后，即组织第1、第3连向中心村进攻。3连在沿山嘴村棱线向中心村冲击时，遭守军山腰暗堡火力点压制，前进受阻，该连立即组织火力，以两挺轻机枪掩护，用喷火器向暗堡口猛烈喷火，消灭了守军火力点，于14时5分占领了中心村。

与此同时，第1营以第2连向山中村（160高地）进攻。在攻击前进中，

遭守军两次火力射击，但该连指战员们英勇无畏地勇往直前，猛烈冲击，前仆后继，终于于 14 时 50 分占领了山中村。

该团以第 2 营乘胜向了望村和 203 高地攻进。203 高地，是一江山岛的主阵地，一江山岛国民党军司令部设在这里。所以，该高地是一江山岛的核心阵地，也是国民党守军最后的一道防线。守军司令王生明，一再命令部队依托工事顽抗，欲作困兽犹斗。大陈防卫司令刘廉一也给王发来急电，命令要“死守阵地，为党国成仁”。

第 2 营以第 5 连为主攻连，该连在航空兵、炮兵和直接瞄准火炮的支援下，乘守军被火力压制之下还未抬起头来之际，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勇敢果断动作，向了望村猛插，一举攻占了望村。接着，向 203 高地前进。

203 高地之守军，见了望村失守，即进行了顽固抵抗。其火力密集得如同筑起一堵围墙，子弹掀起团团烟尘包围了整个高地，在这种情况下，主攻该高地的 5 连指战员，受到严重威胁。毛张苗副团长机智地调整攻击部署，采取灵活的小群战术，对 203 高地主峰实施攻击。空军以 4 架强击机，再次以航炮和机枪火力向 203 高地轮番俯冲扫射，吓得守军纷纷躲进掩蔽部。海面上的 4 艘护卫舰，亦抵近岛岸，向 203 高地主峰勇猛射击。

在海、空军和已经登陆的地面炮火的支援下，2 营官兵高举红旗，冒着守军猛烈的火力，向 203 高地主峰勇猛冲击。该营营长孙勇边冲边指挥喊着：

“同志们，快冲啊！向 203 高地冲击！把红旗插上主峰！”

战士们一边跟着红旗直上主峰，一边高呼：“冲啊！前进就是胜利！”

响亮的口号犹如雷鸣在山谷回响，官兵们紧紧地护卫着红旗，前仆后继，冲向主峰……

当红旗快接近主峰时，主峰上烟尘飞扬，守军的子弹打得更加猛烈了……

高举红旗的 5 连连长毛坤浩头部第三次负伤倒下……

5 连通信员陈寿南，迅速接过红旗。他一会扑倒，一会儿前进。守军手忙脚乱，射击不着边际……

红旗向前跃进，终于插上了 203 高地主峰。这面被打得弹痕累累的战旗，战后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

15 时 5 分，5 连攻占了国民党军之主要阵地——一江山司令部所在地。

守军司令王生明被炸死，第 4 突击大队长王辅弼被 2 营 6 连 11 班班长傅德昌在 203 高地地堡里活捉。

南江岛的进攻部队，以第 180 团之第 2 营之第 5、第 7 连为第一梯队，向胜利坡 160 高地攻进。海军炮舰以抵近射击进行火力支援。“沈阳”号炮舰在支援岛上战斗时，被守军击中 3 发炮弹。但舰上指战员将自身安危置于度外，继续对岛上守军炮兵阵地进行猛烈射击，摧毁其一个炮兵阵地，有效地支援步兵攻占 160 高地。进攻 160 高地的部队，在海军炮舰的支援下，从南、北两侧对守军实施夹击。于 15 时 5 分相继攻占 160 高地。

160 高地攻占后，随即向核心阵地 180 高地发起攻击，在进攻中一度进展缓慢、伤亡增加。营指挥所及时将第 6、第 8 连投入战斗，第 6、8 连接替第 5、7 连的攻击任务后，5、7 连转入防御和肃清反斜面之敌。第 6、8 连在营火力的掩护下，勇猛冲杀，于 15 时 48 分占领了 180 高地。

解放一江山的主要战斗，自登陆突破算起，其主要战斗仅 3 个小时便结束了。在第一梯队攻占了一江山岛各主要高地后，第二梯队第 178 团第 3 营立即投入了歼灭国民党守军最后一批支撑点的战斗。尔后。转入搜索残敌和

组织防御。

肃清残敌，在一般战斗中是件比较轻松的任务，可是在一江山战斗中，它比攻占主峰和解决主要敌人所花费的时间还多好几倍。

一江山国民党之守军思想极为反动，加之受蒋介石集团的欺骗宣传，认为解放军对他们不讲宽待俘虏政策。因此，和解放军进行拼死作战。指战员们发动了政治攻势，边打边喊话，有的还利用俘虏喊话。至 19 日 2 时，全部肃清了反斜面暗堡之敌，一江山岛从此获得彻底解放。

这次一江山岛渡海登陆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守军 1086 人，其中毙守岛司令王生明以下 519 人、生俘守岛第 4 突击大队长王辅弼以下 567 人，击沉国民党军舰 3 艘、击伤 4 艘，缴获各种火炮 53 门、火箭筒 27 具、轻机枪 68 挺，各种枪 834 支以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解放军登陆部队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有 416 位烈士长眠在这东海之滨，负伤 1176 人，损失火炮 3 门、轻伤舰艇 6 艘、飞机 8 架。

### 蒋军撤离大陈岛

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首次联合作战解放一江山岛战役，打得干脆利索，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兵谈起这次陆、海、空联合作战的强大威力时，都心有余悸。

原国民党军大队部作战参谋相廉远说：“18 日上午，解放军空军机群一飞到一江山岛上空就进行猛烈轰炸，大部分通往司令部前沿阵地的电线都被炸断了。”

原国民党军一江山司令部情报参谋葛覃谷说：“解放军炮火把一江山司令部的掩蔽部炸塌了，整个司令部都慌乱成一团。”

原国民党军士兵沈南生说：在炮火轰鸣中，只见解放军许多登陆艇正向我们开来，军舰上的大炮向岛上的阵地轰击。解放军的飞机又在我们头顶上俯冲起来，炸弹、炮弹响成一片，我们的地堡被炸毁了。我刚从地堡里爬出来，登陆艇上的解放军已经冲上岸了，不久我就被俘虏了。

一江山岛渡海登陆作战，是解放军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一举成功。它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张爱萍日后总结说：“我军解放浙东沿海诸岛特别是解放一江山岛的战役，是第一次组织实施陆海空联合作战。那时，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个仗怎么打？我们没有照套苏军的条条框框，也没有按照欧美那一套，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经过周密的筹划、计算，确定了自己的打法，结果打胜了。”

人民解放军一举攻克一江山岛，给了“台美共同防御条约”一个有力的回击。

解放一江山岛后，解放军的进攻态势明白无误地表明下一步将攻击大陈岛。

1 月 19 日下午，解放军空军轰炸大陈岛，炸毁了大陈守军的指挥所和气象台。

轰炸大陈后，台湾国民党当局惊慌失措，认为解放军进攻大陈岛战斗开始了。他们甚至惊呼，共产党出动 200 架以上的飞机攻击大陈群岛，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的一次空袭。

台湾国民党当局，担心其它岛屿之国民党守军一触即溃，故再三声称：

“任何岛屿将不惜任何代价予以坚持”、“大陈岛将准备作最后的战斗”。还下令在闽、粤沿海对大陆进行报复轰炸。

在解放一江山岛的整个战斗过程中，驶大陈岛的美军顾问华尔登上校和他的接替者麦克雷登上校都在现场观察。美国摆出一副军事“干涉”的架势。一江山岛的解放，美国当局感到恐慌。尽管美国此刻并不想直接与中国正面冲突，但又不能不摆出承诺条约的姿态，美国驻台协防司令部司令普莱德海军中将，于1月21日派出数十艘舰艇开赴大陈岛海面布下应战阵势，同时还出动美国作战飞机在大陈岛上空进行示威。

1月23日，美国急忙从菲律宾、日本、香港等地，相继调遣航空母舰“中途”号、“约克逊”号、“埃塞斯”号和“大黄蜂”号，驻往大陈岛东南海面游弋。据美国报纸报道，当时在中国海域共有5艘航空母舰、3艘巡洋舰、40艘驱逐舰、50艘可供登陆的其他舰艇。先后出动了2000多架次飞机飞临大陈岛空域活动，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大陈岛，为已丧失固守信心的国民党军撑腰打气。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玩弄“停火”阴谋，四处活动。它怂恿联合国斡旋安排停火；让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要求“停火”；又让英国驻苏大使威廉·海特尔找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从中劝说。

中国人民不畏强暴。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就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美国在联合国提出停火一事发表《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绝不同意和蒋介石集团停火。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并未造成国际局势的紧张，只是由于美国侵占台湾，庇护蒋介石集团，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才造成了国际局势的紧张。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美国的武装力量必须从这一地区撤走。《声明》庄严地宣告：“中国人民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允许他人干涉”，给美国当局玩弄的花招以有力回击。依照中央军委的意图，浙东前指于30日下达了准备攻占大陈岛的预令。

当晚，解放军鱼雷快艇大队159艇在大陈附近海域击伤国民党海军炮舰“宝应”号。

但是，美国当局并没有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烈抗议而收手，就在这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国会递交了《正在台湾海峡发展的局势》的特别咨文，咨文除提出由联合国谋求所谓停火外，还要求国会授权美国总统在必要时使用美国军队来保证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安全。至于中国的沿海岛屿，他要求国会让他来辨明，如果解放军进攻沿海岛屿是“对台湾及澎湖主要阵地的进攻的一部分或肯定是预备步骤”，就可以使用美国军队。

1月26日、1月28日，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了《台湾决议案》，决议指出：“兹授权美国总统，在他认为对确保和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不受武装进攻的具体目标是必要的时候，使用美国武装部队。”

1月30日，解放军浙东前线指挥部为了实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要解放大陈岛等浙江东南沿海岛屿的既定作战方案，正式向所属三军部队下达了准备攻占大陈的命令。

针对新西兰政府1月28日在联合国安理会提议讨论台湾海峡停火问题，周恩来于2月3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指出美国侵略台湾造成了西太平洋紧张局势，联合国应谴责这种侵略行为。并声明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联合国任何有关中国的决议都是无效的。

在此段日子，美国一再要求蒋介石从大陈岛撤退，并非正式地向蒋介石保证，如同意全面自大陈岛撤退，美国将协防金门与马祖，并暗示在必要时刻会以原子武器对付中共，美国国会将通过“台湾决议案”，授权总统动用美国军队保卫台湾、澎湖。

如果说在此之前，解放军的空军、海军由于初创，蒋介石凭籍他手中的飞机、军舰还能称雄空中海上的话，那么一江山岛之战就明白无误地证明了一点，这个时代已挥手与之“拜拜”，一去不复返了。蒋介石不能不面对事实，如再坚持如昔，上下大陈将遭一江山岛的同样命运。

2月5日，蒋介石作出最后决定：从大陈岛全面撤退，行动代号取名为“金刚计划”。

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政府下令第7舰队和其他美国部队“协助”蒋介石部队从大陈撤退。

撤退行动自2月6日开始。美国通过其驻华沙大使向中共提出了有关这项行动的目的，并保证不骚扰中共的渔船，希望中共方面不干扰这次行动。

2月7日，由普莱德指挥的美蒋联合舰队像鲨鱼群似的涌到大陈海域，美国第7舰队出动了132艘舰艇，5000余架次飞机，48000余名海空人员，到达大陈海域协助蒋军撤离。

### 大陈防卫司令凄然叹息

“金刚计划”正式实施时，蒋经国也在大陈岛。他是在一江山失守之后，受蒋介石委派来大陈稳定军心士气的，随其同行的还有总政治部的美籍顾问杨帝泽。

当放弃大陈已成必然后，蒋经国在大陈的任务就转为安定民心了。在他下榻的渔师庙附近，不论日夜，都有人在守望，只要他一露面，便会大声呼喊：“蒋先生还在这里！”

晚上，蒋经国和杨帝泽坐在山头，凝视月光下的波涛，深有感触。他沉痛地对杨帝泽说：“我们反共复国，是一件大事，为了百年大计，一时的忍痛，是不能避免的。”他不得不给自己吃宽心丸了。

2月6日，台湾当局发表声明，宣布从大陈岛撤退的消息，说撤退大陈岛上的守军，是为集中力量防守台湾，同时也撤退岛上的居民。

2月7日，阴雨连绵，春寒料峭。《中央日报》记者刘毅夫描述说：

夜雨已停，仍是满天低云，我跑出渔师庙，上了附近的海边小山头，向东一看，吓，真来了，大概是一艘美国海军的扫雷舰，也许是联络舰，舰身的号码是124号。再往屏风山外看去，有更多数不清的战舰，像鲨鱼群似的往大海域涌来。我立刻跑回渔师庙，报告了蒋先生，他只微笑的点点头，一句话也没有说。

早饭，跟着蒋先生乘吉普车去风山岭，又看见了大陈守将彭团长，他陪我们爬上下大陈最高峰凤尾山，一路上蒋先生随便同他谈些事宜。上山之后，才知道美国第7舰队已像猎人似的在大陈海域散开了猎犬，海上有一眼看不清的兵舰，空中处处都有喷射飞机巡逻，还有一些大蜻蜓似的直升飞机在舰队上空回旋警戒。我们可敬的将士们，虽然也知道了撤退计划，但仍在挖战壕、修碉堡，诡变无定的战场上有备才能无患，可是一些库存待运的弹药箱，已在往山下搬运。



这天，蒋介石也为撤退大陈岛军队和平民发表了《告海内外同胞书》，称此举为转移兵力，增加台、澎、金、马防卫力量，配合新战略，避免无谓损失。

在发表告同胞书的同时，蒋介石还在台北讲述国际形势时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大陆必须光复，曲解台湾的地位是别有用心的，“两个中国”的主张荒谬绝伦。

蒋介石的讲话，也是台湾国民党政府第一次对“两个中国”问题的表态。

2月8日，台“国防部长”俞大维、海军部司令梁序昭、“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蒋纬国等来到大陈，与蒋经国会合，共同巡视指导撤退作业。

2月8日夜开始至12日，驻守大陈岛之国民党军第46师和直属炮兵、军官战斗团等18000余人，及大陈居民14000余人，共32000余人，在美国第7舰队直接参与下，撤逃台湾。

撤离前，蒋经国从军舰上取下一面“中华民国”国旗，在岛上举行了最后的升旗仪式。蒋经国对在场众人说：“不要难过，不要失望，此刻我们要下决心打回来。”也许，蒋经国为此心愿一直在奋斗，但最终至死也没能再回到大陈岛。

军舰起锚了，大陈守军司令刘廉一观望四处吐火冒烟的大陈岛，凄然叹息：“完了，什么都完了，落了一场空。”

整个撤退行动在2月11日晚完成，岛上守军16353人和平民17132人全部分批运到台湾。居民不愿走者惨遭枪杀。撤退前，国民党海军爆破组在大陈岛上进行疯狂破坏，把大陈居民们世代居住的地方炸成一片焦土和瓦砾，把几十个村庄烧为灰烬。大陈岛国民党军头目刘廉一在逃走之前，曾对合众社记者说：“当我们离开时，岛上只剩下死人。”

解放军根据隔海观察和情报侦察发觉敌人撤退后，立即进占浙江沿海岛屿。

2月8日至14日，浙东前指所属部队先后进占北鹿山、渔山、披山诸岛。22日，又出动飞机轰炸南麂山岛，岛上守军于25日仓皇逃窜台湾，人民解放军当即进占该岛。至此，浙江东南沿海岛屿，全部回到人民的怀抱。

## 第六节 缓和台海紧张局势

### 蒋介石拒绝放弃金、马

解放军华东军区在浙东作战结束后，即开始拟定福建沿海作战计划。当时福建境内的机场一时尚不能竣工，空军不能马上入闽，以浙江为基地的空军只能控制闽东北包括马祖列岛一带的上空。从军事观点上看，这时攻击金门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攻克马祖是有把握的。因为马祖岛上只有国民党军 1 个步兵师，连同配属部队不足 2 万人，使用解放军在浙南已有的海空力量再加少量陆军攻击，是有胜利把握的。因此，解放军华东军区（4 月改编为南京军区）在闽浙的部队进行了首先攻夺马祖的准备，等待着中央军委的最后决心。

在浙东连连失败后，蒋介石急于把美国拖入中国内战。他一方面命令部队加剧海峡两岸的紧张状态，一方面要求美国承诺直接以武力帮助守卫金门、马祖，企图由金、马之战引发为中美之战。

为激怒解放军达到扩大战端的目的，1955 年 1 月 10 日，国民党军队空军以 12 架飞机轰炸福州市居民区，炸死炸伤居民百余人，引起了市内大火，烧毁民房 4000 余间，上万居民在春节前无家可归。

中共中央不为蒋介石所激，冷静地观察着美蒋的新动态。

台海战争一触即发，美国政坛一片混乱。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格林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总统，表示：“协防金门”，可能使美国“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刻，为一众并不会影响到我国重大利益的问题，而卷入战争的漩涡。”

许多美国官员同意上述观点，认为美国应信守对台湾安全所做的承诺，但极力反对美国以武力保卫金、马。

美国国务院认为，“保卫金门”很可能使之和中共、甚至和苏联发生直接冲突，因而一再建议国民党当局撤离金门、马祖。他们甚至提出以美国陆战队和战斗机群驻守台湾，换取台湾当局撤离金门、马祖的建议。

蒋介石断然拒绝了这类建议。他到台湾后，一直以“反攻复国”来激励残军败将，说是“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如果可作反攻跳板的沿海最后两个岛屿再丢掉，谁还会相信他能“反攻复国”呢。

### 美国准备使用核武器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最后支持了蒋介石的观点。他认为，国民党的军队之所以能在丢失大陆后保持相当高的士气，主要是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会打回大陆，放弃金门、马祖，等于粉碎了他们的这个梦想。只要士气不保，台湾便将“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中共随时会将它占领”。

3 月 3 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赴台湾同蒋介石进行了秘谈。回国后，同艾森豪威尔商讨了保卫金、马，防止中共进一步攻打台湾。据美国日后销密的历史档案看，美国当局当时为保卫金、马，不惜采取使用原子弹在内的一切打击手段。3 月 10 日，杜勒斯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了他和总统的意见，又提出了使用原子弹的问题。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副总统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也暗示，美国可能使用核武器，这使得美国国内与世界舆论都对

可能发生核战争的前景感到十分紧张。

有了美国撑腰，台湾的口气更硬了。3月22日，蒋介石在对美国报人谈话时宣称，台湾为保卫金门、马祖，将战斗至最后一个人。此后在许多场合及私人谈话中，他都一再表示，要誓死保卫金门、马祖。

5月5日，台“行政院长”俞鸿钧在向立法院报告施政工作时也说，保卫金门、马祖的决心不会改变，台湾反对任何和谈与停火的建议。9日，他对美国记者重申这一观点说：“保卫金门、马祖的计划不会改变，不会因为外国的意见就放弃了这几个岛屿。”

陈诚也在多次和外国记者谈话时，即使金门、马祖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也一定要坚守下去。

### 毛泽东决定停攻金马

在形势上，金门马祖是两道伸入大陆心脏的触角，澎湖则控扼台湾海峡的衢地，也是台湾与金门之间的中继站。台湾是“反攻复国”的主要基地，而金马则又为登陆的踏脚石，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保台澎必须保金马，保金马以卫台澎。

这是一位美国军事家评价台澎金马关系及其战略意义时所说的一句话。这句话也常被蒋介石用来说明他所以誓保金马的理论依据。其实蒋介石比谁都清楚，国民党的力量已大大弱于共产党的军事力量，防守沿海岛屿尚且感到力不从心，哪里还有“反攻”的力量？既然无力反攻，金门、马祖也就失去了跳板的作用。随着军事科技的高速发展，金门、马祖对于防卫台湾也已失去了价值，解放军若进攻台澎，完全可以绕过金门、马祖而直取目标，金马实际上已没有什么战略意义了。

金门或撤或守，对台湾来说都无关紧要。美国之所以动员蒋介石放弃金马，其中也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因为这样一来，两岸的距离拉大了，分裂起来变得容易，蒋介石之所以坚守金门、马祖，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把美国人拉入中国的内战。因为金、马战火一起，国民党军队必然不敌，美国如果视而不救，必将在全世界面前失去信誉；如果插手，则就要同中国共产党军队发生直接冲突，这样，中美战争就会爆发。

毛泽东，这位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对美蒋的阴谋自然有所洞察，他当初决定在沿海地区采取有限军事行动，主要目的是对国民党的骚扰破坏予以惩罚，并显示坚决反对美国侵略台湾分裂中国的决心，并不打算引发中美之间的全面战争。通过浙东沿海作战的胜利，这一目的已基本达到。接下来，新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只要中国强大了，美国是无法干涉中国内政的，那时，只要嘘一声，外国人就会脱身。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停攻马祖，并适时地采取了缓和紧张局势的措施。

台湾在美国的庇护下，局势逐渐稳定下来，形成偏安海岛的局面。

大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投入了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

## 第五章

清除异己，台岛宦海风波叠起。从拥蒋到反蒋，际遇给幕僚精英留下了一页页惊心动魄的绝笔

## 第一节 陈仪“通匪”案内幕

### 饮弹毙命死因成谜

蒋介石统治中国几十年，拥有众多的文臣武将。有的聪明绝顶，有的军略超人，有的誉享异邦……

在南京政府风雨飘摇之际，这些重臣中有相当一部分由于种种原因同蒋介石一起到了台湾。他们之中，有的被蒋介石“借头以重立君威”，有的成了美蒋矛盾的牺牲品……

从政坛上发生的几件大事中，也可以折射出台湾当局的所谓民主政治。

1950年6月18日，蒋介石下手令，以“勾结共党，阴谋叛乱”的罪名，将陈仪杀害于台北马场町刑场。

陈仪（1883—1950），曾名毅（清末，溥仪当皇帝期间，为避讳，曾用此名），字公侠，后改字公洽，自号退素，浙江绍兴人。他的一生错综复杂，是中国近代政治风云变幻中的一个悲剧性人物。

陈仪1883年5月3日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商人家庭。父亲陈静齐经营钱庄，家境颇富。陈仪幼年随教私塾的叔父到杭州读书。十几岁时，父母将其召回，让他改学经商，进绍兴怡丰钱庄当学徒。满师后，又赴杭州求学，入求是学堂（浙江大学的前身）。1902年，考上官费留学生，赴日进入士官学校第5期炮兵科学习。1907年毕业回国，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员，后升监督（校长）。辛亥革命后，曾任浙江都督府军政司司长。1914年，应召到北京任政事堂统率办事处参议。1917年，再次赴日进陆军大学深造，是中国留日陆大第一期毕业生。1920年回国后，在上海经营实业和商务，与友人合资兴办裕华垦殖公司和丝绸商业银行等。1924年，军阀孙传芳任命他为浙江第1师师长。次年，参加五省联军与奉系作战有功，被任命为徐州总司令。1926年10月，担任浙江省省长。不久，由于和南方革命军秘密接触事泄，被孙传芳羁押，后经友人说情脱险。

1928年，陈仪由南京国民政府委派赴欧洲考察半年，重点参观德国的工厂。回国后，于1929年4月出任军政部兵工署署长。次月，即升任军政部常务次长。1934年，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在闽主政期间，推行“统制经济”，搞粮食“公沽”（即专卖），结果，米商趁机囤积居奇，官吏从中渔利，百姓叫苦不迭，受到回国考察的著名侨领陈嘉庚的极力攻击。1941年，任行政院秘书长，由于和副院长孔祥熙不和，1942年改任考核委员会上任委员。1943年，兼任代理陆军大学校长。1945年，出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后任浙江省主席。

蒋介石在台湾“复职”后为何要拿陈仪开刀，有权发言的知情者说法不一。归纳起来，有三条：一是蒋介石为解脱“2·28”事件的罪责，树立民主形象，借陈仪之头以解民愤；二是蒋介石为发泄第三次下野的积愤；三是因策反汤恩伯被毛人凤借蒋介石之刀杀之。

### 陈仪只是代罪羔羊

持第一种观点的是现年74岁，自称曾任陈仪侍卫、后任陈仪机要秘书的舒桃（本名舒元孝），1995年2月28日，在李登辉代表台湾当局为“2·28”

事件正式向受难家属道歉后，当天下午，舒桃立即召开记者会，宣称目睹官方处理整个事件的过程，并亲眼看过蒋介石发给陈仪指示其“格杀勿论，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人”的电文，重申陈仪只是蒋介石下令杀人的“代罪羔羊”，并将于近期联系陈仪移居海外的后代，希望共同为“老长官”进行平反。

1945年，台湾光复，陈仪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当时台湾实行的行政长官公署制与内地各省实行的省政府制有很大的不同，台湾省行政具有比内地省政府主席更大更集中的权力。这种特殊的行政体制是由陈仪和当时在大陆的一些台籍人士设计的。他们认为，当时大陆各省所实行的省政府制事权分散，牵制太多，不能充分发挥行政效能，只有集中权力，才能增加办事的效率。为了照顾台湾特殊的社会环境，国民党政府也同意了这种特殊的省制。可是，这种制度在台湾的实行，却引起了台湾民众极大的反感。他们感到，行政长官公署制是日本总督制的复活，是一种独裁、专制的制度，在台湾实行这种制度，是一种对台湾与内地有别的不平等待遇。这种心理上的抵触，可以说是后来造成“2·28”事件的原因之一。

陈仪本想用特殊的制度为台湾的民众多做些事情，实际上有些也确实做到了。例如，他与财政部力争，维持了台湾金融、货币的特殊化，使当时中国大陆的恶性通货膨胀不能直接冲击台湾，多少保障了一些台湾人民的利益。可是，他主持下的台湾省政，在当时全国普遍存在的政治腐败、经济凋蔽的客观大环境中，毕竟不能成为沙漠中的绿洲、汪洋中的孤岛。

当时岛内官吏贪污腐败、军警横行的现象，可说与大陆的状况并无二致。加上陈仪在台湾推行经济统制政策，给台湾人民带来了种种的不便和苦难，以及台湾籍人士参政机会较少等原因，台湾民众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对省政不满的情绪。当时，台湾各界对省政的批评，与当年陈嘉庚对陈仪主持下闽政的批评颇有相似之处。作为行政长官，陈仪对“2·28”事件之前台湾省政方面的种种缺失，自然难辞其咎。

台湾民众的不满，经缉烟血案为导火线引发了“2·28”事件。由于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2·28”事件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流血惨案。那么，谁该负出兵镇压的主要责任呢？过去，因为陈仪是台湾的军政主管，一般都把责任算在他的头上。包括台湾1994年出版的《2·28事件研究报告》中也认为，陈仪“事起之初亦希图以政治手段，化解危机，但事态的发展已非其所能控制，乃转而要求中央加派重兵镇压，大军抵台后，他身为台湾最高军政长官，却未能有效约束军警人员依法执行绥靖任务，以致……扩大了事件追究之打击面。”根据这种说法，很显然，陈仪应当负主要的责任。可是，这种说法未必公允。单凭目前已公布的史料就可以说明，陈仪未必应当负主要的责任。

事件发生之初，陈仪电请蒋介石派整编21师的一个加强团回台归建，而当时中统局则向蒋介石建议加派劲旅3个师赴台镇压。当陈仪认为台湾事态还不是很严重的时候，宪兵团长张慕陶认为，台湾局势已演变到“叛国夺权的阶段”，因此他指责陈仪“似尚未深悉事态之严重，犹粉饰太平”。当3月6日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首先出兵镇压民众之后，还受到了陈仪的指责：“台湾问题应由政治途径解决，闻高雄连日多事，该司令轻举妄动，应负此次肇事之全责，着自电到2日起，全部撤兵回营，听候善后解决。”事后，彭孟缉被认为“功绩甚大”，得到了一再的升迁，而陈仪则被认为措施无力，

免去职务，黯然离台。对于军统、中统在“2·28”事件中的滥捕、滥杀，陈仪也曾痛心地说：“他们事先不请求，事后还要求补办手续，真是无法无天。”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陈仪名义上是台湾的最高军政长官，但当时军、警、特各成系统，实际上他根本无法控制全面的局势，可以控制全面局势的是陈仪背后的蒋介石。那种把主要责任归咎于陈仪，而替蒋介石开脱责任的做法，显然并不公平。

舒桃自述，当年经台北市长黄朝琴推介，跟随陈仪专责私函密件收发，陈仪称其为“小四川”。1947年3月1日早上，当时参谋长柯远芬见大批群众包围长官公署，且情绪节节升高，即来面见陈仪，要求动武；陈仪见事态严重，立刻发电向南京蒋介石请示。大约下午6点左右，南京发来密电，陈仪打开一看，脸变得铁青，不说话，随后指示舒送交柯远芬。舒心生疑虑，在送件途中打开密电一看，但见大字“格杀勿论”，下接小字“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人”的令谕。

3月19日事件过后，白崇禧来台要陈仪回大陆避风头，但陈仪表示下令的人并不是他，他没有必要回大陆。然而，1948年5月蒋介石却藉浙江省主席职位空缺，遣调陈仪回大陆。

舒桃的说法，对向来被认为应为“2·28”事件负责的陈仪而言，明显是为其翻案。另外舒桃也对当局提出几点质疑：

1. 2月27、28, 3月2日皆有南京电文，为何3月1日关键时刻却没有？
2. 陈仪当年以通匪叛乱罪名被枪杀，其实只是国府为退守台湾，安抚民心的“代罪羔羊”。
3. 当年陈仪随员11人生死不明，请政府公布处理过程。

至于舒本人在陈仪被“引诱”回大陆之际，觉得事有蹊跷，第二天就易名舒生辰，只身逃到上海。1949年回台开办《民族精神》半月刊，撰文刊登“2·28”事件文章，1959年为警备总部所捕，关了3年。1962年底，移居越南，并与当地钢铁大王邓文成之女邓氏雪结婚，进出越南上流社会，是当时台湾在越南的大侨领。1970年11月在越南侨界的餐会上，被刚调迁来越南任军事代表团团长的柯远芬认出，第二天即被秘密逮捕，囚禁大使馆两天，然后以专机将其遣送回台，又关了3年；被释放后，即以越南难民身分前往美国，1990年返台后，则发行《民族精神日报》，一年后因亏损而停刊。这几年来，为替陈仪平反，舒桃不断透过各种管道，寻机佐证自己的说法，他表示愿与现居美国的柯远芬当面对质，澄清事由，并要求政府立即公开当年3月1日的电文。

他也透过一位现居三重的许森标牧师，找到位居台北县五股乡孝义路陈仪的坟墓，并打听到移居几内亚陈仪侄孙陈春茂，而陈仪的两个亲生女儿（小名为阿蕊，阿玲）现在则定居多米尼加。另外据舒桃透露：现住台北市人称“八爷”的陈仪小弟，担任太平产物保险公司总顾问，舒桃曾去找过他，希望他能出面为陈仪翻案，由于其年事已高，生活无虑而不愿出面。舒桃表示：近期将设法与他们再取得联系，并成立“追究2·28真相联谊会”，共同“追惩元凶”。

根据舒桃的推论，人们想到，蒋介石再次上台后，为了杀人灭口或借头泄愤，所以首先拿陈仪开刀。

## 泄积愤陈仪遭殃

持第二种观点的是李宗仁，他在观察有年后，写了下面的话：

蒋氏每次下野总要杀一二要员以泄其胸中的积愤。民国十六年八月，遭难者为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和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这次却为邓演达。民国三十八年下野时，遭殃的则为陈仪。

1948年12月，淮海战役已近尾声，国民党军败局已定，蒋介石迫于各种压力准备下野，由李宗仁出面和共产党和谈，陈仪披肝沥胆，上书蒋：“当前之势已是敌强我弱，只可言和、不可言战矣。”当局者在下决心破釜沉舟的时刻，最不愿听到不同的声音，蒋想的当是：“要死也一块死”，对陈已经不满了。

1949年1月21日，蒋宣布下野，偕蒋经国乘飞机由南京经杭州回奉化。迎来送往是地方官的头等大事，陈仪乃以省主席身份在西湖“楼外楼”设宴接见。贵客中除蒋氏父子外，还有俞济时、陈诚、汤恩伯等人。席间，蒋满腹惆怅，连“西湖醋鱼”也不能下箸。陈仪也是一片爱心，劝道：“要拿得起，放得下！”

真正会做官的人，那第一等本事便是用心揣摩上司的“思想动态”，像王熙凤侍候贾母那样，投其所好，拣中听的说，少而精。安禄山就有这种本事。传说，唐明皇有次戏问安节度使：“你肚子那么大，里面装了些什么？”安马上伏地回答：“满肚子都是赤胆忠心！”唐天子笑得合不拢嘴。

蒋是不想真心“放下”（下野）的，一听此言，连饭也不吃了。随即驱车而去，连“断桥残雪”也不屑一顾，当夜宿于览桥空军学校“天健北楼”。

2月间，汤恩伯告密，蒋也不同李宗仁商量，便免去陈仪的浙江省主席职务。蒋经国在1949年3月21日日记上写有：

李宗仁本日复飞桂林，陈仪移交浙江省政府主席。

彼因通匪有据，到沪后即被看管。

3月，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将陈押送台湾。

### 劝降汤恩伯内幕

持第三种观点的是当时任汤恩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第二处长毛森（军统）。

1948年6月，陈仪出任浙江省主席。当时，正是国共抗争激烈、乾坤剧变的季节，这位饱经沧桑，年过古稀的官场老翁太疲劳了，不忍再见生灵涂炭，有意且息兵刀。中共研究了思想动态，派人与之联系，希望通过他劝说汤恩伯在宁沪一带宣布起义。

毛森日后的回忆资料（《台湾传记文学》52卷4期《陈仪迫汤投共始末》），承认这个案件是他所主办的。他认为汤恩伯拒不接受陈仪起义的劝告，并向蒋介石告密，这固然是事实，但汤恩伯用心良苦，并不想杀害陈仪，最终导致陈仪杀身之祸的是（军统局长）毛人凤。以下是毛森撰述当时经过的情节，虽属反面史料，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抗战胜利时，毛森奉调汤恩伯部工作，汤发现毛的为人与工作能力，委以重任，对毛推心置腹，相遇恨晚，无论大小公私，都和他商谈，彼此间已无任何隐私。1949年初，东南吃紧，毛森临危受命，接任上海市警察局长。有一天汤私下告诉毛陈仪迫其投共，毛非常惊讶，他问汤有无告诉过别人，



汤说：绝对没有，只告诉你一人而已。毛续问他，打算怎么办？他要求把陈仪迁住毛森家，不准其自由活动。毛说，“陈是封疆大吏，亲友甚多，他要出去访友，或友来访他，或打电话，怎能阻止，一旦被人知道我把他幽禁家中，我怎么应付？且我家生活设备极简陋，无法招待大员。”毛森一口拒绝。

当时毛森对汤的想法，还有点怀疑，因他俩亲如父子，无话不谈，汤可能因言语冲突，对陈说了一时气话。汤：“绝非气话，陈的思想早已变了，他自台湾铩羽归来，即促我去北方率领 13 军独立（汤的基本部队，似驻热河，由石觉统率）。那时我认其是牢骚气话，我和林蔚商量，推荐他出任浙江主席。我们对蒋公说，陈是政治大才，热忱工作，今赋闲无聊，如委其主浙，必能为家乡做一番大事。蒋果任陈为浙江省主席，陈在主浙之初，因忙于工作，较少晤谈，不久他又要我准备和谈，停止军事行动，我才认定他的思想确实变了，恐其闹出大事来，我私下对蒋说，陈已年老，恐难应付大动乱，并推荐驻浙军长周岩接任主席，蒋一一照准。我把陈接来上海为他夫妇安排住所，照顾其生活，原意可以朝夕承欢，让其韬光养晦，安定快乐，享享清福，不料他火气更大，骂我不识时务，大势已去，还作无望的挣扎，我实无法对付。”

毛说：“他年将古稀，投共之后，难道还会给他比省主席更大的官吗？”

汤说：“这个老糊涂竟明对我说，并非为自己打算，是为我向中共找条出路，再提拔我一次。我向他表白，我是军人，追随蒋公几十年，决不能弃他投共。他骂我没有头脑，不识时务，不为国家人民保留元气。每次见面，总是将我痛骂，无法向他解释。”

其实，毛森与陈仪的关系也极密切，他主闽时代，毛任省会警察局特警组主任，帮他做了许多大事，所以陈对他推心置腹，抗战开始，毛奉调北上，离开了陈。其后陈仪接任浙江省主席，尚未与毛晤面，即发表毛兼浙江警察保安处处长（指前浙江省保安司令部警保处长）。

陈仪个性刚愎自用，但学识颇深，他是日本陆军大学就学时以第一名毕业，被誉为卓越的兵学家，其见解亦甚独特，与众不同……

当时毛森曾对汤说：“你不要接受策动，不理他算了，他光棍一个，让他去投共好了。”汤气呼呼地说：“他不断打电话叫我去见他，一见面就骂我不识时务，不识抬举，要我派架飞机送他去共区，我实在受不了。”毛森看出汤、陈争吵已濒决裂，汤已不愿再见陈仪，毛又不愿接陈去自己家居住，实无法处置。

汤命毛即在陈寓软禁陈仪，不准他自由活动，禁止会客，但可陪其上澡堂、理发、购物、上街散散步，他发脾气时，只好逆来顺受，毛乃率领刑事处长郑庭显及干警多人，亲去虹口谒陈仪，进入陈寓后，毛手下即令陈之副官交出佩枪，陈之副官初想抗拒，见毛森在场，即听命缴枪，毛向女佣表达拜望陈主席，陈即下楼接见，毛森对陈仪说：“时局不宁，我奉令派人保护你……”陈仪当然明自己被监视了，默然颌首。毛即指派陈浩泰、甘觉两组长，日夜轮流监护，然后恭恭敬敬向陈鞠躬辞退。

日后有人说毛森当时领人在陈寓翻箱倒柜进行搜查。毛森否定说：陈是廉洁官员，无身外财物，住的是汤寓，食用的全是汤所供应，迫汤投共的信件已铁证如山，还搜查什么呢？

毛森与丁名捕在蒲石路汤公馆见过面，汤介绍说，丁是陈主席的外甥，系陈介绍来沪担任汤的秘书；以后似又见过，但所见的是丁或另一人胡帮宪。

汤私告毛，丁、胡是共方人员。并说：陈仪思想转变，也受其秘书沈仲九的影响。要毛森设法阻断陈与丁、胡及沈等的来往，说只是怕他们继续打扰陈仪，并无对丁、胡追踪逮捕之意。

毛森认为自己办理陈案与办理一般“刑事”、“政治”案件完全不同，绝未追究“余犯”、“同谋”、“图谋”。因陈已明迫汤投共，公然手谕“应做纲要”，还有什么可以追究呢？至于丁名捕、胡帮宪（现名允恭）只是联络人员，陈要汤委其任秘书，只是便于秘密连络及刺探军情，主犯既不能法办，自无法只办其传言人。毛森还怕因汤不听陈命，对方为了逼上梁山，故意泄漏风声汤通中共，以打击人心士气，使汤无地自容，故才决定采取行动，将陈软禁。

其时南京政府系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蒋介石退居奉化，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暗中指挥各地军政长官行事。汤之本性对蒋尽忠，对陈纯孝，到了忠孝不能两全时，把他难倒了。几经考虑，认为兹事体大，不能私了，他身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不能去奉化请示，毛森建议派其心腹陈大庆或石觉为代表。汤说：“陈是淞沪警备司令，石是上海防卫司令，都有重要公职，且不知全案经过，不适宜去。”他最后问毛森能否走得开？毛说，“现在币值狂跌，物价飞涨，治安混乱，时刻准备应变……”这时毛森忽然想起了毛人凤——李宗仁代总统时询中共要求，撤去毛人凤军统局长职务及该局外勤工作，改派徐志道为局长，毛人凤为人谨慎服从，颇得蒋介石器重，故蒋仍指派其担任“黑”局长，闲住上海。于是毛森建议由毛人凤代表去奉化请示，汤认为恰当，立刻同意。

毛森偕毛人凤去见汤恩伯，汤即面告毛人凤关于陈仪要其投共经过，并将陈给他的信件一并给毛（编者按：即陈仪促汤起义亲笔信件，内容是促汤释放政治犯，停止修建工事，保护一切公家财物，改编部队，迎接解放等条文），转递蒋介石。汤的唯一要求，是保全陈仪一命，由其奉养天年。并口头表示对蒋决尽忠到底，不屈从李宗仁命令，尽力装运物资去台湾，坚决反共作战到底云云。

汤派专机送毛人凤去奉化后，毛很快就回到上海。毛说，蒋介石听了报告后，嘱善待陈仪，好好看护他，一切照他们的意见办理。汤再问起，蒋有无答应保全陈的生命。毛说：“当然没有问题。”从此，汤也放心了。

陈仪的一生是有抱负的，他廉洁、勤俭、不谋私利，凡是认识他的人，有口皆碑。对于国家建设和社会变革的追求，他又十分地痴心和执着。然而，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下，不仅他的抱负不能实现，而且，一生辛劳，四处碰壁。他在晚年写下了两首七言绝句：

事业平生悲剧多，  
循环历史究如何？  
痴心爱国浑忘老，  
爱到痴心即是魔。  
治生敢曰太无方，  
病在偏怜晚节香。  
廿载服官无息日，  
一朝罢去便饥荒。

这两首诗正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

他一手培养起来的汤恩伯出卖了他，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国民党军队节

节败退时（指1949年4月下旬），陈仪被送去台湾，幽禁基隆要塞司令部。此后，蒋介石曾表示，如果陈仪认错，写一张悔过书，就可以恢复他的自由。可是，陈仪却表示：“我有何错，我无错可认。我已年过半百，死得了，悔过书我不能写。”

国民党官员去台后，汤恩伯很是怀念陈仪，其本人不便去探望，特派陈大庆携带日用品去请安，大家以为就这样了。陈可享天年了。不料1950年6月间，因时局关系，蒋介石突然下令要审判陈仪，汤恩伯知情不妙，往求见蒋，传话者转示，蒋已去台中。汤四处求人营救，大家都摇头无能为力，拜请当年在沪共患难的谷正纲、雷震、方治及上海市长陈良等人转救缓颊。雷震说，老头子为了杀人立威；谷等认为蒋要用陈仪的头颅镇压人心；陈良认为陈牺牲定了。汤又请毛人凤求蒋遵守“诺言”饶陈一命，毛特来汤府复命说，“天威难测，我已恳求过了，没有用。”

辞出后，毛森在送毛人凤回家路上，埋怨他：“你做事没有肩胛、不负责任，当时汤讲好的，唯一的要求是要‘保全陈仪一命’，蒋既曾允诺，你应据理力争才是。”毛人凤被责怪之后，却耸耸肩说：“你忘了吗？陈仪是杀军统局福建负责人张超的仇人，我还会救他吗？”

张超，福建人，原为军统局福建负责人，抗战开始，组织游击队，只表孝忠于蒋介石和戴笠，目无地方长官。陈仪心腹省会警察局长李进德对其尤为深恶，怂恿陈仪除张。陈求治心切，费尽心力，平定了有小四川之称的福建各股民军，自不容张超再组织地方武力。陈自命公正廉明，不畏权贵，以迅雷手段秘密电蒋，请准将张超就地正法，才伏下本身日后杀身之祸。

毛森认为，依毛人凤当时的语气看来，他在受托飞溪口向蒋介石报告时，可能当做大功一件，而并未向蒋提出汤所要求“保全陈仪生命”的条件，致陈死后，使汤恩伯蒙受“卖师求荣”的骂名。

陈仪死后，蒋始召汤恩伯。蒋似余恨未消，训汤大义灭亲，还哭什么，不得立牌位祭奠。从此汤落落寡欢。汤本有十二指肠溃疡病，据医言，情绪忧郁时，将增剧病情。汤病情日增，亲友劝其去美就医，后在日本草率动手术，死于庸医之手。

## 第二节 吴国桢黯然挂冠

### 当年“打虎”种下祸因

朝鲜战争的爆发，虽然没有给蒋介石“反攻复国”的机会，但却使他意外得到一张“人寿保险”。台湾海峡有了美国第7舰队把守，美国又承认了蒋介石，恢复了军事和经济援助，昔日“囊中羞愧”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台湾在“资本主义阵营”中的砝码又加重了分量。一些欲与国民党台湾当局断交的国家也不断交了。

1953年元月，二次大战时曾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的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取代了蔑视蒋介石的杜鲁门。2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致国会咨文中说明：“解除台湾中立化，不再限制中华民国武装部队对大陆的行动。”于是，蒋介石又喊出“反攻大陆”的口号。不过这只是蒋介石愚弄台湾人民的“政治神话”、“诺言公债”。蒋介石的工作重点，仍是在加强内部统治方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肃清不忠于蒋介石的官员。于是，发生了轰动中外的吴国桢事件。

吴国桢，湖北建始人。1903年10月21日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其父吴经明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供职过清廷军务部。1913年，吴国桢到天津考入南开中学，与周恩来同窗。192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又放洋美国，首先在艾荷华州格林奈尔学院肄业，1926年以《中国古代政治理论》论文，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同年归国。在人才辈出的二三十年代，可说是佼佼者。

西方教育的熏陶，对吴的个性、脾气、为人处世和人生观颇具塑造作用。这也是导致他和蒋经国冲突的主因之一。

打从吴国桢在1927年进入官场，出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特派员兼交际科长起，他的才华即显露无遗。及至1932年，国民党湖北省主席夏斗寅免去吴的财政厅厅长职位，转任蒋介石的侍从室秘书，吴国桢从此即成为蒋的爱将。日后虽与蒋介石闹翻，但吴氏在晚年仍承认蒋对他有“知遇之恩”。吴国桢对蒋的感怀是有其原因的，在政坛上吴始终一帆风顺：历任国民党政府汉口市市长、重庆市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宣部长、上海市市长、台湾省政府主席。

只要稍微了解国民党高层政争的人，都知道吴国桢事件的根源是吴与蒋经国的不和，而吴蒋矛盾并非源于台湾，而是始自上海。

1948年夏间，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国民党政权不但在军事上受到严重打击，在经济上也已生命垂危。当时国统区的纸币已“失去价值尺度的机能，失去了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了支付手段的机能，失去了贮藏手段的机能”。城市大宗买卖早用黄金美钞计算，农村普遍以粮食作价格标准，偏僻地区又已恢复银元往来，物物交换风行各处。同年7月19日，25万元的关金大钞开始问世，纸币的发行量已是战前的20万倍，物价的涨度为战前的390万倍。

7月下旬，蒋介石在莫干山召集他的高级经济幕僚，频频举行会议，准备实行币改，以挽救危机。8月18日，蒋介石返回南京。第二天，明令公布币改内容，归纳起来，不外下列四大项目：

(1)自8月19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10月20日前)收兑已发行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

(2) 限期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与外汇，于9月30日前（其后又将限期延至10月31日）兑换金圆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持有者严办。

(3) 限期登记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

(4) 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开支。

南京不惜孤注一掷的决心，从8月20日《中央日报》的一篇社论可以看出。文章说：

社会改革，就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抑制少数人的特权。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数人以过去借国库发行，以为囤积来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打算，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蒋介石把这个割盲肠的重任交给蒋经国，任上海经济督导员。而蒋经国自己也颇具自信，咸以“认真实行”，即能“扑灭奸商污吏，肃清腐恶势力，贯彻新经济政策。”他调来了“戡建大队”，向渔管处借调一部分旧人马，在上海中央银行内，设室办公，杀气腾腾地打起“老虎”来了。

然而上海的财阀和“教父”，以及国民党的官僚集团，都不愿意和太子合作，要是蒋经国成功了，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侵害。

当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曾与蒋经国发生正面的冲突。吴除不大同意蒋太子的作法以外，市长权力被架空也使他颇为不悦。

从经济的观点出发，吴认为用高压的政治手段，无法解决经济问题。蒋经国不信邪，坚持“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的信念，只要施行铁腕，全面打击投机商人，争取上海市民的通力合作，通货膨胀，是可以遏止的。他是根据30年代斯大林新经济政策成功的先例。吴却亲自赴京，向蒋介石力谏，剖陈利弊。

蒋经国上任不到三个星期，上海市社会局长吴开先，公开和太子冷战，上海的官僚势力，组成联合阵线，和蒋经国对抗。

紧接着又出现一个“扬子案”，把蒋经国到上海的一个多月声威，全部输光，上海居民把蒋经国的政治口号“打老虎”，改成了“只拍苍蝇，不打老虎。”

“扬子案”的主角是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由于他的“扬子公司”在上海经济管制时，犯了最大违禁事件，蒋经国下令将其逮捕。据当时印度驻华大使潘迪华回忆，当“扬子公司”被查封的当晚，南京官邸正在宴客，杯盘交错之际，上海突来一紧急电话，宋美龄接完电话之后，神色至为不安，乃先离席。翌晨（10月1日），宋美龄即自南京乘专机到上海，将孔令侃“带走”。事实证明，吴国桢这位普林斯顿训练出来的政治能手，的确比蒋经国成熟、高明。“扬子案”后，蒋经国落荒而走。但蒋经国却把这笔帐记到吴的头上，认为是吴扯了自己后腿，才有那样的结局。

## 水火难容

1949年12月15日，尚未复“总统”职的蒋介石以台湾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对此，吴大惑不解。因为陈诚掌管台湾省主席大印不足一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而台湾是国民党集团剩下的唯一统治区，当时随蒋赴台的高官如云，这一要职应该与己无缘。想到不久前陈诚

曾邀他出任省主席秘书长一职被他婉拒之事，吴在蒋介石告知他将要做此人事调整时对蒋说：“陈诚将军不是做得很好吗？最好由俞大维担任”。

蒋介石做此人事安排，颇费心机。他毫不隐讳地对吴说：“你很恰当，我要你今后全力争取美援。”

同月13日，台《中央日报》刊出了“台湾与美援”的社论，指出：“我们的历经图治，彻底改革，就是我们争取援助之最有效、最有力的方法”。由于一切改革的目标是以美援为中心，故有“民主先生”之称的吴国桢，当然成为台湾省主席的“最佳”入选。

吴国桢任台湾省主席之职的第三个月，蒋介石宣布复“总统”之职，同时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吴国桢认为：“为了他把省主席的位置让给我，他一直耿耿于怀，老是卡我，所以我向蒋先生报告，请求辞职。”蒋对吴的请辞不予批准，并对吴说：“辞修和你斗，你就和他斗，我支持你。”

受此鼓励，吴认为：“钩座惨受大陆失败之教训，已锐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

吴的“尽忠”，导致了他与蒋经国的再次冲突。当时蒋经国任“国军”政治部主任，承“参谋总长”周至柔之命，职掌三军政战工作。吴为“省政府”主席，主管地方行政，井水不犯河水，双方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尽可相安无事。但这仅是表象，江南在《蒋经国传》中说：“独裁主义式的统治，任何公诸于世的法律规章，随时可以废弃、践踏，机关与机关间的运作，并无固定的程序。蒋经国的权力，远超过其公开的职衔，明的一面，是政治部主任，救国团主任（后来成立）；暗地里，以总统府资料组的名义，操纵台湾的特务系统，特务权凌驾一切行政权。于是，吴、蒋冲突，乃成自然演变。”

根据江南披露，吴蒋冲突的枢纽，则为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即今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前身）司令一职，循例由“省主席”兼，实权操副司令之手。吴国桢一反他前任魏道明时代的习惯，凡事听令钮先铭一手包办，偶尔，要过问一下“司令部”的大事。詎料副司令彭孟緝，早投效到蒋经国麾下，听其驱使，和蒋经国互通声气。自然，就不把他的顶头上司吴放在眼里。

假使换一个“主席”，如俞鸿钧、严家淦之流，持“遇事请示，凡事推事”为座右铭，蒋经国越权，乐得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好官我自为之。那么，何止冲突不会升级，连上海时代的误会，都可消弭于无形。

但吴国桢拒绝妥协，江南认为有下列原因：

吴的性格使然，“士可杀而不可辱”，官可以不做，原则要遵守。这本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一项卓越的德行，吴能舍唯唯诺诺而表现其气节，至为难得。

恃宠而骄，过分高估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迨他了解蒋介石“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时，已噬脐莫及。

缺少团队精神。吴认为蒋经国“不学无术”，其所主张及实施之办法，与“近代民主政治，实属扞格”，而忽略“国府”的本质。民主也者，本来就为装饰门面的东西。

另有一种说法，吴“八面玲珑，十分圆滑”。一个“圆滑”的政治人物，当不至于糊涂到以自己的乌纱作孤注一掷，想必蒋经国有欺人过甚之处。

枝枝节节龃龉，大都为了金钱之争，迁台之初，台湾国民党当局除自上海搬去大量黄金白银，“国库”收入，几乎等于零。一切“中央”的开支，唯“省府”是赖。而“省府”的经济来源，无非靠岁收田赋。应付那样庞大

的开支，难免捉襟见肘。

吴身为主席，自有撙节开支，开拓财源的责任，遇到预算以外的额外要求，如“政治部”、“救国团”的请托，往往不客气地予以婉拒。换一个人当主席，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宁愿别处节省，对蒋经国网开一面。诚如他告诉雷震时说：“我只是采用消极行动，不发给经费，所以蒋经国恨死我了！”江南认为：“公正地说，吴意气用事的成分很大。否则不至于发展到形同水火的阶段。”

类似情况，陈诚当“行政院长”的时候，也曾发生过，也引起和蒋经国的矛盾，但没有吴蒋这么严重。

导致吴蒋严重对抗的是台湾火柴公司案，那是1950年的事。某天“省府”召开资源方面的会议，有人报告，王哲甫（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被捕，承办单位即省保安司令部。会后，吴召见“副司令”彭孟缉，查明原委。彭说是“总统”的命令，并陈阅全卷。吴不看则已，阅后，情绪激动，十分气恼。

台湾火柴公司，总公司原设上海，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董事长吴性裁，选择留居大陆。保安司令部本着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处事方针，将吴性裁列为“附匪商人”。吴性裁解放后，从事电影事业，曾摄制《民国四十年》影片一部，影片内容，对国民党、蒋经国有诸多“诋毁失敬”之处。透过情报活动，蒋经国获悉，迁怒于留台的台湾火柴公司，下令彭孟缉将负责人王哲甫，不分青红皂白，逮捕下狱。

于“法”，蒋经国是站不住的，台湾的王哲甫没有理由去为上海的吴性裁负任何行为上的“法律”责任。吴国桢说：

王虽到香港和吴性裁见到两次面，不过，在时间上是在影片完成之前。据王的供词，仅说是业务报告，和吴在上海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牵连。因此，我认为这种随便入人于罪的办法不足以服众。我命令彭孟缉立即释放，彭要我下手令，我下了一个条子。

吴的手令，等于废纸，彭并未遵守。吴说：

当天下午五点，彭要见我，而且和经国一道来的。

当时小蒋的职务是总政治部主任。我这才知道，经国以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名义，控制着台湾的特务系统。经国说，王有罪，不能释放，我坚持于法无据，场面极为尴尬。最后我问彭：“究竟你做主席兼保安司令，还是我呢？”

处彭的立场，可以对吴违命，吴莫奈他何！和蒋经国站到一边，不愁将来之升官发财。果然，这位吴眼中“獐头鼠目”的彭“副司令”，后来因功而升为上将衔“副参谋总长”、“代参谋总长”、“参谋总长”，似乎火箭的速度，在台湾红极一时。

这是吴、蒋当面顶碰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当时的情况，除吴以外，不作第二人想，可见吴的气焰，并不下于蒋经国。

当天傍晚，吴下班不久，“主席”官邸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即“总统”贴身秘书周宏涛，奉令转达，抓王是蒋介石的意思。显然，打出父亲这张牌，目的在缓和蒋经国和吴的关系，挽回蒋经国的颜面。吴告诉周，“大家都为蒋先生做事，上级命令，无违抗余地。但王案牵涉到一个是非之争，是非是原则问题。此刻台湾既风雷震荡，敌人伺机而动，政府标榜民主法治，焉能言行不一。”周打圆场：“假使省府怕背黑锅，可改由国防部军法处处理。”吴尽可顺水推舟，息争了事。然而，吴仍未见好就收，坚持己见，写就私函

一封，托周转呈，图作最后努力。

当晚，周再度访吴。周说：“先生（官邸称蒋为‘先生’）看你的面子，由死刑改判七年徒刑。”

吴未获全胜，亦未全败，以蒋介石的性格，对这样一位傲慢的部下，已足够容忍，但是吴和蒋经国的嫌隙，亦未因此平息，且进一步扩大。

更严重的冲突，发生在台湾第二次县市长选举前夕。蒋经国下令全省特务以户口检查之名，一夕间，逮捕 398 人，而其中仅 19 名有过轻微违警记录，其余全属无辜。经吴出面干预，迅速获释。但大逮捕之后有小逮捕，吴回忆说：

有一天，基隆市长谢贯一向我报告，有两位市议员，午夜失踪。接报后，我向彭孟缉查询，彭先说不知道，后来推到保安司令部的×处长身上，那处长又说不知详情，案子是调查局办的，于是我下令要他在三小时内开释。开释后，我要谢市长把两位台籍议员带来看我，出于我意料之外的，两位议员表示，人既恢复自由，倒过来要求我不必追求真相，原因怕特务报复。后来说出真相，其故在未遵党部指示，投国民党提名的议长一票，遂遭惩罚。

吴要彭把两位违法乱纪的处长撤职，彭表面敷衍，并未遵办。吴追问原因，彭拿出蒋介石的手令，吴顿时无话可说。

不得已，吴国桢于 1952 年 2 月，向蒋介石进言：“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蒋介石低头不语，装出很为难的表情，向吴斥责：“别说下去啦！”

蒋介石按既定方针办事，自然听不进吴国桢这逆耳忠言。吴国桢说：“此后钧座对于经国兄更加信任，不独任其控制特务及军队，且使之操纵党部并主持青年团。”

## 黯然挂冠

吴国桢认为，他的上述进言使蒋介石产生了除掉他的念头。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52 年 10 月 30 日，是蒋介石 65 岁的生日。蒋介石与宋美龄这天离开台北，到郊外草山别墅避寿，但特邀请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夫妇上山吃晚饭，并殷切地留吴在山上过夜。第二天吴氏夫妇离开别墅时，发现原来自己的汽车司机不在了，派人找也没找到，只得由蒋宅另派了一名司机开车下山。那天正巧吴的妻子大闹腹泻，开车不久就停车到路旁一老百姓家中入厕。等吴氏夫妇回到汽车旁，发现司机脸色都吓白了。原来三个车轮的螺丝钉都早已被人拧掉了，如果不是吴夫人闹腹泻，汽车上的人都已粉身碎骨了。

吴国桢死里逃生，大彻大悟：蒋介石是想要他的命了！这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训练出来的政治能手，十分成熟，对此事一点不露声色。

1953 年 1 月，美国共和党上台，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吴意识到，美台关系已经好转，他已完成了使命，该是急流勇退的时候了。

3 月初，吴国桢借口健康欠佳，向蒋介石呈请辞职。蒋介石故作姿态，批示慰留，给假一月。但吴去意已坚，“三度请辞”，“行政院”第 286 次院会，“应予照准”，并任命俞鸿钧为新的台湾省主席。

蒋介石之重用吴国桢，固然是由于他毕业于美国，与美国政界有相当的关系。但熟悉国民党政坛的人士认为，才干和忠诚，加上不结党营私也是他为蒋器重的原因。



在吴案发生之后，曾任上海市参议长的潘公展回忆：

平心而论，吴国桢并不是一个庸才，他确有一套看家本领。他的漂亮的仪态，流利的演说，讲得一口很好的外国语，十足一股洋派神气，以及按时到办公室（上海人叫“写字间”），见了什么人都笑脸以笑容，甚至和当时气焰很盛的闹学潮的学生，也表示着一种即使“挨打”也满不在乎的气度，的确使当时仅观皮相的一般洋商和上海市民，仿佛都在想大上海何幸而得到如此一位现代化的民主市长。

吴国桢任国民党“外交部”次长时候的僚属何凤山的回忆说：

吴国桢到外交部上任时（1942），仅随身带了一位秘书，用了几个星期之后，打发他走了，并且说：“我来做次长，已经是半路出家，破坏了外交部的系统与组织。我不能再从外边擅带人进来，加深我的歉疚”。所以几年下来，他没有用一个私人，极端尊重外交部的良好传统，年轻的新进大多为高考出身，由外交部举行特种考试派员监督，考取人员所取得的资格与高考资格相等。

吴国桢是清华毕业，留学美国，在国内做事多年，所以英文之外，中文也很不错，他告诉我说：“刀笔吏俗所谓绍兴师爷，在公文的运用上有一种特殊的技巧”。他佩服当时在侍从室工作的陈方（芷汀），他跟陈某请教过，所以吴氏行文，极重简洁扼要。我们部中的同事，虽然许多是老公事，有时在重要关口上认为不当时，他也不客气的申斥，受他折磨最厉的，要算欧洲司长梁龙（云松）。

吴氏是一个急性人，讲求效能，他的外国名字叫 K.C.WU，中文喊为‘开水壶’，一则音同，再则恐怕是形容他说话说得快，好像壶中的开水一样。他走路健步如飞，许多老大爷们跟不上，视与他同行为畏途。在政治关系上，他与张群（岳军）接近，被目为政学系中的一分子。他注意人才选拔，我有时与他同车由上清市到涨秋山庄办公，在路上除讨论案件与问题之外，尚臧否部中的人事。因此，他对于部务的了解更加深切，譬之是时部员的外放，并非人事处决定，而乃每一出缺时，由每司提出人选，再经部务会议公决，人事处不过办理例行手续而已。我是时正督策同仁，铲除积习，努力工作，如果外放机会缺少，则将失去一重要的鞭策工具。所以我一有机会，就与吴氏谈司中的工作，又每一人员的学识品格。他是一位有心人，还晓得看点相，有次谈到纽约总领事馆的情形，我指出领事卢心畬有干才，处理内外事务均能恰到好处，他是于峻吉总领事的好助手。我不过是随便谈谈，并没有存什么心，哪知几个月之后，加拿大的多伦多总领事出缺，部中竞求的人很多，他忽然的问我说：

‘你看派卢心畬怎样？’我闻之愕然，他继续说道：‘你不是说他很好吗？打电报问问他的意思如何？’卢某虽因故没有接受，而吴氏的求才若渴可以想见。”

上述例子，颇能勾画吴的个性为人，办事能力。

蒋介石器重吴，显然事出有因。但宠臣与爱子之间，有如鱼与熊掌，选择起来并不容易。蒋派人向吴暗示，只要愿意和蒋经国合作，将以“阁揆”酬庸。吴坚持“道不同不与为谋的”的原则，断然挂冠。

5月24日，即卸职后的第四十四天，吴国桢偕夫人黄卓群，黯然离台。“官方”公布的理由，是到爱荷华州格林奈尔母校，接受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并作六次公开演讲。离台当天，松山机场，场面热闹空前，陈诚夫妇以下，

500 余人，为这位前“主席”隆重送行。

临别前，“司法院长”王亮畴问吴：“不回来了吗？”吴答：“是时候了。”

吴的好友、政学系领袖张群也来送行，他送吴一幅曾国藩手书对联：“水宽山远烟霞回，天澹云闲今古同”。

对于吴的离台，江南披露：“若非宋美龄从中协助，在蒋经国的阻挠下，绝无可能。然而，险象环生，诸多插曲。先取得普通护照，第二天，‘外交部，次长时昭瀛，旋奉命收回，改发公务护照，吴最小的一个儿子吴修潢，当时就读台北建国中学高二，不准偕行，在台北姨母家中寄居。79 岁的老父吴经明先生，同时留台。

“吴修潢不准偕行，当局如引用‘兵役法’的条例，自于‘法’有据。有气度的话，未尝不可法外通情，免得落个‘人质’的口实。”

### 旧恨新仇一发难收

吴国桢初到美国，顾及老父和次子的安全，谨言慎行，没有半句对蒋氏父子不满之词。

不料，继吴国桢之后，蒋介石又以“蒙混舞弊，不尽职守”的罪名，于 1953 年 11 月 18 日将“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免职。

王世杰是被美国当局认为最具“西方精神”和受到“特别赏识”的人，他与美驻台“大使”蓝钦建立了直接的密切的关系，早为宋美龄等所嫉视。宋认为：王是国民党内部反宋最用力的，间接鼓励居留海外的人对宋恶意中伤，并暗中支持《自由中国》半月刊反对孔祥熙返台。据悉，宋曾对王宠惠说：“像王世杰这样的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蒋经国、郑彦棻也在宋美龄面前，指控王利用《香港时报》董事名义中饱港币八、九十万元，贪污有据。又说他与海外反蒋分子有联系，暗中支持“第三势力”。于是，宋和蒋经国便在蒋介石面前极力攻击王，而蒋介石对政学系的作法不满也由来已久。在美蒋关系上，王与蒋的意见不一，常发生争论。

王世杰事件直接的原因，传说很多。一说原因有二：一是当尼克松晤蒋时提出反共分子“团结一致”共负“国是”和劝蒋交出政权到美国去住之后，王又具体和蒋表示应早日召开“反共救国会议”，惹起蒋的愤恨。二是尼克松与蒋谈话时说：“你们只知道经援，可是浪费的太多了，例如陈纳德在美国出卖的一批中航器材收入即达 400 万美元，这笔钱应该属于你们国府所有；又有吴国桢住在纽约的豪华旅馆中，以一个曾任过省主席的人能有如此财力在美国消耗，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事。”尼克松走后，蒋即令王交代，斥责王在处理民航事件时未向其提出详细报告，王亲笔批过 12 万美元的官价外汇给吴国桢亦未呈报，认为王有意舞弊，两人发生争吵。蒋大怒，当晚即下令将王撤职交“监察院”查办。后经张群疏通，将“交监察院查办”字句取消。传说，当晚及次晨张群两次见蒋皆被拒，次日吴铁城得机见蒋，但被蒋大骂谓“国家的事都是你们这派人弄坏，你怎么有脸活下去”，吴未敢发一言，辞出归家后，即服安眠药而死。

另一种传说是：在尼克松访台时，曾答复蒋介石两件事。一，在军事上美国对台湾“负责到底”，但政治上要与整个远东配合；二，美国认为签订太平洋安全同盟时机已到，但要由远东国家自行动手，现在看起来菲律宾担任领袖国家较为适宜。蒋介石听后甚为不快，立即召集张群、陈诚、叶公超、

王世杰、王宠惠等人商讨对策，会上王世杰竭力主张一切都照美方意见，并引证当年在大陆没有听从魏德迈的话吃了大亏。蒋闻言大骂王“混蛋”、“书呆子”。蒋经国闻讯后即趁机告蒋：王早已不可靠，指王利用美国的关系结党营私，在香港拉拢“第三势力”，与顾孟余、许崇智等有来往，又暗中与胡适联合，以《自由中国》半月刊打击蒋的声望，以及王利用“总统府”名义经营港台走私、套汇等。蒋介石听后怒不可遏，立即传命拘捕王世杰，并亲笔下令要王交代。

王世杰事件发生后，蒋经国即发动台湾报刊攻击王擅自批准吴国桢套购外汇，以此一方面掩盖王去职的真实原因，同时再度向吴国桢进攻，以进一步打击政学系、亲美派的势力。

1954年1月13日、14日《美洲日报》根据所闻的传说，接连发表两篇社论，提出若干疑问。1月25日的《民众日报》也有长篇社论《劝吴国桢从速回台湾》。吴氏对《美洲日报》和《民众日报》都先后有信去声明辟谣，而其1月27日致《民众日报》函中，则透露几句肺腑的话，那便是：

桢之爱国，不敢后人。桢又何敢从个人一人或一家着想？然而古语有云：事有可行，有不可行；又云：

合则留，不合则去；又云：忠臣去国，不洁其名。桢恳请贵报勿逼桢太甚，使桢不得不言所不愿言之言也。

1954年1月20日左右，国民党秘书长张其昀收到吴国桢于1月15日从美国寄来的一份启事，要求台湾报纸给予辟谣。广告内容如下：

桢远在国外，忽闻道路谣传，谓桢苟取巨额外汇，并云前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之去职与此有关等语，查桢此行来美，曾经由行政院陈院长批准，以私人所有台币向台湾银行购买美金5000元，作为旅费，此外并未由政府或政府中之任何人员批准拨给分文公款，桢亦未有此项请求，与王氏更从未谈过去美费用问题，桢闻此谣传后，已于1月2日以党员身分函请张其昀秘书长转呈总裁请饬政府彻底查明，公布真相。至桢在美生活，除夏间遵医嘱曾赴美国西部高山地带休养医治气喘外，自10月起即在依利诺州艾凡思顿城公寓旅舍居住，房屋两间另一小厨房，内子执炊，桢自洗碗，以旅费不敷，遂接受各方请求演讲，已接受者约20余处，每次讲费约450美金，一面借以维持生活，一面亦以国民一分子资格为国宣传，以演讲关系曾赴纽约四次，旅馆费用，由请演讲者供给，曾在所谓最华丽之华都饭店演讲两次，广播一次，但从未寓居该处，此间本国侨胞及美国友好均深知悉，勿庸置辩。查桢为国服务二十余年，平生自爱，未曾贪污，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若尚存心混水摸鱼盗取公帑，实将自觉不济于人类，惟以道路阻隔，深恐以讹传讹，故特启事周知，如桢个人有任何劣迹，敬请国人检举，政府查办。这样一则广告，对当局并无冒犯之处，张其昀身为党的秘书长，应立即向蒋介石请示，并力陈拒刊或缓刊的利弊得失。殊料张是官僚，学会官场的太极拳，将启事交吴父，吴父跑遍各报，不得要领。

吴忍无可忍，再想到留台的儿子吴修潢，放行无期，亲情难遏。于是在美发表了对台的三点“政见”：

(1)“除非吾人能在现行政治区内实施民主”，则无法争取台湾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全力支持，更无法争取自由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同情与支持。

(2)目前的政府过于专权。国民党的经费，非来自党员，而靠国库支出，目的在永恒一党统治。

(3) 政治部完全拷贝苏联，若干人士竟认为——

‘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取共产主义的方法’。”

吴的意见，知道内情的人，早见怪不怪，美国公众，当然闻所未闻，经吴登高一呼，美国的大众传播，如获至宝。报纸如著名的《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杂志如《展望》、《纽约客》、《时代》、《新闻周刊》等，无不争相报道。

## 隔海对骂

国外闹得轰轰烈烈，台湾的报纸，只字不提。2月26日，身为“立法院长”的张道藩，始揭竿而起，和吴隔海骂战。

张和吴曾在南开中学同学，自称是“老朋友”，这天的发言，一面孔的春秋大义，且非常情绪化。指吴“反动”、“狂妄”，上海市长任内，临阵脱逃，反对“耕者有其田”的根本大计等等。公开招待记者，说吴“非法犯纪”，罪名包括：“擅离职守，拒办移交，私自滥发钞票，抛空粮食，并在外汇，贸易，林产等问题的处理上，非法乱纪，专擅操纵，有意的包庇贪污，营私舞弊等”，共达十三条之多。

第二天(27日)吴国桢在美立即威胁称，万不得已时将公开揭发台湾内部专制独裁的事实。同时致函“国大”，攻讦蒋介石卖国集团一党专政、党组织与政治部控制军队、特务横行、人权无保障、言论不自由，思想控制等六点。要求“国大”：

一、彻查国民党经费来源，令“立法院”议定“政党法”，保障各方反共人士俱能在台公开成立政党；

二、撤销军队中的党组织及政治部；

三、由“立法院”拟定“国家安全制度”之法律，明确规定特务机构的权力，对于主持特务机构之人选，不得由当局派其亲属主持；

四、组织委员会公开接受无辜被捕及非法受提讯者亲友之控诉；

五、组织委员会彻查过去言论之何以不能自由，并追究责任；

六、撤销青年团特务组织。

蒋经国恼羞成怒，立刻又组织所有报纸杂志，利用社团、“立法委员”、省“参议员”以及学校、青年和军人的名义集中攻击吴国桢。台湾“中央社”甚至指骂吴为“共产党的同路人”。

另一位和张道藩搭档上阵的是吴的湖北同乡陶希圣，陶撰《两把刀·杀到底》一文，刊台北《新生报》，口诛笔伐，“正气”凛然。

一片谩骂声中，惟独《自由中国》的一篇文章，较为心平气和。

“吴国桢2月7日及16日指摘政府的话，尚系空空洞洞的词句，如‘不民主’、‘过于专权’，以及‘若干人士竟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用共产主义的方法’等等。这些原属空洞的词句，现在一经张院长的质询，吴国桢已申言要举出事实以支持之。果如此，我们倒是欢迎的。但我们要强调一点，即吴氏如要举出事实，最好是回国来向立法院公开作证，如同1951年5月间联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被罢黜后向美国国会作证一样，堂堂正正地说出政见之争何在，并确确凿凿地指出我们政府有哪些不民主的事实，有哪些过于专权的地方，有哪些人认为对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用共产主义的方法……。这样一来，即不说其效果之如何有利于政治民主，就凭这个作证的

本身，也可使我国政治向民主前途跨进一大步。我们该还记得，当时麦克阿瑟在其国会作证时所引起的‘杜鲁门麦克阿瑟大论战’，是如何显得民主国家的气派吧！我们对吴国桢作如此希望，希望其回国作证，正可觐验吴国桢的政治道德及其道德的勇气。”

可惜作者虽较其他台湾报纸的文章具有理性，却昧于世情，满纸书生之见。吴国桢果能堂堂正正地“向立法院公开作证”，他还要远适异邦吗？连出钱刊登广告的自由，如是拖延不决，要最高当局批准，复要求吴有“道德勇气”，岂非强人之难。倒是作者批评张道藩的一段，尚不失为说言佳句。

“张院长的质询，其内容是由立法院新闻室发布，刊载于报章的。其文字当与张院长当时所说的话没有两样。我们细读这篇文字，又不得不为张院长惋惜。不得不为一个作为民主国家的立法院院长惋惜。为什么呢？我想，凡是懂得‘民主不仅是指政治制度，同时也包括生活方式，更重要的还包括心理状态’的人，读到张院长这篇质询词，就一定感觉到一股非民主的气氛，洋溢在字里行间，尤其是被张院长使用的‘危害国家’、‘反动’等字眼，实在有点刺目。就我们所习知的，在民主国家中，对政府的批评、指摘，乃至至于攻击，不仅是常有的事，而且是必有的事。但民主的政府从未以‘反动’的帽子，加在批评者指摘者或攻击者的头上，至于人民代表机关的主席，更不会骂他们为‘反动’。而且政府并不等于国家。批评政府的言论——也止于言论更说不上是‘危害国家’。动不动给人带上帽子，是共产党型的政治作风，民主的政治技术，压根儿没有这一套。”

台湾当局明知理亏，仍顽抗到底，3月9日，国民党党报以《吴案应究办到底》发表社论，硬指吴所谓“政见不同”，是“阴谋诡计”，意图使“法律问题转变为政治问题”。同时重弹外国自由主义污蔑台湾“独裁专政”的老调，说吴与“外国的‘粉红色伙计’携手”，“以自由破坏自由”。

### 兔死狗烹意在传子

吴国桢在台湾的一片谩骂声中，复刊出《上总统书》一文，才正式点出蒋氏父子的名字，说太子是台湾政治进步之一大障碍，主张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在大陆未光复以前，不必重返台湾。同时批评蒋介石“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

吴国桢的一纸上书，等于在蒋氏父子的后院丢了一颗原子弹，发出惊人的震动。美国各大报纸无不争相报道。蒋介石赶紧发表“总统命令”，作为事件的尾声。

“总统43年（1954年）3月17日令：据行政院呈：‘本院政务委员吴国桢于去年5月借病请假赴美，托故不归，自本年2月以来竟连续散播荒诞谣诼，多方诋毁政府，企图淆乱国际视听，破坏反共复国大计，拟请予以撤职处分，另据各方报告，该员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多有违法与渎职之处，自应一并依法查明究办，请鉴核明令示遵’等情。查该吴国桢历任政府高级官吏，负重要职责者二十余年，乃出国甫及数月，即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该吴国桢前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违法与渎职情事，并应依法彻查究办，此令。”

吴国桢的儿子吴修潢，后来通过美国驻台大使蓝钦求情，当局放人。但

事件过程中，也深受其害，台湾报纸曾作如下报道：

“自从吴国桢发表诋毁政府的言论后，却使吴修潢深深陷入苦闷之中，同学们的冷嘲热讽，使得他再也安不下心来研习功课，三天两次请假。为了逃避一部分同学的椰榆和白眼，他拿起父亲吴国桢的印章向学校要求转学，虽然经学校当局劝阻了，但是他的苦闷是可以想见的。他已是失去了蹦跳的活力，眼镜下是一双失神的眸子。问起他对他爸爸最近的言论有何感想时，他带着些愤怒和难以掩饰的痛苦说：‘那是我爸爸的事，我完全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只愿意念书，其它什么问题我都无兴趣。’但是稍稍平静之后，

他又说：‘如果爸爸是胡说的，那么我希望他不要再错下去了，不能再错下去了’。吴修潢的性格似乎是比较内向的，在学校除了功课，他对课外的团体活动，一向无多大兴趣，而且许多想法也很不健全。他心中所念念不忘的，还是到美国去念书。他的爸爸临走时曾对他说：‘孩子你不要难过，我们不久就会见面的’，他仍寄予无限的希望。可是由于吴国桢在国外种种卑劣的行为，倒先作了儿子的罪人了。”

通过吴国桢事件，已给中外人士留下深刻的印象：蒋介石仍然是大陆时期的蒋介石，大陆惨败的教训，并未能使蒋介石洗心革面。台湾当局为维护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形象，曾策动“上书”、“声讨”运动，但结果也于事无补。

台湾内部的反应，包括“副总统”陈诚在内，都觉得蒋经国做的太过火。陈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尚难逃小蒋特务系统的监视，一般人的处境如何，可恩过半。吴出此下策，谁曰非蒋经国逼人过甚所至。

胡适在离台返美前说过这样一段话：

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批评政府或许对于国家还有点好处，假使吴所讲的话有一部分是真实不假，那么我们就应该因其系出自吴国桢之口便拒绝加以考虑……。假使那封信讨论到几项根本问题，其所发生的结果竟能使实行改革成为必须，那岂不是说对于国家倒反有了益处吗？

语虽委婉，但颇能代表台湾“沉默大众”的心声。

在王世杰事件和吴国桢事件的全部过程中，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始终是支持王、吴等亲美分子打击蒋经国。据悉，王世杰一被免职，美驻台大使蓝钦即认为是蒋经国的阴谋，马上向华盛顿密告蒋经国对美国的对台政策经常不满，如任其发展，可能成为“台湾铁托”。当吴国桢遭到张道藩的攻击和被免去“政务委员”职务后，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向吴保证，在任何情形下吴皆可在美居住。

美国最大报纸《纽约时报》、有时反映国务院半官方意见的华盛顿《邮报》、亨利鲁斯的杂志，一向主张积极援蒋的斯克浦斯——霍华德报系以及拥护麦克阿瑟和塔夫脱等“孤立派”的柏德逊——麦考米克报系等均著文支持吴国桢。其中柏德逊——麦考米克报系和芝加哥论坛报老板麦考米克上校当听知吴被蒋以吴必须有两年的稳固职业才能给其子吴修潢去美护照为难时，曾立即聘请他做芝加哥论坛报远东部的顾问。

蒋介石在遭到吴的抨击后，曾怒骂吴“已在一个外国之庇护下空论及滥言民主及自由”，“与共党分子毫无互异之处”。但后来通过美驻台大使“劝告”蒋不要再行攻击吴国桢，继续下去对蒋不利，蒋只好无可奈何地下令禁止继续刊登攻击吴国桢的文字。美国方面之所以在蒋介石召开“国大”和改

组“行政院”的期间支持吴国桢向蒋叫骂，也是为了压迫蒋多吸收亲美分子入阁。

吴国桢由盛而遽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是第一个重要的分水岭；第二个重要的分水岭是，1954年12月3日“中（台）美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的正式签字。

也就是说，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改变了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态势，台湾被列入美国防卫线中的一环，第7舰队开始巡弋台湾海峡，美国军经援助开始大批涌至台湾。“中（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生效，一方面束缚了“国府”的军事行动（实质上等于放弃反攻大陆），一方面也使台湾第一次真正有“安全感”，从而奠定了日后台湾经济繁荣之基。

在这两个先决条件下，蒋家父子决定牺牲“不合作”的吴国桢。吴国桢所鼓吹民主，在蒋氏父子的心目中，实际上等同于“叛乱”。再加上美国国务院有意扶植吴国桢在台湾“称王”的腹案，吴焉能不遭蒋氏父子的整肃！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红极一时的吴国桢率先成了蒋氏父子权力重新组合、巩固下的牺牲品。吴案的余绪，一为台湾“立法院”通过“引渡法”，一为蒋经国调职。蒋经国的新职为“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暂时离开“总政治部”的前台，但更上一层楼，成了名副其实的秘密警察头子。

### 遗愿绵绵无了时

吴国桢把想说的话说过以后，重新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书斋。他的朋友刘宜良（著名作家江南）在谈到吴时，认为他没有染上那种“上台趾高气扬，下台牢骚断肠”的官场病，具有学人本色、名家气度。当官不成，再操旧业，继续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时常还作些学术讲座，所得收入以补家中开支之需。1967年，他离开居住多年的芝加哥附近的伊万斯顿，应聘前往乔治亚州的萨瓦娜阿姆斯特壮学院任教，讲授中国文化，深受学生欢迎。到退休年龄时，校方应学生请求又续聘3年，薪金由学生捐助解决。刘宜良曾劝他在讲授之余撰写回忆录，记下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吴国桢表示：败军之将不足以言勇，不写。他说，他准备广集史料，埋头著述，立志写出传世之作。此作就是后来出版的专著《中国文化史》。

远离祖国的吴国桢，一直关心着故土上所发生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决定实行工作重心转移、一心一意搞四化、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伟大决策，感到由衷佩服。正如他给友人信中表示的那样：“虽身入美籍，然仍炎黄血裔，能不为之欣然？”还说：“现在中共有一个空前难得的机会，为国家、为人民，创造一新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一点，我寄予厚望。”“中国照目前的情况进步下去，发展经济，下个世纪，将和美国、日本，鼎足而立。”一次和刘宜良论及往事，谈到现代史上的国共人物时，吴国桢以历史见证人的身分，把周恩来、邓小平誉为安国定邦之士。他说：“《邓小平文选》，我反复看了3遍，这个人我非常佩服。”这些认识、看法并非心血来潮、一时冲动。吴国桢作为过来之人，看到过封建社会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看到过南京政府官场黑暗、人民痛苦；他也听到了新中国前进的脚步声。经过在美国30余年的观察和思考，理性和良知使他正视现实，愿意向祖国靠拢。当初被国民党方面骂作“共产党同路人”的吴国桢，

现在真成了“共产党同路人”。

晚年的吴国桢夫妇，有一事反复萦绕心头，就是希望回国一游，亲眼目睹祖国新貌，1983年底，他的儿子媳妇借讲学之便先行回国，联系吴国桢回国具体事宜。根据吴国桢的愿望，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发出了邀请。原定1984年春东归的吴国桢、黄卓群夫妇，因黄卓群女士有病未能成行，遂推到同年9月。岂知6月6日，吴国桢突然病故在异国。

异乡难埋思乡情，吴国桢的心愿成了遗愿，永无了时。他只有神游故国，魂归大陆。这真是：“长恨绵绵思乡人，不尽哀思游子魂。”



### 第三节 孙立人去职

#### “王朝”芒刺

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了29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提出了亚非各国应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加强团结，一致对敌。经过协商，同其他与会国一起努力，达成了基本上符合和平共处的十项原则，即“万隆精神”。

周恩来同参加会议的印、缅等七国代表团长举行会谈，讨论缓和远东局势，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周恩来严正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造成的。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但任何谈判都丝毫不影响中国人民行使自己的主权——解放台湾的行动。并表明我国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尽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和平解放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诚意和正确方针博得了国际舆论的好评，促成了1955年8月开始的中美大使会谈。这对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促成中美双方的相互了解起了好的作用。我国外交政策方面取得的一系列的胜利，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1956年3月，蒋介石在接见美国合众通讯社社长时说：

本人坦白认为：自由世界在亚洲冷战中，正遭遇失败，很不幸的，至少在亚洲，自由世界的外交已造成一种支持与鼓励中立主义的印象。……今日所谓中立主义，一方面使共产集团之收获益臻巩固，而另一方面使俄、共政治经济的邪恶势力之渗透发展，较前更为容易。而其最大作用，就是可使自由亚洲人民对于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所持之最后意向究竟如何，更感惶惑。故在亚洲赢得冷战之主要措施，为美国应有一坚定反共政策之表示。

蒋介石到底要求美国应有何种“坚定反共政策”？无外乎帮他“光复大陆”。但华盛顿的当政者，是现实主义者，比蒋介石清醒得多。反共保台可以。与八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战？决不冒这个险！蒋介石有怨气，可是，台湾小朝廷的存亡，又唯美国的庇护是赖，不敢太造次。

实质上，既有了“美、中（台）共同防御条约”为庇护，蒋介石已看出长期偏安的局势已定，他也就乐得在海岛上称孤道寡，安享天年了。要紧的就是如何稳定岛上的政局，发展岛上的经济建设，将最后这一点江山，妥妥当当地传给子孙后代。

蒋经国在父亲的教导下，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危险人物”，“异己分子”相继溃不成军，皆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尤其是在拔掉手握兵权的武将孙立人这颗眼中钉时，表现得更为突出。

#### “东方的隆美尔”

我们先把焦点对准孙立人，将孙的出身作一交代。

孙立人，原籍安徽舒城，生于1900年。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被保送赴美，进入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获工程学士学位，转入弗吉尼亚西点军校学习，和美国的乔治·马歇尔元帅是先后期同学。

1928年，孙立人毕业回国，先入国民党党务学校任军训队长，后调“陆

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任副总队长。宋子文成立“税务警察总团”，邀孙出任该团“特种兵团团长”。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由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直接受到日寇威胁，14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发表“自卫”宣言。同时，蒋介石电令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对日寇发动总攻，并调集73个精锐师参加上海抗战。孙的税警第四团，参与是役。

当时很多人认为，孙部是支非正规部队，没有战斗力。但实际上，这支财政部的武装，武器远比一般国民党军队优越，中层以上军官大都是留美的少壮派，士兵中有文化的多，部队平时训练严格，军容风纪比国民党其他部队好，再加上民族战争伟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淞沪前线打得很顽强，给日本侵略军以很大的杀伤。

在温藻浜战斗中，孙立人中弹负伤，被送香港养和医院医治。1938年，孙立人又率部参加了武汉保卫战，二次立功。

这二次战役，使孙立人在军界初露锋芒。

“税警总团”在长沙扩建为缉私总队时，孙立人任总队长，同时晋升为少将。孙立人选定长沙为扩军基地，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长沙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便于收容各路部队的散兵游勇；其二，原“税警总团”的官兵中，湖南人居多，在战斗中，湖南人勇敢善战，深得孙立人赏识，在本地扩军，便于多招些湖南人。孙部基地设于长沙岳麓山。副总队长齐学启，湖南宁乡人，曾任江苏保安团团长。第一团上校团长贾幼慧，山西人，是孙立人清华和弗吉尼亚的同学，曾任原税警总团炮兵营长。第二团上校团长唐守治，湖南零陵人，曾任某部队宪兵营长。第三团上校团长葛南杉，江苏人，留法生，工兵营中校营长王之，留美生。通信营少校营长文芝龙，黄埔毕业。孙立人依靠这些骨干，招募和收容兵源，扩大自己的势力，不到半年，就招集了三千多人。以后逐渐扩充到五个团，还有工兵、通信、特务等三个直属营和一个教导队，实际已有了两个师的兵力。

孙立人在湖南建军，原以为离前线尚远，可以好好地扩军训练，不料日军飞机经常来轰炸，弄得日夜不宁。于是，他急忙电告重庆，请求转驻贵州。蒋介石、宋子文也想保存这部分力量。所以，很快就批准了入贵州的请求，指定缉私总队驻贵州都匀训练。

1940年11月，税警团改编为新38师，孙任师长，1942年远征缅甸。

在中国对日抗战史中，有一段精彩的“异域”篇章，这就是孙立人所率新38师远征缅甸时的“仁安羌大捷”。

“仁安羌大捷”是个闻名世界的战役，新38师在劣势的情况下，竟以不满1000人的兵力，击败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救出超己十倍的友军。

当时缅甸整个战争形势，就盟军方面来说：左翼为国民党军队第6军，当面之敌为敌第18师团；正面为国民党军队第5军，当面之敌为敌第55师团；右翼为英第一军，当面敌为敌第33师团。新38师在曼德勒，无形中有东西策应的任务。

4月14日，由于英军第1师放弃马格威，改守仁安羌，引起盟军右翼的严重局面。新38师的112团和113团先后奉命由副师长齐学启率领，开往纳特曼克与巧克柏当地布防，负责支援英军和掩护正面的侧背，曼德勒卫戍的任务，只留下114团的两个营担任。而114团的第1营仍然留驻腊戍，担

任飞机场的警戒任务。

日军探听到英军退守仁安羌的消息，马上就分出两个联队兵力，绕到英军后方，占领仁安羌油田，切断英军归路，将英军第1师全部和战车营的一部，包围在仁安羌北面一带地区。又用一个大队的兵力飞快占据拚墙河北岸渡口附近，阻截英军的救援，不过当时在拚墙河北岸和日作战的英军，只是少数步兵和装甲旅战车山炮的一部分，自身都已难保，更无力分兵去救援在南岸被围的部队了。

4月16日，在仁安羌北面的英军第1师已经被包围两个昼夜，粮尽弹缺，水源断绝，危急万分，驻扎巧克柏当的113团，便接到了立即驰援的命令。

救兵如救火，113团连夜奔赶，在17日的黄昏时分，到达拚墙河北岸，在距河五英里的地方，进入准备攻击的位置，当晚就展开了猛烈的战斗。18日拂晓起，战斗更激烈，孙立人亲自从曼德勒赶往前线指挥，正午12时，拚墙河北岸日军肃清，英方催请孙部立刻渡河攻击，当时孙部兵力太少，而且南岸地形暴露，日军又是居高临下，孙部站在仰攻的地位，如果攻势稍一顿挫，日军可能立即窥破孙部实力，这样一来，不但不能达成解救英军的任务，并且可能把113团陷入危险的境地。因此，孙立人决定暂时停止进击，打算在黄昏以前用尽各种方法把当面的敌情和地形侦查清楚，再利用夜间去周密部署，准备在第二天拂晓进行攻击。英第1军团长史林姆将军对于孙立人这样计出万全的筹划，虽然表示十分钦佩，但怎样才能使他的被围部队立刻解救出来，却是他更焦急的一个问题，因为他接到被围的第1师师长斯高特将军的告急无线电话，报告被围官兵已经断绝了两天的水粮，无法继续维持下去，若是今天再不能解围，便有瓦解的可能。所以史林姆将军要求孙立人无论如何要立即渡河攻击援救，不能等到明天。后来孙立人一再的解释利害，并且请他打电话通知斯高特师长务须再忍耐一天。史林姆将军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斯高特师长又打来了第二次告急的无线电话，说是被围的部队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再也不能忍耐一刻了。史林姆将军脸上显然是变了颜色，他凝视着孙立人，目光慌乱，神情紧张，但孙立人的态度却依旧很平静，并再请史林姆将军转告斯高特师长说：“贵师既已忍耐了两天，无论如何还要坚持这最后一日，中国军队一定负责在明天下午6点钟以前，将贵师完全解救出围。”无线电话中又以焦急而怀疑的语气传来“有无把握”的询问，孙立人斩钉截铁地回答他说：“中国军队，连我在内，纵使战到最后一个人，也一定要把贵军解救出险！”

这句话使史林姆将军大为感动，和孙立人郑重地紧握着手，认为这是一种“君子协定”。

19日，东方鱼肚白色还没有出现，攻击便开始了。破晓时，左翼部队将日军第一线阵地完全攻占。战斗转进到山地里，日军不顾一切猛烈反扑，孙部已得的阵地，三次失而复得。在日军优势兵力的压迫下，孙部必须要处处防备敌人侦知实力，所以用种种方法，设置疑兵，虚张声势，又用小部队进行扰乱突击，更教日军无从判断虚实，主攻部队利用山炮、轻重机枪及轻重迫击炮的掩护，反复肉搏冲杀，第三营长张琦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还高呼着“弟兄们，杀呀！”士兵们眼看着自己的长官壮烈地倒了下去，心头热辣辣地默念着他最后所发出的口令，含着眼泪，前仆后继的拚死冲杀上去，一直冲上了油田。山凹里，油田边，都积起了一堆一堆的尸丘。这一场白刃肉搏的大战，从午前4时继续到午后3时，日军的第33师团完全被击溃了，他们

丢下了 1200 多具死尸，退出阵地，113 团不过 1000 人的战斗员兵中也伤亡了一半。这不但是一个冒险的攻击战，简直是一个可怕的空城计。

下午 5 时，孙部克复了全部仁安羌油田区域，枪炮声渐渐的稀远，敌人显然是在加速后撤。孙部首先将被俘的英军、美传教士和新闻记者五百余人解救出险，并将夺回被日军抢去的英方辎重汽车一百多辆，交还英方。接着英军第 1 师的步兵、骑兵，炮兵、战车部队等七千余人和一千多匹马都在孙部的安全掩护下，从左翼向挤墙河北岸退出，三天的苦熬已使他们狼狈不堪，一路对着孙部的官兵，个个都竖起大拇指高呼“中国万岁”，更有许多军官压制不住感激的热情，抱着孙部的军官跳了起来，友情的高扬已经到达了顶点。

仁安羌之役、在军事上是一个奇迹，中国军队是以少胜多，以客胜主，以寡救众。这一仗，不但表现出中国军队是有严格的训练和旺盛的士气，更表现出中国的指挥官有卓越的将才，有高明的判断能力，有超人的战术眼光，胆大心细的断然处置。同时，这一仗还不只是表现出中国军队作战的英勇惊人，并且显示出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优越性，从孙立人回答史林姆将军的“中国军队战至最后一人，也一定要把贵军解救出险”的一句话语中，就充分表现了中国人舍己救人和不背盟信的美德，以及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对道义的高深教养，后来，新 38 师转进到英法尔时，又和英军第 1 师碰在一起，彼此语言不通，相互以目光表达情感，有些英军官兵见了孙部，眼眶中竟都含有感激的晶晶泪水，这种表情不只是在羡慕新 38 师的战功，也不只是在感谢中国军队当日解救他们出险的好处，而是他们被中国军队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了，对于这种亲挚的友情协助，他们当会终身感念不忘的。

由于仁安羌援救英军卓越的战功，孙立人荣获“英帝国司令”勋章（C·B·E）和美国的“丰功”勋章。被誉为“东方的隆美尔”和“东方野战之狐”。

## 四面楚歌

“仁安羌大捷”后，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抗战胜利后，新一军 4 万多人马辎重，借道香港，在美国军舰护送下，开向东北，部队首先在秦皇岛登陆，然后乘火车到锦州一带集中。途中受到东北民主联军的袭击，伤亡颇重。这一年初，孙立人又一次出国考察，此时尚未回国，全军由副军长贾幼慧率领，辗转迂回到沈阳外围。在四平街，新一军同东北民主联军激战了一个月，伤亡惨重，却攻不下一个小小的四平街，蒋介石非常不满。这时，孙立人已经回国，急忙从关内赶来指挥战斗。也是他运气好，东北民主联军在保卫四平街的战斗中，赢得了时间，正作战略转移。因此，新一军一举而下吉林，长春、德惠，陈兵松花江畔。这一战又给孙立人镀了一层金粉。

但孙立人既非黄埔弟子，又非陆大学生，在国民党部队中自成一系，且孤芳自赏，自命不凡，仗着美国人撑腰，有时连蒋介石也不放在眼里。所以，蒋介石对他也不满，适逢云南部队 60 军 184 师在东北起义，投向共产党，使蒋介石愈加感到非嫡系部队不可靠。云南部队的后台是龙云，蒋介石曾以明升暗降的手法，把龙云调到中央，削掉了云南王的兵权。于是，便使用同样的手法，提升孙立人为东北“第四绥靖区司令”，接着又任为东北九省保安长官司令部副司令长官，把他调离长春到沈阳与保安司令杜聿明共事。而他

的新一军，也交给了黄埔出身的 50 师师长潘裕昆。孙对这种人事安排自然不满，但又没有办法，只能暗中怨恨。不久，只身南下。

孙离开东北，心情抑郁，意兴阑珊。最不甘心的，是受黄埔系的排挤欺压。1948 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际，蒋介石依从美国的授意，任孙立人为“陆军副总司令”兼“训练司令”，在美国顾问的直接控制下，开始在台湾训练新兵。其后，蒋介石又任陈诚为台湾省“主席”，除为了部署逃命外，也有牵制孙立人的用意。陈到台后，即曾暗中策划孙立人的凤山军官训练班并入军校中，陈系的林蔚、郭纬、罗卓英等企图将孙的练兵权转到罗卓英手上，但没有成功。

1949 年 9 月，蒋介石为了取得美国的积极援助，以陈诚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又“提拔”孙立人为“台湾防卫总司令”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在陈的控制下，孙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力，在长官公署成立不久的某次会议上，孙就曾很不满地表示：他虽为台湾防卫总司令，而军队的调出调入他一点都不清楚，调换一个军长，他连一个通知都没有接到。陈曾指使其嫡系的第 6 军，用“升官”的办法拉孙的 80 军的官兵，80 军一个老兵到第 6 军可升班长，班长可升排长，此事引起孙的异常气愤。

蒋介石复位后，陈诚任“行政院”院长，又升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表面上向美国做出了姿态，得以争取美援，实际上又以陈诚系的周至柔任“参谋总长”，用以牵制孙立人。据 1950 年材料，孙知道实际的权力操在“参谋总长”手中，不愿就任，要陈诚答应他两个条件：第一，仍任“台湾防卫总司令”；第二，仍兼负陆军军官训练责任。后经陈同意就任。表面上陈虽同意了孙的条件，但孙仍然没有人事权和指挥权，而且训练权的大部分也相继被陈夺去。孙曾哭诉于何应钦说：“台湾完了。”

1951 年 5 月香港《自然日报》称：

孙立人仍旧是一个“木偶司令”，不经蒋介石同意不能任免一个营长，没有蒋介石的命令也不得调动任何部队。蒋纬国的装甲兵部队更不容孙过问。孙的“陆军总司令部”的决议，每次均被周至柔控制的国防部加以删改，双方常打公文官司。陈诚的亲信原任国民党第 6 军军长戴朴等陈系军官，竟拒不出席孙召集的台湾防卫会议，此外，当时孙虽名义上仍兼“陆军训练司令”，可是，校官以上的训练全由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陈诚系的将领万耀煌、彭孟緝负责，高级政工干部的训练又由蒋经国的政工干部训练班主持，孙的凤山军官训练班，只能训练尉官以下的人员。陈诚手下的一些喽啰，对孙挂名的“陆军总司令”空衔，也喧嚷要予以夺去，如 1950 年黄杰从越南逃到台湾和陈诚系的黄埔出身军人段运、罗奇等叙餐时，大家公开他说：“陆军让孙立人干，难道我们黄埔就无人吗？”曾决定要夺取“陆军总司令”的位置，后经吴国桢提出：“要顾及美国人的印象”，才暂作罢。

江南在《蒋经国传》中说：

孙立人的处境，自美学成归国那天起，的确备尝嫉妒倾轧之苦。国民党军队将领中，有留日派、保定和黄埔系，惟留学英、美，形单影只。假使不是宋子文成立税警团，孙立人可能毕生从事军事训练。假如没有和盟军并肩作战的机会，孙亦不可能脱颖而出，中外驰名。那位西点军校出身的温应星，当了一阵税警团长，即销声匿迹，50 年代，参加香港的“第三势力”，和蒋介石隔海对抗，就是最好的例子。

孙的学识，据说卓越超群，这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变成他的负数。蒋

介石在 1940 年前，不让孙入野战军，带兵作战，多半基于现实形势的考虑。这一点，我们要承认，蒋作为最高统治者，权衡人事的综合平衡，有其独到之处。

据一位跟过孙多年的老部下说：“孙是个非常优秀的带兵官，但是位很坏的领袖。”讲人际关系，和他的同辈，几乎没有人可以合得来。任“陆军总司令”期间，每周军事汇报，他从未准时出席，其理由非常可笑，“他不愿意向周至柔总长敬礼，迟到能避免，因为，总统已在场。”

孙之傲慢，固有其理由，主要看不起他的一些同僚，认为他自己鹤立鸡群。也可能当时的情势，特别美国恢复军事援台后，制造他“非我莫属”的优越感。诚然，孙有学识，也有战功，是蒋的爱将，美军的宠儿，但孙是台湾整体里的个体，不能与人和衷共处，就会孤立无援，且遭致群体的打击。

《孙立人在台兵变经过》一文，则有如下生动的描述：

当陈诚任行政院长、周至柔任参谋总长、王叔铭任空军总司令、桂永清任海军总司令时，屡当蒋介石召开会议时，陆军总司令提出的问题或意见，总是遭到三票对一票的否决，有时弄得蒋介石亦左右为难。例如空军与海军提出，在防卫台湾及反攻大陆的战争中，空军海军如何重要，如何优先，须获得优先装备，反正是一切优先。又如空军提出，空军官兵的待遇要超出陆军两级，飞行员待遇，要超出陆军十倍，空军官兵要新式美观服装。海军提出，海军是国际兵种，须按国际标准待遇，一般官兵要超陆军一级，另有航海津贴，要有海军自己的舞厅、歌厅等。以上诸多不平等待遇，二十年后的今天，仍是外甥提灯笼（照旧）。可怜的陆军，四面是海，可怜的总司令，孤掌难鸣。陆军提出的许多问题，都遭到空海军的联合杯葛、阻碍。有时老孙气急了，就在会议上向老蒋报告说海军空军如何好，如何如何行，那么请总统将陆海空三军测验一下，比一比，看究竟哪一军好。先从我们三军总司令考起，比文也好，比武也好，比立正稍息也好，比 X+Y 也好，由你们海空军决定好了。像这样情形，最后还是由老蒋打圆场，至于老孙在老蒋面前请求批准进军校再受训一词，更是家常便饭。由此可见老孙与陈诚、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等高级将领间之矛盾多深。

已四面楚歌，腹背受敌，孙立人却犯着更致命的错误，他以蒋经国为敌，以“陆军总司令”的地位，抑制蒋经国的政工制度。

1950 年 12 月，孙立人召开的“新年第一次年终扩大良心会”，“让许多高级长官来听取士兵们的良心话”。孙致词说：“现在社会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骗人，说话也骗人，所以社会动荡不安，就是彼此不能开诚相见，埋没了良心之故。”

“良心会”的用意，也许不坏，但蒋经国觉得，孙立人捞过界，这本来是该“政治部”发动的事。蒋经国反击，推行“庆生会”，孙、蒋较量的火药味，乃全面扩散。

美军顾问团长蔡斯，他是带了支票签字权的美国大亨，负责台湾的军援执行，颐指气使，法力无边。早为蒋介石父子所不满，孙、蔡不谋而合，蔡斯也主张撤消军中政工制度。蒋经国疑神疑鬼，迁怒到孙的头上，认为孙假外人以自重，于是蒋介石密令除奉命者外，任何人不准与蔡斯接触。

其后，蒋介石与陈诚就更加压抑孙，用牵制、明升暗降等办法削弱孙的势力。将孙系的 80 军军长唐守治升为“南部防守区司令”，后又将他调为“北部防守区司令”，而 80 军却仍留在南部，并以陈诚死党反孙最强烈的戴朴为

其副司令以牵制唐。以后又将唐调任新成立的“第一军团副司令”，该军团司令又是陈诚的亲信胡璉。

1954年6月，孙立人在台湾的军事改组中因“任期届满”的理由免去了“陆军总司令”职，改任“总统府参军长”，贬为闲曹。孙对此很不满意，发牢骚说，“现在台湾是奴才统治人才。”并想藉接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给他工程博士学位为名去美国，蒋介石唯恐孙到美国后成为“吴国桢第二”，未予准许。但为了敷衍美国和缓和孙的反对，乃提拔孙的亲信余伯泉任“副参谋总长”。尽管如此，蒋氏父子仍觉得孙对“王朝”有潜在的威胁，不可“养虎遗患”。

### 疑谋不轨

1955年8月20日，蒋介石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审查“孙立人兵变案”。事出在台湾特务机关，抓到一个名叫郭廷亮的“匪谍”，该犯是孙立人部队的少校营长，利用与孙多年长官部属关系，在军中联络少尉级军官一百余人，预备于适当时机，发动“兵谏”。

江南依台湾“官方”公布的调查报告，以及其它非官方的资料，在《蒋经国传》中，对“孙立人事件”的经过，描述如下：

主犯郭廷亮，34岁，原籍云南，税警总团干部教练所学员队二期毕业，当时孙立人任团长。改新38师，郭是中尉排长，改新一军，郭升少校营长。1948年6月，新一军调驻沈阳时，郭和米店主人白经武结识，经白介绍，与李玉竹女士结婚，白借机“以匪党言论煽惑”。沈阳解放后，郭要求白协助取得路条，白通过其兄白经文给予办理，但白经文嘱郭到台时，须为中共工作。郭因而顺利离开解放区，经天津、上海转台。

郭到台后，先后任孙部少校营长、“陆总”搜索组大队长、步校教官、“陆总”第五署督训组组长。在1954年8月以前，郭并无显著或积极之“匪谍”活动。1954年9月，某晚7时许，有操北方口音的李某到郭家相访，李谓：“白先生要你积极进行，不久他会到台湾来。”郭随即执行所交代之任务，利用与孙多年长官部属关系，在军中联络少尉级军官一百余人，预备于适当时机，发动“兵谏”。

孙交卸“陆军总司令”时，曾令“陆总”督训组副组长于新民造册，把各军师团单位的联络人送孙。1954年8月和10月，孙曾两度召见郭廷亮，了解联络进展情况。

从犯6人，为37岁的江云锦，曾任陆军官校干部训练总队大队长，“陆总”第5署督训组副组长。“借到部队督训机会，在每一团中，指定职阶较高，学识较优，年资较深之同学为负责人，与部队中之各同学联络。”田祥鸿，30岁，四川人，任上尉情报官，受郭指示，“把军训班（第4军官训练班）同学联络起来，结成一股力量”，“向政府提出改革事项”。刘凯英，29岁，安徽合肥人，供职某部，任第4军官训练班学生联络人。还有陈良坝，34岁，福建林森人，孙的随从参谋。还有中校督导官李成亮。

6月初，“国军”在台南地区，举行“总统”亲校，孙等选定此时，为兵变日期。郭廷亮于5月15日在台北谒孙，向孙报告，××部队将在5月22日至6月2日开始团教练。“此项休息时间为采取行动最佳之时间。”于是孙计划于5月25日左右南下，以×××为指挥所，“将于5月底或6月初

有所行动”。

然而事情发生变化，孙决定于28日去南部，但“奉谕”于30日与蒋介石同坐飞机。郭廷亮则已于25日被捕，仅由陈良坝于28日乘车南下，沿公路通知各地人马。

6月6日，南部地区7万部队，举行检阅，来宾有专程自南朝鲜抵台的美国第8军军长泰勒中将和蔡斯团长。受检部队原规定是4时半前抵屏东机场，预定上午9时半正式检阅开始，但延至11时30分才举行。检阅台前，曾两度用扫雷器进行反复检查。

一说，孙事机不密，已先后有20余人向当局告密，郭廷亮干事发前12日被捕，情治单位，早掌握同谋人的动态；一说，某炮兵连突奉命携带弹药，引起某炮长怀疑，偷偷溜出营房向“政治部”主任阮成章报告，阮转报“安全局”，于是毛人凤奉命专机南下，孙事败案发。

孙的“同谋”事发先后，分别被捕，仅刘凯英脱逃，且获孙资助。但国民党当局仍不动声色。6日，蒋介石在高雄设宴，为泰勒洗尘时，陪客中尚有孙立人在座。此后，6月15日的黄埔军官学校校庆，和为蔡斯返国举行的联合欢宴席上（俞大维主持），再看不到孙立人的身影了，孙实际上已受到看管侦讯。

外电率先报道孙被捕消息，台湾当局却闷声不响，到8月3日，也就是说封锁了两个且，才开始公布孙辞职的消息。

辞职书虽吞吞吐吐，已呼之欲出。孙说：

“……近者陆军部队发生不肖事件，奉副总统谕示郭廷亮案情，日前黄、傅两局长奉命交阅江云锦等供词资料，职涉有重大之罪嫌，钧座未即付之法官，仰见格外爱护之恩德，天高地厚，感激涕零。伏念弱冠之年，即追随钧座，今已两鬓均斑，无日不在培植之中，感激知遇，应有以上报，乃今日竟发生此种不肖事件，抚衷自省，实深咎愧！拟请赐予免职，听候查处，倘蒙高厚，始终保全，傅闭门思过，则不胜感激待命之至！”

那么，究竟是什么事使陆军部队发生的“不肖事件”，使孙“抚衷自省，实深咎愧”呢？当局讳莫如深，贯彻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原则，或持“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无奈心理，以致谣言四起，众说纷坛，甚至距至今，迄无是那非耶的公断。

亲台湾的《新闻天地》，在《孙立人将军被黜》一文中，即对案情公布的方式，提出指责，认为“步骤仓卒”，“事前未有整个计划”，“予人以突兀含混印象”。

8月20日，蒋介石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委员包括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并指定陈诚为主任委员，案情有密锣紧鼓的趋势。调委会成员，除陈诚、何应钦（在日，根本未参与）是军人，其余7位和孙都谈不上任何恩怨纠葛。如吴忠信、许世英，德未必昭，年事甚高；王云五、俞大维两位，非国民党员，理论上“不致受到党组织的影响”；王宠惠，司法权威，“一定会坚持公正立场”。可以看出，蒋介石立意要制造出一个客观、公正的形象。

## 是非曲直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信誉欠佳，持独立言论立场的海外刊物，对台湾当局



处理孙案的公平性，颇“忧心如焚”，试举香港的《祖国》杂志的社论为例，该文说：

“这一事件，实为蒋经国氏与孙立人氏冲突斗争的结果……就政府处理龚德柏与马乘风案件经过看来，也使我们忧虑政府当局，是否能做适当的处理。”

社论特别提到吴国桢和任显群涉嫌“匪谍”案，“尽管舆论沸腾，人心激愤”，其中几项政治案件，如今依然在“不审不判”之中，“这次如果对孙立人以及郭廷亮的案件，也照以往的办法拖成‘无声无息’，或不顾舆论而专行到底，那不但对内要失尽人心，同时将再次降低国际声望，而使反共复国的大业更加重的蒙上一层愁云惨雾。”

因此，《祖国》建议，善处此案的三原则，要求“认识事态的严重，幡然醒悟，改变作风”，“洗雪前衍，以正视听。”解除对孙立人的软禁状态，使他获有足以向舆论界公开的自由的发表意见的机会。否则使人只能听到当权者一面之词，无从判断事实真相。从法律观点和既有的资料来看，郭廷亮是否共谍，尚无充分证据，纵然是共谍，绝不能因为他是孙立人的部属，竟把孙立人也当“准共谍”来看待，尤其在未能证明孙立人与郭案有犯罪关连之前，不能先以对待罪犯的方式软禁起来（设非软禁，则何以不子孙立人以公开发言的机会？）。

对郭廷亮等的审判，应该公开，如果碍于实际困难不能公开，也应组织由公正人士所组成的陪审团来参加审判，绝不能秘密拘禁之后，是否经过合法审判尚不知道，即以共谍罪名将之处决。

公开事实真相，是政府公开处理此事而能取信于国内外的首要原则。政府应即出面向舆论界，详细说明此案发生的原委，发表逮捕三百名军官的事实真相，并应说明到目前为止，获有哪些具体证据。单就传闻的资料来说，除了3月（6月之误）间那次军事演习时，配发实弹阴谋叛乱一事以外，反对政工制度及硬性规定师长级军官两年辞职两事，显然并不能证明郭廷亮等即是共谍。

不可否认，海外的舆论，的确使台湾当局对孙案的处理，既不敢造次，更不敢拖延。“9人委员会”，历时50天，完成调查报告。孙立人接受侦讯时，地点在草山第一宾馆，“方式颇似座谈”，“坦白诚恳，在座诸人，有感极泣下者。”

调查报告，长达1万6千余言，10月31日正式公布。但其结果，和1937年的张学良案，有异曲同工之妙。“总统”命令，“以孙立人久历戎行，曾在对日抗战期间作战立功，且于案发之后，即能一再坦诚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既经令准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

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管教，孙立人由“国防部随时察考”，“管教”也好，“察考”也好，词义有别，结果相同，孙立人送台中软禁迄死。

孙如真的图谋不轨，罪证累累，交军法议处，大公无私，任何人服与不服，亦将向“法律”低头，但蒋介石故意师法前人，交叉运用恩威并施的游戏，即西方所谓棍子萝卜的技巧，先予打击，再故示宽容，让受害人感恩不已。蒋“明令”“毋庸议处”的理由，是因为（1）孙抗战期间，作战有功。（2）坦白陈述。（3）深切痛悔。等于说，孙固有罪，其罪可诛，朕宅心仁厚，不咎既往。

然而，演戏和作假，究难天衣无缝，《祖国》即以《孙立人案件献疑》为社论，提出下列疑问：

(1) 孙立人身为陆军总司令，“部下军官何止千百”，没有人可以担保，其中“一个共谍都没有？”以此责孙失察，“实在不合情理”。

(2) 孙立人的去职，既不能以“失察”为理由，真正的理由，是说他在“军中作小组织活动”，但《祖国》作者提出一个疑问，“何以黄埔同学可以联系，孙立人所训练的学生不可以联系？何以别的将领可以进行军官联谊组织，孙主人则不可以进行？”

(3) 有联系活动，并不表示准备进行“兵谏”，报告书仅根据几个下级军官的供证，引人入罪，是无法服人的。

(4) 关于郭廷亮案件部分，无确凿证据，仅郭本人的供词，该刊认为有下列疑点：

“既无证人，又无证物，是怎样破获他的间谍活动的？”

既无证人证物，郭廷亮怎么会供认是共谍，自寻死路？

假如郭廷亮是共谍，一定在台湾还有同伙，给他下命令或接受他的命令；对中共方面，也应有通讯联络方式；何以他长期孤零零地无联系地进行工作？

郭廷亮的证供，是否可能‘苦打成招’，经过别人歪曲？

调查报告书，字里行间，‘用了很多假定的语气’，这种调查，和‘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驰。”

不明就里的读者，可能会反问：“为什么台湾的报纸，对孙案的公正性，未置一词？”了解舆论工具控制在“官方”手里的特性，那就没有什么好惊奇的了。

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台湾监察院”，煞有其事地成立以曹德宣、陶百川为首的五人小组，进行调查，可惜该项报告，始终未获面世，列为“监察院”密件“加锁加封”，甚至事隔多年，当事人陶百川要求借阅，均遭挡驾。个中蹊跷，应是本案的关键之一。

陶百川坦言，其“结果与其它机关提出的报告，颇有出入。”这“颇有出入”四个字虽含蓄，却具画龙点睛之妙。五人委员，天良出现，给蒋介石写一长函，为孙将军和郭廷亮等“剖明事实”，郭乃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郭廷亮判定“匪谍”罪而幸免一死，台湾无此先例，假释后，获准离台赴港，又是例外之例。自然，不是五人小组“剖明事实”的功劳，仅能说，蒋经国有好生之德。郭不幸为夹缝中人物，不死已属大幸矣！

用常情判断，孙有一肚子委屈，现实环境使他无法施展，愤世嫉俗，以至挺而走险，那是可能的。然而，孙军人出身，难道他一点机警都没有，对台湾的严密特务监视，茫无所知，敢轻举妄动，引火烧身？所以，比较合理的假定，孙和部下的联系有之，那是基于长官部下，心心相惜的朋友师道之情，不一定就是同谋不轨。

观全案，郭廷亮成为孙案主角，孙受郭的牵连，于是成为“兵运”的来源。即使报告书说的全是事实，中共要吸收郭为地下工作人员，也不能儿戏到仅凭一面之缘，即下达任务！

以“匪嫌”入人于罪的，如后来的柏杨、李荊荪等，不一而足，早是台湾上下铲除异己分子之故伎。其妙处在于，无人可代为伸冤，无人敢于闻问，训练有素的特务人员，有“认真作假”的本领，使用各种技巧，会让你自己

挖井，自己往下跳。

孙立人受贬后，彭孟缉上窜，由中将御升二级上将，以黄埔六期的小老弟，继病故的桂永清为“参谋总长”，充分显示着蒋经国的势力，更见抬头。情治系统出来的人物，掌握台湾的军事大权。

孙案爆发前后，“总政治部”发动“效忠总统运动”，且借重青红帮敌血为盟的办法，把个人崇拜推到新的高峰，可以解释为孙案的回响和补救，台湾统治上层的虚弱与恐慌暴露无遗。

## 幕后恩怨

1988年，台湾报纸杂志掀起了一阵“为孙立人辨诬雪冤”的浪潮，一些幕后恩怨再一次被新闻界曝光。

三十三年来，孙立人一直被“限制”居住在台中市一栋日式洋房里，终日“诵经礼佛”，不问世事，生活受到有关单位的“照拂”，但没有个人自由，其心境之苦与际遇之惨，不言而喻。

孙立人家属透露，孙立人的“幽居生涯”过得十分恬淡。他晚年的心愿是希望他的长官能明白他的“处境”，宽宥他“个性上”的缺失，相信他毫无“谋反”之意及“挟外力自据”的意图。然而，他的心愿未得到长官的谅解，相反的，他所得到的讯息，却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论调。当局婉转告诉他，若其中真有冤屈，日后“历史”自会还他一个公道。至于在“政治”上能否还他“清白”，却需要从长计议，毕竟，这其中的是非曲直，当局也有难以处理的苦处，希望他能了解当局的“处境”，不必在这件事上引起更多的波澜。

随着时光的消逝，“从长计议”的结果，使“孙立人”三个字逐渐为人们淡忘，而孙立人已是90高龄的老人了。当时对他“行为”颇不谅解的老“总统”，已长眠于慈湖十多年了；一度视他为政敌的蒋经国，亦于1988年1月13日谢世。这两位蒋“总统”的去世，无疑的宣告孙立人所身受的“冤屈”能获“平反”的机会已经非常渺茫。

据一位元老将领表示，孙立人的愤慨，值得同情。事实上，孙立人到底冤不冤？或许仅有两位蒋“总统”知道，而孙立人却不一定知道这其中的缘由。如果两位蒋“总统”在生前没有为孙立人澄清冤屈，未来也没有人会重视此事。

一位台湾当局权威人士表示，当年“孙案”的处置经过，是两位蒋“总统”亲自处置，除非他们生前将处置文件全数保存下来，或许还能还给孙立人一个公道。否则，在原始文件悉数销毁下，光凭“9人小组”的调查报告与“监察院”“5人小组”的调查报告，仍不足以洗清孙立人的“冤屈”。

1955年8月孙立人去职后，时任“参谋总长”的彭孟缉，曾接获当局的指示，悉数焚毁“第四军官训练班”的史料与孙立人个人资料，以免引起外界的疑惧。故而现存孙案的处置报告，外界仅知“9人小组”与“监察院”“5人小组”的调查报告，殊不知孙案的处置报告，一共有六份，依序为：参谋本部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由时任“陆军总政治部”主任高魁元、“总政治部”副主任蒋坚忍负责汇集，而由彭孟缉主持。该份调查报告做得十分详细，现存于参谋本部内，历任“参谋总长”未奉允准，不得私自阅览。

第二份报告，系“国防部”调查报告，由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马纪

壮主其事，主要是提供给“监察院”“5人小组”参考之用，其机密程度不及参谋本部调查报告，现存于“国防部”。

第三份报告则是“9人小组”草拟的调查报告，也是引用最广的调查报告，毫无机密可言。

第四份报告，就是“监察院”“5人小组”的调查报告，尘封于“监察院”内，列为“极机密”文件。

第五份报告则是“军法局”审讯300多名军官的笔录，由当时任“军法局长”、现任“司法院”副院长汪道渊汇集而成。这份报告内容曾有部分外泄，后移存于“总统府”机要室内。

第六份报告，就是“立人专案”报告，由当时任“国安局长”的郑介民召集各情治单位主管成立“立人专案小组”的会议纪录。对孙立人于1947年10月来台训练新兵的过程，与人际之间及海内外之间的交往，都有详细的记载，唯该份文件存于何处，外人不得而知。

从上述六份报告的调查过程可知，“孙立人事件”并非是寻常的“政治”案件。其幕后所隐藏的是非恩怨，干事隔30多年后，令人无法理清其间的头绪。或许孙立人本人对于“兵变事件”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甚至“兵变”部队的军事领导，如高魁元、阮成章，张国英、王永树、石觉、罗恕人、蒋坚忍、王多年、郭永等人，于事件后相继出任要职。相反的，不负实际责任的“总统府参军长”孙立人，却身受“重处”，而被“长期拘禁”，有人认为，这是老“总统”或陈诚的“阴谋”，但当时任凤山地区最高军事长官的石觉，却否认这项传言。

石觉生前曾将这次“兵变”的过程告诉某位国民党将领说，这次兵变并非是事先排练，也绝不是孙立人一手安排。还记得6月6日南部地区部队大校阅前夕，老“总统”还派专人前来指示一切，而后在6月5日，“总统府”警卫营部队南下进驻西仔湾地区；直到6月6日上午，才知道部队可能“出事”。不料，兵变却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对于石觉的说法，当时任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的易大德，与阅兵典礼指挥官罗恕人给予证实。而后易大德去职，二军团政治部主任一职则由孙立人一手提拔的将领郑果出任，以稳定军心。当然，许多将领认为，究竟有没有“兵变”之事，只有当时任第十军政治部主任的阮成章最清楚。因为举发兵变的人士就是阮成章。这也是孙立人于事隔30多年后，对阮成章仍“耿耿于怀”的关键所在。

据了解，“兵变案”发生后、当时任“陆军总部政治部”主任的高魁元，几乎长期驻节高雄，处理“内部”问题。而后高魁元唯恐“株连”过多，曾建议有关单位，尽速焚毁“第四军官训练”的资料，及“改叙”军校的期别与整编部队。

从这项事实可看出，高魁元的“政治智慧”非比寻常，这也是他未来能获重用的关键所在。

另有报道透露，对孙案发生后，除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曾驰电力劝蒋介石须慎重处理外，现隐居士林“梅庄官邸”的宋美龄也曾出力营救。黄杰在《行参戎重》一书中写到：

1958年4月2日，“总统府”第二局长傅亚夫，转呈“参谋总长”王叔铭签“前总统府参军长孙立人，自1955年10月交国防部察看，虽已无职，并未夺职，孙员生活情形颇为困难，拟请自1955年10月起，发补助费3000

元以助孙员。”

该文呈请黄杰加签意见时，黄杰颇感困扰，唯恐蒋介石不同意，只好将此事禀明宋美龄。而后于4月5日，蒋介石批示下来：

- (1) 不必补发，自本年（1958年）4月份开始发给可也；
- (2) 以国防部名义发给之。

由此可知，孙立人的罹祸，关键在蒋介石的“不谅”。据了解，孙立人于“兵变”后，其上将位阶并未除役，其中是靠宋美龄为之转寰。而后，宋美龄又于1987年召见孙立人夫人张晶英，垂询孙立人健康状况，可知宋美龄仍然很关心孙立人。或许宋美龄知道孙立人的冤屈，唯恐涉及他人，而不便为孙说话。不但是宋美龄关切孙立人，甚至连孔祥熙、宋子文生前来台访问时，都曾提出要求会晤孙立人，遭到蒋介石的婉拒。孙立人与孔、宋家族的关系密切，是不是他罹祸的因素，不敢妄下断语。但孔、宋家族对孙立人的厚爱，也是政坛少见的异象。

孙案发生至今已30多年了，而当年涉及该案的“共犯”，如郭廷亮虽获假释，现郭已死亡；王善从是许世英的外孙，多年前已假释出狱，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江云锦则在龙潭附近，不知所终。他们的遭遇令人同情。不过，就孙案本身而言，真正知道真相而仍活于世间者，也只剩下彭孟缉、马纪壮、傅亚夫、蒋坚忍、高魁元、俞济时、俞大维、阮成章、黄少谷、艾瑗、汪道渊等人而已，若他们不肯说出真相。公布一切资料，相信也不足洗清孙立人的“冤屈”。

1989年9月24日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当年因“孙立人事件”而遭非法逮捕入狱的35位受刑人23日上午推派12位代表至监察院陈情。这些请愿代表对于30余年前的“冤狱”记忆犹新，除了逐一陈述当年受害经过，并有人展露往者受刑求逼供的伤痕。他们希望，监院也能够秉公调查，使他们的沉冤得雪，并弹劾当年违法人员及纠正处置错误的机关。

陈情代表指出，他们这些受害人都是当局为制造孙立人事件的假象，而遭冤枉了数十年。他们也于去年8月22日上书李登辉总统，希望能平反当年的罪名，但迄今毫无音讯。因此，只好求助“监察院”，作最后的努力。

监察院值日委员陈翰珍在接见陈情代表张熊飞及陈世全等人时，除了接受他们递交的陈情书外，并耐心地听他们的陈述。在一小时余的陈情结束后，陈翰珍对这些请愿代表说：“一定会本于监委的职权，对案情深入了解并研究如何处理”。据了解，陈翰珍已批示“派查”此案。

1990年11月19日上午11时许，孙立人病逝台中市自宅，享年91岁。弥留之际，虽有夫人及子女等守护在侧，但终因“兵变”案不能公开平反而惘然若失。

### 孙案的新披露

台湾《新新闻》周刊1994年2月9日一期刊登屈山河的文章，题目是《美国一度想在台湾搞政变》，该文原编者按这样指出：

从美国中情局与国务院，近来陆续解密的档案中发现，40年代末期，美国杜鲁门政府即已拟订“弃蒋保台”策略，“孙立人事件”于焉上演，留美的孙立人被华府评估为最适合倒蒋者，于是在美国特务、大使、重要官员接

触下，孙终于动心了。蒋介石对这一切过程虽了若指掌，但碍于依赖美援的压力下，只好万般忍让，但韩战爆发，使台湾不致落入中共之手，蒋放手一搏，孙立人被幽禁 30 余年。

该刊称，孙立人事件的关键史实，要被重新改写了！从美国中情局、国务院新近解密的各种机密、机密档案中发现，美国不仅和孙立人事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一度秘密在台湾推动一场可能影响深远的政变，试图以孙立人取代蒋介石。

从这些机密文件发现，美国国务院慎重其事地拟订“台湾政变”草案，而且其后于秘密会议中，国务院官员也提出由孙立人发动兵变以除蒋的“假设性”方案。不久后，美国国务院拟订一项极机密计划，其中最关键点是：美国应派出密使以最严密的方式通知孙立人，如果他愿意发动政变以军事控制全岛，则美国将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

最后美国付诸实施，派出密使与孙立人接触，也得到正面的回应。如果这一场酝酿中“扶孙除蒋”的政变计划成功实现，则台湾 40 年来的发展将完全改观。

该刊称：虽然被幽禁了 30 余年的孙立人将军，1990 年临终前仍坚持自己是“清白”的，但经本刊抽丝剥茧，爬梳核实，终发掘到历史真相，拨开长达 40 年的政治迷雾。

40 年代末期和 50 年代初期，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兵败如山倒，台湾亦岌岌可危，美国为免台湾回到人民手中，乃积极推动“弃蒋保台”策略。杜鲁门政府认为，腐化无能的蒋政权将无法抗拒中共的攻击，亦不能获得台湾人民的支持，因此，如要确保台湾，则蒋介石必须下台。为了贯彻这项策略，美国希望推出一位杰出能干而又反共亲美的将领，以取代蒋介石。

山姆大叔看中了留美派将领孙立人。

在美国政客、将领不断地游说、催促和鼓动之下，孙立人终于答应与美国合作发动兵变。

然而，1950 年 6 月 25 日爆发的朝鲜战争，粉碎了美国人倒蒋计划，成全了蒋介石在台湾重建王朝的宏图。

### 特务研拟暗杀计划

以下是该刊披露的美国当局策动孙立人反蒋的详细始末：

最早在秘密外交电报中建议由孙立人主持台湾省政的人，系美国驻华大使馆参事莫成德。莫成德于 1949 年 2 月自南京抵台，观察台湾情势，其台湾之行的主要任务，是评估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陈诚是否能与美国“私下”合作，以及对蒋介石的忠贞程度。莫氏发现，陈诚主台并不符合美国利益，乃向国务卿艾奇逊推荐孙立人。莫成德在 1949 年 3 月上旬陆续致电国务院声称：“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能力强、做事脚踏实地的人，不必听命蒋介石，亦毋需服从李宗仁的联合政府，而专为台湾谋福利。孙立人的经验也许不足，但其它条件却甚适合。”艾奇逊即指示莫成德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商议，如司徒大使同意，则伺机向李宗仁提出以孙代陈的建议。

1949 年 5 月，莫成德返美述职，又向艾奇逊和国家安全会议提出，由孙立人主持台政以及美国长期租赁台澎海空军基地的建议，并以此两点作为经援台湾的条件。

1949年6月23日，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任肯楠，向国务院和国安会提出处理台澎问题报告书，其中主张“联络菲、澳、印度、巴基斯坦、新西兰各国，各派遣一些象征性的兵力，会同美军占领台湾”、“邀请孙立人将军加入占领军的新政权，如孙愿意接受，则美国分化国民党当局驻台军队之工作，即造成功”、“通知蒋介石，如他愿留在台湾，当以政治难民之身份相待”、“美国人在接管行政时，应极力避免担任令人注目之职务，其目的旨在不使台湾落入共党之手”。

以研究韩战出名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康明思在《韩战的起源》中指出，国民党在中国大陆败象毕呈之际，华盛顿即盛传蒋介石将在一场政变中被推翻。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这些传言并不是来自国民党内部，而是出自华府，美国政府蓄意要制造一场政变，以迫使蒋介石下台，无法称雄台湾。

1949年夏天，美国特务曾研议一项刺杀亚洲领袖的秘密计划，当时在中情局政策协调组（OPC）任职的陆军上校派希表示，他们曾“认真考虑过”刺杀两名亚洲领袖，一位是周恩来，另一位据信是蒋介石，政策协调组并未在台湾执行暗杀计划，但却以“西方公司”的名义在台湾和滇缅边界大肆活动，1951年“西方公司”驻台成员达600多人；在滇缅边界和李弥所率领的国民党军队残余部队并肩作战。

### 接触孙立人劝其反蒋

美国当时对台政策，以“弃蒋保台”为第一优先，中情局和海陆空特务充斥岛上，但整个对台工作则是由远东事务助卿鲁斯克所主导。

1949年秋天，李宗仁派其私人代表甘介侯赴美从事外交活动，9月16日甘氏在华府公开宣称蒋介石应被推翻。甘介侯鼓吹倒蒋时，美国政客亦在秘密布置除蒋步骤。鲁斯克和他服役时代的老长官莫里尔准将密商，请其前往台湾，直接找孙立人，探询孙有无“救台湾”的“一些计划”。鲁斯克于二次大战期间在中缅战区担任低级军官，为莫里尔的副手，二人与远戍异域的孙立人颇熟。莫里尔的台湾之行，为美国官方首次当面向孙立人试探反蒋的可能性，孙除了发发牢骚之外，并未对莫里尔的试探作正面回应。

当鲁斯克打孙立人的主意之际，美国韦利斯汽车公司老板甘乃德亦为国防部长约翰逊草拟一项计划，建议孙立人担任国民党当局陆军总司令，并由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自由主义分子，在胡适的领导下组成内阁。当时宋子文亦支持这项建议。

1949年12月，美国驻台“大使馆”代办斯特朗和前美国驻台北总领事克伦兹抵达台北。克伦兹对斯特朗说，他将和孙立人接触，当面告诉孙“如果他同意控制”党国民政府，则美国“将会彻底支持他”，孙立人拒绝了克伦兹的游说。这是美国政客第二次当面试探孙立人反蒋的可能性。

40年后（1989年6月2日），斯特朗对康明思教授表示，克伦兹并未向他解释孙立人如何能够取得政权？尤其是撤退到台湾的文武当权派，皆是蒋介石的人，而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亦未瓦解，仍正常运作，孙立人何从“反”起？

### 美方干预介入人事

美国对国民党政局的干预，可说“不遗余力”。1949年年底，国民党当局情报头子郑介民到美商谈军援。做过西太平洋美国海军司令的白奇尔上将对郑介民说，国民党当局如要求美援，则必须任命一位新的台湾省主席，以取代“不能适应局势”的陈诚，并建议拔耀做过重庆市长和上海市长的吴国桢。白奇尔又说，国民党当局必须和美国顾问“诚心诚意”地合作，否则他们就撤出。

“英雄气短”的蒋介石，于1949年12月中旬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驻美“大使”顾维钧把这项任命告诉白奇尔，白“甚感高兴”，但国务院远东事务助卿巴特沃恩（鲁斯克的前任）说，蒋应给予吴国桢更多的权力。1949年12月28日，白奇尔洁问国民党当局驻美武官皮宗敢，台湾防卫司令孙立人为什么没有“充分的权力”？为什么还有人干预他的工作？皮宗敢解释说，除了孙立人之外，罗卓英和彭孟緝也负责台湾防务。此时，蒋介石的秘密特使董显光正访问华府，白奇尔亦对孙立人身为台湾防卫司令而未拥有多少实权一事，向董显光抱怨并表示遗憾。皮宗敢向董显光说，国民党当局必须实践吴国桢和孙立人获得充分权力的诺言。

除了国务院，麦克阿瑟对台湾问题亦极感兴趣，他的立场虽是“反共、保台、撤蒋”，但这位美国“现代凯撒大帝”的政治企图欲极为旺盛。1950年1月，他派其最得力助手、麦克阿瑟总部情报处长韦洛比将军访台，劝蒋介石将治台权力交给吴国桢，并离开台湾。韦洛比又说，蒋如要留台，则不应干预行政，麦克阿瑟总部愿派一位高级顾问赴台协助他。蒋对麦克阿瑟的建议，一概拒绝。

### 孙见麦克阿瑟引蒋猜疑

蒋介石对孙立人一直有“疑心病”，从抗战时代孙与美国“战略情报局”（OSS，中情局前身）特务接触开始直到台湾，孙的“美国背景”，始终是蒋对孙不放心的最大原因。

1950年1月3日下午，美国密歇根州共和党参议员佛格森打电话问顾维钧，他想知道孙立人是否已和麦克阿瑟将军见了面，因孙曾请求他安排和麦克阿瑟会晤。顾“大使”告诉佛格森，由于驻日军事代表团代表何世礼将军已和麦克阿瑟会晤，故麦、孙之会将延后。

1950年2月11日，麦克阿瑟派了一架专机到台湾接孙立人赴日，孙呈报陈诚核准之后搭机到东京与麦克阿瑟长谈。麦克阿瑟期勉孙立人负起保卫台湾的责任，他会尽量提供军援与经费。孙返台后把会谈情形报告陈诚，并请陈呈报蒋介石。孙立人后来虽辩称是麦克阿瑟总部主动邀请他赴日，无论如何，许多人认为这一次东京之行，是孙立人的一大“败笔”，更加深蒋介石对他的猜疑。而朝鲜战争爆发后一个月，麦克阿瑟不顾华府的反对，自行决定访台，在台湾期间与孙立人的“热络”表现，表面上是孙的得意，但实际上却是埋下他垮台的另一个因子。多年后，孙立人也承认，蒋介石看到他和麦克阿瑟握手时，“在旁边吹胡瞪眼”！

美国国务院自1950年年初开始，密锣紧鼓地推动台湾政变。国务院中国科于1950年2月20日拟订《台湾政变草案》，建议以孙立人为“斩府擎旗”的政变指挥官，推倒蒋介石政权，并以“反共、保台、联美”为政变主旨，对蒋的处置方式则以软禁或放逐为主。



## 杜鲁门政府拒军援

“台湾政变草案”拟订后一个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亦在1950年3月20日呈报上级的“台湾可能的发展”的机密报告中指出：“最近几个月各种报道均暗示，受过美国教育、现负责台湾防务的孙立人，正计划发动政变，俾使蒋介石成为有名无实的领袖，同时并铲除其亲信。目前有几项因素不利于在此时发动政变，有关政变的谣言已实为传闻，蒋周围的人亦已知悉。此外，孙立人的缺乏政治经验，以及对军政领导人的欠缺影响力，显示他也许没有力量从事造反。如果未获美国实质上的支持，将不可能发动政变。”

根据国务院中国科外交档案，巡回大使杰塞普（即对华政策白皮书的总编纂人）于1950年3月曾访问包括台湾在内的亚洲地区。他在呈交艾奇逊的报告中说：“蒋介石的部属仍在内斗，相互猜忌，孙立人将军陷于困境，他向我抱怨无权指挥海空军，亦无人在‘宫中’帮他说话。”（1950年外交关系文书）

1950年3月底，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署长克利夫兰向国民党当局官员透露，协防台湾，以免台湾受到攻击。只要蒋介石在位，杜鲁门政府将不会给予国民党当局军援。同年4月，海南岛解放，国民党当局驻美“大使”顾维钧要求美国改变中止军援国民党当局的政策，鲁斯克予以拒绝。

海南岛解放后未久，美国驻台武官巴雷特向国务院发了一通“极机密”电报，引述一名国民党当局“高级官员”的谈话，这名高级官员说，蒋介石及其党羽已到了“混乱及绝望”的状态，并建议采取“剧烈的行动以挽回狂澜”。此高级官员并指责蒋介石一面透过周至柔指挥军队，一面让其两个儿子利用自己的组织干扰指挥；此官员说，要想以蒋介石及其党羽的搅局来挽回局面，其机会可说“微乎其微”。

## 第7舰队协防台湾

这封目前已解密的电报中所说的“高级官员”就是孙立人。据斯特朗说，巴雷特于1950年4月27日左右与孙立人接触，孙自己“提出蒋介石的问题”。鲁斯克于5月1日看到巴雷特的电报，两天后，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官员尼兹在一项秘密会议中，提出由孙立人发动兵变以除蒋的“假设性”方案。

对国民党高层颇为了解的斯特朗，在1950年5月11日向国务院远东司的石博思发出一封“极机密”电报，表示对策动孙立人兵变的意见。斯特朗并不赞成兵变，他说，支持孙发动兵变的构思，他以为“早已在这几个月里胎死腹中了”；斯特朗亦不认为孙立人特别优秀，只不过是“披着美国化的外表”而斯特朗于1989年6月2日向康明思教授表示，孙立人至少需除掉100名文武高级官员，始能控制国民党和各级权力。

1950年5月30日，鲁斯克和尼兹、巡回大使杰塞普及其他官员开会，讨论台湾问题。鲁斯克说，台湾即使在战略上无足轻重，政治上则颇为重要，因此应为岛上“划定最后界限”，并称他已拟妥如何执行这项计划的文件，只有他和艾奇逊、国务院顾问杜勒斯知道文件内容。国务院情报研究处则希望获准采取行动，由“美国主导以武力防止台湾沦陷”。5月31日，鲁斯克等人与艾奇逊讨论了下述计划：“应告知蒋介石以下三点：（A）在目前的情

况下，台湾沦陷已属不可避免；（B）美国将不会协助蒋介石防止台湾沦陷；（C）蒋介石唯一能做的是请求联合国托管，美国会支持这项请求，并在联合国讨论托管问题时，派遣第7舰队协防台湾，以免台湾受到攻击。”

### “台湾托管”方案

鲁斯克在5月30日呈给艾奇逊的简报说明中指出，美国已在台湾部署“秘密行动以对抗大陆上的中共”，同时“亦在台湾支持一些成员”其中包括“秘密武装支援”。莫成德表示：“应在岛上维持与台湾领袖的秘密接触，并尽早给予法兰克一些指示。”法兰克即是中情局政策协调组主任法兰克·韦斯纳。

鲁斯克在简报中表示，第7舰队巡逻台湾海峡固然是保护台湾，使其免受中共攻击，但也是为了防止蒋介石偷袭大陆。鲁斯克并建议告知蒋介石，嘱其离开台湾，将权力交给孙立人，然后由联合国决定台湾前途，台湾获联合国托管后，杜鲁门即宣布撤销1月5日不协防台湾的声明。

鲁斯克于6月9日向艾奇逊指出“两党一致的中国——台湾问题”备忘录，重点仍是台湾交由联合国托管。英国驻美大使法兰克斯6月初与艾奇逊晤谈后，发现美国一方面担心台湾沦入中共之手，一方面又不敢公开出兵台湾，法兰克斯向英国外交部报告，伦敦的答复是：“问题的根源就在这里。”

1950年6月6日，蒋介石的亲信、主持中央宣传工作的董显光，衔命访美，与杜勒斯见面，顾维钧亦在场。杜勒斯向董、顾二人表示，如蒋介石“谦逊一点”，也许能挽救台湾，杜勒斯并未透露鲁斯克的对台方案，但顾维钧正确地猜到美国打算驱除蒋介石，并把台湾列入联合国托管。6月7日，助理国防部长格里夫斯与董、顾晤面，大骂艾奇逊。

当时国务院的艾奇逊、鲁斯克、杰塞普，甚至包括杜勒斯在内，都是“弃蒋保台”派；国防部长约翰逊和格里夫斯则是“拥蒋保台”派，约翰逊和格里夫斯经常向国民党当局驻美“大使”馆通风报讯，成为顾维钧、陈之迈（公使衔参事）和其他亲蒋人士的最主要消息来源。格里夫斯向董、顾表示，华府如没有艾奇逊，则台湾将可得救。约翰逊屡次欲插手台湾事务，并曾数度与艾奇逊冲突，最后杜鲁门正告约翰逊勿捞过界，台湾事务属国务院管辖范围。当宋美龄邀请即将赴日访问的约翰逊顺道访台的消息走漏后，艾奇逊亦嘱约翰逊勿到台湾。

### 蒋介石拒绝扩孙权力

6月10日，蒋介石要求宋子文前往台湾，宋拒绝；抗战前，孙立人曾应宋子文之邀担任税警总团第四团团团长，与宋关系颇佳，宋子文拒赴台湾的理由，有人揣测是因害怕中共侵台。此时，孔祥熙前赴东京与麦克阿瑟总部情报处长韦洛比会谈，已结束美国之行的董显光亦赶到东京，一起与孔会晤韦洛比，董将鲁斯克计划剪除蒋介石一事，告知孔和韦洛比。其时，美国情报界盛传孔宋集团与蒋不睦，但较可信的说法是，仍有政治野心的宋子文，一向与蒋貌合神离；孔祥熙则与蒋关系良好。

艾奇逊在6月上旬接到国民党内部的情报，称蒋介石“绝不同意”扩大孙立人的权力，并“较以往更加痛恨美国”。

1950年夏天，人民解放军将解放台湾的风声更大，蒋介石颇为恐慌，当时英国驻莫斯科、华府和东京地区的情报员一致预测，亚洲潜伏三大危机，即“北韩攻打南韩、中共侵台、台湾政变”，其中之一将在1950年6月爆发。据现存哥伦比亚大学的顾维钧档案记载，国民党当局曾要求法国协助，携手对付中共，遭到拒绝；美国的资料亦揭露，蒋介石曾秘密和韩国与菲律宾当局交涉，一旦台湾沦陷时，请韩、菲为其提供庇护所，驻韩、菲的美国情报员均向东京麦克阿瑟总部发回这些情报。

## 美国国务院评估局势

麦克阿瑟档案透露，1950年6月15日，国民党当局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何世礼将军，向麦克阿瑟总部情报处长韦洛比转达一项“绝对机密”的讯息，蒋介石紧急要求麦克阿瑟领辖整个远东——特别是包括台湾——的防务，他和台湾各级政府及人民都将接受麦克阿瑟的指挥调度。蒋介石在密讯中强调，他愿意交出权力，但绝不交给孙立人。据亚利桑纳大学教授夏勒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远东将领》一书中说，麦克阿瑟颇有当台湾军政最高指挥官的野心，就像他统治日本一样，但台湾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可以作主。

6月19日，国务院召开对台政策会议，并拟定一项“极机密”计划，这是国务院自1950年1月以来，首次对台湾局势作最全面的评估。这次评估的重点为：

（一）如美国要防卫台湾，则蒋介石及其党羽必须离开台湾，将民事与军事交由美国所指定的中国人（即大陆人）和台湾人领袖；

（二）上述步骤完成后，美国海军将驻防台湾水域以避免中共攻台或台湾反攻大陆；

（三）如蒋介石抵制上述计划，美国应派出密使以最严密的方式通知孙立人，如果他愿意发动政变以军事控制全岛，则美国政府将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和建议。

美国有没有派出“密使”？这个使者是何许人？孙立人如何答复？

据新近解密的档案和文献显示，为美国国务院传达讯息的“密使”，乃是一向最同情国民党当局、最支持蒋介石的前第7舰队司令河克海军上将。蒋介石笔下“中国最良之友人”柯克，在国民党当局撤守台湾、杜鲁门断绝军援之际，曾大力协助国民党当局利用各种不同渠道获得军火，1950年3月，柯克同意担任一个专事为国民党当局取得军火的咨询团负责人，蒋介石答应每年付咨询团75万美元服务费。但早在2月11日，已退休的柯克就以美国国际通讯社（后与合众社合并）记者身分访台，抵台当天即获蒋介石和宋美龄召见，并在宋美龄的陪同下，视察国军基地。柯克凭其声望与关系，得到美国海军的直接协助，海空军与陆战队将领纷纷抵台，一批美式武器亦源源运台，真正负责采购和运送这批军火的，是由中情局设立的“纽约商务国际公司”。据文献证明，麦克阿瑟将军曾“鼓励”并促成这项交易，艾奇逊亦知道此事，但未加制止。

## 柯克扮演美国密使

柯克 2 月 11 日访问台湾后，即经常往返台北和东京；并积极介入国民党当局军事战略决定，除了建议国民党军队自舟山群岛撤退外，据称国民党军队决定放弃海南岛，亦出自柯克的划策。

柯克亦敦促蒋介石将军事最高指挥权交给孙立人。1950 年 3 月，孙立人出任陆军总司令，4 月兼任台湾防卫总司令；这项人事布局（不论孙立人是否拥有真正的指挥权），显然也是蒋介石听从柯克建议的结果。

蒋介石既然对他如此信赖与尊重，柯克为什么同意国务院“扶孙倒蒋”的策略？为什么愿意担任传递讯息的“密使”？

柯克虽支持国民党当局不遗余力，但他对台湾局势的考量，仍以“美国利益”为出发点，他协助售卖军火给国民党当局，乃是为了反共保台。他比一般美国将官还了解中国事务，抗战时访问过重庆，战后又以第 7 舰队司令驻防过青岛，然而他也看到国民党的仓皇辞庙，他的经验告诉他，蒋介石并不是一个领军、治国的上乘之选，台湾应更换领导人才能对抗中共。柯克愈来愈赞同国务院“扶孙除蒋”的构想。

消息灵通的鲁斯克一清二楚柯克所领导的咨询团协助台湾购买武器的事情，故透过海军军令部助理部长欧林姆与柯克取得联络，莫成德亦向鲁斯克建议利用柯克，而柯克的身分与地位，颇适合担任这项负有重大机密任务的传讯工作，如此亦可使孙立人觉得美国是认真的。于是，“中国最良之友人”柯克上将，乃扮演了“扶孙除蒋”的“密使”角色。

### 胡适拒绝领导反蒋

鲁斯克数年前曾向为他作传的乔治亚大学比较法学教授熊安邦透露，1950 年 6 月初（应为 6 月下旬），他收到一封专人（即柯克）递送的孙立人将军的密笺，孙立人提出一项“惊人的建议”，他愿意领导兵变以除蒋，孙要求美国支持，至少予以默许，孙表示他如果掌权，将制止国民党当局的贪腐，并在对付共党方面，较蒋更具弹性。

鲁斯克说，此事需要总统的决定，他为了防止机密外泄，以免蒋杀害孙立人，乃毁掉密笺，并告诉艾奇逊。艾奇逊答应呈报社鲁门，但杜鲁门未作决定前，朝鲜战争就爆发了。

康明思教授认为鲁斯克的陈述，乃是推卸责任的说法，有意将政变责任推给孙立人，而开脱真正的祸首——华盛顿。鲁斯克是一个诡计多端的“老狐狸”，他在 1990 年接受美洲《中国时报周刊》总编辑杜念中的专访和孙立人义子杨钧的函询时，皆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含糊其词地交代美国（其实是他本人）策动孙立人造反的史实。也许鲁斯克已垂垂老矣，记不清楚三四十年前的往事，甚至连收到密笺的时间亦记错。

鲁斯克的倒蒋计划显然在收到孙立人愿意反蒋的密笺后，得到新的动力。经国民党当局友人麦基的安排，鲁斯克于 1950 年 6 月 23 日，与前北大校长、“中国自由派”领袖胡适，在纽约布拉萨大旅馆（即 1970 年 4 月黄文雄、郑自财行刺蒋经国未遂之地）会晤。据胡适事后告诉顾维钧，鲁斯克要求胡适出来领导一批反共而又亲美的自由派人士，取代蒋介石政权，胡适告诉鲁斯克，他毫无兴趣，并指责美国未支持国民党，不过，胡适认为蒋介石不应该再当“总统”，只有如此，台湾才能获得美国军援。“胆小”的胡适向顾维钧报告与鲁斯克会见时，宋子文亦在场。

## 朝鲜战争救了蒋政权

鲁斯克于 80 年代末接受康明思访问时表示，他完全不记得在布拉萨大旅馆与胡适会面的往事。康明思说，鲁斯克以记忆力强而著称。

鲁斯克在纽约会晤胡适当天，国务院远东司长莫成德和肯楠等官员亦在讨论台湾问题。莫成德说，美国如要改变对台政策，则必须彻底，肯楠则表示，在政变之前，“蒋介石将已被解除权力”。莫成德又说，鲁斯克自纽约回到华府后，艾奇逊将立刻和他讨论台湾问题。

文献显示，国务院所拟议的台湾政变“预定日期”是 6 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亦就是 6 月 24 日或 6 月 25 日，但朝鲜战争于 6 月 25 日星期天爆发了。鲁斯克说：“韩战挽救了蒋介石政权。”

但据解密档案和学者研究结果，自接到孙立人的密笈直至朝鲜战争爆发以后，鲁斯克一直还在推动倒蒋运动。亚利桑纳大学教授夏勒则指出，“韩战爆发后美国仍未放弃迫蒋下台的念头。”肯楠在 6 月 29 日召开的国安会秘密会议中表示，蒋介石“随时”将会被“推翻”。

麦克阿瑟档案指出，麦克阿瑟总部情报部门在 7 月初获悉，蒋介石已越来越怀疑孙立人图谋不轨。孙立人的陆军总部少将军法处长周芝雨 7 月 1 日被捕，11 月 23 日处决；孙的老部下、前新七军军长李鸿获中共释放来台，8 月被捕，关了 25 年。孙立人的英文秘书黄正和女生大队少校黄珏姊妹，亦早在 3 月因涉及“共谍”李朋案，而被蒋经国下令扣押，坐了 10 年黑牢。

## 蒋介石消除孙立人势力

1953 年 3 月 20 日至 22 日，被艾森豪威尔击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伊利诺州长史蒂文森访问台湾。3 月 20 日上午抵台后，蒋介石即与史蒂文森会谈，21 日晚上又在士林官邸设宴款待他，当晚 10 时 30 分史蒂文森回到台北宾馆后，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即到宾馆与史蒂文森单独谈了一个小时。据史蒂文森档案称：“孙立人显得不大自在，声音压得很低，显系担心房间装有窃听器。”孙立人称赞史迪威将军二次大战期间的在华表现，并认为马歇尔将军 1946 年调处国共纠纷时，对国民党当局贪污腐化、没有效率和未获全民支持的批评，乃是“绝对正确”。

孙立人对史蒂文森说，秘密警察仍在台湾严厉控制思想，蒋介石父子不择手段地镇压反对他们的人。孙立人说，国民党军队不错，亦有希望反攻大陆，但目前的领导层不行，它仍是一个充斥个人权力的者政权。

孙立人夜访史蒂文森一事，蒋经国控制的特务不可能不知道，何况史蒂文森又不是一个亲蒋的美国政客，其行动更需监视。

1954 年 6 月 24 日，孙立人被调为“总统府参军长”，7 月 3 日就职；同年 12 月，美国和台湾签订“中（台）美共同防御条约”。1955 年 5 月 25 日，陆军步校少校教官郭廷亮被捕；5 月 28 日，蒋介石召见孙立人，当面叫他“少跟政客们来往”，并表示要把他“孤立”起来；6 月 6 日，发生所谓“屏东机场兵谏事件”；自此，震动海内外的“孙立人案”正式登场，国民党当局大肆展开“清君侧”之举，彻底消除孙立人势力。8 月 20 日，蒋介石下令组织 9 人调查委员会调查孙立人。

### 需要求美隐忍再三

显然地，所谓郭廷亮事件和屏东机场兵谏，都是国民党当局制造孙立人案的藉口。孙立人的唯一罪状，乃是他在美国策动下试图谋反。

事实上，蒋介石对美国与孙立人所作的一系列联络与接触，均在其掌握中。据文献指出，在美国普渡大学和维吉尼亚军校受过教育的孙立人，抗战期间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关系颇佳，因此受到国民党当局特务跟踪，到台湾后，更因蒋经国建立政工系统，黄埔系军人和他对立，故孙立人一直受到监视与盯梢而浑不自知。

在风雨飘摇、美援孔急的时代，蒋介石对孙立人迹近“叛逆”的行径，隐忍再三，甚至在美国的压力下还让他升官；然而，韩战爆发后，台湾已可确保，美亦源源而来，蒋介石父子乃陆续采取断然措施，斩除“挟美自重”的官员，先罢黜台湾省主席吴国桢（1953年春天）。再“孤立”孙立人。蒋介石所需要的是绝对忠诚的部属，绝不宽容任何心存贰志的文武官员。

国民党当局在风云际会的50年代初期，摇身一变为山姆大叔的反共盟邦，蒋介石政权开始放手弹压异己，华府莫可奈何，孙立人乃成为美国对台阴谋策略下的最大牺牲品。

## 第四节 雷震惨下文字监

### 公然叫阵

1960年3月，一心想做终生“总统”继而父传子的蒋介石，面临一个尴尬问题。台湾6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又到了，按照“宪法”规定，连选只得连任一次。蒋已连任一届“总统”，再连任就违背“宪法”。当初制订“宪法”时，曾预想定一个没有连任限期的“总统”，但那岂不等于封建王朝的世袭制？那么，“实行民主政治”的招牌，一天也不能挂之。蒋既要这个门面，学美国宪法的派头，也要终身当“总统”。蒋介石的真实意图，很难从他发出的讯息得到明确肯定的答案。因为他的那些演说太模棱两可了，即使他最亲信的幕僚，猜起来也颇费周章。一会儿他说，“宪法”不能修改，他要把它完整地带回大陆；一会儿，他又说：“我要带你们打回大陆去！”

假使不修宪，他怎么当选连任呢？不连任，又怎么带你们“打回大陆？”

后来，大家才明白，他反对修改“宪法”，并不反对增加临时条款，如在大房子旁边加个小房子。和很多政客一样，他有擅玩魔术，愚弄人民群众的“智慧”。

绕个大圈子，最后由国民党内善体君意的现代绍兴师爷们，运用大法官会议，作成解释决议，以现有在台的“国民代表”人数为计算标准，修改临时条款，但不“修宪”。这样，蒋不仅可连任，且可做终身“总统”。

国民党这一荒谬的举措，原以为岛内没有人敢反对。所有的舆论工具，悉由当局把持操纵。反对就是“破坏领导中心”，“共匪同路人”，有带红帽子坐牢的机会，什么人敢冒此不韪！

台湾偏偏有一个叫雷震的人，主管一份叫《自由中国》的半月刊杂志，竟对蒋介石连任“总统”著文净谏，继而公然叫阵，发出铿锵有力的反对声。于是招来了一场大祸。

雷震，1896年生，浙江长兴人。早年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复人大学院专攻宪法。返国后，曾任浙江省立第三中学校长，中央大学教授。1928年任法制局编审及编译局编撰，翌年入立法院，并兼任中央军校教官，1931年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书记长，兼南京代表大会主席，1933年任教育部总务司长，1935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候补执行委员。抗战期间任国民党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及秘书长，周旋于各党派之间。日降后，任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及国民大会副秘书长。逃台后，曾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国民党中央改革委员会设计委员会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银行监事，“大陆灾胞救济总会”常务理事等职。

雷原属CC系，后靠近政学系。与胡适交谊很深。是亲美反蒋的重要头目之一。1949年胡适在美国组织“中国自由党”时，雷担任台湾方面的主持人，并出任胡适在台湾创办的《自由中国》半月刊社长，旋因其与美国人有勾结，攻击蒋，于1951年秋被撤去所有“官衔”，并遭监视。1954年被开除国民党党籍。1955年，美国曾邀雷赴美讲学，但为蒋介石所拒，未能成行。其后雷等伙同台湾内外的“自由分子”，打着“自由民主运动”的旗号，鼓吹反蒋“大团结”，企图逼蒋“开放政权”。

《自由中国》自持有某些美国人的支持，在“国大”进行选举“总统”时，就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对蒋介石连任的文章，如《拥护蒋总统继续领导而

不赞同连任》，《岂容御用大法官滥用解释权》，《敬向国大代表同仁说几句话》等等。文章明确指出：

“近几年来，政府采取的种种反自由、反民主、反宪法的手法，尽管引起了海外自由反共人士的普遍不满，乃至具有领导地位的左舜生和李璜两先生（左舜生和李璜系青年党骨干），早就发出对台湾不宜多存幻想及与台湾各行其是的主张。然而，事实上仍没有与台湾走上最后决裂之途，而是一忍再忍，苦口婆心的仍向政府当局进忠言。可是最近消息传来，现由于修宪连任运动者竟不惜撕毁我们立国基础的中华民国宪法，非但左舜生等先生，已决定不出席可能被迫毁宪的国民大会；且迫使海外的自由反共人士，决定发表宣言：如果台湾真听任修宪连任运动者一味硬干到底，则将不再承认自由中国政府为合法的政府了。”

“各位是被修宪连任运动者所收买，做了一毁宪的最后工具。至于因此而造成的任何结果，是海内外的彻底决裂也好，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反共的最后失败也好，各位便无从逃避责任。果不幸而如此，则各位代表势将被这一代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所永远唾骂，甚至各位代表的子子孙孙也将因此而蒙受永恒的羞耻。民初曹锟贿选时，议员们在‘红罗厂卖身’的结果，终留下‘猪仔’议员的骂名，便可谓殷鉴不远！”“……今日反对修宪连任，已经是地无分台湾、香港、美国，人无分青年党、民社党、无党无派、乃至国民党，可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了。因此，如果修宪连任运动者更要不恤人言，罔顾民意，还不悬崖勒马，则后果岂不显然可见了？尤其在海外所将造成的结局，恐将不堪设想好！”

该刊的主要撰写人殷海光教授撰文说：

国民党是怎样统治台湾呢？因为一伙比较大胆的狡猾的人集拢起来，用自命合法的方式，掌握着社会资源，为私利而统治着台湾。而且，实际上是打着“国策”的幌子，以“伟大领袖”的意志，把人民当作自己胡作非为的工具，理由是：“领袖是人民意志的旗手”。

此外，《自由中国》还揭露台湾当局把反攻大陆当成遮羞布，来合理化一切不合理的措施。《自由中国》认为：

这几年来在台湾的措施都是以“马上就要回大陆”为基本假定。这种办法，真是弊害横生。

第一，因为一切都是为了“马上就要回大陆”，一般人就形成事事“暂时忍受”和“暂时迁就”的心理状态。大家看到官方许多不合理或苛烦无比的措施，都认为这是暂时的现象，将来回到大陆就好了，所以只有忍受下去。官方在“反攻大陆”这个大帽子之下，利用人民的这种心理状态，遂得以畅所欲为，这几年来，人权自由受到严重的妨害，政治向着反民主的道路发展，其故在此。结果所及，“反攻大陆”尚在毫无端倪之时，我们已经先失去了自己所有的。

第二，因为被“马上就要回大陆”的心理状态所误，官方的许多措施都是过渡性的措施，不求彻底，不求永久。而一般人民在心理上则被“吊起”。于是，许多事情得过且过，不去设法开展，蹉跎岁月，一误再误，八年于兹。浪费民族时光精力，不可计量。

第三，因为“马上就要反攻大陆”，官方人士拚命办这种训练，那种训练，弄得颇紧张的样子。紧张的时间太长，大家所追求的目标尚渺不可得。但是迫于威势，屈于利害，大家不敢形之于色，言之于口。于是，久而久之，



双重人格就出现：在公开场合满口“拥护”、“革命”、“反攻”；在私人场合就是牢骚、惆怅、悲观、失望、彷徨。

依据上面的指陈，我们知道以“马上就要回大陆”这一假想为根据的种种作法是有着显著弊害的。而“马上就要回大陆”这一假想又是颇为渺茫。一个国家的一切作法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这是太不稳健了。一群人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活动，哪里会“生死以之”、全力以赴？

《自由中国》的上述言论，使蒋介石的颜面大失光彩。而该刊又在蒋介石当选后，再撰社论《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一文，穷追不舍，余音缭绕，台湾当局更力震怒。

如果雷震有自知之明，急流勇退，台湾当局可能在投鼠忌器之下，不会贸然对雷震等下手。但雷过高地估计了美国官员对台湾的影响，竟在书生式的坐而论政之余，联合国民党的反对派，准备成立台湾的第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正面向国民党挑战。

### 组织反对党

1960年4月间，台湾第三届各县市长及省议员选举落幕之后，全省落选的党外候选人，聚集在台北“自由之家”，他们议论纷纷，揭发国民党违“法”选举，如兑票换票、埋伏票、代领投票、故意制作废票、故意唱错票、威胁投票等等。场面火热，责骂声不断。

这时，坐在上座当主席的雷震，突然站起，大声讲话：“大家对国民党的选举作弊，举证历历，真令人寄慨无已。大家都知道，国民党主办选举单位，包括法院在内，都是沆瀣一气，官官相护，互相装聋作哑，不理不睬，即使告到法院也会视若无睹，不了了之。这是因为我们候选人没有组织力量来抗争之故，所以今天我提议，大家组成一个政党，以后选举，以组织力量来对抗国民党，如果国民党继续以作弊方法来赢取选举，我们自可以组织力量彻底揭发斗争，这才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做法。才能得到公开、公正、公平的保障。现在请大家附议，是否应该组织新党？”结果，全体无异议热烈鼓掌通过。

当雷震宣布组织“中国民主党”时，有人举手发言：“今天我们在台湾实施民主政治，组织新政党，应以‘台湾民主党’的名称较妥。”雷震制止说：“我们的政治目标是为全中国同胞的政治受惠，故不应该只冠台湾的名称。”

接着，雷震宣布：“政党组织的筹备工作，异常艰苦，提议，以《公论报》负责人李万吉先生，及曾做过台北市长，而这次在台北市为竞选省议员的党外候选人助选的高玉树先生和本人皆以发言人名义代表本党，进行组党工作，李万居先生是留法的本省前辈，德高望重，高先生对外尤其对国际人士有良好公共关系，同时负责财务的筹措。”

开会后雷震私下对高玉树说，胡适先生最近曾与“行政院长”陈诚谈过自己多年的意愿，“中国应该实施西方式的多党民主政治。”（胡适曾在大陆解放前，建议蒋介石是否把国民党分为左右两个党，以英国或美国模式实施两党互相制衡的政治。未得蒋介石采纳）雷震并以肯定语气说，“陈院长”当面向胡先生保证，国民党绝不反对或排斥新党出现，但先有一个基本条件，

必须与国民党同一目标，即反共而以反攻大陆为最高指标。雷震很乐观地告诉高玉树和李万居，我们不必顾虑，他们是绝对以反攻大陆为最高目标的。

不久之后，胡适亲自在阳明山高玉树寓所主持一次新党的筹备会，参加人员包括雷震、高玉树、李万居、吴三连、郭雨新、齐世英、李秋远、杨金虎、许世贤、余登发等。当天，胡适非常慎重，以恳切语气说，“今后组党是艰巨万分。历史上政治理想的实践，都带艰苦耐劳，无可避免，各位必须有信心苦干到底，才能贯彻我们中华民族历史的创举。”

1960年6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并向蒋介石提出“国民党政务让台湾本地人有更多的机会来干”的“强硬建议”以后，雷震等更加积极进行反蒋活动。《自由中国》撰写社论《台湾人与大陆人》触及国民党的要害。由“二二八”事件引起的省籍鸿沟伤痕，一向是敏感到谈不得的问题，雷震却说：“人与人不会成为仇敌，除非由于政治上的错误”。又说：一些迷误于政治权力的人们发现大陆人和台湾人在政治改革运动上携手合作，起了恐惧心。故意危言耸听，说台湾人的势力抬头，内地人将受歧视等等。

国民党当局一面发动自己控制的舆论工具进行反击，一面制造谣言，硬说中共驻港的工作人员暗中支持台湾的新党活动等等。同时通过美国驻台“大使”庄莱德，向国务院缓颊，俾一旦采取行动时，减少美国官方的压力和冲击。奉命执行此项任务的，即蒋经国指挥下的情治系统——台湾警备总司令部。

大前提上，蒋氏父子俩为维护自己的权力统治，利害相同，观点一致。纵使蒋介石不下命令，蒋经国亦必去之为快。从个人恩怨出发，吴国桢、孙立人是他夺权的障碍，雷的《自由中国》是他愚民政策的绊脚石。允许这个杂志的存在，很多神话、谎言就有被拆穿的危险。

雷、蒋冲突，肇始于50年代时期。据雷震自己说：

“我于民国39年（1950年）10月第一次去香港时，这些党派人士并未提到国民党要‘党化军队’一事，大概国民党改造委员会此时尚未定案也。迨民国40年（1951年）元月28日我和洪兰友同去香港慰问各党派及民主人士时，青年党左舜生和李璜等一见我们，就大骂国民党首领蒋中正和蒋经国（此时陈立夫已放逐至海外了）不该违反现行宪法的规定，在所有军队里，以及持有枪杆子的宪兵和警察里设立国民党支部之事，和过去的军阀与大陆时代国民党一样，采用苏俄的‘以党治国’，不想依照现行宪法，实行民主政治，建设民主国家。这完全是家天下的政治，终有一天要失败的。我和洪兰友无法撒谎来解释此事，只有任其任意咒骂，因为他们骂的是事实，他们都是青年党领袖，参加过制宪国民大会这一幕。

我们回台后，国民党在改造委员会曾邀我们吃便饭，改造委员出席者有胡健中、张其昀、崔书琴、萧自诚等，工作同志有唐纵等。饭后他们详询香港各方人士之意见，我们尽情报告，谓其中党派人士最不满意者，为国民党违反宪法在所有军队中设立国民党分部，民主人士最讨厌者为不思建设民主政治，还是个人独裁，真是自取灭亡。各位改造委员要我用书面将今天所饼的向改造委员会报告，我因去港月余，个人和《自由中国》半月刊积压之事太多，这种报告必须亲自撰写，实在没有工夫，故我一再说：‘现有党部的速记，可供参考。’不料改造委员坚持要我写，尤其是胡健中，我只有勉为其难，亲笔写了六条，包括反对党化军队在内，亲自送改造委员会。不料是

年3月29日上午9时前，我去参加台北市大直圆山忠烈祠祭祀的时候，改造委员蒋大少爷经国一见我就声势汹汹，板着脸对我说：‘你们为什么反对在军队中设立党部之事，这是反动分子，是共产党同路人之所为。’说毕不待我解释，蒋经国就走进忠烈祠去了，里面已吹号，我也跟着进去行礼如仪。蒋经国这一种少年气盛的态度，简直目中无人，和当年袁世凯大儿子袁克定的骄傲，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据说当年袁克定去某地阅兵时，阅兵典礼处只派一名军官来迎接，袁克定认为大不恭，即掉头而返，连阅兵典礼也不参加了。蒋经国这一天气得我发昏，回家后倒床即睡，连午饭也未吃。我们报告书上，明明说是香港各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见，我为使者应照实报告，总不能‘报喜不报忧’吧？”大陆之败，蒋介石认为政治工作不如中共，恢复政工在军队中的地位，被认为是对抗敌人的一道灵符，所以，谁反对国民党进入军队，谁就是“反动分子”、“中共同路人”。

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提到：

“雷震反对军队党化，反对青年救国团，反对特务统治，严格地说，基于良知信念的成分，远超过个人的好恶。”

《自由中国》的宗旨第一条，就写到：

“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

第四条更明确地指出：

“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

台湾当局虽同意《自由中国》这些宗旨，作为橱饰，作为光耀夺目的霓虹灯，但不愿意表里一致，因此，当雷震等把矛头指向国民党时，蒋氏父子终于按捺不住动手了。

## 被捕

1960年9月4日，雷震家中闯进十几个彪形大汉，这些人都是平常寸步不离跟踪雷震的特务。一个手持盒子炮只穿香港衫的胖子要雷跟他们走。当雷桔责他们是干什么时，这个人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拘留票给雷看。拘留票是“台湾警备总司令”黄杰签署的，右边有“叛乱嫌疑”四个字，这个人收回拘留票后，便不分皂白地将雷推上车带到青岛东路看守所。雷震后来有如下回忆：

“我被叫了下来。检查时要我把皮夹子掏出来，那时我正患所谓‘风湿病’，左手不易抬举，而皮夹子正在西装裤子左边后面的袋子里，我左手弯过去很困难，动手慢了一点，而在帮忙的狱卒，竟将我左手用力拉过去，痛得我心里发抖，而眼泪直流。不晓得为什么要这样野蛮？后来皮夹子还我时，台北美国大使馆新来职员给我的名片统统没收了。那时蒋氏父子是讨厌我们和外国人来往的。后来才知道这位检查官姓贺，担任政工官，是老友贺国光的侄子，我一直不大理会他。那个强力拉我左手的特务姓吴，南京人，担任监视我的四人中之一人。后来他知道我是受蒋氏父子的迫害，很同情我而对我的遭遇则痛哭流涕。经过检查后把我送进看守所第三间病房，内里已有一人，就是由台北县土城洗脑所调来监视我，要我证我是共产党的洪国式。进去时要我把全部衣服脱下去洗一次，怕我身上有虱子。可是我身上倒没有虱子，而病房的床上尽是臭虫。看守所交给我的衣服又短又小，裤子要差大半

截，不给裤带，怕我吊颈，我只有用手拎着裤子走。这是我进狱时的情形，我也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隔了好久，看到四面煤烟，看守所所长告诉我这是青岛东路。我问他：‘为什么四面都有煤烟，政府不是禁止在都市内烧烟煤么？’张福庆说：‘这些都是军事机关烧的，无人敢来取缔，老百姓是不准烧的，怕污染空气，我的洗衣工厂则烧柴油，不烧烟煤，一个月不过多 3000 块钱吧！’可见蒋介石统治下的军事机关，从来没有把政府命令当作一回事啊！因为蒋本身就是一个不守法的家伙。”

与雷同时被捕的还有《自由中国》的主编傅正、经理马之骑、会计刘子英。

台湾特务机关原先计划派洪国式和雷同问，由洪赖雷为“匪谍”。詎料，洪国式不但不肯“诬陷”雷，反而同情他，要他说话当心。

洪国式这着棋失败了，特务机关改向刘子英下手。雷说：

“因为刘子英是我担保入台的，抵台时又住在《自由中国》社里面，而我又一再给他介绍工作。如果刘子英能够自认是匪谍而又告诉了我，那就可以课我以叛国之罪，在‘莫须有’的表面上，总比较好看一点。至于这样做，是否丧尽了良心和伤天害理，那就完全不顾了。过去许多王朝时代就不必说了，为了家天下和个人统治起见，清末的部位慈裕固是如此，民国的袁世凯亦复如是。

刘子英在受不住威胁利诱的情形下，就‘自认是匪谍，而且告诉了雷震。’被迫缮写‘自白书’而六易其稿，始得警各总部当局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主持‘雷案’的人，大为满意。其条件则是警备总部，当然就是国民党及其政府豢养刘子英的一生和其大陆的家属。”

逮捕雷震，举手之劳；防悠悠之口，可就不简单了。9月5日，“警总”政治部主任王超凡举行记者招待会，一口咬定雷“涉嫌叛乱”，但事实如何，搪塞以对。又说：“警总”系根据“惩治叛乱条例”第十条采取行动。第十条规定，在戒严区域内，不论犯本条例之罪者为军人，抑为非军人，概由军事机关审判。王超凡同时以书面文件，公开指责《自由中国》的言论文字，涉嫌叛乱。由当局炮制的《雷震与〈自由中国〉半月刊》一文中，对雷的罪状归纳如下：

“（1）倡导反攻无望。引用《自由中国》第七卷第七期的《反攻大陆问题》中文例：‘而马上就要回大陆这一假想，又是颇为渺茫。一个国家的一切做法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这是太不稳健了。

一群人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活动，哪里会生死以之、全力以赴？’文件作者认为这种说法影响民心士气，莫此为甚。

（2）主张美国干涉我国内政。引用《自由中国》第十八卷第六期社论《中国人看美国的远东政策》中说：

‘假若美国今后改换一个方式，把这种经济援助的重心，不专放在各国的政府上面也放在各国的人民，或严格规定凡接受美援者，必须遵守国内言论自由、保障人权，一切案件公开审判，经济政策符合平民大众利益，及司法独立等为前提条件，那我们相信东南亚各国没有一国的人民会反对这种干涉’。又引用《自由中国》第二十二卷第十二期社论《欢迎艾森豪威尔总统访华》文：‘试想，如果由上而下的改革竟被事实证明为无法走通之路，则中国将面临怎样一个可怕选择，流血？政变？还是让绝望来销蚀人民的反共意志？’文件作者认为这篇社论，将‘流血’、‘政变’来激动艾森豪威尔

总统干涉我内政。

(3) 煽动军人情恨政府。文例引自《自由中国》第十七卷第四期社论《我们的军事》，内有：‘但军人生活的困难，内心的苦闷，实已相当的严重’，‘这种现象，还不够严重吗？任其发展下去，我们军事将成一个什么样子，真可以使你想起来发抖！’文例又引《自由中国》第二十卷第二期读者投书《革命军人为何要以‘狗’自居？》等文，认为《自由中国》用意在于煽动军人情绪，为其企图颠覆政府重要对象之一。

(4) 为共匪作统战宣传。引用《自由中国》第十九卷第八期社论《认清当前局势展开新运动》，内有：‘于是乎台湾一天一天地走向孤立的道路。这种统治的结果，使整个政治机能愈来愈僵固，政治的格局愈来愈狭小’，又有：‘我们兹举几项最需要办的事项如下：取消一党专政；取消党化军队，取消消费青年生命，制造个人势力的青年反共救国团；取消党化教育。’文件作者认为这些文字均证该志煽动海内外人民，颠覆政府，另组政府或投向其他政权之阴谋。

(5) 挑拨本省人与大陆来台同胞间感情。引用《自由中国》第二十二卷第二期社论《台湾人与大陆人》，内有‘司法成了政治及至政党的工具’。除司法以外，警察与税吏是各行各业的人经常接触的，他们当中的横行霸道，更为一般人民所最感头痛，无怪乎这三部门在省议的质询中称之为‘台湾三害’。‘可是在若干台湾人的心目中，统治台湾的是大陆人’。

又引用《自由中国》第十九卷第七期社论《台湾人对陈内阁的期望》，内有：‘在中央各院部会中竟没有一个台湾人，这是不是能够使台湾人相信我们已经恢复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呢？’

文件作者认为这是该刊挑拨台湾人不应受大陆人的统治。

(6) 鼓励人民反抗政府流血革命。引用《自由中国》第二十二卷第十期社论《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内有：‘自古至今，统治者太专横、太霸道、太自私，以至叫人忍无可忍的时候，大家就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反抗的。’”

又引用同期另一篇社论：

“《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内有：‘国民党如果执迷不悟、自私自利，那么只有等待再革命吧！再流血吧！’文件作者认为自南韩与土耳其政变后，《自由中国》一再为文鼓动人民效法韩土政变，掀起流血革命，以图颠覆政府。”

可见台湾当局在下令拘捕雷震之前，早做好一切周详的作业。简言之，发动舆论，使用特务手段，发挥军法制裁的力量，而且不达目的誓不休。

## 下狱

国民党对雷震等人的逮捕行动，虽是以“知匪不报”与“为匪宣传”为罪名，但海内外人士都很清楚，雷震等人被捕跟《自由中国》的言论与筹组新党有关。这是一项赤裸裸的政治迫害，胡适曾表示为了此案，而在海外抬不起头来，而一向亲国民党的美国《时代周刊》发行人亨利·鲁斯也忍不住指责蒋介石：

“我虽是中华民国的好朋友，但我是杂志的发行人、编辑人，我是一个报人，不能不替报人说话，不能不为言论自由来说话。这是报人的责任，我

不能不负起我的责任，否则我就失职了。蒋总统用军法来逮捕《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雷震一事，就是打击言论自由，无视新闻自由，实在大不应该了，把自己号称为自由的中国毁掉了。”

在雷震被捕之后，《时代周刊》曾一连登过三篇文章，并刊出雷震照片，其中有一个标题为《如何制造烈士》，讽刺国民党当局。

美国圣路易城的《邮讯报》发表社论说：

“叛乱的定义是‘意图叛乱却因缺乏公开的行动而无法达到之行为’。显然的，在中华民国反对蒋总统就是叛乱。雷先生的《自由中国》杂志，据说曾刊载过那些讨厌的看法。例如，蒋总统的政府太弱，无法光复大陆；党化蒋总统的军队；美国应该监督其对台湾美援的处置，以保障人权。这些意见听来都不像叛乱，美国政治人物在总统竞选中要说比这些更坏得多的事物。”

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傅尔布莱德，气愤不已也公开评蒋，他说：“也许他（雷震）是一个恶棍，但看样子，却像是清算反对党。”

9月13日，蒋介石亲自出马，向访台的美国西海岸记者访问团解释捕雷的原因，“系该刊所登的文章，对‘共匪’有利”。他相信“已有匪谍在该刊幕后作活动”等等，最后，蒋介石故意卖关子：“我不愿作进一步的评论，因为这件案子尚在侦查中。”

台湾当局一口咬定，雷案是法律事件，它的用心是在逃避世人指责。青年党籍的监察委员陈翰珍，即持此说：“雷案根本不是法律问题，完全是因雷震组织中国民主党的政治问题。”

法律问题也好，政治问题也好，蒋已一意孤行，只好蛮干到底。

台湾的军事法庭，发挥高度的工作效率，于27日公布起诉书，起诉内容一无新颖之处，主要说刘子英策反雷震，为匪宣传，雷知情不报。

起诉书发表的前三天，《自由中国》的编委及主要撰稿人殷海光、夏道平和宋文明三人，共同发表声明，表示愿对该刊的文章自负文责，但当局的对象是雷震，故未予理会。

两星期后（10月8日），军法处走完过场，便匆匆结案，以“煽动叛乱罪”判雷震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权七年；刘子英陪葬，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公权八年；马之骥有期徒刑五年；傅正因撰文“攻讦政府，论调激烈”，交感化教育三年。

雷震下狱，海外舆论再次大哗。加州大学教授斯卡拉宾诺，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说：

“……雷震的罪名，经失败主义直到颠覆政府，但是他的真正罪名，非常简单，他打算领导一个对抗国民党的真正反对党。

……最近盛传……蒋经国正在握权。统治秘密警察的蒋经国，不是美国的朋友，在台湾住的人，最怕的就是他。

国民党有理由畏惧像中国民主党有生气的新党派，此点毫不足异，甚至拥护国民党的人士如胡适，及第三势力如张君勱，目前也很恐惧，或在私下批评。自由中国在哪里呢？”

詹姆斯·H·泰勒牧师这样反问着：

“起诉书中‘该刘子英图报犹恐不及，断无任意攀诬（雷震）之理。’这说法是错误的。随便看一看历史上记载的就非常多，有的人们甚至捏词出卖朋友。基于这段错误的说法，雷震被假定‘明知刘子英系匪帮派来使其自

己为共党工作的匪谍’。我并不是说雷震并不知道此事，我也不是说他已经知道此事。我只要问，刘子英说他告诉雷震说他是被共产党派来工作的说法（雷震对此点已予否认），是否就足以构成他确已知道的事实呢？”

美国舆论的抨击，是站在美国利益的立场评雷论蒋，国民党所受到的羞辱，不下于吴国桢事件。香港报纸，以纯自己人的身分同样冷峻责骂。《星岛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

“天祸中国！六十年风水‘返转头’，庚子年来了，又要像六十年前一样，祸乱迭见。当年是清朝的末代，措施每多倒逆，戊戌政变，捕杀六君子等，都是末代王朝的衰象。现在正要号召‘中兴’，岂可重蹈六十年前的覆辙？但是，不祥的事，接二连三地来，拘捕政治活动者，闭塞言论，一如当年，怎不叫人不寒而栗？‘中兴’之象未见，反而出现末代衰风，拘捕政治活动者，拘捕出版人，大兴文字狱；可怖之事，孰过于此？庚子是一个可怖的岁序，过了不祥之年，应化戾气为祥知，否则徒嗟年头不对，于大局何补？”

香港《工商日报》转载《德臣西报》的一篇社论：

“全球人士都想知道雷震将来的命运。现在事情似乎明显得很：蒋氏统治台湾一天，可以预料得到的，不幸的雷震，将会像一个反蒋人物张学良一样，不能希望可以获得宽大待遇，张学良遭非正式的监禁，几乎已有二十五年，国民党如容许这些措置，应该抹去自己的愚拙饰词，不要把所据的中国小块土地冠以‘自由’两字了。”

1960年10月8日，“雷案”初审结束后，台湾“监察院司法委员会”成立了以委员陶百川、刘永济、金越光、黄宝贯、陈庆华5人组成的“监察院雷震调查小组”，以免外界谓当局有“干涉司法审判”之嫌。但该调查小组向主管单位提出“面晤4位被告，即雷震、刘子英、马之骥和傅正作当面查询之要求”时，却遭到拒绝，原因是“没有蒋总统之指示，他们不敢做主”。

雷震发监执行，胡适等四十人曾联名请求“特赦”，蒋介石演双簧，交“国防部”签注。“签注”的结果，不问可知。雷震被捕后，《自由中国》也被迫停刊。

## 狱中生活

从1960年9月4日起，到1970年9月4日止，雷震在新店军人监狱，整整坐了10年牢，一天也不少。

10年的狱中生活，无疑是雷震83年生命中最暗淡的岁月。通常他以写日记、打苍蝇、抓臭虫等活动消磨时光。不过这10年的日记，也如同日记的主人一样，十分不幸。1970年7月23日，雷震应该恢复自由前，台湾“国防部”军人监狱的监狱官，居然滥用权力，连同雷在狱中三易其稿才撰成的回忆录，一并抢夺上交。结果，日记的主人虽然走出了监狱，日记却继续坐牢。直到1988年4月由傅正和雷震夫人宋英发动平反“雷震案”以后，经一再追索下，才答应归还了日记。军监居然公然宣称，回忆录已烧毁。而这10年的日记，又拖到1989年1月27日才勉强发下。但军监又另耍手法，只发下1961到1970年的10本日记，而将入狱初的日记扣留。

雷震的狱中日记，较详细地记录了他的狱中生活。下面摘录其中数则：

1961年2月26日 星期日

今天天晴太阳不好，晨6时35分起床作散步与运动。

近日来写得太累，晚上睡得不好，今天勉强写，仍写了 2500 字，今日头昏得利害，惟耳鸣较好。……

今天开始打苍蝇消磨时间，4 时开始打了 42 个，华先生在隔壁则打了 900 个。

1961 年 3 月 15 日 星期三

今天天气较好，但是太阳不佳，晨起（6 时 20 分）作散步与运动。时时出外打苍蝇，以代替活动。晚间散步 3 次，共 50 个来回，又走了几身汗，惟晚间仍是睡得不好，但是咳嗽少了一些。

牢后面山上，前几日葬了一个大人，昨日又葬了一个小孩。我来时不久生病，曾告诉董监狱官，我说死在牢里时，希望葬在对过山上，以纪念我在此受苦难，照现在看起来，不等我死，而对面山上已葬满了。钟山说前几年一座坟也没有，自从立法委员（即马晓年？）葬起，现在已有 56 座了。

今日写了 1500 字。

1961 年 10 月 6 日 星期五

晨起钟山发现床上被上有两个吃饱了的大臭虫。难怪这两晚睡不好。这个臭虫大概是前天晒了牛皮垫子的时候由隔壁爬过来。张班长那一天晒被子，他们房间多得很。

1961 年 10 月 9 日 星期一

晨起微雨，不久即晴，今晨又捉了 5 个臭虫，钢丝垫抬到外面去晒，床架子和铜丝架子均用开水烫过。

今日写了 5200 字。

1968 年联合国人权保障委员会，致函台湾当局，要求赦免雷震三分之一刑期，蒋介石不理。到了雷震刑满 10 年出狱前一个月，军人监狱的狱吏和高级特务钟文葵要雷在出狱前立下“誓书”，才能干刑期终了时间开释，否则不得出狱。雷因为“于法无据”，一再拒绝。于是军监又通知雷的妻子，动员她劝雷。然而雷在妻女落泪下跪恳求下，仍无动于衷。

雷妻不得已，请来了雷的好友谷正纲来监劝说。谷要雷看在妻子这 10 年所受的煎熬和痛苦份上，接受当局的条件。雷开始仍无动于衷，但在谷的一再劝导下，有些不耐烦，于是问谷：“究竟要我写个什么东西？”谷正纲即从袋中掏出一个纸条子，说是“台湾警备总部”主管人交给他的誓书底稿，要雷震照样写一份交给“警备总部。”内云：“我出狱后不得有不利于国家之言论和行动，并不得和不利于国家人士来往”，雷说：“我一生从来就没有对于国家不利之言论和行动。这一点我兄可以证明的。惟第二点太含混了，谁是不利于国家之人士，我实在不知道”。后经谷正纲的反复劝说，加上雷的妻女在一旁眼泪汪汪，又见这个誓书的内容是国家，雷便照写了。

过了两三天，“台湾警备总部”负责人又送来一份誓书的底稿，却把原稿中的“国家”改成“政府”二字。雷说：“国家和政府不可相提并论，这是常识，凡有现代知识的人，都应该懂得！”然而雷还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含泪写下了誓书，成全了常以民主法制自我标榜的台湾当局的“司法”笑话。

### 株连家人

“雷震案”发生后，雷的亲朋也大受牵连，而深受其害的是他的子女们。他们受到教师百般刁难、求职到处碰壁、出入境受到走私嫌犯般难堪的搜身。



1960年雷震服刑以前，他尚在求学阶段的三个女儿雷美琳、美莉、美梅就已是学校里的“特殊分子”了。雷美梅高中时因制服只有一个口袋，而非多数同学的两个，受教师屡次警告。大姐雷美琳的遭遇更荒谬，她就读世界新专时，有一名姓刘的教师每次在走廊遇到她，就对她谈保密防谍，上她的课，则会在黑板上写下“保密防谍”四个大字。有一回，这位教师要同学写一篇作文，题目是：“一个伟大人物”，雷美琳写的就是父亲雷震，教师给了她40分，并对全校同学说这位认为自己父亲是伟人，“无视于国父、蒋总统存在”的同学“不要脸”。经雷美琳向校方陈情后，该教师居然在校务会议中下了“不是她走，就是我走”的最后通牒。由于没有教师认为学生写自己的父亲是一个伟大人物便罪当开除，所以这名教师终如其所愿，“走”了。

早在雷震入狱前，国民党特务已24小时盯住雷家。雷美琳值班太晚，男同事送她至家门口，隔天这位好心的同事就被“安全人员”约谈，他们拿着暗中拍摄的雷美琳与男同事站在门口的照片问他“到雷家干嘛？”。原来常到雷家借报的邻居，也因类似情形不再来往。亲友多不敢与他们接触，雷家就这样被孤立了起来。

在当时苦闷的空气中，雷家姐弟们偶尔也会制造一些乐趣。大雨天，与父亲坐在凉亭里，看着两个一边监视、一边东张西望、若无其事的特务，淋着滂沱大雨，像落难老鼠的惨状，使他们乐从中来。有时雷震要到中南部为筹组“中国民主党”开会，他们会陪父亲借道邻居家，翻越后山，到景美搭车。姐弟几个再由另一条路走回新店，打从前门晃回来，唬得那几个特务一愣一愣的，搞不清他们没有出门，怎会从外面回来的。

1964年，雷美琳随夫婿往美国。几年内，姐弟也陆续离台。一两个星期可以发下的出境证，他们却等了将近半年。1966年，雷美梅去美时，雷震正住院，病房随时有两个保防官陪伴，她怕有关单位改变心意，临时禁止她出境，竟连离台的消息也没告诉父亲。雷美梅回忆说：“当时匆忙成行，就像逃难一样。”

定居美国后的雷氏姐弟，每次回台，出入境时也备受阻扰。一班飞机抽查两个中国人、两个外国人，这四个人恰巧就是持台湾护照的大姐、小弟，及待外国护照的二姐、三姐。人被带到小房间搜身，如果可以的话，海关人员会把他们的皮也掀起来检查看看的。带回送人的礼物，也要受严密搜查。面霜被搅得溢出一半，糖果盒被拆烂，甚至牙膏也挤出一半，行李箱被翻得合不拢来。排在后面的老外看了，当场对她们说：“女士，如果你要告他，我随时可以为你作证。”但是，告了他们，于事何补？口口声声注重“国家形象”，国际形象的国民党当局，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外国人面前演这类荒谬侦探剧，受害的，又岂只雷震家人？

雷震出狱后，仍然被监视着。有一回，他参加朋友喜筵，因身体不适，提早离席回家。守在喜堂外的情治人员没有发现，管区警员竟在凌晨到雷家临检，折腾一番后离去。被吵醒的雷震再也无法入睡，面对着曾经门庭若市、冠盖云集的客厅，唏嘘不已。

雷震生前，始终耿耿于怀的，即为他在狱中完成的400万字回忆录遭狱方没收一事。出狱后，雷拟重写回忆录，由于在电话中托人印稿纸而被“警备司令部”保安处长吴彰炯得知（雷家电话被24小时监听、录音），立即打电话给雷夫人，叫他不要再写回忆录，“在家打打麻将好了。”

雷震非常念旧，蒋介石死时，他还到“国父纪念馆”排了四五小时的队

“瞻仰遗容”。雷家一名司机被卡车撞到景美桥下，雷震难过了许久，每年清明节，他都到坟前致意。然而活着的朋友，却难得见上一面。

雷氏姐妹曾无限感慨地说：“父亲晚年非常寂寞，即使昔日再好的朋友，他也不会主动联络，就怕连累人家。”

1976年秋，忍受不住精神上重大威胁的雷震，开始为自己安排后事，他选了一块坟地，除了夫妻的墓穴，又做了三个，安葬亡儿德成和两位故友（均为《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一为殷海光，一为罗鸿诏。1979年，89岁的雷震含冤去世。

1989年4月29日，当年雷案当事人傅正与民进党立委及关心雷案的人士，成立了“1960年雷震案平反后援会”。5月1日，久居美国旧金山、洛杉矶的雷震儿女们，特别千里迢迢赶到台湾，希望能力其父的清白尽一点心力。

5月5日，雷震之女雷美琳，雷美莉、雷美梅三人，在雷案辩护律师谢长延的陪同下，共同出席了平反雷震案的记者会。会中雷美琳等人发表一篇“我们的感谢与呼吁”的声明，要求有关当局重审雷案，将雷震当年在监狱所写的回忆录手稿及日记归还，同时并要求注销雷震家属的黑资料，归还他们自由生活的权利。

雷震子女表示，当年有关雷震案的侦察、判决都是假的、错的，“监察院”的调查报告，也是不尽事实的作品而已。

雷震子女在会中也呼吁，所有知道雷案真相的关系人，包括该案的证人，当年参与侦察审判、监视的治安人员，能发挥道德勇气，提供确实资料，以助雷震案的平反，还其清白。

## 第六章

台北频发暗杀令，魔掌屡伸大陆内地。共和国镇反剿匪。军统龙头纷纷归阴

## 第一节 覆巢之前的哀鸣

### 毛人凤布置潜伏

1948年以前，保密局的企图是派遣特务进入解放地区建立组织，结果屡遭失败，经常受到蒋介石的责备。1948年以后，由于一些原来控制在国民党手中的大中城市不断被解放，根据这种新情况，毛人凤开始采用预先布置潜伏组织的办法，以便解放后这些组织能继续活动。

为了加强对潜伏特务培训，保密局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全能训练班，由电讯处长杨振裔主持，加紧培训一批所谓全能情报员。这个班的成员除要接受搜集情报的训练外，还要接受无线电收发报技术训练，能够独立担任无线电收发工作。全能特务派到前方各大城市居住下来，让他们先找好掩护的职业，不与原来保密局的站组发生横向关系，直接由保密局潜伏布置组领导。

以后又采用双层布置，在各大中城市中又吸收了一批新的人员。担任这项工作的条件是，要有一个正当的职业，例如医生、护士、教员、会计师、工程师等。他们当中，以既要与特务有一点亲友关系，又没有被人发觉与特务有往来的为最适宜。每个大城市都准备设立一个或两个这样的组，组长一般由军统特务没有暴露身份的人担任。每组设一部或两部电台。潜伏特务的待遇是以黄金计算，比一般特务要高出几倍。组长如兼电台报务员，每月连房租等津贴可得黄金二两左右。在快解放的地区，可以一次发给半年或一年的经费。一般组员每月待遇是从黄金三钱到五、六钱不等。在潜伏地没有解放时，这些特务只作一些准备工作，而不正式活动。潜伏组主要任务是解放后搞情报。蒋介石最希望这些人能在解放后混入政府机关去工作，特别希望能混入到共产党里面去。所以这些特务平日表现得很左，工作也很积极，因为只有这样的才能取得信任。

保密局还布置一些潜伏在解放地区的个人，专搞破坏工作和进行造谣等活动。这些人一般都是个人活动，并不结成小组，也不配备电台，而是靠个人去作反革命活动，与潜伏组不发生横向关系。潜伏组所用的电台，一般是两瓦半的美造特工机，利用种种方法掩护起来。有的装在办公桌抽斗的后半部，有的装置在收音机、留声机、台灯等里面。电池一般也配给半年到一年。

当时毛人凤乐观地估计，不出一年，所有被解放的大中城市，便可以在美国的直接帮助而重新回到国民党手中，最久不过一年，于是各种配制也只以一年计。

西南方面的潜伏布置，一直到1949年4月以后才正式开始。这年3月间，沈醉到重庆参加毛人凤召集的西南、西北两地区的负责人会议。会后，沈奉派去上海找保密局办事处领取经费，回来时才带回西南地区布置潜伏组织的指示和各项规定。那时，蒋介石认为西南还可以作为反攻基地，短期内不至于解放。但到今年夏天，他们感到连西南也不易保得住，才匆匆派出保密局潜伏布置组第二科科长任鸿传赶到重庆，由他兼任西南特区潜伏布置专员指导各省站协助布置。

任鸿传和重庆站站长李修凯，先在重庆及川东等地进行布置后，7月间才到昆明，在昆明布置了一个潜伏组和一个独立潜伏台。潜伏组由沈醉找人介绍了两个医生，一个叫明绍武。任鸿传知道明绍武想开设一个私人诊所，便一次答应给他1000元云南半开硬币。当时毛人凤是想用重金来搜罗这种人

才，使他们在解放后能为国民党效命。任鸿传只匆匆把昆明布置好以后便去贵阳。按保密局规定，在云南除昆明应布置一两个组外，还要在保山，昭通各布置一个组。当时因交通困难，任鸿传不肯久待，便先走了。

9月间，毛人凤感到西南地区潜伏组的布置还不够理想，加上华北、华东、华中的一些潜伏组在解放后陆续被破获，为了加强西南地区的布置和恢复解放区的组织，又在重庆缫丝厂内成立了一个全能情报人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由毛人凤兼主任，王蒲臣任副主任，准备训练几百名潜伏特务派往各地。但开始训练不久，解放军已向西南进军，训练班只好迁往成都，结果在路上便弄得七零八落。到成都后，知道已没有时间从容进行训练，才把这批人编入交通警察第一旅何龙庆部队中，准备让他们去打游击。

保密局在进行潜伏组布置的同时，还作了一些专门准备在解放后的大中城市中搞暗杀和破坏部署。这种部署的办法是，先把手枪、爆炸物品预先存放在可靠而容易取出的地方，而不是放在担任破坏暗杀等工作的特务家里，需要时临时派人去取。

## 还乡运动

1949年春天，当全国大部分地区被解放后，从各地逃出的特务大批向国统区后方逃窜。他们多年来受蒋介石的欺骗宣传，没有一个不害怕异常，不少人都希望早点去台湾。

毛人凤看到这种情况，便向蒋介石请示办法，得到的答复是除少数大特务有必要时才准许去台湾外，其余还应留下来继续与共产党斗争到底。毛人凤根据这一指示，3月间在重庆召开了有西南、西北、广西、湖南等省的负责特务参加的会议。毛提出这样一个办法：各人返回自己的家乡去进行个别的活动，在地方上设法立足生根。

这个办法一方面可以大量派遣特务到各个角落去继续从事反共活动，同时又可以减少拥挤在国统区后方城市的待命人员，实际上是不想再负责安置他们的工作。因为地区一天天缩小，人一天天增多，实在也没法安置。这样一举数得的办法，蒋介石很为赞许。

毛人凤在宣布这一办法时，要求这些从事还乡运动的人，要在自己家乡坚持一两年，要他们相信蒋介石不久便可在美国帮助下率部卷土重来，只要忍受一个短时期，便可得到重用。毛人凤还指示他们回到解放地区，可以但白向共产党交代自己过去的历史，不必隐瞒身份；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不准交代组织，特别不准检举其他特务，不准揭发别人罪行。如果不遵守这一规定，不但将来要处分，甚至当时就要派人进行纪律制裁。毛还告诉这些人，可自首交代一些历史上的人，以便进一步取得信任。如果能够在机关中得到工作，那时自然会派人去联系；没有联系到以前，可以相机行事。自己有把握的破坏活动，一定要进行，成功后逃到后方或台湾可以受到奖励。回到没有解放地区的人，要先立下足来，设法掌握地方团队武力，有把握时可以参加打游击；等到解放时，如果没有办法，可以参加起义，以便混入解放军部队去。

## 留下大量叛徒

1949年10月初，有天傍晚，昆明航空检查所长李瑞峰拿了一大批请示飞香港、仰光、台湾等地的申请表，要沈醉作最后决定。当时毛人凤住在沈家，在楼上一间大的客厅办公，沈醉在他隔壁一间小会客室办公。徐远举正在和沈醉聊天，沈便叫李瑞峰把申请表放下，等他看过后再还给他。毛人凤等李一下楼就把沈醉和徐远举叫到他的办公室，要他们特别注意一个问题。他说，蒋介石曾当面指示他，要尽可能不要让中共叛徒去台湾，而要劝他们留下。他说，蒋连张国焘都叫人去劝说过。当时沈问毛人凤，为什么要尽可能不让叛徒去呢？毛说，这是蒋介石英明的地方，使他非常佩服，要沈醉和徐远举一定要认真控制好去台湾的飞机票。因为叛徒去台湾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主要原因是共产党胜利了，他们决不会再死心塌地的跟着国民党。加之，有些叛徒在台湾又没有什么关系，再也不能利用他们去破坏地下党组织，只是增加负担。他们到台湾后，当局不但要多养活一批闲人，还得防范他们倒戈投向共产党，在台湾搞里应外合，而留这批人的好处就太多了。由于蒋介石这一措施，解放前夕在重庆出卖江竹筠、王朴等近百名地下党员的叛徒，曾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刘某，虽然对国民党立过“大功”，在最后向毛人凤跪下去苦苦哀求让他去台湾时，也被毛人凤一脚踢开，刘在解放后落入了人民法网。曾给国民党立过汗马功劳，在军统中工作多年爬到将官级的前张国焘秘书，也没能逃往台湾。此外，未能逃到台湾的叛徒，有做过榆林站长的，有任军统局本部第二处处长的，有任业务处长的，有任兵工署稽查处长的，有任成渝铁路警务处长的，等等。

### 准备在西南地区打游击、当流寇

1949年12月12日，是蒋介石在中国大陆上的最后时刻。

这天中午，毛人凤及蒋介石的贴身机要秘书拿着一份《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和一大叠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委任状，从蒋介石卧室里出来，匆匆往楼下的一间临时机要室走去。这项“应变计划”是从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后由毛人凤亲自起草、拟定的，前后酝酿了整整半年，其中的一些措施，早在人民解放军挥戈南下之时就已经着手进行部署和安排。

毛人凤在重庆期间，曾要求每个省站的负责人立即拟好一份“应变计划”，叫大家充分作好临解放前的大破坏、大逮捕、大屠杀的准备，从速作好上山当流寇的准备。他谈得比较具体一点的是打游击，主要力量是依靠何龙庆的交警第一旅的两个总队。贵州站长陈世贤曾表示，他和余万选可以成立一两个总队。云南方面当时也有一些交通警察，可以凑成一个总队。如加上西南地区十几个兵工厂的警卫部队，以及特务们所掌握的一些公开单位和流氓组织，凑几万人不成问题。

毛人凤信心十足地说，共产党是靠打游击起家，而军统特务也懂得这一套，在这方面要比一般正规部队强得多，将来在大陆上保留几个据点有把握。同时他还向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要到了泸州专区，介绍罗国熙去当专员，派了几个特务当县长，准备把这个地方也作为根据地。

毛人凤拟定的“应变计划”是一项国民党在地下继续与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进行斗争的政治动员令和大纲。而那些委任状，则是属于这项“应变计划”中的一部分，是由国民党“中央行政院”正式委任的、国民党失陷

后在全国各大区以及各主要游击区的负责人和主要领导人。现在经蒋介石签署后，将通过秘密电台发往全国各地的潜伏组织和武装特务。这也是蒋介石在离开大陆前的最后的计划和措施。

“应变计划”称，“为更好地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总体游击战之计划，按照当前全国特定情形，全国敌后工作委员会总部暂时设在台北”，并在大陆设5个“勘乱区”：

第一是西南区，主要负责人何应钦；

第二是西北区，主要负责人马步芳；

第三是华北区，主要负责人李玉堂；

第四是东南区，主要负责人郑介民；

第五是华南区，主要负责人薛岳。

“应变计划”中规定，这五个区“直接统归中央行政院领导，并受驻台北全国乱后工作委员会具体工作指导”。

除上述5个“勘乱区”外，“应变计划”中还策划在各地建立15个“重点游击根据地”。它们分别是：

苏南太湖游击根据地，辖“太湖游击纵队”4个师，并“曲线救国新编第一军”，纵队司令胡伯龙，参谋长季家振。

湖北大别山游击根据地，辖“大别山人民反共义勇军”一个军，军长汪宪，参谋长袁成英。

浙皖边游击根据地，辖“浙皖边区游击挺进纵队”一个军，并“浙边支队”、“皖边支队”各一个师，纵队司令徐振东，副司令徐建中。

豫西游击根据地，辖“豫西剿暴总指挥部”两个军，并“黄河”、“绥远”两个特工大队，总指挥卢民。

赣南井冈山游击根据地，辖“井冈山游击挺进军总指挥部”一个军，并“翠微峰独立支队”，司令黄镇中。

湘西游击根据地，辖“湘西反共救国军”暂编第一军，并“新一师”、“新二师”，军长陈子贤，“新一师”师长兴周，“新二师”师长余适。

湘鄂川边龙山游击根据地，辖“湘鄂川边反共游击军”暂编第二军，并五个直属支队，总司令瞿波平。

广西瑶山游击根据地，辖“广西反共游击联军”暂编第四军，并两个交警大队，军长黄品琼。

广西十万大山游击根据地，辖“广西反共复国第三方面军”一个军，及9个县自卫大队，总司令苟正康。

黔东南游击根据地，辖“黔东南人民自卫军”暂编第九军，军长史肇周，副军长吴登云。

川黔湘鄂边游击根据地，辖“边区人民反共自卫联军”4个师，及11个自卫团，总司令陈全，副总司令陈长捷。

川南游击根据地，辖“西南剿共救国纵队”两个军，并新编第7师，第一军军长也占武，第二军军长欧阳祥林，新7师师长吕振华。

滇北昭通游击根据地，辖“云南人民救国义勇纵队”一个师，并三个大队，师长杨永寿，大队长王跃云，龙绳曾，李云聪。

甘青川边游击根据地，辖“三边靖绥反共司令部”4个师，总司令周迅宇，副总司令刘野樵、傅秉勋。

武当山游击根据地，辖“鄂陕边人民自卫军”一个军，并新编第5、第8

军，总指挥王凌云。

“应变计划”还对这些“游击武装”布置了具体任务，“一是要保存，二是要扩大，三是要进击”。要求他们“各自为战，苦撑待变，尽力避免不利行动。生存就是胜利，坚守就是胜利，同时，积极吸收和引导、组织过去我所留之各种地方武装、警察、绿林武装，等待一切机会，留心一切机会，创造一切机会”，并“利用当前社会问题制造事件”，积极主动地进行“灵活的斗争”，破坏一切军用设施，消灭一切有生力量，最终配合国民党完成“反共复国”的“大业”。

这一垂死挣扎，虽像覆巢之前的哀鸣，却也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力。应该说，长达3年之久的匪患，其源盖出于此。

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崩溃的时候，留在大陆上的溃散武装（政治土匪）就有200万，各种特务分子60万。这些反动势力，在全国各地埋下了定时炸弹，增加了建国初期的不安定因素。



## 第二节 中苏铁道线上连环谋杀

### 毛人凤策划行动方案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就在毛泽东手持讲话稿，站在天安门城楼宣告这一伟大事件后的24小时，从苏联的首都莫斯科拍来了世界上第一份外交贺电：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

苏联政府的反应之快，使全世界都始料不及，许多国家领导人还在瞪大眼睛看着新中国有没有人理睬呢？！

紧接着，蒙古及其他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也都相继用最快速度拍来贺电，纷纷正式承认这个新生的人民政权。

一个占人类1/4人口的国家的红色政权迅速地在国际上站稳了脚跟，这使得新中国的领袖们不禁长长地舒了一大口气。

10月16日，苏联大使罗申在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递交国书，周恩来等参加了这个仪式。

11月的一天，毛泽东打电话把周恩来等领导人请到了自己的住处，正式商谈着出访苏联、亲自会晤斯大林的事宜。

“恩来同志，我看现在我到苏联去一趟比较合适了。”

“今年是斯大林同志70寿辰。他60寿辰那时主席在延安不是还写了祝贺他生日的文章吗？”

“是呀，一晃10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呀！”

“12月21日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领导人都要到莫斯科去为斯大林祝寿，主席选择这个时候去苏联很合适。”

“我可是只管去祝寿嘛，有关双方商谈，协定、签约之类的事还得靠你这个政务院总理啊。”

“主席可以先在苏联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恢复恢复，有关中苏双方商谈的具体工作，我到苏联后按主席的意见和政治局的决定去办。”

“好哇——”毛泽东点点头，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凝望着中南海天空中高挂的一弯星月，陷入了沉思之中。

毛泽东之所以在新中国诞生两个多月后就首次选择出访苏联，这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态度也有一定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到新中国诞生之前这段时间内，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了解是不够的，这位大元帅一直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直到蒋介石最后完全冷淡了苏联而全力转向了美国后，斯大林才开始意识到毛泽东将来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位大元帅是位性格多疑而又十分精明的领袖，他经常在克里姆林宫的餐桌上或是在自己别墅的饭桌前，同自己认为“绝对可靠”的核心圈子的人边用餐，边谈论中国问题和中国未来的形势发展。

斯大林五次三番地问旁边的人：“这位毛泽东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一点儿也不了解呀。他从来没有到过苏联的确，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中，没有到过苏联的人很少，毛泽东可算是例外了。毛泽东始终坚信自己的道路和选择，他是一位中国农民的儿子，自信中国革命的道路要靠

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去闯。

斯大林急于想了解毛泽东，毛泽东却显得不紧不慢。于是乎，斯大林怀疑毛泽东可能有狭隘的农民主义立场。然而毛泽东却心地坦荡，既不受控于人也不斤斤计较苏联朋友的偏见，他有着中国传统伟人一样的君子风度。这些，斯大林是不了解……

毛泽东将出访苏联的消息被国民党保密局潜伏在北京的特务计兆祥得到了，并探听清楚毛泽东坐火车去苏联，经山海关、长春、哈尔滨、满洲里进入苏联西伯利亚大铁道赴莫斯科。他立即向台北保密局拍发密电，报告了这个重要情报。特务头子毛人凤经过周密策划制定了行动方案：密令潜伏在东北的地下技术纵队，在两个地方下手，一是破坏长春 14 号铁道桥；二是在哈尔滨车站埋下定时炸弹，炸毁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

计兆祥发到台北的电报，被我军反特监听台的工作人员及时截获，他们在准确地破译其内容后，上报了中央。

这份带有“绝密”字样的电报及译文，被送到了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在卷宗中看到这份密件后，立刻挥笔在文件的天头上批示：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

毛泽东

## 毛泽东首次出洋

12月6日晚，月亮悄悄地爬上红墙，早已结成薄冰的太液池映射着一片青光。在徐徐寒风中，身披玉霜的古柏时时闪出几枝翠叶。

几辆小轿车由丰泽园门口缓缓驶出新华门，尔后向永定门方向飞奔而去……

刚跨出车门，毛泽东就发现车站空旷寂静的月台上，站立着几个熟悉的身影。

“不是讲好不送了么？”

他拖着鼻音很重的湖南腔，紧紧地握住了朱德刚从帽沿旁边放下的大手。

在下午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上，他就讲过晚上大家不要送。当时大家都没吭声，他以为大家已经同意了。没想到，真要动身的时候，又一个一个冒了出来。看到自己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注意，他真想说几句什么，但话到嘴边他又把它咽了下去，因为这毕竟是他以新中国国家元首的身份第一次前往苏联会晤斯大林，同伴们对自己这次出访的关切和寄以厚望，也是情理之中的呀！

“主席第一次出国，那有不送的道理呀！”朱德憨厚地咧咧嘴笑道。

“你们呀你们呀！”

毛泽东又把手缓缓地伸向站在朱德侧旁的刘少奇、周恩来。

“弼时，看你，身体不好也赶来了。”

毛泽东不无责备地瞅了瞅任弼时那张由于长期失眠而显得有点浮肿的脸庞，右手有力地抖了一抖。

“可要注意身体，千万不能拼老命啊。”

任弼时含笑着应了一声“好”。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而后把高大的身躯朝前俯了一俯，对着周围的送行人说：“既然你们都来了，我可要同你

们订一个君子协定哟！”

“好啊！”

同伴们随声附和。

“是这样的。”毛泽东缓缓扬了扬眉，轻轻地伸出了一个指头。“我这个人属猴子的，天生的爱动不爱静，喜欢到处活动活动。今后我到外头走走，你们都不要搞送往迎来。你们一送一迎，劳了你们驾我不敢当，我毛泽东本人也不自在。你们也不要担心有人朝我打冷枪。敌人想动我毛泽东的脑筋，也没那么简单。轻车简从，神鬼莫测，你说是不是，公安大臣？”

说到这里，毛泽东突然把脑袋转向跟在侧后面的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杨奇清连忙憨笑着应了一个“是”。

“你们看，他都打包票了，你们还不放心？”

“放心，放心，主席保重！”

刘少奇、朱德笑咪咪地做了回答。

“那就这么说定了？”

毛泽东又把有神的目光在伙伴们的脸上扫视了一圈，见大家没有异议，他满意地憋了憋嘴，而后潇洒地挥了挥手，迈着矫健的步伐，朝着月台上那辆编号为 9002 的专列走去。

杨奇清刚想跟随毛泽东走向专列，周恩来轻轻地拽他的衣服，他立即会意地停下了脚步。

“还有什么吩咐吗？总理？”

“刚才瑞卿同志报告：一个小时前，敌潜伏电台又发出呼号，报告了主席专列即将启程的情报。”

周恩来拧了拧眉，有点清癯的脸庞上耸动着焦躁与不安。

“奇清同志，此行事关重大，你可要千万小心在意，一定要保证主席的绝对安全，出不得半点纰漏啊！”

“请总理放心，我一定保证主席安抵满洲里！”

杨奇清挺胸打了个立正。

周恩来没吭声。他一点也不怀疑这位老红军、老保卫部长的忠诚与干练。

1942 年 5 月，日本侵略者采用“铁壁合围”的战术，再次向太行山根据地大“扫荡”，我党政军机关受到不小的损失。杨奇清的家属和公务员也被敌人抓走。不久，他得悉 5 月反“扫荡”中被俘的同志，在日本侵略者的太原集中营里，组织了地下的共产党支部，他的公务员也参加了活动，并同驻在太行山的八路军前方总部建立了秘密联系。杨奇清抓住时机，通过这位公务员掌握敌人内部情况，积极设法营救被捕同志。5 月反“扫荡”结束后，八路军前线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在一次大会上赞扬说：在反“扫荡”中，杨奇清领导的许多干部牺牲了，他的家属也被俘了，但他仍然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坚守岗位，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罗瑞卿号召部队的干部和战士，学习杨奇清无私无畏的崇高革命精神。

1942 年底，敌人大搞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在敌占区加紧了法西斯统治，同时千方百计向我根据地派遣特务，进行渗透和破坏。日伪的秘密“维持会”渗入我们的根据地，汉奸汪精卫的伪国民党和投降了日本侵略者的蒋帮特务潜入了我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一个蒋伪合流的国民党区分部，指使潜伏在我根据地的一个女特务，勾引收买我们内部的人员，阴谋刺杀八路军前方总部首长。杨奇清亲自组织人员，深入调查研究，一举破获这个大案，

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保卫了首脑机关和我军首长的安全。

抗日战争的中后期，党在延安的审干工作，由于毛泽东的肃反路线受到“左”的严重干扰，一度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这个错误也波及到太行山。1944年，杨奇清从延安回到太行，遵照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邓小平、滕代远等人的领导下，对太行地区的审干案件进行认真的甄别工作。他亲自一个案件一个案件地听汇报，看材料，做调查研究，同有关同志一起研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很快把错案、假案一一平反了。

北京截获台特电讯时，公安部长罗瑞卿正在外地视察工作，领导侦破这个案子的工作落到了杨奇清肩上。由杨奇清指挥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共同侦破此案。

然而，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毛泽东访苏的行程日益迫近。但供破案参考的线索仍然只有敌电译文和以“0409”为代号的发电署名。

这一天，心急如焚的杨奇清，把公安部一局侦察处一级侦察科长曹纯之请到办公室。毛泽东的安危，关系着新中国的命运，曹纯之当即立下军令状：到期破不了案提头来见！曹纯之成了侦破敌潜伏台的前线指挥。

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杨奇清随同专列沿途组织保护，然而，谁又能保证在长达一万多里的铁道线上没有偶然的“万一”呢？而如果这种“万一”出现，将给党给人民带来何等惨痛的损失啊！

周恩来紧紧抓住杨奇清的双手，语重心长地说：“一切都拜托你了，有情况及时汇报，我和罗部长24小时值班。”

“是！”

杨奇清向周恩来敬了个军礼，同公安部长罗瑞卿向着毛泽东一行大步赶了上去。

### 途经天津发现异情

12月的华北大地，呈现出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美图景。

这天，一辆编号为9002次的专列，像一条绿色的钢铁长龙，吐着团团白烟，肩负着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在凛冽的朔风中，风驰电掣般往北驰去。

车头上悬挂着金黄色的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在阳光下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专列经过的路线，只见护路部队一公里一个岗哨；一双双警惕的眼光，密切巡视着四面八方。

专列上的乘务人员更是一一选好了的。专列一共三节，前节是警卫连，后节是备用车。司机是一位经过战争烽火考验的经验丰富的老英雄，车开得快又平稳。

专列首先由北京风驰电掣般地驶向天津。经过天津时，前导车发现有一段路轨被毁，一辆机车头上绑着一束手榴弹。此事非同小可，罗瑞卿部长立即下车组织调查。

天津路段出现的情况，使得留在车上的杨奇清副部长和同往的铁道部长滕代远，以及铁道部公安局长冯纪等领导人，更加感到此行任务的艰巨。每到一站，他们总要下车检查一次，及时与前方交流情况。

列车继续前进，坐在中节车厢的毛泽东，在听到天津路段的情况后，把手中的书放到茶几上，点燃了一支烟凝视着车窗外急速向后掠去的田野、树

木……“请杨副部长到这里来一下。”毛泽东用那浓浓的湘音不紧不慢地对秘书说。

听说主席有请，杨奇清急忙来到中节车厢。毛泽东亲切地询问：“对潜伏敌台的侦破落实了没有？”

杨奇清从容地回答：“报告主席，不仅落实了，而且经过分析、判断，敌人还要搞活动。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布置。此案已有李克农接替我指挥。请主席放心。也许主席到了莫斯科，就可以听到胜利的消息了。”

“那好。奇清，我们的公安保卫工作就是要在实战中提高嘛！”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后，继续问：“你们是怎么侦察、判断的呢？”

杨奇清说：“据侦察获悉，台湾保密局拟派专人潜伏大陆，配合华北土匪，在主席访苏前后，组织暗杀活动。但是，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在敌人立足未稳之时立刻逮捕！”

“好！来者不善，歼之有理嘛！”毛泽东满意地笑了。

### 毛人凤下令执行计划

12月7日清早，毛人凤正与美国顾问布莱德上校密谋在大陆的行动，保密局机要秘书匆忙走进来报告：

“今晨两点，万能台自大陆报告，毛泽东的专列已经出发了，估计需要经过三天两夜到达满洲里。毛的安全在苏联境内由苏方负责。”

布莱德上校欣喜若狂：“这是刺杀毛泽东的最好时机。毛泽东此时访苏对美国、对台湾、对朝鲜战争都很不利。你们要立刻选派最有经验的行动人员去大陆督战。”布莱德站起来又说：“我们在正面战场虽然失利了，但是在情报工作方面一定要给其党以狠狠的打击。美国战略情报局希望在毛到莫斯科前后，看到你们的成功！”

毛人凤即刻命令：“按行动计划执行。”接着，他又督战似地说：“立即电告计兆祥，通知××国驻苏办事处协助侦察毛泽东在苏和回国的时间、路线。奖励计兆祥2000美元，并晋升他为上校台长！”

毛人凤转而对美国顾问布莱德上校吹嘘：“共产党绝难料到，在他们党政要员集中的心脏地带的‘南池子’，竟是我潜伏台指挥的天下！”

“这我相信，仅就技术装备方面而言，共产党还不是你们的对手！”

北京朝阳门内路南有一个古朴典雅的四合院，它是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家。这一天，肩负着侦破潜伏台第一线侦察工作重任的曹纯之，第一次到这里，汇报侦破工作。

李克农是我党我军赫赫有名的长期在“国统区”做地下情报工作的名将。他曾和我党地下工作者胡北风、钱壮飞长期在敌人的心脏与敌特进行惊心动魄的斗争，给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被周恩来誉为“三杰”。

尤其是1931年，中央领导机关发生了党的重要领导人顾顺章叛变事件，国民党政府如获至宝，准备将共产党分子一网打尽。在这紧急关头，由于李克农、钱壮飞、胡北风三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及时掌握了敌人的机密情报，以最快的速度，将叛徒所知道的线索全部切断，从而使在上海的国际机关、中央机关以及中央领导同志免遭劫难，为保卫党中央建立了卓越的贡献。李克农这个人，无论是自己的同志，还是敌人，都无可否认地认为他是一个了

不起的传奇英雄。

曹纯之虽久闻李克农部长大名，但打交道还是第一次。当他思绪未定之时，只见李克农部长就笑呵呵地从客厅走出来，热情地说：

“杨部长向我介绍过了，同志们干得很好！今天请你们谈一谈，下一步该怎么行动。”曹纯之上任后，着手进行了两项工作：一是调公安部的电讯侦察组监测，从空中确定敌潜伏台所在方位；一是在北京和天津查汇，从台湾给敌特活动经费的这条途径，获得地上侦破线索。这两条“高招”果然立竿见影：电侦组先是破译了台湾保密局给“0409”的嘉奖令（由中尉台长提升为中校台长）；接着报告从北京到台湾的电讯信号相思线交叉点由初感应在天坛范围，进而北移东城缩小为前门外，最后确定为南池子上空。由查汇获得的侦破线索正与在空中确定的敌台方位相吻合。在天津黑龙江路银行发现了香港九龙××街道××号汇北京新侨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计采楠小姐两笔大额汇票（一笔是1500元港币；一笔是2500元港币），计采楠的弟弟计旭（原名计兆祥）是北平特警训练班的最后一期学员，现恰住在南池子九道湾43号。

南池子紧挨中南海和天安门，旧时这儿王府宅第林立，深宅大院星罗棋布，大小胡同纵横其间，是皇宫要员集中居住的地方。解放后，党政军领导人也多居于此。在老百姓眼里，这个贵人居住的地方是个防范较严的禁地。正因为如此，也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真空地带。

南池子43号的院内有两个院、两个门，正院向东，旁院向西。计兆祥住在正院西房，住在旁院南东头的是个邮电工人（旧警察）。若在这个旧警察的北房安一微小泡泡监视，夜间计兆祥发报，小泡泡受电波干扰就会闪动，以此便可肯定电台在计兆祥屋里。公安部侦察处李国祥处长、苏玉涵副处长提出这个绝对有把握抓住敌台的建议，曹纯之马上表示赞同，当时主管该案的杨奇清也表示同意。但是，对计兆祥进行实地严密监视后，潜伏台没有出现任何信号……

曹纯之汇报完毕，李克农往上推了一下鼻梁上的老式水晶石眼镜，温和地对他说：“老曹，从今天起，你每天只向我汇报一个问题，就是对那些接近计兆祥的人的侦察情况。同时要注意，我们着重打击的是国民党保密局这个组织，政策上不要扩大打击面，只捕潜伏敌人。”

“是！”曹纯之颌首答应。

## 两位伟人首次握手

在沿途武装部队和专列警卫部队的密切配合下，12月9日，毛泽东的专列安全抵达“国门”满洲里市，列车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停了下来，因为中国铁路是窄轨，苏联铁路是宽轨，因此要换车。

在苏联国境线的车站上，早已停好了迎接毛泽东一行的高级专列。这是一辆设备很好的专车。车上设有会议室、卧室、休息室和浴室，显得气派堂皇。苏方赤塔州的党政军领导人和苏联外交部一位副部长来到边境线上迎接毛泽东的到来。毛泽东亲切地上前和他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后，又登上了苏方的专列。

“呜——”汽笛高鸣中，草原上的这列专车驶离了边境线，在苏联国土上奔驰起来。

毛泽东登上苏联专列后，神态显得格外平静，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埋头读书和查阅资料，有时连工作人员请他吃饭也没有听见。不知不觉中，专列到了入境后的第一站奥特波尔，毛泽东发觉车停了，他问道：“这是到哪儿了？”工作人员告诉他地名后，又请他下车，说是有仪仗队欢迎。毛泽东整理了一下衣着，大步走下车来。

他在站台上停了一下，望望天空，这里已是天地萧然，一片严冬景象。站前广场，寒林萧瑟，晓霜犹凝，北风吹得树枝沙沙地响，毛泽东却迈开了大步，有力地朝前走去。

军乐四起，鼓号齐鸣，奥特波尔车站前肃立着一排排威武整齐的仪仗队，一色的新军装，他们手持步枪“唰——”地一下齐整整地向着走来的中国领袖致敬。毛泽东冒着寒风，大步检阅了仪仗队后，又与欢迎的人握手致意，稍事停留后又登上了专列。

列车顶着凛冽呼号的北风继续向前行进着。

西伯利亚的寒流是有名的，对于初来乍到的中国客人也毫不留情，车顶上，车窗前已开始挂上了一道道晶莹的霜花，星星点点，不停地抖动着。当列车到达新西比尔斯克时，莫斯科方面把电话挂到了车站上，询问毛泽东的身体情况，途中是否顺利，还需要什么帮助等。毛泽东听了挥挥手对工作人员说：“告诉苏联同志，我们一切都很好，谢谢他们的关心。”

当列车到达斯维德洛夫斯克站时，毛泽东的身体有些不舒服，脸色有些不正常，可能是疲劳和气候的关系。

“主席，要不要通知苏方一下？”工作人员不安地问道。

“不用不用。”毛泽东摆摆手，站起身来说：“等车停下后，下去透透新鲜空气就好了。”

列车停稳后，毛泽东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走下列车，沿着站台走了一会儿。这时天气奇寒，冷气袭人，不少人冷得直搓双手，他们担心毛泽东受凉，忙劝他上车休息。

毛泽东笑了笑说：“没关系。”他活动活动身体，这才又登上了列车，随行的人见他恢复了常态，这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车到了雅罗夫斯基车站后，专程从莫斯科赶来迎接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在这儿登车陪同前往。

精干的王稼祥一登上专列，就兴奋地奔上前去紧紧握住毛泽东的双手说：“主席啊，可把您盼来了——”

毛泽东也高兴地迎上前去说：“稼祥同志，你辛苦了，我这一回可少不得你这个苏联问题的专家哟！”

12月16日清晨，莫斯科银装素裹，白雪皑皑。大街小巷银枝拂掠，冰影映漾，四处显得格外地庄重和肃穆。快到中午的时候，空气中有了些暖意了，莫斯科人开始走上街头，他们都在议论着今天的热门话题——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将来到这里。

正午时分，伊万大帝钟楼上的那口古老大钟敲响了，“当当当——”12下深沉而洪亮的钟声，这钟声在莫斯科城内久久地回荡着。

“呜——”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声，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在钟声、汽笛声、车轮声中准时徐徐驶进了莫斯科车站，顿时鼓乐齐鸣，欢声划破了机车头那腾腾的白色烟雾，男女青年们手持鲜花边挥动边欢呼，车站广场一片喜庆。

月台前，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元帅布尔加宁、外贸部长孟希

科夫、副外长葛罗米柯、莫斯科卫戍司令西尼洛夫中将等一批高级领导人依次等候在站台上迎接毛泽东的到来。欢迎的人们在寒风中已站了一些时候了，尽管他们穿着厚厚的冬装，一个个的脸仍冻得红红的，可他们依然热情和精神饱满。

列车停稳后，毛泽东那高大魁梧的身影第一个出现在车门口，他微笑着边向人们挥手，边大步地走下车来。莫洛托夫等人热情地迎上前去，与毛泽东亲切握手拥抱，又把欢迎的人向毛泽东做了逐个介绍，毛泽东与他们一一握手问候。由于天气大冷，苏联同志怕毛泽东吃不消，于是加快了欢迎仪式。毛泽东匆匆检阅了仪仗队后就由莫洛托夫陪同前往下榻之处，苏联驻华使节罗申也陪同随行人员前往。

毛泽东被安置在莫斯科郊外一座非常优雅、舒适的别墅内，这里曾是斯大林的住所。

安顿下来后，莫洛托夫请毛泽东好好休息，他转告毛泽东：“下午6时整，斯大林同志约毛主席在克里姆林宫会面。”

毛泽东在卧室内休息了一阵后，便叫工作人员马上做好会晤前的准备工作，自己则点着了一支烟，沉思着在屋内来回踱步。他习惯性地一手握着香烟，一手背在身后，久久地凝视着郊外茫茫白雪覆盖着的田野，似乎在掂量着即将与斯大林握手的分量。

毛泽东是清楚的，直到自己赴苏前夕，斯大林仍然怀疑中国共产党会不会也走“南斯拉夫式”的道路，还有，斯大林对自己让中国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新政府的做法也表示过忧虑，担心这样有可能使新政府选择一条亲美英的西方路线。然而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当时的时局和世界革命的大局出发，断然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毛泽东说：“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

此时的毛泽东有充分的自信心去打消斯大林的顾虑，他为即将开始的会晤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

过了一会儿，警卫人员前来接毛泽东去克里姆林宫，毛泽东只带了顾问兼翻译的师哲，随警卫人员登上了小车。

克里姆林宫里的路全是用鹅卵石铺成的，宫对面的广场地上铺的都是方形木块。车队顺着伊万大帝钟楼的右边，从斯帕斯门驶进去。小车经过一个很大的街心花园，车内的毛泽东注视着前方一个很大的大理石游廊。原来游廊的顶部，全是罗曼诺夫王朝历代皇帝的画像。毛泽东似乎在领悟着这块土地上曾有过的古老历史，他显得那么平静和从容，目光中透出深沉而稳健的神采。

由一座座教堂和宫殿组成的克里姆林宫庄严神秘，一条护城河与红墙护卫着这座曾为莫斯科的公国和18世纪前的帝俄皇宫，而今苏联党政机关的心脏就设在这里。

毛泽东按时被送到宫内斯大林的会客厅里，这客厅十分气派，金碧辉煌，大理石墙壁光亮照人，红红的地毯显得隆重华贵，壁炉架上端的墙上有一口者式的俄国古挂钟。毛泽东有意识地看了看时间，5点57分，比约定时间提前3分钟到达。

斯大林的秘书走出来，他请毛泽东到他的屋里休息一下，他随即进去向斯大林通报。



客厅尽头有一条不太长的甬道通向斯大林的办公室，按规矩，以往斯大林召集会议时所有的与会者都是从这儿进入的，而且必须正点，不能迟到，这是斯大林的工作作风。可今天，会晤的时间马上要到了，竟然没有动静。

“当当当——”挂钟敲了六下后，里间的大门打开了，秘书走了出来，有礼貌地作了一个请的手势说：“斯大林同志请毛主席进去——”

毛泽东站起身来，步伐潇洒地大步走了进去，翻译师哲跟在他的身后。

斯大林宽敞的办公室里全体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排成了一排迎接着毛泽东的到来。站在最前边的是斯大林。他沉着而坚毅，眼光深邃，热情随和，他身后依次站着的是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

苏联的这些高级领导人全都衣著一新，仪表整齐，神态严肃庄重，显得礼貌而不失风度。

当毛泽东一跨进门，斯大林首先微笑着伸出双手迎上前去，毛泽东的双手也伸了过来，两位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领袖的手，终于握在了一起……

“您好！”

“您好！”

“我们欢迎你的到来。”

“谢谢斯大林同志。”

四只手紧紧地握了又握，……

斯大林仔细地端详着毛泽东那高大的身材，红润的面容，赞叹他说：“好，好呀，真想不到你是这样年轻，这样健壮——”

“斯大林同志也很健康呀！”毛泽东回答。

斯大林回过头来，把全体政治局成员逐个向毛泽东做了介绍，毛泽东亲切地与他们一一握手，祝愿问候，尔后毛泽东也向斯大林通报了中方随行人员情况。

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会谈桌两边坐了下来，毛泽东和师哲坐一边，斯大林和苏方人员坐在一边，斯大林望着毛泽东，又赞叹说：“伟大，真伟大！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真诚地祝你健康！”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我可是长期受打击，受排挤的人喔，有话无处说……”

“不不不——”斯大林没等翻译把话说完，捏着烟斗的手习惯地摇了摇，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谁也不能去谴责一位胜利者。”

毛泽东听了这话，深沉地笑了。在场的苏联领导人也笑了起来，有人还轻轻地鼓了掌。

话转入正题后，斯大林的语气严肃起来，他认真地说：“中国人民的胜利，加重了世界天平上革命力量的砝码，我们全心全意地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进一步取得重大的胜利。”

“我代表中国人民衷心感谢苏联人民长期以来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朋友的。”毛泽东的话很诚恳，他显得儒雅、温和，很有分寸，言谈举止中带有浓郁的诗人气质。

毛泽东的风度吸引了苏联领导人，他们都用极有兴趣的目光注视着毛泽东，感到坐在对面的不仅仅是一位伟人，一位领袖，也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们常对毛泽东话中的旁征博引听得津津有味，不时有人轻轻地点起头

来。

斯大林取下嘴上的烟斗，思索了一下，问道：“我们双方这次可以做什么事情呢？你们有些什么想法和愿望呢？”他最关心的还是中苏结盟的问题。

毛泽东想了想，巧妙地说：“我们这次来是要完成一些事情的，是应该搞出一个东西来，可它必须是既好看又好吃……”他很形像地用手比划了一下。

苏方的翻译被难住了，他不知怎么把话的意思表达出来，脸都急红了。毛泽东的翻译师哲见此情景，忙把毛泽东的话做了解释：

“毛主席的意思是说，好看就是指形式上好看，应该是冠冕堂皇的才好，好吃就是说这个东西必须有好的内容，实实在在的。”

师哲解释后苏联同志还是不太明白，他们相互看着，比比手势。有的人还觉得好笑，竟然笑出了声来。斯大林的神情是很认真的，他在体会着毛泽东话里的含意，想弄清楚毛泽东究竟心里有什么打算，特别是双方若要签约需涉及哪些方面的内容，他再三地询问毛泽东的想法。

毛泽东似乎显得不那么着急，他没有直接去回答斯大林的问话，只是说：“我打算请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来莫斯科来一趟。”

斯大林抖了抖烟斗，微微蹙眉头，说：“如果毛主席和我还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伴的事情，周恩来总理到莫斯科来后做什么呢？”

毛泽东平静地掐灭了手上的烟头，说：“周恩来到了就可以商量这件事了。”他接着把话题巧妙地岔到了一边。

斯大林觉得过去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犯过错误，他不便把自己的想法先抛出来，以免造成“强加于人”的感觉。但他内心认为不管中苏双方签订什么样的条约或协议，都应由他和毛泽东亲自来签署，可毛泽东似乎没有明白他的意思，或者是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打算由自己出面来办理这件事。

尽管如此，首次见面还是令双方满意和愉快的，大厅内的气氛显得平等、轻松、友好，说到兴致处，斯大林还不时习惯地摆弄他那精致的小烟斗，毛泽东也不时露出了微笑。

就这样，毛泽东在苏联首都度过了第一天。

12月21日，斯大林70岁生日的庆祝活动开始了。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富丽堂皇的莫斯科大剧院装饰一新，灯光通明，充满了喜庆色彩。除各国代表团外，前来赴会的苏联国内代表都是精心组织的，苏维埃人把能参加这一庆典看成是很高的荣誉。

当斯大林和毛泽东以及各国代表团一同走上主席台时，全场掌声雷动，欢呼声四起。容光焕发的斯大林走上台后，首先把毛泽东和各国共产党代表团介绍给大家。所有人望着站在斯大林身边的毛泽东竟如此高大魁梧，气度不凡，不禁发出一阵阵的议论和赞叹声。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祝词。祝词热情洋溢，十分精彩，自始至终抓住全体与会者的注意力。在费德林的翻译宣读中场内反应热烈，气氛活跃。费德林没想到这篇祝词竟会如此抓住人心，他自己的情绪也被感染了，当他读到“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广泛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受到了斯大林同志友谊的重要性”时，全场发出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台

下有人挥动起了帽子和手巾，场面十分热烈壮观。

斯大林也友好地侧过脸来，对毛泽东报以感谢的一笑，他轻轻地鼓起掌来。在整个会议中，他不时和毛泽东相互交谈着，议论着。

庆祝活动安排的文艺演出开始了，斯大林特意叫人安排毛泽东同自己坐在一个包厢内，两人又边看演出边交谈着，显得亲密友好。

精彩的演出结束了，礼堂内所有的灯光齐明，照得全场雪亮，观众们都回过头来鼓掌，有节奏地高呼着“斯大林——毛泽东！斯大林——毛泽东！”

斯大林高兴地向大家挥动双手致意，毛泽东也起身向人们挥手表示感谢。掌声和欢呼声久久不息，震荡着大厅……

庆祝活动持续了几天才结束，各国代表团在完成使命后先后回国了，毛泽东则按预定的安排在苏联休息一段时间和参观访问。

此时期苏联新闻机构很少报道毛泽东的活动和行踪，西方一些好事者于是做了种种编造和猜测。有一天，工作人员把一则“毛泽东已被斯大林扣留”的西方报道的捏造消息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付之一笑，放下报纸说：“随人家说去吧，古往今来总有好事者的。”

然而斯大林在此期间又打了几次电话给毛泽东，还是询问毛泽东下一步对双方结盟签约内容的具体想法，而毛泽东总是不说，当斯大林了解到毛泽东确实在等周恩来以后，也就不再多问下去了。

1月15日晚，工作人员转告正在列宁格勒参观访问的毛泽东，“周恩来总理已在赴苏的途中了——”

毛泽东一听大喜，他顾不得疲劳和辛苦，当即决定：“请通知苏联同志，我们马上返回莫斯科。”

工作人员劝他再休息两天，恢复恢复再走。

毛泽东果断地一摆手：“不用了，我和恩来是有约在先的。”随即他又幽默地说：“君子言必行，行必果啊！”

1月17日，毛泽东一行人从列宁格勒返回了莫斯科，第二天上午就接到了周恩来从途中打来的电话向他请示问候。电话直接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因为线路有毛病，通话声音不好，毛泽东在耳机旁听了半天，也很难听清楚。他当即决定，请周恩来到下一站后再次通话。

毛泽东挂上电话后，背着双手在屋内踱了起来，显得有些着急。此后他一直守在电话机附近，等待着周恩来的消息。

周恩来从斯维德洛夫斯克再次打来了电话，毛泽东拿起了话筒，直接与周恩来通话，这次通话的效果不错。毛泽东竟然坐在沙发上与周恩来长谈起来了，他把自己来苏后的一些看法和分析与周恩来通了气，并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也把中苏双方条约谈判和协议签定的一些重要问题再次向周恩来做了布置，两人在电话中谈得十分亲切，有时还哈哈大笑。

看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外交才干是深信不疑的，他把几乎所有的实质性任务都交给了自己这位杰出的助手。

两人的通话竟然讲了一个多钟头！

通完话，毛泽东显得格外轻松和愉快，他喝了一口茶，悠闲地靠在沙发上抽着烟，欣赏收音机里的音乐。

一阵深沉雄浑的歌声在屋内响起来，缓缓地、沉重地越响越大，像一条河水，流到了人们的面前，这是伏尔加河船夫曲。唱得那么深沉动人，像一股激流拍打着人们的心胸。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听着，又渐渐地直起了身子，

全神贯注地凝视着窗外，那么专注、深沉……

###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

1950年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一行到达了莫斯科。在莫斯科车站广场，苏方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这是周恩来10年后的再次赴苏，他现在是以新中国政府首脑的身份出现在莫斯科车站。

周恩来身着冬装，神采奕奕，面带笑容，一下车就以他杰出的外交家风度吸引了前往迎接的苏联领导人。他们目睹周恩来举止从容，落落大方，话语有礼有节，巧妙含蓄，都不禁在一旁暗自点头称赞。斯大林在会见刘少奇时也这样说过：“我认为新中国政府的领导人都是很成熟的，尤其是总理和外交部长的人选周恩来，那的确是当之无愧的。”

与毛泽东一行人相比，周恩来一行人就显得庞大多了，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东北工业部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以及赖亚力、何谦、沈鸿、苏农宫、柴树藩、程明升、王勋、聂春荣、罗维、常彦卿等人。

王稼祥同志照例赶到200多公里外去迎接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在1939年6月曾从延安来苏联治疗摔伤，在苏联住了8个多月。正是在这段时期中，共产国际于1940年1月至3月举行过一次特别执委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这也是与中共和中国革命有着千丝万缕难以分割关系的共产国际在解散前，对中共的工作作的最后一次讨论。会上充分肯定了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并建议中共及时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非常及时地把共产国际的这些精神带回了国内，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后，苏德战争爆发和新疆盛世才转向反共反苏，阻隔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解散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继续保持了同中国革命的关系，而中共也开始了旨在为实现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思想的整风运动，中共中央解除了对共产国际章程的决议所要承担的义务。对于这段难忘的历史周恩来是记忆犹新的，他深知此行责任的重大和意义深远，他准备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完成这趟莫斯科之行的历史使命。

周恩来仅仅在特意为他安排的住所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直接搬到了毛泽东住处的楼上来。同重庆谈判时一样，两位老战友一个住楼上一个住楼下，经常在一起为某些重大问题长谈到夜静更深之时。

相比之下，周恩来的时间安排要比毛泽东紧张多了，他白天要到克里姆林宫去参加谈判，晚上还要向毛泽东汇报和商量，常常是一天仅有几小时休息时间。可他仍旧是精神抖擞，毫无倦意，无论出现在哪儿都显得精力旺盛，使得一些参加会谈的苏联领导人也自叹莫如了。

在谈判处于关键阶段的一天夜里，已经很晚了，周恩来与毛泽东仍在客厅里长谈着。

毛泽东茶几上的烟缸里已盛了不少的烟头，他手指上的烟卷还在冒着缕缕烟雾。毛泽东像是在思索什么往事，显得有些心绪难平。

“主席，时间不早了，您该休息了吧。”周恩来看了看表，说道。

“恩来，你记得我们党同共产国际的历史有多长时间吗？”毛泽东问。

“从1920年3月开始，到1943年6月为止，有23年多。”周恩来记忆精确地回答。

“列宁创建的共产国际20多年来对中国革命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都是有功劳、有帮助的。在整个共产国际的工作中，苏联起的作用是最大的。”毛泽东的口吻十分肯定。

“是的，我们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同苏联同志的关系。”周恩来点了点头。

“对！”毛泽东掐灭了手中的烟头，转过身来，“这就是我们在考虑中苏条约上的历史前提呀！历史提供了我们经验，历史也提供了我们教训。”

周恩来点了点头，他明白毛泽东话中的深刻含意。他知道，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出现过的三次“左”倾错误，同当时共产国际的错误是有直接联系的。在抗战胜利后，斯大林既对中国革命以支持，又对中国共产党的实力缺乏信心，他在寻求与蒋介石政权发展关系的同时，也把本国的民族利益放在了中国革命发展之上，对此毛泽东是心中有数。

1943年至1945年之间，美英苏等国首脑举行了对战后世界局势有着决定性影响的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在这些会议中，尤其是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为在中国领土上谋求权益而同美国进行了交易。当时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在拍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电报中这样说过：

昨晚我同斯大林谈话时……他说，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即库页岛）的南部应归还俄国。他在包括旅顺港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南部用手画了一个圈说，俄国人希望再次租借这些港口及其周围地区……斯大林进一步说，他希望租借中东铁路。我请他说明，他

所关心的究竟是哪条铁路？斯大林指出是从大连到哈尔滨，再向西北到满洲里，向东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这条铁路，斯大林的答复是肯定的。但他特别重申：苏联无意干涉满洲的主权。当然，随着对铁路管理的控制，苏联军队可能护路，苏联的影响毫无疑问将会很大。

1945年2月8日下午3时30分，斯大林同罗斯福正式会晤中认为他的要求是“正义”的，不然他和莫洛托夫难于向人民解释苏联为什么要出兵对日宣战。他还向罗斯福表示了这样的看法，中共应该接受蒋介石的领导，既然他们有一条抗日统一战线，那为什么搞不到一块儿来？斯大林甚至还宣称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说“没有哪个共产党强有力到足以统一中国。”

毛泽东面对斯大林在中国领土上谋求权益和对中共的干涉，始终坚持了正确的态度。他以一个伟大战略家的眼光采取了坚定而明智的决策：既不直接干预苏美与蒋介石从事的外交交涉，也不直接反对斯大林的某些谈话，相反的，中国共产党继续尊重斯大林和联共（布）在国际共运中的重要历史地位，维护团结，为争取苏联出兵东北对日作战，创造中国革命形势取得大发展的局面而进行了成功的努力。

在这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的英明决策深得周恩来等许多领导人的拥护和支持。周恩来此行到莫斯科谈判签约，自始至终都在坚定不移地贯彻毛泽东的思想。

夜更深沉了，星月在天空闪烁，雪野冰霜与星光月影交相映射，为莫斯科的大地披上了深银灰色的衣装。屋内，毛泽东端起桌上的茶杯，倒上热水递到周恩来面前，关切地问道：“2月14日正式签约有把握吗？”

周恩来喝了口热茶，剑眉一扬回答说：“如果苏方不再提出新问题，我想，2月14日正式签约是有把握的。”

“好！”毛泽东点点头，双手叉腰，高兴地对周恩来说：“你谈得很出色，应该记一大功。”

周恩来忙说，“是主席指挥得当，考虑周密。”

“不，要论这种场合，非你周恩来不可呀！”毛泽东说完哈哈大笑了起来，周恩来也跟着笑了起来，两人笑得那样会心，那样神往……

“嘘——”周恩来蓦然做了个手势，止住了笑声，毛泽东也猛地意识到了此时已是更深夜静时分了。

窗外，夜色深沉，星月闪闪，预示着将有一个晴朗的好天气出现。

中苏正式谈判开始后，克里姆林宫内的斯大林也十分忙碌，每天清早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到世界各国主要报刊及首脑对中苏会谈的各种反映和分析。他让秘书把这类材料搜集摘录后，准时送到他的办公桌上，少一件也不行。然后就亲自听取米高扬和维辛斯基等人的汇报，每当他听到汇报人总是提：周恩来的意思是怎样，周恩来的建议是如何之类的话时，就皱起了眉头，有时他干脆打断了汇报，说：“我更希望了解到毛泽东的意见怎样，毛泽东的建议如何……”

终于，斯大林再也等不及了，为了摸清楚毛泽东本人对结盟的真实具体意图，斯大林曾几次把电话挂到了毛泽东下榻的地方，此时毛泽东已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内，斯大林请毛泽东住在近处，其目的也在于更方便联系。

毫无疑问，斯大林是一个卓越的、意志坚强、非常熟悉情况的人。然而到了晚年，他又显得性格多疑，他感到周围的人都不大可信，秘密活动到处存在，他对中国人的信任程度也并不能使人满意。记得1948年2月，斯大林对季米特洛夫就中国共产党“不听话”，坚持对蒋介石政权不做妥协的情况汇报时，就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同志在莫斯科时同意我们的看法，但回到中国后又是另一种看法。”

当然，历史也使领袖们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

中苏条约是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会晤的最主要问题，这一历史性会晤在当时不仅受到了中国与苏联两国的密切关注，在东西方最遥远的许多地方也紧迫不放任何细节。

条约具体的内容是在周恩来和米高扬之间讨论和谈判的。周恩来则始终位于会谈的主角，他杰出的外交才能在新中国第一项外交使命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会谈中周恩来的建议和意见使得米高扬也觉得几乎无懈可击，当最后一轮会谈完结时，米高扬握住周恩来的手说道：“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中国共产党能夺取政权的原因了。”

周恩来风趣他说：“你不久还将看到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建设起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

最后一次关于条约的定案会谈，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到会，苏方除斯大林外的所有高级领导人也都全部出席了会谈。

大厅内5盏光线柔和而明亮的水晶大吊灯使得这儿的气氛格外亲切，双方平等地商定了各项协定和条约的原则。

毛泽东意识到这些原则对于实现中国的领土主权的完整，加快经济发展和新中国的建设都是意义重大的，对此他感到满意。整个会谈中，一连几天没有休息好的周恩来仍是精神饱满，话锋敏锐，掌握着发言的主动权，毛泽

东只是在关键地方插上几句有分量的话，充分显示出他的驾驭全局能力。

会后一位苏方人员感慨地说：“毛泽东和周恩来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真是少有的领袖人物呀！”

### 斯大林举行招待会

2月8日，在所有的条约与协定开始拟定之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又一起来到克里姆林宫拜访了斯大林。由于条约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双方这次会谈谈得十分投机，斯大林用最好的酒菜招待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习惯地一个劲劝人吃格鲁吉亚式羊肉汤，红菜汤和烤羊肉串。

菜虽不算多，但味道可口，女侍者不停地端来热腾腾的新鲜菜肴，请斯大林过目。斯大林和中国同志边吃边谈着，当他了解到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著述丰富时，便认真地想了想，严肃地说：“毛泽东同志，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我建议你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文章文件尽快整理出来，编辑出版，这是件大事情。”

毛泽东点点头，回答：“我也在考虑办这件事情。如果斯大林同志能支持这件事，我将十分感谢。”

“你需要哪方面的帮助？”斯大林手上的烟斗转动了一下，神色很认真。

“如果能派一位理论上强一点的，精通马列主义哲学的同志协助我们就太好了。”毛泽东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晤——”斯大林眼睛盯着杯里的红葡萄酒，沉吟了好一阵子，毅然说：“我马上派尤金同志去协助你，他是位哲学理论专家。”斯大林握着烟斗的手挥动着。

“那太谢谢您了，斯大林同志。”毛泽东说。

斯大林笑了笑，显得有些得意。

毛泽东看了他一眼，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来：“斯大林同志，在条约签字以后，我们准备举行一个招待会。”

“当然，”斯大林点了点头。

“但是不在我现在下榻的克里姆林宫，而是在另外的地方，比如在大都会饭店。”毛泽东明确地说。

“为什么不在克里姆林宫呢？”斯大林不解了。

“斯大林同志，您要明白，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国宴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主权国家来说不完全合适……”毛泽东的语气很平和，但态度却有些强硬。

斯大林显然有些不悦了，他沉思片刻，侧起头来说：“是的，可是我从来没有出席过在外边饭店或是外国使馆举行的宴会，从来没有过。”他强调了一句，显然在向毛泽东施加压力了。

毛泽东没有理会斯大林的态度，坚持说：“斯大林同志，我们的宴会要是没有您出席，这恐怕是很难想象的……”毛泽东的话也显得软中有硬，他进一步说：“我们请您，殷切地请您务必参加。”

谈话停顿了下来，斯大林像在考虑什么，而毛泽东则冷静地看着他，等待着他的答复。

“好吧，毛泽东同志，如果您是这样希望的，让我考虑考虑……”斯大林终于做了让步的表示，看来他准备打破自己从来恪守的信条了，因为他清

楚地意识到面前这位高大健壮的中国领袖，对他来说是一位非常不一般的盟友。

会晤结束后，斯大林再次破例把毛泽东一行送到了门口，目送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斯大林手中的烟斗轻轻转了两下，若有所思。

1950年2月14日上午，中苏双方正式举行隆重庄严的条约签订仪式，它意味着两个盟国的“蜜月时代”从此要揭开序幕了，尽管谁也无法预料到两个社会主义邻国的关系以后将会遇到什么坎坷和变化，这份条约的签订毕竟给当时的世界带来了剧烈的震动。

条约原称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改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对周恩来提议加上的“互助”二字十分满意，他认为这两个字“加得很合适”。

签字大厅内的灯光格外地耀眼，大小十余盏各式吊灯挂灯壁灯齐明，更增添了隆重气氛。

条型的签字桌中央分别插着中苏两国国旗，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了字，互换文本后，两人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出席了签字仪式。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也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协定规定至迟不过1952年底，苏联将交还他们在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在华权益。还签订了《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将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帮助新中国的建设。

仪式开始后，进程很顺利，可是当要签订贸易方面的协定时，文本却迟迟没有送到，双方领导人显然都等得有些着急了。斯大林不悦了，他问及下边，得到的回答是“中文的文本没有准备好。”斯大林不动声色，转身对中方翻译师哲说：“请您把这个情况通告毛泽东同志。”

师哲小声地对毛泽东耳语了几句，毛泽东不悦地一摆手说：“算了，总而言之，一切错误都在中国人的身上行啦——”说罢，毛泽东再也不言语了。

然而文本的拖延是由于苏方工作人员的差错造成的，他们在修改错误时耽误了时间，对此周恩来是十分清楚的。他理智地示意维辛斯基再等等，一直等到文本送来后，场上的焦灼气氛才缓解下来。

签字仪式终于完结了，在全体人员合影前，毛泽东和斯大林又相互交谈了几句，彼此祝贺与问候。合影时站在中间位置的斯大林比毛泽东矮了些，他很机智地向前跨了半步，这样第二天见报的照片中，斯大林和毛泽东几乎是一样高地并肩出现在全世界面前了。

当印有照片的报纸送到斯大林面前时，他仔细地看照片，有些狡黠地笑了，似乎是在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你真聪明呀！”

然而毛泽东注意的却是报纸上消息的内容，对那张合影照似乎根本没有去认真留心过什么。

### 斯大林破例出席中方招待会

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大都会饭店是一幢带有典型俄罗斯风格的建筑，2月14日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把大都会饭店的宴会厅全部包了下来，整整的一层楼都成了中国东道主接待客人的场所。自然，花费的租



金也是颇为可观的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结束的告别宴会将在这里举行。

下午6时左右，中国东道主和请来的客人们都按指定时间来到了宴会大厅内，到处都是笑脸和热情的话语声，气氛是热烈而隆重的。

然而快到开始的时间了，仍不见斯大林等苏联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出现，不少人脸上浮现出忧虑不安的表情。大家担心斯大林是否真能破例走出克里姆林宫到这儿来参加招待会。几位苏方人员交头接耳地议论着，认为情况不妙，另外一些人则显得信心十足地在等待着，他们都是平常很难近距离看见斯大林的人，尽管他们的职位也不算低。

正在人们议论纷纷之时，一位身穿便服的外交官悄悄走到苏方译员费德林身边，神秘地耳语道：“您应当到前厅去迎接斯大林，把他接到这里来。”

费德林心里掂量了一下，说：“你们做这件事或许更好些，难道这种事成了我的特权吗？”

外交官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费德林同志，关于特权的事，我们现在不谈它，我们现在是把你看做汉语专家来要求的，难道您还不明白？”他拉起费德林的手就把他带到了前厅，让他在指定的位置上站好。

6时30分，一队长长的高级轿车在饭店前停了下来，斯大林带领苏共政治局全体成员走下了汽车，前来赴宴了。当前厅大门打开，斯大林威严而颇有风度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时，全场许多人都惊呆了，因为在场的大部分苏联人都从未这么近地看见过斯大林呀！

斯大林走到存衣处解开大衣，殷勤的服务员要上前帮忙，斯大林风趣地说：“谢谢，看来这点事我还会做的。”他说完跟着费德林大步走进了宴会大厅内，顿时，全场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久久不息，回荡开来……

斯大林停了停，向狂热的人们挥挥手，然后向“主宾席”长桌后面的毛泽东大步走上去，毛泽东微笑着伸出双手与斯大林亲切地握手，请他在自己旁边坐了下来。

“斯大林同志，您好！祝您身体健康！”

“谢谢，毛泽东同志，您的身体看来也不错，还适应莫斯科的气候。”

“还好！谢谢苏联同志们的关心和照顾。”毛泽东说完话将走上前来的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等人中斯大林尚不认识的作了介绍，斯大林也微笑着同他们问候并握手致意。

敬酒开始了，大厅内灯光辉煌，欢乐的乐曲四下回荡，两国同志一个接一个地发表祝酒词，但所有祝酒的人都目不转睛地望着并排站在用玻璃板壁隔成小间内的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位领袖在小间内交谈着、议论着各种问题，同以往的数次会晤一样，他们的谈话是没有题目的，高兴议论什么就谈什么，十分随便。

祝酒讲话开始不一会儿，大厅内的人流全都向小间前涌去，周恩来眼看玻璃板壁要被挤倒，忙叫人把它拆开，使大厅小厅合成一处，这样才使狂热的苏联人稍稍安定了一些。斯大林对人们没完没了的欢呼和兴奋看来有些厌倦了，他几次用目光向大家发出呼吁，但最终看来是徒劳的了。

首先发表祝酒词的是周恩来总理，他嗓音洪亮，没有用事先为他准备的讲稿，但所讲的内容竟和讲稿几乎一字不差。周恩来主要讲了中苏两党两国兄弟般的团结是对世界革命的最大贡献，中国人民感谢苏联老大哥的援助，要向老大哥学习等等内容。他的讲话使得在场的苏联同志十分激动，不时报

以热烈的掌声，费德林有时也觉得一时找不到更好的词汇来翻译了。周恩来的讲话结束后，人们更关注下边的议程了，因为斯大林也要发表祝酒词了。

斯大林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站了起来，显得从容不迫，他触了一下装满佳酿的酒杯，打了个手势说：“请注意，我要讲话他首先为毛泽东主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就而举杯祝贺，他的语调是轻松的，他说：“中苏友好的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总理的讲话也代表了我的意思了。”可接下来他却把话锋一转，说：“社会主义阵营要团结起来，可惜今天与会者中间少了南斯拉夫的同志，我感到很惋惜……”最后，他放下酒杯，举起双手高呼着：“团结就是力量！”

宴会进程中，气氛始终很热烈，毛泽东举杯祝斯大林健康，视中苏人民友好下去。斯大林也数次举杯祝毛泽东、周恩来健康，斯大林这时情绪很好，不时地与中国同志谈笑着……

这次宴会，斯大林与毛泽东为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共同举起了祝贺的酒杯，尽管这酒杯的举起多少有些不容易，但它毕竟代表了50年代初中苏两国之间的“蜜月时代”到来了。

告别宴会持续到午夜，人们才尽欢而散。

### 李克农严斥毛人凤

北京南池子，云南会馆。已是深夜1点多钟，曹纯之仍难以入睡。按毛泽东访苏归国的预期时间，破案期限只有3天——72小时了。曹纯之几次去向李克农汇报，都没得到明确指示，他有些沉不住气了，这倒不是因为他立下了军令状，而是着实担心毛泽东在归国途中的生命安全。正当他辗转反侧之际，传来了阵急促的脚步声，脚步声在他门前停住，紧接着传来重重的扣门声。曹纯之打开门，与计兆祥住对门的那个邮电工人站在门前，气喘吁吁地说：“计兆祥凌晨1点钟又发报了。”

邮电工人的话音刚落，电侦组组长李朋不召而到，兴奋地对曹纯之说：“经与各电侦情况核对，敌台发报的时间与电侦监收到的时间完全一致。”

曹纯之喜出望外，他立即调车去李克农家汇报。李克农听完汇报，微笑着拍拍曹纯之的肩膀说：“老曹，我宣布这一仗你完全胜了。”

“现在只对计兆祥一个人有证据啊？”曹纯之疑惑地问。

“这个问题大家要统一认识。通过对那些与计兆祥有接触和联系的人的调查，他们与他计兆祥并没有直接的特务关系。由此可以推断，计兆祥的电台是保密局的‘万能潜伏台’，计兆祥集台长、报务、情报、译电于一身。这种情况，我还是头一回遇到过。”

曹纯之听罢，心中不由暗自钦佩。

下午2时，李国祥处长用毛笔下达了侦破命令：

关于侦破国民党保密局北京潜伏台一案的命令：

只捕计兆祥一人。

李国祥

1950年

接到命令后，曹纯之率领侦察员们来到南池子九道湾43号，计兆祥正好在家。侦察员们亮出逮捕证和搜捕证，计兆祥顿成筛糠。可几个侦察员搜了一阵儿，只发现了整流器，没有发现电台。曹纯之屋里屋外仔仔细细瞅了一

遍，然后回到屋里，独自坐在客厅沙发里，掏出一支烟，若无其事地吸着。他按思考问题的习惯的方式，猛抽一口，仰头喷着螺旋式的烟圈。沿着烟圈升腾的方向，只见天花板上倒贴着一张手绘的色彩绚丽的“牡丹图”，他心中一动，命令道：

“上去！电台肯定在上面。”

一个侦察员敏捷地跳上擦起的凳子，用手一拉“牡丹图”，立刻现出一个黑洞洞的窟窿，他掏出手枪，一纵身爬进黑窟窿。不一会儿，侦察员从上面递下来美制 SST—1—E 型 25 瓦电台一部、美制手枪一支，以及写在一本《古文观止》上的密码本等特务罪证。

李克农赶到现场。他看着浑身发抖的计兆祥，对他说：

“你不要怕，我今天来，是来看你发报技术的。就用这架电台，使用你原来的手法，呼叫毛人凤，我说，你发。”

“是，是。”计兆祥连连颌首。

此时，台北近郊。一座隐蔽在浓郁茂密树木中的国民党保密局本部里，笼罩着一种神秘、可怕的气氛。神经过敏的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刚刚接到人民解放军即要解放海南岛、舟山群岛的情报，又接到情报部门报告：人民解放军在福建沿海已集中大批部队，空军已进驻华东的一些机场，登陆舰艇也正在一些港口集结。看来，那阵势是对着台湾来的。

毛人凤面带难色，忧心忡忡。而蒋介石这时正在阿里山庆寿。他暗自思忖，如果下一次行动成功，在毛泽东访苏归来时干掉他，中国的风云就会发生突变。否则，万能潜伏台、地下武装力量的活动将更加困难。不把握住这个时机消灭毛泽东，蒋介石不会答应！

见毛人凤无精打采的样子，急功近利、坐阵督战的美国顾问布莱德上校对他说：“立即电告计兆祥，报告潜伏大陆暗杀队的准备情况，对东北技术纵队所有行动人员除重赏外，一律官升三级。并委任纵队司令马耐为国民党东三省救国司令。”

毛人凤焦虑地抽着香烟说：“按规定的联络时间已经超过了，可现在还没有得到大陆的任何反应……”

布莱德很敏感，打断毛人凤的话说：“立即电告计兆祥，停止发报，马上转移。”

“我看问题不会那么严重。共党再狡猾，也不会那么快发现我万能台的踪迹。也许计兆祥马上就会发来成功的电讯！”

正在毛人凤忧心忡忡的时候，机要员进入，战战兢兢地递给他一份电报。毛人凤兴奋地接过电报，迫不及待地打开，这正是李克农发给他的那份电报，电文是：

毛人凤，经你精心策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潜伏的万能台，你向美国人吹得神乎其神，发报只有两三次就被我们侦破了。我们有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有雄厚的群众反特力量，你们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你们在中国大地上洒满了怨恨，你们活动到哪里，哪里就陷入人民的包围之中，我们的专政机关就会立刻侦破你们。你们如果执迷不悟，来多少，就歼灭多少。保你有来无回。你还有本事吗？你有本事你来嘛！告诉你，给你讲话的是李克农。不要怕嘛！好好地听着：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你们有丧师八百万，逃往海岛的教训。你们现在“寄人篱下”，好景不会长久。人民政府对你们有国人共睹的政策，立功受奖、不咎既往。

你若率部来归，我李克农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告诉你，发报的报务员，就是你新提拔的上校万能台台长计兆祥。

毛人凤心惊肉跳地看完译电原文，不知所措。但他想最后摊牌的时候还未到，手里还有东北技术纵队这张王牌，心里踏实了些。只是眼下不知如何向蒋介石交待为好。特别是李克农的出现，更能惹怒“老头子”，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李克农曾在“国统区”做电讯情报工作，把他和戴笠整得防不胜防，处处被动挨打。国民党政府曾多次悬赏10万元。捉拿李克农，但始终连李的影子也见不着。为此，他俩多次向蒋介石请罪。蒋介石气得训斥他们是：“饭桶，无用，白痴！”他们对李克农真是恨得咬牙切齿，徒叹奈何！

冤家路窄。没想到，今天在无线电里，毛人凤被李克农义正辞严地训了一通，不禁恼羞成怒！

他忽而一想，今天已命令在太平洋某半岛待命的两位特派员，飞往大陆督战，让计兆祥电告东北技术纵队准备接应。说不定，计兆祥的电报也被共产党截获，如果真是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

“该死的计兆祥！混蛋！”他绝望地骂了一声，把电讯稿猛地一摔，吓得机要员大气不敢出，小气不敢喘。

美国顾问布莱德上校走过来，不知所然地问：“大陆的情形如何？”

毛人凤受不了这样的刺激，仍然大叫大嚷：“他妈的，共产党进了北京，比过去更厉害了！”

布莱德上校看了译电，脸一下子沉了下来，但他故作镇静地说：“还有希望，因为我们的飞机已经起飞。你要有信心，不要激动，丢掉了万能台，但是我们还有技术纵队。”

毛人凤知道美国顾问不了解中共的厉害，只是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发完电报后，李克农部长见计兆祥不像刚才那样紧张，便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小计，今天这个报，你发得还可以，不愧是毛人凤的万能潜伏台。”

接着，李克农走到院子中间，对侦察员们说：“攻克保密局潜伏台的战斗，我们彻底胜利了！”

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向首长鼓掌致意！

李克农部长临上车时，对曹纯之说：“明天上午我再来看看同志们！”

## “马司令”落网

这是一个早春的夜晚，天空黑沉沉的。

约7点钟，一架没有任何国籍标志的飞机，正悄悄地沿着朝鲜的东海岸向北飞行。它小心地绕过激烈的高射炮火网，穿过鸭绿江，又越过吉林，在离哈尔滨不远的山林里，低低地盘旋，寻找着合适的空投地点。

片刻之后，突然从飞机中部跳下两个神秘的怪物。稍顷，飞机便怪叫着在漆黑的夜空中消失了。

此时，成润之副科长、侦察员沈继宗和哈尔滨的侦察员，正等候在这里。

成润之副科长仰望着空中的两个怪物，沉着命令：“注意目标，迅速接近！”

两个怪物落到地面，收拾了一下东西，正庆幸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深入到大陆数百里时，忽然一道道手电筒光和一个个森严的枪口，对准了他们，

他们沮丧地低下了头。

根据从计兆祥处截获的电讯证明，他们就是由台湾派来的领导东北技术纵队进行暗杀活动的两个特派员。这两个人，曾是国民党高级刺客段云朋的助手。从他们的衣物中，搜出了美国的卡宾枪、无线电台、气象预测器、炸药等特工用具。

这两个特务叫张大平、于冠群。次日上午8点，将在哈尔滨松花江饭店与东北技术纵队接头，并代表国民党保密局，给有关人员颁发委任状，以鼓励反共有功人员。

翌日清晨，哈尔滨松花江饭店，一个高级客房里，一位身穿蓝料子服，戴一副墨镜，留一撮小胡子，打扮得像绅士的人，独自在客房内踱步。他时而把脸贴在玻璃窗上看着临街的动静，时而焦急地看着怀表，好像是在等一个什么人的到来。

突然，门“砰砰”地响了两声。声音非常小，除非有意识听，否则是听不到的。

“谁？”穿蓝料子服的人问了一声。

“我。”门外的声音极小，“205来了！”

“请进来！”

门轻轻地敞开了，但只敞开了一半。原来门外站着三个人，除了那个敲门的中等个外，还有两人。他们三人侧着身子蹑手蹑脚地走进屋。房主人转身坐到沙发上。中等个指着身穿蓝料子服的房主人，对另外两个人介绍说：“这位就是保密局特派员张大平先生，毛人凤局长的臂膀！”

其中一个高个子立刻摘下毡帽子，朝张大平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龇着黄牙，献媚地说：“久仰！久仰！”

然后，中等个又给特派员介绍说：“这位就是东北技术纵队司令马耐，代号‘205’。”

“噢！请坐！”特派员稍微欠了一下身子。

马司令看了看特派员的脸，小心翼翼地提起他的半旧棉袍坐在靠近特派员的沙发上，然后用手擦擦脑袋上的汗珠，假惺惺地说：“昨晚受惊了吧？兄弟未能亲往迎接，失敬，失敬！”

特派员点头表示体谅，然后站起来说：“我奉国民党保密局毛人凤局长命令……”室内空气立刻严肃起来，马司令把脖子挺得溜直，听特派员宣布：“……蒋委员长的饬令，此仗不成功，便成仁。所有行动人员除重赏外，一律官升三级。”

马司令松下一口气说：“多蒙党国关照，请特派员指示！”

特派员一挥手让另外两个人到外边去。

特派员说，“马司令，谈一下行动的准备情况吧！”

马司令得意洋洋，往沙发上一靠，吹嘘起来：“这次中共访苏，共党防守极严，沿途及车站军警岗哨林立，还有便衣、地方干部都参加巡逻。我们给共产党灌了个迷魂汤，让他走时安然无恙，回来时粉身碎骨。”

“你们的行动计划是否可靠？”

马司令压低声音说：“根据北京潜伏台指示，毛泽东专列明天晚上8点可到达哈尔滨。我们拟在满洲里、哈尔滨、长春举行三次行动。作战计划是分三路进攻。一路从正面攻击，打个快速歼灭；一路从背后堵击，防止他们撤退；剩下的一路迎击中共援军。事成之后，撤退到长白山区，建立武装游

击根据地，只等第三次世界大战到来，就可迎接国军到来！”

“有响货吗？”特派员问。

“当然有。都是香港送来的黄色烈性炸药。明天，我就派人去哈尔滨市郊铁路埋炸药。到时候，炸药一响，把他们的专列打个一塌糊涂，叫他们签订什么中苏友好条约，建立什么反帝联盟，统统见鬼去吧！”说完，马司令嘿嘿一阵冷笑。

特派员点点头，担心地问：“行动计划都有谁知道，他们不会变节吗？”

狡猾的马司令不讲谁知道，因为他对特派员还有点戒心。

特派员要挟地说：“这次行动成功，立刻就发委任状，论功行赏！”

马司令一听，故意不回答第一个问题，而回答第二个问题。他用手比划了一下脖子说：“我手下的人都是一手接派令，一手提头颅的人。我们报效党国，脑袋丢了也不会变节！”

特派员早已明白马司令的意思，便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这次来，就是代表国府发委任状的。你不讲多少人，不讲组织成员都是准，我怎么向上级报告，给你们请功？”

想到发委任状，马司令不由得心花怒放。炸了毛泽东的专列，风云突变，大陆就是国民党的天下，他就是堂堂正正的国军司令。到那时，要女人有女人，要枪有枪。于是他便和盘托出东北技术纵队人员名单：“这是组织成员联络图副本，共170人。”

特派员看了看，将副本装进自己的衣袋，说：“到时，我就按这个单子点名！”

马司令操纵的这个东北技术纵队，是国民党保密局的秘密武装。保密局在全国有三个技术纵队，一队在南京，一队在广州，一队 in 哈尔滨。所有的敌特均经过中美合作所严格的技术训练，都能熟练地掌握射击、爆破、投毒等特工技能。他们是“全五行”的杀人魔王，专门从事重大暗杀、爆破等恐怖活动。解放前，这支人马大部分打入国民党起义部队，经过改编混入人民解放军，另一小部分则散落在社会上，隐蔽下来，伺机行动。

谈话进行了一点一刻钟。

该是收场的时候了。特派员看了看表，对马司令的谈话感到满意。

这时，那个中等个子的人敲了敲门，从外边走进来，把一张纸递给马司令，并很幽默地说：“马司令，你不是准备要委任状吗？我现在就发给你！”

马司令喜出望外，接过来一看，不是委任状，是逮捕证！

特派员笑了，问马司令：“司令先生，还有什么话没说完？”

说着，特派员把眼镜一摘，小胡子一薅，原来是成润之扮演的特派员。

翌日清晨，李克农部长准时来到侦察科现场指挥部云南会馆。

云南会馆这个幽雅、古老的庭院，充满着蓬勃生机：公安部侦察科全体参战人员，以及北京市公安局一队部分侦察员，早在门前列队欢迎。

曹纯之快步向前迎接李克农部长下车。同志们高声说，“首长好！”

李克农部长一边走一边挥手说，“同志们辛苦了！”

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进入客厅后，李克农部长招呼大家一块儿坐下，然后问：“老曹，这就是你的破案指挥所吗？”

曹纯之回答：“是！”

“那从今天起，就不是华北贸易货栈了。”李克农部长幽默地说完，接

着问：“东北的情况如何？”

曹纯之说：“已经来电，一网打尽了！”

李克农部长更加高兴：“老成回来，我亲自给他们接风！”

由于李克农部长平易近人，说话风趣，不少同志又与他见过面，所以都能自动给他倒茶、递烟、送糖，无拘无束，显得很亲热。

高兴之下，曹纯之一时忘了请同志们向李克农部长作自我介绍。

李克农部长指着对面的外线侦察组组长辛立学问曹纯之：“他姓什么？”

“他姓辛。”曹纯之答。

李克农部长用英语风趣地说：“不！”接着用普通话说：“他姓张嘛！”

曹纯之还没有明白李克农部长的意思，只是笑了笑。

李克农部长说：“嗨，他叫张飞嘛！”说完，又指着侦察员任洪友问：“他姓什么？”

曹纯之答：“他姓任。”

李克农部长还是用英语说：“不！”接着用普通话说：“他姓李！”

曹纯之赶紧说：“噢！我明白了，他叫李逵！”大家一听都哈哈大笑。

李克农部长说：“不再问了。如此爽朗的笑声，就是自我介绍了。你们这个队伍的同志，都是智勇过人，立场坚定，胆大心细的好同志！”

同志们纷纷说：“不敢当！”

曹纯之也说：“部长过奖了！”

李克农部长说：“同志们干的好哇！为侦破此案，曹纯之之所以敢立军令状，原来，你们有这么多张飞、李逵保驾呀！”

同志们没有等李克农部长再夸奖下去，辛立学代表大家说：“都是部长亲自领导，我们天天都能听到部长的指示，才打了胜仗！”

“哪里！哪里！我和你们杨副部长，也和你们曹科长天天向我们汇报一样，我们也是天天向党中央、向毛主席汇报。是党中央、毛主席天天在关怀着同志们的工作哟！”

李克农部长的话激起大家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 毛泽东登上归程

午夜过去了，莫斯科沉入了梦乡之中。“当——当——”克里姆林宫钟楼上的大钟钟声又深沉而悠扬地响了起来，宽阔的广场上已没有了人迹，天空中飞扬的雪花仍在静静地飘洒着。广场尽头处那座高耸的石座上竖着一块铁铸的纪念碑，这是纪念罗曼诺王朝帝王亚力山大二世的铁碑。此刻，这座古迹仿佛作为见证人，站在这静悄悄的夜晚里，向历史诉说着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和苏联之间这段不寻常的经历。

在这寂静的深夜，已完成了重大历史使命的周恩来却还没有功夫休息，他在房间里向工作人员一一布置着回国前的事项。他亲自清点带来的礼物清单，其中送给斯大林的是中国绸缎和屏风，其他领导人的也是绸缎刺绣之类的物品。周恩来还特别仔细地检查了分发给所有苏联工作人员、服务人员的礼物，包括没有见过面的人也是一人一份，全都写上了名字。

分发完毕后，周恩来还再三叮嘱工作人员，“不要漏掉了一个人。”

第二天，当这些普普通通的苏联工作人员接到礼品时，好多人禁不住激动得大哭起来了。

启程的日子到来了，2月17日，中国代表团要离开莫斯科回国了。这天早晨，毛泽东早早地起了床，他同往日一样，动手把自己的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又把房间整理了一遍，然后点着了一支烟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把这房里的一切看了看，像是在同它们告别似的。

门轻轻地推开了，打扫卫生的女服务员端着水走了进来，她一见毛泽东早把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了，不由得一阵激动。几乎每天都是这样，毛泽东总是自己收拾房间，这使那些长期在斯大林身边服务的人员感动不已，今天毛泽东要走了，仍然早早起来收拾好了房间，女服务员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她恭恭敬敬地向毛泽东鞠了一躬，不由得哭出了声来。

毛泽东笑着拍拍她的肩头说：“我们要走了，欢迎你到中国来做客哟——”

分别的时刻到来了，苏方全体服务人员全都赶来送行，不少人哭红了眼睛，他们觉得毛泽东和周恩来比起斯大林来，要亲切朴实多了，短短两个来月，中国领导人已和他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莫斯科车站广场上人头攒动，前来送行的苏联同志早就等候在这里了，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来向毛泽东送行，他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斯大林同志让我转告您，请您一定注意保重身体，在路上、在国内都应该保重。此外，保卫工作要做好，千万不能大意，这是斯大林同志再三让我告诉您的。”莫洛托夫说这话时神态很认真，斯大林晚年性格中那种多疑，总感到自己周围有许多幽灵，这种心理状态也影响着像莫洛托夫这样的高级领导人。在他们眼中，权力是神秘的，权力的力量应当使人捉摸不透……

可毛泽东似乎与苏联领导人有很大的不同，他并没有把自身的安全看得多么重要。他握了握莫洛托夫的手，笑着回答：“感谢斯大林同志的关心。也请您转告我对斯大林同志的问候。”

长长的汽笛声划破长空，专列徐徐驶动了，与毛泽东同车返回北京的周恩来等人，从窗口探身向送行的苏联同志挥手告别，人们彼此久久地挥着手，直到列车远去。

阳光从云层中探出了头，洒在大地上，2月的风已有了一丝暖意。车窗外，远处的雪线在慢慢上升着，渐渐显出了一片新绿，人们似乎感到了春天将临……

2月26日，毛泽东和中国党政代表团回到了我国边城满洲里。毛泽东到达满洲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斯大林发出了致谢电，周恩来总理也向维辛斯基外长发了致谢电。



### 第三节 保密局接到暗杀谕令

#### 装有子弹的恐吓信

这是上海解放不久的一天。

上午，陈毅市长刚走进办公室，市政府秘书长神情严峻地跟着推门进来，交给陈毅一封匿名恐吓信，里面还装着一颗子弹。陈毅轻蔑地一笑置之。

几天后，陈毅在给新政府留用的旧人员讲话时提到了这件事，他很坦然地说：“我陈毅千军万马都见过了，还怕你这小小的一颗子弹？！”这以后，倒有两个旧人员交待了他们接受的特务任务。

事实上，台湾的保密局当时已接到国民党最上层人物的谕令：不惜任何代价派遣行动人员潜入上海，采用枪击、爆炸、投毒、撞车等一切手段，达到从肉体上消灭“共匪要员”的目的，第一号目标便是陈毅，此外还有财经委主任曾山和邓颖超，以及在上海的著名民主人士。于是保密局开始往上海派出能干的特务。

#### 毛人凤限期六个月交令

刚解放的上海，国民党残渣余孽到处都有，台湾派来的特务，不愁找不到巢穴和党羽。第一批刺客出发了，由国民党“保密局苏浙特别站”站长封企曾，率亡命匪徒 28 人，分批经舟山潜入了上海。他们带的有美式无声手枪和轻机枪、长短枪支几十支，还有全套电台设备。但是还没等他们下手，28 人便一一被我捉获。

第二批特务紧跟着又潜入上海，为首的叫朱山猿。他们除了枪支电台之外，还带足了美制雷管、黄色炸药、手榴弹及氰化钾之类的剧毒药品。可是不久，第二批特务也落入法网。

台湾的特务机关输红了眼，保密局头子毛人凤亲自组织派遣第三批特务，这回他押上了手中的“大宝”——著名职业刺客刘全德。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特务，他早在 1929 年陈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时，就在红四军某团当特务连连长。1935 年 he 被捕叛变，投在戴笠门下，专事绑架暗杀活动，手段狡猾毒辣。他认识陈毅，便于下手。刘全德领受任务时升任为“保密局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跟美国专家学了最新的特种爆破技术，制订了周密详尽的刺杀计划，行动小组共 6 人。毛人凤下的命令是：限期 6 个月，务必刺杀掉陈毅，震惊中外。并许诺：成功之后刘全德可得黄金 2000 两。

#### 六人小组再次被擒

刘全德这条老狼很快潜入上海。我方公安机关虽得到情报，但在人口几百万的茫茫大上海，搜捕谈何容易？尽管上海市公安局长亲自挂帅侦破此案，刘全德还是在一个大白天，混进了市府大厦，从楼上到楼下，把地形道路都察看了一番。

但是这条老狼感觉并不美妙，好像处处受人盯梢。尤其是很难用钱买到肯卖命的人，他只好暂时深居简出，窥视时机。

11 月 11 日，已经是刘全德潜入上海的第 10 天了。在山西路 7 号住宅门

口，一个推自行车的人有规则地在门上敲了几下，便听见里面问“谁？”

“是我，高香圃。”来人低声答道，“史晓峰先生在家吗？”

门开，高香圃进了屋。可是他定神一看，愣住了。只见满脸凶相的刘全德，正端着手枪迎面而立，叉开两条粗腿，满腹狐疑地打量：“你来干什么？”

原来这高香圃也曾当过国民党小特务，早先在上海跟刘全德打过交道，解放后便投案自首了。今天来看朋友，想不到撞在老狼手里。他知道是轻易走不掉了的。于是装出坦然轻松的样子，寒暄几句后，便坐在摆好的酒菜前与刘全德、史晓峰一起吃酒。从谈话中，高香圃感到刘全德来者不善，史晓峰也与他搅在了一起。

酒过三巡，高香圃便渐渐显得醉眼朦胧，话也不清了，舌头也大了。可是人家仍不放他走。他点燃一根烟含在嘴里抽，暗中却用牙齿咬下一截，嚼碎了强咽下肚里。片刻，便觉肠胃翻动，“哇”地一声吐了一地。刘全德相信他真醉了，看看时间已近半夜，这才将他放走。自己则准备再商议一阵就离开史家。

步态踉跄的高香圃，推着自行车刚出巷口，碰见两个巡逻的解放军战士，忙低声说明情况：“快，跟我来捉特务！”

他领着两个战士，折返史家门口敲门，里面问：“谁？”

“是是——我，我——高香香——圃。”十足一副醉汉腔。里面警觉地问：“怎么又回来了？”仍不开门。

“我他妈的，醉——醉——了，车子骑——骑不上，先放——放——你家。”这样一说，合情合理，门才打开。

门一打开不要紧，高香圃将门一顶，两个战士立即猛扑上去，经过一番紧张格斗，将刘全德和史晓峰双双活捉。

老狼一落网，其余5个特务也很快乖乖就擒。

国民党特务在上海进行刺杀的计划始终没能得逞。

## 第四节 广州第一号暗杀目标

### 惠如楼二位别胸针客人

1950年4月17日，广州。

位于北京路的红棉舞厅惠如楼走进一位港客，他身高约1.7米，从那匀称健壮的身材和洪亮稳重的言谈举止中，可以感到这是一个出身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军人。从外表上看，他与其他茶客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上衣左侧别着一枚回形胸针，在窗前的阳光映照下晃晃闪闪。

片刻，另一位港客也尾随黄氏上了惠如楼。他的胸前也同样别着一枚回形胸针。也许是香港流行这玩意吧？

第二天，两人又在原地方见面了，但这一次，他们的胸针却都去掉了。原来那是接头的暗号。头天首先上楼的人叫黄强武，后者名钟嘉。这次，钟嘉又带来了两个广州人，一个名叫陈星群，一个名叫梁中华。

在茶座上一阵寒暄之后，黄强武即以超人的口才讲起了时局。他从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讲到即将出兵朝鲜，从国民党炸毁海珠桥讲到反攻大陆。最后亮出了底牌，台湾保密局命令：“干掉叶剑英！这是在广州暗杀的第一号目标。”

惠如楼的众多茶客们欢声笑语，谁也不曾想到，他们的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长叶剑英，已经受到了魔爪的威胁。暗杀者认为，他们的阴谋一旦得逞，解放才半年的广州将会人心惶惶、一片混乱。

然而，叶剑英领导下的广州市有关机关，对台湾特务的破坏活动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早在3月份，广州市公安局就连续截获台湾保密局密令其在香港的特务刺探我省市首脑行踪的电报；4月份又接到一份绝密紧急情报——台湾保密局已下令其在香港的特务机关，要求派员前去实施暗杀计划；接着，一封匿名检举信又到了公安局侦察科胡科长手中，信中举报一德路善庆里13号2楼住户陈星群是潜伏特务，还收藏着一批枪支、手榴弹。但经过反复侦察，尚看不出陈氏有什么可疑行动。由于检举信是匿名的，也不好对陈氏实行强制措施。

但暗杀计划已付诸实施：黄强武赶紧搭乘火车回香港汇报，陈星群和梁中华一天到晚缠住“珠江轮”驾驶员，暗杀小组另一名成员郭禄打进了西园酒家当上了厨师。而钟嘉则偷偷溜进公安局……

### 叶剑英导演斩魔小剧

叶剑英市长却像往常一样忙碌地工作着。这一天，他又登上“珠江轮”，前往西郊、黄埔巡视工作，然后到定点酒家西园宴请宾客。——这就是叶剑英的活动规律，特务们经过观察已完全摸透了。

五天后，暗杀方案确定了：第一方案规定特务们乘小汽艇靠近“珠江轮”，用手榴弹及事先安置的定时炸弹将船炸沉；第二方案是，由当上西园酒家厨师的郭禄在宴请宾客的饭菜里施放毒药，同时在座位上安放定时炸弹。假如双管齐下仍不能得手，特务们就在酒家门外向叶剑英扔手榴弹。

接下来，就看叶剑英是先上船还是先上西园酒家了。黄强武从香港再次来到广州进行幕后指挥。暗杀小组的特务们洋洋得意，幻想着大功告成后便

邀功领赏。

就在这时候，广州市公安局干警火速出动，将黄、陈、梁、郭等特务一网打尽，全部逮捕归案。而这一切又都是在叶剑英市长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魔爪伸到他的身边，却被他抓住打断，这是怎么回事呢？

### 钟嘉自首走向光明

原来，早在1950年4月12日午夜，钟嘉便敲开了公安局侦察科的大门，将特务机关派遣他前来暗杀叶剑英的计划如实自首举报。

说来这个钟嘉倒还有一番经历。他从小父母双亡，依靠哥哥扶持，在贫困生活中长大。先在国民大学附中教书，后进入国民党广州警备司令部任职。广州临解放时去了香港。他本来谈不上对共产党有多少了解，但重踏入广州后，看到人民政府的廉明公正、厚朴为民，还有那满街的笑脸和安宁，与国民党统治下的广州比，如同换了人间一般，使他感动，再加之慑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他怀着复杂的心情踏进了公安局。随后，又将功赎罪，继续与特务们演暗杀戏，终于配合我公安机关将特务全部诱入法网。他本人则由此走向光明。

一起重大特务案被破获了，广州的局势更加稳定。

## 第五节 惩治反革命

### 反革命分子活动猖狂

早在 1949 年 4 月 25 日，由毛泽东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布告曾经宣布：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各种人员，除了怙恶不俊的战争罪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并且宣布，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人民政府给予分别录用。同年 7 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论文中指出“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这样的政策，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伟大的人道主义的政策。

党和人民政府实行了这样仁至义尽的政策，使反动阶级和反动派中的许多人认识到，只要服从人民政府，向人民低头认罪，老老实实地劳动，重新作人，就是有前途的。这样就大大地促进了反革命内部的分化瓦解，一部分人向人民投降，部分人发生了动摇。但是，也有一些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拒绝接受共产党的政策，坚持他们的反革命破坏活动。

在解放战争初期，那些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进行了疯狂的破坏活动。他们在若干地区进行骚扰，和人民政府作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特务分子，在人民中散布谣言，企图破坏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企图离间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合作。他们破坏人民经济事业，搜集情报，暗杀革命工作人员。不久以后，美国入侵朝鲜，国内的反革命破坏活动一时极为猖狂。

1950 年 10 月 16 日，中央公安部召开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传达和贯彻中共中央 10 日发出的《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在罗瑞卿主持起草的向毛泽东的报告中，对于敌情作出如下的估计：

朝鲜战争发生以后，反革命分子向我们发动了各种各色的谣言攻势，加紧破坏经济建设，特别是破坏军运，积极策划暗害活动，组织武装暴乱。其原因：

第一、反革命确实很多。除有大批的职业特务之外，无形的反革命力量还到处大量存在。反动党团员、地主、会道门、流散军官、教会和大批的旧公务人员中的落后分子等，或是他们的社会基础，或是他们的活动对象，特别是地主阶级则是反革命可靠的社会基础。

第二、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已经燃烧到我国门，给反革命分子很大鼓励，他们竟认为“黑暗将过，黎明即来”而加紧活动。

第三、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我们在最近一时期内对反革命的活动镇压不够，对反革命“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在党与政府的组织中是严重存在着的。这种右的偏向既损害了人民群众对敌斗争的积极性和勇气，也助长了反革命分子的气焰。这表现在：

（一）破案多，但对罪大恶极怙恶不俊的分子镇压不够。根据公安部的材料，从 1949 年 1 月至今年 8 月，约计捕获特务 25041 名；处死者仅 639 名。检查去年 10 月至今年 9 月所破获的 153 起要案中，有处理报告者仅 10

余起。南京解放以来至今年9月只杀过4个人，青岛解放以来至今年7月只杀过两个反革命分子，福建匪患严重的建瓯县解放以来至今年8月未杀过一人，也足说明镇压不够的严重情况。

(二) 重罪轻判迟判，镇压不及时。如石家庄对“19号”特务机关作恶多端的匪特首要王钧，拖处至三年之久，最近始判死刑，该犯临刑前还在公审大会上喊“国民党万岁”；西安土匪拒捕打死我邮差，西安法院认为系“自卫”，不判死罪；南京土匪拒捕枪杀我公安员，竟按“初犯”理由改死刑为徒刑；××部被我破获的反革命叛变案犯，有人认为是“未遂犯”；反革命俘虏搞叛变，说是我们教育不够；以及不管罪恶大小强调既往不咎等。判决批准手续繁多，华东说最快两三个月，慢的两三年。法院不健全，旧司法人员中有浓厚的旧法律观点，不少的公安干部则有送法院即了事的错误想法，对于结案与判决缺乏坚持与负责到底的态度，我们亦有督促检查不严之责：

(三) 由于镇压不够和不及时的结果，形成此地释放彼处作案，今日释放明日作案，形成大批人犯积压，加上干部产生轻敌麻痹思想，看管不严，今年1月至今发生犯人越狱暴动事件66起，参加犯人1370名，以西北最为严重。

镇压反革命工作取得了成就根据当时的特匪情况，1950年12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了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经过这一运动，基本上肃清了中国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曾经严重一时的匪祸，也基本上被扑灭。

1951年8月3日，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上作了《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

对于反革命残余势力及其破坏活动，采取坚决镇压的方针，乃是中国人民反对美蒋斗争的继续，为中国革命发展所必需，也是中国人民巩固胜利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必要步骤。毛主席再三再四地提醒过我们，要我们不要放松对于反革命残余的警惕，我们的《共同纲领》对此也是规定得很清楚的。

但是，当我们对此认识不够深刻因而缺乏警惕的时候，曾经发生了对待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错误倾向。在将近大半年的时期中，曹因此造成国家和人民的严重损失。仅就我们有4万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在广大新区被反革命分子杀害这一点来看，就是极其痛心的损失。至于去年大半年，反革命气焰嚣张，到处破坏，实在达到了令人难于容忍的程度。因而广大人民不满意我们，在这一点上说我们“不像个人民政府的样子”，是完全有理由的。在毛主席正确方针下，在广大人民的要求和督促下，我们改正了错误，坚决逮捕、处决了大量的反革命分子，因而我们也就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和成绩。

在全国各地已逮捕大量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已被处死刑。在这批首恶分子中，匪首、惯匪占一半；恶霸占三分之一以上；反动会道门头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有恶霸行为）占不足百分之十；特务地下军头子占百分之十几。此外有大批反革命分子已被判处徒刑，另有一大批尚在关押审判中。

罗瑞卿在报告中认为：“这次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按：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5月），是正确的，健康的，一般的没有发生偏差和错误。”“但是，个别的错误与偏向，也不是完全没有的。这主要是在这次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的后期，若干地区工作中，曾有过草率和粗糙的现象，因而在这些地区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也杀了一些可杀可不杀

的反革命分子。对于统一战线中应该照顾的方面亦发生了若干照顾不够的偏向。这些缺点和错误是应当引起重视的，在今后的工作中是不应重复发生的。但这些缺点和错误，仅属于个别的性质，而且大体上都适时纠正了，因此并不影响镇压反革命的总的成绩。”

对于毛泽东领导的镇反运动，站在不同的立场会有迥然不同的看法。占中国人口 80% 以上的平民大众是拥护的。说三道四的主要是国内的右翼势力和国际上的人权主义者。但他们也是有自己立场的。当杨虎城和宋绮云两家 6 口被军统特务杨进兴等在中美合作所杀害的时候，当蒋介石成千上万地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他们并不说话，并不出来保护杨虎城等的人权；当杨进兴被人民政府抓获以后，与像杨进兴那样的手上沾满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鲜血的特务、土匪、恶霸被镇压的时候，他们出来说话，保护杨进兴们的人权了，这些先生的立场能说是公正的吗？！

## 第六节 周恩来万隆之行历险纪实

### 周恩来临时改变行程

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西部，有个著名的度假胜地叫万隆，它坐落在群山环抱的山谷之中，诸峰黛色，幽境迷人。

1955年初，由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和锡兰（现称斯里兰卡）5国总理联合发起在万隆召开亚非会议。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下，由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发起和召开的讨论亚非切身利益有关问题的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除印度等5个发起国的政府首脑外，还有柬埔寨、阿富汗、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菲律宾、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也门等国的政府首脑，新中国也在被邀请之列。

这样一次重要会议，我国当然要出席。经过中共高层的研究，决定派以周恩来为首，陈毅为副团长率代表团出席。

关于出国的途径，先是周恩来提出由香港坐船走海路，那样可以在船上休息两天。经与有关方面的研究，认为走海路不行。因为当时来往于香港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船只，只有荷兰的两只小型商船，一只5000吨，一只3000吨，单程要走一个星期。如蒋介石特务机关派出特务沿途破坏，则安全很难保障。于是便放弃了坐船走海路的设想，改为由香港乘飞机去印度尼西亚。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实行封锁，我们既没有大型飞机可坐，也没有去印度尼西亚的国际航线可用，只能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经与印度航空公司商谈，决定租用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商定，4月11日我代表团乘该机启程时，该机作为正常航班，上午飞抵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于1时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直飞雅加达。

为了保证我国代表团能准时、安全地出席亚非会议，我公安部门还做了代表团由云南昆明乘汽车，经滇缅公路出境到缅甸，然后由缅甸换乘飞机飞雅加达的安排。为此，中央警卫局特派李福坤副局长和伍全奎同志，紧急赴昆明，要求云南省有关部门派专人协助，进行实地勘查，并尽快做好全面的可行性部署。

4月3日，公安部特别就代表团将出席亚非会议通知有关单位的工作人员，要求他们密切监视美国和台湾方面的动静，以保证出席这次亚非会议的代表的安全。

两天后，即4月5日晚上12时，一位从香港返回广州的广东省公安厅侦察人员，专程从广州赶到北京，汇报说：“美国和台湾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已获悉代表团的行踪，他们正策划乘新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恩来及代表团成员，并已分头行动，其行动代号为‘1号’。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有可能出现意料不到的情况！”

第二天凌晨3时，周恩来接到了这个紧急情报。他立刻把公安部的负责人召来，要他们迅速核实情报的准确性，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

凌晨4时，公安部派人与广东省公安厅那位侦察人员一道，紧急飞广州，第二天一早即潜入香港，对这宗惊人情报进行核实。不过，公安部特派员在



香港的活动亦不怎么顺利，所得的情报与广东省公安厅的情报大致相同，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面对这一严峻的情况，是去，还是不去？就成了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工作人员和同事们的劝说，周恩来坦然地说：“蒋介石太蛮了！以为这样就可阻止我前去万隆，当年重庆百万禁军之地毛主席也敢闯进去，难道这小小的威胁就能难倒我吗？”

正当代表团成员全力以赴进行准备之际，周恩来总理接到了缅甸总理吴努发来的电报。电报邀请周总理去万隆参加亚非会前，先在仰光休息两天。并称，届时他将派飞机到昆明来接。经了解，吴努邀请周恩来在仰光休息两天的意图，是想在大会召开前在仰光同几个主要参加国的领导人先碰一下头，研究一下会议的有关问题。

吴努总理对中国领导人如此尊重，周恩来自然欣从。于是，决定代表团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于4月7日先去昆明，待缅甸所派飞机试航成功后（那时我国和缅甸之间尚未通航）再启程去仰光，之后由仰光飞雅加达；另一路，代表团其他成员则按原订计划于4月11日由香港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雅加达。由于敌情复杂、多变，中央决定加派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随周恩来去昆明。

4月7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一行乘车离开中南海，驶向西郊机场。这时，中国民航的伊尔—14飞机已经停在停机坪上，机组人员也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正当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要离开候机室时，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匆匆赶来了，将刚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了总理。这是在代表团出行前我有关部门获得的又一次警报。情报说，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油箱里，以暗害周总理和代表团人员。

据周恩来总理卫士长成元功日后回忆：“对这份重要情报，周总理非常重视，看后当即指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然而遗憾的是，当这样一份重要的情报，转到外交部后，外交部有关领导同志未予重视，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不幸失事4月8日，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乘伊尔—14抵达昆明，此时在北京乍暖还寒，树木还都光秃秃的，而昆明却已到处鲜花盛开，春意融融。代表团成员换上了为这次出国新制作的派力司套装，一个个显得年轻、神气多了。

周恩来在动身来昆明之前，刚做阑尾切除手术，所以北京医院特地派外科主任王励耕陪同来滇，进行护理。此时，到缅甸的航线尚未开通，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便在昆明休息等候。

4月9日，喜讯传来：试航成功了！代表团成员都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由昆明飞仰光，再由仰光飞雅加达了，也省得在滇缅公路乘车受颠簸劳累之苦了。

但周恩来并没有忘记先行到香港的代表团其他同志的安危。就在试航成功的当天晚上9点多钟，周总理打电话给北京，嘱咐邓颖超，说他虽不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走，但先行到达香港的同志要坐，务必转告罗青长同志，将情况查清后，让外交部通报给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请他们务必采取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并要把此情况通报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和

代表团的同志们。据成元功回忆：

邓大姐把总理的电话指示转告给罗青长同志后，罗青长同志便去找外交部部位领导同志。因那天是星期六，那位领导同志要早休息，不办公，罗青长同志只好告诉了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董越千当晚便将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转告给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次日上午，外交部又派西欧司张越于9时半约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向艾惕思通报了有关情况，并告艾惕思：中国记者等11人，将于明天（11日）上午由香港搭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希望英国代办处提请香港当局注意，对他们的安全给予关注。艾惕思当即表示，他将尽快将这一情况转告给香港当局。

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后，在当天晚上就将情况通报给了香港当局。他们怕不落实，次日凌晨1时半，又派专人驰赴印航驻港经理住宅，向印航经理通报了上述情况。印航经理听后，将信将疑，问中方派去的人，“你们的意思是否说有人可能要破坏飞机？”“你们的消息是否有根据？”中方派去的人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当然有可靠的根据，不然，我们就不深夜前来造访了。我们希望贵方能引起注意，一旦出了问题，其后果不堪设想。”印航经理仍然不大相信，他略略沉思了一下说：“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12时到达香港，下午1时即起飞，在香港加油停留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谁敢胆大妄为！”当我方派去的人严正指出“据我们所知，在机场地勤人员中就有人和蒋介石特务分子有联系”之后，印航经理才不得不表示，届时他将派印方工程师对飞机进行检查，而他自己则亲自去机场进行监督。

新华社香港分社觉得印航经理态度勉强，于11日上午10时，再次派人去会见印航经理，提请印航务必严加防范，以防“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出问题。印航经理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港停留之际，绝不允许任何非印航人员接近飞机，就连上食品、加油、押运行李也都由公司派人负责。

至此，可以说万无一失，似乎完全可以放心了。其实不然。

4月11日下午，周总理在昆明接到北京打来的第一个电话还没什么，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已从香港启德机场按时起飞，未发生任何问题。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我们在昆明的代表团成员，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终于安全地离开了香港。但到了下午6点左右，北京打来了第二个电话情况就有些不妙了。电话说，已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去了通讯联系，有家通讯社报道，说在南海上空曾听到有大的爆炸声，不知是不是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有关。接到这个电话，大家放下了的心登时又提了起来。周总理更是十分关注，他立即指示北京，要迅速与有关方面取得联系，查明情况。如飞机确系失事，要敦促有关方面火速进行救援，寻找失事人员。这天大家连晚饭都没有吃好。晚上，北京又打来第三次电话，这次电话，进一步证实了“克什米尔公主

号”飞机确已失事。有家通讯社报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起飞后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坠于南海，机上人员全部失踪。有的通讯社还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失事前，曾两次发生紧急呼救信号。接到这个电话，大家就像有一块铅压在心头。从总理到每一个在昆明的代表团成员和省领导同志，无不感到十分悲愤，既对因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代表团成员惨遭不幸而悲痛，又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

对我代表团成员横下毒手异常气愤。同时也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的阴谋能够得逞，而迷惑不解，不知道问题是出自香港加油时国民党特务搞的破坏，还是出自印航本身。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由于接受了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准备乘缅方所派飞机去仰光参加亚非几个主要国家领导人的碰头会，而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

否则，其后果不堪设想。

## 两次意外事件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的消息传开之后，不仅给中国代表团每一个成员的心头笼罩上了一片乌云，个个心情沉重，就连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其他亚非国家的代表，也都惴惴不安。特别是东道国印度尼西亚，更加紧张、忙碌，生怕在哪个地方出现闪失，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因为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这次会议就像一线曙光，使亚非人民看到了和平的希望。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却非常忌恨这次会议，早在这次会议发起之时，他们就曾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会议决定召开之后，他们又想方设法进行破坏，企图使这次会议流产。

中国代表团警卫人员也很紧张。据了解，美国虽然并不参加会议，但它却派出了一个由70多人组成的庞大的“记者团”。在这个“记者团”中不仅有在朝鲜板门店谈判和日内瓦谈判时活动了很久的间谍，而且还有什么议员、警察、军人、使馆职员、公司雇员及从香港、台北等地调来的职业特务。此外，在印度尼西亚国内离万隆几十公里还有一支反动武装，也制定了阴谋袭击亚非会议的计划。蒋介石集团的阴谋活动，也不单是针对“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据了解1954年被印度尼西亚驱逐出境的蒋介石集团的头目章勋义、郑义春、吴扬明等人，这时不但潜回了万隆，而且召集其在印度尼西亚的特务骨干开会、筹款，并布置了破坏行动。蒋介石集团在雅加达的基干组成的“铁血团”，秘密策划派遣行动小组去万隆。

周恩来这次出行，警卫人员没带多少，随身警卫只有何谦和成元功两个人。人手本来就紧张，可是行船又遇顶头风。在去仰光之前，总理的警卫秘书何谦阑尾炎突然发作，被送进了医院，成元功为此十分着急。为了确保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党中央于4月11日晚开会，决定派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以代表团顾问的身份随团去印度尼西亚，全权负责会议期间周恩来和代表团其他成员的安全警卫及情报工作，并增派警卫局李福坤副局长代何谦出国作为总理的随身警卫。

根据这一决定，外交部很快给杨奇清和李福坤办了护照，并派人专程送到昆明。可是制服已来不及了，李福坤只好穿用何谦的行装。此外，空军也派人以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名义同机去印度尼西亚，以负责飞机的安全。

对周恩来的安全，邓颖超也很惦念，她从北京来信表示关切。周恩来却安之若素。他一方面安慰代表团的成员和昆明的党政军领导，对他们说：“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一方面于4月12日晚复信给邓颖超，说：“你的来信收阅，感谢你的谏言。有这一次的教训（指“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集

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

临行前，周恩来针对已经发生的问题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开了个动员会，提请代表团每一个成员都要提高警惕，加强组织纪律性。为了使飞机多带一点汽油，周恩来还要求大家尽量少带行李，每次行动都要对自己的行李自行负责，严格检查；并要求不准给任何人随机捎带东西……

4月13日晚，周恩来又找留在昆明的人员谈话，进行安抚，随后又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何谦昨日忽患慢性阑尾炎，今日似转为亚急性，决留昆请王大夫于明早动手术，由伍全奎陪他，望告林玉华（何谦同志的爱人）放心。现由李福坤代何出国。附上云大学生来信和戏单各二纸，俾知我们在昆明的生活一斑。”

4月14日晨7时15分，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和陈毅率代表团按原计划乘印度空军空中霸王号飞机从昆明起飞，迎着南方的暑热，踏上了飞往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的行程。“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一再讲安全第一，这次上飞机后，因飞机多带了1000加仑汽油，周恩来又亲自宣布了一条纪律，即在飞机上不准吸烟。

中午12时（当地时间为10时30分）空中霸王号飞抵仰光。周恩来、陈毅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下飞机后便住进了总统府。

下午，当地时间3点30分，周恩来、陈毅和浦寿昌去吴努官邸拜会吴努总理，成元功和李福坤随行。吴努总理将周恩来、陈毅迎进客厅，成元功和李福坤则一面在院子里等，一面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大约5点左右，一名服务员用盘子端着几件衣服走来，向成元功和李福坤打手势，意思是要把衣服交给他们。成、李两人一看是周恩来、陈毅和浦寿昌的衣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不由大吃一惊。他们想问一下服务员，但又语言不通。怎么办？只有进去看看再说。他们用手势告诉服务员让他把衣服送到车上，便快步向客厅冲去。一进门，只见周恩来、陈毅副总理、吴努总理、奈温将军和浦寿昌都换上了缅甸民族服装，正谈笑风生地起身往外走。浦寿昌把情况一说，成、李两人才知道是吴努总理让周恩来、陈毅、浦寿昌换了衣服去参加泼水节。虚惊一场，一块石头落了地。

每年4月14日为缅甸的泼水节，即缅甸的新年，一连三天，盛况空前，颇有点像中国的春。中国代表团抵达缅甸当天，恰恰正值泼水节，在仰光大街上到处可以见到用竹木树枝搭起的彩棚，棚前摆着贮满清水的大缸和桌椅，旁边开着消防水龙头，自来水不住哗哗往外流。不时有男女青年坐着汽车来到彩棚处，互相往身上泼水，打水仗。据说互相泼水，可以洗净身上一年之过错。所以他们便以互相泼水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成元功和李福坤唯恐周恩来和陈毅有闪失，便紧紧跟随在身边，不离左右。

周恩来一行一共参加了5个彩棚的泼水仪式。开始，可能因为他们是贵宾，群众还比较受约束，他们只是用小碗向中国客人身上泼，或用树枝沾上水向他们身上洒，后来在吴努总理的带领下，群众不再用小碗和树枝了，而是用盆和桶，嬉笑着大盆大桶地向中国客人身上泼来，还有的干脆提起他们的衣领往衣服里边灌。中国客人也不再客气了，便把对方的盆和桶抢过来向对方回敬，以致把许多妇女脸上的脂粉都冲得一道一道的。尽管如此，她们谁也不嗔怪。5个彩棚的泼水仪式下来，周恩来一行每个人的身上都被泼得水淋淋的。尤其是成元功和李福坤，由于没有换缅甸民族服装，浑身上下湿

得就像个落汤鸡，新做的中山装被泼得变了形，干后皱皱巴巴再也无法穿了，只好另换一身。

开始，成元功和李福坤对周恩来和陈毅去参加泼水节很担着一份心，因为彩棚那里人很多，难免鱼龙混杂，弄不好就会出岔子，后来才知道，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中国客人所去的5个彩棚，全都是吴努总理特意安排的，向他们泼水的群众不是缅甸的政府官员的眷属，就是他们的子女。

### 新加坡机场出现台湾特务

为了等待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到来和举行印、缅、埃四国政府首脑会谈，15日中国代表团在仰光又停留了一天，到16日凌晨1时过10分（北京时间2时40分），才从仰光直飞雅加达。

本来起飞时间是凌晨3点，但机组考虑到，飞机小，时速慢，建议把起飞时间提前两小时。周恩来同意机组的建议。为了保证安全，周恩来还指示：无关人员不得接近飞机；乘机人员所带行李要严格检查，并由专人负责押送机场，经机组检查同意后再上飞机；送行人员一律停在距飞机50米以外。周恩来身体力行，他与吴努总理、奈温将军的告别，也是在50米以外。

空中霸王号起飞后，大家便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有的由于连日劳累干脆进入了梦乡。

空中霸王号大约飞行了8个小时，进入了新加坡空域，不料正赶上航线前方有雷雨区。由于空中霸王号是印度空军所属的一种双引擎无密封的小型飞机，时速仅为360多公里，不能超高空飞行，无法飞越雷雨区，机长要求在新加坡机场降落，待雷雨过后再继续飞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考虑到周恩来、陈毅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只能应允，除此而外，别无选择，于是成元功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同意在新加坡机场作短暂停留后，机组人员立即通过无线电话与新加坡机场进行联系。

当时中国与新加坡在外交上虽然没有关系，但新加坡机场的老板却很热情。在他得悉是中国的包机，而且是周恩来的专机后，立即与英国驻马来西亚的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取得了联系，并在空中霸王号着陆后，亲自登机邀请周恩来、陈毅和代表团成员，到机场贵宾候机室休息。

考虑到安全，周恩来、陈毅只带了廖承志、李福坤等人去机场贵宾候机室。代表团其他成员除两名下机看守飞机外，其余一律留在飞机上。

麦克唐纳系英国工党首任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儿子。他早就想见一见中国这位杰出的总理，听说周恩来的座机将在新加坡降落，立即赶到机场贵宾候机室。

成元功和李福坤随周恩来和陈毅等人，在机场老板的陪同下，走到贵宾候机室。在门口碰上了两个中国人，一个30多岁，一个40多岁，两个人微笑着直向他们招手。成元功以为他们是新加坡人，因为新加坡人也都是黑头发、黄皮肤、鼻梁低低的。他们冲中国代表团招手、微笑，显然是友好的表示，所以也就未加在意。谁知廖承志认识他们。一进接待室的门，他就把成元功和李福坤拽到一边，悄悄地对他们说：“那两个人是蒋介石的特务，我认得的，你们要特别注意。”廖承志当时主管侨务工作，在去香港时常被国民党特务跟踪，所以认识一些蒋介石的特务。成、李两人一听那两个家伙是蒋介石的特务，当下就急了。又一看那两个家伙正站在窗外，并未离开。李

福坤同志忙对成元功说：“你在里边盯着点，我到外边去。”接着他便匆匆向门外走去。当时成也很紧张。不知这两个家伙是和中国代表团不期而遇，偶然碰到一起的，还是他们已经获悉了击恩来的行踪有备而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已使中国代表团失去了 11 位同志，教训是深刻的，绝不能再让这样的事情重演。机场老板和英国驻马亚西亚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倒是彬彬有礼，他们亲自给周恩来、陈毅和廖承志等人拿点心、递饮料，边吃边谈。这时，中国客人们都有点饿了，在主人的殷勤招待下他们饱餐了一顿。但李福坤守在外边，成元功又不便去招呼他。因为那两个家伙一直站在窗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警卫人员只能坚守岗位，提高警惕，保证首长的安全，而绝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否则就是失职。

两个小时过去了，直到广播喇叭中传出飞机可以起飞的声音时，那两个家伙才匆匆离去，李福坤才回到接待室来。成元功赶快拿了些点心和冷饮，递给他。

下午 2 点 45 分，麦克唐纳和机场老板，把周恩来和陈毅等送到空中霸王号飞机跟前，彼此友好地道别。空中霸王号飞机离开停机坪腾空而起，继续飞行。此时雷雨已经过去，天空虽然依旧白云片片，但已不再妨碍空中飞行了。

飞机又飞行了三个钟头，于下午 5 点 30 分到达了雅加达玛腰兰机场。机场上警戒森严，岗哨林立，密密层层欢迎的人们都站在警戒线以外。看到欢迎的人群，代表团成员不由又想起了那 11 位同志。他们本应该是先到达这里的，也应该到机场来迎接周恩来的，可现在却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也见不到他们的音容笑貌了，每个人心里总感到沉甸甸的。

周恩来和陈毅等一行走下舷梯后，受到了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纳约和中国大使黄镇的欢迎。

大使馆从安全考虑，为了转移视线，同时准备了三辆同样的汽车，每辆车上都挂上了中国国旗，杨奇清副部长和黄镇大使研究和安排了乘车的顺序：由大使夫人乘第一辆车先行，周恩来和大使乘第二辆，陈毅副总理乘第三辆。

车队进入雅加达市区时，受到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华侨的热烈欢迎，人们手持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国旗和周恩来的肖像，以及各色彩旗，高呼口号，热烈欢迎新中国使者的到来，结果第一辆车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但也有少数坏人混在群众中起哄捣乱。

当晚周恩来和陈毅等一行住进了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我们紧张了一天的心，才松弛下来。

### 一个反正暗杀队员的检举

4 月 17 日上午 10 时，周恩来和陈毅一行，乘飞机离开雅加达，前往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万隆，并住进了达门沙里路 10 号，当地华侨的一栋别墅里。

亚非会议定于 4 月 18 日正式开幕。

开幕后的第二天，吃罢午饭，黄镇大使、杨奇清副部长，还有陈家康等几个同志，正在住地的临时休息室（天井）闲聊，大使馆的人开车赶来，交给了黄镇大使一份特急件。黄镇大使拆开一看，吃了一惊，随手递给了杨奇

清副部长。杨奇清副部长一看，也不由地一惊，然后又把它传给了陈家康等几个同志。陈家康等几个同志看后，也很紧张。

原来这份急件，是一个觉悟了的暗杀队队员写给大使馆的一封告密信。信中称：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于3月初，奉蒋介石之命组织了28个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对到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采取谋杀行动。并称，暗杀队已于3月10日在红溪组成，成员均系国民党逃亡在印尼的中下级军官。他们不但每人从美国使馆领到无声手枪一支，而且领到印尼市20万盾。事成之后，每人加发20万盾，打中周恩来的加发40万盾。

中国代表团一到雅加达，就看到了这样的消息：对这次亚非会议，美国不但派出了一个庞大的“记者团”，而且其特务机关还指使蒋介石在印度尼西亚的恐怖组织“铁血团”，和印度尼西亚的武装匪徒相勾结，准备在亚非会议开会期间发动骚乱和暗杀。还有消息说，蒋介石集团已派毛人凤、李朴生、林维栋等人，赶来印度尼西亚，并匿居于雅加达与万隆之间的苏加武眉地区，以指挥其对亚非会议的破坏活动。这封来信，再次证实了上述消息并非子虚乌有，而是实有其事。

有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教训，当然不能掉以轻心，让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特务机关的阴谋再次得逞。当下，黄镇大使、杨奇清副部长和警卫组研究了一个意见，这就是写一个备忘录，递交印度尼西亚政府。备忘录起草出来之后，先送陈毅，他看后气愤地说，他们还要搞暗杀！又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完全同意，并说：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完全由印度尼西亚政府负责，要他们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大会的顺利进行。

之后，代表团内部又召开了个紧急动员会。会上，陈毅要求每一个代表团成员，人人都要对总理的安全负责，并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接着杨奇清副部长对总理的警卫工作做了进一步的部署。如有一次周恩来参加一项活动，要经过一个复杂地段，杨奇清便指定申健、康矛召两人在周恩来前边走，他说：你们是外交官，能听懂外语，身高体壮，万一有情况你们也能挡一挡。

同时，警卫组还对印度尼西亚政府派来的警卫人员做了工作，由杨奇清副部长出面，代表周恩来、陈毅请他们吃中国饭，向他们送纪念品，并根据情况对他们的生活给予照顾。工作上也给规定了几条，明确随身副官和司机可同代表团工作人员一起用餐；周恩来乘用的汽车，在任务完后不得离开代表团驻地。至于其他警卫人员，除白天按大会确定的日程布置工作外，还给他们搭了专供休息用的棚子，并给予烟、茶招待，这样一来，他们都很受感动。其中的安全官和老司机曾对警卫组人员说：我们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平易近人的伟大人物，我们一定为中国代表团服好务。

此外，警卫组在要求使馆做好代表团的服务工作和安全工作的同时，还要求使馆组织当地的进步华侨、新闻记者和友好人士，帮助代表团加强防范。事后证实，他们都很努力，其中以华侨为代表的安全和服务工作做得尤为出色。

印度尼西亚当局接到中方的备忘录之后，非常重视。他们不但要求万隆所在地的第三军区加强对万隆的外围警戒，还从外地抽调了三个步兵营来万隆，以对付蓄意在亚非会议期间进行捣乱破坏的反动武装，并在万隆市内集中了2000多名警察，以及从爪哇省调来不少警察便衣，还采取了收缴民间枪支、颁发居民身份证、划定会议期间的戒严区域和行车路线戒严等措施。据

说对秘密暗杀队所有成员还进行了临时性拘留。对周恩来，他们也加强了随身警卫和现场警卫。他们专派了一名陆军上尉作为周恩来的安全副官，5名警察作为随卫。周恩来外出，除有两辆摩托车开路外，还加派了一至二辆宪兵吉普车随卫。对代表团驻地，特地派了8名宪兵和8名机动警察、3名便衣进行警卫。至于周恩来座车的司机，则是专门从运输公司挑来的。这是个50来岁的小老头，据使馆的人员说，听说给周恩来开车，当时有4个司机都争着要来，没办法，只好让他们抓阄，结果小老头运气好抓到了。他喜出望外。不但把车开得又平又稳，而且一停下来就擦车，把车擦得锃明瓦亮，纤尘不染。

## 周恩来倾倒万隆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在当年1月份就对万隆会议做出如下断言：

这次会议的前途肯定是……在概念上有历史意义，在行动上就有疑问了。几乎所有的参加国都是不会满意的……会上有这么多不同的调子要唱，不几得会得到普遍的赞扬，认为这次会议会有肯定的结果，未免太冒失。

但是会议的结果证明，那些以为亚非国家没有人叫口令就不会协调自己的行动的人是打错了算盘。正如苏加诺总统在开幕词中所说的，“我们之间是有差异的，但是只要希望一致，多样化又有什么害处呢？”“我们是由比表面上使我们分裂的东西更重要的东西联合起来的。”

当然，亚非会议经历过曲折，经历过风暴，经历过令人揪心的时刻。不论在会内还是会外，会前还是会后，始终可以感觉到有一股力量，想利用与会国之间的分歧挑起一场争论，使会议无结果而散。

事实上，从4月18日大会开始，争论就渐渐激烈，一直到第二天下午4点多钟，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登台发言，紧张的气氛才突然缓和下来，凡是参加过万隆会议的人大概都忘不了这个转折。

事情的起因是，在两天的全体会议上，有几位代表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同殖民主义一样的祸害，同时毫不留情地攻击另外一些亚非国家奉行中立主义，因而酿成了被许多人认为会议已难于避免分裂的危机。

就在公布的全体会议临近结束的紧要关头，周恩来登上了讲台。他在说明他决定把原来准备好的讲稿散发、现在只作一个简短的补充发言以后，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代表团是来寻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陡然之间，人们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全场鸦雀无声，屏息倾听。周恩来接着发挥了现在已经是人们熟知的命题：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

周恩来心平气和地针对一些代表对共产主义、共产党人和中国的误解作了解释。他说，在第二次大战后，新兴的亚非国家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但是并不是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他说：“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不同的见解。”周恩来宣布，为了不想使会议陷入争论，中国决定不在会上提出关于台湾地区的局势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问题，虽然中国的要求完全是正义的。



这篇不到 5000 字的即席讲话，找不到雄辩滔滔的外交辞令，有的只是一片谋求团结的赤诚。如果说发起会议的科伦坡国家在为亚非会议制定的目的中已经表达了要求大家越过歧异而寻找共同点的希望和祝愿的话，那么，周恩来就是以自己的言行树立了求同存异的实例。

万隆会议的第一次风波就这样平息了。大会顺利地转入秘密举行的三个小组委员会。然而在从 4 月 20 日开始的政治委员会，也就是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风波又起来了，根子还是先前那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实行中立主义和同共产主义共处；一种观点反对同共产主义共处。双方相持不下，以致又有人得出了会议已不可能达成协议的结论。

终于，又是到了最后一天（4 月 23 日），成为争论中心而又从不介入争论的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总理周恩来，发表了某些代表所说的“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

讲话最中心的几句是：“虽然我们信奉的意识形态和承担的国际义务不同，但是我们的目的都应当是发现和维持世界和平和进行合作的基础。有人不喜欢‘共处’这个词儿；那好，我们可以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这个词儿。”

障碍消除了。就在中国提案的基础上，政治委员会通过了《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

什么是和平共处的真谛？什么是求同存异的真谛？这就是。

这就是万隆精神。正是这样的精神使万隆会议开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议，一个被菲律宾外交部长罗慕洛称之为“罕见的理性和尊严的会议”。通过大会、小组委员会和不计其数的会外交往，长期被隔绝和被分离的亚非国家第一次进行了接触，打开了正式建交和互助合作的道路。许多人来时素昧平生，去时已成知交，许多人带着误解而来，带着友谊回去。周恩来总理同纳赛尔总统和西哈努克亲王的相识就是这样的例子。

万隆精神表现在会场内，也表现在会场外。

会议期间发生的最大的会外新闻是，周恩来提出了同美国就解决台湾争端举行会谈的建议。

在 4 月 19 日的补充发言里，周恩来曾经提到：“本来，对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谋求解决的议案。……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4 月 23 日，周恩来在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寓所举行的午餐会上，当着聚集在那里的 8 国代表团团长的面发表了下面的声明：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用罗慕洛的话说：“这三句话的声明震动了会议”。云集万隆的各国记者都抢着发这条特大新闻。各国代表团团长也纷纷发表谈话表示欢迎。

会议期间发生的另外一条重要的会外新闻，是 4 月 22 日早晨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和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纳约签署了两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这个条约不仅解决了中印（尼）两国之间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而且表示了中国愿意同一切有所谓“海外华人”的东南亚国家解决同样问题的愿望。中国以实际行动回答了会上某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示的对中国的误解与疑惧。

罗慕洛在 1956 年写的《万隆会议的意义》这本书中曾引用过希腊哲学家的一句名言：“历史就是哲学用以施教的实例”。万隆会议正是求同存异的智慧启示世人如何为和平解决争端、团结谋求进步的一个最好的实例。

在闭幕式上，亚非会议的主席、印度尼西亚总理是这样结束他的闭幕辞的：“愿我们在我们已经共同采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并且愿万隆会议成为指引亚洲和非洲前进的灯塔。”

周恩来的魅力在万隆会议上再次为众人所倾倒，一位记者写道：“周需要做的一切是站在原地，伸开双手等着，而他们就会向他走来。”一位出席会议的亲西方代表承认：“我一如既往，强烈反对共产主义，但我相信这个人。”

这种势头保持下来了。5 月，周恩来声明中国愿意尽可能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8 月，与美国的第一次大使级会谈开始在日内瓦举行，双方在解决朝鲜战争时间的相互不信任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展。亚洲的来访者开始几乎是不停地到中国来了，开始是 1955 年 5 月印度尼西亚总理的来访，紧接着是柬埔寨、老挝。尼泊尔、缅甸和巴基斯坦的领导人相继访问中国，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加强。

不久，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以及柬埔寨、伊拉克先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国外交喜结硕果。

## 最后的胜利

尽管印度尼西亚政府、中国代表团内部，以及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为保证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成元功和李福坤等人，弦仍然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麻痹大意。成元功和李福坤所带的手枪子弹都是上了膛的。每逢随周恩来离开驻地到独立大厦或红白旗大厦开会，或是去拜会其他代表团，或是应邀去出席其他代表团的宴会，成、李两人总是紧紧跟随在周恩来的身后，情况复杂时，他们则干脆把周恩来包在中间。由于大使馆给他们办的身份证同会议代表一样，不论什么场合他们都可以进去参加，这对警卫工作帮助很大。

周恩来并不轻松，既要参加会议，应付来自帝国主义仆从国家的代表提出的各种挑衅，又要在一些代表团之间做工作，求同存异，还要广交朋友，进行一些必要的应酬。此外，还要过问代表团成员的饮食起居以及安全，包括对印度尼西亚当局派来的安全服务人员的关怀。别的不说，单从 4 月 24 日亚非会议闭幕的那一天的活动安排，就足以看出周恩来紧张到了何种程度。那天，本来预定上午 8 时开会，只要团长会议通过一下“殖民主义问题”和“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两个小组所起草的文件，就举行闭幕式。那天周恩来连早饭都没吃，说等闭幕式完了回来再吃，就坐车到会场上去了。谁知赶到会场之后，两个小组在文件起草上出现了争执。在殖民主义问题上，有些国家的代表坚持要把所谓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所谓的“渗透和颠覆性的国际学说”写进去，而在军事集团问题上，又不同意仅写“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双方争来争去，从上午 8 点一直争到下午 6 点半（中午休息半小时，大家在酒吧间吃了一点点心），在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下，才打破了僵局，达成了协议。关于殖民主义问题，会议拒绝了那种据所谓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所谓

的“渗透和颠覆性的国际学说”的提法，改成了“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都是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宣布会议支持所有这种（遭受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的）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事业；要求有关国家给予这种人民以自由和独立”。关于军事集团问题，在“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之后，又加上了一句：“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达成协议后，于下午6点35分，接着召开全体会议，直到晚上9点半全体会议才闭幕。会议闭幕后，周恩来和陈毅又去出席老挝代表团的酒会和亚非会议五个发起国的宴会。周恩来和陈毅回到达门沙里路华侨别墅驻地，已经是晚上11点了。周恩来略略休息了一会，11点半，又在驻地会见了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谈了有关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炸事件的问题。零点30分又会见了越南总理范文同，直到早晨5点，周恩来这才上床休息。但也只能休息两个多小时，因为第二天上午8时还要会见日本代表高崎达之助，10时会见印度代表梅农，11时半出席华侨招待会并讲话。

这次会议，在周恩来总理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代表的努力下，不但开成了一个一致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团结的大会，大会宣言中所提出的十条基本上反映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而且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有个国家的代表，当时对我国表现并不友好，在会上也没有什么好作用。最后却说：“只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周恩来先生这样伟大的人才”，“我们就要离开万隆了，除了你周恩来一人之外，我们都犯了错误。万隆会议闭幕了，但周恩来的旗帜将永远在万隆飘扬。”

7天的亚非会议终于结束了，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坚持求同存异、协调一致的原则，为这次会议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这7天的会议中，最忙的是周恩来，据不完全统计，在这7天中，他共参加各种会议16次，会客约谈10次，参加各种宴请活动15次。此外，还要参加代表团内部的活动。批阅文件和亲自起草电报等。睡眠最少的也是周恩来，他每天白天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晚上办公，有两天只能和衣在床上睡个把小时，当时成元功曾对他的睡眠做过统计，7天他共睡13个多小时的觉。

从万隆回到云南昆明后，一天在驻地的院子里散步，周恩来对成元功说：“这次出去很紧张，比较忙，睡觉少一些，休息几天就补上了。大姐（指邓颖超大姐）身体不好，不要对她讲，免得她担心。”周恩来的嘱托在成元功心底埋了22年，直到1977年春天他才告诉邓颖超。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调查结果亚非会议虽然结束了，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4月11日，中国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发生后，4月15日，周恩来在仰光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时，就向尼赫鲁建议由印度派一名官员，去香港调查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尼赫鲁果然派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作为私人代表，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在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也接见了这位代表，并商谈和安排了有关调查处理事宜。回京后，于5月9日和5月15日又两次约见英国驻华代办社维廉，最后确定由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和我方熊向晖，去香港与港英当局共同调查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经过尖锐的斗争，港英当局才不得不于18日晚开始逮捕蒋介石集团的特务人员。从5月18日至6月1

日，他们先后传讯了 88 人，其中拘留了 19 人，以后又逮捕了与蒋介石有关系的人员 8 名。经过审讯和调查，终于证实，“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是蒋记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策划的，其目的在于暗害周恩来总理。其主使人为周斌成；直接指挥的是金键夫；参与策划的有沈齐平；直接执行的是周驹。周驹原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的清洁工，住九龙太子道公共汽车站附近。定时炸弹是由“四川”号轮船海员张祖顺从基隆港秘密运到香港，经蒋记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特务李益民，交给另一特务而后又转交给周驹的。周驹将定时炸弹伪装成西药带进机场，乘打扫卫生之际，溜到“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到了飞机的右翼轮舱附近。当天中午 12 时 15 分，飞机飞离启德机场，下午 6 时 30 分，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 100 海里处上空爆炸，机上除了领航员帕塔克、工程师卡尼克和副驾驶员狄克西特三人遇救外，乘客和机组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周驹安放定时炸弹得逞后，未等下工，即从铁丝网下爬出机场，乘特务接应的汽车溜回家中。在家躲了几天，而后于 5 月 18 日，即印中调查人员到达香港的当天，乘美国人陈纳德的民航班机，逃到了台湾。

真相大白之后，港英当局本应将周驹引渡回香港，连同其他罪犯一并送上法庭，听从审判，但港英当局竟置我国政府的一再交涉和抗议于不顾，声称香港与台湾没有引渡条约，不但没有将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而且借口证据不足，先后将全部拘留人犯，其中包括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驱逐到台湾。至此，这一震惊世界的案件，实际上不了了之，不能不令人深表遗憾。

### 台刊披露空难真相

然而，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发生 40 年以后，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张平宜专访该案的主要当事人，当年任职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总算打破了台湾的“沉默”，首度揭开尘封 40 年的情报黑幕，抖出“克什米尔公主号”暗杀周恩来的始末。

《中国时报》周刊第 171 期刊登了张平宜题为《专访谷正文谈筹划谋杀周恩来始末》文章。该文说：

1955 年，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召开前，台湾情报人员获悉，周恩来将率中共代表团，包租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雅加达开会，由于专机会在香港短暂停留加油，所以台湾特务，决定趁此炸机干掉周恩来。

当时，这件暗杀行动的两执行者，一位叫周斌成，是保密局敌后部置组组长，此人沉默寡言，工于心计，是戴笠得意的学生之一；另一位则是组员陈鸿举，两人都是台湾派到香港从事敌后颠覆的特务人员。

两人全盘计划是这样的：找人到“克什米尔公主号”放炸弹，时间一到，炸弹爆炸，自然什么都炸得灰飞烟灭，包括所有乘客及犯罪证据。

计划中，放炸弹的人将是关键人物。问题是谁将执行这个任务？找个陌生脸孔的国民党特务，恐怕混不过机场严密的检查，最好是机场工作人员，尤其是能接近飞机，又不引人注意的“小角色”，周、陈两人在机场勘查一阵过后，终于找到心目中理想人选一小郑。

小郑是香港人，本名叫周驹，他原是香港启德机场的清洁工，才 20 来岁，未婚无家累，只有一位嗜赌如命的父亲，此外，小郑个子瘦小，长相普通，

在机场打扫清洁，鲜少引人注目。

在港市 60 万的重赏下，小郑“勇敢”接下暗杀周恩来的危险任务。

计划大致底定后，周斌成与陈鸿举两人特地从香港赶回来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口头报告”，毛人凤一听觉得“大有可为”，因为本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就一直不断在积极谋划暗杀周恩来的举动，但始终没有付诸实行，正好周斌成此时提出了炸毁周恩来的专机计划尽管毛人凤觉得计划可行，可是周、陈两人却不敢向毛人凤提起 60 万港市酬劳的事情，怕金额过高，遭毛反对，最后，两人决定央请当时有“地下局长”之称的谷正文，请他出马为 60 万港市代为通融。

谷正文详听计划始末后立刻赞成，他的理由有三：一是，暗杀中共领导人，本来就是特务工作之一；二是，想藉此给香港政府压力，因为在此之前，香港对我情报人员不太客气，抓到老是判重刑；三是这个计划大漂亮了，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谷正文并建议周、陈两人，最好前一天，能带小郑住旅馆，并将他的爸爸一起找来，免得小郑临阵退缩，坏了整个计划。

4 月 10 日，周、陈两人从台湾带着 60 万港市利用货船偷渡至香港，与小郑住进旅馆，将现金交给小郑的父亲保管。当晚，台湾特务除了交给小郑炸药外，同时还教他如何使用，并就计划细节，反复进行沟通演练。

4 月 11 日，小郑跟往常一样上班去了，“平安无事”地通过工作人员例行检查。

小郑的炸药是如何通过检查的？原来，台湾人员交给他的炸药，叫做 TNT，这是一种高科技的产品，一直由美国中情局提供台湾情报网使用。这一次，为了应付机场的安检，特别做成牙膏模样，装进牙膏里，而简易的洗盥用具，机场工作人员是被允许带入的。

就这样，小郑带着 TNT 成功闯关。

4 月 11 日早晨，小郑负责 3 架飞机的清洁工作，其中包括来加油、作短暂停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他神色自若地跟着一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东打扫，西打扫，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何时钻进行李舱装了定时炸弹，又何时失踪。

失踪的小郑，是躲到飞虎将军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里，随时等待飞往台湾。

看起来貌不惊人的小郑，其实挺精灵的，当初与台湾特务在研拟退路时，他就提出一套逃生计划，躲到飞虎将军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内，因为这架飞机经常来往于港台间，最方便不过了，至于如何搭上便机，个子瘦小的小郑，决定缩在飞机的机轮间，因为一般人想不到那么狭小的空间，竟能藏人。

当天，一切都在神不知鬼不觉中进行，小郑也顺利躲入陈纳德的民用飞机内，以后，倒是发生一段意外的插曲，差点叫小郑曝了光……。

那就是陈纳德的民用飞机，在小郑躲进去后不久就起飞了，不久，从启德机场降落在台湾松山机场，由于飞机降落后，突然跳下一个人，当场引起一阵骚动。

飞机上跳下一个人，当时保安司令部在机场设有一个联合检查处，由一位姓赵的上校统筹管理，他以为来了一个“偷渡客”，吓得鸡飞狗跳，一通电话打到保安司令部。

还来不及吃中饭的谷正文在获知小郑提前到来后，立刻带了两个人，坐吉普车直到机场接人。

到机场时，赵姓上校，不让谷正文带走小郑，一直嚷嚷，即使从飞机上“跳”下来，还是违法，只要违法，一定严办。

看着不明就里的赵上校吵闹不休，谷正文担心惊动了媒体，最重要的是“克什米尔公主号”尚未起飞，小郑绝对不能曝光，否则真是功亏一篑，不得已，谷正文只好板下脸孔，说是“老先生亲自交办的”，如果消息见报，一切后果自行负责。然而根据谷正文了解，后来，这位无辜的赵姓上校还是因为这件事被免了职。

谷正文从机场接过小郑后，便将他带到延平南路有“南开大学”之称的南所，让他洗澡吃中饭，休息事实上，也在此时，台湾接获消息，周恩来可能没有登上那班飞机，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并没有按原定计划从香港起飞。

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周恩来临时改变主意，外界对此纷纷揣测说“因为他知道台湾特务在飞机上放炸弹”。对此，谷正文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周恩来根本不知道，只能说他命大。”

后来周恩来为什么没有登上那班致命的飞机呢？据事后了解，周恩来因为接到缅甸及印度总理的邀约，准备先赴仰光约会，再转赴万隆开会，因此，才幸运逃过一劫。

载着中共代表团3人、中共5名记者、1名波兰记者、1名奥地利记者、1名越南工作人员，一共11人，“克什米尔公主号”于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时，从行李舱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飞机起火燃烧，像一团火球一样冲进海里，时间是4月11日下午6时30分，只有3名印尼航空公司机组人员，在海上漂流几个钟头后，奇迹似地获救。

根据谷正文表示，蒋介石事前并不知道保密局炸机的举动，第二天，毛人凤才亲自向他报告，并对周恩来幸免于难深表遗憾。不料，蒋介石听完后，非但没有生气，还觉得给大陆一下下马威，挫挫士气，感觉不错，因此签下好大一笔奖金——美金9000元，搞赏有功人员。

而台湾对于万隆会议前夕发生这种敏感新闻，也一反常态，三家晚报均以不大显著的版面处理空难的消息，《中央日报》第二天更是只字未提，直到第三天才在第二版，以不到50字的内容交代了事。

虽然台湾当局始终低调处理这件空难，不过由于罹难人员包括5个国家，在国际舆论及中共压力下，为求破案，香港政府曾雷厉风行展开一连串调查审问一竿子人等，连小郑点头之交的朋友，几乎无一幸免，纷纷被抓去严刑拷打，希望逼出小郑的下落，及整件案情的来龙去脉。

打了又打，问不出一个所以然，不顾中共的抗议，香港政府只得放人，只起诉了本名周驹的小郑一人，问题是光知道凶手是小郑，可是人海茫茫，到哪里才能将小郑逮捕归案？

另一方面，在台湾保安单位严加保护下，小郑一切平安，其父在情治人员安排下，也在案情曝光前，安全偷渡去台，父子俩抵台后，立刻改名换姓，如今已在台湾落地生根。

“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尽管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谷正文却说，最大的收获是，的确让香港政府吓了一跳，因为事后台湾在香港情报网的最高督导王新衡，曾与港督达成了口头协议，对于台湾特务，香港可以破坏组

织，可以抓人，但不准判刑，直接遣送回台，交由台湾自行处理，如果香港政府答应放台湾特务一马，则台湾特务保证不在香港再搞炸机、杀人、放火等恐怖行为，并停止印制港币假钞。

蒙上神秘面纱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已经事过境迁 40 年，周、陈两人也先后在前年、去年离开人世。谷正文指出，如今他站出来，坦承是台湾当局主谋放的炸弹，当局可能会觉得某种程度的难堪，不过今年 85 岁的谷正文还是忍不住要说：“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类似这种政治谋杀事件多得不胜枚举，事实上这已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做不做’的问题。”

根据台湾《中国时报》周刊最近介绍，谷正文生于 1910 年，原籍山西汾阳。在抗战以前，谷正文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已是国民党特务（即所谓‘职业学生’）。他后来还担任“华北特种工作组”的组长，专门执行破坏中共组织及暗杀中共干部或亲共人物的任务。他是以戴笠为局长的军统局的大特务。

1949 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溃败后，谷正文随军统局迁往台湾。到了台湾，30 多岁的谷正文继续干他的本行，担任情报机关的“侦防组”组长长达 17 年之久。后来，他又升任“情报局督察室”主任。

不久前，中华航空公司一架运输机在台湾境内坠毁，引起各方面议论。退休多年的谷正文也发表一番高论，大胆假设华航这架飞机可能是“人为蓄意破坏”。此言一出，引得华航高层人员的不满和追究。

## 第七节 九龙暴动内幕

### 旗山旗海

九龙暴动是从李郑屋徙置区首先发生的。这些徙置区是港英当局修建，用来收容各式各样的人，其中包括政治“难民”、一贫如洗的和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之中具有支配作用的是一部分组织得极好的分子——国民党“难民”。

1949年声名狼藉的“十四K”党迁入香港后，香港的秘密帮会中便增加了一个新因素。“十四K”党是已经死掉的国民党特务葛兆煌在广州成立的。这个组织决不是香港固有的秘密帮会之一，它实际上只是——正如香港人所共知的也为英国警察当局所承认的——国民党的一个外围组织。

由于这个组织在香港的出现，国民党利用美元渗入秘密帮会过程加紧了。“十四K”党充当国民党和香港一些传统的秘密帮会之间的主要联系。1956年10月8日，李郑屋村徙置区的一个居民组织的负责人吴达，从港九各界庆祝“双十”国庆筹备委员会那里，带回大批青天白日旗及庆祝补助费后，便立即吩咐他的十多名心腹，加紧布置。这十多个人当中，有8名是“十四K”的人马，其中就有事后被驱逐出港的肥佬林、大鼻登在内；另外5名是“和胜和”分子，其中包括事后被驱逐出境的大傻球。

当时香港的徙置区，只有黄大仙、石硤尾和李郑屋三处，每年的10月10日，亲台人马便经常利用这三处地盘作为“据点”，进行悬旗及张贴标语等政治活动。

8日晚上，李郑屋村的每户居民都收到十面纸旗。送旗上门的大汉再三叮嘱居民，这些纸旗一定要悬挂或张贴于当眼之处。此外还发给每户一元的浆糊费。

1955年的“双十节”，是令徙置区居民恐惧的日子。石硤尾的R座，一家四口人因拒绝悬旗，被来历不明的人夜间闯入住宅殴打致重伤。不过当时的徙置区面积有限，很难把十面纸旗全部张贴，居民们只有把这些旗粘在一根小绢上面，张挂在户内或窗门之上；有些则随便把一面纸旗贴在窗户或门上了事。

今日的徙置区已非去年可比。在9日的上午，分旗的大汉派人分头巡视一番，遇有拒绝悬旗或悬旗过少的便当场提出警告，面对这帮恶势力，港民们只能把气咽到肚子里，而不去自找麻烦，于是，尚不到“双十节”那一天，整个徙置区的大街小巷，门前房后便已是旗山旗海了！

9日午间，那群人又在面对通衢大道的李郑屋村的A、B及G座刻意地进行了重新布置，他们出动了50多名大汉，把所有面向街道的各层墙壁，都贴满了彩旗；此外，又把数不清的旗子，旗串，纵横交织地悬挂在座与座之间，每层的外墙，也贴上一个或多个用红纸剪成的“廿”字。这还不算，“中华民国万岁”、“蒋总统万岁”、“反攻必成。复国必成”等大小型标语也比比皆是，连地下的公共厕所中、浴室中也全都贴满了！

于是，徙置区一下子变成了“青天白日”的海洋，尽管旗子间少有人员走动，却也着实是蔚为壮观！

“双十”标志被撕去后的轩然大波10日上午，港岛东区的一家戏院正在上演所谓的“香港文化教育界庆祝国庆大会”。临近中午时分，大会已接近



尾声，会议的负责人正带领参加会议的“代表”们高呼“蒋总统万岁”的口号，会场高潮迭起。

突然一名纠察模样的人仓惶奔向前排，对一名 50 多岁的大块头低声耳语了一番，大块头脸色陡变，急忙向周围喊口号的人打个招呼，便立即离座跟着“纠察”跑向大堂外票房接电话：“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绝不能让步，这与国家的面子有关，我会立刻向上级汇报，……必要时可以给他们一个下马威，一小时后我会赶到现场……”大块头正频频在电话中向对方嘱咐再原来李郑屋村为了悬旗问题，亲台分子与徙置区的事务处的职员碰上了。

9 点半左右，徙置区一名姓李的职员，看到 G 座的公共墙壁上张贴着巨大的由红纸剪成的“廿”字，周围也挂满了由小绳悬系着的旗串，这跟徙置区的管理条例有抵触。根据 1956 年 10 月 3 日市政卫生局徙置事务政务委员会的会议精神，决定给各徙置区大楼居民警告不得在各楼字的墙壁上贴纸旗标语或其他装饰物，以防此种物件一经张贴后难以清除，影响周围环境，而用绳悬挂旗帜则不予反对。于是该职员便通知该居民自动拆去，但无人理会。在此情况下，该职员便亲自动手将双十字及附近的纸旗拆去。当时并无任何人干涉或阻拦，姓李的职员稍作巡视以后也便返回 A 座地下的办事处料理公务。

这件事被以吴达为首的居民组织知道了。10 点 30 分，吴达指使一名绰名为“猪肠粉”的男子纠集 30 多人，声势汹汹地包围了办事处，并高声质问是谁斗胆撕毁了 G 座的“国旗”。

姓李的职员便把事情的原委照实向“猪肠粉”作了番解释。但“猪肠粉”岂会接受这等道理，他最关心的只是谁撕毁了“国旗”，并扬言如果办事处不赶快交出“凶手”，立即将其夷为平地。言辞不仅粗秽不堪，还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

这时办事处尚有 27 名职员在工作。但是随着“猪肠粉”的吆三喝四，一会儿便聚起了一大群。其间多是些唯恐天下不乱之人。11 点左右，围聚者已达 600 人。办事处的职员见势头不妙，偷偷地与深水埗警署联系，请求警员前来维持这里已经充满火药味的秩序。

11 点半，深水埗警署派出警员 20 人赶到现场，当他们发觉局势绝非目前人手所能控制时，便采取了较为灵活且保守的做法，一面向警署报告实际情况，一面采取消极行动，严密保护办事处的职员们的安全，暂不对围观人群采取驱散活动。可这正放纵了滋事分子的暴行，“猪肠粉”大声提出了五个条件，限徙置区在 15 分钟之内给以答复，否则将采取断然行动。五个条件是：将撕去的双十字标志及“国旗”重新张贴、悬挂，并加上蒋介石的肖像；由办事处买 500 元的爆竹在撕旗地重新张贴、悬挂时燃放，作为认错；将“凶手”找来，向“蒋总统”行三鞠躬礼，以示道歉的诚意；以“套红”将道歉启事在全港大小报章刊出；对撕旗“凶手”以法律处分。

像这样苛刻的无理条件，自然不可能答应，于是双方剑拔弩张，气氛愈加紧张起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话说“猪肠粉”其人，乃是“十四 K”中的“草鞋”人物，以前在北河街摆卖猪肠粉，由此获得绰号。他连斗大的字也认识下了几个，又怎会草拟五项条件和道歉启示呢？不用说这又是吴达背后操纵的结果。

吴达原是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的外围人物。当他教唆“猪肠粉”提出五项条件之后，便吩咐手下人向正在一间戏院开会的那个大块头男人报

告。原来此大块头也非等闲之辈，他乃是“六组”驻港的特务头目；以出版社副总编辑名义掩护身份，此人阴险毒辣，鬼心眼一个接着一个。

在十日的庆祝大会上，大块头之所以没有坐在主席台上，而是坐在前排的听众席上，主要是为了遮人耳目，避免特务身份暴露。

大块头一接到吴达的电话后便马上奔往李郑屋村现场与吴达共商“大计”。

与此同时，原来徙置区办事处的主任为了息事宁人，避免局势扩大，竟然答允了亲台分子的部分要求，愿意重新张贴双十字标志及所谓的“国旗”，并购买 10 元鞭炮燃放，对道歉及处分撕旗职员问题等请示上级后再给以答复。

你退一尺，我进一丈。这帮亲台分子一见官方让步，气焰更加嚣张，声称办事处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全部要求，不许讨价还价拖延时间，否则将立即采取行动。

形势变得更加严峻，深水埗的警员又增援过来不少，现在由一名副警司为首全权处理此事，同时九龙警察总部也被迫取消各级警务人员休假，准备对付这场愈演愈烈的事变。

躲在现场附近一家餐厅的吴达、大块头二人设立了“临时指挥部”，手下有两人随时向他俩通报消息。当大块头获悉警方的反应之后，便立即指使滋事分子为“国家”争一口气，所有条件都不能折扣，办事处若再拖延，便施以暴力措施。

受了大块头的疯狂煽动之后，暴徒们一个个变得更加凶相毕露，他们开始涌办事处，冲破警察人墙，大打出手。副警司只好立刻下令警察们保护 20 名职员撤离现场，但是这又何其容易啊！暴徒们毫不示弱，分成两批人马，一批捣毁办事处并到处纵火燃烧公文、财物，一批则紧紧尾随撤退的警察，疯狂地追打徙置事务所的职员，追至永隆街口时双方展开大混战，结果，警察及徙置事务所职员多人受伤，暴徒也逐渐被警察用催泪弹驱散。

事件看来就要平息下去了。

但是上述始末情形被“军统”派遣在港的特务头子华将军获知后，本来就对大块头的狂妄自大有几分不满的华将军遂极不客气地电告大块头：此事从现在起由我们直接处理，你们不要再插手此事了。

这位潜伏于半山之间罗便臣道的“军统”特务头子的干预，注定了这场大灾劫的不可避免，也表明这场灾劫中，台北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香港警总部的政治部主任葛某，因获悉台北派驻香港的特务有可能居中策划，又担心暴徒再行集结，遂于正午 12 点左右召集几名部属研究此事。经过研究决定把各区警署人员抽调部分到九龙总部，以备应变；同时通知九龙总部尽可能多的派警员驻守现场。但是他们总也没有料到台北方面竟然直接派遣特务前来指挥，更没料到这“星星之火”终会酿成重大的政治、经济动荡。

下午 6 时许，一名瘦长的中年男子，闪闪缩缩地走上九龙长沙湾道 100 号二楼的一间房子，屋内的四男一女恭候多时，男的分别是陈英、大戈登、钟发、欧同，女的是齐济文，他们都是追随“十四 K”香主葛肇煌由穗来港的“内八堂”人马。后到的中年汉子则是在港潜伏的特务华将军的心腹助手，很久以来，“十四 K”人马都由他出面作“特”、“黑”之间的联系。

这位瘦长汉子面带紧张之色，在详细盘问了此处的安全措施后，才吩咐

各人坐下，下达了一连串的机密指示。

瘦长汉子诡秘地传达着：“是可忍孰不可忍，为了国家的体面，为了振奋海内外同胞的人心，为了使香港政府不敢轻视我们，台北政府方面已决定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同时也是咱们‘十四K’及各位兄弟报效国家的千载良机，一定要干得有声有色，出出这几年的怨气。”至此，5名小头目们听得眉飞色舞，喜笑颜开，纷纷表达自己“死而后已”的壮士之志。

“现有以下指示，望大家即刻执行，不得有误”，瘦长汉子继续说，“一、由‘十四K’联络全港各堂口的黑社会人物，准备编成5个大队，尽量携带各种武器，联络工作必须于今晚10点之前完成；二、明日午前，政府将有重要人物来港直接指挥5个大队的战斗；三、5个大队以孙、逸、仙、先、生5个字编号，如‘孙大队’、‘逸大队’等，来自政府的指挥者也分别以‘孙君’、‘逸君’等作为称呼；四、大队召集人以‘十四K’人物为主，各大队的召集人选出之后，立即用电话通知蔡先生，时间为今晚12点至凌晨1点，电话号码为96322；五、已经分别通知绿林等3家中学，必要时召集沉重参与宣传工作，并通知忠贞分子候命开入市区，参加战斗；六、攻击对象为报馆，商店、学校、社团、工会（属左派的）……等，务必全力以赴，尽快摧毁左派在港的实力；……九、连夜赶印‘国旗’……十、战斗总部设在长沙湾球场，”这就是所谓的“十大战斗纲领”。此时，已是灯火万家的时分了。

这五名头目立即分头向各黑社会组织联系，这时外边已是闹得天翻地覆、日月无光了。

### 密谋血洗半岛

此时的李郑屋村办事处，依然烟雾未散，迟迟赶到的消防队员刚刚扑灭被暴徒点燃起来的大火。李郑屋村的扰乱使九龙警察断定这一带乃是暴徒的核心地带，于是800名警察在永隆街、东京街、顺宁道、青山道等处布防，并架设铁马，禁止闲人随便集结。

李郑屋村及其附近街道变得戒备森严。

5名“十四K”头目接受军统特务头子的指示之后，以最迅速的一传十、十传百的方法，将“战斗纲领”传达给九龙各路的黑社会人物。晚上8点钟，警察换岗的时间到了，暴徒们纷纷在夜幕的掩护下出动了。

9点半，一辆消防车在九江附近被砸，前往救护的警察和消防队员5人被玻璃瓶及砖头掷伤，暴徒们随后便逃之夭夭。

10点10分，嘉顿公司10余辆货车火光冲天，3名司机受伤，货物几乎全部被焚毁；

10点45分，新中食品公司、荣华茶楼、大丰国货公司等数十家公司均发生店门被砸、货台被抢劫等事件；

11点10分，南昌街201号周先生金铺被砸得稀巴烂，幸而保险库坚固，又有数名警察前来及时阻拦，才没有重大损失；

11日凌晨，九龙总部、旺角警署及九龙交通部等，均被暴徒包围袭击，警察只得关闭大门，以守为攻，不敢轻易外出；

到了11日的早晨时分，整个九龙几乎无一处不遭受暴徒们的袭扰，而整整一个夜晚的防守也使得警察们疲于奔命了。

黎明前后，局势稍有缓和，只是偶尔能听到几声枪响。

10月11日早晨8点钟，在石硤尾、青山道、长沙湾道、荔枝角道、基隆街、鸭寮街、汝洲街、南昌街、大角嘴街……出现了一群接一群的暴徒分子，人数多则2000，少则几百，有的拿着棍棒、酒瓶，有的还带着枪，大有踏平九龙城之势。

长沙湾球场附近，人头涌动，一批约200人的暴徒，臂缠白布，巡逻于球场内外；球场之内，一面三丈多高的青天白日旗迎风招展，“好不威风”，这便是暴徒们的“指挥部”所在地。

为了稳住阵脚，应付更严峻的场面，一名助理警务处长和一名政治部警司，进驻九龙警察总部，协同九龙总指挥官处理一切，并准备了较多的催泪弹，以便通过“文明方式”驱散人群，同时各区警署全部取消休假，连可能动用的辅警都集中候命，看来一场暴乱与反暴乱的战斗就在眼前了。

与此同时，整个九龙的黑社会组织都接到了国民党特务的通知，编成若干“大队”。军统特务瘦长汉子亲自驾驶了辆柯士甸牌汽车，进出于深水埗与长沙湾球场之间，给那群臂缠白布的家伙面授机宜。

10点10分，一辆来自台北的客机徐徐降落在启德机场。飞机上依次走下7名衣饰华贵的男子。下机之后便速分两辆的士绝尘而去，其中一辆载着两名乘客的驶向汽车渡海码头，前往港岛半山罗便臣道，会晤“军统”驻港特务头子华将军；另一辆载着5个人的则直驶九龙市区，消失于弥敦道的车海人群之中，这7名天外飞来的特务抵达香港之后，血腥暴行便重又在各处疯狂展开。

面对暴徒的滔天罪行，由百名警察组成的防暴纵队，列成方形阵势，遥向暴徒们发射催泪弹，东边的给驱散了，马上又移到西边集结。一进一退，你追我赶，跟小孩子捉迷藏一样。暴徒们戏称各街道都能见到的这支支防暴纵队为“影子纵队”、“无能纵队”。于是暴徒们更加有恃无恐，气焰更加嚣张。

刚过正午，一辆小型货车于兵荒马乱中直驶长沙湾球场，迅速卸下一叠叠的青天白日纸旗。目击者后来称纸旗在50000面以上。许多“双十节”时出现的标语又出现在街头巷尾，并且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车辆通行证”发放室，从此凡是进入北九龙地区的车辆都要用钱购买一面纸旗，贴在车头之上，才可通行。否则将有被砸毁的危险。这面纸旗的代价，最低以10元起价，如果暴徒发现车内乘客衣着较为华丽，或者车辆较为名贵的，则要交付更高的价钱。有些车辆，由荔枝角道至青山道这段地区竟然给勒索11次之多，付出近1000元的“车辆通行费”。

### 暴徒滥杀无辜

暴徒们为了方便“特殊身份的人”，便发放了“特别通行证”。常见的是下面两种：

“此车系我方报馆工作人员使用，所过之处盼即放行，切勿骚扰，必要时应予协助。生君谕。”

“此车中立，由本人负责管理，并已购国旗乙帧，敬希各位留意，勿生意外是禱。C、C中三青总。逸君留条。”

不令来往车辆被勒索，就是各大小商户也几乎无一幸免于被劫的下场。

暴徒们分为十几组，分组前往商户门前敲击门窗。因为此时的商店早已大门紧闭。敲门的常常是一位作学生打扮的美貌少女，商户如不及时开门，便免不了被砸被抢的命运。暴徒们在店主面前，总是冠冕堂皇地声称，这是一场反击香港左派的斗争，望各位同胞踊跃捐助，以解经费紧张之难，多数商人屈于暴力，忍气吞声地给予少则 500，多则上千元的“捐助”。

据称在长沙湾道的一家五金商店中，因为以前悬挂的一幅毛泽东像没有来得及摘下来，竟被暴徒们逼迫交纳了 5000 元现金以恕罪，并勒令店主亲自当场取下画像以火焚之，方肯罢休。

下午 3 点左右，大角嘴华润国货公司因无人应门，被一伙歹徒用木棒打烂门框而入，将其中货物全部掠去之后，又来了一个七捣八碎，临走还纵火焚烧。幸而消防车及时赶到才没有使火势蔓延到周围木屋，导致一场火灾惨剧！

在荃湾，由代号“孙君”的“军统”特务率领的“十四 K”、“和胜和”、“和安乐”等黑人物组成的突击大队，人数逾千，配合宝星纱厂的一批亲台工人，又一次疯狂地向各工会和工人医疗所进攻。宝星纱厂门前有 20 名穿着白衫黑裙的女学生，手持政治性标语，高唱反攻大陆歌曲，替暴徒们打气助威。纱厂的董事长恐把事情弄僵，及早出面与暴徒们调停，暴徒群中一名操国语的中年男子遂提出把左派工人交出，立即悬挂青天白日旗和蒋介石像及赔偿其费用 3200 元等三项条件，厂方除无法交出左派工人外，竟然毫不迟疑地应允并兑现了后两项条件。但是，当厂方按暴徒们的要求悬起青天白日旗和蒋介石像，“赔偿”3200 元现金之后，暴徒们立即又露出凶相，以清洗所谓左派工人为借口，一拥而入，在工人中间大打出手，致使数名工人被打成重伤。

警察的无能、暴徒的残忍，使九龙市区成为一个乌七八糟的地区，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还不算，“闹区”中心又在上演着另一幕轰动中外的惨剧，瑞士共和国驻港领事馆的副领事兼参赞及其夫人竟被暴徒纵火焚于车中，致使司机当场惨死；参赞夫妇亦受重伤，入院后的第二天，参赞夫人重伤不治，在死异乡。

在下午 4 时左右，一辆的士载着瑞士驻港副领事埃士德夫妇，由九龙前往新界。的士驶至大埔道时，被暴徒包围，喝问有无“通行证”。司机怕出事，便急忙说明，他没来得及购买，并说愿出钱购买彩旗。暴徒们并不听这番解释，只当这是一种故意抗拒行为，便不分青红皂白，四面向车袭击。他们先是掀翻车辆，然后泼上油，纵火焚烧，领事夫妇二人竟然来不及跳出车来便陷入了大火之中。车后座的埃士德先生一时着急，便用英语大叫：“我们是瑞士外交人员……”杀红了眼的暴徒火上加油，变本加厉，哪里会理会这等叫唤！附近的一名店员见状，急忙致电“九九九”，当灭火车及救伤车赶抵现场时，车内三人都已奄奄一息，待送往医院后，司机早已死亡；埃士德先生须长期住院施行植皮手术，埃士德夫人于 13 日午间不治而死。

### “五大君”隐匿幕后

香港这个“没有娘的孩子”正在受到一场狂风暴雨的肆虐。10 月 11 日从早到晚，从九龙半岛到油麻地、九龙城、土瓜湾等地区无一不遭烧杀抢劫，佐敦道以北几乎没有半寸净土。据警方资料证实，截至 11 日下午 5 点，被洗

劫或焚烧的工会、学校、工厂、商店达 300 家之多，死伤人数超过 300 人。

这已经不是一场一般的冲突，而是一场由台湾潜港特务幕后策划、香港黑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动暴乱。局势万分危急！

下午 3 点，署理港督戴维德在港府召开高层紧急会议。在宽敞的港府中间的大会议厅中，在异常紧张的气氛下，戴维德用他那略带女腔的尖声宣布了一项非常命令：从 11 日晚上 7 点半起，至 12 日上午 10 点止，整个九龙半岛实施宵禁，所有居民务请呆在家中，一切交通包括公共的士及渡海小轮均于晚上 7 点半停止行驶；人群绝不能在街道上集结；并且调派英军进入市区以维持秩序，凡违犯该戒严令者，后果完全自负。

11 日晚上 8 点钟，香港电台及丽的呼声联同播出了戒严令数次，并且由戴维德亲自广播，他向市民表示港府要和广大警察及士兵一道，尽快弹压暴乱、恢复九龙半岛的秩序和安全。

根据戒严令，军警将授权开枪射击，这是暴徒们最胆颤心惊的。

是年 10 月 12 日为农历重阳节，此戒严令又被称作“重阳节宵禁”。

早已闻风而动的暴徒“指挥部”长沙湾球场在宣布戒严后不到 20 分钟，便举行“下旗典礼”，典礼台下百余名臂缠白布的大汉和 30 余名着白衫黑裙少妇，抬头仰望着徐徐降落的青天白日旗，齐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党歌，一片忠心耿耿的气氛。其实在此前几小时，来自台北的 5 名特务中，有 3 名已不再露面，仅留下“孙君”和“生君”二君分别负责当天晚上进攻九龙城区和荃湾区两处的指挥工作。

宵禁的范围尽管包括九龙及整个新界，但北九龙方面，过了荔园和钟山台，便等于真空状态了！从长沙湾球场边至下葵涌的“指挥部”，灯火辉煌，进出人流络绎不绝。由葵涌至荃湾市区仍有私家豪华上车穿梭往返。

港九工联荃湾医疗所的“攻防战”尤为惨烈。

500 多暴徒在其主子“孙君”的率领之下，波浪式向该所发起了猛攻。当时该所仅有留守人员 12 名，其中还有 5 名女性。当暴徒手持木棍，竹杠、水喉铁、石块、啤酒瓶等袭击时，所内的职员们仍能沉着应战，各守岗位，使暴徒一时竟然难以长驱直入。从午夜 11 点至凌晨 1 点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暴徒竟通过不同方式向该所攻击了不下 7 次，均未能有所突破。其后，由“水房”的黄大麻子带领 10 余人，爬上了天台，捣毁屋顶，以长梯跳入屋内，遂打开大门，其余便汹涌而入。十几位职员有 6 名被打成重伤，其他也各有轻伤，可怜这一福利机构顷刻间便成一片废墟。

九龙市区方面，实施宵禁之后，虽有军警不断巡逻，但旺角及油麻地区仍时有零星的暴乱事件发生；若干未能及时回家或不知内情而外出的居民，有不少被军警当成暴徒误伤。这些人都成为这场暴乱的牺牲品。

鉴于中国政府提出的严重抗议和香港局势的急剧变化，游东窜西的港督葛量洪真的坐不住了。13 日整个下午，香港各部门高层人士频繁接触，商讨如何应付中国方面的压力及如何收拾香港的这场大暴乱。警务处提议在宵禁时间内全力搜捕黑社会各头目，以借此杀一儆百，打击暴徒的嚣张气焰。葛量洪采纳了这个意见，训令迅速付诸实施。

13 日晚上至 14 日凌晨之际，警方是最紧张的时刻，当时尚没有设立“反黑组”，只由刑事侦察处及各级侦缉人员，尽量提供黑社会组织名单，要宁枉勿纵。

来自台北的 5 名特务，除那两名没有露面，仍然匿居于罗便臣道华将军

寓所之外，曾经直接指挥杀人放火的“孙君”、“逸君”等5君，从13日上午起不再公开露面，只留下几个爪牙大汉清理遗物，销毁罪证。

当天晚上，实施宵禁之后，九龙警方的车辆全部出动，各街道一片警笛刺耳的鸣叫声；尤其是调来的英国军车尾随干警车之后，再分为十余组四面出击拘捕黑社会头目。除李郑屋村、石硤尾等徙置区之外，九龙城砦、旺角、深水埗、东头村木屋、福华村木屋、荃湾等地区，均有数不清的黑社会人物被拘捕。最不幸的是，有许多滞留在街上的无辜百姓，因来不及撤走，遂成为拘拿对象，和众多真正的黑人物一道成为“漆咸营”中的“同僚”。截至14日晨为止，被拘留在“漆咸营”的已超过3000人。

### 港英当局脚踩双船

14日晚上，港督葛量洪在香港电台及丽的呼声中发表讲演，声称此次参加暴乱的歹徒定必予以严惩，同时强调局部地区仍在宵禁期限范围之内，而英军亦暂时留在市区，协助恢复市区秩序。只字未提北京方面的抗议之事。

16日，港府宣布戒严已经全部解除，市区及郊区全部恢复正常。而此时拘于“漆咸营”中的“罪犯”人数却已超过5000人，戒严已被解除，秩序也终于恢复正常了。

对于这场持续的暴乱香港方面该作怎样的“交代”呢！

16日下午，新闻处通知在辅政司署之内举行记者招待会，出席长官除葛量洪之外，还有辅政司戴维德、署理警务处必明达、驻港三军司令史德顿等。

招待会上，名报记者争相询问，当提及周恩来总理在10月13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先生的抗议时，葛港督竟回答说：“中国政府的抗议中，称九龙的中国和平居民的生命财产在国民党匪帮特务分子操纵的暴徒们的动乱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港府被指责说没有及时采取得力措施阻止暴乱的扩散，这种抗议和指责是通过一些不确凿的报道资料作为根据的，是不合实际的。”

又是脚踩两条船的卑劣手法！

又是两面三刀惯用伎俩的复演！

望着自己的骨肉同胞惨遭蹂躏，全中国人民怎能不怒火中烧，义愤填膺呢？

“释放无辜居民！”

“严惩黑帮特务！”

“戳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

这是正义的声音，是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共同的声音！

在这场由国民党驻港特务一手策划并指挥的持续数天的大暴乱中，港英政府一直处于被动应付之中。对于台北的直接参与采取了置若罔闻的消极态度，这表明英国政府和受其遥控的港督府并未完全放弃“两个中国”的反动立场。而只是到了暴乱升级，殃及池鱼。局势若不加以控制，整个九龙城将变得不可收拾之时，迫于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港英政府才不得不采取了所谓的宵禁政策。

好一个姗姗来迟的宵禁令！

几家公司、学校、商店被毁，几千人被拘禁“漆咸营”中，上百人伤

残、几十人命归黄泉，这就是英警察加上军队所取得的辉煌战果！青山作证，历史无情，人们从中又一次领略了殖民主义者的丑恶嘴脸。



## 第八节 毛人凤作古

### 蒋介石痛失老奴

1956年10月13日，郑介民因报告九龙事件来到蒋介石跟前。听完九龙情况，蒋介石对特务的活动颇为满意，突然，他想起头天曾有“国防部情报局长”毛人凤病危的消息传来，便向郑了解毛的病情。郑介民答复道：

“毛局长本来有慢性支气管炎，一直没有彻底治好。从去年夏天开始，不时咯血，甚至咯血回局办公。到本年4月再发，血咯得多，又发高烧。5月间医生断定是局部化肺癌。”蒋介石问：“不是到美国治病了吗？”

郑介民道：“是！毛局长在美国波士顿州医院动手术，切除了右肺中叶和下叶，医了两个月，后来从波士顿去纽约，不成了，再去华盛顿检查，发现心脏跳动太快，也不规律，就在当地住了下来，9月份才回来，这是上个月的事。”蒋介石：“美国医生也没办法？”郑介民道：“大概病太重了。9月底毛局长回国之后又咯血，痰中有葡萄球菌和肺炎双球菌，于是又动胸膛穿刺手术，取出淤血一块，咳嗽咳得厉害，到双十节过后，连饭都不想吃，精神萎靡，再检查，又发现右肺气管中有大量淤血。到大前天，再动切开胸壁手术，在心脏附近发现大块癌瘤，因为癌已从肺门深入纵隔，紧靠心脏壁压住了食道，已经无法切除了，要治好的希望不多了，从那时起，已经输血、拿氧气帮他呼吸，非常辛苦。”蒋介石越听越不舒服，挥手令去，一个人坐在那里发怔。

10月14日上午11时25分，毛人凤终于归阴。

18日，台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情报局故局长毛人凤事略》：

【军闻社讯】国防部情报局毛人凤故局长生前事略，顷经治丧委员会发表如下：

毛故局长讳人凤，字齐五，籍隶浙江江山，生年五十有九。幼怀大志，与戴雨衣将军同砚于江山文溪小学，常以报国相勋勉。弱冠时毕业于浙江省立一中。旋入上海复旦大学肄业。中途感国事之蝥螭，愤军阀之残暴，乃毅然间道入粤，投考黄埔军校第四期，不幸因病休学，不久病愈，转入党军戎幕，略偿夙愿。民十五年春，因封翁谢世，自粤返籍奔丧。其时适值戴雨衣将军亦欲投身黄埔军校，俾遂报国之初衷，先生赞助甚力。

迨民廿三年，戴将军正主持情报工作，浼先生为之臂助。初在浙江省警官学校及武昌西安行营第三科，先后供职有年，为各该单位首长所倚重，建树极夥。民廿六年七七事变，日寇入侵，戴将军责任更重，工作益繁，乃调先生兼程入京，命掌机要。军书旁午，听夕辛劳。八一三沪战时，先生随侍戴将军在沪郊主持情报别动等项重要工作……

嗣局势日非，我政府由粤徙渝，先生为卫护领袖驻节渝垣之安全，并亲自部署西南方面之工作，曾亲赴渝州留至最后。迨后大陆全面失陷，保密局在川康青边境等地之各游击部队，曾先后予共军以重大打击

保密局迁台以来，在先生之贤明领导下，曾先后破获重要共谍案多起，功在国家，蒙政府酬奖勋劳，先后奉颁三四等宝鼎勋章，三四等云麾勋章，胜利勋章，忠勇勋章各一座。美国政府也曾以先生对于中美情报合作著有勋劳，曾以司令级嘉猷勋章授予先生……

在国民党文武大员死后的“事略”之中，人们将永远看不到死者到底是

个什么样儿的人，更谈不上死者的“德政”与“德行”了。当然，国民党人之中确乎也有君子，但毛人凤则不然。

毛人凤作古，蒋介石一面庆幸蒋经国接手情报单位的障碍，从而消弭于形。但回想起毛氏一生对自己的忠诚，不禁黯然泪下。

至于毛人凤如何掌握蒋介石的特务机构，还得从戴笠乘机失事说起。

### “特工王”突然失踪

1946年3月17日下午，戴笠座机失踪的消息犹如世界末日降临的阴影一样，阴森凄凉地笼罩着重庆军统局本部。军统局代主任秘书毛人凤紧张不安地守在办公室里，不停地指令重庆总台向上海、南京、青岛、济南、天津、北平等处询问222号专机的消息。至次日，毛人凤紧张得坐立不安，甚至通宵也不离办公室一步。电讯总台的电波连续不断地向全国各地数十个建有机场的大中城市发送，并命令各地的军统组织调动一切情报力量，寻找222号专机去向。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毛人凤心中的不祥之感越来越强烈。过去，戴笠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一般都要给毛人凤发电告知自己的行止，以备蒋介石随时向毛人凤查询，也便于毛人凤及时向他报告局里的重大情况。但是自17日中午戴笠离开青岛后，不但完全中断联系，而且完全失去行踪，这是以前从没有出现过的异常情况。222号军用运输机，原由DC—3型民航机改装而成，1942年开始装备美军部队，安全可靠，全天候飞行。其最大时速350公里，最大航程4900公里（平常2500公里），续航时间为19小时24分（平常8小时），可载量2270公斤，号称空中列车。毛人凤认为，按222号专机正常航程计算，戴笠已不可能在空中飞行，即使按最大续航时间测算，戴笠也不太可能在空中飞行，肯定已经降落到某一个地方。只要222号专机着陆，戴笠与军统局及当地组织的联系并不困难，不但戴笠随身带有电台和报务人员，况且军统组织遍布国内，军统的一项重要命令可以在一两个小时之内，通过近千座电台传达到全国每一个角落。现在岂有老板数十个小时与局本部联系不上的道理。据此分析，222号专机极有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

（1）由于某种原因，飞机被迫降落在共产党武装控制的地区；

（2）飞机失事，机上人员遇难。

对于这两种情况可能带来的后果，毛人凤都不敢深思，他只觉事情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必须尽快向蒋介石报告。

3月18日清晨，毛人凤闯进蒋介石官邸，向蒋紧急汇报222号专机及戴笠失踪的消息。蒋听完报告，一言不发，立即拿起话筒用一种恐慌与紧张的口吻向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询问222号飞机的去向。当他得知222号专机确实失踪后，当即作出两项指令：一是指令周至柔马上派出几架搜索机沿青岛、南京、上海一线及周围地区寻找，弄清222号专机降落的地点，通知空军各机场协助查寻，将情况随时报告；二是指令毛人凤马上选派1名将级特务，带上电台及1名报务员，1名外科医生，于3月17日下午即出发前往上述地区寻找，如发现222号专机，就马上降落，不能降落则跳伞下去，并用电台将情况随时向蒋报告。并且命令毛人凤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戴笠，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蒋介石之所以很快作出这两项决定，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考虑，222号

专机如果是失事遇难，那将是无可挽救的事，蒋也并不担心这一点。说实在的，蒋对戴的厌倦心理甚至在潜意识中希望出现这种后果。但是，需要防备的是，如果飞机降落到共产党武装控制的地区，戴笠一旦被共产党活捉，以戴所掌握的国民党内幕及情报，就会对蒋的统治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这是蒋决不能处之泰然的。因此，当蒋得到戴笠失踪的消息后，很快表现出恐慌而不是关怀戴笠安全的原因。

毛人凤急匆匆地领旨回到军统局，当即召开所有在渝的“将”字号的高级特务会议，通报戴笠及 222 号座机一天一夜失踪的消息，传达蒋介石关于派人寻找的指令。参加会议的大都是局本部各部门及驻渝外勤机关负责人中少将级以上的大特务，一共 20 余人。

当到会的大特务们得知戴笠已经失踪一天一夜时，不啻一声惊雷在头顶上炸响。多少年来，军统特务们无不把戴笠看成是军统的灵魂、化身和象征，甚至早已习惯了终日战战兢兢地在戴笠的淫威下生活，谁也没有想过离开了戴笠的意志、权威和漫骂，将如何生存。在过去，特务们均以戴笠的意志为意志，想戴笠所想，干戴笠所干，一切以戴笠的脸色为行动准则，早已失去了个人的意志、人格和思想，一个个几至成了政治上的植物人，谁也不敢想象离开了戴笠，军统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参加会议的军统总务处长沈醉回忆当时的情形，只觉得自己“顿时浑身直冒冷汗，心想：他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呵！”沈醉的这种心情正是当时大多数特务的共同心态。

但是，当特务们听说蒋介石命令要选派 1 个人坐飞机去寻找戴笠时，马上都像被霜打了的庄稼似的，一个个蔫着头。会场上鸦雀无声，谁也不肯接受这样一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生存是每个特务的本能，何况又是面临着抗战胜利后人人都将升官发财的灿烂前程，谁肯因为寻找老板而被共产党活捉，成为老板的殉葬品，结果断送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

这一尴尬的场面大大出乎毛人凤的意料，他本来以为会上将有一番热烈的竞争，人人都会抢着要去，结果在关系到戴笠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这些平时被老板视为心腹亲信加以重用的大特务们竟没有一人肯挺身而出，肯去救主。这不啻是对戴笠鼓吹“团体即家庭，同志即手足”的无情讽刺和嘲笑。毛人凤面对这一场面几至要哭出声来。他本是一个代主任秘书，地位与这些“将”字号的大特务只在伯仲之间，资历却远远不如这些大特务，过去他也仅仅是戴笠的传声筒，拉大旗作虎皮，替戴笠看家守门罢了。这些大特务们既不把毛人凤放在眼里，毛人凤也不敢对这些大特务指手划脚。现在戴笠生死未卜，他又如何能一下子指挥得动这些“头上长角”的混世魔王！最后，毛人凤在百般无奈之中声泪俱下地哀求说：“同志们，委员长再三强调，一定要派个高级同志去。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人肯去，岂不是显得我们军统的负责人大胆小怕死了吗？如果我能走开，我一定去，可是戴先生临走时，让我在局里处理日常事务，离不开。你们叫我怎么去向委员长复命呢？”

在会场气氛几至凝固的情况下，倒是年仅 33 岁的沈醉站了出来，表示愿意承担去共区寻找戴笠的任务。沈醉既非戴笠的江山或浙江同乡，亦非戴笠的黄埔同志，只是出于报答戴笠对他的知遇之恩，才决定不惜冒死成行。这也是戴笠平时注意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效应。

沈醉是湖南长沙人，1932 年初因闹学潮被学校开除，到上海投奔特务处上海特务处处长、姐夫余乐醒，由其介绍加入特务处，初任上海区交通员，时年仅 18 岁。这年的秋天，余乐醒命沈醉送一封信到杭州浙警校面交戴笠。在

浙警校特派员办公室，沈醉看到身着灰色中山装的戴笠，中等年纪，中等身材，显得过长的长方形的脸，又宽又大的嘴巴，除了那双又粗又黑的剑眉和精光四射的眼睛让人望而生畏外，其他无一出众之处，不像平时特务们传说的那么可怕。戴笠望着新参加特务处、年仅 18 岁的沈醉，十分高兴，立即放下架子，亲热、和气地询问沈醉的个人和家庭情况。当沈醉谈到被学校开除的前后经过时，戴笠哈哈大笑起来，一股同病相怜、惺惺惜惺惺的感情油然而生，亲切地对他说：“年轻人干点莽撞事没什么！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也是让学校赶出来的。只要你在这里好好干，就有前途。你知道我们这个组织是当前最先进的革命团体，它进可作革命的先锋，退则保卫革命的安全。这是项很神圣的工作，你好好干，就前途无量。”说到这里，戴笠感慨地讲：“你很幸运呵，这么年轻就能参加到我们这个团体里来，我可是经过了多少年的奋斗，才有今天的呵！”这一天，戴笠破例跟沈醉谈了一个多小时，临走还送给他 100 元钱，让他在杭州游玩。并亲切地拍着沈醉的肩膀说：“你以后常到我这里来玩吧，我儿子跟你同岁，在上海上大学，放寒假同他一道去南京玩。”

戴笠眼里，沈醉是初出茅庐，一张“白纸”，可塑性强，只要稍加笼络，即可培养成自己的心腹。1933 年 5 月，上海区法租界情报组长徐昭俊因情报屡次失实，被戴笠下令扣押问罪。该组 14 名组员，个个久历江湖，阅历很深，戴笠却破格晋升乳臭未干的沈醉任组长，并刻意教会沈醉一套驾驭下属的工作方法：一是自己会搞情报；二是奖惩分明；三是恩威并济；四是运用团体纪律。这是戴笠多年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套用人思想，轻易不对外人言，却毫不保留地传给沈醉，可见对其希望之殷切。这一次，戴笠调沈醉随自己同入厦门搞策反活动，一则充作助手，协助自己搜集情报；二则让他开开眼界，学习学习；三则进一步考察运用，观其表里言行；四是加深感情，以作心腹。一路上，沈醉把任组长后组里的情况和心里的苦恼一一向戴笠作了汇报，特别是一些老资格的特务对沈醉阳奉阴违，各行其是，极难驾驭。戴笠一边笑着安慰：“年轻人别着急嘛，干什么都要慢慢来”；一边令人不寒而栗地开导：“对部下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对那些不服从命令、软硬不吃的就要抓住他的小辫子，狠狠整治一下；杀一儆百，这样他们就不会再不听话了。”

沈醉随戴笠在厦门鼓浪屿完成任务后，很快回到上海，并按戴笠的教导，对情报组进行整顿。通过抓小辫子、杀一儆百以及金钱名誉引诱拉拢的办法，很快使手下的特务一个个刮目相看，服服帖帖。因而也更受到戴笠的青睐和培养。有一次，沈醉发现自己手下有一个叫胡继业的情报员给日本人提供情报，并悄悄搬到千爱里附近的日本人居住区居住。沈醉一时不知如何处理，决定到南京直接向戴笠汇报。适其时，戴笠儿子戴藏宜因与沈醉相处很好，一次私下向沈醉借了 300 元公款出去胡花，快到发饷时，戴藏宜仍不能归还，沈醉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也就一不做、二不休，跑到南京去向戴笠讨债。戴笠初听沈醉向他要钱，一时不知所以，等到问清缘由，不由得哈哈大笑。本来，戴笠的凶狠冷酷，在特务处是出了名的。一些跟戴笠多年的老特务，在他面前也不得不唯唯诺诺，恭恭敬敬，敬之如鬼神。但奇怪的是，沈醉这个乳臭未干、新来乍到的年轻特务，却能在戴笠面前谈笑自若，受嗔自然，而戴笠也不怒反喜。他听沈醉说完，连连表扬沈醉做得对，当即给沈醉开了一张 300 元的支票让他到会计室支取。

子债父还以后，沈醉接着汇报了胡继业一事，并建议开除胡继业出情报组。谁知，戴笠却要沈醉亲手干掉他。沈醉当时仅 20 岁，当听到要他亲手杀人时，极其惶恐地加以拒绝，可是戴笠却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命令说：“不！我就让你去。”并开导他如何进行心理平衡：“胡继业把情报交给日本人，这种做法就是汉奸行为，把他干掉就是为国除奸，就是为民除害”。接着，戴笠写了一张条子，叫沈醉去找特务处技术股和行动股，让他们教会沈醉杀人的办法。临走时，又给沈醉写了一张发“特别费贰百元”的条子，作为杀人的赏钱。

沈醉离开戴笠，到行动股领到一把削得又薄又尖的有毒的竹刀，又领得 200 元特别费，回到上海。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思想斗争，终于在金钱、地位、前程的诱惑、团体纪律的威逼、“为国除奸、为民除害”的心理解脱下，利用去看望胡继业的机会，将胡继业刺死。从此以后，沈醉在戴笠的精心培植下成为一名出色的职业杀手。

1934 年底，戴笠提拔沈醉兼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少校行动组长，沈醉从此对戴笠更加忠心不贰。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由此看出沈醉的分量，托人传话给沈醉，要收他为徒，加入他组织的“恒社”。以杜月笙当时在上海滩的名誉地位，此举不啻是项殊荣，但此时的沈醉对此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

以杜月笙的阅历和手段，他是不相信会有人在重利之下不上钩的。于是，过了不久，又买了一部豪华轿车送给沈醉。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在杜月笙看来，也是没有人能够对此加以拒绝的。沈醉虽然很喜欢这辆轿车，但他想起戴笠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得人钱财，就得与人消灭。”受了杜的汽车，就得被杜利用，自己现在的一切，都是戴笠给的，只应效忠戴笠，不应该再去效忠他人。于是断然退回轿车。此举连杜月笙也不得不佩服沈醉的忠心和戴笠的厉害。当时，戴笠的特务处和杜月笙的青帮组织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争夺人才十分激烈，戴笠和杜月笙为了彼此利用，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加以默许。戴笠手下的大特务、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大队长、黄埔四期生王兆槐就是杜月笙的青帮大弟子，杜月笙手下的弟子陈默也是被戴笠拉进特务处的特务。现在沈醉年纪轻轻，居然能对戴笠矢志不渝，就是杜月笙也深为佩服。

戴笠不久从杜月笙口中知道了这件事，内心极其骄傲，对沈醉简直是到了十分宠爱的程度。他特地把沈醉叫到南京，陪他一起吃饭，以示恩宠。然后详细问了杜月笙拉拢沈醉的过程，听完后，戴笠又高兴又得意地拍着沈醉的肩说：“做得对！我的人如果都成了杜先生的学生，那我还依靠谁呢？你要永远保持这样就好！”

此后，沈醉大走鸿运，很快被提升到军统局任总务处长。

沈醉的“壮举”使毛人凤和在场的大特务们如得救命稻草。毛人凤当即领沈醉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在官邸又叮嘱一番道：“好好好，你们赶快去找，务必要把他找回来，你们要不借一切把他我回来！我刚才又问了一遍，各处都没有发现这架飞机，准是在共区了！好好好，你们到共区去吧！”忽地又问沈醉：“你会不会跳伞？”沈醉直挺挺答道：“不会。”

蒋介石一怔，说道：“不会跳伞那怎么成？”又问毛人凤道：“换一个能跳的人去吧。”毛人凤不便告诉他旁人没一个肯去，情急智生，说道：“问过了，都没有跳伞经验。”蒋介石急道：“那就练习，你们今天下午带着医

生、报务员先练习一下，明天便动身。”至于跳伞是否能在一个下午学得好，到时会不会跌死，蒋介石倒没想到。两人正在告辞，不料一声“且慢”，蒋介石又说：“我来写几句话！”接着拉开抽屉，取出一张信纸，写了几行字便要秘书拿去盖印，然后再给沈醉，只见那是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手令”，上面写道：

“无论何人，不许伤害戴笠，各军政机关，地方政府，如发现戴笠，应负责妥为护送出境，此令。”

蒋介石吩咐沈醉道：“如果你发现失踪的飞机不是停在机场上，你就应该带着报务员和医生立刻跳下去，见到那边不管是什么单位的负责人，你就把我的手令给他们看。找到戴局长，立即用无线电告诉我！我相信，一切都成问题，看谁敢违抗？”蒋的这最后一句话虽然明白表示了他是对共产党而言，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戴笠的威胁。蒋的猜忌心之强和心眼之多是无人能及的，因而当分析某一事件的原因和动机时，也往往先从推测对方不利于己的阴暗心理出发，故而能常常生出许多可笑的念头与荒谬的结论，戴笠的失踪，他当然相信毛人凤的两个分析。但在毛人凤推测的两种可能之外，蒋介石又生出第三种可能：会不会出现戴笠主动向共产党投诚的可能性？蒋分析了战后自己为了应付舆论和解决军统势力对自己潜在威胁问题，曾秘令戴笠撤销军统局，然后化整为零进行安排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逼迫措施，越想越觉得后怕，果真如此，他也将不借采取一切手段，把戴笠抢夺回来。这就是“看谁敢违抗”的另一个潜台词。

3月18日晚，就在沈醉等人积极准备乘飞机前往中共武装控制区寻找戴笠的时候，李人士在南京得到戴笠行踪的第一个消息，3月17日午后，在南京西南郊的江宁县上空，有一架军用飞机坠毁，只是不能确定是不是222号专机。李人士得到江宁县特务情报人员的报告后，一方面派人前往查实，一方面用长途电话分别向军统上海办事处、重庆局本部通报。

3月19日早晨，李人士进一步得到新的线索，在飞机坠毁处找到一颗私章，刻着龚仙舫的名字。至此，222号座机失事，戴笠及其一行遇难已确定无疑。

毛人凤接到李人士的第一个长途电话后，立即向蒋介石报告，蒋当时胸有成竹地肯定坠毁的必是222号专机，并断定戴笠已死。经过航空委员会查实，也很快证实了蒋的分析判断。

3月19日上午，李人士即带领陆总调查室和南京办事处的特务赶往222号专机坠毁地点——江宁县板桥镇以南5公里处的戴山。李人士等人坐大小车辆到达江宁县板桥镇，前面已无公路可行，只得下车在大雨后的泥泞小道跋涉而行，1个多小时后，方到达戴山。只见数日暴雨已将现场冲刷得乱七八糟，飞机残骸成圆形抛洒在半山腰的大片泥泞中，被烧焦的残肢断体令人可怖地与飞机的残骸夹杂在一起。经过附近农民两日来翻搅践踏的寻宝活动，尸体与泥水搅混在一起，另有一些尸体已被雨水冲刷到山腰上一条叫“困雨沟”的水沟中，其形其状，惨不忍睹。李人士当即指挥特务和雇请来的民工把尸体一具具的清理出来，用白布包裹好，排成一行，放在戴山的半山坡上。经反复清理清点，一共13具。由于每一具尸体都烧得像一段黑炭棒，特务们已不能分清谁是戴笠，谁是龚仙舫，后经闻讯赶来的贾金南进行辨认，才弄清从“困雨沟”中捞出的1具尸体是戴尸。贾金南是通过戴笠生前左边白齿上下镶嵌的6颗金牙才确定戴笠尸身的，他10多年来始终跟随戴笠当勤

务兵和副官，不但对戴笠忠心耿耿，而且对戴笠情况的了解和熟悉无人能及。这次因事滞留上海、南京，未能同行，故躲过一场灾难。

3月19日，军统上海办事处的“将”字号的大特务李崇诗、王新衡、毛森、邓葆光、王一心等乘专列赶往南京，在南京换乘汽车赶往江宁板桥镇，然后步行到达戴山，此时已是3月20日上午。李崇诗等大特务们一到戴山，立即向戴笠的尸体围上前去，只见这个生前叱咤风云、威风不可一世的特工王，现在却成了一具残肢断臂、面目全非的焦炭棒，暴尸三日，无人收殓。

贾金南仔细将戴笠的半截尸体（右手和小腿均未找到）用白布一层层裹好，抱在怀中，踏着泥泞的山坡，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可笑的是，在板桥镇乘车返回时，乘自备轿车前来的军统大特务们竟没有一人肯让贾金南抱着戴笠的尸体上车。贾金南想到戴笠尸骨未寒，这些平时对戴笠无比“尊敬”的大特务们就脸色陡变，一腔怒气无从发泄，只得一边嚎啕大哭，一边搭乘了一辆大卡车返回南京。

当日下午4时左右，沈醉从重庆赶到南京，见到戴笠的尸体，立即指挥人将死尸先送到殡仪馆整容换衣。然后将戴尸装殓放进李崇诗从上海购买的一具楠木棺材内。同时在南京中山路的军统办事处设一灵堂，将戴笠、龚仙舫等的棺木放置在灵堂里，一切草草办完后，李人士便邀请上海、南京、重庆各地赶来的大特务们到一家大饭店里摆下豪华的宴席，心安理得地大嚼起来。

在一片杯盘交错声中，除了沈醉、邓葆光等少数几个大特务因铭记戴笠生前的知遇之恩而难过得吃不下饭外，绝大多数人却因心情极好而胃口大开。在他们认为，戴笠死后，虽然会给军统的事业带来很大的损失，然而他们自己在接收日伪财产中贪污受贿的大批财产再也用不着担心戴笠追查处理了。

3月21日，沈醉为了追查寻找戴笠遗物，专程到戴山踏勘飞机失事现场，并召集当地的县长、保甲长开会，追查是否有人私捡了飞机失事后散落的古玩珍品。经过一番威胁利诱，果然事隔不久，县长派人送来了一只一尺多高的宋代雕琢的羊脂玉白九龙杯和一柄古剑。那古剑虽遭烈火冶炼，鞘柄俱毁，但剑体依然寒光闪闪，锋利无比，令人惊叹不已。可惜，当时没有一个特务能够识破此剑的庐山真面目和个中玄机。这2件珍品由军统清点上送到当时的故宫博物院。沈醉此行是有大功的，正是找到此剑，后来成了弄清戴笠死因的线索。

### 戴笠死因之谜

为了加强布置对东北的反共活动，搜罗在华北地区日伪汉奸特务，组织内蒙方面的反共特务组织，以便派往被中共武装占领的内蒙广大地区开展活动。抗战胜利后夺得肃奸大权的戴笠再一次来到华北。在北平期间，戴笠亲自提审了已被逮捕的著名日本间谍川岛芳子（金壁辉）。川岛芳子长期在华北地区活动，对内蒙方面的情况不但十分熟悉，而且她手中掌握的一些关系可以进行利用。

当川岛芳子知道坐在对面的这位黝黑马脸、气度不凡的中年汉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戴笠时，顿时来了精神。她除了说了些在反共特工活动方面情况对戴笠有所作用，还说出了一件令戴笠十分震惊的秘密川岛芳子告发，军统大特务马汉三在抗战期间曾经叛变投日。在战后逮捕她的时候，马汉三还从她

家中搜走了一柄九龙宝剑。川岛芳子说出宝剑一事，本意只是想作为证明马汉三投日的危机证，不想戴笠听到“九龙宝剑”几个字，神经很快紧张起来，马上联想到孙殿英当年送给他的那把龙泉宝剑，便详详细细向川岛芳子打听她所见到的这把宝剑的详细情况，当戴笠从剑体的外观、长度，剑柄上雕龙及剑鞘上嵌玉的数量与形状等断定，均与孙殿英赠送的那把龙泉宝剑的特征吻合时，多年来萦绕他心头的一个疑问终于有了答案。

原来，从1939年初开始，蒋介石的政治重心已经开始从对外抗日转变到对内反共。在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防共、溶共、限共、反共”的政策，设置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会后，蒋介石特别交代戴笠，当前许多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军队中钻进了中共人员，有的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地方武装的领导权，形成了与国民党中央军抗衡的力量。并告诫戴笠，据有关方面报告，孙殿英的新五军里就钻进了大批共产党人，孙殿英的副军长邢肇棠就是共产党人。蒋介石说，华北沦陷以后，晋东南的中条山区、太行山区成了国民党军队的唯一敌后根据地，必须确保能把孙殿英控制在“中央”手中，不使这块根据地丢失。为此，蒋介石指令戴笠以校阅新五军为名，视察华北太行山区的部队，规劝孙殿英反共，清除新五军中的中共组织，对其它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军队组织和群众抗日武装也要照此办理，以确保五届五中全会制订的反共方针能够切实贯彻执行。

戴笠受命，动身前往华北太行山区。他此行一方面是奉命清查孙殿英的通共行为，一方面是为了向孙殿英讨要一件国宝——龙泉宝剑。

戴笠对孙殿英其实早有布置。30年代初，孙殿英率部西进宁夏，结果被西北“五马”之一的马鸿逵打败，又被何应钦趁机免去本兼各职。孙殿英黔驴技穷，只得下野赴山西太原晋祠闲居。七七事变后，孙殿英东山再起。他只身溜回北平，从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那里弄到500支枪。接着从北平出城，一路收容散兵游勇。当他走到石家庄以北的东长寿时，居然收容到2000多人，编成了4个大队，有了一定实力。

孙殿英是个惯于见机行事，因时而起的果雄。他知道要想在政治上重新造成一个气候，必须先从蒋介石那里谋取一个正式“名义”，才能名正言顺地招兵买马，进一步扩充实力。不然凭这两千来条人枪，最多只能当个“山大王”，难得“正果”。由此，孙殿英想到了戴笠。他先派遣擅长外交的亲信随从刘曾若到南京找到戴笠，请戴笠为他在蒋介石面前打通关节。然后由驻防保定的第二集团军司令刘峙电请蒋介石召见。其间，孙殿英的杀手锏就是用东陵盗来的宝贝开路。

1937年8月上旬，孙殿英带上大批礼物到南京。他先与戴笠见面，献上随身所带的奇珍异宝，请戴笠赠于蒋介石、宋美龄、何应钦、宋子文等人。宝物中最名贵的是一颗夜明珠。据孙殿英向戴笠介绍，这本是用炸药崩开慈禧陵墓时，从慈禧嘴里掏出来的。当时将棺材劈开，慈禧尸身完好，好像在睡觉一样，就是因为她嘴里含着这颗夜明珠。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珠，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戴笠把玩一番，果然如此，不禁连连喝彩。于是这件宝物由戴笠提议献给蒋夫人宋美龄，孙殿英连连称是。另一件宝物是慈禧在墓中用的枕头，名翡翠西瓜，也由戴笠提议转赠给宋子文。其它一应大小宝物都由戴笠一一作主，或献蒋、或赠何、或送孔，孙殿英莫不称是。只是孔祥熙夫妇后来看到宋氏兄妹宝物之后，极为眼红，经戴笠电告孙殿英，孙殿英又选了两串朝



鞋上的宝石送去，才算摆平。孙殿英这次向戴笠点交宝物之后，又向戴笠许诺，他尚有一件最最名贵的九龙宝剑，乃是从乾隆皇帝墓中盗得，剑长5尺，剑柄特长，上雕9条紫金龙，象征“九九归一”的至尊皇位，剑体光华四射，不锈不污，其锋无比，吹毛可断，削铁如泥。剑鞘用名贵鲨鱼皮制成，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太阳之下，一片光华闪灿，令人炫目，孙殿英说，得到此剑以后，他曾暗中请人考证，才知此剑是清乾隆28年春，由新疆爱乌罕、马达克山、霍罕、哈萨克各部落派使节来京入朝，晋谒高宗乾隆皇帝时所献的一件主物。当乾隆在龙位上佩上此剑，顿时满殿生辉，华光耀眼，犹如万朵彩云在殿中飘舞，满朝文武大臣莫不称幸。高宗皇帝见此龙颜大悦，特以“龙泉”二字命名，并赐宴使节和文武大臣于紫光阁。从此以后，乾隆对此剑爱不释手，朝夕相伴，直至驾崩之时，仍遗命将此剑同时下葬，永不分离。说到此处，孙殿英又鬼头鬼脑地对戴笠附耳低言，说此剑是他从东陵盗取的无数奇珍异宝中最宝贵的宝物，自得此剑后，一直藏在秘处，不肯示人。只因此行匆匆，未能及时取来，只待下次有机会，一定将此剑献上，请戴先生转献委员长或何部长，一切由戴先生裁处。戴笠听完此事，不觉怦然心动，当即满面笑容地应承此事。

献完了这些价值连城的稀世之宝，孙殿英才与戴笠言归正传，谈到此行的目的。孙殿英先吹嘘自己已有人枪近万，还可以号召旧部数万，进可以与日军决一雌雄，退可以与八路军争一短长。凭他老闯江湖的一套本领，总不会落在别人后头。

孙殿英的这大套大话自骗不过戴笠。不过，在戴笠看来，抗战初期正是用人之际，况戴笠的这一套想法正合老头子的心意，大可利用。同时，如能把孙殿英扶植起来，控制在自己手中，不啻也是增加一份实力，加强自己在老头子心目中的地位。于是，戴笠当即向孙殿英允诺，要助他一臂之力，使他不虚此行。

经戴笠安排，蒋如期接见孙殿英，一见面，蒋即说，你的情形戴局长向我说明白了。你好好地为国出力，我已手令你为冀察游击司令。孙殿英连忙站起来谢恩，接见完毕，蒋瞪着眼睛把孙殿英从头到脚瞧了一遍，一字一句地说，老殿：你很能干，有作为，就是过去的历史不太清白，趁抗日救国之机，好好地洗刷一番，以后不要胡来，有困难找我。此语一出，把孙殿英吓出了一身冷汗。孙殿英当即站起来倒身便拜，连说，我过去没有找到亲爹亲娘，这次雨农引我找到了亲爹亲娘，走上了正道，从此忠心不二，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我早就向雨农盟过誓……孙殿英话没有说完，蒋介石立刻改变了严肃的面孔，命侍从参谋将孙殿英扶起来，摆了摆手，含笑地连说了几声好好，即退了出去。

孙殿英的南京之行，表面上对戴笠异常感激。其实，他只不过是利用戴笠而已。孙殿英认为，带着从东陵盗来的大批奇珍异宝，就是没有戴笠，也能买到一个司令的头衔。这就是“钱能通神”的妙用。孙殿英一生奉行的三句名言是：骑马要骑得巧；耍人要耍得好；撒钱要撒得呱呱叫。他认为，南京之行就是利用戴笠是蒋的心腹亲信的地位，达到耍人耍得好、撒钱撒得呱呱叫的目的。

孙殿英要利用戴笠，而戴笠其实亦对孙殿英看得很透。他对孙殿英始终是不放心的。为此，戴笠在南京就与孙殿英谈定，在冀察游击司令部里成立联络参谋室，由军统特务严家诰以军委会联络参谋的名义掩护，率领一个特

派小组，配属一部电台，随同孙殿英到华北赴任，常驻孙部对孙进行严密控制。交换条件是，由孙在南京设一个办事处，以刘曾若为主任。办事处的主要任务就是跟戴保持联络。孙部的军费、枪支弹药，都由办事处通过戴接洽后给予补充。孙殿英由南京北上之际，戴笠又向孙介绍了一位叫于炳然的神秘人物随行，因此人与内蒙古德王驻北平办事处主任有同学之谊，私交颇笃。故请孙殿英掩护此人潜入北平，对其同学进行策反活动。孙殿英如约办到。

孙殿英始终是个以个人利益作中心的唯我主义者。根本无所谓革命与反革命和进步与落后的差别，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谁对他有利，就利用谁为他服务。当时，孙殿英一方面利用戴笠作靠山，谋取头衔，取得军费、弹药的补充，一方面则积极与共产党人接触，保持联系，利用中共党员的革命献身精神与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为他训练部队，提高战斗力。因此，在孙殿英编成的4个大队中，有不少干部是由共产党人担任，其中大队长邢肇棠就是中共派遣的重要干部。

孙殿英回到石家庄东长寿以后，又在车站会见了当时以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乘专车北上宣传抗日的周恩来，孙当即向周恩来表示，拥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立场，并接受了周恩来介绍到孙部工作的共产党人靖任秋。

1939年1月，蒋介石手令何应钦将孙部改编成新编第五军，下辖第三师和第四师，所部调防河南林县，靖任秋调任第四师副师长。新五军处于蒋军晋东南根据地的前沿，所以蒋介石对孙殿英的一举一动非常注意，既防他通共，又防他投降日伪，不断指示戴笠加强对孙部行动控制。戴笠为此除继续派大特务严家诰以新五军高参名义随孙部行动外，又加派大特务徐静远、张振远为“军事委员会平汉路北段爆破总队”正副总队长，成立1000余人的庞大爆破队，配属电台随孙部行动，亦步亦趋地对新五军进行监视，另外，又成立军统局晋东南站，派山西人、黄埔五期毕业的大特务乔家才为站长，重点还是加强对孙部的监视控制。

戴笠来到新五军驻地，通过对各方面进行深入考察了解，发现在孙殿英身边确有不少共产党人，但孙殿英是很狡诈精明的，他始终把各级军事主官交给其旧部军人掌握，不让共产党人担任实职。这说明他对共产党也仅限于利用而已。戴笠据此认为，孙殿英乃是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处处以个人利害为转移，投共绝非他所愿，投日伪有可能，但不到无路可走，当不致出此下策。然而当前要他断然采取反共立场，似也不太现实。因此，戴笠的策略是继续加强对孙殿英的监控，逐步收紧绳索，加大压力，逼迫他采取反共、清共措施，摆脱共产党的影响，确保他为国民党所用。同时，作为控制孙殿英的措施之一，戴笠在这次与孙殿英的会晤中，主动提出与孙拈香拜把，结为兄弟。孙殿英一听，自是喜不自胜。于是孙年长为兄，戴年少为弟。自此以后，戴称孙为“魁元兄”，孙也改口叫戴笠“雨农老弟”。

“雨农老弟”“校阅”既毕，开始旧事重提，拾起东陵盗宝的话题。“魁元兄”是一点就通之人，马上连叫“请罪”、“请罪”，立即交出已在南京许诺的“龙泉宝剑”，即托戴笠代为转献。

戴笠得剑后细细把玩，果然名不虚传，确是平生未见之稀世珍宝。一时心花怒放，笑逐颜开。他连拍孙殿英的肩头说：“魁元兄，有了此剑，我包你后半生平安无事！”

戴笠对此剑极为看重，他因此还要继续前往中原各部队视察，检查贯彻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定反共方针的情况，生怕带着此剑过于招摇，难保没有闪失。于是亲自交代大特务马汉三，要他视陆路“保险”时将此剑带交何应钦，再由他本人亲自转献蒋介石。

马汉三原系军统北平区张家口察绥站站长，这次由戴笠召到林县见面，改调他为军统陕坝工作组组长，专门负责内蒙一带的特工活动，并对率部进入绥西作战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博作义进行监视控制，以防他通共联共。

当马汉三从戴笠手中接过这把龙泉宝剑时，立时被这件稀世之宝震惊得不知所措。他深知其价值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一旦能够带出国外，不但自己终身的荣华富贵有了保障，就是子孙后代也享用不尽。马汉三本就贪婪无比，自得到这把宝剑后，终日神魂颠倒，茶饭不思。他既舍不得轻易把这件到手的异宝送到重庆，又害怕躲不过戴笠的严厉打击。思来想去，他竟利令智昏，决定宝物暂不上交，先静观局势发展。当时正是日军长驱西进，国民党军队全面溃退，大片国土沦失，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未卜的严峻时刻，马汉三自忖如果国家民族不保，军统当然也不复存在，自己何不携带此剑就此脱离军统，逃亡国外，换得荣华富贵，可保终身受用。万一局势有了转机，戴笠又紧迫不放，则随便找一个理由作为迟缓上交此剑的借口，再把此剑送还戴笠不迟。

戴笠从中原各地视察回到重庆后，虽未见马汉三将此剑送到，但他并未追问。一方面认为关山阻隔，路途艰险，故而迁延时日。另一方面他自己也许并不想马上将此剑献给蒋介石。

就在戴笠的瞬息疏忽之间，龙泉宝剑又再次易主。1940年初，马汉三以商人身份在张家口活动时，误与日本特务机关开设的“大隆洋行”接触，并因挥金如土、生活糜烂，引起“大隆洋行”的后台老板、日军大特务田中隆吉的注意。田中隆吉是一位老资格的日军特务，属于日军少壮派。自20年代以来，先后在上海、东北、华北、内蒙等地，策划过无数阻谋事件，被称为是一个具有狐狸般狡猾和疯子般性格的阴谋家。经田中派特务一查，马汉三的身份很快被弄清，田中隆吉马上指示张家口特务机关长田中新将马汉三逮捕审讯，大凡贪财之人，无不怕死，马汉三被捕后，听说落在嗜杀成性的大特务田中隆吉手中，自知情况不妙，当即供出全部情况，并献出龙泉宝剑，以求活命，果然田中隆吉得到此剑，欣喜异常，不但免其一死，而且将其释放，令其暗中为日军特务机关服务。

1940年春，田中隆吉被日本东京大本营派充为日军山西派遣军少将参谋长。12月，田中隆吉因指挥山西作战失利，被奉调回国。田中隆吉深知自己因平时飞扬跋扈，在日本军界中口碑很坏，可能结果不妙，因而在回国前路经北平时找到川岛芳子，将龙泉宝剑交给川岛芳子妥为保管，以防回国后受到宪兵的整肃而被迫缴。20年代末期，田中隆吉在上海任特务机关长期间，川岛芳子曾在他手下工作。两人双宿双飞、狼狈为奸，有很深的关系。

马汉三自被田中隆吉释放后，因这段经历并未暴露，所以仍然当他的军统陕坝工作组组长。不久，戴笠因久不见马汉三送剑到渝，故发电查询，马汉三则胆颤心惊地复电戴笠，因此剑珍贵异常，风云突变，为安全计，古剑仍留在孙殿英处，容日后再做计议等待。戴笠又去电孙殿英处询问，孙殿英一方面弄不清戴笠再次提出讨剑，其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一方面忙于暗中与日军洽谈投降事宜，无暇顾及，故久久未给回电，戴笠怀疑孙殿英一时反悔，也不便追逼此事，等到孙殿英公开投敌，讨剑一事也就更不好提起，

马汉三因而侥幸过关，把这一巨案搪塞遮掩过去。以后，马汉三居然步步高升，先后由陕坝工作组组长调任军统兰州站站长兼第八战区调查室主任、宁夏缉私处处长、五原办事处主任、军统局本部布置处处长等职。但马汉三的一块“心病”仍时时系在宝剑身上，时时在暗中密切注视田中隆吉回国前与什么人有过接触，终于了解到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交情非浅。由此秘密派军统特务以“和谈”为名，长期潜伏在川岛芳子身边，以对其进行掌握控制。抗战胜利后，马汉三通过毛人凤向戴笠进行活动，被任命为北平办事处主任、平津地区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北平行营军警督察处处长。马汉三到北平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抢在肃奸行动开始之前，亲自带人于1946年10月11日将川岛芳子逮捕。然后命人在川岛芳子的住处北平东四牌楼九条胡同34号进行大搜查。这是一处有二进院落的四合院，原是大汉奸伪满洲国实业部长张燕卿送给她的逆产。马汉三指挥手下特务整整用了2个小时进行挖地三尺式的搜寻，终于在房后的地窖中找到此剑。

马汉三复得此剑，又看到孙殿英在战后重新投靠国民党，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知道这场戏已经唱到尽头，自己在军统的日子指日可数，只要戴笠与孙殿英再次见面，自己私截宝剑的罪行就会暴露，以戴笠的手腕，自己有几个脑袋都是保不住的。于是，马汉三开始了秘密布置。一是在军统高级特务中寻找靠山和援手，特别是同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人拉好关系。马汉三因心中有鬼，早在任宁夏缉私处长时，就狠捞了一把，一方面准备后路，一方面给郑、唐、毛等大特务送礼，以防在不测时能有所照指。马汉三到北平后，一如既往，对郑、唐、毛经常孝敬，且不图报答。当郑介民到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后，马汉三更是通过送礼行贿与郑介民紧紧勾结在一起，成为郑的亲信心腹。在此基础上，马汉三利用他长期在华北地区工作的条件，大肆搜罗党羽，组织小团体，这个秘密组织人数最多时达到50多人，其中包括军统北平站长乔家才等大特务。马汉三秘密策划，如果形势危急时，就用破釜沉舟的方法，铤而走险，拼死一搏。

马汉三营造的第二个洞窟，就是投靠北平辕行主任李宗仁。马汉三知道桂系是国民党内独树一帜的实力派，如果能得李宗仁的保护，不要说戴笠无可奈何，就是蒋介石也一时难以下手。于是，马汉三处处对李宗仁巴结逢迎，忠心耿耿，并把军统内部有些不利于桂系的情报及时向李密报，深得李宗仁的信任，因而由李力荐他担任北平市民政厅长，成为李的心腹。

马汉三的最后着就是预备逃亡国外，远走高飞。

马汉三营造“三洞”，但进那一个“洞”都是少不了金银财物的。于是，马汉三到北平后，利用接收日伪财产和肃奸的权力，几乎是发了疯似地贪污索贿，其所聚敛的财物简直难以计数，在军统清查工作开始前，由马汉三等人大捞剩下后上报的日伪财产尚有一仓库，但是等到军统清查大员廖华平、沈醉等人到达北平清查时，一仓库的财物又只剩下半仓库。可见马汉三等贪污财物之巨。

戴笠弄清自己朝思暮想的龙泉宝剑尚在马汉三处，且马汉三又是个暗中出卖“团体”，背叛国家的“异类”时，心中极其愤恨，恨不能立刻生啖其肉，以泄其愤。然而待到戴笠把此事冷静地思考了一遍，感到尚不宜鲁莽行事。一是马汉三“叛变”的证据尚没有到手，仅凭川岛芳子的一面之词是不足为据的，川岛芳子本是一个特工老手，万一中了她的圈套，岂不贻笑天下。况且川岛芳子揭发马汉三，是由于马汉三竭力宣传川岛芳子是“特大号汉

奸”，要杀川岛芳子以灭口，安知川岛芳子不是反其意而用之？二是戴笠当时既要急于赴青岛与柯克践约会晤，进一步洽谈美国海军援助中国的舰艇问题，又要赶往上海与胡蝶见面，并替胡蝶办理与其夫潘有声的离婚手续问题，准备正式与胡蝶结婚；然后，还要返渝向蒋汇报华北、华东等地肃奸案件的处理情况，参加新八人小组会议等等，并主持战后第一次“四一”庆祝大会，这段时间实在难以分身在北平亲自调查处理马汉三巨案；三是戴笠认为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如何与黄埔系的三人进行斗争，使“团体”不被端锅的问题，如果在此时将马汉三这一巨案抖落出去，徒然给对手增加攻击的口实，反使“团体”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四是孙殿英所献的这一柄象征皇权的龙泉宝剑，戴笠虽口口声声对孙殿英说要献给委座，但内心深处又未必如此，实际上意在由自己秘藏，故始终没有向外透露，更没有向蒋报告。现在如果把马汉三扣押起来，并签报蒋予以处决，蒋如果查询龙泉宝剑的来龙去脉，自己何以为对；五是戴笠感到北平是桂系的天下，且马汉三不但党羽遍布华北，而且与李宗仁关系密切，自己尚身在虎穴，一旦打草惊蛇，激起狗急跳墙，其后果不可不防。如此一想，戴笠决定施以缓兵之计，徐图对策，伺机收拾这个“异类”。

戴笠与龚仙舫密谋策划的结果，决定第一步由龚仙舫给马汉三递过话去，只是索要“从金壁辉家中搜出的古剑”，其它的话题一律不谈。一来是要取得确实证据，弄清此剑是否就是彼剑，一剑在手，即可测知马汉三其人真面目，二来戴笠实在是太想念这把宝剑，他怕夜长梦多，此剑如再次易主，那就永难谋面了。

当龚仙舫向马汉三提到宝剑一事，马汉三即知事情已经败露。马汉三是有胆量的，生存的本能促使他决定要向“无人能敌”的老板作一次最后的较量，而决不做束手待毙的阶下囚。马汉三当即按久已蓄谋的步骤实施。为了能稳住戴笠、龚仙舫，争取时间，马汉三装得很“识相”；极痛快地交出宝剑，只是说他如何“出生入死”，保护了宝剑。这些破绽百出的谎言自骗不过聪明绝顶的戴笠，相反，却显示了撒谎人的自欺欺人和笨拙可笑。但唯其如此，却应了古人的两句俗语：聪明过头就是愚蠢，大智若愚。马汉三这一“笨拙”的险棋却造成了戴笠抱恨终天的失策。

马汉三一步得手，连施妙着。他发现戴笠并没有立下杀手，赶尽杀绝的意思，马上将预备好的10大箱价值连城的书画古董、金银财物，亲自押送到弓弦胡同什锦花园，孝敬戴笠。戴笠笑眯眯地照收不误。在戴笠看来，马汉三此举无非是想以巨宝“赎罪”和“堵嘴”，但是他这样做的结果不是既暴露了自己犯下了弥天大罪，又是一个利用肃奸行动大肆搜刮汉奸财产的大贪污犯吗？戴笠这样分析马汉三动机，又导致他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结果对马汉三这一“愚蠢”的举动毫不怀疑，并且将预先准备的一份给文强的信交给马汉三转送。他估计马汉三将会偷看信的内容，因而露出将重用马的口风，以稳住马汉三。

马汉三二番得手，又将自己的心腹秘书刘玉珠找来，研究如何实施第三步行动方案。刘玉珠是马汉三集团内最核心的成员，马汉三所有贪污索贿行为，都是刘一手经办，二人已到了生死与共的地步。马、刘二人首先偷看了戴笠给文强的信，内中虽有拟将马汉三他调，委以重任的意思，但马汉三早已看穿这是戴笠调虎离山所放的烟幕弹，因而更坚定了他破釜沉舟的信念，接着，马汉三发现戴笠在信中透露此去天津后，将去青岛、上海等地的重要

机密情报。于是，马汉三对刘玉珠附耳授以密计，如此如此。刘玉珠领计，当天夜间即秘密动身，先期赶往青岛，进行周密部署，一个以于掉戴笠为目标的行动计划实施已到了最后阶段，死亡的阴影已在一步步向纵横天下的戴笠逼近，而戴笠却全然不察。

### “3·17”空难

戴笠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周中，似乎已经预见到某种事态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因而开始将军统面临的严峻形势在小范围内给一部分军统特务吹风。1946年3月10日，戴笠在即将离开北平前夕，在北平怀仁堂主持军统北平办事处总理纪念周，发表公开讲演。戴笠说：“去年领袖叫我当中央委员，我坚辞不就，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一个革命者”。“最近中央开六届二中全会，十几天来所表现的情况，未出我预料之外，对调查统计局的问题，看来是毁誉参半的。有人叫要打倒我们（所谓特务），我不知道什么叫打倒，什么叫取消，我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官僚腐化。如果这样，人家不打，自己也会倒的。所以我时刻所想的，是如何对得起先烈，如何保持光荣历史，决没有想到别人如何打倒我。我个人无政治主张，一切唯秉承委员长的旨意，埋头去做，国家才有出路，个人才有前途。”戴笠的这番话无非是想说明，他早已将政治上的进退置之度外，随时准备面对可能出现的严峻形势。

3月12日，戴笠约见在北平执行军事调处任务的郑介民，在商讨解决东北军事危机的同时，出其不意地把军统的家底和善后工作一件一件地向郑介民作了交代。戴笠既不讲明自己预备出国的腹案，也没有说明军统的前途，却与郑介民作了“最后晚餐”式的交代，顿使郑介民如坠雾里云中，隐约有一种凶险不测之感。

3月13日，戴笠在北平工作干部会议上再次发表讲话，然后赴天津。军统华北总督察王蒲臣率军统在北平的干部送行，马汉三则陪同戴笠赴天津。戴笠与军统大小特务握手告别，并谦谢说：“下不为例，这是最后一次。”这在戴笠也许只是故作姿态的游戏之言，然而站在一旁的马汉三听了，心中不觉怦然一动，认为“这是最后一次”，也许正是预示戴笠死到临头。

领銜送行的王蒲臣，是戴笠为对付马汉三而刚刚调来北平工作的一名军统大特务。他的公开身份是军统华北总督察，秘密使命则是：调查监视马汉三及其同党在平津的所作所为，向军统局提出证据确实的报告。王蒲臣多年从事华北地区的军统活动和秘密督察工作，对平津的情况很熟悉，人亦精明能干，是戴笠的心腹亲信，自戴笠察觉马汉三不轨行迹后，当即下令将王蒲臣调任华北总督察的要职，一方面箝制马汉三的活动，一方面着手秘密调查马汉三抗战期间及胜利后的行迹，以便为铲除马汉三搜集证据。戴笠的这一着棋虽然布得太慢，被马汉三一步占先，但毕竟为两年后铲除马汉三集团起了重要作用。

3月13日，戴笠一行来到天津，这是他在战后的第三次天津之行。戴笠此行天津有两个任务，一是整饬特务中利用肃奸进行贪污腐化的现象。二是处理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副军长杨文泉在津纳妾一事。

戴笠到津后，即召集在津的特务训话，警告所属特务要忠于领袖，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克己奉公，遵守“家规”，否则定予严惩。戴笠并当场宣布严惩犯有严重贪污罪、已经被扣押的军统电讯处长魏大铭，发誓要枪毙与汉奸小老婆通奸的北平肃奸委员会的军统特务王子英等等。戴笠这

番话虽是对天津及军统的普遍状况而言，但主要目的还在于敲山震虎、儆戒在座的马汉三。戴笠不在马汉三以军统北平站站长身份直接统治的北平市讲，而跑到天津来说这番话，这正是戴笠的心机缜密之处；一方面，他不能过早地打草惊蛇逼反马汉三；另一方面又要使马汉三有所醒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所收敛。

3月13日晚，戴笠派人直接通知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谓委座座谕，因杨文泉在津私纳雍载华为妾，将杨文泉扣押法办。3月14日，牟廷芳邀同天津市长张廷谔、副市长杜建时三人到马场道7号会见戴笠，代杨文泉求情，说杨是续弦不是纳妾，请求戴向蒋转陈此情，免予处分。戴笠却摆出一副钦差大臣的面孔，对牟、张、杜3位地方大员的说情置之不理，并虚声恫吓道，不管是谁，违犯纪律都要严惩。为了杀鸡儆猴，戴笠当即指令陈仙洲把在津纳妾的军统特务、天津区汉奸财产清查委员会审讯组长朱洽阳扣押镣审。牟、张、杜见戴笠对纳妾一事如此大做文章，自觉无趣，只得唯唯而退，另想门路。不意戴笠在3天后死去，杨案经牟廷芳等人向军统继任局长郑介民转圈，此案即不了了之。

戴笠本拟在3月14日飞青岛，然后去上海，但因牟、张、杜等人为替杨文泉说情而再三殷勤挽留，戴笠在天津延至到15日，恰好这一天，又接到文强从东北发来的急电，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将于3月16日在北平白塔寺中和医院动手术，割去左肾。建议戴笠借机探望一下，以利于东北办事处今后的工作，杜聿明与戴笠相识已有十多年，现升任东三省保安司令，拥有雄兵10万，美式装备。戴笠意识到杜对东北的作用今后将会很突出，于是接受文强的建议，于3月15日晚赶到北平，即赴中和医院秘密看望杜聿明。

戴笠的突然造访，使杜聿明颇为惊恐，杜初疑戴是衔蒋命而来打听自己病情，以决定东北是否“阵前走马换将”，后弄清戴是借关心病情关心东北局势和军统活动，才放了心。戴先以自己当年在上海割盲肠的经验，关切地忠告杜聿明不能让年龄太大的大夫作手术主刀，否则会因动作迟钝，留下后遗症。接着又亲自到医院里查询安排。一番忙碌之后，戴才言归正传，希望杜能早日出院，回东北主事。并说，他过去对仕未帮过忙，今后将全力支持，在东北成立军警稽查处，推荐文强为处长。同时将考虑调2个交通警察总队到东北，担任北宁路及中长路的警备和检查任务等等。杜幸明见戴笠情意恳切，当即表示感谢，并表示将全力支持军统在东北地区的工作。

3月16日，戴笠由北平返回天津，当即带领早已作好准备，因戴笠突然去北平而延期出发的随员由天津直飞青岛。天津机场上，戴笠笑容满面地与送行的马汉三、陈仙洲、黄天迈等平津地区的大特务话别。马汉三即于当日返回北平。

戴笠在天津起飞前，分别向军统上海办事处和重庆局本部发了2份电报。发给上海的电报是给上海办事处参谋长李崇诗，戴指定由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三人于3月17日下午2时到上海龙华机场接他。发给重庆的电报是给毛人凤的，戴笠要毛人凤向蒋介石报告他的行止，他将于近日内由上海返回重庆，向蒋汇报此行情况。

戴笠于当日到达青岛，军统青岛办事处主任梁若节一见面就向戴笠报告，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已于当日飞上海，准备由上海乘机回国，并约定与戴笠在上海见面，最后商谈“援助”问题。戴笠马上决定在青岛小憩一夜，于第二日上午赶往上海，并指示人下机后，所带行装、物品，包括马

汉三的 10 大箱礼品均不下机；飞机停在青岛沧口机场，由梁若节派特务严密看守，确保安全。

3 月 17 日上午，经青岛沧口机场向上海龙华机场联系，龙华机场天气晴好，下午可能有雨。戴笠听后十分高兴，因他乘坐的这架由航空委员会拨给的 DC47 型 222 号专机，是美国提供的导航设备最完善，可以全天候飞行的军用运输机，堪称 40 年代世界一流飞机，相当安全可靠。为此，戴笠于 17 日上午 9 时决定：专机 11 时起飞，并告诉飞机师多备油料（达 800 加仑）。戴笠考虑，万一上海龙华机场天气条件过于恶劣，不便降落，则转降南京机场，或直飞重庆。布置完毕，戴笠还兴致勃勃他说了句“老天爷帮忙”。这是戴笠一方面是由于对专机性能的信赖，另一方面急于赶赴上海的心情不容他在青岛多作停留。此时，胡蝶早已到达上海，正等候戴笠到上海后帮其办理与丈夫潘有声离婚手续；柯克因卸任从上海回国，戴笠必须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与其作一次深谈；上海的这两件大事处理结束后，戴笠还将按原先已向蒋报告的在 3 月中旬迅速赶赴重庆，一是向蒋介石汇报这次外巡的情况，二是参加新八人小组会议，对付黄埔系“三大哥”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的“端锅”行动，三是主持庆祝战后第一次“四一”大会等等。

戴笠的起飞时间确定后，有一个人立即忙碌起来，这就是早两天已到青岛秘密守候戴笠到达的刘玉珠。

刘玉珠到达青岛，以军统局华北督导员的特殊身份，暗中与青岛机场的航空检查人员混得很熟，并与机场和军统青岛办事处的有关方面打通关节，以便及时掌握戴笠的行踪。马汉三、刘玉珠等人十分了解戴笠的特点，知道他历来对自己的行动计划极其保密。一般来说，戴笠座机移动的时间和路线均由他自己作出决定，从不肯受别人左右或影响；戴笠每次作出决定后一般只通知极少数有关人员，以免张扬泄密；并且常常在作出决定后，突然改变行动时间和行动路线，使手下人搞得措手不及。针对戴笠的这些习性，马汉三与刘玉珠事先作了周密的计划和安排。因此，刘玉珠到青岛后，不是抛头露面，而是沉入基层，只在暗中积极活动，秘密建立情报网络，开辟计划实施时的掩蔽渠道。这一手确是厉害，由于刘玉珠有华北督导员的特殊身份，手中又有大把大把的钞票，并且又十分熟悉青岛地区军统内部的情况，所以，仅仅两三天时间一张大网已经织好，只等戴笠到来。当戴笠决定于上午 11 时起飞时，情报很快反馈到等候在沧口机场的刘玉珠那里。于是，刘玉珠立即按计划实施暗杀戴笠的方案。

刘玉珠驱车到达机场，向警卫 222 号专机的特务提出登机检查“安全状况”，以确保飞机安全。由于刘有军统华北督导员的特殊身份，有这个权力，况且特务们均和他很熟悉，近来又得了他不少好处，因此，谁也不会对刘督导员的登机产生怀疑。于是，刘玉珠很顺利地一个人登机用马汉三事先预备的钥匙，打开一个木箱，塞进了经过伪装的高爆力定时炸弹，并将引爆时针拨到飞机飞临上海龙华机场上空时爆炸，以造成飞机降落时失事的假象。

但是，上午 11 时正已过，戴笠并没有马上起飞。由于接见山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洪九等人，戴笠将起飞时间一再推迟。这一突发变故使暗中窥测在一旁的刘玉珠惊出一身冷汗，他完全弄不清戴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是一般的延迟出发时间呢，还是察觉了他们的阴谋？假如出发时间超出定时引爆时间，不但一切计划均被打破，而且他们的阴谋将很快被发觉，他和马汉三都将死无葬身之处。就在刘玉珠惊慌失措、六神无主的时候，



11 时 45 分，戴笠终于登机，下令起飞。专机像一只大鸟冲天而起，向上海方向逶迤而去，刘玉珠被吓得蜡黄的脸上才泛出了一点血色。

222 号专机从沧口机场起飞后，即遇大雾。飞不多久，经与上海龙华机场联络，说是上海方面雨大如注，气候恶劣，该机不能降落。于是，戴笠决定直飞南京。飞机到达江淮地区上空，正值大雨，云层很低，能见度差，飞机偏离航线。约在下午 1 时 6 分，飞机到达南京上空。1 时 13 分，当飞机抵达南京郊县江宁板桥镇上空时，刘玉珠设定的高爆力定时炸弹起爆，飞机顿时失控，一头栽倒在板桥镇以南一座不足 200 公尺高的小土山——戴山的半山腰上。由于机上所备油料充足，飞机坠毁后，大火在雨中熊熊燃烧了 2 个多小时才熄灭，机上所有行李、物品，包括 10 箱书画古董，均被燃烧殆尽。机上人员无一幸存，他们分别是：戴笠，国民党军委会军事调查统计局局长，陆军少将领中将衔；龚仙舫，军统局秘书兼局本部人事处长，军统少将；金玉波，军统局专员，帮会工作专家，杜月笙徒弟，江苏人；徐焱，副官；马佩衡，英文秘书，香港大学文学士，刚从牢房开释，其英语口语水平很高，很受美国人欢迎，戴笠原拟用他作为与柯克会谈时翻译；黄顺柏，戴笠保释的汉奸，此次跟随戴笠赴上海与杜月笙合作筹备军统北洋保商银行；曹纪华，卫士；何启义，卫士；冯振忠，上尉飞行员，正飞机师，有丰富的飞行经验；张远仁，中尉飞行员，副飞机师；熊冲，少尉飞行员；李齐，通讯员；李开慈，机工长。

自戴笠以下，共 13 人，全部死亡。奇巧的是，戴笠一生中极为忌讳的事和数，竟一连串地凑在了一块儿：13 时、13 分、13 个人于浓雾、雨中葬身戴山。

### 困雨沟的“黑炭棒”

222 号专机坠毁以后，最先感觉到不祥预兆的是军统上海办事处三少将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

3 月 17 日下午 2 时，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按戴笠先一日的指令，冒着倾盆大雨，驱车去上海龙华机场迎接老板。在机场，他们耐心地守候了 2 个小时，始终不见戴笠座机的影子。李崇诗似乎有些不安，他先通过机场电台向北平办事处查询。马汉三回电，戴老板已于 3 月 16 日由天津飞青岛。再询青岛办事处，梁若节回复，戴老板已于上午 11 时 45 分飞上海，3 名少将焦急不安起来，推算起来，戴老板的专机应达上海，为何仍不见踪影？于是，他们急返市区杜美路办事处，命令军统电台连续向北平、天津、青岛、南京等地的军统办事处和军统站查询，并将情况报告重庆局本部毛人凤。但各地的电讯陆续返回，均无消息。戴笠和 222 号专机一起神秘地失踪了。李、邓、王至此既不敢回家，也不敢将老板失踪的消息透露出去，更不敢想象老板可能遇难。他们只是在杜美路办事处苦守电台，等候各方面出现有关戴老板行踪的新消息。

戴笠座机失踪的消息，在南京、青岛、天津、北平等地军统组织的高级特务中，犹如瘟疫一样，引起了大家的恐慌。陆军总司令部调查室主任兼军统南京办事处主任李人士接到上海方面的查询消息后，立即赶到南京机场查询，得知 222 号专机午间前后曾与南京机场有过联系，但很快中断。李人士是很冷静的，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经过分析，认为在南京附近并无其它大型

机场，老板的座机确已起飞，从时间上推断，若无例外，本应到达南京、上海，而且确实与南京机场有过联系，说明 222 号座机肯定到达或经过南京上空。目前的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情况是 222 号转降其它大型机场，但现在尚无任何消息证实；另一种情况则是 222 号在南京地区附近迫降或坠毁。这虽然是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想象，但李人士不得不从这方面作最坏的打算。于是，他当即向南京四郊地区的军统组织和情报人员发出指令，要他们仔细寻找 DC47 型 222 号军用运输机的下落，并派出陆总调查室和南京办事处的特务四出寻找，打听消息。

军统青岛办事处主任梁若节、军统天津站长陈仙洲得到老板座机失踪的消息，也在不断地向机场打听消息，通宵不敢睡觉，苦守在电台旁，等候上海、南京及重庆方面的电讯联络。

北平的马汉三自 16 日在天津送走戴笠回到北平后，几乎是在惊慌、恐惧和焦虑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对这次由自己一手策划的破釜沉舟的暗杀行动作出了各种最坏的打算，就是不敢想象戴笠会死在自己手中。在马汉三眼中，戴笠不啻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暗杀大师，他一生策划和实施了許多石破天惊的暗杀行动，无疑是一件件完美无缺的黑色艺术杰作。一个杀人大师，竟也会被自己所杀，马汉三实在不敢想象。当 17 日下午上海方面发出戴笠座机失踪的查询电报后，马汉三仍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使马汉三很快惊醒过来，他意识到他很可能成功了，一个无比强大的对手，终于被他闪电般地一击，打翻在地，是他一手制造了一个令人无法相信和想象的千古奇案。在极度兴奋和不安之中，马汉三真想关起门来放声大喊大叫一阵，以痛快淋漓地宣泄自己那种充满胜利感的狂喜。

1946 年 3 月 21 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及其它许多报纸，刊登了戴笠乘 222 号专机从青岛去上海途中，在南京江宁县上空因遇大雨，飞机撞山失事，戴笠及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的消息。戴笠的死因，就此而成定论。国民党上下及军统内外，基本上都接受了这一结论。一场弥天大案就此掩盖过去。

3 月 17 日，戴笠暴尸戴山的同一天，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闭幕。这次会议无疑是蒋介石动员国民党在战后走向全面独裁的一次重要部署。一方面是由于对戴笠的悼念，另一方面也是进行反共内战动员的需要，蒋介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对戴笠之死进行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其规格、声势，完全是空前的。

1946 年 4 月 1 日，军统局在重庆举行隆重的戴笠追悼会。所有军统内外勤的大特务全部到会。蒋介石亲自到会主祭，号召特务们要完成戴笠生前遗愿，继续做好特务工作，并十分难得地流了泪，参加追悼会的特务们也大都痛哭失声。礼毕，蒋介石走下主祭台，在一批死者家属面前转了一圈，一一握手赠金，含泪以泣。死亡特务家属们想到戴笠已死，军统前景黯淡，自己今后的生活也将难以保障，思前瞻后，悲上心头，一个个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毛人凤觉得在此种情况下，蒋将难以脱身，当即挥手制止，将哭声压下，蒋趁机脱身，追悼会也在一片凄凉的气氛中结束。

从 4 月中旬开始，国民党各大城市军政最高主官按蒋的旨意，对戴笠之死纷纷举行公祭。

6 月 11 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缓戴笠为陆军中将。

6 月 12 日，蒋介石亲率南京政府数百名军政大员及数万军民为戴笠举行隆重的葬礼。出席公祭的重要人物有行政院长宋子文，国防部长、一级上将

白崇禧，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二级上将陈诚，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教育部长陈立夫等人。蒋介石亲赠花圈，题“碧血千秋”，挽联文为：“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这次葬礼所赠花圈、挽联数以百计，其中，得到各界一致公认，被认为是上上之联的，是章士钊所写的一首挽联。原来，自戴笠死后，蒋介石慨叹地对人说：“戴笠‘生也为国家，死也为国家’”。并示意教育部长陈立夫，要发动一些文化、教育、法律界名人，写几副挽联来，悼死扶生，以提高戴笠的身价，装璜门面。为此，陈立夫利用一些名流宿彦的聚会，向大家提出给戴笠送挽联的事。名流们虽然感到钦命不敢违，但想到以戴笠其人的黑暗一生，如何能歌功颂德，自甘堕落；如果照实写来，岂不有违蒋，陈等人的初衷，引火烧身，自找麻烦。想来想去，一个个都是激流勇退，相互推诿。这时，国民党元老张群素知大律师章士钊与杜月笙交谊非浅，与戴笠亦有交往，于是极力推荐他主笔，众人一致附和。章士钊至此不好再推，稍加思索，一挥而就。文曰：“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寥寥数十字，却以“曲笔”手法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戴笠一生的特点。满座名流也无不欣然赞赏这副不吹不捧、不卑不亢的挽联，也无不叹服章士钊的点石成金之笔，就连陈立夫、张群也频频点头，一致认可。这副对联写出后，很快被社会各界的许多人推为是很能切合戴笠身份的名联，一时传为佳作。即使军统特务们也都在私下认为章士钊不愧为大手笔，写得确如其人，因而争相传颂。自公祭活动以来，仅各地军统搜集的挽联就达 5000 多副。

上午 9 时，蒋介石身穿特级上将的军服，在大批文武大员的陪同下，由南京中山路 357 号军统办事处内的戴笠灵堂，亲自护送戴笠灵柩至钟山灵谷寺志公殿。送葬队伍一律素衣白马，由陆军第五十一师师长邱维连为指挥官。蒋介石在葬礼上含泪亲读长篇祭文，痛感“唯君之死不可补偿！”深表哀悼。当天，国民党报纸报道，“南京万人空巷，痛哭戴将军”。

时隔两月，正当美国特使马歇尔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内战开始全面爆发时，蒋介石与宋美龄却突然抽出时间，乘车到灵谷寺志公殿凭吊戴笠。蒋介石进入灵堂后，立即把头上的草帽摘下，面对戴笠的遗像默默地凝视着，许久不着一声。这时，虽然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蒋面对戴笠遗照时内心的真正想法，但可以想象，蒋的内心感情一定是不平静的。其实，蒋在这个时候来凭吊戴笠绝不是偶然的。蒋在很长的政治生涯中依靠以戴笠为代表的特务统治度过难关，每当一个重大事件来临，或形势发生转折时，戴笠总能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及时提供准确的情报，以便使蒋作出切实的应变措施。现在没有了戴笠，谁再为他做这一切呢？世界上许多东西，都是在失去之后，才显出它的重要性。在蒋、戴关系方面，亦中如此。在戴笠生命的最后几年中，由于戴的权力和野心太大，也由于蒋的猜忌和戒备心太重，蒋、戴斗法的高招迭出，高潮迭起，蒋在思想深处渐渐认定戴是对手，而不是助手，防戴的意识也更甚于用戴的意识，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过去 10 余年中蒋、戴之间形成的那种密切的依赖感和信任感受到严重破坏，戴作为蒋的心腹亲信的地位也几乎不复存在。戴笠在蒋心目中的重要性是出于戴对蒋的威胁，而不是出于戴对蒋的贡献。戴笠死后，蒋统治地位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完全解除后，蒋重新深切地感受到戴的重要性，每当想到这些，蒋心中总要隐隐升起一种廉疚和愧意。戴终身为蒋效尽

犬马之劳，却在恐惧不安和失望挣扎中走完了最后的人生旅程，戴之死，虽然死于飞机失事，但如果不是蒋迭电逼他兼程赶回重庆参加八人小组的会议，也许他不会遇此“奇祸”。因此，戴之死从某种意义上是蒋之逼迫而成的，这一点，蒋心中是多少有数的。正是出于这种补偿或报答心理，蒋对戴的后事是办得不差的。并且，蒋还决定亲自帮戴笠选一处风水绝佳的安葬地点，以荫庇其后人。

凭吊完毕，蒋和宋美龄在毛人凤、沈醉的陪同下向灵谷寺后山走去。因宋美龄的高跟鞋不适于走崎岖山道，蒋只得对毛人凤说，过几天再来看看。果然，蒋这次走后仅半个月，一个人在毛人凤、沈醉的陪同下，再次从灵谷寺后山山顶到烈士公墓山顶转过一番，再顺道下山，选准前面有一个小水塘的所在，对毛人凤说，“我看这块地方很好，前后左右都不错，将来安葬时要取子午向。”接着指使毛人凤还要找人看看什么时间下葬最适宜，然后再报告他。做完这些，蒋在骄阳之下已是满头大汗，其对戴的一片爱抚关切之情，令在场的军统特务们无不感激涕零。沈醉后来请风水先生去看，果然称赞此处地方是好风水，子午向亦是好取向，其对后人的好处似乎也是不必说的。

1947年3月17日，保密局的新落成的洪公祠新楼大礼堂隆重召开了戴笠逝世1周年纪念会。然后选了吉日安葬戴笠。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为戴笠墓碑书写了“故戴笠中将之墓”几个大字，毛人凤请章士钊撰写的墓志铭刻在碑阴。安葬时，蒋介石亲派陈布雷代表他去致祭。国民党在宁的许多军政大员也都由毛人凤邀请参加葬礼。毛人凤与沈醉先商定，戴笠的棺木入穴后，用水泥炭渣搅拌灌注，将棺木与整个墓穴凝结成一个整体，以防风云不测。

## 军统大斗法

戴笠在世时，由于深得蒋介石的宠爱，可谓一花独秀。戴笠死讯证实后，军统局内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立即上演。毛人凤无形中组成了“浙江派”首领、郑介民也来了个“广东派”，唐纵则来了个“湖南派”，彼此勾心斗角，均想把军统置于自己掌握之中。

毛人凤在军统内的资历，既比不上戴笠的十人团诸元老，也比不上他的副主任秘书张严佛。西安事变以前，他还没有参加军统，只是在陕西省某县县政府当秘书。以后由他的弟弟毛万里把他介绍给戴笠，他先在汉口禁烟督察处密查组工作，“八·一三”上海抗战时调到苏浙行动委员会当秘书。特务处扩大为军统局后，他才到军统局当秘书。由于和戴笠是小同乡，平日工作非常肯卖力气，他最大长处是能保密，加上态度温和，作事勤勤恳恳，因而逐渐地一步步得到戴笠的信任，成为戴的左右手。到了抗战末期，戴笠对他的信任已超过郑介民、唐纵和潘其武，每次外出，整个军统工作几乎全部交给他。而名义上却请郑介民代为负责。郑本身兼职很多，也很了解戴的个性，对军统工作和人事、经费等一向不愿多加过问。戴出门期间，郑虽然也抽出一些时间去军统局办公，但只是在毛人凤拟好的文件上批上一个“照办”或“可”，极少更改毛的意见，因此郑、毛相处很好。唐纵为人拘谨，事必躬亲。他在军统局办公期间，对军统人事、经费虽不过问，在工作方面却常有与毛人凤有不同的意见。1944年以后，蒋介石也看中了毛人凤，戴笠出门时，便经常找他去询问情况，他总是对答如流。

戴笠死后，毛人凤生怕局长由唐纵代理，便向蒋介石说，军统大部高级人员对郑很好，和唐的关系比较疏远。蒋介石便听从了毛的意见，把唐纵挤了出去。郑介民这时正在北平任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委员，执行蒋介石交给他的对付中共的任务，无暇兼顾保密局的工作，毛人凤便利用这一机会极力扩充个人势力，逐渐把郑介民在该局的关系削弱，并找郑的缺点进行攻击。

保密局没有成立前，军统三派先在瓜分军统财产和戴笠的遗产方面进行了一次争夺，虽弄得丑态百出，仍互不相让。

先是为了分洋房汽车。郑介民把戴笠在上海林森路的一所大洋房要去之后，毛、唐两人各争一所小的。美国特务机关送给戴笠四辆新式小汽车，原来准备送一辆给蒋介石外，三人各得一辆。以后何应钦知道，要去一辆，剩下二辆。郑、毛两人便各要一辆，而要总务处长沈醉去向唐纵说明情况，请他在原有的旧一点的和接受汉奸的所有好车中挑一辆，弄得唐满肚子不高兴。正在这时，又插进一个姓胡的特务来大吵大闹。胡氏参加军统后，虽然只当过息烽训练班和衡阳查缉干部班的副主任，却要凭他过去在蒋介石身边当秘书时帮助过戴笠这一点，硬想挤在郑、毛、唐三人中平分秋色。因为没有人理他，有次便借酒装疯，跑到军统局要打唐纵和毛人凤，被沈醉阻挡以后，竟大耍无赖，倒在地上不起来。毛人凤没有办法，只好也分给他一座洋房、一部汽车。这一来，不少人都想效尤，经常有为争夺东西而吵得一塌糊涂的情况发生。

戴笠摔死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全国人民都渴望能真正走上全国团结一致、和平建设的阶段，对军统局这个一向为全国人民所痛恨的庞大特务机关，都希望能按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主张早日撤销。

国民党内部也有一些人提出裁减军统的意见。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在反共反人民方面与军统目标相同、意见一致，但是对军统和戴笠的种种作法非常厌恶，或在本身利害方面与军统有冲突。戴笠在世时，由于戴为蒋介石所宠爱，大家都畏惧他几分，有意见也不敢提或不好提。戴笠死后，这些人便想趁机报复或分赃。他们绝不是和全国人民一样真正想撤销这个特务机关，而是各有各的打算和目的。例如，对军统反对最力的陈诚，是想裁减军统之后，扩大他自己的特务系统，希望他手下的特务头子张振国能把军统部分机构和人员接收过去。而陈立夫、陈果夫等 CC 派首脑，则想趁机打垮军统扩大中统特务组织，加强中统职权。孔祥熙在当时也表示过军统不应再拥有和过去一样庞大的组织和巨额的开支，这是由于戴笠杀过给他弄钱的心腹林世良。至于过去复兴社中的一些太保之流如邓文仪、康泽、贺衷寒等人，则是想由自己来分掌特务组织，扩充个人势力，所以也跟着叫喊缩减军统。大员中，只有宋子文、胡宗南表示支持军统，蒋介石为了应付内外舆论和反共反人民的需要，决定将这一特务组织才改头换面地保留下来。

在此四面楚歌声中，毛人凤与唐纵曾一度商量向蒋介石建议把军统改为“国防警察局”。蒋介石没有同意，他认为这一名称不适合军统工作的职权范围。以后决定附设在新成立的国防部时，毛人凤又建议仍然保留调查统计局这个名称。蒋介石自己很清楚，调查统计局这块招牌上涂的鲜血太多，再拿出来实在太不雅观，便采用了“保密局”这样一个比较隐讳的名称。

保密局成立后，郑介民为了防范毛人凤大权独揽，便把他的亲信同乡、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继勋派为局长办公室主任，规定各处室公文都要先

送局长办公室；还派他另一亲信同乡王清为办公室专员，协助张对付毛人凤。毛原来想让他最亲信的人潘其武担任这一工作，看到郑这样安排，只好请求唐纵把潘其武安置在警察总署当刑事警察处处长。唐纵这时因意外地得任全国警察总署署长，便心满意足，不想再插手保密局去争领导权，只是趁机要去了马台街 22 号一所大房子，作为警察总署的办公地方。毛人凤为了拉拢唐，专门对付郑介民，又自动送几辆汽车给警察总署，并同意唐在保密局中调用干部。

总务处长沈醉当时倾向于毛人凤的浙江派。由于掌管财物关系，郑介民的老婆柯淑芬认为他分东西偏心，经常找岔子。毛人凤便利用沈对郑妻的不满，叫沈给郑制造一些麻烦，扩大人们对郑的不良印象。沈醉曾抓住郑介民做 50 岁生日这个机会进行活动。郑一向怕老婆，1947 年他 50 岁生日时，自己怕惹是非，不敢大张旗鼓地做寿，毛人凤叫沈怂恿他老婆非做不可，并向许多特务去宣扬，暗示他们送厚礼。生日前两天，郑生气跑到上海去了。沈醉便派人人为他大肆铺张，把他在南京颐和路的住宅装饰一新。到时，许多公开单位送去的金制寿桃和许多金银器具、礼券等，都一齐陈列在寿堂上。正在大开筵席的时候，沈醉又派人到鸡鹅巷 53 号招待所，叫住在那里的一群特务遗属也去祝寿要饭吃。这些人因为发的抚恤金花完了，保密局不想再理他们，便都挤在那里住，并且整天吵得不可开交。现在一听说郑介民大做其寿，便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地奔去。当沈醉派去的特务回来告诉他们已出发了的时候，沈又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郑妻。她一听，知道这群人一到来，马上会出大问题，沈也怕事情闹得太大不好收拾，便在她再三央求下假充好人，赶忙把这群人劝回去，答应给他们在招待所加菜招待。毛人凤便把郑介民做寿，特务遗属准备去郑家吵闹等情况立刻向蒋介石报告，使蒋听了很生气。

这件事情发生后，郑派的人不甘心，不久便查了出来，事情与沈醉有关系，便想先收拾他。由于沈醉经手处理过不少财产，他们便从这方面下手找毛病，结果没有找到可以法办的证据，便找他部下的毛病。总务处管理科长邓毅夫私自盗卖了一批洋锁，被他们查了出来，于是将邓扣押了起来。按照一般情况来处理，至多关几年，郑介民却坚持要严办。因为邓毅夫是临澧特训班学生中最拥护毛人凤的人，郑就以监守自盗的罪名请求蒋介石予以枪决。

矛盾发展到这个地步之后，毛人凤便指使沈醉暗中搜集郑的材料。沈当时掌握到的有关郑的贪污情况是：他在南京莫干山路占了一幢洋房，在汉口日租界军统接收的日本人一座洋房占为己有，用他老婆的名字过了户；他家中每月一切开支均向总务处报销，连小孩玩具、湘绣观音像都出公帐；郑还私自把中美所交给军统的手枪、手提机枪等送给他兄弟郑挺峰 40 支。毛人凤认为还不够，又要他的亲信小同乡王蒲臣在北平搜集到郑的许多材料，一起向蒋介石去检举。当时蒋介石身边的军务局长俞济时，也一向不大高兴郑而和毛要好，便在很多方面与毛同时进攻郑，最后蒋介石便于 1947 年 12 月 5 日免去郑介民保密局局长和二厅厅长的职务，让他继黄镇球任国防部次长，主管国防物资去了。

毛人凤在接任保密局局长时，郑介民到保密局举行交接典礼，表面上两人还非常客气。在郑介民讲话之后，毛只讲了几句话，表示今后还得依靠郑先生来领导，说什么今天长官（指郑）在场，所以他不多讲。在送郑上车时，毛还亲自为他打开车门。但一转身，他便立刻清除郑在保密局的心腹，把局

长办公室主任张继勋、专员王清、肖漫留等一一逐走，接着便把属于郑派掌握的公开机关也抓了过来。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程一鸣被调职，由毛派陶一珊接替，交警总局长吉章简也换成了周伟龙。

郑介民安置在保密局内外的人被挤走之后，毛人凤还不甘心，又对依靠郑的关系而当了北平市民政局长的马汉三下了毒手。马原为军统华北办事处处长，处理日伪财产时贪污很多，郑在北平时，与郑发生密切关系，经常送厚礼给妻。毛过去虽已掌握了马汉三不少证据，由于郑的关系不便动手。等到郑调任后，毛人凤便将马汉三和马的助手刘玉珠扣押起来，由于一些事情牵连到北平站长乔家才等多人，毛说他们搞小集团，想在保密局中自成一系。毛人凤认为如单以贪污和搞小组织的罪名告他们，还不容易杀几个人，便趁蒋介石正为李宗仁当选了副总统，他指定的孙科未能当选而大发雷霆的时候，提出马汉三违反支持孙科的命令，而支持了李宗仁，要求蒋介石批准将马汉三、刘玉珠枪决，并没收其全部财产交保密局，经过这一番打击，郑派彻底垮台了。属于唐派的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毅夫），不久也被毛人凤挤回了湖南。这时保密局便成了清一色的毛派天下。

毛对张的排挤，也有一些内情。本来毛、张一向相处得还不错，毛在军统当代主任秘书时，两人共事多年。戴笠死去之后，属于毛派的重庆航空检查所长吴茂先替毛妻做贩运私货的生意，张当时在重庆任结束办事处主任，因吴有恃无恐，不买张的帐，张就把吴扣押起来，报请郑介民处理。毛对此怀恨在心，等自己当了局长，便立刻把吴开释出来，并将张赶走。

毛、唐两人之间的冲突，虽不如毛、郑之间激烈，也一直在暗中勾心斗角。毛人凤想和军统时期一样，把警察总署的人事控制住。唐纵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便做出规定，凡是由保密局介绍到警察总署去工作或希望通过警察总署派到各省市警察机关去工作的人，不经过他的批准，人事室不能处理。毛人凤对这一规定极为不满，多次在中午会餐时提到这一问题，认为唐控制太严，不肯安插自己的人，而喜欢用外人。由于利害关系不太大，唐不想在保密局中发展自己的力量，所以两人矛盾不很尖锐，还能相安无事。

另外，戴笠死去以后，毛、郑、唐三人在抓特务训练班结业的学生方面，也发生过不少次的争夺。1946年开始，历届军统特训班的学生感到，自己不抱团，便会受到排挤，因此纷纷以同学会或同乡会等名称结合起来。首先是临训班和黔训班学生在重庆成立了一个滨湖同学会，由张明选、李葆初、邓毅夫、易啸夫、刘本钦等暗中进行联系工作。接着兰州、息烽、东南、谍参等班学生也相继暗中组织起来。他们都想找靠山，希望搞军事工作的便想走郑的门路，想搞警察的便去找唐，愿意继续做特务的便投到毛的手下。由于郑、唐、毛过去都没有一批自己认为忠实可靠的干部，戴死后，正是打天下、争权利的大好机会，也都想趁这个时候抓一些人在手中。

毛人凤看到这一情况，便召集拥护他的潘其武、袁寄滨、李修凯、毛钟新、沈醉等七八个人商量，决定成立一个“军统局各训练班毕业学生统一同学会”，规定凡是抗战期间在军统各训练班毕业的学生，都要参加这个组织，不准另外再成立什么训练班的小组织；已有的应一律停止活动，否则以搞小团体的罪名加以处分。同时还决定，在统一同学会成立后，请郑、唐两人为名誉会长，毛人凤为会长，另外聘请一些与训练班有关系的大特务为顾问。这样一来，这几万名学生便全由毛派掌握。

1947年统一同学会在南京洪公祠保密局大礼堂开成立大会时，军统几十

个训练班的毕业学生都派有代表参加，但两位名誉会长因对此事很为不满，却不去参加大会。这个会由毛人凤主持，以后便附设在保密局人事处里面，由李葆初、邓毅夫、徐凤等以总会干事名义处理各项工作，下设联络、登记、福利等组，并在各省设立分会。军统各特训班毕业学生参加该会的达两万名左右，会员都发有一个会员证章，铜质圆形，图案是用一支箭射穿和平鸽。解放前，在蒋管区内到处可以见到佩带这种证章的特务，只有担任秘密工作的才不准佩带。当时，这个小证章简直成了这些特务可以到处横街不法的许可证。一般公开机关中搞特务活动的人，遇见佩带这种证章的，不管与之认不认识，都要客气三分。临解放时，这个会也随保密局一同逃往台湾，一直由毛人凤所控制。

郑、唐、毛三人各有一套，作风也各有特点。郑介民一向以老成持重、深谋远虑而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他平日喜怒不形于色，很能控制自己，有空便阅读书报杂志，肯用心钻研问题，对国际、国内形势也爱分析研究。他在军统局和保密局的纪念周上讲话时，一向是专作时事报告，极少谈到工作上的问题。有部下去看他时，他也爱讲一些对时局的看法。

抗战期间，有一次他正在和部属们大谈其对日军作战的形势分析时，他老婆柯淑芬就在旁边插嘴，叫别人不要相信他那一套。因为抗战开始时，根据他的分析判断，香港不会有问题，他老婆便信了他的话把许多东西存放在香港，结果日军占领后全部损失。她曾多次当着别人的面气愤地质问郑：“你说香港没有问题，现在怎样？你把我的东西还来！”郑对她这样当面给他出丑，也毫不在意，只是一笑置之。

郑自认为对中共问题素有研究。戴笠在世的时候，也常常叫毛人凤就一些关于中共的问题向郑请教。有一次郑到军统主持纪念周以后，正在休息，重庆邮电检查所长刘之盘把查扣到的一批报刊送给他看。他除拣出其中一两份外，指出一份对刘说：“这种东西粗看像是共产党的，其实是我们的同行搞出来的，不过搞得还不错，连我们的同志都信以为真，一般人就更不容易分辨出来了。”接着他便对邮检方面的工作做了一番指示，教他们如何注意研究问题，不要粗枝大叶，并说，对付共产党是多方面的，我们有些单位是专门假借共产党的名义来进行反共宣传活动的，如果把这类东西也扣下来，无形中就替共产党做了工作。

蒋介石派郑介民担任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后，郑跑到军统局找毛人凤商量了很久，接着又把人事处、军事情报处、党政情报处的负责人找去商谈了一阵，最后又把沈醉找去，叫沈在交通运输等方面注意协助他工作。郑介民和毛人凤商谈的具体情况沈醉不了解，以后只知道郑要求军统调派人员时，要选军校出身的，担任过公开军职的，要尽量避免特务身份，同时又希望军统不断提供有关的情报给他。

郑介民派到各地担任执行小组工作的人，都是经他自己决定的。曾任陆军大学调查组组长的邹陆夫和军统军事情报处副处长的胡屏翰派给他时，开始他认为不大妥当，以后由于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他才勉强同意调他们去。郑去北平不久，却把军统中共科科长郭子明调到北平当了他的顾问。

他在北平工作时，对司徒雷登特别表示亲热，尤其与司徒雷登的亲信秘书傅泾波拉得很紧，经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一天，郑突然下一张手令，叫人事处立即委派原在重庆稽查处涪陵稽查所当少校所长的肾某担任北平铁路警务处副处长，大家对此都感到奇怪，因为像这样一下把一个少校超升到



上校，在他平日还从来没有过。后来一打听，原来肯某是傅泾波的妹夫，傅向他提出之后，他立刻给以超级重用。

毛人凤考虑问题非常用心思，别人向他请示重大问题时，他从不轻易马上作出答复。他在工作作风上处处学戴笠，而且想超过戴笠。在他担任保密局长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比戴笠过去杀的人还要多。他对军统内部防范也很严密，生怕别人不听他指挥，特别对外勤各省站站长不放心，和戴笠一样，他把一批江山籍的译电员派到各省站去工作，暗中监视外勤单位的负责人。

毛人凤在杀人方面，不但秉承蒋介石旨意以多杀为上，更主张斩草除根，连革命人士的孩子都要杀。在重庆进行大屠杀时别人问他，小孩怎样办，他回答：“当然一起杀。难道还留下来等他们长大来报仇不成！”实际上蒋介石指示他杀杨虎城时，并没有指出连小孩一起杀。毛人凤对革命人士如此，对保密局内部也是用杀来对付的。解放前，只要发现特务们有一点投向人民的表现，被抓住了，便立刻杀掉。原任军统南京站长的周镐，曾任重庆稽查处外事组长的吴润荪，在长沙随程颂云先生起义的刘人爵，都是被他杀掉的。湖南和平解放后，一些大特务来不及逃出来，他就派人去进行暗杀。因此湖南警保处长兼长沙市长李肖白、长沙绥靖公署处长杨继荣、湖南站长黄康永等逃出大陆后，都不敢去台湾。云南和平解放时，沈醉随同起义，毛人凤也派郑世勋从台湾到昆明准备暗杀沈醉。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从台湾到云南，准备指挥李弥、余程万的残部攻打昆明时，毛人凤再三叮嘱汤尧，攻破昆明后，立即将沈醉逮捕解送台湾，以后郑世勋、汤尧被俘与沈醉在一起时，都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他。

唐纵为人一向谨慎小心。抗战前他在特务处当书记的时候，因戴笠出门去了，在他主持下逮捕了几个改组派的人，汪精卫向蒋介石提出来，他因此被撤职。后来他随酆悌去德国，在驻德大使馆里当副武官，回来后更加小心。凡是上峰交给他办的事，他总是想方设法去完成，并能绝对服从指挥。所以戴笠把他推荐到蒋介石身边去当参谋，几年间由中校晋升到侍从室第一处第六组少将组长，主管蒋介石集团中的情报工作，他认为，只要能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便不愁没有出路。他不想多得罪人，所以和政学系、CC派的人都能处得很好。

在郑、唐、毛三个人当中，唐贪污得最少，他搞钱是自己不出面，叫老婆来搞。他自奉比较俭朴，年青时虽在南京和一个女记者打得火热，以后地位高起来，不敢再乱来，因此越来越得到蒋介石的重用。

### 弄清戴笠死因

在郑、唐、毛大斗法期间，毛人凤的得意之作之一，就是找到了谋害戴笠的凶手。戴笠入土后，马汉三、刘玉珠等人似乎也笃定泰山地认为万事大吉，尽可以高枕无忧，庆幸大功告成，言语行动间便不再处处小心设防，并渐次张狂起来。不想马汉三这一得意忘形，便怠慢得罪了毛人凤，从而留下无穷后患。毛人凤顺藤摸瓜，弄清戴笠之死系马汉三所为，马汉三终致杀身之祸。

马汉三在戴笠生前，因设防戴笠的需要，极力巴结逢迎毛人凤，毛人凤也处处给予援手，交谊甚密。但是自戴笠死后，马汉三认为毛人凤已失去利

用价值。军统局局长由郑介民接任，马利用郑主持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和长期坐镇北平的机会，用接收贪污的敌伪汉奸财产将郑“喂足”，郑成为马的大后台。马汉三外有桂系支持，内有郑介民撑腰，下有乔家才（军统北平站站长）、刘玉珠等一帮人作党羽，羽翼渐丰，便渐渐不把毛人凤放在眼里，进而冷落怠慢起来。此时的毛人凤，正一方面等候马汉三将北平捞得的汉奸财产与他分肥，一方面攒足了劲与郑介民争夺军统的天下。他渐渐发现马汉三竟对自己敷衍疏远，而和郑介民打得火热，心里早恨得牙齿痒痒，只是一时不能得手，就命令华北总督察王蒲臣加紧搜集马的劣迹，以便伺机捕杀。王蒲臣是早有任务在身的，他初到北平时，尚受到马汉三的猜忌怀疑，后来王改变手法，表面上处处与马汉三小集团的人同流合污，一起花天酒地、吃喝玩乐，无所不为。马汉三此时也将王列为可以争取的“自己人”，而渐渐放松了警惕。结果却被王蒲臣将马派小集团的内幕活动打听得一清二楚，报告毛人凤记录在案。1947年12月，郑介民被毛人凤赶走，去当体面的国防部次长，保密局长由毛人凤递升，毛人凤遂决心给马汉三颜色。

1948年3月29日，国民党于南京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即所谓“行宪国大”，主要议程就是选举总统、副总统。总统一职是蒋的囊中之物，自不必说，问题是副总统的人选，按蒋的腹案，早属意于孙科，岂知桂系巨头李宗仁出来力争。蒋盛怒之下，下令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全力支持孙科，并给毛人凤下令，除了所有保密局系统的国大代表必须投孙科的票以外，还要利用特工手段和力量为孙科拉票。所有当选为国大代表的军统特务和保密局各外勤机构主要负责人都接到毛人凤转达的领袖的秘密指令。马汉三当时既是北平市主持选举工作的民政局长，又是河北省“国大代表”。他表面上也复电毛人凤表示拥护“总裁”指示，暗地里却早成为李宗仁在华北地区组织竞选班子的核心成员之一。他为李宗仁出谋划策，利用孙科当年任立法院长时与汉奸女谍川岛芳子缠绵悱恻的传闻，要李宗仁以惩治汉奸作号召，以揭发孙科丑闻为策略，作为选举的制胜之道。按马汉三的初衷，一方面要帮助李宗仁战胜孙科，以增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则在于借刀杀人，剪除川岛芳子以灭口。果然，马汉三的这一手十分厉害，川岛芳子本由戴笠生前保下，准备利用她在内蒙地区开展反共特工活动。不料，被马汉三“旧事重提”，复于“行宪国大”开幕前4天执行枪决；而孙科更因这一说不清的丑闻，被搞得满身臭气，却使李宗仁声势大张。由此，孙科虽有蒋介石的强有力的支持，终以143票的微弱劣势而败北。据说，蒋在4月29日听到副总统竞选的结果时，气得一脚将收音机踢翻，坐上汽车，在中山陵、官邸、汤山之间发疯般来回狂驶。可见其受刺激之深。恰在斯时，王蒲臣在北平将搜集到的马汉三暗中帮助李宗仁竞选的情报密报毛人凤；毛人凤又将马汉三贪污汉奸财产、组织“建国力行社”的小集团与背叛领袖、投靠桂系的罪行，一起报蒋介石，并签请将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一并逮捕，处以极刑。

蒋介石闻报当然十分震怒，但蒋是慎重的，他认为马汉三不但是北平市民政局长，而且是“国大代表”，马帮助李宗仁竞选的“罪名”本不好公开宣布，如果反以贪污汉奸财产和组织军统小集团的罪名将一个“国大代表”处决，难免致人攻击的口实，于是，只准予扣押讯办。毛人凤领旨，当即于6月30日亲赴北平将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三人秘密逮捕，并彻底查抄马汉三等人的住宅，搜出黄金、珍珠及其它珍贵物品不计其数，其估值的市价竟达7000亿元，仅4个金佛就重达数十公斤。当毛人凤从王蒲臣口中得知马

汉三追诛川岛芳子的背景时，立即敏锐地意识到马的问题似乎不仅在支持桂系，而是另有重大图谋，决定对马汉三的问题进行彻查。毛人凤于7月6日将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3人用专机秘密解回南京，立派保密局著名的办案专家、局本部司法处长李希成到北平全面清查马汉三的问题。李希成从清理戴笠的遗产和飞机失事时的遗物入手，很快发现古剑的不同寻常之处，并从弄清古剑的价值、出处和来龙去脉着手，一路追寻下去，一步一步地将马汉三私藏宝剑、投敌叛变、暗杀戴笠的弥天大罪清理出来。鉴于此案实在重大，李希成将整个办案过程及内容严加保密，然后亲自向毛人凤及蒋介石面报详情。蒋介石闻报大惊失色，但考虑到戴笠死因已由国民党当局确认并向国内外公布，现在又披露马汉三等人暗杀戴笠的罪行，不但对蒋本人、对国民党、对军统组织的政治信誉和工作能力产生严重损害，而且在社会上极易引起混乱，并将给政敌提供攻击的口实等等。由此，蒋决定对马汉三等人谋杀戴笠案严加保密。对马汉三、刘玉珠只以贪污汉奸财产罪指示枪决。乔家才因没有直接参加谋杀戴笠的活动，而由蒋免除死罪。1948年9月27日，戴死后两年半时间，马汉三、刘玉珠在保密局南京宁海路看守所内被秘密处死。行刑时，李希成问马汉三还有什么话说，马汉三早知不免一死，因而态度沉着，只希望“团体”能照顾他的家属，让她们活下去，别无它求。马汉三认为他本该两三年前就死于戴笠之手，结果反在于掉戴笠后，侥幸活到今天，实已心满意足，故死而无怨。由此，这一历史巨案被蒋出于自身的政治需要而遮掩过去，并用重重铁幕将其禁锢尘封起来。又因此案的主要当事人先后死亡，其具体细节也许成了烛影斧声的千古之谜，永不被世人所知晓。

### 调整组织疯狂反共

保密局成立不久，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后官邸办公室，对局处长级的大特务进行一次训话，他强调今后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同共产党作斗争比过去同日本人与汉奸作斗争要困难得多。他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全力以赴，稍不注意，不只危及党国，而且会死无葬身之地。他希望特务们多研究一些办法，多出一些主意，随时总结经验教训，很好地担负起这项直接和共产党作斗争的任务。

为了完成蒋介石这一指示，毛人凤对保密局的人事组织进行了一次大调整。他从军统临澧特训班毕业的学生中和一些中级干部中提升一批人，来替代过去那些不大听话的各省站站长。后来他发现这些新手由于在军统的资历浅，对各省的公开单位领导不起来，而各公开单位的负责人都是军统老干部，对这些新提的站长不买帐，站的工作推不动。毛人凤感到再这样下去不行了，又决定把一批将级大特务调出去当站长，并且在毛的亲自主持下，把这些新调任的站长和准备保留的一些老站长调集到南京训练一个月，把原有的一些资历浅的站长降为副站长。蒋介石对这项加强外勤各省站的工作很是满意。

1948年5月，省站站长，一个月讲习完毕后，蒋介石又接见所有调训的站长和出席“三·一七”工作会议的代表指出，各省站今后仍应和过去军统局时期一样，秘密领导公开，各省的工作重点应摆在省站。

蒋介石这次讲话的重点是要求各省站的负责人对外勤特务必须加以调整。保密局的外勤人员应当社会化，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公开的职业作为掩护，以便打入各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除多多拉拢一些民主党派中的动摇分子参

加工作外，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千方百计、不惜任何代价打入共产党在各地的组织，以便彻底消灭各省共产党，巩固后方。对一些不称职或身份已暴露的特务人员，应调往公开机关去安插，留下来的必须是有能力的和有工作路线的人，并要不断吸收新的人员参加。他要求各省领导人不单是负责领导工作，还要亲自去从事高一级的情报活动。他提出省站站长可以加委为国防部专员，用这一名义在当地作公开活动，站长以下则绝对保密。他还要求各省站领导人搞好地方关系，与当地驻军将领及行政负责人密切联系，发动各方面的力量搞好特务工作。他还以颇亲切的口吻对这些为他尽心竭力充当鹰犬的大特务们说：“你们都是跟随戴局长多年的老部下，都是最革命、最忠于党国的人。保密局在各省的组织由你们去领导，我很放心。今后在各地展开和共产党作斗争的工作，有你们去领导，我相信一定能够不辜负我的期望，做出卓越的成绩。你们在工作中有什么困难，我一定负责替你们解决，使你们能一心一意去工作。”末了，他照例对中共来一番诬蔑，并对在场的人进行一番恐吓，说什么如不努力战胜敌人，必死无葬身之地。

保密局成立后的两三年中，在反共活动方面，毛人凤一直认为比过去军统局时期更有成绩。他最得意的是更加受到蒋介石的奖励，主要的有：

（一）1946年在上海破坏过中共苏北地区的一个财经贸易组织，截获到一只小火轮和准备运往解放区的许多物资，逮捕了10多名地下工作人员，其中有在上海江海关工作的张渊、尹兰有等，均被杀害。

（二）1947年在北平破坏中共的地下电台，逮捕了地下电台的报务员李政宣和他从事译电工作的妻子张厚佩，报务员孟良玉和他的妻子译电员李毓萍；同时还清理出地下党的重要骨干北平市地政局代理局长（原系该局科长）董剑平，北平贝满女中教员田仲英，燕京大学学生李恭贻等多人。

（三）由于北平地下电台的破坏，同时又在保定绥靖公署内清查出参谋处处长谢士炎、副处长丁行（两人解赴南京后，在雨花台被杀害），军法处处长王某以及绥署设计委员余心清等多人。通过这些线索，又在西安、兰州发现中共地下组织和电台。蒋介石得到报告时高兴极了，马上叫空军总部准备飞机，毛人凤派第二处处长叶翔之率领大批特务，连夜飞往西安，又在盐店街奇园茶社逮捕到梅永和、赵耀斌等，还破获了一部电台，逮捕了十几个地下工作人员。当时连胡宗南的一个秘书和他所办的西北通讯社的一个负责人，都被牵涉进去，使得胡宗南大吃一惊。他真没有料到在他的身边也有共产党。当他听到叶翔之说兰州方面还有线索的时候，他马上叫叶翔之乘他的小飞机赶去，不料飞机在平凉上空发生故障，几乎把叶摔死。胡又请空军另派一架专机从平凉把叶送到兰州，又逮捕了尹家明等几个中共地下人员，一同由叶翔之带回南京。蒋介石除发给1万元奖金外，还特别发给叶翔之和北平行辕电检科科长赵容德四等宝鼎勋章。这一案件还牵涉到东北行辕新闻处专员李年，沈阳防守司令部新闻处代理处长王书鼎，以及巩天民等。最后还发现连长期在蒋介石身边负责机要工作的陈布雷的一个女儿，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使得蒋介石大为吃惊和震怒。他一再责令毛人凤，务必竭尽一切力量，彻底清查打入各军政部门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宁可错抓错杀，也不能放过一个。当时连毛人凤也感到棘手和惊异，有天中午，他在集合保密局处长级的特务们在一起午餐时，很感慨地说：“我们这样抓，这样杀，还是有这样多的人敢提着脑袋闯进来，真不知是为什么？”

（四）1948年，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与保密局重庆站长吕世琨

密切合作，在重庆破坏了重庆地下党的《挺进报》之后，进而破坏了中共重庆市委组织。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的叛变，使在重庆和四川其他地区的地下工作人员近百人被逮捕。毛人凤特别重视这一工作，又派叶翔之赶往重庆去主持，并把刘某带到南京，要他破坏中共长江局的组织。以后沈醉由昆明到重庆，见到这个叛徒，他还准备和沈醉一同到昆明破坏云南的工委组织。据他说，在云南工作的个别负责人，他还能认识，可以协助云南站进行这方面的活动。后来由于沈醉去上海，回来后又去西北、成都，这个叛徒才没有和沈醉一同去昆明。

毛人凤自从这件案子办完后，对徐远举加倍称赞，除给他请勋章、发奖金外，还决定成立保密局西南特区，派徐为区长，负责领导西南四省的工作，以便集中力量从事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在这同时，毛人凤还把另一个中共叛徒王某派到西南特区当专员，协助徐远举。王某原为东北军区参谋处的科长，在四平街战役中被俘后叛变，曾在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工作过一段时期。当时毛人凤希望王某对在四川方面捕获的中共人员进行说服，使之叛变，但无结果。早先刘某叛变后，受他领导过的许多人虽被他出卖，却不肯和他一样叛变组织出卖灵魂向敌人屈服。以后这些忠贞不屈的优秀党员全部于解放前被屠杀在渣滓洞看守所内。

### 刺杀杨杰

解放前夕，民革在西南地区的武装革命活动，声势相当浩大。蒋介石对于民革的后方从事武装起义的活动，感到非常不安，也是防不胜防。他除了一面责成各地驻军随时“进剿”外，并命令保密局尽力设法破坏和防止。西南特区从四川华蓥山区先后查获的民革武装组织的文件内，发现从事这些活动的主要人员中，有前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便准备把材料搜集起来，在重庆将杨逮捕进行审讯。因为杨杰在国民党部队内的人事关系很多，不少国民党将领是他的学生，蒋介石认为如不除掉这人，对国民党十分不利。

特务们除对杨严密监视外，还收买他的秘书，威胁一个准备嫁给杨的女护士为他们工作。以后杨杰发觉了，便秘密逃往昆明，托庇于卢汉。但是蒋介石并不因杨杰离开重庆而放过他，便叫毛人凤再三命令沈醉（当时任保密局云南站长）在昆明将杨暗杀，以除心腹之患。由于种种关系，沈迟迟没有执行。1949年9月，杨杰由昆明逃香港。毛人凤发现杨在香港的关系后，便派叶翔之率领特务韩世昌等6人由台湾出发，将杨刺杀于香港。但是西南地区的民革武装并未因此而停止活动，相反，却越来越活跃。毛人凤为此挨过蒋介石好几次臭骂。

### 徒劳无功的策反活动

毛人凤在搞策反活动方面，也曾费过不少心思。保密局第二处专门设有策反科，幻想对解放军及起义的部队进行策反活动。除了在开封、郑州、青岛等处设立有策反站外，第二处还派副处长黄逸公随同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到武汉“和平爱国团”去挑选人员，秘密进行训练后派往接近解放的地区去从事阴谋活动。“和平爱国团”的成员，都是被俘的解放军军官和文职人员，保密局从中挑选人事关系较多的人带回南京，施以训练再派出去

活动。但是，这些人被派出去后，从来没有把解放军部队策反到国民党这边来。

在策反工作中，毛人凤极力在蒋介石面前争功的是策反郝鹏举的事件。当时很多方面都在进行这一活动。薛岳说是他一手搞成的；毛人凤却硬说是由于他通过吴化文的关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等到吴化文起义后，毛人凤满以为有把握再把吴策反过来，结果空夸了一顿口，给蒋介石骂了一顿。

保密局在进行策反工作中，还弄过许多次赔本生意。如对河南军区牛子龙的策反，便把派去的人和电台一起送掉了。牛子龙曾在军统中工作过，因发现他有同情中共的言行便把他扣押在军统西安西北看守所中。牛在看守所内联络了几个心腹人员，趁看守人员不防备时劫夺警卫枪支，击毙几个看守，逃出监狱，投入解放军。毛人凤以为凭过去的关系，只要不追究他越狱的罪行，应许给以官位金钱，便可把他策反过来。结果等到把人和电台派去后，便一去不复返了。这类的事虽然有过好几次，但毛人凤并不死心。他总认为只要成功一次，便能一本万利。直到1948年冬，他还在积极搞这些活动。到1949年后，他再也不愿在这方面花气力了，他知道大势已去，谁也不会再弃明而投暗。

### 特务武装的覆灭

派特务武装进攻解放区，到保密局时期，有了新的发展。这时由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郑介民和毛人凤便一批又一批地把所掌握的交通警察总队调在各个战场，直接参加反人民战争。最初毛人凤担心这些部队不能作战，在阻止解放军解放大同和包头的两次战役中，他发现特务武装发挥了一点作用，便越来越胆大起来。可是等到张国梁、熊剑东等几个总队被解放军全部歼灭以后，毛人凤既感到非常心痛，又有些恐慌，但是蒋介石为了垂死挣扎，还是不断地把这些部队投入战场。在上海外围战斗中，第2、第5、第11、第12、第15、第18以及水上总队都投了进去，结果除两三个不完整的总队由他的亲信周文新带往台湾以外，其余几乎全部被歼，最后剩下的残余部队，也在代指挥李铁夫率领下放下武器，投向人民。

在1949年初任交通警察总局长的周伟龙，个人野心一向很大，他用尽一切方法，特别是通过和毛人凤老婆向影心的勾结而抢到这个职务后，不愿再听毛人凤的指挥而独树一帜。他最反对把交警总队投入前线作战，而希望多保留一点实力。那时唐生明在湖南暗中策反国民党武装部队，和周取得联系之后，周便设法把交警总队慢慢抽调到湖南去集结，先后调去了王春辉等6个总队。当他还想抽调派驻在奉化担任蒋介石的警卫部队时，被毛人凤发觉，立刻向蒋介石报告，将周伟龙在上海国防饭店内逮捕。在搜查出的信件中，发现他与唐生明有往来。毛人凤原来准备马上逮捕唐生明，后来因为湖南正在酝酿和平运动，便改派特务孙坤、焦玉印等前去长沙暗杀唐。特务们曾在唐的寓所附近向他放过一枪而未击中。等到程潜率部在长沙起义后，原来在湖南工作的张严佛，刘人奎、刘人爵等都参加了起义。毛人凤怕其他特务效尤，便令焦玉印等把参加湖南起义后临时担任长沙警察局局长的刘人爵暗杀于长沙浏阳门正街22号家中。凶手逃出后，改派到云南工作，他们曾向沈醉谈到过这一经过。

## 侦探毛泽东下落落空

在解放战争期间，为了镇压各地民主爱国运动，保密局特别举办了两次司法人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之所以设立，主要是研究国民党的宪法颁布以后，保密局怎样表面上不违背宪法，又能随心所欲地贯彻军统的意图，逮捕革命人士，阻止人民的活动。因此这个班成立后，司法人员莫不背地里叫它“违法训练班”。到1948年初，蒋介石颁布了“特种刑事法庭组织办法”，一脚把宪法规定的保障人身自由等假东西踢得干干净净，这时候特务们额手称庆，才再不研究耍“宪法”幌子的手段，而依旧毫不掩饰地按照原来的一套进行逮捕、搜查、审讯等危害人民的勾当了。

保密局在解放战争期间，除了直接干出许许多多破坏中共组织、屠杀中共党员、镇压民主爱国运动，大批逮捕囚禁革命人士以及在各大城市进行大破坏大屠杀等罪恶活动外，对解放地区的情报工作一直无法开展。毛人凤为此经常遭到蒋介石的责备，他每次被训过一顿后，便照例对外勤各单位也来一次指示和训令，要求各单位务必切实设法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毛人凤认为这项工作做得比较出色的，是天主教神父雷震远领导的华北工作督导团。他们利用天主教的关系，指使在解放地区或接近解放区的教徒从事这方面的活动，搜集到不少东西，往往比许多接近解放地区的省站所得到的情报还要多几倍。

在胡宗南攻占延安后，保密局为获取情报，立刻在延安成立了小组，派崔毓斌担任延安的稽查处处长。蒋介石这时急于要知道毛泽东、中共中央与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他指示毛人凤，要不借花费最大的人力和物力，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设法把中共领导人的下落弄清楚。那几天蒋介石天天问毛人凤有什么情报没有。可是稽查处除了在延安附近抓到几个没有法子走动的老病残废外，再也没有找到一点旁的线索。毛人凤也急得不得了，认为这是活捉中共领导人的大好机会，他一再严厉地要求陕西站务必加强延安组的工作，无论如何要满足蒋介石的这一要求。这时胡宗南也打电报给毛人凤，要他特别加强这方面的活动。毛人凤被弄得寝食不安，天天在会餐时谈这个问题，不断地用特急电报指示陕西站。他非常生气他说：“我们的工作没有法子配合军事上的胜利。辜负领袖对我们的期望。这种千载一时的机会都放过了，实在大说不过去。”直到1949年10月间，毛人凤在和沈醉谈到这项工作时，他也不得不承认，在和中共作地下斗争中保密局是失败了。

## 大破坏活动

毛人凤从保密局成立开始，便想走戴笠的老路，希望得到美帝的直接支持，与美帝特务们再来一次合流。戴笠死后不久，原中美所副主任、美特头子梅乐斯特地从美国到南京吊唁他这位朋友时，毛人凤便有过这种表示。梅乐斯当时曾答应在对付共产党问题上再尽一点力气。后来美国为表彰协助中美所工作的军统特务，特别发给郑介民、唐纵、毛人凤、潘其武、李崇诗、陶一珊等6人每人自由勋章一枚，郑介民和毛人凤都在欢宴美国授勋的专使宴会上，再次表达了他们希望美国支持的愿望。但是中美特务合作事，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迟迟未曾实现。直到大陆全部解放，保密局逃往台湾，美帝特务才姗姗而来，成立了一个中美办公室，由曾任中美所总翻译的刘镇

芳担任主任。美帝方面派了过去在中美所工作过的 20 多名美特来到台湾。

1948 年秋天，蒋介石特准保密局增加 2880 人的编制和预算。这两千多人，大部分配备在新成立的技术总队里，由杜长城任总队长，专门从事各大城市临解放时的破坏活动。技术总队成立前，在苏州办过一个爆破人员训练班，专门训练了 3 个多月。这个总队除了参加为阻止解放军渡江而在江里布置水雷和在江岸布置地雷等活动外，还参加了南京、上海撤退前的大破坏。

对于破坏上海公用建设的工作，则因汤恩伯还准备在上海与解放军进行巷战，没有进行，解放后才派飞机去轰炸杨树浦等发电厂。

最使毛人凤不满意并感到遗憾的，是他推动勒索的计划没有实现。1949 年 10 月间，他在昆明和沈醉以及徐远举等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还在大骂上海稽查处长黄加持太不中用，没有听他的命令，原来在上海被包围时，他就要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作好抢劫的准备。他认为东西不抢走，反正会落到共产党手中。在他的计划中，至少可抢到几万两黄金和大量美钞，足够保密局一两年的经费。由于黄加持的准备工作事先做得不周密，不但有钱的资本家都躲起来找不到，他们的钱放在什么地方也弄不清楚。结果除了特务们各显神通自己趁机抢了一些外，有计划的大规模抢劫却没有能实现。

在重庆撤退之前，保密局在重庆成立了一个“破坏指挥部”，也叫“破厂办事处”，下设参谋、技术、运输三个组，专门破坏重庆的兵工厂、发电厂、仓库等。抗战期间，国民党先后在重庆及附近各县建立过十来个兵工厂，蒋介石怕这些工厂落入解放军手中，便决定叫毛人凤派人进行彻底破坏。这个指挥部由兵工署稽查处长廖宗泽及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等负责主持，由杜长城率领技术总队特务们担任技术方面的工作，于 1949 年 11 月，先后将大渡口钢铁厂与长春龙溪河水力发电厂及南岸鹅公岩等兵工厂的重要设备一一予以破坏，当时有不少工人在护厂工作中壮烈牺牲。当解放军越过贵州而直向重庆挺进时，毛人凤还叫杜长城派人去破坏綦江大桥。当装满炸药的两部卡车和大批特务赶到綦江时，大桥已为解放军先头部队所占领，击毙了两个特务，其余的特务们弃车狼狈逃回。最后他们决定破坏重庆大溪沟发电厂，但全厂工人一致起而保护，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特务无法把炸药运进厂去，重庆发电厂才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广州解放前，毛人凤又派这个总队的人员去广州把珠江大桥炸毁。他们还在香港把即将开往新上海的轮船泽生号炸沉。陈诚看到这个总队在破坏方面很能起些作用，便叫毛人凤把它全部划归他指挥，改为东南长官公署技术总队，并特别准许这个总队的特务 2000 多人全部去台湾。

### 筹备“行动总队”

1948 年冬天，保密局还准备成立一个和技术总队一样庞大的行动总队，以加强对后方各大中城市风起云涌的民主爱国运动的镇压，专任逮捕与屠杀爱国人士的工作。蒋介石批准了毛人凤这一计划，同意再增加 2000 人的编制和预算。毛人凤便于 11 月初调沈醉到南京接替叶翔之，在准备布置暗杀李宗仁的同时，还要沈醉筹备成立这个总队。沈从人事处提供的几百人当中，挑选出不到 50 人，因大多数不适宜于担任或不愿担任这项工作。

当时一些大特务因为为战事发展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不少人发生动摇。早在 1948 年春天，便发生了情报处处长何芝园请长假去台湾想改行当商



人的事。毛人凤虽大骂何芝园为“胆小鬼”，也没有法子把他留下来。接着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张师也请求辞职去台湾，想去办农场。消息传开以后，有钱的大特务打算自己事情的就更多了。他们想早点离开大陆，纵然不能去海外做寓公，也希望先到台湾去。

毛人凤感到最吃惊的，是上海救济总署汽车总管理处处长余乐醒（又名余增生），竟和中共地下党发生了联系，在他住的愚园路家里竟掩护了地下党一部无线电台。毛人凤非常害怕军统特务弃暗投明，决心要捕杀余乐醒，以收杀一做百之效。当他命令上海稽查处的特务去逮捕余的时候，该处科股长一级的特务大都是余的学生，便暗中打电话通知他逃走了。毛人凤大发脾气，把稽查处长黄加持痛骂了一顿。

上述情况不断发生，对一些中下级的特务也有很大影响。所以，有些认为是很适宜干行动工作的人，这时也都在推三推四不肯再担任这项工作。后来人事处告诉沈醉，上海和苏州还有一批没有工作的人，叫沈去挑选一下。沈到了上海找他们谈话，又大多希望去西南等后方地区工作。沈看到这情形，苏州也不想去了，便回南京，专门布置暗杀李宗仁的事，成立行动总队的事便被搁了下来。

在准备撤走南京之前，毛人凤还布置过一次大逮捕。毛人凤得到蒋介石的指示，南京临解放还不走的军政大员，一定是想在解放后投向共产党，除了先劝他们早点离开外，到时不走的便一律逮捕起来。当时南京卫戍总部稽查处和首都警察厅刑警总队都奉到这一命令。可是等到保密局逃离南京而分别在上海、福州成立办事处，并准备向台湾迁移时，南京方面留下的大特务都纷纷作自己逃跑的准备了。他们一则怕解放时逃不掉，一则怕李宗仁上台后桂系特务要逮捕他们。所以等到蒋介石宣布退休后，大特务们便抢着向上海逃跑，毛人凤想制止也制止不住，他的搜捕计划，也没有实现。

沈醉从南京带着搞行动工作的特务和一大批武器到上海后，问毛人凤这批武器怎么处理？他告诉沈，除了沈醉愿带去昆明的一部分外，其余的要他设法储存在上海，准备在上海解放后拿出来使用。沈根据他的指示，买了大小棺材各一口，运到保密局在上海的一个临时看守所内，叫人把大棺材后面的木板取出，改装成比较容易开启的小门，把 10 挺汤姆生机枪装进去，每挺机枪配足两梭子子弹，装好后用大钉将棺盖钉好，雇一辆卡车将这口大棺材装上，送往停盾灵柩的四明公所内，付了两年人停厝费用，然后拿出一块写有“汤吉祥老大人灵位”字样的木牌钉在棺材前面，意为汤姆生机枪。这种专门停放死人棺木的地方，白天很少有人去，夜晚更没有什么人去，所以取存武器是比较理想的。在小棺材里面，装了 20 支毛瑟和勃郎宁手枪，于第二天另雇一辆小车，送往虹桥飞机场附近一个乱坟山埋好，立一块石碑，上镌“小女毛玲之墓”，意即毛瑟、勃郎宁。一切安置妥当后，把附近的地形、方位、道路等拍成照片。剩下的十支驳壳枪则装在一个大木箱内，辗转托人用“德记”五金店名义存寄在十六铺的一个仓库内。当时沈醉把这些储藏的地方告诉了毛人凤，并把照片、收据等交给了他。解放后，沈醉向有关方面交代出上述情况后，不久他们告诉沈，只有存放在仓库中的那些枪弹取出来了，停放大棺材的地方已改成工厂厂房，没有人认领的棺材都埋掉了；埋小棺材的坟地已改成菜园，找不到“毛玲之墓”了。

## 布置大屠杀

南京、上海解放前后，保密局秉承蒋介石的命令，对革命人士和无辜人民的杀戮，发展到更加骇人听闻的程度。这时蒋介石对毛人凤的指示是：“过去由于我们杀人太少，对一些反对我们的人没有杀掉，所以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怕我们。今后只有多杀掉一些，才可以挽回这种不利于我们的局面。”毛人凤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这一指示，向保密局的大特务们再三说明这种办法是最英明的，要求特务们都要重视，所以越到后来便越杀得多越杀得残酷。

上海警察局长毛森执行毛人凤的屠杀政策，先后杀害的革命人士，据起义人员沈醉日后回忆计有：解放军京沪特派员刘钧成，参谋黄培中，联络员陈玉山，情报组组长张伟，谍报员杨剑民，另外还有第九分区参谋汤新民等5人。毛森杀害的爱国民主人士有：民革南京分会主任委员孟士衡，宣传委员吴士文；此外，一个原来是国民党的宪兵，担任了民革交通联络员的肖俭魁也一起被杀害了。还有一些其他民主党派的人士，如陈惕卢、张达生、方志农、朱大同、王文宗等几十人。中共地下党员被捕杀的有近百人。后来在宋公园等处还公开杀害了很多人。

1948年冬，蒋介石叫毛人凤派人去北平暗杀奔走和平的何思源。毛人凤找了主持这项业务的第二处处长叶翔之，还有技术研究组主任刘绍复和沈醉，4人前后研究过两次。原来准备等何出门时，在他住宅附近用手枪暗杀他，但是考虑到那样做，凶手逃走不容易，以后才决定用定时炸弹放在他住宅内，炸弹爆炸后凶手可以从容逃走。毛人凤为了慎重起见，特别叫叶翔之亲自率领4名特务乘飞机赶往北平，事先并通知当时还留在北平的特务协助进行这一工作。后来没有炸死何思源先生而误毙其女儿后，蒋介石非常生气，指责了毛人凤一顿。毛人凤便埋怨叶翔之没有照他的意思在路上狙击，因考虑凶手的安全而误了大事。毛人凤说，牺牲个把人换一个何思源总是值得的。

1949年，张治中、邵力子、刘斐、屈武等到北平不愿再回去时，蒋介石更是恨到了极点，叫毛人凤一定要设法杀掉一两个。可是在这时候，毛人凤也感到无能为力了，但是他又不便拒绝接受蒋的命令。直到1949年9月间，他去昆明时还和沈醉研究怎样有把握地去进行这一工作。当时还有两个在保密局专干暗杀工作的人，由沈醉从南京带去昆明。毛人凤还问过他们，在北平有什么社会关系。他们也认为去北平无把握，才没有叫他们去。毛人凤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还一再说：“老头子对于没有杀掉这几个人很不高兴，每次问到我说时，我总是说还在准备，现在越看越没有办法了。”说到这里时，他叹口气说：“现在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不行了！”尽管如此，这年秋天，蒋介石还是命令毛人凤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蒋介石首先叫毛人凤在重庆杀掉囚禁多年的杨虎城将军，全家一个不留。1949年10月底，军统在重庆市大坪杀害了中共四川省委蒲华辅，重庆市委王朴，以及徐孝义、刘国志、成善谋、邓兴邦等10人。接着又秘密在原中美所范围内岚垭电台旧址杀害了30多人，其中有江竹筠（江姐）。在11月27日大屠杀中被害的烈士有：许晓轩、陈然、何雪松、李青林、何敬平、沈迪群、张现华、杨翱、黄显声、李承林、韩子重、黎又霖、周均时、王白与、周从化、阎继民、张醒民等，加上原因禁在新世界饭店的王亚细、艾仲煌、单本善、钟奇等，共达300多人。此外，他们还在成都十二桥杀害了许寿贞、杨伯凯、于渊、姜乾良、彭代梯、刘仲宣等30多人，造成了惨绝人寰震惊世界的大屠杀。

在重庆临解放前，毛人凤叫保密局把囚禁在中美所内白公馆和渣滓洞两个看守所以及重庆卫戍总部保防处小梁子新世界饭店看守所的 3 批人士一起杀掉，总共约有 300 多人，即“一一·二七”（11 月 27 日）重庆大屠杀案。

在执行这次大屠杀之前，蒋介石指示毛人凤：抓到的中共党员、民主人士和嫌疑犯都要杀掉，连原来保释出去的共产党员都要一样杀掉。当时重庆市长兼卫戍总司令杨森的侄女共产党员杨汉秀，本来已由杨森保出去，也由警察局刑警处长张明选，亲自带领特务将她杀死在歌乐山一个碉堡内。囚禁在白公馆内的 30 多人，系由军统局息烽监狱移送去的，大都关了七八或十来年。如张学良将军旧部副军长黄显声，便关了十多年；还有 4 个中学生，是抗战期间误入中美所范围，被指为中共嫌疑犯，关了十多年，也全部被杀掉。不仅如此，毛人凤叫保密局法官徐钟奇清理白公馆人犯时，连临时囚禁在里面的军统老特务、警察局刑警处督导长陈为城（因违犯军统纪律，平日关几个月就可无事），这次也一样签请枪决，蒋介石照样予以批准。

大屠杀是从 11 月 25 日开始的，先杀白公馆的人犯。为了避免引起附近渣滓洞看守所内人犯的警觉，决定使用刀和手枪。

当天上午第一个把黄显声将军叫出来，骗在离白公馆半里路左右的步云桥附近的山坳中，趁黄在走着的时候，由凶手从后脑射入一弹毙命。其余的人也是一个一个骗出来，到步云桥附近山沟内用刀砍死。女共产党员黎剑霜在狱中生有一个小孩，当时还不满周岁。她被骗出时，进入刑场看到那么多尸体躺在血泊中，自知难免，便请求保留孩子，结果被凶手将孩子夺去摔在地上。黎扑向凶手拼命，被旁边另一凶手拦腰一刀，砍倒在地，但她还挣扎着爬到小孩身边抚摸摔得半死的孩子。当天，30 多人被这样一个一个骗出去杀掉后，连看守所所长陆景清也感到害怕起来，马上找毛人凤吵着要立刻飞往台湾，他说：“我们这样杀人，将来被共产党抓到后，还能活着出来？”

囚禁在新世界饭店看守所的近百人，都是在 1949 年间被捕的，其中大多是嫌疑犯，据说被判处死刑的 30 余人中，只有少数如王亚细（女）为共产党员。这时根本不管谁是不是共产党，由毛人凤通知杨森全部杀掉。这批人于 26 日解到中美所内执行了。当时特务骗他们是换一个地方囚禁，这些人都带着行李，但一到缙丝厂刑场，看到新掘好的大坑，也都明白自己已无生路，不少人便在临刑前高呼共产党万岁！在一阵乱枪中，他们结束了生命。有的还没有击中要害，也被抛入坑内活埋。

27 日，在屠杀渣滓洞看守所内 100 多人时，是把所有监房房门加锁后，由门窗洞口用汤姆生手提机枪向内扫射。经过一次两次扫射之后，再洒上汽油连房子一起焚毁。少数没有被枪打死的，也都烧死在里面。这个看守所内囚禁的人，大都是 1948 年至 1949 年间由保密局西南特区和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所逮捕到的共产党员及民革、民盟人员，其中大多数是经过种种威逼利诱而不肯变节投敌的好同志。

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于重庆解放前逃逸。另一些特务在中美所内屠杀完毕后，在保密局总务处长成希超指挥下把几座盛满武器和器材的大仓库纵火烧毁后才逃出。

在成都，毛人凤通知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把四川逮捕到的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 10 多人，一起枪杀在成都十二桥。毛人凤原来还准备把昆明逮捕的 400 多人，也要杀一大批，由于卢汉坚决不同意才没有杀成。这使他认为是最大的遗憾。

## 蒋经国跨入情报单位

尽管毛人凤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但去台后并不得志。由他领导的情治单位对大陆工作连遭失败，蒋介石颇有不满之意。蒋经国在父亲的教导下，步步为营，把手伸向了本来由他控制的盘地。

从江西时代起，蒋经国即已着手建立自己的 KGB，但都成不了气候。那时候，“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是陈立夫的天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是戴笠的禁脔，都直接向蒋介石负责，蒋经国是插不了手的。退到台湾，局面小了，机构紧缩，正好给予小蒋登堂入室的机会。何况，陈立夫远走美国，毛人凤当家的军统，不复昔日雄风。

蒋经国跨进情报单位的第一步，是从“政治行动委员会”开始。“政行会”是于 1949 年 8 月 20 日在台北的圆山正式成立的，即今“安全局”的大本营。成立之初，仅书记室和石牌训练班两个部门。

“政行会”因对外行文不便，旋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披着“总统府”那张老虎皮，自成为君临一切的权威机构，超越任何党政机构，就像其中一位工作过的同僚所说：

“‘政治行动委员会’到了太子先生手中，马上便不同了，由无名单位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这个名衔，真是微不足道，然而大家不要以为它仅仅是机要室下面的一个小小单位，而便小看了它，实际上它是一颗包在败絮里面的钻石，虽然没有关防大印，只有个木条刻戳，但是就凭这个木戳，有时再加上一

颗太子先生的名章，便已所向披靡，没有哪个机关敢不另眼相看！”

“内调局”（全名为内政部调查局）自陈立夫 1949 年 8 月赴美“重整道德”后，经过一番大整肃，局长数易其人，到沈之岳接长，季源溥（前局长）升“内政部”次长时，已经被蒋经国彻底掌握了。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这位江山三毛之一，自恃得宠于蒋介石，是“领袖的耳目”，把“领袖”的儿子就不怎么放在眼里了。蒋经国很不喜欢他这位浙江同乡，可也莫奈他何！毛不仅有蒋介石撑腰，还有来美龄做靠山。蒋经国虽以“总政治部”名义，抢去“保密局”的业务，但在毛人凤眼里，蒋经国是外行，“外行领导内行”，毛怎么会服气呢？蒋经国遇到这样负隅顽抗的特务头子，类似猛龙斗恶虎，速胜是不可能的，只有用“渗沙子，挖墙角”的办法，长期图谋。先拉拢和毛失和的郑介民，次向毛手下的叶翔之招手，从内部去瓦解敌人。

叶翔之，浙江杭州人，原任职空军政工，1939 年，经其妻兄李崇诗介绍，加入“军统局”，绰号“小飞机”，喻“钻得快，爬得高”的意思。1949 年，任“保密局”第二处长，因部署暗杀杨杰，炸毁“译生”轮船，破获“吴石案”有功于蒋，深为蒋介石所器重。但叶贪污腐化，品德低下，且为人桀骜不驯，故与局长毛人凤，办公室主任潘其武（曾任阳明山管理局局长）失和，形同水火。毛挖空心思，欲去之而后快。1951 年，时机难得，叶办案敛财，共贪污 170 余条黄金，东窗事发，为毛抓到把柄。毛人凤一面扣押叶的副处长侯定邦，一面签报蒋介石，要求严办叶翔之，处以极刑。

这下，叶翔之慌了手脚，向当时的蒋经国好友王新衡（戴笠时代的军统高级干部）求援。王带叶去见蒋经国，小蒋认为，报复毛的机会来了，略施

手脚，将毛的签呈，从蒋介石办公桌上抽下，且调叶到“大陆工作处”任副处长（处长郑介民）兼中二组副主任。

叶贪赃免死，且因祸得福，摇身一变，为太子“最亲密的战友”。毛人凤的感受如何？不难想象。毛患肺癌去世时，有人曾说是为蒋经国所气死。

由于叶翔之窝里反，蒋经国打击“军统”的面愈来愈广泛，凡戴笠旧部，愿投诚效命的，或收容或升官，倚老卖老的顽固派，报复打击，绝不宽容。那位前戴笠的电讯处长、“国防部”爆破总队长魏大铭，即以贪污罪判罪下狱五年。

调离“总政治部”，蒋经国的新职是“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蒋经国坐在“国防会议”的办公室，直接指挥的有两局（“动员局”、“安全局”），间接听命的，除两局（“情报局”、“调查局”）和一“总司令部”（警备）外，尚有党政方面其它无数的机构，在其遥控下，从事特务统治。蒋介石的意思是“我让我的儿子主管情治系统，你们谁有异志，小心一点！”

蒋经国接管台湾情治系统后，对大陆派遣特务，破坏渗透，败多成少，益形黔驴技穷。安全局（郑介民局长）的重点，只好以巩固内部为工作重心。

## 第九节 郑介民猝然病故

### 首获蒋介石赏识

毛人凤死后，台湾的特务系统按理应由军统特务内部三大巨头之一的郑介民重新掌管，但此时的蒋介石，对郑介民的“深信不疑”已发生了变化。

郑介民于1897年农历8月15日生在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下水村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里，兄弟四人，他居长。

郑介民原名庭炳，别号耀全，他投考黄埔时改名介民，在军统当特务后用的化名是杰夫。

1930年前后，郑介民在武汉搞特务活动时，与汉口女子柯淑芬结婚，先后生了8个子女。柯是一个非常泼辣的女人，郑很怕她。

郑幼年因父亲早死，兄弟又多，家无恒产，只勉强读完旧制小学，十多岁的时候即随同同乡去马来西亚吉隆坡谋生。他最初在一个橡胶园里当徒工，收入很微，足够个人糊口。由于当时在南洋做苦工的华侨没有几个人读过书，而他能写能算，不久便在一个养鱼场当了记帐的，每月收入稍多，能经常接济家里一点钱。他在这个养鱼场工作了好几年，最初还安心，因比当苦工好一点，稍久便不满意起来，常感寄人篱下没有出息，自己又没有本钱做生意赚钱，便想另谋出路。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创办陆军军官学校的消息传到南洋以后，郑便决心回国从戎，邀约同乡黄珍吾一同回到广州，准备投考黄埔一期。结果黄珍吾被录取，而他却没有考上。这时，他苦闷异常，感到进退两难，想再回南洋，又怕被人取笑，住下去生活又无法维持，后来得到同乡邢森洲的帮助，暂时住在邢家。他等了一个多月，找不到工作，便投入警卫旅旅长吴铁城所办的军士队当学兵，并积极补习功课，准备继续投考黄埔。

当黄埔二期招生时，他又去投考，这次总算被录取了。他高兴异常，从此决心发愤读书，勤学苦练。据说他在黄埔时，一有空就看书，很少出去玩。后来他常对人说：“一个人没有机会读书，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他尝过第一次投考黄埔没有被录取的苦头，使他终生都没有忘记，以后不管怎样忙，都保持经常阅读的习惯。

郑回国后，常以“华侨工人阶级”自居。他在黄埔军校的时候，经黄珍吾介绍，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他对这个组织极感兴趣，并且介绍邢森洲也参加了。当时他们利用邢对外担任联络工作。据说，邢为非黄埔学生加入该会的第一人。郑和黄珍吾、周复等10人为一小组，以研究三民主义、团结革命力量为名，联合贺衷寒、潘佑强、杨引之等，同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共的活动。

郑于黄埔二期毕业后，即投考苏联在莫斯科举办的纪念孙中山的中国劳动大学（简称中山大学），与康泽、李宗义等为同期同学。他在中山大学时，对该校的几门主要课程，如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等最感兴趣，花过不少时间去细心钻研。但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而是为了以后升官发财做反革命的政治资本。

郑介民只读过小学，但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却动笔开始写《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书，内容只是重复了一些反动头子们的陈辞滥调，说什么中国

没有阶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问题是民族问题，等等。以后连他自己也认为这本书写得太拙劣，不愿再提它。不过这本书据说在当时还是得到过蒋介石和一些反动头子的赏识，从思想和言论上对蒋介石“四·一二”清党反共起到一些拥护和帮凶的作用。

1927年8月间，郑由苏联毕业回国，使他感到非常失望和伤心的是正赶上蒋介石下野去日本。他找不到主子，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内心惶惶不安，便只好去投靠贺衷寒。贺当时任中央军官学校第六期的总队长，便把他安置在总队部担任政治教官。他利用这一职务向学生鼓吹他的那一套反共的理论，深得潘佑强的称赞。不久，潘又推荐他去第四军政治部担任秘书。当时政治部主任为杜从戎。

1928年1月，蒋介石由日本回国，复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郑便千方百计托人直接走蒋介石的门路。蒋在召见他的时候，他把在苏联留学的黄埔学生思想情况向蒋作了报告，并表示他是坚决反共的。蒋介石很欣赏他这一套，将他留在身边当侍从副官。从此以后，郑便官运亨通，飞黄腾达。

### 打入桂系一鸣惊人

郑介民当了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实际上是替蒋做特务工作。当时主持这一工作的是王柏龄，直接领导郑的是蔡劲军。郑与蔡不仅是黄埔同期同学，且系海南岛同乡，两人之间关系很不错。郑最初在南京搞这一活动时，并没有什么特殊表现，只是在一些同学同乡方面搜集一点情报。但没有多久，在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斗争中，他却大显身手，一鸣惊人，受到蒋介石的特殊信任，奠定了他以后搞特务的基础。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1928年冬，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以后，蒋介石的天下表面上算是得到了“统一”，但新桂系的势力却从广西经武汉直到华北，分去了他不少的地盘。蒋介石对此很不甘心，时刻想把这个眼中钉拔去。

郑介民了解到蒋介石有解决桂系的决心，便自告奋勇，请求去武汉活动。他认为最有把握的事，是他与李宗仁的兄弟李宗义在苏联中山大学同学时两人私交很深，李早就要郑去替桂系工作，郑可以通过这一关系打入桂系内部活动。王柏龄认为他这一关系很可利用，便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蒋马上找他去，面授机宜，命他立刻动身去武汉。

郑介民的这次活动，他一直认为是件得意的杰作，以后经常向人夸耀。

郑介民假装失业，从南京悄悄跑到武汉，故意找一家很小的客栈住下来，装出一副非常穷困潦倒的样子。当他把武汉的情况看了看以后，便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去找李宗义。当时第四集团军总部里，一般人称李宗仁为“老总”，称李宗义为“二总”。“二总”在总部内受到各方面的尊重，谁也不会注意他会把一个特务引进来。

郑介民见了李宗义之后，说自己失业很久，连生活都无法维持，此次是专诚前来投效，希望得到收容。他说得非常诚恳，加上李宗义根本不了解他的情况，便信以为真，马上答应为他设法。

隔了一天，李宗义去客栈探望郑，看到他那副穷困样子，便毫不怀疑，立刻要他搬到总部与他同住一室。李还给他做了衣服，经常陪他出去玩。这时在总部工作的一些高级官员看到“二总”和郑的关系这样好，都乐于和他接近，他利用种种机会拉拢总部机要人员，首先把李宗仁和各部队及各方

面联络的密电码本盗出拍成照片，又陆续把李部兵力驻地、人数、装备、主官姓名等表册抄出来，秘密送给蒋介石，使蒋掌握到第四集团军的全部情况和各种活动。

在此同时，郑又在桂系将领中进行挑拨离间。先是，李宗仁到武汉后，为了拉拢湖北人，曾提出过“鄂人治鄂”的口号，因而桂系中的鄂籍将领如胡宗铎和陶钧便红极一时，以致引起一些桂籍将领如夏威、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的不满。郑便借机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经常散布“当权发财的是湖北人，打仗拼命却要广西人”等一类话去挑拨离间。

桂军将领中闹不和的情况，郑介民随时向蒋介石报告。蒋便派人对这些人员进行收买拉拢和分化瓦解工作。这方面的具体工作郑做得很少，因为怕一旦暴露，不容易再找到一个这样的人打入内部去活动。当时一些人对蒋介石的特务活动都缺乏警惕，郑表面上又装得那么老老实实，见了李宗仁总是开口“德公”，闭口“德公”，连李宗仁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他。

蒋介石的阴谋逐渐完成的时候，李宗仁还没有察觉到他的基本力量的内部发生了变化。到1929年，他还想扩大势力，把桂系势力由广西到华中、华北联成一片。白崇禧在北平纵谈天下大事时，也常说：“自古以来统一中国只有自北而南才能成功。”言外之意，大有随时准备自北而南进军的打算，蒋介石却不动声色，暗中作好各种准备，只等机会下手。

李宗仁决心进取湖南，企图扶植倾向桂系的何键代替亲蒋的鲁涤平为湖南省主席，不经过中央政治会议的批准，擅自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越权免去鲁的湖南省主席职务。此时，何键暗中向蒋介石输诚，使蒋更为高兴，认为时机已到，便扣压李济深于南京汤山，借口李宗仁不服从中央而免去李的职务。李宗仁、白崇禧通电反蒋，蒋以师出有名，于1929年4月间发动战争。

这时，早已被蒋介石收买的桂军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旅，一枪不发，率部退往平汉路花园一带。胡宗铎、陶钧等陷于孤立，无法支持，率部退往沙市、宜昌一带。因此，桂系盘踞在湖北的10多万人便一下子土崩瓦解，蒋介石毫不费力夺取了武汉。当时正在上海医治眼疾的李宗仁完全没有料到会失败得这么快，闻讯急忙从上海逃往香港。

桂系问题迅速解决后，郑介民便回南京见蒋介石复命。蒋介石在接见郑介民的时候，紧握着郑的手连声称赞他的工作做得好。郑又趁机当场把蒋给他的活动特别费剩下的一本存折交还，更加受到蒋的称赞。

蒋介石对一些叛桂来投的将领仍旧很不放心，便派郑介民去做这方面的工作，任命他担任李明瑞的十五师政治部主任，随部队去广西。当俞作柏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时，蒋又派郑为广西省政府委员，仍兼十五师政治部主任，驻在南宁。他的任务是监督俞作柏和回广西的桂系部队。

不久，蒋以57师杨腾辉部驻防柳州，郑在南宁无法兼顾，又将郑所兼15师政治部主任免去，改令其兼57师政治部主任。郑这时便经常来往于南宁、柳州之间。他一面在广西省政府内暗中布置爪牙，一面利用政治部派在部队内的政工人员为他搞特务活动。

当时与郑一同派到广西为蒋介石搞特务工作的还有不少人，而与郑经常有联系的是梧州海关监督饶毓琛，专门控制广西的财政收入。梧州海关监督是广西第一肥缺。这个关的收入为广西主要财源，被蒋介石派人掌握以后，广西部队回到这个地瘠民贫的地方，军政费用便都是仰蒋的鼻息。俞作柏的困难一天天增加，弄得一筹莫展，郑介民和饶毓琛两人伙同一气，暗中进行



对俞部下收买拉拢，又重演在武汉的故伎。俞虽然知道他们是在捣他的鬼，但由于是蒋介石派去的，表面上还得客气三分。郑虽然是个空头的省府委员，但对省府各项措施都要过问，并把一切情况随时向蒋介石报告。

1929年秋天，汪精卫、陈公博等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及张发奎等酝酿反蒋的时候，派人去游说俞作柏和他的部下将领。俞等均感到与其受蒋压制困死在广西，不如起而反蒋，“向外面打”，另谋出路。郑介民在南宁听到一些风声，一面急电向蒋报告，一面连夜赶赴柳州，企图掌握和分化杨腾辉部。

同年10月初，俞作柏在南京宣布就任讨蒋军总司令职，以响应在宜昌通电反蒋的张发奎时，郑介民还在柳州活动，他不敢再回南宁，便连夜从柳州化装只身逃往广州。

俞作柏发动反蒋后，各方面的反应并不如他的理想那么大。他部下中被郑、饶收买了的吕焕炎、黄权等部又起而反对；张云逸、李明瑞率部在右江树起红旗，还有一部分军队自行溃散。俞作柏弄得狼狈不堪，未待出兵，便已垮台。

同年12月间，郑从广州经香港回到南京。这次他去见蒋介石的时候，便不像上次从武汉回去那样受到蒋的重视，蒋当面责备他，因为广西不但发生了反蒋运动，说明郑在控制分化广西部队方面没有多大成绩；特别使蒋痛恨的是有不少广西部队起义当了红军，这是他最头痛的事。

郑这次回来，蒋介石冷落了他一段时期，才派他到参谋本部去当了一个上校参谋。他整天无事可做，便专心阅读有关军事、政治、哲学书籍，郑以后经常对人说，他在这一段时间内很看了一些东西，对他有极大帮助。

蒋介石没有找他，他也不敢去见蒋。但他在人前一直没有发过半句牢骚，却常向人表示，认为自己在广西工作做得不好，辜负了蒋的期望，不能为校长担忧分劳，用以自行谴责。这些话慢慢地传到蒋介石的耳中，因此，蒋对他又慢慢重用起来。

## 瓦解陈济棠反蒋

1931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黄埔学生讲话，宣布成立复兴社，郑介民立即请求参加，并被选为该社干事会干事。郑在这个法西斯集团中，一直担任着重要的角色。1936年刘健群任书记时，因赴北平工作，蒋介石指派郑介民代理书记，直到同年冬康泽接任书记为止。

1932年3月，蒋介石召集复兴社高干们开会，决定成立特务处。会前，蒋先找康泽和桂永清谈话，征询他们的意见。蒋想要康任处长，康当时表示不相宜，蒋不作声，也未再问桂。等到开会的时候，蒋提出复兴社应当成立一个特务处，准备以戴笠为处长、郑介民为副处长，征询在场的人有什么意见。大家一听，人选已由他提出，只好表示同意。郑当时默不作声，不敢表示不愿意，而心里却很不痛快。因为他了解戴笠的为人，知道这个人不容易共事，也有点不甘心居于这个六期同学之下。

特务处成立前夕，戴笠和郑介民两人出面在南京大宴宾客时，前考兴高采烈，后者却表现得很勉强。在确定特务处的组织人事时，戴虽然请郑介绍些亲友参加，但他推说没有适宜的人，完全由戴笠把他的“十人团”作为骨干。以后郑才介绍了邢森州、王昌裕、郑公粥等小同乡和侄子到特务处工作。

郑任特务处副处长后。参谋本部的职务并没有取消。开始他很少去特务处办公，并想摆脱这个工作，另谋出路。戴每次离开南京请他主持特务处工作时，他对人事、经济和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都不愿处理，往往要蒋介石派在该处任书记的唐纵决定，极力避免在这些方面和戴笠发生摩擦。他曾两次请康泽向蒋介石保他干别的工作。康曾经保举他担任中央军校西北训练班主任，以后还保他担任过政治部第二厅厅长，但蒋介石都没有批准，还告诉康，说此人做事无魄力，让他留在特务处，以后不要再保荐他。

蒋介石对特务处的工作异常重视。他知道郑不安心，曾找他去谈过话，叫他好好帮助戴笠把这项工作做好。郑知道蒋不会调动他，便只好和戴笠相处下去，戴也很了解他的心理，所以对他表面上很客气。

郑为人谨慎而又爱说话。在一件工作没有做好以前他是不随便向人谈出来的，可是一旦做出了成绩，他又爱向人夸耀。他在这个时期内，最得意的事有这样几件：

“一·二八”以后，十九路军开赴福建时，蒋介石指示特务处要多派人打入这个部队去充当中下级军官。其中除了少数是通过特务处组织进行有计划的布置外，大多数是由于他个人关系派遣去的。这些人平日与特务处没有什么关系，仅和他个人保持联系，身份不易暴露，活动更为方便，后来起的作用也更大。如他派去的海南岛文昌县的小同乡云大沂，策动七十八师师长云应霖投效蒋介石。云大沂还提供很多情报，当时特务处福建省站所得到的有关十九路军的情报，往往不及他所了解的多。

十九路军在福建反蒋时，郑介民正在北平，戴急电把他找回南京。蒋介石原想要郑去福建主持瓦解十九路军的活动，但他顾虑很多，迟疑不决。他认为认识他的广东人不少，几年间，通过他的关系打入十九路军去工作的人还有些去后一直没有和他联系，态度不明，怕被这些人认出后出卖他。戴笠知道他胆小，不好勉强，便要他把一些可靠的关系交出来，由戴笠自己带了几个人潜往鼓浪屿坐镇指挥。

通过郑所派遣打入十九路军的特务和福建省站的特务活动，戴笠不仅掌握了福建全部情况随时向蒋介石报告，甚至连十九路军总部与所局部队及对外联络的密电本都全被特务盗取出来，弄得总司令部竟在事变发动后无法向部队下达命令。部队发回的电报也无法翻译出来，彼此均失去联络。

“福建事变”很快结束，戴笠回到南京后，虽然最初对郑介民不肯前往有些不满，可是事情出乎意外顺利地得到解决，又庆幸自己大功独得，反过来对郑表示好感。由于郑介民事前所布置的广东同乡和海南岛小同乡从中所起的破坏作用收效很大，戴笠曾当着许多特务面前称赞郑有“制敌机先”之明。蒋介石听到戴笠的报告后，也很称赞了郑一番。

1933年春天，华北局势非常紧张，何应钦感到穷于应付，蒋介石叫戴笠派重要特务去主持华北方面的工作。戴便向蒋提出派郑去兼任华北区区长，对外活动则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中校参谋名义作为掩护，将特务处在华北地区的工作重新作了一番调整部署。

古北口战事发生的时候，蒋介石生怕日军大举进攻，急于要了解随时发生的情况。当时华北区掌握这方面的材料很少，古北口一带又没有派遣特务组织，蒋介石骂戴笠不懂得工作的轻重缓急。戴便急电郑请他亲自去布置并了解一下情况，临时成立了一个小组，带了一部电台，随他同到古北口。郑在那里只住了两三天，把那个小组和电台留下，自己赶忙回到北平。以后他

一直向不了解情况的人吹嘘，他曾经参加过“古北口的抗日战役”，实际上便是这么一回事。

郑介民在华北区长任内最得意之作，是1933年5月7日派人在北平六国饭店打死张敬尧。这是由他亲自出马，化装成为由南洋回国的华侨资本家进行侦察活动，等到把张的情况弄清楚以后，便派华北区行动组组长白世维带领行动员黄泗钦等将张击毙。

郑介民自主持刺杀张敬尧后，即回到南京，再也不愿去北平，害怕张的旧部和日本特务对他进行报复。1932年秋天，戴笠改派王天木为华北区区长，郑连办理移交手续都不敢去，好在他是副处长身份兼任区长，也没有人难为他。

1934年春，蒋介石为了要效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决心挑选一批人去学习。郑介民也被选中了。当年夏天，郑介民和潘佑强、杜心如、滕杰等一行7人，以军事考察团名义前往欧洲考察，实际上主要是去德、意两国。蒋介石给他们的任务，一是学习法西斯统治人民和反共防共的一套办法，二是发展复兴社在欧洲的组织。他们先后到了德、意、英、法、奥、瑞士等国，在德、意的时间较长。他们对这两个独裁统治集团各方面都作了研究。郑对学习他们的特务工作方面的组织活动等花的时间最多，搜集了不少材料，由戴笠整理后送给蒋介石。戴参照他这个报告，对他领导的特务处作了不少的调整。

最初戴对特务处的工作究竟应当怎样做，提不出一套完整的办法。郑这次考察，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当时特务处改组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及以后的军统局所搞的那些活动，不少是通过郑的这次考察和唐纵在德国任国民政府驻德大使馆副武官时所学到的一套搞起来的。像通过特务组织去控制交通和通讯，监督无线电台和收音机及干扰广播，派特务渗入机关、工厂、学校，加强警察机构等等的措施，以后在反共反人民方面都起过作用。

他们在欧洲时，每到一地总要召集留学生开会，宣传复兴社的组织和作用，告诉他们这个社是蒋介石自兼社长，叫所有的留学生都要参加这个组织。郑向留学生讲话时很干脆，常常毫不避讳他说，蒋介石决心不再依靠国民党，所以组织复兴社来代替。他为蒋介石大肆吹嘘，说蒋如何有决心把中国治理得富强康乐，而国民党已经老大腐朽，没有朝气，只有靠复兴社来复兴中国。据郑自己说，他的这些话常常受到留学生们的欢迎。因为这些人对国民党中一些老朽昏庸的权贵们早有不满，平时敢怒而不敢言，郑的这些话正投他们之所好。

郑等在德国时，曾多决请求晋谒希特勒致敬，经过几番周折，等了好些时候，才被允许接见，希特勒在召见这些不远万里而来向他致敬的徒子徒孙时，态度非常傲慢，但他们却以能见到“元首”一面而感到心满意足，均认为不虚此行。

他们在意大利时，据说墨索里尼在接见他们时态度比希特勒要好得多，对他们曾加以勉励。他们便感到受宠若惊，高兴异常，回国以后，郑介民常以曾见到过这两个“法西斯老祖宗”而认为无上光荣。不过也有人说，他们在德国请求晋见希特勒，没有得到允许，回来后为了面子吹牛皮。

1935年春夏间，郑等由欧洲回来后，蒋介石曾抽出不少时间听取他们的口头报告，并看了他们长篇大论的文字报告，兴趣异常浓厚。戴笠也不断找郑问长问短，请他到特务处作报告，他立刻成了最受欢迎的大忙人。

郑回国不久，便被蒋介石提升一级，任命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

1932年特务处与陈立大所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合并，戴笠任处长，郑仍兼任副处长。当时陈立夫对戴笠限制很严，处处不给他方便。二处的特务对外活动遇到很多困难，甚至连军委会的证章都不肯多发给他。戴笠便要郑介民向参谋本部要了许多证章和差假证，当时许多特务对外活动统统都是用参谋本部第五处名义。

从1936年春天开始，戴笠不断接到情报，说胡汉民在广州召集两广军政头子密商反蒋问题。蒋介石曾几次电促胡汉民到南京来，均无结果，便命令戴笠加强华南地区的特务活动，戴把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广东籍特务分子大量抽调前往。

不久，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及川访问广州，特务们得到情报说陈济棠接受了日本人的支持，准备与广西联合向南京进军推翻蒋介石政权。蒋便加派郑介民前往香港，指挥华南区进行暗杀陈济棠的活动并分化收买广东部队，郑于3、4月间即由南京经上海秘密去香港。

当时特务处华南区区长邢森洲，原是郑所保荐的人。邢森洲在南洋混了不少时间，在华侨中小有声望，他的人事关系很不错，但对搞暗杀和分化等却远不如郑有经验。

郑去香港后，一面积极布置暗杀陈济棠的工作，一面多方设法收买陈的部下叛陈投蒋。郑派到广州的一个暗杀小组，曾在广州市通往郊区梅花村陈济棠的寓所途中租好房屋，准备利用陈每日往来时进行狙击，结果被陈的特务发觉，将郑派去的几个特务捉了去，这更使陈坚定了反蒋的决心。蒋介石和戴笠对此均大为恼怒，曾函电指责，令郑迅速重新布置，必欲杀陈而甘心。

6月初，陈济棠借口蒋介石不抗日而通电反蒋，自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一面派大军镇压，一面加派特务暗中加紧收买陈济棠部下，郑介民和邢森洲在这次事变中最得意的杰作是收买两广空军。当时两广空军中不少是华侨，邢和这些人当中不少人有关系。郑先以12万港币收买了航空队长黄光锐。他们还收买了广西空军，并策动师长李汉魂、李振良等将级和校级军官40余人叛陈投蒋。

7月初，各项布置就绪，黄光锐等分别率领飞机连同全部空勤人员飞向南京。广西空军也在同一天逃走，一同到达南京。黄光锐发表通电，历数陈济棠在广东多年来搜刮民财、勾结日寇的罪行。

蒋介石和戴笠自得到郑的密电，知道他在进行收买两广空军的活动，曾拨出数以百万的港币令其积极进行，日夜盼望早日成功。当这些飞机到达南京后，蒋、戴十分高兴，连电嘉奖，嘱其继续加速进行瓦解陈部的活动。

陈济棠等反蒋通电发出后，仅仅一个月左右便弄得众叛亲离，不得不通电下野。这次事变很快结束，郑在其中起了不少的作用。当他高兴地准备回南京报功请奖时，戴笠又叫他到广州布置保护蒋介石的工作。

8月间，蒋介石飞到广州。郑这次去见蒋，自然又得到了一番奖励。蒋离开广州后，他才回到南京，戴笠又为他举行一次庆功大宴会，并给他请到一笔巨额奖金。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郑介民被调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主管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

## 醉心成为一名“儒将”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表面上虽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一致联合起来抗日的主张，而暗地里却更加积极地进行反共防共的阴谋活动。当国民党政府从南京逃到武汉后，在珞珈山举行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便提出要增加一个庞大的特务机关，把原来由陈立夫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交与戴笠，另在中央党部内设立一个同样的调查统计局，以加强他反共反人民的特务力量。

蒋当时虽有意提拔戴笠，但苦于他的资历不够，只好指定他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为局长，以戴为副局长负实际责任。但对郑介民的安排却成了问题，蒋不让郑离开这个特务组织，又不便设两个副局长，最后才决定叫郑兼任军统局的主任秘书，协助戴笠工作。郑对这个名义很不痛快，开始很不愿去办公，老是推说事忙抽不出时间，这个主任秘书便成了一个有名无人的空位。戴也了解郑的心理，不好勉强他去，而内部工作却还得有人领导，便在军统局中仍保留书记长这个职位，主持内勤业务。唐纵、张严佛、周伟龙、吴麋恕四人先后担任过书记长。

当时军统特务之中，不要说外勤特务不知道这个主任秘书，连内勤也有些不知道书记长之上还有这样的领导人。戴笠感到这样下去有问题，不但郑可以借口不去军统工作，特别是怕蒋介石查问起来无话交代，才于1940年将书记长名义取消，改为代理主任秘书，由戴的亲信小同乡毛人凤来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46年3月间戴笠死去前，郑的这个主任秘书都是由毛代理。到1942年前后，中美所工作正在开展，毛人凤忙不过来，又增加了一个副主任秘书，由张严佛担任，直到抗战胜利。

郑介民对军统局这个主任秘书的本职虽不大感兴趣，而他的老婆却生怕丢掉了这个位置。因为军统局钱多、东西多，可以源源供应，不但郑所乘的汽车、汽油由军统局供给，家里用的副官、男女佣人、厨师等都是军统局支薪，连家里的许多开支和应酬请客等费用都由军统局包下来。军统控制的公开机关如缉私署、货运局、交通检查处等走私和缉私得来的东西，对军统大特务“进贡”时，总有郑介民的一份，为了这些，郑的老婆去军统局本部的次数，却比郑还多。每当戴笠离开重庆，毛人凤要找郑去军统主持纪念周时，郑常推说事忙抽不出时间。毛人凤以后找到一个窍门，只要打电话到他家里告诉他的老婆一声，第二天郑一定准时到达，从不误事。

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曾请求英国帮助成立一个突击部队。郑得到这一消息，对此很感兴趣，便托人向蒋去要求，希望派他去担任这项任务。蒋认为郑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不适宜搞这种工作，另派李默庵去筹备成立英械装备的突击部队，郑又一次感到很大失望。

当参谋本部改组为军令部之后，郑却意外地被蒋介石提升为该部第二厅中将副厅长。这样虽使他安下心来，却仍不忘情于带兵的工作。1939年陆军大学设立将官班，专门调训国民党中高级军官，他便请求带职去受训。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还要去进陆大？他很高兴地说：“现在的军事机关和部队的幕僚长，规定都要陆大毕业，如果自己不是，不但没有机会带兵，也不懂业务，无法工作。而且由于和陆大学生不是同学关系，也不易驾驭，所以非去不可。”

郑介民于1939年9月前后进陆大将官班，1940年4月毕业。当时陆大

还设在贵州遵义，有些调训的高级军官带职学习，连画地图都要参谋代办，本人则经常跑到重庆、贵阳去玩乐。即使在遵义，他们也是花天酒地，有时通宵达旦地赌博，上课听讲只是敷衍了事，反正是去混一个学历。郑介民在这段时间内却与众不同，他非常认真地学习，有空还从事写作。他偶尔回重庆几天，也是到军统局和第二厅去要一些资料，作为他写作参考之用。他老婆经常写信骂他，说别人常常回来，他却不想家，还疑心他在遵义玩什么花样，曾两次偷偷地跑到遵义，看到他的确是在埋头学习和写作才放了心。

郑一面悔恨自己没有带兵打过仗，“武”的气味还差一些，一面又醉心于想当一个“儒将”。当时反动派中许多将领，都有“武人惟恐不能文”的思想，他便是具有这种思想的一个典型人物。几年间，他从军统局与第二厅档案中搜集了不少材料，先后编写了《军事情报学》、《谍报勤务教范草案》、《游击战术之研究》等几本书。国民政府对他这种肯钻研和写作精神，曾予以明令表扬，并授给他一枚“积学勋章”。他对这枚勋章极为重视，认为是最难得的“荣誉”，经常爱把它拿出向人炫耀，以显示他是个“文武双全”的“儒将”。

郑任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期间，还于1940年下半年起，兼任“中苏情报合作所”副所长，所长由二厅厅长杨宣诚兼任。苏联方面也派了一个副所长，这是苏联帮助中国侦收对日情报工作的。该所设在重庆夫子池来龙巷庆德里1号，另在南岸黄山放牛坪茶亭子附近设有电讯侦测总台，由军统所派的特务肖坚白任总台长。苏联派有一个副总台长和几十名技术人员，在南岸汪山建有两幢宿舍专供苏联人员住宿。该所结束后，该处改为军统汪山农场。

这个所虽是由军令部出面，实际是由军统主持与苏联进行合作，专门侦收和研究翻译日本陆空军无线电通讯密电码。苏联方面提供了一批供侦收用的电讯器材。名为合作，实际上是彼此都想把对方侦译日本密电码的技术学过来，而把自己懂得的一套又不要让对方学去。戴笠曾把留学苏联的中共叛徒谢力公、吴景中等人派去担任该所的科长（苏联方面派副科长），其他一些工作人员也大都是由戴笠选派去的军统特务。

戴笠一方面指使派在该所的电讯部门特务去偷苏联人员在这项工作中的技术方法，同时还指示他们应多方设法去和苏联人员接近，想从中收买拉拢个别的苏方工作人员，妄想在苏联内部去布置情报工作。戴对谢力公抱有很大的希望，谢的俄语很流利，一向长于交际应酬，戴特别拨出在赣口街附近的一座小洋房交与谢，作为联络苏联人员之用。谢的举止很阔绰，一切交际费用都由军统支付，曾花了不少的钱，但却没有听说得到什么结果。当时郑介民的老婆为此常发牢骚，说郑兼任该所副所长，却远不郊该所的科长阔气。

郑在兼任副所长期间，平日也很少过问该所的工作，一直交由军统会搞。有人偶尔问到他这个所的情况时，他总是神秘他说：“这是秘密，暂时还不宜公开，将来等到对日作战取得最后胜利，一定会有惊人的成绩在报上公布的。”实际上他有许多问题也弄不大清楚，除了邀请苏联人员赴宴时他去参加一下，他连设在南岸的侦测总台都没有去看过一次。谢力公有事也是直接找戴笠请示，有些事告诉他一声，有些连事后都不和他谈，他也从来不去追问。

## 拥有四枚外国勋章

1940年夏天，蒋介石叫戴笠加强军统在南洋各地的特务活动，戴因郑对南洋情况较熟悉，要他赴南洋一带视察，开展军统在海外组织的工作。他认为这些地方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范围，必须与英国有密切联络，以免引起英的不满。他去视察时，英方面特派两名特务随他一同前往。

同年秋，通过郑与英接洽，决定成立一个“中英情报合作所”，英国派特务安德逊到重庆正式商谈中英情报合作问题。蒋介石决定用军统负责与英国合作，戴笠即推荐军统特务武装部队头子、军委会别动军司令周伟龙兼任该所主任，安德逊任副主任。

中英情报合作所成立时，戴笠在军统局举行纪念周上特别称赞郑“为军统发展国际情报工作作出新的贡献”。

这个所设在重庆小龙坎红糟坊周家湾别动军司令部旁边。合作内容主要是由军统向英方提供有关日帝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情报，其中着重于日本空军的情报。军统曾应英方要求，派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先后在香港、印度（日寇占港前去印度的）工作，专门侦测日空军的活动和研译日空军密电。当时这个工作组英方很重视，并多次想派人学习军统侦译日空军密电的技术，军统始终不肯把这部门所取得的经验向英方提供。

1942年前后，戴又要郑以军令部二厅名义派军统特务李汉元、吴文字等十余人去缅甸工作，还由英方派遣几名特务随同前往。

郑最得意的一件事，是1942年1月间，他对盟军在新加坡的作战方案提出自己的意见，后来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当罗斯福和邱吉尔决定要保卫住盟军在远东的军事基地新加坡时，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英国上将魏菲尔在新加坡召开同盟国军事会议，商讨保卫新加坡的计划，蒋介石除了派杜聿明等前往参加外，还派郑介民前往担任有关情况方面的联络。郑去了之后，不但没有受到魏菲尔的重视，连当时新加坡英军总司令对他也很冷淡。他只是和魏菲尔总部的一些高级幕僚人员有所接触，并没有正式参加这次会议，一向非常骄傲的魏菲尔，在这次会议上坚持表示：只要缩短防线，集中兵力，确保新加坡是决无问题的。郑介民却向魏总部的幕僚人员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见。他认为新加坡是绝对没法防守的，不如集中力量坚守印度尼西亚，使之成为西南太平洋盟军的反攻基地，坚守印尼比坚守新加坡要有把握。当时他的这些言论，完全没有受到魏菲尔的注意。

郑从新加坡回到重庆，又把这一意见向蒋介石提出，蒋对他的话相当信任，曾正式转达魏菲尔，也同样没有被采纳。

还不到半个月，日军便集结大量海陆空军猛攻新加坡。这个为英国经营多年、费资达6000万英镑建成的所谓远东第一巨港，加上有6万多名防守的英军，只有十多天时间，便于1942年2月被日军攻陷，魏菲尔仓皇率领总部人员逃往荷印爪哇。

这时，不仅在蒋介石和在重庆听到过郑意见的人，认为郑果然“料事如神”，连魏菲尔在致电蒋介石的时候，也有悔不听郑言而遭此惨败的表示。蒋便再度派郑去爪哇与魏联络。这次魏菲尔的态度便与以前完全不同。据郑回来时说，连魏菲尔都亲自去机场迎接他。不过这次郑却没有看得准，当他刚从爪哇回到重庆，正预备再去的时候，日军又乘胜向印尼大举进攻。不出一个月，爪哇也被日军占领。魏菲尔只身乘飞机逃往印度，防守印尼的几万英军和魏菲尔总部军官都成为日军的俘虏。

在一败再败以后，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部也一度宣布解散，魏菲尔仍

回原任驻印英军总司令。以后蒋介石还经常派郑去印度和魏菲尔联络。后来英国派蒙巴顿在锡兰任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时，郑也曾去锡兰和蒙巴顿联络。在协同对日作战中，郑曾提出过不少的意见。

蒋介石认为郑在和盟军打交道时还有一套办法，以后又指定他参加在重庆举行的中美联合参谋会议。当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驻华总司令的魏德迈，对郑的印象也相当好。

郑对军事问题一向爱提出他的分析和判断，虽然有时估计错误，但偶尔也能说中几件。他最爱向人夸耀的另一件事，是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被他猜中了。1944年夏，郑和魏德迈总部的一些美军将领们谈话，大家预测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许多美军将领们谈的都不着边际，只有郑指出6月初很有可能。当时大家也只是认为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并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隔了不久，盟军果然在6月6日那天从法国诺曼地登陆。消息传到重庆，许多听过郑那次谈话的美国军官立刻想起他事前说的日期完全正确，见到他的时候都称赞他是神机妙算，居然能这么准确地计算出盟军登陆的日期。这时他便大卖其野人头，瞎吹一顿。魏德迈听到这些话以后，还当面称赞过他。原来，他这次猜中的根据，主要是从整个战局来看，认为第二战场开辟不能再拖延，而且各项准备也已就绪，不会出今年。至于日期的确定，他是根据英伦海峡每年6月初天明前涨潮最大，在那几天登陆最适宜。他一面向人夸耀他学识渊博，一面也暗示他是消息灵通。

郑的这些预言虽然受到一些人的重视，使他沾沾自喜。但他的老婆却常常当着许多人的面揭他的底。每当他正津津有味地向人说这说那的时候，他老婆往往从旁插嘴叫别人不要信他乱吹。一次她说：“抗战开始，他认为香港最安全，把贵重物品和行李寄存在香港，可以保险，结果香港很快沦陷，东西全部丢光。”她越说越气，用手推他、捶他，要他把东西还来。他这时只是苦笑一下，还是继续向人讲下去。

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初，原来听说除由戴笠兼任该所主任外，还准备由他和美特头子梅乐斯一同为副主任。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他这个兼副主任的职务一直没有落实。

郑在中美所虽然没有兼任职务，但他却非常热心于中美所的种种活动，并常与梅乐斯往来。中美所的第一、第二次签订合同时，他都参加。他在重庆期间，所有中美所举行集会和盛大宴会时，他和戴笠都是以“主人”身份来殷勤招待美国特务。席间，他总是喜笑颜开，用些滑稽幽默的话来逗美特们开心。每当戴笠不在重庆时，有关中美所的问题都由他出面与梅乐斯商谈。许多美特都喜欢找他聊天，并当面称赞他是“一位很有风趣的人物”。

戴笠死后，梅乐斯从美国到南京吊唁，郑特意从北平赶到南京，一连和梅乐斯长谈了几次。他希望再度恢复美蒋特务合作，梅乐斯也表示在对付中国共产党方面愿意再尽一点力量。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直到全国解放，美国还没有把这一组织恢复，使他很失望。最后，美国才同意在保密局内成立一个“中美办公室”，继续进行支援军统的反动活动。

郑对美国“特使”马歇尔，恭维备至。马歇尔九上庐山，他几次参加迎送。有次马歇尔夫妇去找蒋介石，他跟在两乘大轿后面走了十来里路。那次他穿着整齐笔挺的军装，连外衣都为汗水湿透。他有支气管炎的老毛病，每到冬天发作得最厉害。所以路上被弄得上气不接下气，支气管炎大发，回到南京医了很久。他老婆埋怨他，他却认为这次当马歇尔的跟班，是有很大的



政治意义的。

郑介民在和马歇尔的往来中，虽然极力为这个伪装的“和平使者”到处吹捧，但后来他认为马歇尔帮助蒋介石还不够积极而在背地里有些埋怨。有次他在保密局对几个处长级的大特务发牢骚，说许多事没有能够按预定的计划弄好，使国民党吃了许多亏。

郑介民和司徒雷登虽然早就认识，但关系不深。1932年，郑在北平任特务处华北区区长的时候，用以掩护的职务是北平军分会的上校参谋。当时司徒雷登任燕京大学校长，交结的都是国民党的达官显贵，对这个上校参谋并不看在眼里。郑虽然很想巴结，也没有巴结得上。

司徒雷登这个“中国通”被日本人囚禁了几年，于1946年继赫尔利担任美驻华大使。这时，郑的地位也和过去不同得多。彼此都感到需要拉拢一下，但又不便直接去找对方。当郑向保密局办公室主任黄天迈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黄告诉他司徒雷登也早有意和郑谈谈。黄是燕大学生，曾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总领事，抗战期间投入军统当特务后，当过军统局第一处副处长、海外区区长，主管海外情报。抗战胜利后，黄天迈在平津专搞国际情报工作，主要是和美国驻平津人员进行联系。黄和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是燕大同学，两人私交甚好。当傅带黄去见这个老校长，谈到他在郑介民手下工作时，司徒雷登便在黄面前称赞郑是“国民党中有数的军事谋略家”。郑听到这样称赞他，更是急于希望能早日同这个被蒋介石尊为上宾的新大使见面。据黄天迈说，当他和傅泾波联系好以后，郑第一次去见司徒的时候，两人一谈就是几个钟头，越谈越有劲。

郑介民在北平时，司徒雷登每次来平津活动，郑都赶去迎接。司徒在南京过70岁生日时，郑没有来得及赶上，便叫人买一个漂亮的寿幛送去，并专电向其祝寿。

郑介民善于讨好帝国主义，也深为蒋介石所嘉奖，并且常常利用他这一长处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郑也以所谓“军事外交家”自居。他认为最得意的是1944年“开罗会议”前后的一些活动。

开会之前，蒋介石先派胡世泽、朱世明、李惟果和郑介民4人到开罗与美、英方面人员联系。郑介民奉命后立刻与戴笠商量，两人几乎谈了一个通宵。郑的任务除了先去商谈会前的种种准备事项外，最主要的还是为蒋介石布置警卫方面的工作。军统在那次会议之前，急急忙忙加派了一批特务去印度、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处，戴笠亲自力这些人饯行，发给他们大量经费。军统原来在这些地方虽有组织，但人数不多，没法担负这一新的临时重大任务。

郑去开罗后，不久便和李惟果先回重庆复命，郑一下飞机便立即向蒋介石报告了准备情况。李惟果去见蒋介石的时候，蒋马上说：“一切情况已由郑厅长报告过了。”李惟果只好退了回来。

蒋介石去开罗，所乘的专机航行的路线，连随同他一道去的许多人都不了解，只有戴笠和郑介民才在事前知道，这是由郑预先安排的。因为蒋介石怕日本飞机截去，故让其随从人员乘飞机去加尔各答，而他的专机则取道卡拉奇。

当晚，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卡拉奇过夜，郑介民更为忙碌，几乎通夜没睡，指挥着事先去那里的军统特务暗中严密保卫，因此第二天他在飞机上一直打瞌睡。

那次蒋介石带去的随员不多，但郑介民却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参加会议。

蒋住在金字塔旁的一家大旅馆中，也很少看到郑出入，实际上他每天都在为警卫忙得不能休息。会议刚一结束，郑又先到加尔各答布置。蒋介石在印度停留时，郑也在负责蒋的警卫工作。

1949年9月，司徒雷登由南京回美国后，曾打电报到广州邀郑介民去美国商谈问题。郑介民向人说：“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于南京被共军占领时没有离开，直到最后才回美国，前几天他来电邀我去美。我报告总裁（指蒋介石），已批准我去一趟。现在在赶办赴美手续中，一俟办妥后，即往香港搭机去美。”他在说话时表现出非常得意的神色，并没有因全国即将解放而感到沮丧。他当时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美国的帮助下。

广州解放前几天，郑介民才由香港转赴美国。以后听说他由美回台，蒋介石派他担任国防会议所属的国家安全局局长，以加强台湾的特务统治。他之出任这个职务，是与这次去美有重要关系的。

郑介民在与英美两国公务交往的过程中，美国人曾颁给他两枚勋章，英国人也给过一枚。他还有一枚法国勋章，这个勋章的来历不清楚，他平日在闲谈中也没有说过。

### “出任军调”处国民党代表

抗战胜利，国民党军政人员贪婪欲望大发作，都在准备“劫收”。郑介民也希望能够弄到一个接收大员来发横财，他老婆尤其希望他能负责一个肥美的接收任务。不料蒋介石却派他兼任蒋梦麟所主持的“赔偿委员会”委员，这使他大为泄气。

当他正在闷闷不乐，害怕蒋介石忘记了他的时候，一个出乎他意料的新的任务落到了他的身上。蒋介石决定派他担任军调处执行部北平办事处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叫他利用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机会，去对解放地区进行特务活动。这个平日反共最积极的特务头子，对中共情况比较了解，感到这一任务非常棘手，不容易完成。他急忙找戴笠商量，一连谈了两三天。戴向军统局各单位负责的大特务宣布，一定要尽全力协助郑去完成任务，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电台、武器、交通工具等都要尽先尽量供给，不准有任何借口拖延。戴认为蒋介石挑选郑去担任这个任务，不仅仅是对郑的信任，也是对军统的信任，因此无论如何要抓住机会，把多年来对解放地区布置工作屡遭失败的情况扭转过来。戴一面赞扬蒋介石这一决定的英明，一面破口大骂有人提出反对用这样一个公开的特务头子出任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说这些提不同意见的人没有头脑，没有常识，不了解抗日胜利后国内唯一的敌人是共产党。

在戴笠所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郑介民的心情表现得很深重，不像往日那样一团高兴指手划脚。他只简单地说了一些任务很重大，关系到党国前途，他个人力量有限，要大家一齐竭力帮助他，相信有蒋介石的“英明领导”和戴笠的随时指示，他有信心和决心把这一工作做好。他一破以往惯例，没有大谈他的分析看法。大家也了解，因为有戴笠在座，怕他不耐烦听，谁也没有向他提出什么问题。

过了两三天，郑又去军统找毛人凤，几个处长级的特务一下把他包围起来，问长问短，他才谈了一会儿。他认为最大最难的任务是他如何在短期内恢复交通。他说，这些被共产党占据了的几条铁路是国民党的动脉，要想拿

过来是有困难的。因为多年来国民党、共产党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不容易使得对方相信自己的“诚意”，单靠运用政治手腕办交涉，开谈判席，不用强大的军队作后盾，不会轻易得到圆满结果。他认为靠几十架飞机运送部队，只等于撒撒胡椒面一样，起不了多大作用，一定要把铁路交通恢复。

当有人问到他苏联会不会公开阻拦国民党接收东北和帮助共产党的时候，这个以“了解苏联情况最多的专家”自居的郑介民，便打开话匣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他认为苏联不会公开阻拦而只是暗中加强援助中共，并举出了许多理由证实他的看法。

对于向解放地区搜集情报，他认为机会很好，平日不能进入的地区现在可以公开进入。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过去你们老是说这方面的情况太少，将来你们连看都看不过来的时候可不要怪我！”

临走的时候，他很严肃地向这些大特务提出警告，叫大家千万不能麻痹大意，把问题看得太简单，把一切寄托在双方谈判上，而一定要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加强对中共的工作。他认为“和谈”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他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一定是站在国民党一边，美方指派的代表饶伯逊（以后改为吉伦）和他关系很好。他说：“三个人开起会来，要表决问题时，总是可以做到两票对一票的。”

他去北平之前，在军统局和军令部第二厅的特务中挑选了胡屏翰、邹陆夫、温天和、黄维勤、黄长新、潘志民、涂叙五、肖凤岐、郭子祺、董承烈、黄介新等一百多人担任各地调处小组的工作，把军统中共科长郭子明调去当顾问。

当报上颂他出任国民党代表的消息后，许多报纸的新闻记者便去访问他。他在重庆和北平接见记者时，总是说：“我们不再算旧帐了。算也算不清楚，过去谈了八九年，再谈下去，我们都已经老了。”他一开始就想把过去谈判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在中共方面，好像国民党很有诚意。可是还没有开始谈判前，他和戴笠就暗中在积极进行向解放区布置特务活动了。

1946年3月17日戴笠摔死后，蒋介石于20日决定派郑介民继戴笠任军统局局长。毛人凤急电郑介民，要他立即回重庆。郑原定22日由北平起程，可是到了22日上午毛又接到他的电报，因军调部方面有紧急工作分不开身，所以24日中午才能动身。

24日下午，毛人凤带着几个处长去机场迎接他。飞机迟了两个多钟头才到达，特务们和他的老婆都非常着急，不断地要航空检查所的特务去航空公司问情况，虽然知道没有事，但都不放心。因为那一天天气不好，飞机顶风飞行，所以迟误了两个多钟头。郑走下飞机便向欢迎的人打趣说：“今天天气很恶劣，我还担心戴先生找我去吃晚饭呢！”

当晚郑介民去见了蒋介石，第二天上午便到军统召集各单位负责特务们开会。毛人凤首先宣布蒋介石已指定由郑继戴笠代替局长职务，希望大家在郑的领导下继承戴的遗志把军统工作做好。接着，毛请郑训后。郑那次说得很简单，只说，他目前的工作非常重要，因此不能亲自主持军统工作，仍旧由毛人凤领导，除重大问题和研究外，一般问题仍照过去一样办。他还说，他过去对军统情况很少过问，许多事还不大接头。

当有人问他军调部工作情况时，他回答也很简单，只说问题很难办，对手不容易对付。他说，人家（指中共）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不像国民党那么粗糙，有些地方值得学习。

下午他找毛人凤谈了几个小时。以后据毛向人说，郑主要是想了解军统的经费和人事方面的情况。因为他过去怕为这些和戴发生摩擦，一向少过问，现在要他负责，不能不了解一下。他听到军统经费月月入不敷出，总是寅吃卯粮，负债很多，过去完全靠戴笠到处张罗，移东补西，人数超过编制几倍，大为吃惊，当时便表示一定要实行紧缩和裁汰人员，并认为这个摊子过去摆得太大，以后谁也没有这样的魄力来维持，工作比过去繁重而困难，只有汰弱留强一项办法。

郑口头上虽然宣布他在北平工作期间，军统工作仍由毛人凤主持，但他早已心中有数，戴笠多年来一意培植毛人凤，并且已经大权独揽。过去他可以不过问，但现在蒋介石把这个担子交给了他，他怕出乱子，所以在他离开重庆之前去见蒋介石。他向蒋提出，请唐纵来代理他主持军统工作。他刚一走，蒋介石派唐代理郑的命令也随之到达。毛人凤看到这一情况，知道郑一定在蒋面前说了什么话，使蒋不放心，才叫唐来代理。唐也看出郑的用意，要他出面作难人，就干脆来个代而不理，一切还是由毛人凤主持。从这时起，郑、毛之间便种下了不和的根子。

郑在重庆只停留4天便又去北平。这时，沈醉恰由南京收拾戴笠等尸体后回到重庆，便去郑家向他报告戴死的情况。当郑听到戴死后在南京附近江宁县山上暴尸3日被大雨冲洗的情况，不免有点兔死狐悲之感，非常生气地说：“真太丢人！我们的组织不但遍及全国，还分布全球，可是一个领导人死在南京附近3天才发现，怎么说得过去！这让别人知道了真是闹大笑话！”郑的老婆在旁边插嘴向沈醉要戴笠在上海、南京、汉口准备的房子、汽车等东西。郑既不制止，也不表示同意，只装作没有听到一样。直等他老婆要这要那要完之后，才继续指示沈醉赶紧清理各地接收的产业，免得各地特务趁戴笠一死便鲸吞接收的财物。

郑回北平不久，国民党的报纸于3月底前后刊出新闻，说戴笠死后由郑介民继任军统局局长，唐纵、毛人凤任副局长。郑看到这一消息非常生气，4月初便在北平向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公开否认这一事实，说他没有继任军统局局长。5月初，沈醉和军统局督察室主任廖华平到北平清查军统接收的财物时，郑见到沈醉还余怒未息，说重庆方面有人在胡闹，为什么要公布他当局长的消息，这对他的工作将增加多少困难。沈醉了解到这消息是中央社记者从军委会办公厅方面得到的，便向他解释一番。郑虽已接到毛人凤的复电，但还是那么生气，这在他平日是极少有过的表现。那天郑和沈醉一同吃饭时还在说：“如果政府派一个军统局局长来和共产党搞和谈，这会给人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好像在这消息公布之前，共产党方面并不知道他是一个军统特务头子。

郑在和谈中要尽各种手法，却自认为很聪明，他除了在国民党报纸上连篇累牍发表诬蔑诽谤中共的一些材料外，还指使特务捣毁军调处中共办公室。

1946年2月21日，有所谓“冀省难民还乡请愿团”这样一个组织，去设在协和医院的军调处执行部请愿。这个“请愿团”是以河北解放区逃出来的地主恶霸为基础，通过郑指使军统北平站以及北平市警察局刑警大队去进行组织和鼓动起来的，并且派有大批特务、帮会流氓分子混在其中，有计划地去进行捣乱。特务们对这些逃亡的地主恶霸进行煽动，说中共不肯把军队撤出那些地方（解放区），所以弄得大家无家可归，应当去找中共算帐。这

些逃亡到北平的地主恶霸们看到有特务支持他们，便集合起来，涌到军调部大门口，乱喊乱叫，指名要中共负责人出来答话。坐中共办公室干部向他们说明情况时，特务们便领着大喊“共军立即撤出河北”、“打倒共产党”等口号，不让中共人员说下去，并且在特务们指使下，不由分说一齐冲入中共办公室乱打一阵。特务们想趁机抢劫中共文件，结果只拿到一些不重要的东西。在场的宪兵和警察，因事先得到特务们的通知，都袖手旁观，任暴徒们把中共办公室门窗玻璃、办公室等捣坏之后才把他们劝走。

当天，军调部三方面负责人向北平市长熊斌提出严重抗议，要他查办凶手，并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暴行发生。熊斌对此大发牢骚，明明是特务们干的，郑介民这个特务头子不管，他这个市长从什么地方去查办这些凶手？当时连美国方面也觉得这种做法太拙劣，很不满意。他们明知此事与郑介民有关，背地里曾关照过郑以后不要采用这种办法。郑在美国主子面前矢口否认与他有关，硬说这是老百姓自己发动的。

5月间的一天，沈醉和廖华平在郑介民家吃晚饭，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组长罗日明去见郑，郑邀罗一同吃饭。在吃饭之间，郑突然问罗：“还没有找到一个？”罗答，“还没有找到。”他俩说完这两句话后便没有再谈别的。

第二天，沈醉见到罗，才知道郑曾叫罗派特务跟踪住在北京饭店的工作人员，看他们晚上有没有人到八大胡同等妓院或在其他旅馆开房间。罗是负责旅馆与妓院检查工作的，郑叫他如发现有中共人员到这些地方去便抓起来，让中共方面向他耍人的时候再送回去，好让中共丢脸。7、8月间，沈醉又一次来到北平，听说仍然没有在这些地方发现一个中共人员，使郑很感失望。当时他非常希望找出中共在北平人员的毛病，采取了种种监视的办法，却一直没有找到一点。

军统在北平站有一个特别小组，是专门监视跟踪在北平的中共人员的，站长经常要向郑汇报情况。郑对这些很注意，这个小组直到军调部结束后才停止活动。

郑在军调部工作期间，和美国沆瀣一气对中共进行许多阴谋活动，他每次回到南京，在保密局向一些大特务谈到恢复交通的问题，总说这问题使他大伤脑筋。蒋介石对此也经常催促他和责备他。

郑介民认为中共在“大问题”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情况不适合共产主义。可是他对中共人员的工作精神和作风这些“小问题”，却认为值得学习。他认为中共人员普遍的特点是生活朴素，勤俭刻苦，工作认真忠实，组织纪律性很强，待人态度平和。他最感到头痛的是国民党许多人做事马虎，不负责，反映的情况不真实。这使他在向中共办交涉时，往往由于没把问题弄清楚，而大碰钉子下不了台。而中共提出的反驳，每点都是有根有据。他常说，幸好他有一套对付办法（即强词夺理和耍无赖的办法），总算可以勉强应付一下场面。

他埋怨特务们不争气，不好好工作，生活腐化，连他最得力的重要助手，他的参谋长也包括在内。郑把许多事情的失败都归咎到别人的身上，好像只有他最能干最有办法。他做梦也希望从北平坐火车回南京，可是始终没能实现。

军调部工作结束，郑发表一篇和中共商谈经过的谈话，极尽造谣诬蔑和颠倒黑白之能事，把全部责任推到中共“缺乏诚意”上面，用以混淆视听。

当时，保密局许多外勤单位从各方面搜集到许多情报，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有许多责难的地方，毛人凤都送与他看。他除了将一部分送给蒋介石去看外，其余大多作为档案保留下来，不敢把各方面对国民党不满的情况全部让蒋介石知道。

## 反共又畏共

1946年10月1日，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蒋介石派郑为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正式编制发下以后，组织、人事、经费等都比军统局时期大为缩减，不到以前的三分之一。军委会结束，改组为国防部，各厅局部在7月间先后成立，郑介民的第二厅厅长也在那时公布，而保密局却拖了3个多月才决定下来。郑介民对这个改头换面的新成立的特务机构，是极力主张紧缩的。他对戴笠那种不受编制和经费约束乱来的作风一向反对，戴在世时他管不了，戴死后要他来顶这个破摊子，他感到无法维持，不能不管。

郑从北平回到重庆，在军统局准备迁往南京之前，曾召集军统各部门负责人开会。他在会上强调今后军统工作是和共产党作斗争，必须有精明强干的人才能担负起这项重大任务，所以宁可少些但要精干一些，目标不宜太大。他在会上还提到朱德总司令早有电报要蒋介石撤销一切特务机关，为了不增加蒋介石的困难，应主动提出“汰弱留强”和“紧缩开支”的办法，并且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当时以毛人凤为首的军统各单位负责人，都希望能保持原来的庞大机构和众多人员，所以他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这些意见。

郑介民在北平期间，他的国民党二厅厅长的职务先后由侯腾和龚愚代理，保密局局长则由毛人凤代理。1946年6月以后，他经常回到南京，照例只召集两个单位的负责人开开会，简单讲讲他在军调部工作的情况。他一贯诬蔑中共，企图掩饰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他多次举出国民党的一个组员在宴城被流弹击毙的事，作为中共不守信用枪杀军调部调处小组国民党人员的例子，对中共进行诽谤。

当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的部署已经完成时，军调部工作停顿下来，郑把参谋长蔡文治留在北平，自己坐着飞机回南京。蒋介石交给他“恢复铁路交通”的任务没有完成，受到蒋介石的严厉责备之后，他对中共更加仇恨。1947年，郑主持保密局对各地中共地下党的迫害，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几乎把大部分精力用在这方面，以发泄他对中共的愤恨和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这年9月初，保密局北平站发现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和电台的线索，郑介民和毛人凤研究之后，立即派保密局行动处（主管侦防、行动、策反、心战等）处长叶翔之赶到北平，主持破坏工作。叶翔之到了北平后，报告案情重大涉及保定绥靖公署许多高级人员，郑便立刻亲自飞到北平指挥工作。

由于这一案件的发展，以后又在西安、兰州等处破坏了电台，逮捕了十多位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还在东北也破坏了一处地下党组织。

郑对这次破坏极感兴奋，除随时向蒋介石报告外，并连续在保密局召集大特务们开会研究，认为这是最得意的大事。他强调今后为了配合前方军事进攻，对后方活动的中共党组织必须用全力来进行破坏，以安定后方秩序。他最感兴趣的是搜查出来的中共地下党电台。他在没有看到以前，曾断定这些地下电台一定是苏联供给中共专作秘密活动的新型电台，很不容易侦测出

来。当特务们把搜获的文件和电台送到南京后，他急于要看一看，结果使他大出意外，这些电台不但不是苏联制造的什么新型秘密电台，而且做得很粗糙。他看了以后，先是用讽刺的口吻说：“这些东西我们早就扔到垃圾箱里去了，他们还当作宝贝在使用。”等他翻过一些档案材料之后，他又改口说：“用这样的电台能做出这么多的工作，真不简单，这是人家比我们强的地方。”

同年 11 月间，军统在上海破坏中共的一个补给机构，也是郑亲自赶去指挥的。

这一事件的经过大致上是这样：军统派在第一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的特务们，在苏北射阳口检查来往船只时，发现一只可疑的木船，装了一些禁止运往苏北解放区的物资。特务们将全船人员扣留，在细密搜查和酷刑逼供下，知道这是与中共地下补给单位有关系，除继续搜寻线索外，并向保密局报告。毛人凤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郑介民，郑便亲拟电稿，指示该处处长蒋剑民务必追出有关人员，扩大破坏。蒋剑民对被捕人员多方威逼利诱之后，有一人动摇叛变，供出了上级领导机关设在上海，但不知详细地点，只了解接头办法。郑得报后，即嘱蒋将该叛徒带往上海。他自己也连夜赶去，召集在上海的大特务——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保密局上海站长刘芳雄，以及在上海市警察局工作的张师等密商选派精干特务，会同蒋剑民在上海搜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第二天，蒋剑民带着那个叛徒和几个特务来到上海，郑立即接见了，并叫他和陶一珊等密切配合。在郑亲自领导下，先将中共设在上海的后勤补给总站破坏，总站长冯伯昌、柳明等 20 余人被捕，抄出大批文件和存在仓库中的布匹 1000 多匹，颜料几十桶以及许多其他物资，并在吴淞口外查出一艘小火轮和物资。

当陶一珊、蒋剑民等兴高采烈地认为收获不少的时候，郑却认为这不够，必须“趁热打铁”继续猛打穷追。结果又在上海××路破坏了中共华中局、苏皖边区政府、华中银行等单位设在上海的联合办事处，又搜捕了十多人。

郑介民的作风与戴笠有些不同，他从来不亲自主持审讯被捕的中共人员，更不像戴笠那样爱亲自指使特务对被捕中共人员使用种种酷刑。他总是叫特务们去干这些，自己偶尔在审讯时走去听听。去之前，先叫人关照主审的特务不要看到他去时起立。他去时也只站在旁边听一听，不像戴笠或是抢着插话来问，或则把主持审讯的特务赶下去，自己坐下来审。郑不爱露面，对叛徒不愿马上接见，怕遭到突然袭击。他除在背后指示特务如何去做之外，最有兴趣的是研究搜得的各种材料，他能一气看上几小时都不放手，并能从这些材料中发现新的线索，继续扩大破坏。那次从上海破坏的中共地下后勤补给机构取得的许多材料中，他便找出了一些与上海中共补给总站有关的线索，先后在青岛、宁波、定海、烟台等处陆续破坏下一些中共地下后勤机构。他在保密局一次会议上特别谈过，如何从搜获到的材料中发现线索的问题，叫大家对片纸只字都不要轻易放过。

郑任保密局长期间，只是每天上午去一两小时。他的办公桌抽斗内，满装着从各地收集来的中共发行的书刊文件。他批阅的公文很少，除了重大问题如破坏中共组织，逮捕了中共人员等文电由他批阅外，其他一般性问题都由毛人凤决定。他看完几个卷宗后，总是从抽斗中找出一些书刊文件略加翻阅，选择几本带回去细细地看。当时保密局的电讯总台，有两部专门收听中共广播的电台，每天把收到的电讯抄下两份，一份送给他，一份由毛人凤看

后批交情报处（保密局第一处）存查。他对这些电讯看得很仔细，看后便带走。

郑在反共活动中，总是绞尽脑汁，全力以赴。他不断研究中共文件，除了进行诬蔑宣传外，还从中共政策中钻空子进行特务活动。他利用“宗教信仰自由”指使军统特务中一些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到解放地区进行特务活动。山西天主教徒李广和（解放前任天津稽查处长）在山西教区关系很多，他便叫李在教徒中进行布置。还有比利时神甫雷震远，郑一直利用他披着宗教外衣在华北进行特务活动。

另外，他还利用中共少数民族政策，先后多次命令外勤省站尽力在少数民族中去发展组织。他常说：“将来有些地区汉人立不了足，这些少数民族中的同志（指参加军统的特务）是大有办法的。”

解放前，毛人凤亲自在上海、重庆、昆明等地拉拢过资本家，希望他们协助保密局工作，而以保障他们在国外的利益为交换条件。据毛人凤谈，这也是郑介民研究中共政策想出来的好办法。当时不少人以为共产党来了，资本家会被清算，郑介民却说这些人不会有问题，认为这些人如不走而能拉上关系的则应尽量去拉。

郑介民任局长时期，许多特务都认为对解放地区布置工作太困难，他总是说大家不肯动脑筋去研究中共的文件，所以总是弄得束手无策。他从中共文件中找出不少钻空子的办法。他常说：“共产党不能不要老百姓。只要他们要，我们就有办法。他们要的是哪一种人，我们就在哪一种人当中去布置。”以后毛人凤继任局长时，就专门在医生、护士、教师、店员、小商贩等人中布置潜伏特务，一反过去吸收特务专找社会关系复杂、爱活动的以及地方恶霸豪绅和流氓头子等的办法。这也是郑介民任局长时所决定的。

郑一生反共最积极，同时又最害怕共产党。解放前，他总是鼓励别人反共，而自己却害怕得要命。他在公开场合中，照例夸夸其谈，说什么共产党军事上胜利是偶然的，如果国民党能纠正错误，真正听从蒋介石的指挥，一定能转败为胜。同时，他还认为美国一定不会让国民党垮台，必然会全力支持。他在背地里对自己的亲信表现出悲观恐惧的心理。

1948年，郑介民的胞弟郑挺锋任94军军长，驻在北平，归傅作义指挥，担任防守北平的任务。辽沈战役刚一结束，蒋介石在东北的精锐部队全部被歼灭后，郑介民急忙从南京赶到北平，亲自向傅作义请求，准郑挺锋离职南返。傅碍于情面，只好准郑在短期内军长职务交副军长朱敬民代理。

郑介民将郑挺锋带回南京后，不让其再回北平。他认为只要东北解放军一进关，再留在华北的话，不被打死，也会当俘虏。他对华北能否守得住，完全没有信心。以后他帮郑挺锋弄到海南岛去当21兵团副总司令，海南岛还没有解放，又将其弟叫到台湾，生怕这个老弟被解放军活捉去。

淮海战役刚开始时，郑的老婆就在收拾行李准备逃往台湾。郑自己却逢人便说：“共产党不能打主动战。这次徐州决战，是我们转败为胜的起点，乘胜收复华北和东北在此一举。”当时南京的许多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也都是这样指望。其实郑心中有数，不等到淮海战役结束，他在南京的动产已全部转移，剩下的只是搬不动的房子和家具了。

郑介民自认为对当时国际形势有相当了解，曾多次预测美国必定要趁苏联在二次大战后损失惨重、元气未复之前对苏作战。他们这种论断很适合蒋介石的胃口，蒋曾叫他到中央训练团、中央军官学校等许多训练机关去讲这



一套，以安定人心。

他认为美国对苏发动战争，美必能将苏击败，那时国民党才有希望将中国共产党消灭掉。他对中共不像陈诚那样狂妄，说什么“三个月消灭共产党”，而是经常提心吊胆。他在对一些亲近的人谈话时，多次显示出他内心对与共产党作战的恐惧。他常说：“最好是发生三次世界大战，单靠我们反共，困难还很多，打下去很难有必胜的把握。”

## 出任国防部次长

1947年1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蒋介石找郑介民去谈了很久。第二天，郑的老婆便兴高采烈地向人谈出郑又要升官了。那几天郑到保密局去办公时，也是喜形于色。12月5日，蒋介石果然明令发表郑介民为国防部次长。当时国防部有三个次长：秦德纯主管一般业务，刘士毅主管国防人员，郑介民继黄镇球主管国防物资。黄镇球随宋子文去广东后，这一职务便空下来。蒋介石为了尽力争取美国的军火物资，考虑到由郑担任这一职务最为适宜，先几天便找郑去征求他的意见，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当命令公布后，保密局和二厅一些处长级的人员都到他家去向他道贺，许多新闻记者拥到他家去请他发表谈话并向他索取照片。一时贺客盈门，他感到太麻烦，当天晚上便跑到上海去休息，过了两天才正式去国防部上任。

过了一个多星期，郑到保密局去办公，神情便不像前几天那么高兴。有人问他新的官职情况时，他连连摇头说：“不好办，不好办。”以后他慢慢谈出了一些情况，说现在全面战争展开，最困难的是弹药补给不上，特别是一些全部美械装备的部队，在和解放军作战时弹药消耗很多，库存一天少于一天，美国答应补充的东西迟迟不来，自己又不能制造，再打下去会变成有枪无弹，那就要靠刺刀和手榴弹来打仗了。

当时保密局所掌握的交通警察总局，曾把过去军统的特务武装和汉奸部队编成了20来个交通警察总队，这些部队的装备都是由中美所美方供给的。郑一向主张把这些部队都用到反共的内战场上，以便更加取得蒋介石的信任，毛人凤却希望能保留一点控制在手中。郑对装备这些部队的械弹，原来也是准备把库存的全部拨给交警总局，毛人凤却留下不少。郑自当了次长之后，知道美制弹药缺乏，便同意毛人凤的意见，除已拨给交警总局的外，库存的应当好好控制起来，并叫总务处把重庆、贵阳、南京三个军械库所存的美制弹药数量表抄一份给他。郑看到三处库存的弹药数量还很多，曾表示将来在必要时使用在刀刃上，俾可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对这些交警总队，一向看成是反共的一支强大力量，称之为“袖珍挺进队”。因这支特务部队都是美式装备的新型轻武器，又大都经过美国的训练，行动轻便，带部队的军官多半是军统特务分子，蒋介石对这支部队也是很重视的。在解放战争中，这支部队虽很顽强，却同样是不堪一击，除少数逃往台湾外，其余全部被解放军所歼灭。

郑当上了国防部次长以后，工作比过去更忙，对所兼的二厅厅长与保密局局长两个职务都不能很好地照顾到，而这两个单位的工作又都是异常重要。蒋介石希望也把精力多放些到争取美援与部队的补给方面，曾授意他把二厅厅长职务辞去。他最初还有点恋栈，以后蒋当面问他，什么人继任厅长为宜？郑原来打算保荐他的亲信张炎元升为厅长，蒋对这个出身于戴笠“十

人团”的老特务表示同意。但郑没有及时签报，主要原因是宋子文出任广东主席后，把张炎元从二厅副厅长调去任广东省保密司令。他怕得罪宋子文，不敢保荐张，而在军统中虽然还有人可以担任这一职务，却不是郑的亲信，便不愿保举，因而拖延了一个时期。

当时二厅副厅长侯腾，早就有野心想当厅长。侯原来就当过二厅副厅长，后任驻美大使馆武官。侯重任副厅长后，郑在北平军调部工作时，便由侯代理厅长很久。侯早作了种种安排，郑升次长后，便大肆活动，一面走参谋次长林蔚的门路，一面由他老婆找郑的老婆去活动，最后由林蔚出面找郑会同签呈保侯，郑怕得罪林而同意。蒋介石看到林郑两人合签也就批准了。侯当了厅长后，便独树一帜，不但不接受保密局的领导，也不再听郑的指挥。历来由军统掌握的这个庞大的公开特务单位就这样脱离了保密局的控制。当时毛人凤和许多军统特务都大骂郑优柔寡断，私心太重，结果把这个单位白白送掉了。

郑介民任国防部次长后，对保密局长这个兼职并不打算放弃，因而和毛人凤一直闹摩擦。毛是以继承戴笠的“家业”来笼络军统分子的，在保密局的实力远远超过郑派。郑、毛两人拉拢特务各有一套手法。毛极力主张将军统的规模恢复到戴笠领导时期那样，这对当时在保密局工作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特务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和长期从事特务工作又没有学历与资历的骨干分子来说，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郑主张向外扩张，尽力鼓励学校毕业和有资历的特务向公开方面去发展和兼任公职。在他的支持下，不少军统特务在1947年竞选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各地竞选结果，特务当上国大代表的竟有30多人，有：吉章简、马志超、马汉三、楼兆元、郑修元、柯建安、张家铨、李广和、王抚洲、刘艺舟、王孔安、涂寿眉、罗毅、蒋志云、罗国熙、龚少侠、吴敬群、王兆槐、汪祖华、陈旭东、陈世贤、简朴等。

军统特务王新衡在上海市竞选立法委员时，郑介民亲自去上海为他活动。王新衡是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在军统中任处长多年，当时是上海市政府的调查处处长兼顾问。王新衡竞选时，公开支持他的都是几个军统控制的外围团体，如上海地方协会、上海市社会安全促进会、青白体育会等一些微不足道的社团。这与当时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所推荐的上海地方士绅外交界元老之一的颜惠庆相比，无论在资历上还是在社会关系上都差得很远，但由于郑介民指使在上海的特务都要支持王，结果王所得的选票竟超过颜惠庆而成为第一名当选人，颜虽得吴国桢等全力支持，反而只当选为第三名。

郑介民在保密局中所拉拢的只是少数大特务，在他领导的“广东派”中，一些留在保密局工作的人资历都很浅。他把原来在军统局任过中共科科长的张纪勋调升为办公室主任，等于主任秘书，在局里本来应领导内部各处处长。但属于毛人凤领导的“浙江派”骨干中的第一处处长何芝园和第二处处长叶翔之，都是张纪勋过去任科长时的处长或副处长，自然不肯听张的话。加上毛人凤从中指使，处处故意与张为难，弄得张无法工作。最后郑不得不将张外调，而以其另一亲信黄天迈接任张的职务。

郑、毛两派在保密局内的斗争越来越发展，等到郑当了次长丢掉所兼的二厅厅长后，毛便集中全力来夺取局长。毛人凤除了在保密局所布置的力量足以打垮郑而有余外，更得到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俞济时的全力支持，双方都尽力找对方的缺点向蒋介石检举。蒋介石为了要特务为他拼命卖力，也希望郑介民专心搞国防部的工作。加上毛派不断通过俞济时向蒋告郑的状，甚至

连郑的老婆服用的珍珠粉向保密局报销的事都给蒋介石知道了。蒋曾当面问郑：“你老婆为什么要吃珍珠粉？”弄得郑狼狈不堪，无辞对答。但蒋对他还是异常爱护，除轻描淡写地责备他几句外，一直没有深究。最后实在过不下去，蒋才叫他辞去保密局长兼职，于1948年初改由毛人凤继任局长。

郑介民虽然只剩下一个光杆次长，实际上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并没有减低。郑自己也觉得以后可以向其他方面去求新的发展。

他听说宋子文不想当广东省主席了，便托人活动，由他继任。蒋介石找他去安慰一顿，叫他安心工作，把向美帝乞求军援的工作搞好，这比做什么都重要。

全国解放前，他建议蒋介石成立一个美式机械化兵团来和解放军打阵地战。他曾向人吹嘘，说这是唯一取胜之法。因为解放军已改变了过去的战略，敢于和国民党打硬仗。如果集中几个机械化装备的军去进攻解放军的主力，可以换回过去失败的局势。虽然他大吹大擂，蒋介石心中明白，一是时间来不及，二是再没有那种力量了。郑想当机械化兵团总司令的梦也没有做成。

### 做事圆滑敛财有方

郑介民被人称为“老成持重”，实际上在旧社会里这句话几乎和“老奸巨猾”相等。他一向怕负责，什么事都是含含糊糊，不作肯定答复。朋友托他帮忙，部下向他请示，他总是用模棱两可的语句来回答，对重大问题生怕负一点责。他怕得罪当朝权贵，处处总是尽力忍让，很少看到他和别人强硬过一下。他在和毛人凤争权夺利的斗争中，也总是暗中指使他的亲信去对付毛派，他自己见到毛时总是笑容满面，从不露不愉之色。

戴笠在世时，郑这一套还没被人戳穿。戴死以后，许多问题要他决定，他的滑头手段便很快为人看透。

在军统缩编裁员问题上，郑一直不敢说一句话。当时这个特务集团，不但为全国人民所厌恶，连国民党内部也有人对它不满，所以戴笠一死，各方面群起而攻之。郑曾几次从北平回到重庆主持军统局局务会议。参加会议的大特务都希望他向各方面去疏通一下。他怕别人把攻击目标转到他身上，因而对这问题一直不作正面回答，只说些什么“过去对敌不够狠，对内不够和，所以弄成这种情况”。他提出，今后对付共产党，不在乎人多，而是要精干一些的。实际上，他是同意裁员缩编的。毛人凤曾说过，如果不是蒋介石一意袒护军统，尽力保留这个组织，连以后保密局这样的局面都不可能存在。毛说，郑只是作了现成的局长，没有出过一点力。

当军委会改为国防部时，决定设立一个军法局。如果戴笠在世，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抢夺这个机构。毛人凤向郑建议，要把这一机构掌握过来，今后对军统工作有很大方便，但他没有作表示。大特务徐业道亲自去找郑，请他向蒋介石保荐他去当这个局长。郑也只答应先去打听一下，却不表示是否愿意保荐。徐见他没有诚意，便去找俞济时。蒋介石看到徐业道是个老军统特务，立刻批准他任军法局局长，以后徐对郑便很不满意，背地里常说他是个“老滑头”。

戴笠在抗战时期便大搞帮会活动，利用遍及全国深入民间的帮会组织来搞特务工作，胜利后又用“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这样一个名义来统一全国的帮会。这个会的理监事都是帮会中的大头目。有：杜月笙、杨虎、杨庆山、

向海潜、范绍增、张子廉、田德胜、张钊、徐为彬等。监事有：黄金荣、张树声、潘子欣、李福林、王慕沂等。戴笠死后，由军统老特务徐为彬担任书记长，主持会务，总会设在上海，组织很庞大，当时成为保密局的一个有力的外围组织。1947年各地竞选国大代表前夕，CC派对这个组织大为不满，怕军统利用来和他们争夺选票，便由社会部出面取缔，不许它在各地进行活动。毛人凤和徐为彬都去找过郑介民，要他向蒋介石报告，请求保留该会。郑不但不去找蒋，反而讨好陈立夫，竟决定将该会取消。

大汉奸周佛海不仅在抗日时期替军统做工作，在沦陷区打击共产党和新四军，胜利后又替军统布置接收，勾结日军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为军统出过不少的力。胜利后，戴笠把周佛海和丁默邨、罗君强、杨惺华等都送到重庆保护起来，不受法律制裁。当时各方面对此均表不满，舆论哗然，戴都置之不理。郑接任后，便不愿再替周等背过，而把周等从重庆送回南京交由法院审办。原来由蒋介石派到南京去和敌伪联系的唐××，了解周佛海过去对国民党有过不少“贡献”，便找郑为周说话。郑推说：“要由领袖（蒋介石）来决定，我不能管。”当时保密局也有些特务向郑指出，如果把周枪决了，以后谁肯再卖力？他回答很简单：“那是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1947年2月，上海发生轰动全国的“黄金风潮案”，由于监察院已派4名监委前往彻查，蒋介石也特派郑介民去参加调查工作。这一案件的经过，郑早已得到上海站的报告，主要是宋子文的亲信贝祖贻勾结上海金业分会理事长詹连生长期舞弊贪污而引起的。他很清楚，该一定要牵涉到宋子文。他怕得罪宋，所以很不想去，但上海站把全部情况向他仔细报告之后，他又去见过杜月笙，便立刻溜回南京向蒋面报本案内幕，并建议不宜扩大，应早日结案，以免过多牵连。蒋同意他的意见后，他再度去上海，当面向军统在上海的几个大特务王新衡、刘芳雄、陶一珊等说明蒋介石对此案的态度。此案牵涉的人很多，调查到的就有40多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信大纱号老板孙于信，竟在特务包庇下逃往香港。郑自始至终都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结果只将贝祖贻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将中行业务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安仁和詹连生3人交上海地方法院判处徒刑。这件轰动一时的大贪污舞弊案就此了结，郑既没有得罪人，暗中又得了不少的好处。

郑介民贪污敛财的手段是相当“高明”的。他自己一向假装“清廉”，他的部下谁也不敢直接向他去行贿送礼。实际上，他是一个贪污能人，自己却不经手，而由他老婆柯淑芬出面。他装出一副怕老婆怕到极点的样子，想使人相信他是没法奈何她；万一事情发作，他又可假装完全不知而不负责任。所以别人当面说他怕老婆，他总是笑容满面地承认，有时还故作解嘲地说：“怕老婆有好处，可以省麻烦。”

他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大耍手段，但明眼人还是很清楚。他每天回家，看到家里的东西一天天多起来，房子新造起来，他会不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

抗日战争期间，他老婆经常托二厅派到国外去的一些武官、副武官代买东西，买来了照例是不给钱，变相叫人送礼。当时国民党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陈质平（军统特务），是专门替戴笠采购日用奢侈品的。郑的老婆也经常要陈买这样那样，买回后照例由军统局付款。她把这些从国外买来的东西，留下自己所喜欢的以后，其余的则送到她住的重庆临江路川盐一里附近一所拍卖行去寄售，这个拍卖行存列的外国货很多是她送去的。

当时那些被她敲竹杠的部下，总希望让郑知道自己送了礼，常有人亲自

带着东西到他家里去。郑每见人挟着礼物去看他，总是借故避开，等他老婆来收礼。像这些小搞一下，郑的确没有经手过，完全由他老婆出面。戴笠死后，他没有什么顾虑了，便大搞起来，许多事他也不再假装正经，而是亲自动手。

1946年5月，军统督察室主任廖华平和沈醉以军统财产清查委员会正副主任身份到北平清查北平办事处长马汉三所接收的敌伪物资，马交出一大堆清册。廖向其索取原始清单核对，马初说正在整理，隔一天又说遗失了。廖坚持非要不可，两人争吵起来。马最后有恃无恐地说：“我已送给郑先生，你向他去要。”廖华平和沈醉当晚便去见郑，问他收到马送给他的原始清单没有？事情发展到这样情况，郑不得不吞吞吐吐地说：“我见过这些东西，基本上没有出入，交多少你们就收多少吧。”刚一出门，廖就大发牢骚说：“还清查什么？回去算了。”这笔为数达几十万银元的糊涂帐就这样马虎了事。

1946年夏天，沈醉回到湖南，接到郑由北平发来的急电，叫他立即赶回重庆，因为军统从重庆运物资到南京的木船有一只在重庆附近唐家沱沉没。这只船上装有郑岳母的棺材，漂流不知去向，他希望尽一切可能将它找回来。当天晚上，郑的老婆又从南京打长途电话给沈醉，在电话中大哭大吵，要一定把她母亲棺木找到。沈醉一面急电重庆有关方面派人沿途寻找打捞，一面连夜赶回重庆。

沈醉于3天后回到重庆，郑岳母的棺木已由稽查处水上稽查所寻获，运回了唐家沱，沈醉怕棺材里面进水，便叫人将捆得密密的粗麻绳解掉，将棺材盖撬开看一看。撬开后才知道，老太婆尸体的四周都塞满了用油纸包着的鸦片烟土。

沈醉回到南京见到郑的老婆，告诉他因棺材打捞起来后怕进水而将棺盖打开，看到了里面的东西。她脸上为之一变，立刻大骂她的兄弟柯新吾，说这一定是他在胡闹。接着，她假惺惺地叮嘱沈千万不能让郑介民知道。当灵柩运到南京时，她和她兄弟到下关江边去迎这具装满烟土的棺材，毫无责怪她兄弟的任何表情。

同年秋，军统决定把在重庆的2000辆十轮大卡车运一部分去南京，准备与江南汽车公司合伙做运输生意，由沈醉去上海接洽购办汽油5000大桶。有一天，上海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来找沈醉。陆根泉过去和戴笠很要好，抗战胜利后帮助军统在上海接收，并替大特务做生意，又正在南京为军统建造办公大楼，和沈的关系也很好。陆提出，请求在购运汽油去重庆时，他要加购1000桶，随同运往重庆。沈则以公文已写明了数量无法更改拒绝了他。

当时西南各地汽油奇缺，由上海运去很不容易。招商局怕运汽油出事，许多机关请其拨船运油都被拒绝。军统不仅在该局有一个特务组织——警卫稽查处，并且了解该局许多黑幕，所以交涉船只方便。在上海购买一桶美国汽油，只按官价付50加仑的钱，实际上是装53加仑，按官价运输一共不到黄金一两。而运到重庆、成都等地，一桶汽油可卖黄金二两多，是对本对利的好生意，但没有特权却赚不到这笔钱。

隔了两天，郑的老婆邀请沈醉到她家去吃晚饭，陆根泉也在座。刚入座，郑介民由北平打来长途电话，她先谈了几句，便叫沈醉去听电话。郑在电话中说，陆根泉需要由重庆运东西去上海，要沈帮助陆购汽油1000桶，随军统所购的一同运往重庆。沈当然得答应照办。第二天，沈向毛人凤说明情况，

把公文上的购油数字改为 6500 桶。沈利用这机会为自己加了 500 桶，并叫陆承认这是他要增加的。

汽油在重庆售完以后，陆和沈在结帐时说：“我这次是完全代人尽义务的。”郑介民一个长途电话和他老婆一顿便饭，便捞到 1000 多两黄金。

1947 年，郑介民不顾别人议论，将军统在上海杨树浦接收的一座规模相当大的锯木厂连同地皮以极廉的价格批准由陆根泉购买。这座厂占有地好几十亩，还有自己的起卸木材的码头和仓库等。他们之间的交换条件，是陆代郑在南京北平路修建一座三层楼的花园洋房。

至于郑介民做 50 生日他老婆大收寿礼，平日托人做生意，说情、受贿等，实在太多。他们夫妇每到上海一次，上海的特务头子们都得有所“孝敬”。郑介民上海家里的东西连他老婆也记不清。1947 年春，几个不怕事的小偷趁他们不在上海时，竟把这个大特务头子家里的东西偷去不少。郑的老婆闻讯赶回上海，向稽查处、警察局的特务们大吵大闹，非叫破案不可，一时弄得满城风雨。可是当问到她究竟丢了些什么东西时，她自己也开不出清单，只说很多很多。上海的几家小报都用花边新闻刊出“郑介民将军在沪寓所失窃”的消息。郑怕惹出麻烦，叫把所抓的嫌疑犯放了，并在报上更正，说只是丢掉几个汽车轮胎，案子已经破了。实际上，被偷的东西一直没有追回，行窃的小偷始终没有抓到一个。

在逃往台湾的时候，郑介民利用种种特权把可以带的东西都带走了。但房子却没有办法带，他老婆托人用低价卖出，结果却没有人要。郑在送他老婆上飞机时，还当着送行的特务们用故作镇静的口吻说：“你们去台湾过冬，等明年院子里的花一开就可以回来了。”但是没有几天，郑也依依不舍地丢下那座洋房逃出南京。

### 受美金蒋介石置疑

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鉴于党政军情报机构系统复杂、工作重复，特于 1954 年成立“安全局”。郑介民为局长，陈大庆为副局长，所有“中统”“军统”，以及国民党中央的“二组”“六组”统在该局控制之下，而在上面负责领导责任者则为国防会议秘书厅。这样，情报系统完全划出党政机构之外，而直属最高当局了。

郑介民任“安全局”局长后，曾到香港一趟，与美方高级官员有所洽商，后者告诉他，过去台湾特务人员以较多注意力来对付“第三势力”分子，这是不对的，应该改弦易辙。有所更张才行，郑唯唯听命。事后美方人员对郑很有好感，认为他识大体，非其他凶神恶煞的负责人员所能企及，遂寄以厚望，视为应该争取的主要对象。

后郑介民应邀赴美，商谈情报交换事宜，美方有关部门负责人交给他一千万美金，作为他个人额外开销，郑不敢收，对方坚持再三，始拜领而归，郑介民一到台北，即将此款缴交最高当局，并陈始末，以示清白，当局表面嘉其忠贞，仍令携回，以备不时之需，但内心相当不快，认为郑接受美国的收买，从此对他另眼相看，不敢推心置腹矣。

郑介民也知其然，遂以心脏病为由，从事长期休养，所有“安全局”对内外一切事务悉由副局长陈大庆负责主持。但情报系统如有三长两短，蒋介石仍惟他是问，所以他仍如临渊履薄日子很不好过。

## 遭痛骂猝然病故

这时，台湾出现一个台独领袖，欲取蒋介石而代之。

这个领袖名叫黄阳辉，据台湾警备司令部的公布，说他是共产党，其实毫无根据，他的真正底牌是东京“台湾共和国大统领”廖文毅的正前锋。

早在廖文毅在东京就任“台湾共和国大统领”之时，黄阳辉即奉到“密令”在台湾南部发展组织，联合台湾青年，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为口号进行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工作，经过近三年的努力，在南台湾一带，隐然成为一大危险势力，前后吸收成员近千人以上。黄不但自任党魁，而支持他的人来头也不小。这从他的活动费完全是美钞即可知之。

此事远溯到一年之前（1955年），黎复在胡适的《自由中国》半月刊著文，声言台湾非有一个“反对党”不可，又指责青年、民社两党曲阿取容，不配称政党。此时，黄阳辉之“共和党”已开张大吉，但参加者不多。

1959年夏威夷成为美国第50州，华籍之共和党员邓友良成为美国会议员，黄阳辉乃宣传，此一个共和党即美国共和党之支系，将来台湾成为美国第51州时，凡党员均有邓友良第二资格。因而参加者顿时热闹起来，不少台湾籍名流，亦厕身其籍了。

黄是廖文毅之助手，应经常通过美方之手给予指示。这“台湾共和党”是廖文毅的地下组织，不在话下。

郑介民主持安全局，其最重要的工作是对美国，可是也最难，因美国在台既有特权，他所干的事因有特权掩护，不易对付。对黄这一个秘密，郑知得太迟与太少。1959年8月12日，才在高雄把“共和党”30人拘捕，黄当时逃入美方人员住宅，数日后逃出，“安全局”人员追及，黄竟敢开枪拒捕，伤后始俯就擒。

及11月30日，有美国人探监，黄随之失踪。此事使蒋介石大为愤怒。12月10日，蒋以“巡视重建灾区”为名，召郑介民随从，在台中时，他声色俱厉，言下怀疑郑已被美国收买（此亦有蛛丝马迹，郑曾保证其弟郑挺锋赴美考察，然逾期不归，又送其长子至美国留学），限令郑在三天内缉捕黄归案。然三日限期迅即过去，黄阳辉依然无踪影，蒋介石赫然震怒亲手下令，将郑介民记大过两次，仍限其在一周内缉获，否则令全体人员即均依军法论处。可是，严令过后，历时一周，缉捕又告失败。

1959年12月11日，台湾中央社台北报道：“国防会议国家安全局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主任郑介民上将，今晨2时因心脏病不治逝世北投寓所，享年62岁。”

郑介民治丧委员会由何应钦出任主任委员，顾祝同、蒋经国、唐纵为副主任委员，决定以军礼治丧。丧礼这天，这些国民党官员一窝蜂前往那个熟悉的地方，只见极乐殡仪馆中甚为拥挤，门口车子往来不绝，张道藩、俞鸿钧、黄少谷、严家淦、黄镇球、郑彦芬、陈建中、胡健中、梁寒操、马超俊、薛岳、蔡培火、余汉谋、冷欣、黄珍吾、王叔铭、马纪壮、黎玉玺、蒋坚忍、李弥、钱大钧、李朴生、李士珍、刘牧群、卜道明、钮先铭、罗奇等一一来到致吊，直到下午，却不见蒋介石来到。

下午三点半，吊者大减，忽有一车驶来，走下一个小个子，脚履不健不实，人们却纷纷致敬，原来是陈诚来也。轻车简从，面容哀戚，到郑介民灵

前，鞠了三个躬，再去灵堂后面，慰问柯淑芳及其子女，一片嚎陶，陈诚落泪，再三劝慰，逗留了足足二十分钟才告离去，自始至终并未声明“代表总统”。

郑介民与美国的秘密接触虽然令蒋怀疑，但了解蒋介石性格的人认为郑死蒋不致吊，内中不无踢跷；再加上那一阵外面的风风雨雨，于是也就展开“耳语运动”，胡猜乱测起来。

郑死后十余日，香港报纸纷纷传出：郑介民并非死于惊病，而是对付地下组织不力，蒋介石猜疑他是为美国佬效劳，致郑介民引咎自杀。

初听之，以为是附会之谈，及郑之三弟郑挺锋自美闻耗归台，上述所传秘密内幕就呼之欲出了。

当时台北盛传，郑是知黄匿居哪里的，可是无法拘捕。郑介民一死，倒使美方觉事态严重，以参加圣诞舞会为名，把黄送至一名流家中，并通知“安全局”。在圣诞前夕，黄再次被拘。可是郑介民尸骨已寒。



## 第七章

“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章士钊请缨联络，蒋介石有感中共来函。和谈密使二临大陆，“党国”要员纷纷北归

## 第一节 “和为贵”

### 中共中央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

蒋介石失掉大陆，退守台湾后，致力于岛内政治“稳定”与经济建设，但这位“中华民国大总统”何尝一日忘了大陆？但“反攻”、“收复”作为口号喊喊容易，付诸行动难免自不量力。于是，在海峡两岸这场公开上演的大戏后台，有时也有过一些小插曲，排演着暴风骤雨后的“藕断丝连”。

就中共方面来说，几十年来，从未丢掉过统一战线。中共领导人从不讳言这一点，毛泽东多次声称，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是战胜敌人的“法宝”。“法宝”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工具。在马克思看来，共产党的存在也只不过是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的工具。“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实质上就是孙中山的统一战线。宋庆龄也曾说：“三大政策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工具”。

新中国成立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插手台湾事务，阻止了解放台湾的进程。进入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开始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达成；次年春，柏林会议召开，4月至7月，日内瓦会议签订越南停火协议。针对国际局势由紧张对峙向缓和转变的趋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

1954年7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日内瓦会议后的形势。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解放台湾的运动，以粉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在毛泽东的运筹下，周恩来于1955年3月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祖国统一问题。这一主张标志着中共对台政策的重大调整。

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印尼参加由29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万隆会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

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提出了亚非各国应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加强团结，一致对敌。经过协商，同其他与会国一起努力，达成了基本上符合和平共处的十项原则，即“万隆精神”。

周恩来还同参加会议的印、缅等七国代表团长举行会谈，讨论缓和远东局势，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严正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造成的。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但任何谈判都丝毫不影响中国人民行使自己的主权——解放台湾的行动。并表明我国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尽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和平解放台湾。

此次会谈后，周恩来接受了美国《民族》周刊记者访问，表示：“为了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提议和美国坐下来谈判解决这个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诚意和正确方针博得了国际舆论的好评，同时也使美国政府作出了迅速的反应。4月26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愿意同中共举行双边会谈。后经英国穿针引线，中美两国开始了日内瓦会谈。

中美大使会谈虽然未能就台湾等问题达成实质性协议，但对缓和台湾地

区紧张局势，促成中美双方的相互了解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新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取得的又一个胜利，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对于中美大使会谈，蒋介石表现出极大的不安。1956年3月，蒋介石在接见美国合众通讯社社长时说：

本人坦白认为：自由世界在亚洲冷战中，正遭遇失败。很不幸的，至少在亚洲，自由世界的外交已造成一种支持与鼓励中立主义的印象。……今日所谓中立主义，一方面使共产集团之收获益臻巩固，而另一方面使俄、共政治经济的邪恶势力之渗透发展，较前更为容易。而其最大作用，就是可使自由亚洲人民对于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所持之最后意向究竟如何，更感惶惑。故在亚洲赢得冷战之主要措施，为美国应有一坚定反共政策之表示。

蒋介石到底要求美国应有何种“坚定反共政策”？无外乎帮他“光复大陆”，而不是与中共和谈。但华盛顿的当政者，是现实主义者，比蒋介石清醒得多。“反共保台”可以。与八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战？决不冒这个险！蒋介石有怨气，可是，台湾小朝廷的存亡，又唯美国的庇护是赖，不敢太造次。

1956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国民党，发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巨大的和平攻势，频频向台湾发出了和谈信息。195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

台湾那里的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

不久之后的1月30日，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对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指出：凡是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什么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他号召：“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

4月，毛泽东又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的主张。

同年6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阐释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提出：

我们原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7月，周恩来在接见原“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时，进一步提出国共之间第三次合作问题。10月间，毛泽东会见有关朋友，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现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签个协定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就秘密来。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团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

不久，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问题。次年4月在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的宴会上，当周恩来谈到“国共两党过去合作过两次”时，毛泽东当即提出“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明确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问题。

## 章士钊出任和平使者

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先生，从 50 年代起，就经常奔走于北京香港之间，利用滞留在香港的一些国民党故旧，勾通与台湾的关系。当他看到 1955 年 4 月 24 日《人民日报》刊载的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中国政府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更增加了做统战工作的信心，于是，向周恩来总理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过去的一些朋友做蒋介石的工作，以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

毛泽东、周恩来同意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办法：

第一，除了外交统一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

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

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

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中共领导人欢迎蒋介石能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

1956 年春，在周恩来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的信，到香港会见了台湾派在香港负责国民党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许孝炎与章士钊是同乡，抗战时期，在重庆和章士钊同为国民参政员，交往密切，关系甚好。这次在香港重逢，分外亲热，感叹不已。章士钊便向许孝炎谈了中共以和平方式统一祖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与诚意，并拿出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委托他亲手转交。许孝炎即从香港飞往台北，直接到蒋介石的“总统府”，亲手将中共的信交给了蒋介石，并将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蒋介石听后，再展开中共的信件，反复看了几遍，长时间沉默无语，没有作任何表示。许孝炎只好默默退出。

## 当年国共和谈的发起人

凭心而论，蒋介石觉得共产党如今以绝对的赢家地位，能提出这样的和谈条件，已是十分难得。20 多年前，自己可没有如此“大方”过。

1935 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先后被迫放弃了中国南方的各个根据地，转移到偏远的西南、西北地区。由于红军已远离中国的核心地区，不再对南京政府构成严重威胁。至 1935 年 10 月，中共的中央红军更由一年前的 8 万人锐减为 5000 余人，不得不试图通过靠近外蒙边境来寻求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自然也不必再把军事的重心放到中共身上，可以腾出手来解决国民党内部的纷争，特别是可以转而对付已经侵入到平津地区的日本人了。

要准备对付日本人，说到底就是要准备抗日战争。而要实行全国范围的抗日战争，自然就要想办法统一全国的军事力量，结束国内的战争状态。但严格他说，国内战争状态一下子还很难完全结束。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交道

的蒋介石很清楚，即使是在处于绝对优势的条件下，要想根本上消灭共产党，也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事实上，这时无论在西南；还是在西北，仍有大约 20 多万国民党军队被红军牵制着。而共产党问题的国际背景，更是难以根本消灭的一个重要原因。面对这种情况，与其用几十万军队去与红军打仗，不如以政治军事双管齐下，利用中共深陷困境之势将其收降。更何况蒋介石在他的计划当中，已打出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这张牌，还包含着更深一层的对苏战略的考虑在其中呢。

在蒋看来，共产党人的背后是苏联。所以，他考虑共产党问题时必然涉及对苏关系。尽管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英美各国的态度暧昧，而对苏交涉已成为借以抗衡日本入侵的重要法码，蒋介石一直等到 1934 年对红军的第 5 次“围剿”接近成功之时，才开始着手这一交涉工作。显然，蒋介石认为共产党的存在已不对其统治构成直接威胁时，才敢于下决心同苏联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利用共产党势力已经严重削弱的机会才打出政治解决这张牌，也是对苏交涉的一种姿态。

于是，自 1935 年底开始，国共两党便有着秘密的接触与谈判。关于这段历史，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专家杨奎松曾有署名文章《1936 年国共和谈揭密》给予论证。该文长达 2 万 5 千字，于 1994 年 4 月 20 日至 5 月 21 日在《团结报》分九次登刊。

根据杨奎松的披露，从 1934 年秋天开始，南京政府小心翼翼地加速对苏交涉的步伐，以适应国际之需，但收效甚缓。华北事变发生后，眼看华北五省重蹈东北三省之覆辙，蒋已不能不被迫把“武装抗日”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于是，全力加速对苏交涉，以求苏联在军事上的尽可能支持，进一步成为当务之急。1935 年 10 月，蒋介石明确向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提出了缔结两国秘密军事互助协定的建议，而政治解决国共关系问题，就成为对苏交涉中的必不可少的关键。为此，南京政府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秘密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探知中共的意愿；另一方面向苏联方面提出要求，劝说中共服从南京中央政府。

经多次秘密酝酿之后，蒋介石在 1935 年 11 月底基本上确定了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方针，其基本内容包含以下 4 点：

- （一）取消苏维埃政府归顺南京；
- （二）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 （三）共产党可以存在，或共产党全部加入国民党；
- （四）改编后的红军全部开赴内蒙前线地区驻防抗日。

国民党开始通过秘密途径在上海和南京等地寻找共产党的关系。经秘密寻找近 10 天，包括释放在狱中的个别共产党人，都未能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欲派人秘密前往红军所在地川西和陕北，苦干找不到适当人选，又自知进入苏区几乎不可能。正在这时，回国述职的驻苏武官邓文仪注意到共产国际机关刊物——俄文版《共产国际》第 33、34 期合刊上的一篇论述中共统一战线新政策的论文，很快找人译出，送交蒋介石而引起他的兴趣。中共在莫斯科提出新的统一战线政策，公开表示愿意联合国内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党派、军队，“兄弟阅墙，外御其侮”，这表明政治解决的想法恰逢其时。既然共产党的后台在莫斯科，其新政策自然也是经共产国际批准的，何不直接前往莫斯科，借中共以联苏，借苏联以和共，联苏和共一并解决呢？

12 月中旬，驻苏武官邓文仪和国民党重要中委、CC 系负责人陈立夫先后

衔命前往苏联驻华使馆，会晤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在反复重申南京政府联苏意图的同时，明确提出希望知道苏联方面对中共新政策及国民党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具体意见。陈立夫还特别提出，国民党方面有意派一名中央委员前往莫斯科与各方面进行直接的联络，也愿意与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进行政治接触。但对于陈立夫、邓文仪的上述表示，鲍格莫洛夫在未得到莫斯科的有关指示之前，当场只是简单地回答说：“不打算过问有关中国的内部事务。”

12月19日，鲍格莫洛夫根据苏联政府的指示，通知蒋介石，苏联政府准备同意与南京政府就军事互助协定一事进行具体的讨论。蒋对此十分满意，并立即坦率提出了请苏联帮助促进中国统一的问题。据原《苏联外交文件》第18卷披露。

（蒋介石）很感遗憾，过去苏中之间发生了一连串的误会，特别是关于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问题。他决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并认为共产党像其他政党一样，有权表达自己的见解。但因为共产党以推翻中央政府为号召，所以他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对此他感到遗憾。他高兴地从我这里获悉，苏联支持建立统一的中国，况且他本人明白，只有达到中国统一，才能保证顺利抵抗外国侵略。没有统一，中国将永远不会强大。若苏联政府能促进（中国）统一，他会高兴的。

随着日本入侵加剧和苏对蒋交涉的迅速展开，蒋介石不能不同时着手从政治上解决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了。蒋之初衷，是建立在共产党军事上已无力与其进行军事抗衡的估计上，希望可以借此机会促使苏联出面，劝说中共承认其权威，把红军交给南京政府改编和指挥，以便实现先安内统一，后攘外御侮的既定方针。

考虑到日本不断扩大对中国国土上的占领，将会给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压力，苏联这时的确渴望中国能够实现统一，投入反抗日本的斗争，以便减轻苏联在远东所承受的侵略威胁。因此，它这时也在积极谋求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并主张中国尽快实现统一。但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刚刚通过的关于在中国实现统一战线的方针反映出，斯大林希望在中国实现的是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军队在内的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非是希望中共服从南京。因此，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在答复鲍格莫洛夫的电报中，明确告诉鲍格莫洛夫：苏联政府支持国共两党直接谈判以求建立统一战线，并愿意为此提供可能的方便条件，但仅此而已。电报称：

应特别注意蒋介石与中国红军的相互关系。需要指出，我们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如果蒋介石的主要武装力量用于对付中国红军，那么他想怎么安排抗日。我们坚信，蒋介石的军队和中国红军若不实行军事统一战线，就不能真正有效地进行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

如果蒋介石就此同您谈起他希望我们在他与中国共产党中间调停，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请您告诉他，我们不能扮演这种角色。但是，他完全可以同中国共产党直接谈判。比如，请您转告他，您愿意随时给蒋介石或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任何代表去莫斯科的签证，不管他前去的目的如何。

远在苏联政府向它驻中国大使发出上述重要信息之前，即蒋介石得知苏联方面同意就军事互助条约进行谈判之后的第二天，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派遣邓文仪赶回莫斯科找中共代表谈判了。邓于1935年12月21日乘苏轮起程。

他到莫斯科 3 天后，蒋介石为避开南京政府内亲日派的耳目，国共谈判亦要有高层人物就近指导与决策，复派陈立夫（化名李融清）携俄文秘书张冲（化名江淮南），以新任驻德国大使程天放的随员身份前往柏林，可随时赴莫斯科。

### 王明、邓文仪首次会晤莫斯科

1935 年元旦过后，邓文仪回到莫斯科。他一到莫斯科就立即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其转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要求与王明直接会面，但几天后未得消息。随后，邓文仪偶然遇见原 19 路军流亡将领设在香港的抗日反蒋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驻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他转托胡秋原代与王明联系，此举终于成功。中共代表团经过初步讨论并取得共产国际同意之后，决定先由潘汉年出面了解邓文仪的基本意图。

根据与胡秋原商量好的办法，1935 年 1 月 13 日晚，潘汉年按约定时间来到胡秋原的寓所，经胡秋原介绍与已经等候在那里的邓文仪见了面。邓文仪首先介绍了他此次寻找共产党谈判的原因。邓说：

我这次来莫，完全是受蒋先生之嘱，一定要找到王明同志讨论彼此联合抗日问题。我们曾经在上海、南京等地找寻共产党关系，进行了一个礼拜，毫无结果。

后来想由四川或陕北直接与红军谈判，但事先毫无接洽，恐进不去。最近蒋先生看到王明在七次大会的讲演及在《共产国家》杂志上的文章，要我立刻来找王明谈彼此如何合作的问题。我们在南京曾召集几次高级干部会议，由蒋先生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与会者完全同意蒋先生的主张。可以说联合共产党的原则是已经决定了。因此，我可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判合作的初步问题，具体合作条件双方自然还要请示。邓文仪接着表示，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方面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像 1925 年那样继续合作，但具体的合作方式，还是一个很复杂的技术问题，需要具体讨论。邓说：

要合作是决定了，不过有三个问题解决比较困难：

1. 联合以后，对日作战非有统一的指挥不可；
2. 我们现在子弹与粮怕只够打 3 个月的时间，假如彼此估计对日要采取持久之战，那么非另想办法不可；
3. 外交问题，对英美外交自然是有些办法，但英美离中国太远，远水救不得近火，总没有苏联与我们毗连一起那样方便，何况最近日本要进攻外蒙。我们应当与苏联有合作，要他们帮助我们军需粮食，这点很重要对此，潘汉年答复说：“只要诚心抗日，这 3 点就不难解决。”问题在于共产党人至今看不到南京政府有什么真正抗日的表示。邓称：

要抵抗可以说早已有准备，不然日本为什么非威迫蒋先生到底？关于我们抗日的准备将来是有文件可公布的。现在情形很迫切了，日本只容许我们有 3 个月的时间，而我们尚未停战，同时非集中 80 个师不足以言抵抗，然则与红军接触的各部队又不能同时撤退，恐日本知道秘密后，他先发制人，实行各个击破，这是很危险的。我敢说，我们与红军停战之日，即为与日本宣战之时，所以我希望能早与你们谈妥。

邓文仪与潘汉年的谈话，反映出国民党上层这时已经有了抗日的要求和联共的意图。尽管在中共代表团的内部讨论中，许多人怀疑蒋介石实际上只

是想要借共产党之手来促使苏联对南京政府进行援助，但代表团多数人仍旧对这种接触抱以积极态度。在得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正式批准之后，王明正式开始了与邓文仪的一连串秘密谈判。

1月17日，王明与邓文仪开始了第一次谈判。邓文仪在这次谈判中明确转达了蒋介石关于两党合作的具体要求。邓说：

蒋先生的意见，第一，关于政府，取消苏维埃政府，邀请所有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第二，关于军队，红军应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因为要抗日一定要统一军事领导。当然，红军不能接受南京政府的军事工作人员，但政府和红军可以交换他们的政工人员，政府派政治工作人员到红军中去，红军也可以派政治工作人员到政府军队中去，以表示互相信任和尊重。第三，关于党的问题，蒋先生考虑了两个办法，或者是恢复1924—1927年两党合作形式，或者共产党独立存在。这个问题可在以后逐步解决。蒋先生知道红军没有军事装备和食品，南京政府可以提供一批军事装备和食品给红军。另外，可以派一些军队和红军一起到内蒙古去参加抗日斗争，因为南京政府的军队主要的军事行动在长江流域，所以不能派较多的部队到别的地方去

根据邓文仪的说法，“南京政府准备在明年6月份以前解决中苏合作问题，因为明年9月份中国政府准备开始对日战争”，这也就是为什么南京政府急于与共产党取得谅解。他再度提出有关苏联援助的必要性问题，强调全部军事装备只够全国抵抗3个月，英美离中国很远，远水不救近火，为此南京政府再三向苏联提供援助，而苏联却只是说：“他们可以援助，如果国联采取集体行动的话”。邓表示对此难于理解。他希望确切地知道：“在日中战争爆发后，苏联会不会援助中国？”并希望在这个问题上中共能够起某种促进作用。

对于苏联援助的可能性问题，王明只是含混其辞，没有做出正面的答复，但对于邓文仪要求派代表跟他一同到南京去进行具体谈判一事，王明一口答应。但他表示：第一，邓文仪必须出具一份签字盖章的书面保证，保证中共代表的人身安全；第二，莫斯科去的中共代表只负责国共两党的联络工作，“有关的具体条件你们必须去和毛泽东及朱德同志谈”。邓文仪再三要求王明就中共的妥协条件作出说明，王明却只是重复解释共产国际七大所通过的有关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建议，坚持具体条件只能和苏区去谈。双方最后商定了谈判代表出发的问题。

邓：我打算早一些出发。我知道31日有船要从海参成到上海去，今天是17日，所以我们20日就必须动身。

王：这当然好。不过最好你先向蒋介石发一个电报，问一下他是否允许我们的代表和你到南京去，并保证我们代表的安全，是否同意你们的代表到苏区去。

最好在他回电之后再谈你出发的事情。

邓：那好。我会发一个请示电。不过要过两三天才能收到回电，我担心……，你们是否能够很快拿到过境签证？

王：这些技术性问题可以以后再谈。

## 蒋变卦，谈判中断



22日，邓文仪第二次见王明，明确通知王明：“蒋先生回电到了，我们可以马上回国”。但这一次王明却表现出某种犹豫和疑虑。他认为，蒋介石提出的所谓条件，都是相当刻薄的，对中共极端不利，“要参加谈判，却只有这样一些条件，代表团不能不表示怀疑。”邓文仪承认，目前的条件的确对中共不那么有利，合作当然不能只要中共单方面做牺牲，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谈判才能找出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比如内蒙防地问题，南京政府也并非一定给内蒙不可。实际上，西北几省中共都可以提。邓特别强调，对日战争一旦爆发，中国的海上交通线注定要被切断，结果中国唯一的武器来源只有苏联，唯一的国际交通线也只能是西北的交通线。中国共产党如能在西北驻防，就意味着保持着国际联系。对此中国共产党应该可以满意。但王明仍旧怀疑：“谁会相信，蒋介石会照顾红军，会把红军看成像他自己的军队一样？”谁都了解蒋介石的所谓改编是怎么一回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是一个势力的问题。因此你们将来同朱、毛谈判时，请不要提出那些要求单方面让步的条件，那是不能接受的”。当然，王明并没有因此改变派代表前往南京谈判的承诺。在邓文仪肯定具体的谈判结果必须是双方让步，而不会只是单方面让步之后，双方最后仍旧商定了于25日离开莫斯科前去南京的时间表。

第二天，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即1月23日，邓文仪急匆匆地打电话要求与王明见面。刚一见面，邓就马上表示道歉，宣称他后天不能和中共代表一同出发去海参崴了，要马上到柏林去。王明闻后不禁疑窦丛生，怀疑根本没有什么谈判，没有什么蒋介石的委托，一切都是“蒋在搞手腕”。邓文仪连连解释说不是那么回事，“没有什么手腕”，他确实已经准备好后天出发，但刚才突然得到蒋介石的电报。说着，邓把电报译稿交给王明过目。电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说邓文仪前电内容不清楚，有些词的意思不能理解，以后涉及此类事不要发电报，要派人员或利用外交邮件；二是要求邓文仪马上动身到柏林去，参加由李融清主持的秘密谈判。邓文仪解释说：“有关这封电报，我不能再说什么，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即这个人不但要和苏联人谈判，而且还要和你们谈判”。他强调说，不管你们怎样考虑回国谈判，以及到苏区去签协议的问题，“蒋先生的想法完全不同，他坚持我们应当在这里达成协议，然后再拿着协议到苏区去。”因此，我们确实需要在这里就具体的条件进行谈判。

很难判断蒋介石为什么在1月22日或23日突然决定中止关于去南京谈判的计划，转而打发邓文仪到柏林去。事实上，电报上所说的同苏联人的谈判是根本不存在的。苏联于22日正式通知蒋介石：他们愿意随时给蒋介石或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任何代表去莫斯科的签证，而蒋介石对苏联大使的这一通知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也就是说，他这时还并不想告诉苏联人，他的代表到了柏林，不想与苏联开始具体的谈判。当然，与苏联谈判军事互助问题的时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蒋介石对日本和整个国际局势的判断。但蒋为什么会同时改变了同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谈判的态度呢？看起来这也与22日蒋介石同苏联大使的谈话有关。

1月22日的谈话主要是苏联大使转达苏联政府的几点意见。第一，南京政府关于拟议中的互助抗日条约有什么样的具体考虑；第二，南京政府是否相信南京政府的军队有必要与中国红军建立军事统一战线，否则苏联政府很难相信南京政府能够真正有效地进行抗日战争。原《苏联外交文件》第18

卷记载的鲍格莫洛夫当天给斯托莫尼亚科夫的电报是这样说的：

蒋介石说，他认为向他提出的问题中重要的是最后一个，即关于红军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他十分明白，共产党可以公开存在，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一个政党拥有自己的军队。苏联必须利用自己的威望劝说红军承认事实上的政府，那时中国政府就能抗日了。我回答说，苏联政府对中国的红军没有任何影响。……这应由中国人自己去完成。蒋介石又开始阐述他关于一国之内不允许有其他政党拥有军队的观点。谈话有陷入僵局之虞，为打破僵局，我指出，不久前陈主夫同我谈话时说到希望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到莫斯科去进行各种会晤，我问这是否符合蒋介石的愿望。蒋介石对我的话没有反应，继续热情地论证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的必要性，说如果苏联政府就中国红军承认中央政府权威一事向红军施加必要的压力，那么苏联政府就可以此表示对南京的真诚态度，并赢得南京政府这个忠实的同盟者。我看到谈判继续朝僵局发展，便斩钉截铁地声明，我们绝不能扮演他讲话中说的任何居中调解人的角色，这是中国内政。蒋介石同孔（祥熙）商量后说，他认为可以据以下原则同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和总指挥的权威，同时保留其现有人员参加抗日。我重申，按自己的意向同红军谈判，这是他的内政。蒋介石说，尽管如此，他要求向苏联政府转达这个想法。

我回答说，我当然会把他的话报告我的政府。历时 2 小时的会谈有 80 分钟被用来谈这个内容。

从上述报告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蒋介石这时对于利用苏联方面的压力来解决共产党问题有着极为强烈的愿望。甚至与苏联签订互助军事条约问题同解决中共红军问题相比，占次要位置。但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却让蒋介石十分扫兴。本来蒋认为，他完全可以利用苏联支持中国统一，乐于与南京政府签订军事互助条约的态度，来迫使中共就范，通过莫斯科来解决共产党问题。不曾想，苏联竟一口回绝。这意味着，在莫斯科谈判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时机不成熟。事情明摆着，如果苏联继续为中共撑腰，在莫斯科谈判的中共代表的要价只能比国内高。与其如此，不如在国内与明显处于困境的中共中央直接谈判为好。这样一来，莫斯科的两党谈判就必不可免地结束了。尽管邓文仪 1 月 27 日离开莫斯科之前，还信誓旦旦地写信给王明，保证很快就可以回来继续谈判，结果却只能是泥牛入海，音讯全无。那一边自然让不明真象的王明大有上当受骗之感。一度冷清了两个月的“抗日反蒋”口号，又于 1936 年 2 月间再度高唱了起来。

## 数路并进找中共

就在邓文仪受命前往莫斯科与中共代表团王明等人接触之际，同样受蒋之命寻找共产党线索的国民党 CC 系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属下的曾养甫等，也通过正在交通部工作与周恩来有过同学之谊的谌小岑，转经翦伯赞，找到了中共北方局的关系，并向后者秘密转达了希望具体磋商政治解决国共两党关系、联合抗日的意图。

1935 年 12 月底，中共北方局经过研究，决定派周小舟及吕振羽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进行秘密接触，宣传中共方针，探询对方真实意图。

1936 年 1 月，周小舟、吕振羽与谌小岑进行了多次接触。谌小岑根据陈

立夫和曾养甫的意图，首先拟就了一个具体的意见书，要求中共及红军放弃阶段斗争和暴力革命，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权威，赞助其统一中国的努力，以便最终实现合作抗日。而周小舟等则根据中国共产党 1935 年《八一宣言》中所列十大纲领提出对案，并特别要求国民党方面首先作到以下四项：

（一）立即发动抗日战争；

（二）开放民主自由；

（三）释放政治犯；

（四）恢复民众组织与活动，保护民众抗日爱国运动这次接触中，国民党方面明确表示可以考虑承认共产党在组织上的存在与独立，乃至释放政治犯等，在谌小岑拟就的书面意见中，他甚至表示可以划定一个特别区域来供共产党人实验诸如“集体农场”之类的理想。但其核心的要求毕竟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共产党必须同意：

（一）协助联苏；

（二）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

（三）帮助蒋先统一，后抗日。

蒋介石的“统一”与“合作”的条件及形式，在这里反映得十分清楚：“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的标准，就是依据国民党的军队和政权形式，把共产党的军队和政权“统一”到国民党军队与政权中去。

这自然要引起共产党代表的不满，周小舟认为：“很明显的，他们想要借苏联的力量以要挟日帝，以作投降的条件，也即是取得奴才的地位；又要借抗日的无耻欺骗，以完成其法西斯的统一”。

以曾养甫直接负责，由谌小岑出面与中共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所进行的会谈，虽然在实质问题上没有结果，但双方交换了通讯联络方法，为以后的进一步接触作了准备。会谈至 1 月下旬告一段落，周小舟返回天津向北方局汇报。

蒋介石在寻找中共的线索方面，可以说是多头并进，与中共北方局的接触只是其中的一头。另外还有董健吾和张子华两个线索。

1936 年 1 月，南京方面的领导人之一宋子文及陈果夫兄弟等分别通过宋庆龄等人先后找到原来属于中共特科系统的董健吾和张子华，并分别于 1 月中旬和 2 月中旬委托董、张二人经西安转入陕北苏区，以便与中共中央直接建立联系，转达蒋介石政治解决两党关系的意图。

1 月中旬，董健吾受宋庆龄之托，化名周继吾，并由孔祥熙给一个财政部“调查员”的身分，携宋庆龄用以慰劳红军的一大包云南白药及宋庆龄电台的呼号密码，赶赴西安，准备进入陕北苏区。由于雪大路阻，董在西安耽搁 40 余天。张子华于 2 月 10 日左右受覃振、谌小岑的委托，前往陕北，同时并带有覃振写给林伯渠的亲笔信。信称：

迈园吾兄，别久思深，如何可言。目前吾人所负之责任日趋严重，而环境日益险恶。唯一认识，就是谁敌谁友；唯一办法，就是一抗一联。此真千钧一发之时机，不容再由误者也。弟与兄虽地角天涯，而革命精诚自信彼此一贯。某同志前来，切盼兄润兄等决定大计，完成孙先生之国民革命。弟不敏，当赴汤蹈火以从。书难尽意，诸乞亮照不备。弟鸣手启。

张子华于 2 月中旬到西安，与董健吾不期而遇。在西安，“剿总”司令张学良电询蒋介石证实董、张使命后，二人即由张学良用专机送至延安，然后再由东北军原 619 团团团长高福源陪同，通过东北军的封锁线，于 2 月 27

日晚抵达陕北苏区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当晚，中共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李维汉、袁国平、吴亮平等接见了董健吾和张子华。第二天，留守瓦窑堡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博古正式接见了他们二人。二人称：此次使命的主要策划者是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但实际负责的全是 CC 系曾养甫及其背后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目的仅在于了解中共可以“输诚”的条件。若中共肯于向南京政府“输诚”，则蒋可同意：

- 甲、不进攻红军；
- 乙、一致抗日；
- 丙、释放政治犯；
- 丁、武装民众；
- 戊、顷（倾）蒋尚有款。

二人还认为，南京国民党内部目前正在发生分化，CC 系陈果夫等主张联共反日，曾扩情等则反对联共；政学系黄乳、王克敏等亲日，反对联合苏联与共产党；其余如冯玉祥、陈诚、孙科、张群、于右任、翁文灏等，则主张联共抗日。故形势对中共颇为有利。

对于蒋介石主动找中共谋求政治解决方案一事，中共中央作出比较灵活和积极的反映。周恩来于 3 月 2 日明确表示：“对蒋及南京方面，应答应派正式代表去”。不论蒋介石耍什么花招，我们都必须估计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蒋现时之弱点，抓住他找我之一环，向全国各方活动，并得与全国群众见面。这千载一时之机，万万不可放松。”至于谈判条件，原则上可依照前此宣言、通电中的主张，但应说明，有些条件在实行时可以协商，仅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为根本主张，军事上则应声明红军愿意“东向抗日”及“集中军队与联合行动”。

正在山西石楼前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参照周恩来的意见，于 3 月 5 日联名臻电博古等，决定向南京方面提出五项基本条件，作为联合抗日谈判的具体步骤和前提要求，即：

- 甲. 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
- 乙. 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 丙. 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
- 丁. 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
- 戊. 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之改革。

中共中央并非不知道蒋介石关于“输诚”、“统一”要求的实质内容，从当时李克农与张学良的秘密接触中，已经清楚地知道：“蒋介石的策略，即取消苏维埃红军，纳入三民主义的轨道，引进共产党代表于国民大会，在共赴国难口号下取消苏维埃制度与暴动策略，接受南京节制，以最后瓦解红军”。

为此，中共中央的对策也很强硬，即：对方提出取消苏维埃，我则提出取消南京政府，主张“全国人民公决”，并成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中就取消双方政府，建立人民公意的政府进行初步的讨论；对方提出取消暴动，我则提出取消国民党一切压迫制度、封建剥削，实行全国抗日，说明如此则自无暴动之必要。“否则，以暴动战争对付日帝与卖国贼是中华民族的神圣事业。”

董、张带来国民党的条件中没有取消苏维埃红军及其暴动政策的话，中共中央自然也不打算在自己的条件中提及这种问题。

3月5日，董健吾接到中共中央五项条件的指示，即刻与高福源一起离开瓦窑堡，经洛川返回西安再转回南京。林伯渠托董健吾带函给宋庆龄，感谢他慰问红军，并希望宋庆龄能够为红军征得部分财政上的援助。该信称：

庆龄同志：不通音问，弹指十年。每从报纸得悉言动，知耿耿此心虽海角天涯而如在一室也。正值红军东进抗日之时，忽奉到先生珍贵慰劳品，万人欣腾，……我在苏区负财政之责，已历四年，虽支出浩繁，限无限越，只是大战开始，依靠全国民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无庸讳言。特寄来抗日基金筹募条例一份，收据一组，望大力为之筹焉。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对海外华侨宣言，佩仰其历来帮助中国革命之爱国举动。……在我们率领广大民众走上神圣民族革命战争之战场时，爱国侨胞必然予以热烈协助也。旅旗在望，握谈有期，书不尽言，敬候明教。民族革命的敬礼。

伯渠

三月三日于抗日后方瓦窑堡

董健吾走后，张子华应张闻天、毛泽东等领导人之约，前往山西汇报工作。3月15日，张子华在山西石楼前线汇报了工作之后，返回到瓦窑堡，当日，林伯渠有信给覃振，张学良、宋子文、于右任、孔祥熙等，托张子华带回南京。信函说：

别来十载，音讯久疏，远承惠问，欣慰无既。外患日亟，亡国灭种之祸迫于眉睫，凡属华族，应放弃曩昔政治上主张异同之清算。不问任何阶段、任何派别、任何团体、任何武装部队，一同团结，急起直追，以求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之胜利，海内贤能应同具此见解也。来示一抗一联，语重心长，确为卓识。惟吾人更有进者，则以革命胜利，不仅恃外之有联，而恃能发挥并善用其本身之能力，……所虑者，吾不能发挥民力，而反妨碍民力之发挥。与敌战而自缚其手，欲不亡也得乎？苏维埃深虑全国志士空有冲天之愤，不及尽其能力。是以有召集抗日救国会议电所列举之主张。吾几读之，谅为同意。弟虽碌碌，亦为革命饱历艰辛。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翘首钟山，不胜悬系。

随着董健吾、张子华带着中共中央的建议先后返回南京，国民党谋求与中共中央的联络工作已告成功。由于双方仍处于隔绝的状态，只有董健吾口头转述中共的条件和林伯渠的信件作为凭证。当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到南京出示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三人签名的信件时，更使国民党莫衷一是，不知谁能真正代表中共中央。直至4月初湛小岑等再托张子华进入苏区，于5月带回周恩来亲笔信之后，国民党开始把联络的重点转移到陕北。

### 相互试探阶段

1936年3月底，周小舟和吕振羽相继得到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再度前往南京与国民党代表接触，以探明国民党对于停战协议和联共抗日的真实意图。中共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并以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三人的名义致函曾养甫，表示了对政治解决国共两党冲突的愿望和对国民党政策的不安与疑惑。同时，刘少奇还托周小舟带去了他的一篇以陶尚行为笔名发表的有关中共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文章。在周小舟带去的和谈条件中，根据红军东征的情况，增加了要求国民党停止拦阻和进攻红军。协商红军北上路线并提供给养

的内容。

国民党鉴于周小舟带来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信件，开始重视这次谈判，在与周小舟、吕振羽多次交换意见之后，陈立夫和曾养甫等经过秘密磋商，并取得蒋介石的同意，向周小舟等提出了四项条件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其内容是：

一、停战自属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其他游击队则由国民革命军改编。

二、国防政府应就现国民政府改组，加入抗日分子，肃清汉奸。

三、对日实行宣战时，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一编制。

四、希望共产党的领袖来京共负政治上之责任，并促进联俄。

从文字上看国民党的四项条件，在统一军队和政权形式方面比以前灵活了。鉴于红军仍有重返内地之实力，国民党方面希望把红军进一步引向靠近外蒙的边境地区，远离中国腹地。此举既可使红军进一步远离内地重要省区，又可促使红军以外蒙为依托与日本冲突，从而造成苏联干涉，使日本再也无力南侵，可谓一举多得。

5月15日，国民党方面正式形成上述文件，曾养甫、谌小岑并分别有信复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等。只是因5月初又得到张子华自陕北转来周恩来和林伯渠的信件，邀请他们前往陕北苏区面商联合大计，故曾养甫、谌小岑二人遂将上述信件一式两份，一份交予周小舟，并附曾致毛、彭、周的信；另一份交给董健吾，并附谌小岑至周恩来的信。

谌小岑在致周恩来的信中写道：

目前南京当局，自审其在国际上之地位，对于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之组织，在表面上势难赞同。然兄等尽可求其实质，而不必求其表面与名义。苟中日战争爆发，则现政府之组织势必有所变更，而加强其国防的性质，自不待言。军队编制与番号，自必重新组织，亦所当然之事实。欢迎抗日分子之参加，乃势所必然。故今日之问题，在如何方能发动此战事耳。就现势以观，欲求避免目前国内之矛盾，最好另辟新土。

苟合作成立，民主权利份属当然。唯党与军之行动，或须有所分别。此则根据此间当局之意旨，非弟个人敢有所主张也。

这封信实际上是对南京方面四项条件的一个较为具体的说明，它表明南京方面在军队与政权问题上并没有丝毫让步的打算。这种态度，自然是中共中央无法接受的。

果然，6月中旬，中共中央先后收到由董健吾和北方局转来的国民党四项条件，以及曾、谌两人的信。毛泽东说：曾养甫等人的信件及条件，“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古边境，导火日苏战争”。

当时，国共两党的这种最初的接触要想取得明显的进展，应当说是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共双方这时对对方都还缺少足够的了解，双方各自的立场和政策都还不够灵活，因而相互间的条件相差甚远。就中共中央而言，这时显然还没有放弃以苏维埃为中心来建立统一战线的立场，甚至还坚持着不久前在瓦窑堡制定的“抗日反蒋”的革命方针。因此，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谈判条件一度充满反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不是说，中共中央下准备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接触，不打算通过政治方式来解决两党之间的问题。在考虑到自身的实力和明确规定了以“抗日”为第一位，而以“反蒋”

为第二位的方针之后，中共中央对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态度实际上是以后者对于日本侵略和对于自己的态度为转移的，他们显然并不反对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问题上与南京方面达成某种政治上的妥协。为此，当他们得知蒋介石国民党正在寻找共产党谈判之后，他们就希望这种谈判能够在他们所希望的条件取得进展。因此，还在曾养甫提出四项条件，交与周小舟、董健吾等带回中共中央，希望双方进一步商谈之际，周恩来等也在陕北瓦窑堡致函谌小岑等，并托张子华将函带往南京等地，正式邀请曾养甫及谌小岑“惠临苏土，商讨大计”，“或更纠合同道，就便参观”。他明确表示，希望谌等“能推动各方，共促事成”。周恩来的信表明中共中央这时对于此项接触的存在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只是其根本主张仍未脱离得到共产国际七次大会认可的《八一宣言》的规定。

周恩来致谌小岑信称：

十余年来，弟所努力，虽与兄等异趣，但丁兹时艰，非吾人清算之日，亟应为民族生存，迅谋联合。此间屡次宣言，具备斯旨，今幸得兄相与倡和，益增兴感。黄君回，面托代罄积愆，并陈所见，深愿兄能推动各方，共促事成。

养先生木为旧识，盍代致意。尝愿惠临苏土，商讨大计，至所欢迎。万一曾先生不便及来，兄能代表蒞临，或更纠合同道，就便参观，尤所企盼。

上信中的黄君即张子华，此时化名黄续。

周恩来在致张伯岑的信中，更明确提出中共对国共联合的基本主张：

目前华北局势，非战无止日帝之迈进，华北沦亡，全国继之，救华北即所以救全中国。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今日如能集合全国之武力与人力财力智力，共谋抗日，则暴日虽强，不难战胜。而民族战争之开展，端赖有一致之政省与军队。居今日中国，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各种军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统一对外，并开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以促其成。

由上所见，国共双方这时确有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愿望，但双方对于联合与统一全国武装力量的想法与意见，却有相当的距离。不过，由于周恩来发出正式邀请，特别是此后中共中央北方局正式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对案，双方的接触和谈判毕竟结束了最初的相互试探阶段，开始进入正式交换意见的过程。

## 正式商谈

6月下旬，周小舟等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再次来到南京，针对国民党方面5月间所提方案，正式提出了如下对案：

一、为求中华民族之生存，C方确认：

- (1) 立即发动抗日战争保卫中国华北、内蒙，并收复东北失地；
- (2) 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及人民，共同奋斗，严厉制裁汉奸；
- (3) 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并释放一切政治犯；
- (4) 与日本断绝交涉，并废除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条约，实行联合苏联及一切反日的外交。

二、在K方承认并确行第一条各项政策时，C方放弃敌对K方的行动，K方停止围剿与封锁红军和苏区。

三、C方确认抗日战争须要有统一领导与指挥，C方提议在最近期间召集全国各党及人民团体（不论已立案否）共同讨论具体实现抗日联合战线之一切问题，例如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名义，红军及其一切抗日部队当然要服从这个政府的指挥。在K方执行第一条各项政策时，C方赞成K方在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中占有指导地位。

四、C方在今天无意考虑取消苏维埃组织及红军之提议，C方也不要求K方及愿意抗日的其他各派变更原有的政治军事地位。但在将来，依据抗日战争的需要，C方赞成全中国真正民主的统一。

应当指出，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的上述对案，较此前中共方面的历次主张以及陕北中共中央当时的态度，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所谓提议在最近期间召集全国各党及一切人民团体共同讨论具体实现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名义，很明显地意味着它并不再继续坚持“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外在形式；而所称目前无意考虑取消苏维埃组织及红军，但将来依据抗日战争的需要将会赞成全中国真正民主的统一云云，同样在某种程度上暗示它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放弃苏维埃组织与红军的外在形式。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共没有再坚持以苏维埃为中心和国共两党必须平等地实现他们之间的合作的想法，第一次率直地表示在将来政府中可以由国民党占指导地位。这无疑使双方的条件开始有了进一步接近的可能。

果然，双方的商谈迅速取得进展。经过了几天具体的交换意见，国共两党代表破天荒地第一次形成了共同的“谈话记录草案”。内称：

一、KC双方一致确认，为求得民族之生存，须立即实现民族之联合战线，共同抗日。

二、为使联合战线之巩固与实现，应先消灭国内现有之矛盾，集中力量。

三、C方提议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K方在原则上接受此提议，但C方须承认K方之主导权，C方代表认为K方在原则上接受此提议后，现形势下应该而且可能成为抗日之主导力量。

四、在上述三原则下，尤其在第三点上相互以文件承认后，K方将在事实上以秘密方式停止围剿红军，红军亦停止进攻的军事行动。同时在C方停止反K方之行动与宣传的条件下，K方承认立即停止破坏C方组织，及逮捕C方人员群众，并予暗中保护爱国运动（指在K方权力范围以内，冀察不在此限度内）。

之后C方公开发表宣言要求K方一致抗日。

五、双方于履行第四点要求后，共同组织一混合委员会，讨论具体实现抗日联合战线之政治形势及统一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例如在国防政府成立后，C方须改变苏维埃之政治形式而统一于国防政府之下），以及联俄诸问题。

由上可知，在这次商谈中，至少在形式上双方代表都作了较多的让步，以至取得了一个得到双方代表共同认可并且正式签字的谈判文件。其中最为关键的让步在于，国民党方面接受共产党方面关于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提议，而共产党方面则承认国民党方面之主导权和实际上的主导地位，同时准备放弃苏维埃之政治形式。据此，溆小岑立即起草了一个正式协定条款的草案，试图一漱而就乘势提交双方领导人，迅速达成协议。

溆小岑起草的新的协定的内容如下：

一、K方为集中民族革命力量，要求集合愿意参加民族革命之一切武装



力量，不论党派，在同一目的下，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

二、C方如同意K方之主张，应于此时放弃过去政治上一切足以引起国内阶级纠纷之活动，K方可承认苏维埃主要区域在民主政府指挥之下作为特别实验区。

三、K方在C方承认全国武装队伍统一指挥与编制的原则时，即行停止围剿，并商定其武装队伍之驻扎区域，与以其他国军同等之待遇。

四、K方在C方决意接受K方之上述军事政治主张原则下，执行：

（一）抗日民族革命之民主自由，但其限度以不反党国为原则；

（二）红军之驻扎区域采商定方式，依双方之同意而决定；

（三）苏维埃政权取消系指苏维埃独立于中央政府而言，其他地方组织形式可适当保留；

（四）C方之表示与K方所负之义务应在同时实行，其实现方式由双方协议后实行之。

作为国民党方面级别较低的联络代表，溆小岑实际上并不负有谈判的责任。但是，不能说溆小岑不了解谈判的技巧。在争取中共方面承认了国民党方面的主导权和主导地位之后，他立即在正式条款中放弃了对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提议的承诺，仅以集中革命力量为由，提出了国民党方面的中心要求——统一指挥与编制。而共产党地方政权和军队之保留，均以这一要求为前提。尽管溆小岑的条款对于这种集中统一的形式没有具体的表述，但其内在含义十分明显，即中共的军队和政权将必须统一于南京政府。

果然，在溆小岑将此一文件上报曾养甫和陈立夫之后，陈立夫进一步将国民党方面的要求具体化了。陈于7月初对此一文件做了两点最重要的修改，并于7月4日通过曾养甫和溆小岑正式提交给中共代表。经过陈立夫修改的国民党方面最终的文件内容如下：

一、K方为集中民族革命力量，要求集合愿意参加民族革命之一切武装力量，不论党派，在同一目的下，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

二、C方如同意K方上述之主张，应干此时放弃过去政治主张，并以其政治军事全部力量置于统一指挥之下。

三、K方在C方承认全国武装队伍统一指挥与编制的原则时，即行停止围剿，并商定其武装队伍之驻扎区域，与以其他国军同等待遇。

四、K方在C方决意放弃苏维埃政权和条件下，即以K方为主休，基于民主的原则，改善现政治机构，集中全国人才，充实政府力量，以负担民族革命之任务。

这里的修改主要表现在第二条和第四条，即强调了共产党方面必须以其全部政治军事力量置于统一指挥之下，和放弃苏维埃政权，承认并参加以国民党为主体的，只是经过改善的现政权。这就在事实上否认了中共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

考虑到中共的代表来自不同的方面，溆小岑分别将国民党的条件递交给周小舟和刚刚由陕北返回的张子华，再由二人分别转送中共中央。但由于溆小岑交给张子华这一文件时，并没有说明此件为国民党之谈判条件，只是说提供中共中央“参考”，故张子华并未专程送往陕北，而是托上海的李雪峰于方便时交人带往陕北，致使此件久未送到。周小舟一件虽然送到，但因周转较多，颇费时日，也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到陕北。这样，中共中央只是在一个半月之后，即8月下旬才见到国民党的这一谈判条件。

## 国共高层直接面商的尝试

由于国共双方联络已经沟通，利用中间人来往联络颇费周折，双方上层感到建立直接联系和进行直接商谈的必要性。当7月初张子华带去周恩来邀请曾养甫、湛小岑进入苏区面谈的信件之后，国民党方面立即作出了积极的响应。7月19日，曾养甫致函周恩来，邀其外出晤谈。函称：

翔兄：黄君来，得悉种切，欲谋迅速解决，盼两方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如兄能摒除政务，来豫一叙，至所盼祷。顺颂

时祺

弟养上

七月十九日

此时恰逢蒋介石平息两广事变，迅速选派CC系骨干前往控制广东党政军各系统，曾养甫也被派任广州市长一职，立即赴任，故此函邀也告失效。7月底8月初，湛小岑分别把国民党的电台联络呼号密码交给周小舟和张子华，希望与中共立即建立直接的电讯联系，同时，湛小岑复信周恩来，称：

翔宇兄赐鉴：敬邀临西北之游，使得吾兄及诸友畅叙一堂，交换中国革命动向意见，个人衷心亟为感奋。因蓄志已久，尝寤寐以求之亟，盼能早日实现。且也，吾人本年来做进行工作，也须当面作具体之商讨，俾早日有所决定，求打开目前革命局势，故屡向表兄建议派弟一行。其所以至今未能成行者，盖故乎：1. 统一军政组织问题，此间至为重视，然民主方式究能实行此若何程度，当待初部（步）之商讨；2. 停止军事行动问题，希望西北有军事负责人在陇海线西北段择一地点，作一度之会商，我兄如能命驾，更所欢迎；3. 两广问题发生，彼此间不无新的隔阂。又如以养、立二兄均注意粤省党政局势之开展，故一月以来特形忙碌，几至无暇常谈。近且派弟办理粤省国民党务，促递速行。

然求吾人工作之早欢厥成，实半年如一日。固未尝稍有变更也。兹特奉上电台符号及密码，一切问题可用电报直接谈商，既省时间，又免多人来往跋涉。如能有所决定，即可约动晤谈。盼能早日面聆教诲也。书不尽意，诸维心照不宣。敬致革命的敬礼！

诸友前乞代致意

弟岑

八月六日早

大约在此前后，原奉命由莫斯科前往香港同两广势力及19路军将领联络的潘汉年，得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的指示信，他前往南京主动与陈立夫进行了初步的接触。由于国民党不能确定潘汉年当时的身份，故他与陈立夫的接触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加上潘汉年还负有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有关意图的使命，随即经西安于8月9日转入陕北苏区。

潘汉年回到陕北，使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统一战线工作的具体策略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8月10日专门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更加重视对南京政府的统战工作，开始主张要“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准备在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上，在忠实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实行停止围剿的前提下，承认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在此后接到共产国际8月15日更加明确的政治指示之后，中共中央终于正式

决定放弃“抗日反蒋”方针，并且进一步就自己没有充分重视争取蒋介石合作抗日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开始加紧与南京方面进行公开的或秘密的联络及谈判工作。

8月25日，中共中央开始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明确表示愿意“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实现“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

8月27日，张子华带着国民党的电台呼号密码和曾养甫及湛小岑的信件，到达陕北中共中央所在地。为了直接促成国共双方高层谈判，周恩来于8月31日和9月1日分别亲笔致信曾养甫和陈果夫、陈立夫等，首次表示愿意外出商谈。周恩来给曾养甫的信说：

（前略）国难危急，是此非联合不足以成大举。弟方数年呼吁，今幸贵方所表同情者，复得兄出而襄赞。

救亡前途，实深利赖。弟方除已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弟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诚意和愿望外，兹为促事速成，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承允面叙，极表欢迎，惟……弟等外出不易，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上，弟等愿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山麓亦作为把晤之所。……为慎重秘密计，现仍托黄兄回报并携去较妥靠之密码，至呼号波长——如来约，凡机密事，统可电中相商。晤其约定，即希告黄兄先来布置一切，以便弟得代表弟方兼程前往也当然，周恩来更希望能够直接与负责与中共谈判的陈果夫和陈立人兄弟进行面谈，故他在给二陈的信中特地表示：

敝方为了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

为了在国民党上层迅速造成便利于国共合作的气氛，这时，周恩来还分别致函胡宗南、陈诚等人，希望他们作为“蒋先生所最信赖之人”，“能力排悖议”，劝蒋“立停内战”，“重谋国共合作”，9月8日，毛泽东也分别致函宋庆龄、蔡元培、邵力子、朱绍良、毛炳文、孙蔚如、李济琛、李守仁等人，并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他们为促成国共合作而尽责尽力。

9月20日，张子华辗转赶赴广州，在递交了周恩来的亲笔信之后，于27日面见了曾养甫。此时曾养甫再度说明了国民党对两党关系的基本条件，即7月14日正式提出之四条，表示只有在此四条的基础上，才能考虑允许中国共产党公开活动的问题，以及目前苏区政权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继续存在和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问题。他并明确强调：两党并非“合作”关系，军队也必须改编。同时，曾再度提出邀请周恩来外出谈判问题，因为曾说他们的行动过于引人注目。之后，张子华通过国民党的电台致电中共中央，称曾养甫仍然希望周恩来能够亲自来香港或广州，与国民党负责人谈判。10月8日，湛小岑更进一步表示已经为此准备好一切。他在致周恩来的信中说：

翔兄赐鉴：读澄川兄携来各件，敬悉我兄同意晤谈计划，至为欣慰。西南问题之解决，足法此间南顾之忧，而加强对敌人抗战之态度。苟西北能于此时造成统一局势，则整个民族革命战线将赖以完成，联苏外交亦必实现。如是，则远东局势已可控制，日帝国主义之崩溃可期，弱小民族之解放可立而待也。此实转变历史行程千载一时之机，想兄等对于前次此间所决定之办

法原则必能接受也。现办好太原行营护照六张，通告安全当可不成问题。谈话地点以在广州为最合适，因曾、陈二兄均在此，蒋先生在日内亦南来也。

期间以十月底较妥，飞机往返需时不多，国民大会代表问题亦宜早日解决。把晤匪遥，诸容面叙，弟当扫榻以欢迎。余由澄川兄面达。

颢此 敬致

革命的敬礼

诸友及颖超姊前乞代致意

弟岑

十月八日

为了便于中共高层代表成行，陈诚致电西北“剿匪”总部叮嘱放行。

10月9日，中共中央收到张子华于9月28日由广州发来的电报，当即复电表示同意，但要求以国民党暂时不进攻红军为条件，14日，中共中央再度致电广州，称：

（一）寇进甚急，我方愿以全力为助，希望宁方坚持民族立场，不作任何丧权让步；

（二）我方首先执行停止对国民党军队攻击，仅取防御方针，等候和议谈判集力抗日；

（三）欲图和议谈判早日实现，请蒋暂时以任何适当名义停止军队进攻，以便开始谈判，若一面进攻一面谈判，似无此理；

（四）在进攻未停止，恩来未出去以前，准备派在沪之潘汉年同志进行初步谈判。

21日，中共中央接广州方面20日来电，表示同意由潘汉年进行初步谈判，毛泽东立即于第二天电告潘汉年，要潘“直接去见陈立夫”。至此，国共两党间下层代表的接触和联络工作告一段落，高层会晤及谈判工作开始进行。

### 《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

9月下旬，中共中央专门召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8月15日发来的有关统一战线的“政治指示”之后，就开始起草《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准备恩来带往谈判”。该草案显然是参考了中共中央北方局送来的他们在此前与国民党方面在南京谈判时所提出的各种文件和双方曾经形成的谈话记录草案，具体他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实现两党合作的基本设想和基本条件。该草案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鉴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侵略之有加无已，危害中国领土主权之保全与民族之生存。一致认为，惟有两党合作并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实行对日武装抗战，方能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与恢复中国领土主权，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生存之目标。因此，双方派遣全权代表举行谈判，订立此抗日救国协定。

二、双方共同承认，互夫最大之诚信与决心，一致努力于下列之伟大的政治任务。

甲、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

乙、实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

丙、实现依据民主纲领而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为力求以上政治任务之完成起见，双方同意实行下列各项必要的步骤与方法：

甲、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

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停止进攻红军与侵犯苏区，取消经济封锁，并承认经过单独协商，一方面调动进攻红军之部队离开现在区域开赴抗日战线，一方面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根据地，给以必需的军械军服军费粮食与一切军用品供给兵员的补充，以便红军安心对日作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经过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红军不向国民党部队攻击，承认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之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担负一定之防线与战线。

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改革现行政治制度，撤废一切限制民主权力之法令，允许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惩办汉奸与亲日分子，释放政治犯，释放已被逮捕之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之言论与行动，承认在全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召集根据普选权选举的全国国会时苏维埃区域选举代表参加此国会，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丁、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在全中国未召集与民主政府未建立之前，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召集基于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举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之必要，此种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有决定一切抗日救国方针与方案之权。

戊、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迅速建立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及由此机关采取真正对日抗战的一切实际军事步骤之必要。中国国民党承认，红军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有选派代表参加全国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之必要，并保证该代表等顺利进行其工作；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人员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的领导地位。

己、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之必要，同时对日本以外之其他国家在不丧失领土主权条件下，应保持友谊并取得其帮助。

草案同时主张，两党中央应“各派出同数之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之机关”，并在忠实执行此协定的同时“双方均保持其政治上与组织上之独立性”。10月上旬，该草案正式形成，并很快由中共谈判代表潘汉年带往上海。

与此同时，国民党内上层人物中主张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统一抗日的倾向也日渐突出。宋庆龄、何香凝等于10月下旬正式提出建议书，征求附议签名，得到了孙科、冯玉祥等国民党重要领导人的积极响应。而蒋介石也直接了当地告诉冯玉祥，关于同中共关系问题，他已考虑很久。在他看来问题主要有三点：

（一）人的问题，“这好解决，从前大家在一桌子吃饭，一屋子开会，现在变成对打的冤家”，“如妥协成功，仍在一起对外，并无不可”。

（二）党的问题。“这好办，待我们实行宪政时，各党派都可参政，共产党当然不能例外”。

（三）军队的问题。“这是最不易解决的问题，谁敢去领导他们的军队

呢？何况现在他们不答应改编，我想还是送他们到外蒙古去吧！”

蒋同时还希望冯玉祥和其他人能够想到办法，使红军“能够服从统一与服从领导”。

显而易见，国民党内部这时是存在着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气氛的，而对于蒋介石说来，问题的关键只是在于军队，军队问题如能解决，其它问题都是次要的。

11月初，陈立夫等人受蒋旨意四处找潘汉年谈判。8日，潘由沪到宁，而陈已由宁飞沪。经张冲安排，潘复于当晚乘车返沪。10日，陈立夫终于在上海沧州饭店与潘汉年开始了正式的商谈，据潘汉年的报告称：

十日晨抵沪，在沧州饭店与陈晤谈，并将周致陈及蒋的信顺便亦文他。陈问我代表周个人或代表“中共”，我给（说）代表整个苏维埃与红军来与南京政府及中央军谈判，并非代表任何个人。陈请我先将我方原（愿）合作之条件告诉他。我乃根据那修正草案讲了一个大概，问陈南京对我们提议有何意见，陈于是着重声明代表蒋委员长作一答复：

第一，既愿开诚合作，我就好有任何条件。

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

第三，目前可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材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

第四，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

潘当即表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请问陈先生，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的均非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为甚目前有此设想！”这样来磋商合作条件，恐“尚非其时”。陈则表示：在目前这种条件下谈判确实一时难于成就。但他认为，如果周恩来能全权代表军事出与蒋先生面谈，保留的军队数目尚可商酌，如从3000扩大为1万之数。考虑到双方立场相差太远，潘不再与之谈整个解决的条件，转而提出：能否先谈停战问题？然而陈立夫断然否定，称：这决无可能，因“能否停战，蒋先生意思要看你们的军事问题能否接受来决定，而军事问题双方谈了必须负责，因此必须双方军事直接负责人面谈”。

11月11日，潘汉年将与陈立夫的会谈情况电告中共中央。12日，中共中央复电潘汉年，对于国民党方面谈判条件突然变得如此苛刻感到不解，要求潘汉年弄清楚“南京对红军究能容纳至何限度”？中共中央电称：

据张子华谓，曾养甫云：

一、党可公开活动；

二、政府继续存在；

三、参加国会；

四、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党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个别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

为一致对外，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照曾谈原则协定。但目前彼方条件却与此大相径庭，周恩来出动也无法接受。

### 一夜之间坐到谈判桌前

在10月底，红军为实现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军事援助的战略计划失

利了，中共军事上正感到十分被动。此时对两党谈判希望颇高。故中共中央这时在谈判条件上不能不作出远比《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大得多的让步，甚至准备同意“个别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然而，国民党方面在接到中共中央给潘汉年的电报后，却很明确地否定了张子华转达的条件。陈立夫在 19 日与潘汉年的谈判中称张子华所说四条“纯属子虚”，并再度重申 10 日所谈的原则，说“蒋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潘汉年报告说：

（陈立夫）说蒋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并要我把蒋所提收编办法打电给里面。我初表示拒绝。我说：前电并未提及条件，已答复周不能出来，如把蒋所提告他们，则连我与你们的谈判也无从进行。我又提议，先谈暂时停战办法，以便双方军事长官可就近面商一切，他们则表示，如军队条件不先解决，无从停战。并讲了一大套关于日德协定，东西两国反苏联的紧张，如中国红军过分要挟，说不定中苏关系可变为恶劣，因日德正在接蒋先生加入反苏联阵线，那时对红军岂不更糟糕……等混话，我简单的提出：反苏联与否，职责在南京，与红军无关。我们可以讨论的是如何一致对日，联俄是我们对中国抗日反帝的主张及认为中国可以抗战的唯一出路，如蒋先生要加入反苏阵线，当无抗日之后方，则我们所谈均属无谓。他表示：我们当然不希望中国加入反苏阵线，正因此更希望红军方面能为民族国家捐除成见。我乘机将预先抄好的那合作草约交他，表示这是我们共产党对民族国家最负责、最尽职的意见，可供你们对我们希望合作的参考。如双方合作意见之接近，则不难成就，否则我们希望南京能顺从舆情，坚决实行抗战，恐成泡影，则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对立更无从停止，日本势必乘机大举进攻，蒋先生所得所失不可不预为设想。……

养甫先生转告我们关于合作办法，关于军队一点离我们所提原则尚远，今蒋先生所提较养甫先生所讲更远，这从何谈起？请一再（再作）考虑。他说，张子华所述养甫意见，纯属子虚，蒋先生并未与第二人讲到关于与你们谈判的条件，想系张子华一面之辞。至此，谈话不能继续，我声明晚车回沪。如必要时可再邀面叙。

显然，陈在前往洛阳面蒋说明情况之后，并没有能够改变蒋介石的想法。尽管张冲当晚 10 时又去找潘，对他说：上次所提红军保留 3000，说的是目前保留红军番号 3000 人，其余的红军部队均由南京方面编遣。但张冲却不能解释为什么蒋要如此安排。他只是说：“坚持 10 日所谈原则，实在是蒋先生的意思，陈先生个人也是左右为难。但他相信，如果周恩来能与蒋先生亲自面商，条件或有松动的可能，而且蒋先生也是坚持要求周恩来出来谈判的。据此，潘汉年当晚通过南京国民党方面的电台电告中共中央：

据陈先生转达蒋先生意见：

- 一、红军可缩编至三千人，其余由宁方编遣；
- 二、师长以上官佐由宁资遣出洋考察，半年后回国按材录用；
- 三、可派代表参加国会及各军政机关工作，但须先由我方提出适当名单，由彼酌量任用。

如以上各点能解决，至释放在狱之共党及以后停止逮捕共党等。当不成问题云中共中央在 11 月下旬接到潘汉年的这一电报，随即接连两电潘汉年，拒绝派周恩来前往谈判，并明确表示：

国共十年对立，今求联合，完全是也只能是为了对日抗战，挽救中国子危亡地位，在当前则尤为保卫华北与西北，抗拒日寇进攻而有停止内战共同

救国之迫切需要。彼方之同意谈判，其出发点当亦不能外此。

然如皓电所言，殊不见有任何之诚意，无诚意则失去谈判基础，只好停止以待他日。

中共中央决定，先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酝酿一处，发动一处，到处响应，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在蒋尚有“围剿”红军之可能时，彼方必然步步进逼，要价日增，“此时实无谈判之余地”。

12月初，陈立夫与潘汉年再度谈判。陈立夫终于表示了一些让步，同意红军大部不由军方编遣，但只同意保留30000人，并坚持其它各点，对此中共中央再度表示拒绝，并决心不惜以战争求和平。

12月12日，由于蒋介石决心推行大规模的“剿共”军事计划，终于迫使早与中共秘密结盟的张学良、杨虎城等发动了西安事变，一举扣留了亲临西安督战的蒋介石等人。西安事变的爆发，使蒋介石计划的大规模“剿共”计划和把红军赶往外蒙边界的设想，一时间再无实行的可能。而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的公开结盟，更使蒋迅速以强大实现其统一中国的方针受到致命的打击。国共两党最高层的谈判在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发生了。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先后与宋子文、宋美龄进行了直接的商谈，会谈虽然没有直接讨论到改编的意向和大致时间，以及南京方面通过张学良解决红军今后一时期的给养问题，从而正式承认了和平改编的原则。潘汉年与陈立夫几次谈判不能解决的停战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自然，蒋也如愿以偿地见到了周恩来，双方就最终确定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达成了共识，审时度势，蒋介石当着周恩来的面，同意在“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的条件下，“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于是，自1935年底至1936年初开始的国共两党秘密接触与谈判，在经历了众多的周折几近夭折之际，竟于一夜之间达成了正式妥协。南京方面终于放弃了以武力摧毁或驱赶共产党到外蒙边境去的计划，坐到谈判桌前来，用政治方法来解决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了。

### 西子湖畔秘密会谈

1937年的3月下旬，周恩来由陕北秘密抵达上海，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代表潘汉年会合，再由沪乘车来到杭州。这两位被誉为“谈判圣手、外交长才”的中共代表急赴西子湖畔，当然不是为游山玩水，而是要与蒋介石进行一场关系到国共合作、民族危亡的秘密会谈。

“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曾以中共的全权代表身份置身于这个巨大风暴的中心，斡旋于矛盾各方，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在西安，蒋介石对周恩来许诺：“我再不打内战，以后你可来南京与我谈。”但在张学良送蒋被扣以后，周恩来如果再去南京，蒋介石能否遵守信义，已使人感到难以放心。故毛泽东度电指出：“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因此，“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应该欢迎“张君”（即张冲）到西安与恩来协商。”

然而，西安会谈历时月余，终因国民党内顽固派的阻梗而成果甚微。所以，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由他向国民党方面“申明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于是，经潘汉年和张冲多次磋商，终于促成了周恩来和蒋



介石在杭州西子湖畔的这次国共最高级别的首次会谈。

西湖会谈事关重大而又极其机密，谈判地点便选择在“一角夕阳藏古洞，四围岚翠遥接村”的烟霞岭上进行。周恩来抵抗的次日，在烟霞洞旁的烟霞寺里，“校长”蒋介石与昔日的黄埔同事周恩来握手寒暄，对阵而坐，他们身旁各有一个干练的助手：“中统”干才张冲和“江南才子”潘汉年。

在“西安事变”之前，潘汉年与张冲已经有过秘密接触。那是1936年4月的一天，上海《申报》忽然刊出一则醒目的寻找“伍豪”的启事，要他见报后务必在5月5日去新亚酒店廿号房间，与落款者一晤。“伍豪”是周恩来早年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时的代名，而启事则是国民党“中统”干将张冲奉命刊登的。几年前，张冲为蛊惑人心、制造混乱，也曾在《申报》炮制过臭名昭著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被中共及时识破，“伍豪之剑”立刻出鞘，刺穿了张冲一伙的卑劣阴谋。不过张冲此次所为却是出于民族大义，为国共合作计，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了。经过一番曲折，潘汉年终于与代表中共及周恩来和张冲联系上了，开始了秘密交往。“西安事变”时，张冲作为蒋介石的随行人员也被羁押，而潘汉年则在南京活动于宋美龄、宋子文之间。这次他们又分别作为国共双方高级人物的助手坐到了谈判桌前。

谈判开始后，周恩来单刀直入地表示了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但强调中共拥蒋的立场系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主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决不能容忍投降收编之诬蔑，并提出了中共的6点要求。蒋介石也开门见山，显得很爽快，他同意国共两党重新合作，表示无论如何也决不再打红军。但紧接着他又提出：“中共不必说同国民党合作，我希望你们只是同我个人合作，永远合作……”

对此，机敏的周恩来已洞悉蒋的内心，看穿了他的真实意图在于“领袖问题”。

中共承认蒋介石是抗日领袖，但并不意味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在根据地、政权、军队等问题上中共享有充分的自主权。据此，周恩来和潘汉年不卑不亢，据理力争，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谈判陷入艰难之局。

此后的一周，双方易地再谈，几经交锋。周恩来和潘汉年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谈判天赋，显得有理、有利、有节，而蒋介石和张冲理亏词穷而谈不过对方，终于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搞个共同纲领规范两党行动的建议，并商定由周恩来月底回延安后起草这个纲领。“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至此，国共双方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取得了一定的谅解。中共中央对首次国共最高级会谈所取得的结果表示满意，认为“结果尚好”。

西湖会谈期间，张冲始终参与其事，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此后5年，他与周恩来相处甚洽，为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了中共中央的称誉。

### 蒋介石盟弟赴延安

1938年秋的一天，一支由5辆满装慰问品的卡车组成的特别运动队到延安王家坪村后停了下来，早已等候在村口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等高级将领，迎向前去，向慰问队队长、新任国民政府卫生勤务部长金诵盘握手问候。

欢迎队伍中，有不少黄埔学生，他们见老师来了，纷纷争着和金诵盘握手言笑。

朱总司令半开玩笑地提醒大家：“黄埔的校风都到哪里去了？恩来是怎么对你们说的，全忘记了？”

军官们顿时散开了，肩并肩排成了一排，依次出列，向金诵盘敬礼报告。

“学生左权，八路军副总参谋长！”

“学生林彪，115师师长！”

“学生陈赓，386旅旅长！”

“学生许光达，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

金诵盘面对着这些充溢着英雄气概的黄埔毕业生，激动得无法自制，眼圈都红了。这时，周恩来安排完了接待慰问团的事项后，也赶来了，与金诵盘紧紧拥抱在一起，所有的感慨，皆在不言之中了。

金诵盘是孙中山先生当年创办黄埔军校时的重要助手，因对官场的厌怠，脱离政界多年，潜心从医。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碍于盟兄蒋介石的情面，重新出任国民政府的卫生勤务部长，决心为抗日竭诚尽力。

当金诵盘偕家人离开上海，抵达陪都重庆的当天晚上，蒋介石设宴为他接风。

饭后，蒋介石便开腔道：“诵盘，我们是兄弟，所以，别人办不好的事情，唯有请你出马。”

金诵盘笑笑说：“反正介兄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你的饭可不好吃呵！”

蒋介石瞅他一眼，也随之笑了起来：“我想让你出趟公差去延安，慰问八路军的伤病员……”

原来，国际救援组织将救援物资运到重庆，为了表示姿态，蒋介石决定派金诵盘去给八路军送慰问品。

正式欢迎仪式开始，朱德致欢迎词，金诵盘的答辞，是他离开重庆时，由陈布雷起草，蒋介石圈阅认可的。

在随意的交谈中，金诵盘悄悄对周恩来说：“我这次来延安，很想见见毛泽东先生，你能替我安排吗？”

“我已安排好了，毛泽东先生要请你吃饭。”

金诵盘感动得只知连连道谢。一直想见毛泽东的愿望实现了！可一旦见了，却不知说什么好。毛泽东亲自打开了一瓶汾酒，先给客人斟满了一杯，又给周恩来和他自己各倒了一杯。他举杯起立祝酒道：“为国共合作，为早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也为金先生的身体健康，干杯！”

金诵盘举起酒杯，恭恭敬敬地说道：“毛先生，能够认识你，真是三生有幸，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万事如意，永远顺利！”三人碰杯之际，周恩来说：“诵盘兄，你祝毛先生永远顺利，让蒋介石晓得他可要不高兴了。”

“恩来兄，你是了解我的，我虽然与蒋介石相识多年，私交甚好，但是在他搞分裂，与共产党为敌的时候，我辞官不干，在南京、上海又做起挂牌医生，如今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我才重入军界。因为我心里始终装着一杆秤，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和他亲自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金先生作为国民党的元老，能够如此清醒明智，真是令人敬佩，这也正说明国共合作是深得人心的。”毛泽东边说边请金诵盘举筷。

周恩来说道：“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呵！”

金诵盘颌首表示赞成，他想想又说：“我总是在想如果国共两党能够团结得像亲兄弟，那么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毛泽东说：“这要靠大家的努力。”

饭后，金诵盘提议道：“毛先生，我们三人合个影好吗？”

“好啊！”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

结束了延安的慰问之行，金诵盘率团回到重庆。一下飞机，他就感到气氛不对，在机场迎接他的，既没有国民政府的代表，也没有一个新闻记者，只有自己的部下。卫生勤务部次长告诉金诵盘：“侍从室来电，要金将军一下飞机就去德安里见委员长。”蒋介石见了金便沉思着说：“我们俩情同手足，所以有话还是挑明了讲好。你现在是党国的重臣，不是普通的挂牌医生，你的一言一行要谨慎小心，千万不可感情用事。”

“你对我的延安之行意见很大，对吗？”金诵盘也毫不回避地问道。

“我让你去慰问八路军伤病员，没有让你去与共产党的头目会谈。”蒋介石冷冷地说。

“毛泽东是延安的主人，我去那里能不拜访他吗？”金诵盘毫不相让，“介兄，毛泽东并不像你认为的那么可怕，如果你与他面对面坐下来，开诚布公地谈谈，大家都会少流很多血。”待蒋走后，金诵盘独自去书房里抽闷烟，他实在不明白，蒋介石为什么像孩子似地反复无常？他为什么在口头上谈国共合作，而在行动上又如此惧怕共产党……

## 和谈密使再临大陆

其实当初的蒋介石并不害怕共产党，一贯相信武力的他，深信在这一方面共产党远非是他们的对手。但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领袖人物，也比别人更了解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和官员的腐败，而在这方面，共产党恰恰显示出了极大的优势。蒋介石惧怕自己的人与共产党接近，因为他们很快就会被“赤化”。蒋介石欣赏共产党的组织性，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一直把共产党作为心头之患，欲除之而后快。

以后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当初的“惧怕”并不是没有道理，这不，腐败的国民党终于丢掉了大陆，如今，他只能以“败兵之将”的地位与共产党言和。

蒋介石经过近一年认真考虑后，于1957年初突然召许孝炎回到台北，在“总统府”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蒋介石说：“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因，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往北平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让许孝炎推荐。

许孝炎考虑再三后，当即提出3个人选，分别是：曾任“立法院院长”的童冠贤、秘书长陈克文，现任“立法委员”宋宜山。蒋介石反复权衡后，选中了宋宜山。

蒋介石为什么选中宋宜山呢？

第一，他是蒋介石的学生，经过长期考验，是忠于蒋介石的。自南京中央党校毕业后，派往英国留学，归国后一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国民党撤退南京前夕，出任中央组织部人事处长。

第二，宋当时是台湾为所谓“中央民意机构”代表的“立法委员”，国民党党候补中央委员，身份比较灵活，官式意味较轻，蒋介石不愿意派一个官式身份过重的人前往。

第三，宋的胞弟宋希濂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被解放军俘虏后，关在战犯

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到北京去，万一被人发现，可以说是去探亲。

第四，宋宜山为湖南人，而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等以及中共派往香港活动的章士钊，也都是湖南人，对话比较方便。

宋宜山经过认真准备后，于 1957 年 4 月成行，自香港，经广州乘火车到达北京。章士钊、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等到车站迎接。第三天，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有名的饭店东兴楼宴请宋宜山并与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随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出面，就第三次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的一些具体问题与宋宜山协商。李维汉提出：

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

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权；

台湾地区的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

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李维汉还表示，国共两党可先在香港进行谈判，如能实现，他将率团前往。对此，宋宜山表示愿回台湾后，要为促成两党谈判而努力。

宋宜山在北京期间，还在章士钊、唐生明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工厂、农村，游览了故宫、颐和园，并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望了他的胞弟宋希濂，宋宜山见弟弟在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生活都很不错，也十分放心。

当时，反右斗争尚未展开，大陆正广泛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又加上号召和平统一祖国，整个政治气氛和社会面貌，显得很有生气，给宋宜山以欣欣向荣的印象。

5 月份，宋宜山回到香港。根据自己此次大陆之行的印象，写了一份 1.5 万多字的书面报告，由许孝炎转呈蒋介石。在这份报告中，除叙述了与周恩来、李维汉见面、商谈的详情及中共提议外，还描写了沿途及北京各种见闻，包括农村平畴绿野、丰收在望的景象和工业生产蓬勃发展，市场供应无缺的情况，把共产党治理下的中国大陆写得很有有一番新气象。还说，“我以为，中共意图尚属诚恳，应当响应，大陆从工厂到农村，所到之处，但见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民众安居乐业，与蹒鱼水相依。以前提的‘反共复国’，似已无望。”

报告送上去之后，蒋介石越看越生气，不等看完，就把报告往桌子上一摔，说：“娘希匹！他把共产党说得那么好，半个月就被赤化了”。吩咐人告诉宋宜山，不必回台湾了，就留在香港算了，将“立法委员”的新的每月寄给他。

就这样，蒋介石派往大陆的第一个和谈密使被他给搁浅在香港，蒋介石也拒绝了中共中央一系列和平统一祖国的提议。一次本来很有前途的和谈刚起步又中止了。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呢？主要还是放不下“正统”的架子。一看叫自己成为地方自治区便火冒三丈。宋宜山对自己那份报告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有所准备，但他仍直言相告。这种为中国统一大业敢于探索的志士，值得人们给以敬意。

## 第二节 中美日内瓦会谈

### 王炳南出任中方首席代表

就在海峡两岸进行秘密接触的同时，中美之间一场以台湾问题为主要内容的会谈也在日内瓦进行。

1955年7月底的一天，美丽的华沙阳光灿烂。出任才3个月的王炳南大使和使馆的工作人员一块，正在郊外野餐。郊外的景色宜人，那一片片绿色的小树林和原野，让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大家正坐在一起谈笑、聚餐……

当地时间中午1时许，机要秘书送来了外交部的一份电报。

这是一份发往驻英代办处的电报，内容是说，美国通过英国方面的斡旋，向中国建议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这个电报加抄驻华沙使馆，王炳南读了电报，心里有些纳闷，为什么发往驻英代办处的电报要加发到华沙使馆来？在旁边的使馆人员议论纷纷，他们猜测是不是要让王大使去参加会谈？王炳南自己倒没往那儿想，因为日内瓦会议后，王再没有管过中、美关系问题了。

王炳南，1908年1月1日生于陕西省乾县好畸村。1925年初，他在家乡三原中学读书时加入共青团，第二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乾县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组织领导了农民群众开展抗粮抗税的斗争。由于从事革命活动，为反动政府所不容，家乡呆不下去了，1929年，王炳南由父亲的歃血之交、西北军爱国将领杨虎城资助出国，到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同时组织在法德等国的中国留学生建立抗日小组。

王炳南在柏林学习工作了5年。他结交广泛，朋友遍及德国各城市，有产业工人和学生，也有科学家和革命家，包括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1936年，王炳南与他在柏林大学读书时的女同学、哲学博士安娜利泽在伦敦结婚，安娜利泽随夫姓改名为王安娜。新婚燕尔情意绵绵，但为了革命，他们不能不毅然离开新居——1936年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王炳南回国，做争取杨虎城将军和17路军抗日的统战工作。

1936年3月，就在王炳南夫妇回到西安的当夜，甚至还没来得及走进家人专门为他俩布置的新房，便被急切想见他的杨虎城将军请去，执意让他俩搬进“官邸”住下。经多次密谈，杨将军委托王炳南为他物色人才，帮助他改造部队。王炳南成了杨虎城的“忘年之交”。当杨虎城为躲避蒋介石令他“剿共”到上海“治病”时，就接二连三发电报让王夫妇迅速赶往上海。在上海，经杜重远介绍，王炳南又与张学良将军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成为张、杨之间沟通意见，携手团结的牵线人。1936年11月，杨虎城返回西安不久，急电王炳南速返西安议事。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到止园找杨虎城密商应付时局的办法，对杨说：“王炳南不是在你这里吗？找他来商量一下吧！”杨说，“他这个人思想激进，主张扣蒋。”张高兴地说：“这也不能不说是个解决的办法，看来只好如此了。”由此，两人彻底公开了各自的想法，具体商谈了扣蒋的部署，于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天早上，杨虎城就叫卫兵通知王炳南去开会，认真研究下一步的对策。

西安事变期间，王炳南协助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做了大量工作，毛泽东和朱德亲笔致信予以赞扬……过了几天，外交部来电正式通知他担任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首席代表，美国方面则任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

为谈判代表，真是巧合，日内瓦会议上会谈的两个对手，将再次交手。

王炳南接到这个通知后，心情并不轻松，甚至有些忐忑不安。虽然说，他已经参加过日内瓦的中美代表会谈，但毕竟当时身旁有一个阵势雄壮的代表团，有许多有经验的“干将”出谋划策，特别是那时他在总理身边，亲聆教诲，一言一行都可以得到总理的直接指导，凡事都可以依赖总理。现在他独当一面，虽说可以随时与国内和总理联系，但总是远离了祖国，有许多情况，要他自己拿主意，自己去分析、判断，并积极向国内提建议，也要善于随机应变，不能有一点差错，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仅关系重大，而且情况复杂，举世关注。它像千斤重担压在他的肩头。

当然，他也想到有利的一面。外交部为了这场大使级会谈专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负责研究会谈中的对策。组长是章汉夫，副组长是乔冠华，秘书长是董越干，另外还有龚澎、浦山、王保流等，是一个人材济济的智囊团作他的后盾。而且可让他放心的是，这个小组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当时被人们称为“秀才”的乔冠华担负具体工作。从他个人来说，他在30年代就和美国人打过交道，他熟悉美国人的思想、作风和处事的方法。事后，他曾听贺龙说起，中央最先选择谈判人选时，不光是他一个，正是考虑到他有从事10年外事工作的经验，和美国人打交道的时间长，比较熟悉他们，才最后确定由其担任谈判代表。

说起王炳南与美国人打交道，引起他对抗战时期外交工作的回忆。确实，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人交往，并非始于它成为新中国的执政党，而是开始于抗日战争时期。那时周恩来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党在国统区的工作。1938年为适应宣传我党抗日政策的需要，成立了直属南方局领导的对外宣传小组。这个小组由周恩来领导，由他具体负责，组员有王炳南当时的妻子安娜利泽、毕朔望、许孟雄等人。这几个组员都精通英语。小组的任务是向外翻译毛泽东的著作、抗日文章及八路军的战报。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写的《论持久战》等著作最先就是由他们这个小组翻译的。他们积极宣传党的统一战线主张和解放区的成就。

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国共双方合作还比较顺利，对外宣传小组的工作就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他们在武汉同艾黎、斯诺、史沫特莱商定建立了全国工业合作社，并安排白求恩、印度医疗队等去延安。正是在那个时期他们小组开始了同美国人的接触。当时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史迪威将军、海军陆战队卡尔上校、美国总领事等人都同他们有频繁的交往。这些工作当时没有受到国民党的干涉和限制。

## 中国人又抢了“主动”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消息一公布，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各国的重要报刊，几乎都把这件事作为头版头条新闻，并对此作了许多评价和预测，其中也不乏对王炳南个人历史，与周恩来的关系，甚至私生活的介绍。他一时成了报刊上被人评头论足的新闻人物。

他抵日内瓦的那天，抢新闻的记者们都蜂拥到车站来了。一下火车，他和代表团成员就被团团围住。

王炳南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他说：“中国人民一向对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想和美国打仗。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中，早已经提

到说中美应该用谈判方式来缓和目前的紧张情势。如果双方都有一样的诚意，我相信这次会谈，不仅是遣返侨民问题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而且对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情势也会有所贡献。”

当时中美双方对会谈的议程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一开始就有很大的距离和分歧。我方认为，会谈应着重讨论台湾问题以及安排杜勒斯国务卿和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的直接会谈和建立两国的文化联系等一些实质性问题。美国则想先要回扣押在中国的美国人，并要求中国保证不对台湾使用武力。最后，为使会谈先开起来，我方便同意先谈遣返侨民问题，然后讨论其他实质性问题。

第一次会谈确定于8月1日下午在国联大厦一个小会议厅里举行。这个会议厅以前是国联理事会主席办公室。会议厅中央放着一张很大的椭圆形会议桌，陈设简单，气氛庄严。

王炳南和参加会谈的李汇川、林平等同志提前到达会场。据新华社记者说：在“记者之家”的酒吧间早已喧闹开了！

原来，有些记者已经收听到中国政府将在第一次会谈中宣布释放11名美国间谍的消息。这个消息使新闻界因为中美会谈而激动起来的情绪更加高涨了。有个美国记者听了此消息，禁不住脱口说：“呵，中国又抢去了‘主动’！”在旁的一些外国记者不无嘲讽地对这位美国记者说：“美国何尝不可采取‘主动’，比如美国国务院紧跟着发表一个声明，宣布撤退保护蒋介石的第七舰队，对远东国家采取友好态度。这样不就把谈判的主动权抢过来了吗！”

在会谈时先宣布释放11名美国间谍，这确实是周恩来为这次会谈创造的良好开端。当时王炳南的想法是不如先谈后放人，但从这第一步的实际效果来看，是很成功的，使国际舆论很快认识到中国对会谈是怀有诚意的，也是积极的，人们的感情也很快倾向于中国。

当王炳南一行步入会议厅时，许多新闻记者都友好地向他招手致意。约翰逊大使迟到了几分钟。陪同他的有美国国务院事务专家克劳。双方坐定后，镁光灯不停地闪亮，所有的记者都在照相。这些照片和摄像在中美交往的史册上留下了痕迹。记者们退席后，会谈正式开始。

王炳南首先宣读了中国政府释放美国11名间谍的声明，约翰逊向王炳南表示了谢意。接着便先商谈了会谈议程。

不知是因为中方宣布了释放美国间谍，还是因为王炳南和约翰逊已经熟识，这次会谈的气氛是轻松愉快的。以后，王炳南听说，杜勒斯曾嘱咐约翰逊在会谈中要忍耐，避免出现板门店谈判时那种硬碰硬的做法，要想办法维护住和北京的这种联系，会谈不能破裂。杜勒斯在这次会谈前曾说，如果中美代表能谈上三个月，他将很高兴。

第一次会谈比较顺利。最后双方达成会谈议程的协议，一是遣返双方侨民问题；二是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同时确定第二天上午继续举行会谈。

## 旷日持久的遣返侨民谈判

第二次会谈只进行了1个小时就结束了。双方提出了遣侨名单。在中方提出的名单中就有钱学森的名字。6月间，钱学森在一封给国内的家书中夹带了给陈叔通副委员长的信，信里要求政府帮助他早日回国。周恩来见信后

立即转给了王炳南。王炳南便就钱学森的归国问题向约翰逊提出交涉。约翰逊曾狡辩说，没有证据表明旅居在美国的中国人想回去，王炳南立即举出钱学森的例子批驳了他。他还提出授权印度作为第三国关照在美国的中国公民的利益。

约翰逊提出休会一天，以便他请示国务院。第三次会谈定于8月4日举行。

在第三次会谈中，约翰逊一开始便要求我方立即无条件地让所有在中国的美国人离境，以便为进入第二项议程——其他实质性问题的讨论扫清道路，王炳南认为如何处理美国在华被押人员问题是会谈的内容，决不是继续会谈的条件，因此王炳南在郑重地重申了中国对遣返中国留学生和侨民的立场同时，提出美国必须立即释放所有被无辜监禁的中国人，使他们有机会返回祖国。这时约翰逊已不再提扣留技术的中国人是美国的法律，可见美国的法律也并不是丝毫不可改变的，它也要为政治需要服务。

以后，我方的会谈就遣返侨民问题反反复复地进行了多次。约翰逊代表美国政府顽固地要坚守他们所谓的对华政策最根本的一条原则，即是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美国政府总要敏感地联想到是否会形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像和结果。凡是涉及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问题，约翰逊就和王炳南兜圈子。例如，王炳南提出授权印度驻美大使馆照管中国侨民，他始终不能同意。因为他认为，这就等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居住在美的侨民负有合法的领事权利，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主权国家，排除了台湾当局。这是美国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

单就这样一个问题，我方就经过了好几个回合的斗争。我方充分摆理由，摆道理，最后约翰逊显得有些词穷，经他请示杜勒斯后，被迫接受我方授权印度作为第三国关照在美侨民的意见，但又在“授权”两个字上作文章。约翰逊说，不能用“授权”两个字，只能用“邀请”，他认为这样就减少了中国的合法性和法律责任，而且还无理提出对印度大使馆的授权要严格限制在只调查那些真正想离开美国的中国公民。显然在这样的限定条件下，美国是大有空子可钻的。美国还可以对这条特定条件作任意的解释，这当然是不能同意的，我方断然予以拒绝。这样，会谈虽进行了近10轮，却迟迟无法取得积极成果。

王炳南在会谈开始后不久，就意识到原来他认为开几次会就能解决问题的想法是不现实的。看来，这场会谈将是十分艰难和旷日持久的。那些抱着乐观希望和追逐有新突破的记者们，总是在会场外焦急地等待消息。开始时，我方代表一走出来，他们便兴致勃勃地抢着围拢来，争先恐后地提出问题，可是我方的简短回答总是没有提供令人兴奋的新消息，后来他们几乎一看王炳南和约翰逊的脸色就泄气了。他们开始怀疑会谈能不能有成果，会不会中断，对中美会谈前景感到失望和悲观的论调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报端，记者们的热情也渐渐冷了下来。经过11次这样的会谈后，大约到8月底，会谈从每周举行三次减少到每周一次，温度显然降低了。

到这个时候，会谈实际上程序化了。王炳南和约翰逊轮流照本宣科。当然有时也会出现你来我往的答辩，这就要靠反应灵敏，要看善不善于抓住对方谈话的漏洞了。约翰逊是一个老练的、知识面广泛的职业外交家。也许他严格遵守了杜勒斯的嘱咐，在辩论中从不失礼，不用尖刻的语言进行还击。



在最难受和尴尬时，他也不过就是红一红脸，多抽几支香烟。

我方也始终彬彬有礼。我方的立场是坚定的，态度是严肃的，但言谈有理，举止沉着，保持着文明讲理的外交风格。

双方的助手从不在会谈中发言，但他们有时递张条子，写上意见，或耳语几句。李汇川和林平都在会谈中给予王炳南许多有益的建议。

有意思的是，双方在会谈桌上非常严谨，互相守住一条防线不放，会下却时常有些有趣的事，甚至是友好的私人交往。周恩来指示王炳南要大胆地同约翰逊进行私下接触。约翰逊也取得杜勒斯的同意，可以和王炳南进行个人交往。

## 谈判对手的私交

在会谈僵持不下时，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双方有时就互相邀请吃饭。在正式场合不便说的话，私下可以磋商，交换看法，摸摸底，甚至还可能有点突破。记得这还是约翰逊首先开头的。他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想了解我方的态度，又要避开记者的视线，便在一个僻静的山上找了一个别墅，悄悄地邀请我方代表去吃饭，在饭桌上解决了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后来为了同样的需要，经请示总理同意后，王炳南也在同一地点请约翰逊吃饭。几年后，周恩来还风趣地问到王：人家请你吃饭，你有没有回请？周恩来就是这样，事事都十分精细，在外交上非常讲究礼节。还有一次，我国的京剧团到日内瓦演出，王炳南邀请约翰逊和他的助手们来看戏。他们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但一再叮嘱说，要保密，不要声张，千万不能让记者知道。看完戏，约翰逊称赞道，“这是中国古老文明的艺术表现，是美国没有的。”

当时华沙到日内瓦之间没有直航飞机。王炳南每次去日内瓦会谈都必须提前一天先到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去换捷的飞机，然后从布拉格经苏黎世换瑞士飞机去日内瓦。到了布拉格，他常常和约翰逊相遇，同坐一架飞机，回来时也一样。有时因气候不好，飞机不能起飞，他们便在苏黎世过夜，王炳南和约翰逊一同被安排在一家旅馆住宿。旅途中，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双方从来不谈公事。王炳南的英语马马虎虎能凑合一些，约翰逊也能讲几句简单的中国话。他们俩便连汉语夹英语随便聊天，这种时候总是轻松愉快的。当时瑞士政府对中美会谈在日内瓦举行是十分重视的，曾指示机场领导要特别照顾我方，因此在苏黎世机场上下飞机时，机场场长对中方代表非常客气，每次都亲自前来迎送，而且陪同中方到贵宾室休息，还招待喝咖啡。

后来由于一架飞机失事，约翰逊便不敢再走这条线了，改从巴黎走。失事的是一架从苏黎世起飞的大型捷克斯洛伐克的飞机，还载有从拉美演出后回国的中国演员，没想到飞机上天不到5分钟就爆炸了。王炳南原来也订了这架飞机的座位，因故晚走了一天，才得以幸免。还有一次飞机起飞后发生故障，降落在慕尼黑。联邦德国当时和我国没有外交关系，王炳南只好同全体旅客一起坐在机场休息室里等候。这可急坏了在伯尔尼的中国大使馆，冯铨大使非常担心，怕他会出什么事。他为了让联邦德国政府知道王炳南因故到慕尼黑的机场，就故意直接打电话到机场找“王大使”，结果候机室的旅客都惊讶地盯着王炳南，闹得满城风雨。闻讯而至的记者们更是互相传递消息：“中美会谈的中国大使到了慕尼黑！”可见中美接触影响之大。

## 十五年会谈中唯一达成的协议

为了使中美会谈不在一个问题上纠缠，更快地进入实质性会谈，国内对在押的美国人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核实和处理，王炳南接到国内指示，于9月10日向约翰逊宣布，中国有关当局对在华的12名美国人的复查已经结束，他们可以获准离境，在其它一些具体问题上，由于我方也作了一些适当的让步，从而使这一段反反复复在原地踏步不前的会谈有了进展。

中美双方终于在9月10日的会谈中达成了一项协议，也是15年会谈中唯一达成的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

不难看出，这是在互不承认的情况下，处心积虑搞出来的一份奇怪的联合公报。在公报中既要体现互不承认，又要体现双方的一种共同意见，还要体现双方的联系，于是就别出心裁，搞了这么一个各说各的“杰作”，叫作“协议声明”，英文为 agreement announcement，以后尼克松和周恩来达成协议发表的上海公报也仿效了这种形式。这份协议同时也是1972年的上海公报发表前的唯一一份中美之间达成的正式协议。王炳南至今读来都能感觉到这份协议上每一个字的份量。

至此，关于遣返侨民问题暂告一个段落。

五十年代末，周恩来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方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 美方采取敷衍态度

9月20日，双方又开始会谈，王炳南认为侨民问题已经达成了协议，第一个议程可以结束了。中美大使级会谈应该进入第二项议程，即讨论其他实质性问题。但是，他没想到，美国在第二阶段的会谈中采取了极为敷衍的态度，并且不断在第一个议题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上纠缠不休，以致使会谈拖泥带水，几乎是寸步难行。

王炳南在早些时候就已经提出了第二阶段双方所要讨论的实质性问题，即台湾问题和周恩来总理与杜勒斯直接会谈问题。王炳南一再指出，只有通过外长级会谈的切实可行的途径才能实现解决美国军队撤出台湾，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等这样严重的问题，并讨论两国建立文化交流、贸易关系等等。

由于直接涉及到台湾问题，因此这第二个议题比第一个侨民议题的谈判复杂得多，难度大得多，斗争也就尖锐得多。

10月27日，我方又一次主动就美国提出的双方保证不使用武力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协议草案。我方在这个草案中援引了联合国关于成员国应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条款。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同意，它们应该

用和平方法解决它们两国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武力；

为了实现它们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决定举行外长会议，协商解决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约翰逊拒绝了 this 协议草案。这样，美方实际上一直处于被动地位，这使约翰逊显得沮丧。他不停地抽烟，一轮会谈下来，他的烟缸里塞满了烟蒂。直到 11 月 10 日，美国提出了自己的协议草案，称：

……一般来说，并特别对于台湾地区来说，除了单独和集体的防御外，美利坚合众国放弃使用武力。

……一般来说，并特别对于台湾地区来说，除了单独和集体的防御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使用武力。

这个草案的第一条是荒谬的，美国要求在台湾地区拥有“单独和集体的防御”权利，岂不是要中国政府承认美国霸占台湾的合法地位吗？草案的第二条是无理的，它等于让我们放弃解放台湾的主权。

尽管如此，王炳南在拒绝了美国的协议草案后，耐心地作了又一次的努力。在 12 月 1 日王炳南提出了新的草案。为照顾到美国不愿明确提联合国宪章条款和两国外长会谈，这个草案只提“应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它们两国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威胁或武力”。

美国是没有诚意的，他们不愿认真讨论我方的草案，约翰逊只是一味拖延时间。在这以后的接连三次会谈上，他都拒绝对我方的新草案作任何具体的评论，而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直到 1956 年 1 月 12 日，他才有一个草案提出来。这与上次他提的草案并无二致，即继续要求我方承认美国在我台湾地区拥有“单独和集体的自卫的固有权利”，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美国要求的这种“权利”是我方绝不能给予的。

以上事实证明，我方在第二项议程中一直积极寻求达成共同协议的机会，以使中美会谈能成为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途径。我方提出了积极的合理的建议，但均因美国无此诚意而使会谈停滞不前。这一阶段的会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在 1956 年 4 月到 5 月间，美方提出了一项协议草案，我方提出了一项对案，均未通过。会议仍无丝毫进展。

特别要说的是，在这第二阶段的讨论中，美国还违反了第一个议题所达成的协议，迟迟不提供在美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的名单及情况，并继续刁难他们回归祖国，使印度作为第三国很难开展工作。美国就这样层层设置障碍，甚至不顾已经达成的协议，想方设法来阻拦会谈的进行，王炳南看得很清楚，心里很气愤。美国在这一段会谈中的表演，使他对这个政府坚持反共反华的本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 中国单方取消采访禁令

1956 年，台湾海峡局势继续紧张。一面中美大使级会谈漫无期限地在进行，一面杜勒斯狂妄声称，美国在台湾地区将不惜进行原子战争，恫吓中国人民放弃对台湾的主权。这两手的目的是一致的。但是，正如上述，杜勒斯太傲慢了，他过低地估计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决心。事实上，无论他用什么手法，都不能使中国政府放弃保卫中国人民利益的根本立场。

会谈仍然在继续。王炳南几乎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他和约翰逊常常是

互相读一通发言稿，他提出一些美方侵犯中国领海、领空的抗议，然后交锋几句，最后双方决定下次会谈的日期就散会。

但是，周恩来却运筹帷幄，他在积极思考如何进行新的斗争。指导小组的同志也在出点子、想办法，抓住一切机会，做有利于我方的事情，促进会谈的进展。

1956年8月，犹如夏天的第一声惊雷，全世界为之一震：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而且向美国15个重要的新闻机构拍发电报，邀请他们派记者来华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

美国新闻界和国务院被震撼了，轰动了。要知道，当时美国政府对新中国实行了严格的新闻封锁，不准许任何人对新中国进行符合事实的报道，因此，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新中国是不很了解的，他们渴望知道真情。中国政府的这个决定无疑给美国政府出了一道难题，而美国新闻界却因此兴奋起来，那些接到中国政府邀请的美国记者更是激动万分，纷纷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访华申请。

狡猾的杜勒斯却按兵不动，他决不愿轻易废除国务院关于不让美国人，不论是一般平民还是记者到中国旅行的禁令。于是一时间美国几乎所有的报刊都一致抨击国务院的这种顽固立场。他们愤怒地说，美国作为一个崇尚个人自由的民主国家，竟对本国人民的旅行自由横加限制，这在宪法上和道义上都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情。

差不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新闻界一直在向美国国务院施加压力。有几名记者不顾禁令，勇敢地冲破封锁，访问了我国。在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美国青年代表团也不理睬国务院的禁令，在世界青年联欢节结束后，他们勇敢地集体来到中国，受到中国人民的友好接待。他们宁愿回到美国受罚，也要到新中国来看看。七十年代末，这些人还联合起来重新到中国访问。这时，他们大都年已半百了。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向往和情谊令人感动至深。

在这种突如其来的形势面前，杜勒斯终于沉不住气了。在权衡利弊之后，美国国务院终于被迫作出了一点让步，以免引起美国舆论反对它孤立中国的全面政策。即使这样，杜勒斯也已经拖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到了1957年8月，杜勒斯悄悄地同美国一些新闻界代表举行了协商。他不得不作了一些妥协，最后宣布，美国将准许24个新闻机构派遣记者到中国访问。在这个事件中，许多美国记者都说，周恩来这一着棋下得很妙，他成功地让美国新闻界去反对美国国务院。

周恩来下这着棋，是希望沟通美国人民与新中国的交往，也让美国记者看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干什么，他们所从事的目标是什么，希望他们能把新中国的真实面貌介绍给美国人民。

同时，周恩来的这着棋也是为了推进中美会谈。同年9月，王炳南在会谈中提出两国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准许记者互相采访的协议草案，遭到拒绝。杜勒斯决不能同意中国派相等人数的记者去美国访问。他说，这些中国记者只有按照美国现行的移民法取得合法资格才能进入美国。周恩来对美国记者的主动邀请和杜勒斯对我记者互访协议草案的强硬拒绝，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周恩来坦荡博大的胸怀，明智的策略赢得了国际舆论，特别是美国人民的高度赞赏。

## 杜勒斯的诡计

9月底，王炳南提出对禁运的协议草案；10月中旬提出对文化交流、人民往来的协议草案；12月初，又提出司法协议草案，均被一一拒绝。

由于美国的这种顽固态度，我方所提出的这一系列的协议草案无法付诸实施。这些建议现在都成了历史文件。回过头来，翻阅这些高高堆积起来的文本，人们可以知道，美国在这一段时间里是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文字上做游戏，企图无限期地拖延会谈。他们对中美会谈的总方针是：拖而不断。

时间在一轮又一轮反复进行的会谈中流逝。到了12月12日，会谈已进行了73次。约翰逊在这次会谈中彬彬有礼地宣布，他将撤出会谈，调任美国驻泰国大使。他指定他的副手埃德·马西接替他的工作。

不难看出，这是杜勒斯的又一个花招，他把参加谈判的大使换成了参赞，想使会谈降级。王炳南当即表示，这种变化是他不能同意的。他也有礼貌地向约翰逊指出：中美进行的是大使级会谈，而马丁先生只是一个参赞，不能代表大使。他说，约翰逊大使，你这样做是很不严肃的。

正像周恩来说过的，我们愿意谈判，并积极争取成果，如果美国不愿意谈，我们也可以中止谈判。我们不愿破裂，但我们不怕破裂。美国如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

正是因为我们对美国采取了这样一种高姿态，使我方在谈判斗争中保持了主动。

就这样，在第73次会谈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了一年。

## 会谈移到华沙

1958年9月15日，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在台湾海峡形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重新开始。王炳南的助手换为黄华和赖亚力，有时姚广也参加，翻译除邱应觉外，还增加了过家鼎，都是几把好手。

会场布置得既简单又考究。四张大桌子排成一个长方形，双方代表分两边相对而坐，代表团团长坐在中间，两侧分别为各自的顾问和译员。一切就绪之后，下午三点正式开会。

波兰外交部礼宾司长请中美代表团入席，王炳南和美国驻波兰大使雅各布·比姆互相点头致意。

比姆也是一位有经验的美国职业外交家，沉着、冷静、头脑清晰。和约翰逊比起来，他缺乏幽默感，通常脸上没有笑容。但他具有学者的风度，像个教授。比姆当时是个单身汉，他到50多岁才结婚，夫人很能干、活跃，善于社交。后来一位熟悉比姆的朋友谈起他，说在宴会上和比姆坐在一起很乏味，但是有他夫人在场就弥补了比姆的不足。在和王炳南会谈前，比姆有过和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谈判的经历，号称有和共产党打交道的经验。虽然他好像不善辞令，不是那种巧舌灵齿的外交家，但也决不是中方代表可以轻视的对手。

王炳南请比姆大使先发言。他一开始就要求中国方面停止对金门、马祖几个岛屿的炮击，他说，美国承认，中美长期以来对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存在着严重争议，美国并不要求任何一方在这个阶段放弃自己的意见，美国的目的是消除可能被对方视为战争挑衅的行动，否则，军事行动将可能扩大。他用呆板的声调说，中美的共同任务是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他的讲话把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责任有意推到中国方面，而且明显地把自己置于台湾的当然、合法的占领者的地位。

王炳南对此早有估计，因此王很平静地反驳他。王炳南指出他无权代表台湾当局讲话，无权提出停火的建议。他向这位新的对手庄严重申：台湾及澎湖列岛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是中国的内政，包括金门、马祖。

华沙会议开始一段时期后，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依旧，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因而会谈又陷入程式化。王炳南每次发言的开场白都要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美国若不放弃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中美之间不可能解决其他问题。

9月30日，在第78次会谈时，比姆提出了一个“声明草案”，后来王炳南听说这是杜勒斯亲自精心起草的，也是他在中美会谈中最后的“作品”。“声明草案”开头用一种平行的格式说明中、美各自对台湾问题的看法，还写上苏联支持中国，接着这个草案进一步说，中国政府应停止对金门、马祖的军事活动等等。王炳南当时没有立即答复他。中方代表团回去后经过研究，一致认为这个“声明草案”没有什么新内容，实际上是用这种“草案”作为掩盖美国继续侵犯中国主权和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活动的烟幕。

王炳南断然拒绝了这项“声明草案”。

此后的会谈几乎千篇一律。王炳南和比姆在互相提防和抑制的气氛下，你谈你的，我谈我的。

这期间，苏联帮助中方代表团架设了北京—华沙的直通电话线。王炳南和周恩来的联系更加紧密和经常。周恩来常常亲自打电话给王炳南，及时发指示，并不断提醒王炳南应该注意哪一方面的问题。

王炳南日后对这个时期的会谈还能回忆起来的一次是，人民解放军对金、马双日停止炮击。有一次会谈正值双日，比姆对此表示高兴，并说希望永远停止炮击。王炳南感到很可笑，他对比姆说，打饱和不打炮是我们单方面行动，与中美会谈无关，会谈应该讨论美国全面地从台湾撤军。

比姆也像约翰逊一样，从不使用恶语攻击。但是他显得比较呆板，不苟言笑。在讲到激动之处，他甚至有些结巴。他的优点是不那么死硬，容易打交道。

在台湾海峡空气紧张时期，双方比较冷淡，很少有什么私下接触。

1959年底，顽固坚持和新中国作对，始终不愿在对华政策上有所改变的杜勒斯终于离任了。但是新上任的赫脱国务卿也没有给会谈带来什么起色。

1960年3月，披着罗马天主教主教外衣的美国人华理柱由于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企图颠覆中国政府，被司法机关逮捕判处死刑。22日，王炳南在会谈中将上述情况通知了比姆大使。

比姆先是惊讶，接着对此提出抗议。王炳南断然将他顶回去，并陈述了华理柱所犯的严重罪行，证据确凿，无可抵赖，有权提出抗议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

在整个华沙会谈期间，美国紧紧抓住不放的问题就是美国在中国的罪犯问题。几乎在每次会上，他们都无理提出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这批罪犯。遭到我方代表理所当然的回绝。

1960年9月6日，举行了中美第100次会谈。王炳南认为，为了今后会谈的进展，也为了让世人了解会谈所以停滞不前的真相，有必要作一个总结性发言。

他首先指出，在5年以来的100次会谈中，中国方面始终本着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态度来和美国进行会谈，而美国方面毫无解决争端的诚意，并且还在继续扩大和加剧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接着，王炳南回顾说，中美会谈在进入第二项议程，即进入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以来，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中国方面一直采取积极态度，作了不断的努力，先后提出了10个合情合理的方案，以谋求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和改善中美关系途径，可是美国方面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美国一方面曲解关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硬要把协议运用于所有在中国犯有严重罪行的美国犯人，要求无条件释放这些犯人，这是无理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却又违反平民回国的协议，阻挠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国。

美国拒绝对中国放弃使用武力，不肯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一切武装力量。

王炳南着重地说，和缓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是中美会谈的关键，是考验有无谈判诚意的试金石。你们美国政府为了永久霸占台湾，甚至把台湾蒋介石政权说成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硬说美军侵占台湾是根据同蒋介石集团的所谓“条约义务”。这种旨在制造“两个中国”，并把台湾变成美国殖民地的阴谋手法，已是世人皆知了。

王炳南具体指出了这样一些事实：1958年秋季，美国在台湾海峡集结了一支美国自称是最大的武装力量，对中国人民寻衅挑战；1960年夏季，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还亲自到台湾去从事敌视中国人民的活动，美国的军用飞机和军舰不断侵犯我国的领空和领海。最近美国又把武装或者能够武装核武器的巡洋舰、潜水艇和飞机派到远东去，公开对我国进行核威胁。

事实俱在，历历可数。比姆听到这里是有些不自在的，他哑口坐在那里，想说又无以对答。

王炳南说，大使先生，你应该知道，玩火者必自焚。

那时，王炳南简直觉得自己是站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必欲将美国政府的侵略面目揭露得痛快淋漓，否则不足以表达6亿中国人民5年来的努力、奋斗和期望。

王炳南继续说，中美之间的争端能否解决，单凭中国一方的努力是不行的，现在是你们认真重新考虑你们对中美会谈的态度的时候了，特别是认真考虑把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时候了，迟考虑不如早考虑，迟走不如早走。早考虑，早走，你们可以早日得到解脱。

比姆在听王炳南的这番慷慨激昂的议论时，一言不发。王炳南讲完后，他除了对王炳南的发言表示失望以外，无法进行有力的反驳，他有些尴尬。

接着，王炳南就中美互换记者再次提出一个新方案。他强调说：中国的宗旨是，中美互换记者是为了消除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隔阂，初步改善目前两国之间又冷又僵的关系，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促使两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解决美国武装部队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的问题。

王炳南所提到的这个新方案又是美国政府敏感的神经上最不能承受的，

提案照例没有通过。

配合王炳南在第 100 次会谈上的发言,《人民日报》于 9 月 8 日特地发了一篇题为《中美会谈一百次》的社论。国内的人民争相阅读,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也都赞扬中国政府的正确立场。

### 肯尼迪的新花招

1960 年底,美国举行了大选。肯尼迪和尼克松在竞选的电视辩论中,似乎都全神贯注地把金门、马祖当作大问题来谈,他们一致表示将毫不动摇地支持台湾的蒋介石政权。

肯尼迪上台后,美国在全球推行咄咄逼人的攻势。苏联在 1956 年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后,与中国共产党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逐渐公开化。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日趋险恶。

中国国内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苏联又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停止经援,中国大陆正经历着严重的经济困难。

这时的会谈仍像一块无法推动的巨石,毫无进展。

在肯尼迪就职 3 个月后,王炳南和比姆又在华沙会谈。

王炳南当然不会对肯尼迪政府存有任何奢望,但是从积极方面着想,他向比姆表示,希望肯尼迪不像他的前任那样死抱住没有出路的旧政策,而能够在中美关系的进展方面有所建树。

几次会谈后,肯尼迪完全暴露他是换汤不换药。美国方面照旧在遣返平民问题上纠缠,照旧提出在台湾问题上双方不使用武力的老问题。

肯尼迪也搞了一些新花招,例如向双方提出了交换记者的综合建议,但在具体做法上,他们又阻挠被我方邀请的美国人访华;又如提出以优惠的条件卖给中国粮食以及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等。王炳南觉得肯尼迪未免有点天真,甚至幼稚,他以为略施小恩小惠就能诱逼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王炳南庄严地拒绝这项建议。他说,新中国正在经历严重的困难时期,但是,中国地大物博,人民勤劳勇敢,我们有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些困难,中国人民决不依靠别人的施舍而生活,更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

尽管会谈陷入了僵局,王炳南还是努力与比姆进行一些私下会晤。王炳南有时请他喝茶,谈谈老挝问题;发生柏林危机时,王炳南邀请他来中国使馆,向他提出一系列问题。在这些会晤中,双方都不可避免地重复提到台湾问题,不过气氛是讨论性的,语言也较和缓,但谁也不放弃自己政府的原则立场。

1961 年 9 月上旬,比姆奉调回国,出任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副署长的新职务。比姆走后,王炳南的对手再易其人。

据说,美国这时在挑选驻波兰大使时,不是考虑新人选是否对波兰问题熟悉,而首先考虑他对中国问题是否熟悉,因为这个人选要和中国大使会谈。继比姆之后新上任的美国驻波兰大使卡伯特正是由于有过在上海当总领事的经历,他便很自然地选中了。

### 测探蒋台反攻虚实

1962 年 3 月,王炳南同卡伯特大使继续会谈。



卡伯特与他的两位前任很不相同。尽管他已经有了 36 年外交工作的经历，在上海当过总领事，为人也很和善，到华沙之前他是美国驻巴西大使，但是他没有显露出出众的外交才能。王炳南 1979 年到波士领会见他时，才知道他是波士顿两大富翁之一。另一个是曾经出使越南的洛奇将军。波士顿人有一句俗话说，当地人士向洛奇讲话，洛奇向卡伯特讲话，卡伯特向上帝讲话。意思是说，卡伯特比洛奇更有钱，他可以买通上帝。卡伯特在波士顿隆重接待王炳南。他为自己过去有过一些对华不友好的言论而深感不安，想重访中国，又怕不受欢迎。他的夫人一直在旁边埋怨他，说像你这样的人，中国是不会让你再去了。王炳南听了这些话后，认为那些都是过去的事，现在可以不提了。因此他当即邀请卡伯特和夫人访华，卡伯特夫妇十分高兴。此后他们便积极筹备来华。1982 年，卡伯特特意来函告诉王炳南，他已经定于某日来华，并感谢王炳南对他的邀请。可是不幸，在他即将动身前夕，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在 1962 年中美会谈时，卡伯特已有 50 多岁，说话、举止很随便，不在乎外交礼节。在谈判桌上，双方代表甚至常常开玩笑。记得有一次，他笑呵呵地说，你们中共应该感谢我们美国，你看你们胜利后检阅军队，不是有很多美式装备吗？这些装备是蒋介石供给你们的。所以你们称蒋介石为运输大队长，他送武器给你们，连张收条也不要。

这个时期，台湾蒋介石集团趁大陆连续遭受自然灾害之机，又开始掀起一股反攻大陆的恶浪，福建前线重又战云密布，局势空前紧张。中方代表团当时得到的情报是，蒋介石正在大量购进新式武器，并改装了飞机，增加装油量，使之能来回于台湾——大陆。蒋介石集团还宣布延长士兵服役时间，士兵一律不准离开营房，随时待命。他们的鞋上和皮带上都刻有“光复大陆”的字样。据说他们还从日本大量购买血浆，看来蒋介石准备挺而走险，妄图与大陆决一死战。

1962 年 5 月底，王炳南正在国内休假。有一天，周恩来亲自约他谈台湾海峡的局势。他说，蒋介石认为目前是进犯大陆的好时机，在外中共与苏联不和，在内有严重的自然灾害，真是千载难逢，蒋介石是下决心要大干一场了。有关这方面的军事情况，他嘱王炳南去找罗瑞卿总参谋长谈。王炳南随即给罗瑞卿打了电话，约见他。他请王炳南去总参办公室谈话。罗瑞卿向王炳南谈了很多情况。他拉开墙上一张大型地图的帷幕，指点了蒋介石集团的军事状况。他说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怎样打的问题，是拒敌于大陆之外，还是诱敌深入，这两种意见正在讨论。王炳南听了后，确实感到局势十分严重。

又一天，周恩来紧急找王炳南谈话，他让王炳南立即中断休假，返回华沙。他说经中央认真研究，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他还是存在着一些困难，现在的关键问题要看美国的态度如何，美国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要争取让美国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周恩来指示说，要尽快通过会谈，找机会了解美国的态度。王炳南意识到这个任务至关重大，不能有丝毫疏忽。于是他很快动身，返回华沙，并按国内规定的时间通知卡伯特，约他见面。为了便于无拘束地交谈，王炳南采用了非正式的会谈方式。6 月 23 日，他请卡伯特到大使的官邸来喝茶，随便聊聊。卡伯特应邀前来。

卡伯特依然是那样不拘礼节，显出一付毫不在乎的神态，有说有笑，边进茶点，边聊天，王炳南先谈了东南亚的局势。他说，中国政府对东南亚局

势的发展感到担心。今年以来，美国增兵越南，出兵泰国，加紧干涉老挝，东南亚局势已经发展到随时可能引起大规模国际冲突的边缘。中国政府的态度一向是克制的，尽管蒋介石残部参加了老挝内战，中国的安全正遭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中国仍然没有放弃争取和平解决老挝问题，没有放弃争取在不干涉有关国家内政的基础上，使印度支那和整个东南亚局势缓和下来。但是，局势能不能缓和下来，关键并不掌握在中国手里。

接着王炳南严肃地说，中国政府还要提请美国政府注意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说到这里，卡伯特的神情也突然严肃起来，他听得很认真。

王炳南用强调的口吻说，美国政府完全清楚蒋介石集团准备窜犯大陆沿海地区的情况，这种准备工作正是在美国的支持、鼓励和配合下进行的。自从今年2月以来蒋介石集团就进行了准备窜犯大陆沿海地区的战争动员和军事部署，提前征集兵员入伍，延长现役士兵服役期限等等，准备渡海登陆。蒋介石集团在美国参与或配合下，进行了频繁的登陆实战演习和对大陆沿海地区的侦察活动。为了给蒋介石准备进犯大陆打气叫好，美国政府增加了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美国的如意算盘显然是，支持和鼓励蒋介石进行军事冒险，不管冒险的结果如何，美国都可以收到进一步控制台湾的实利。在美国支持和鼓励下，蒋介石集团正在跃跃欲试。

在王炳南特意反复谈及美国政府在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的背后所起的作用时，卡伯特显得有些紧张。王炳南于是进一步说，中国人民同蒋介石打过几十年的交道，完全懂得怎样对付他。中国政府必须指出，美国政府是在玩火，蒋介石一旦向大陆挑起战争，其结果绝不会对美国带来任何好处，美国政府必须对蒋介石的冒险行动和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

王炳南最后用警告的口吻说，我可以断定，蒋介石窜犯大陆之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之时。

鉴于局势的严重性，王炳南请卡伯特立即把上述情况报告美国政府。卡伯特听完王炳南的话，停顿了一会儿，表示欣赏王炳南的坦率精神，将尽快地把王炳南所谈的情况电告美国政府。

卡伯特很爽快地说，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决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

卡伯特说，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来防止这种事情。以后他又几次重复了这个保证。在分手时，卡伯特甚至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

听了卡伯特这个明确的表态，王炳南的目的达到了。他不禁松了一口气，美国的态度已经很清楚，这正是党中央急于要知道的重要情况，它将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对福建前线战略部署的制定。王炳南一刻也不迟缓地把同卡伯特谈话的内容报告了国内。

事后，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对王炳南及时摸来了情报，了解了美国的态度，十分满意，这对当时国内的决策起了很大作用。

随后，王炳南同卡伯特大使进行了十几轮会谈。在中美两国关系的实质性问题，谈判仍无结果。

## 奉调回国

1964年，王炳南奉调回国，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中美大使级会谈由来接任他的王国权大使同美国大使在华沙时断时续地进行下去。

直到1972年2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因尼克松访华，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而结束。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也随之结束了。

在这场漫长的谈判中，中美双方除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一项协议外，在涉及中美关系的一切实质问题上皆无结果。

对于这一点，我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在1968年11月26日就第135次会谈的会期问题发表讲话时作了如下阐明：

中国政府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一贯坚持两项原则，第一，美国政府保证立即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拆除它在台湾省的一切军事设施；第二，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两国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但是，13年来，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就这两项原则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而是本末倒置，老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做文章。中国政府已经一再明告诉美国方面，中国政府是绝不以原则作交易的。如果美国方面继续采取这种做法，不管美国是哪个政府上台，中美大使级会谈决不会有什么结果。

70年代到来后，美苏争霸加剧。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强大，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并相应逐步改善其对华政策。

1979年，在新中国成立30周年之后，中美两国宣布建交。是年，王炳南飞越太平洋，首次访问美国。王炳南说：

“这对我具有特殊的意义，尤其是会见了20多年前轰动世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我的三位谈判对手：尤·阿·约翰逊、雅各布·比姆和约·卡伯特。当我们紧紧握手，微笑着互相审视对方的变化时都抑制不住激动和兴奋。”

### 第三节 首位回归的“党国”要员

#### 脱离了国民党政府

子曰：“君子之爱人也以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在中共的统战策略面前，尽管蒋介石十分“硬气”，但他长久以来对故人的“不义”，使人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态，于是“党国要员”中心向大陆者为数不少。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从海外回到祖国怀抱的国民党高级人士，是原国民党行政院长翁文灏。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报道，陕北各界人士谈论战争罪犯问题，提出43人当列为头等战争罪犯，翁文灏列在第12名。

从延安发出的电波飞向全中国。此时此刻，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光明与黑暗正在进行着最后的决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经直逼长江岸边，蒋家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隆隆作响的炮声，伴随着列出头等战犯的电讯，一齐重重地落到了石头城。

古城南京，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里。蒋介石一筹莫展，国民党政府的要员们惶惶不安，局势将怎样发展，自己今后的归宿是什么呢？！

连日来，翁文灏坐卧不安，食不甘味。几天以前，他奉蒋介石要求政府官员眷属先撤退的命令，把老父、妻子以及大儿媳妇和孙妇送到了台湾。现在，他一人独居南京，并非要在此久居，而是准备一面将手头上的公私杂事作些料理，一面观察局势以决定个人命运的下一步棋如何走法。

这天，翁文灏送走了前来探望他的老朋友、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一个人望着桌案上的战犯名单暗自伤神。孙越崎刚才对他讲的资源委员会全班人马不去台湾，也不去外国，他很赞成。但是，他认为只有孙越崎那样的人才能做到，自己是不行的。所以，他刚才指着桌案上的战犯名单，摇着头对孙越崎说：“你们可以不走，我是没有办法不走的。”尽管孙越崎把一个多月前资源委员会南京干部会议决定留在大陆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一再劝他将来最好也不要走，但他还是举棋不定，犹豫彷徨。

想着想着，翁文灏的思绪转回到一个月以前向蒋介石面辞行政院长职务时尴尬情形，不由地叹了一口气：“晚了！”

1948年11月26日，也就是一直为蒋介石十分倚重的“文学侍臣”陈布雷在南京寓所里含恨自尽的第三天，翁文灏迈着沉重而又无力的脚步，来到国民党政府总统蒋介石的黄埔路官邸，以一种苦不堪言的心情向蒋介石递交了辞呈。

蒋介石坐在沙发上，心情阴郁地打量着这个身高不到一米六的行政院长，久久没有吱声。两人相对无语，唯有那种失败后的痛苦心情尽在不言中。

其实，蒋介石在5个多月以前就已料到，这个“拉郎配”式的行政院长翁文灏干不了几天。当时，蒋介石本意也并非要把“行政院长”这顶“大乌纱”送给翁文灏，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那时，也是在蒋介石的黄埔路官邸，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为行政院长职务谁属而展开了白热化的公开争斗，简直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蒋介石曾为此大伤脑筋，大动肝火，他

能轻易忘却吗？

无官一身轻了吗？不，他不轻松。相反，桌上的那张战犯名单，使本来心神不宁的翁文灏更加如坐针毡。他取出纸墨，打算写封家书，只写了几个字，就无心再写下去了。何处是归程？他陷入了沉思之中。

留在大陆，还是另奔他方，翁文灏决定先到台湾去看看父亲、妻子再说。

1949年1月末，正在翁文灏在台湾探亲之际，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的“和谈”准备也逐渐转入高潮。恰恰这时，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辞职了。此人是蒋介石在1948年12月24日正式任命的，是蒋介石准备退居幕后前的重要人事安排。蒋介石曾向吴忠信摊牌说：“观察最近内外情势，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开后，势必由李德邻来过渡。你的任务是拉德邻上轿，任务完成后，去留由你决定。”形势的发展，使得吴忠信自己倒很快下了轿。李宗仁为了给“和谈”增添些“民主气氛”，打算请翁文灏继任代总统府秘书长。

正巧，李宗仁指示行政院办理的“七大和平措施”，其中有释放政治犯一项，程思远为此于2月4日飞抵台北，与国民党台湾省主席陈诚商谈释放幽居在新竹的张学良将军。程思远此行关于释放张学良问题虽然碰了钉子，却代表李宗仁向翁文灏转达了请他出任代总统府秘书长之意，并于2月9日偕翁文灏一起从台北飞抵南京。

孙越崎也受李宗仁代总理委托，来到翁文灏家中，征求他对担任代总统府秘书长的意见。孙越崎开门见山地说：“上次，我竭力劝你不做行政院长，这次我却来劝你作秘书长。因为，蒋介石主战，李宗仁主和，蒋介石是利用你当替罪羊。现在你去作主和的代总统府秘书长，表明了自己拥护主和政策，这是认错赎罪的一个表现。你自己转一个弯子吧。”

翁文灏默默无言。

于是，孙越崎回报李宗仁说：“如果你能亲自去一趟，他会同意的。”

李宗仁果然前往翁家面请。翁文灏又一次出山，担任了代总统府秘书长。

蒋介石自1949年1月宣布“引退”后，住在奉化溪口。他表面上不闻不问，暗地里却在布置排李反和，并且在作下一步的准备。他指使汤恩伯等人出面，下令把上海、南京等地工厂迁往台湾。对于迁不走的，就破坏掉。

2月中旬，蒋介石给接任吴忠信的代总统府秘书长翁文灏发电报，邀请翁到溪口面谈。翁文灏征得李宗仁的同意后，应邀前往。他原意是想见到蒋介石，劝蒋真正退休，完全放弃政务，“庶可停止内战，告罪国人”。凭着蒋介石和他多年的交往，他暗抱一线希望，也许蒋介石能够听取他的意见。

几天后，翁文灏怀着彻底失望的心情，带着大儿子翁心源回上海了。在溪口，他看到蒋介石并非真正引退，而是实际上牢牢控制反革命实力，加紧反革命部署。他知道无法打动蒋介石，但决心再也不被蒋介石牵着鼻子走。但他在方便中做了一件有益的事。当时孙越崎已有投向人民之意，故意托辞不执行把南京五厂拆迁台湾的命令，引起蒋介石的不满，说他受了地下共产党的包围，翁文灏为孙越崎做了解释。

2月27日，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四人率领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从北平返回南京。于右任、翁文灏等和各办代表到机场欢迎。以后，南京政府对于如何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由行政院长何应钦召集了四次会议加以研讨，翁文灏以代总统府秘书长身份参加。

4月1日，南京政府代表团前往北平正式谈判。翁文灏站在送行的行列中。他真诚地期望和谈成功。他希望能为和谈尽一份力量，以减轻自己的罪

责。

翁文灏的希望再一次落空了！1949年4月20日午夜，中国共产党向中国国民党提出的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的最后期限到了。李宗仁忽然反悔，拒不签字。翁文灏看到了整个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无可救药。

在南京城下的隆隆的炮声中，翁文灏悄然地到了上海。四五天后，他即动身飞往台湾。本来，他准备带着在中国石油公司任工程室主任的大儿子翁心源同行。行前两天，孙越崎劝道：“心源尚年轻，你何必害他呢？我看心源不要走了嘛。”翁心源听了孙越崎的话，也对父亲表示，自己不愿意到台湾去，并且说：“请父亲到台湾后，就让我的妻子和儿女回来。”翁文灏点头同意了。不久，翁心源的妻子、女儿回到了上海。

5月21日，翁文灏从台湾来到香港。这天，正好是钱昌照在党的安排下离港北上解放区的日子，也是孙越崎从广州逃到香港的第三天。但是，翁文灏到香港时，钱昌照乘坐的轮船已开，两位老朋友未能见到。

孙越崎见到翁文灏，问他来这里干什么？翁说：“我要去广州向李宗仁辞去秘书长之职。”

第二天，翁文灏即去广州。两三天后，他又回到香港。从此，他脱离了国民党政府。

### “宁当战犯，不当白华”

“翁先生，吴兆洪和资委会的人都在大陆，钱昌照已经回去了，我不信也即回去，你的儿子、儿媳和孙女都在大陆，你和老父、老妻接到香港来，慢慢和共产党联系，得到许可，也回国内，阖家团聚，老朋友也可常见面。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请你好好考虑。”孙越崎语重心长地对翁文灏进行劝说。

“我何尝不想回去。可是，我的罪恶太大，不可能得到共产党的谅解。”翁文灏叹了一口气，忧心忡忡地说：“我的问题，非得到毛泽东主席同意，否则不能解决。但这就太难了。”

孙越崎点点头说：“你的话有一定道理。但是，只要有回国的决心，我认为有邵力子在北平，可以请他帮忙，也不一定没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是你要做两件事：一、必须从思想上，对台湾的关系一刀两断。蒋介石是利用你，发戡乱令，发金圆券，是害你，你应该恨他。二、快把老父、老妻接出来，到香港住，可以自由行动。时间晚了，想接怕也接不出来，万一将来不能回大陆，住香港也比住台湾好。”

在香港的周太玄、杨东莼也来到翁文灏隐居的铜锣湾石油公司宿舍，做他的工作。留在大陆的原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吴兆洪，得到中共上海华东统战部的同意，派戴世英来香港动员翁文灏回国。

翁文灏深深地为这些老朋友、老同事的热诚相助所感动。7月间，他回到台湾，悄悄地把老父、老妻接到了香港。

在翁文灏来往于台湾与香港时，孙越崎写信给和平谈判破裂后留在北平的邵力子，说明翁文灏也有想回大陆的意思，请邵力子多加帮忙。邵力子当即给孙越崎回信，表示愿意大力帮助。

翁文灏回大陆决心已定，马上写信要在上海的儿子翁心源来香港接祖父和母亲回上海。9月间，翁心源从上海来到了香港。

11月，孙越崎离开香港回到北京，带了翁文灏的一封表明心迹的信，交给了邵力子。只等中共方面有所表示，翁文灏就打算回到大陆。当孙越崎因糖尿病住院治疗时，钱昌照来看望孙越崎，对孙谈起：“我从报上看到，翁文灏从香港飞往巴黎了。”不到一个月，变化如此之大，孙越崎十分奇怪。

过了几天，翁心源从香港来到北京，孙越崎才弄清真相。

原来，孙越崎离开香港不久，陈诚派人到香港正式“请”翁文灏去台湾，并对翁文灏说：“投共必有危险，世界大战必将再起，你要认清局势，不去台湾也要移往美国。”

翁文灏坚决不去台湾。但是，他想到杨杰将军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之事，感到真有些不寒而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他临时决定飞往巴黎。这只是一时避难之策。回国之心未变。他不去美国而去法国，原因也正在在此。

邵力子、孙越崎与翁心源经过一番商量，决定把翁文灏的情况报告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表示同意翁文灏回到大陆，但须稍等些时候，以便向民主人士方面做些说服工作。关于战犯问题，周恩来解释说：这是新华社的消息，不是党和政府的正式宣布，翁文灏对此可以放心。

1950年初，翁心源从上海调到北京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工作。周恩来指定一位秘书与他联系。翁心源与孙越崎同住在一个大院内，他们经常与翁文灏通信，向他介绍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此时，翁文灏正在远离祖国的异域漂泊。1950年1月末，他从法国来到了英国。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他曾被接纳为伦敦地质学会外国名誉会员。这次，他在英国的伯明翰大学住了20天，在伯明翰，他又接到了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的邀请电。李约瑟在抗战时期，曾旅居重庆，与翁文灏时相会晤。这次翁文灏应邀来到剑桥，访晤李约瑟，两个老朋友重逢，感慨万千。翁文灏看到这位致力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友人，书架上摆满了中文书籍，案头放着《计然新书》、《齐物要论》，正在写作规模宏大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不觉触动了他的思乡之情。他又似乎想起了在1925年说过“我们自己的材料、自己的问题，不快快自己研究，以贡献于世界，却要劳他们外国人来代我们研究”的那番话，觉得自己不止是十二分的惭愧，简直是一百二十分的惭愧。

3月下旬，翁文灏回到巴黎。他一面历访法国地质界的老朋友，一面于闲暇时到巴黎大学地质学系及地球物理系的图书馆去读书。他深知自己在地质研究上掉队了，如果能用这个机会好好地补补课，未尝不是一件难得的好事。

然而，动荡的世界，纷坛的局势，异国的孤独，思乡的情怀，翁文灏时时感到无法安心读书的苦闷。

这年10月，美国雷诺金属公司致函翁文灏，以优厚的待遇邀请他为该公司顾问。一天，美国驻法国大使馆秘书斯柏劳司突然找到翁文灏的寓所，面请他早日赴美。与此同时，美国地质调查所也来函邀请，美国矿冶工程及机械工程学会在来函中，通知翁文灏说：“将特别召开大会欢迎您的到来。”

逃到台湾的原工矿调整处的一位副处长，也一再写信给翁文灏，“动员”他到台湾去。台湾当局不仅“关心”着翁文灏，而且，蒋介石还使出了一个“断绝后路”的办法。那是一年前，台湾发表了许多人署名的反共宣言，尽管翁文灏人在香港，不知此事，蒋介石却让人把翁文灏的署名亦列入在内。

蒋介石企图以此迫使翁文灏无家可归，只能就范。

翁文灏面前摆着三条路：一条是到台湾去，这是他决不选择的。第二条路，他可以到美国去，过那种“白俄”式的生活。第三条路，回到祖国的怀抱去。“宁当战犯，不作白华”，翁文灏把第二条路也彻底抛弃了，选择了第三条路。他写道：“归乡虽少把握，叛国决非素心。审顾国局，不应逃亡。宁冒艰辛，归向祖国。”于是，他给远在北京的儿子翁心源写了一封家信，告诉儿子说：“我心已定，不愿在外蹉跎时日，近日即将归来。”

翁文灏踏上了归国之路。他在自述其生平的《回溯吟》中写道：

毅然一叶向东飞，不畏榛关与棘扉。

焕发光华胜昨日，亲睹邱壑是邦畿。

才惭舒国屠龙尽，身比令威化鹤归。

但得回黄能转绿，松楸故土得凭依。

1950年12月，翁文灏从法国来到伦敦，准备乘飞机去香港。谁知，英国当局竟然以停发护照横加阻挠。在翁文灏的斗争下，终于在第二年1月初来到香港，并于当夜转到广州，由中共广州市委派人送到北京。

经过一年多的漂泊，正当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时，翁文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在北京火车站，翁文灏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代表们以及老朋友孙越崎、儿子翁心源夫妇等家属的热烈欢迎。他激动得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1953年1月8日，翁文灏写完了由58首七律组成的诗体回忆录《回溯吟》，回首往事，展望前程，他既惭愧悔恨，又欢欣鼓舞。他深深感激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和祖国人民对他的宽宏大量，在《回溯吟》的最后写道：

自度辛勤卅载更，愧于政理失分明。

猿人演进惭多昧，军阀贪私痛久行。

枉历六旬虚用力，尚须多日苦收成。

愿从社会前途想，细绎史篇判浊清。

本是负有盛名的地质学家翁文灏在进入蒋介石政权之前，本来是一个负在盛名的地质学家。

1889年6月29日，翁文灏出生在浙江鄞县的一个富户人家。14岁，他考中了秀才。3年后，到上海进了法国天主教会办的“震旦”读书，主要学习法文和数学。1908年，翁文灏远渡重洋到比利时罗文大学攻读理学博士，专习地质、岩石专业。1912年，他以优异成绩获理学博士，成为我国获地质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当时比利时的一家报纸惊呼：“最好的成绩被一个矮小的黄种人夺去了！”

第二年春天，翁文灏回到祖国。他在北京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分配为农商部地质科签事。

本世纪初叶，中国地质科学人才奇缺，人们对于地质学的重要意义几乎一无所知。当时，北京大学因为地质专业招不到学生，竟把原有的地质专业停办了。担任农商部地质科科长丁文江为了培养地质学人才，把北大地质专业原有的图书、标本一古脑儿借了过来，开办了一个地质研究班，后来改称地质研究所。翁文灏和丁文江、章鸿钊一起，投身于造就一代中国地质学家的教学工作，讲授矿物学、岩石学两门课程。两年后，地质研究所一期研究生班的20多名学生结业，为造就中国地质学家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中，翁文灏充满激情的序言，至今仍放射



着他的爱国思想光芒：

我国地大物博，而生息休养于斯土者，不自研求之，自考察之，而坐待他国学者之来游迨，既知考察研究之不可已矣。而必要之知识，相当之经验，又不可不求学于他国之校与他国之师。孜孜研究者数年，劳劳奔走者数百千里，而于本国之地质仍不免于耳食之谈，隔膜之见，此诚未可讳言者也。地质研究所诸生未得更贤于余辈者以为之师，是诚憾事。然而以中国之人，入中国之校，从中国之师，以研究中国之地质者，实自兹始。登泰山而考片麻岩，涉长江而观冲积层，其胜于余辈为学时，不亦远哉！

“到处游踪欣涉跋，试从形迹溯渊源。”翁文灏极其重视野外实地地质调查和室内化验等科学实验。他在担任地质研究所教师期间，先后同丁文江、章鸿钊带领学生“三年之中从事于实地之观察者，北抵朔漠，南涉鄱阳，往来奔走，而不敢以室内之普通讲义及外人之已得成说自封。”1920年12月16日，甘肃发生8.5级大地震，死亡达20余万人。翁文灏闻讯，立即前往调查。当时，银元还不普及，他身上带着纹银，坐上一辆骡车，冒着严寒的北风出发了。由于行程十分缓慢，一路上饥寒交加，长期缺乏营养，赶到震区时已经患了维生素缺乏症，以致脚软得不能举步。但是，他坐在骡车上仍然坚持实地调查，终于完成了我国现代地质学家第一次实地调查大地震的创举。

地震调查归来后，翁文灏陆续发表了《甘肃地震》（1921年），《甘肃地震的历史记载》（1921）、《中国某些地质构造对地震之影响》（1922）等一系列论文，评述甘肃地震的频度和烈度，列出比较详细的地震分布表，对地震的起源提出构造成因的意见，并绘制了一张现在看来也相当合理的中国地震分布图，突出大地震和活的大断裂的密切关系。

翁文灏作为一个地质学家的卓越贡献，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他于1930年出版的《锥指集》一书，有通论，地质学、地震学、矿床学、古生物学及考古学、地理学方面的27篇科学论文，基本上包括了他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结晶。

翁文灏曾创立了东亚燕山运动的学说。这一学说阐明亚洲东部侏罗纪和白垩纪间有造山运动，至今仍是中国和东亚构造地质学中的重要篇章。与此同时，他还指出我国造山运动也有欧洲阿尔卑斯运动的某些特点，提出中国也有“纳布”构造和“纳布”构造的重要经济价值。本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在“纳布”构造下盘找到了较大油气田，证实了翁文灏几十年前的创见的正确，引起了中国地质、石油方面研究人员的重视。

翁文灏还创建了中国矿产区域论，说明锡、钨，汞分带的理由。他首次提出我国成矿系列的概念以及他对成矿规律的论述，对后人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翁文灏还担负了继地质研究所结束后成立的地质调查所的领导工作，长达十数年之久。在此期间，在翁文灏主持下，地质调查所积极开展地震、燃料、土壤新生代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科学研究，许多活动是开创性的，在国际国内都很有影响。

地质调查所经费少得可怜，翁文灏对于“全所经费不及农商部欧人顾问”所支付的费用，极为愤愤不平而又无力改变现状。他只得紧缩开支，把十分有限的财力全部用于地质调查。他在任期间，上百人的地质调查所，始终只有两个非专门的人员：一个会计，一个杂务。他从不用秘书，所有的公私信

件都是自己缮写，往往一早上写几十封，写得手腕酸痛，提不住笔为止。信写完了，他就到各研究室去考察、指导工作。1933年，所里经费稍有增加，下文江等同事见翁身体不好，工作繁重，劝所里置买一辆汽车。翁文灏说：“一辆汽车的费用，至少可以做两个练习生的薪水了。为我自己舒服而少用练习生是不应该的。”

长时期来，翁文灏就洁身自好。他留学归来时，家道已经中落。1920年前后，翁文灏的亲家、大女儿慧娟的丈夫张悦联之父张寿庸，担任了北洋政府财政部长。张寿庸请翁文灏去做税务差使，说：“这个差使，奉公守法的人，一年也可以有6万元的好处。你去一年，先把生活问题解决了，再回来做科学工作不迟。”翁文灏回答说：“谢谢你的好意。我的生活很简单，用不着这么多钱。”到了1921年，他父亲已经彻底破产。翁文灏上要赡养双亲，下须抚养7个孩子（大女儿出嫁不算），家里生活十分困窘。但翁文灏为了维护地质调查所创办初期同人相约不在两个机关拿全薪的原则，1931年代理清华大学校长3个月，当会计科派人把1800元薪金送到他家里时，他竟然分文不受，原壁退回，做了清华学生的奖学金。

翁文灏以一颗赤子之心，站立在中国地质学界的前沿，努力奋斗，获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就。那个时候，他不关心政治，不过问政治，政治却来找到他的头上。可惜的是，找他的是现代中国历史上黑暗政治，其代表人物是蒋介石。

## 牯岭之行与武康之难

翁文灏与蒋介石相识，始于他的牯岭之行。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钱昌照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担任常务次长兼国民政府秘书。

这年冬天，钱昌照每天上午在教育部工作，下午到蒋介石住的地方与蒋一起会客。一天晚上，钱昌照向蒋介石建议筹办一个国防设计机构，并且解释说：“国防设计应该是广义的，其中包括军事、国际关系、教育文化、财政经济、原料及制造、交通运输、土地及粮食和专门人才的调查等部门。”

蒋介石似乎很感兴趣，连忙问：“哪些人可以担任这些工作？你拟一张名单交给我看看。”

十几天后，钱昌照把拟好的一份名单交给蒋介石。接过名单，蒋介石的双眼在四五十人的名字上溜来溜去。他看见在军事方面有陈仪、洪中、杨继曾等，国际关系方面有王世杰、周览、徐淑希等，教育方面有胡适、杨振声、张其昀等，财政经济方面有吴鼎昌、张嘉璈、徐新六、陶孟和等，原料制造方面有下文江、翁文灏，顾振等，交通运输方面有黄伯樵、沈怡、陈伯庄等，土地及粮食方面有万国鼎、沈宗翰、赵联芳等，其中许多人不曾相识，连名字也是第一次见到。他不住地指指点点，向钱昌照问这问那。然后，在军事方面人名旁边，用笔添了林蔚。他对这张没有宋、孔和二陈的人，也没有当时在国民党政府负实际责任的人名单表示同意，又嘱咐钱昌照：“请钱先生和这批人谈谈，再选一部分人和我见面，或者算是讲学吧！”

第二年夏天，翁文灏应邀从北平来到牯岭，与蒋介石相见。他与蒋介石同为浙东人，虽素不相识，但这第一次见面，却相谈甚洽。

翁文灏在谈到国家大局时，言辞恳切地敦促蒋介石说：“政府诚然有保

全整个领土的任务。日本帝国主义由东北而进侵华北，亦必由华北进取长江，社会人心，都怕政府苟安一隅，不肯负全国责任，因此愈感恐慌。此为目前存亡所关，如果政府负起这个艰巨责任，必能取得全国拥护，增加新的力量。而且有了这种重大任务，那么经济建设等具体工作，得有确定目标，也可易于集中推动。至于政府工作，我并无专长，惟历年调查矿产，于主要富源，尚知梗概。”接着，他又滔滔不绝地向蒋介石讲起全国自然资源的分布概况。

蒋介石摆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听完之后连声称道：“好！好！”过下一会儿，又对翁说：“翁先生，我要以巩固国防为己任，因此，设立一个国防设计委员会，延揽贤才，筹划各项工作。你是国家之栋梁，我希望你能多出主意，给我以实际的帮助。”

翁文灏完全被蒋介石所迷惑了。他天真地认为，蒋介石虽是一个军人，但尚能认识保全国土的责任和为此礼贤下士。这一错误看法，便成了翁文灏从一个致力于地质事业的科学家落入战犯泥坑的潜在思想根源。

这年10月初，国防设计委员会正式成立，隶属于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蒋介石自任委员长，要钱昌照担任副秘书长，而准备委任二陈的叔父、百分之百的官僚陈其采当秘书长。钱昌照反对陈其采担任此职，面向蒋介石提出异议。

“那么，你看什么人比较合适呢？”蒋介石问。

“翁文灏先生可以胜任。”钱昌照的提议，马上得到蒋介石的同意。

然而，翁文灏却没有同意。他向蒋介石回复说：“我并无分头接洽各项事务的能力。况且，地质调查所是一个穷机关，我不能脱离这里。”后来，国防设计委员会改为资源委员会，蒋介石再次要翁文灏出任秘书长，翁文灏仍力辞未受。尽管如此，翁文灏心中却对蒋介石产生了知遇之感。

1934年初，翁文灏去浙江长兴调查油苗。这次调查中发生了一个意外事故，翁文灏险些丧命，那是2月16日，春节即将到来，驾驶汽车的司机多喝了几杯酒，行至武康桥上时出车祸，坐在车上的翁文灏当即因流血过多而不省人事。

消息传到北平，翁文灏的一位朋友写信给胡适说：“如此天才，如此修养，岂但是一国之瑰宝，真是人世所稀有！”还有一位朋友说：“翁咏霓（翁文灏的字）是50万条性命换不来的。”

当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刊出这些溢美之辞时，一位叫“子明”的人写信给胡适，讥笑说他们是“台里喝采”，“互相标榜，未免有点肉麻”。为此，丁文江写了《我所知道的翁文灏》，甚多赞誉，“差不多是一篇身后的墓志”。丁文江此文又引来了许多读者来信。其中一封长信责备翁文灏辞官不就，是“放弃了他不应该放弃的责任”。还劝说翁文灏：“不可狃于世俗结习，以为一入仕途，便有‘晚节不终’的危险；而正应上台去移风易俗才是。”

几个月后，从武康之难中康复的翁文灏读到这样的信，不由地很受感动。读者的敦促，蒋介石的拉拢，以及他对蒋介石的期望和知遇之感，诸般因素溶为一体，对翁文灏踏入蒋介石的政权产生了一种推动力量。这时，他对自己“只事研究不干国事”的一贯作法，发生了根本性的怀疑。从怀疑到摆过去，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距离。

失足的爱国者

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关内，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然而，一心内战的蒋介石不顾外患临头，大敌当前，亲自坐镇江西，调兵遣将，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组织反革命的“围剿”。

翁文灏从北平给蒋介石拍了一封电报，以忧虑的心情告诫蒋介石说：“华北将失，勿忘国计。”

蒋介石接到电报后，不日动身北行，在保定停车，于车中约见北平的知名人士。见到翁文灏，蒋介石一再表示说：“政府决不放弃北平。”其实，蒋介石根本没有抗日的打算。

1935年10月，蒋介石约请翁文灏任行政院秘书长。同时，被任命力行政院政务处长的有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廉等人。一时间，这批人被称为“学者从政派”。

蒋介石的目的，不过是利用翁文灏等人的名声，给腐败、反动的国民党政府装璜门面，欺骗人民。但是，首先受欺骗的是翁文灏本人。蒋介石冠冕堂皇地对翁文灏说：“日本内侵愈急，你在南京政府受一官位，以便我们有事随时面商。”蒋介石“为了抗战”的这块假招牌，打动了一颗真正的爱国心。从此，翁文灏正式加入蒋介石政府。这是他失足的开端。

1937年4月，蒋介石派翁文灏以行政院秘书长名义，加入孔祥熙任特使的外交团体，赶赴英国祝贺英王加冕之机，到欧洲历访英、法、德及苏联各国政府人士，探询对中日危机的态度。正当翁文灏在苏联访问时，“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了。这年9月，翁文灏从欧洲飞返南京时，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已经踏进上海。目睹大好河山被日本帝国主义践踏，人民惨遭蹂躏，翁文灏心中充满悲愤。

翁文灏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身上。为此，当国民党政府移至武汉后，他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于1939年1月担任经济部长，兼任并入经济部的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工矿调整处处长。

蒋介石也已经不满足于只是让学者从政，他还要把可以利用的学者进一步拴住。新组成的国民党武汉政府各部长中，只有翁文灏、张嘉璈不是国民党员。于是，蒋介石指令国民党中央党部，一定要把这两个人拉入国民党内。蒋介石严词厉色地告诉翁文灏：“我已经向党部正式推荐，因此，你们一定要接受勿辞。”于是，翁文灏成了一名“钦点”的国民党员。

翁文灏就任新职后，立即着手进行建设后方工业基地的工作。第一项工作是组织战区各地工厂、煤矿拆迁机器，迅速内运，择地重建。尽管翁文灏多方努力，主持人员和技术人员、工人不畏艰险，迁到内地的工厂却数量极少。诚如翁文灏在1937年12月22日《再致地质调查所同仁书》中所述：“中国从前太信任上海的外国租界，许多工厂都开在那边，内地许多富人的财产都搬在那边，只图一己的苟安，而放弃了全国的大局。此次战事却使东南富力大半灰烬，政府尽力协助，只搬回了工厂120余家，设备总价约计1万亿元，其他许多一时措手不及。”

为解决后方燃料短缺的燃眉之急，翁文灏一只手抓住煤，另一只手伸向石油。他派地质学家孙健初等7人，到甘肃玉门老君庙进行石油地质勘探。为了在玉门油矿钻井，1948年在汉口他还同周恩来商定，调了陕北者根据地两部冲击钻机去玉门钻探石油。1962年，周恩来总理在大庆接见石油工作者时，追述了当年亲自批准派钻井队的过程。就是那些钻井队，打出了玉门油

田的油井。这个油田不但为抗日增添了一份力量，而且也成为世界石油地质史上一个非海相油田的重要先例。这一非海相生油观点，为全国解放后大庆油田的发现拔除了理论障碍。

翁文灏致力于抗战所需的后方工业建设，虽然得到了来自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国统区的广大爱国人士、科学工作者和工人的大力支持，仍然困难重重，举步维艰。这些阻力和障碍，完全来自于他所从政的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大发“国难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交通部要建造叙昆铁路，与法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代表磋商借款办法。不料，宋、孔两家死力把持的建设银公司与法国资本家串通一气，无理要求铁路两旁的开矿权。翁文灏拒绝说：“造路与开矿性质不同，不应并为一事。”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没有矿权，绝对不能帮助造路。”面对如此之个，翁文灏只能摇头长叹。

与四大家族肆无忌惮的巧取豪夺的行径共存并行的，是蒋介石法西斯特务组织无孔不入的破坏活动。翁文灏任经济部长和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时，任用了一批有爱国思想和事业心、为人正直、品行良好的高级职员。但这些人连人身安全也全无保障。1942年，章元善、吴闻天、蔡承新等忽被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拘捕审讯，翁文灏提出质问，戴笠拒不作答。翁文灏愤慨之极，直趋蒋介石住地，向蒋介石说：“我既不了解军统为什么抓人，也不知道被抓之人有什么问题，无法向人们说清。我面请辞职，望能照准。”蒋介石“王顾左右而言他”，既坚拒不允翁文灏辞职，也不命令戴笠即行释放拘捕之人。翁文灏真是欲于无力，欲罢不能，内心苦不堪言。

翁文灏的高足朱森之死，是他最感痛心的一件事。1942年，在重庆大学任职的朱森，经翁文灏推荐，又在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兼任地质系主任。当时，法币贬值，物价上涨。一般教授每月配给五斗平价米，算是特殊照顾。恰逢朱森带领学生外出调查之日，两校各发给他五斗米。朱森本人并不知道此事。特务闻讯后，秘密告发朱森“贪污”。教育部长陈立夫竟无理斥责朱森，并以教育部名义命令朱森免职。一气之下，朱森的胃溃疡骤发、不治而逝。

在中央大学饭厅，各界人士为朱森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以示对国民党当局抗议。追悼会那天，饭厅上挂满了挽联，气氛格外悲哀沉郁。潘菽教授写的一幅挽联：“在昔唯用折腰事；于今竟犯丧身罪。”矛头直指横行霸道的陈立夫之流。然而，大厅正中的朱森遗像两侧，陈立夫竟派人挂上了他送的挽联，上联说了几句“值得同情”一类的敷衍话，下联却写了“国法难容”等字眼。翁文灏参加朱森追悼会时，看到这一挽联，频频摇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还送这样的挽联啊！”

回到家中，翁文灏以满腔悲愤写下了长达462名句的诗篇《悼朱子元》：“人生自古谁无死，死非其人太可怜。五斗折腰古所耻，君负此名真歉然。真诚朴俭人皆晓，枉死无境太倒颠。……”这首长诗，可说是翁文灏用血和泪为朱森写下的悼文。1946年，他在重庆出版诗集《蕉园诗稿》时，收入此诗公开发表，以鸣不平。

翁文灏在重重混乱与阻碍中，勉为开创抗战时期的西南、西北地区各种经济建设尽力。他满心以为为国家增加了抗战实力，却不知大部分化为了蒋介石集团反共反人民的资本。翁文灏对此并无觉悟，蒋介石却看到了翁文灏

对自己的特殊用处，进一步加紧了对翁文灏的拉拢。1944年11月，蒋介石利用翁文灏在美国人眼中的学者身份和清廉名声，委派翁文灏兼任直接同美国政府打交道的战时生产局局长。蒋介石的这一招确有妙处，既堵住了美国朝野人士对国民党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成风的指责，义为自己捞到了一批批美援。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又封给翁文灏以挂名不作事的行政院副院长头衔。同年，国民党代表大会举行，中委名额激增，蒋介石也把翁文灏拉入中委会。

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翁文灏们心自问，引以为荣的是在国家民族生存存亡之际，他个人尽了一份力量，他的家庭也作出了牺牲。一年前，他的儿子翁心翰率领机队在桂北兴安上空与日军作战，不幸被日军击伤机身，在三穗坠机身亡。想到仅仅结婚一载就献身国家的儿子，翁文灏不禁者泪纵横，挥笔写下了《追哭翰儿》，其中两首写道：

渝城到处是欢声，八载艰辛一日平。

完赖沙场忠勇士，不辞拚命捍防城。

秋风秋雨忆招魂，胜利反教流泪痕。

南望一棺江岸畔，放牛坪上尚安存。

战后辞官，是翁文灏久存于心的念头。因此，抗战胜利不久他就接连5次向蒋介石呈文辞职，申明“原为对日抗战而加入政府任职，自当为抗战告竣而告退”，坚请辞去政府本兼各职。他本想脱卸政务后，往欧美各国考察一番，重新回到心爱的地质科学研究工作中去。但是，行政院长宋子文坚持不允，蒋介石也只同意他辞去经济部和资源委员会的职务，保留行政院副院长名义。

出国考察既不可能，翁文灏就另作它想。他想组织一个中国石油公司，自行出产油品，于一点实事。1946年6月1日，资源委员会中国石油公司在上海江西路131号宣告成立。翁文灏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利用各地旧有的基础，将甘肃油矿局、东北抚顺炼油厂、高雄炼油厂、嘉义溶剂厂、台湾油矿勘探处、四川油矿勘探处、新竹研究所以及上海、南京、汉口、广州、台北、青岛、天津、沈阳、兰州、重庆等十多个营业所，一并纳入公司之中。翁文灏意欲向企图垄断中国石油事业的美孚老板们争一席之地。由于当权者的阻挠，自产油品的事没有办成。

1947年4月，国民党行政院改组，张群继任院长，翁文灏乘机辞去了行政院副院长之职。但又受蒋介石之命，专管资源委员会。

此时，翁文灏已经在蒋政权里从政十年之久。十年从政，他并没有认清蒋介石及蒋政权的真实面目，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蒋介石大好内战，太弄权术，偏重内争而对外屈辱忍让。但是，他仅仅“认为可惜”而已。十年来，他亲历目睹国民党各派，如宋、孔、CC派、政学系、复兴社等等，置国家大局于不顾，明争于朝，暗斗于野，为害甚烈。然而，他并没有与这个腐败没落的政党脱离的决心。结果，翁文灏不但未能从蒋政权中拔脚，而是愈陷愈深。

### 滑人战犯的泥坑中

1947年7月4日，国民党政府举行“国务会议”，出席的“国府委员”“一致通过”蒋介石所提出的《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

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翁文灏在其中充当了一个角色。

第二年初，中国石油公司按照蒋介石的旨意，为满足蒋介石打内战的急需，以 2444 万美元巨款，向美国政府订购军用石油。在这一活动中，翁文灏不能辞其咎。

如果仅此而已，翁文灏自然不会进入头等战犯的行列。我们是不相信天命的。但却相信有一些事情，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一个人的处境。翁文灏便是如此。蒋介石把翁文灏“拉郎配”式地推上行政院长的“宝座”，这像一个正在沿着陡峭的河岸向下滑动的行将落水之人，又被已经落入水中的人死死拽了一把，一下子深深掉了下去。

从 1948 年 6 月至 11 月，翁文灏担任行政院长虽然只有短短的 5 个多月，但是却犯下了两大罪行。

其一，翁文灏直接参与了蒋介石所谓“戡乱”的内战。这年 7 月中旬，蒋介石将陶希圣执笔的反共讲演词交给翁文灏去播讲。当时，翁文灏曾向蒋介石推辞过：“此稿是蒋先生的口气，还是蒋先生自讲为好。”蒋介石点点头，笑道：“我自然会讲。但你是行政院长，你也该讲。”在蒋介石屡次催问督促下，翁文灏以行政院长名义。于 7 月 24 日在南京电台上向国内外发表坚持“戡乱”的广播讲话：“我们必须把全国的力量集合起来，以担负我们戡乱救国的神圣任务。”

翁文灏发表这一广播讲后的真实背景，是国民党政府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中，已经碰得头破血流。美帝国主义为了保护他们在华的利益，不使岌岌可危的国民党统治彻底垮台，正在策动以李宗仁为首的一部分国民党人士出来进行国共和谈。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继续主战的死硬派却因此发生恐慌，所以蒋介石又一次把翁文灏推上前台扮演反共到底的角色，借以给李宗仁等人施加压力，给主战派打气。

果然，在翁文灏发表广播讲话的同一天，李宗仁正式辞谣称：“任何人相信谣传都是无道理的，现在并无和共产党谈判的基础。”

其二，翁文灏直接参与了筹划蒋介石政权的所谓财政金融改革。1948 年 8 月 19 日，蒋介石《临时条款》授予的特权，宣布国民党政府“改革币制”，发行伪金圆券，实行空前的通货膨胀，同时实行暴力“限价”，强制收买人民手中的金银、外币，对人民实行进一步的掠夺。

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之日，正是国民党政府到了山穷水尽之时。物价飞腾，财政破产，巨大开支无款可付，中央银行外汇告罄。

蒋介石看到内战已经到了严重关头，不顾人民的死活，连连命令翁文灏等人想尽一切办法，赶紧搜刮现金，以供反革命的内战急需。财政部长王云五提议以“金圆券”代替法币，并与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商定具体办法。翁文灏对于财政金融并无专门知识，处此急需之时，“病急乱投医”，他即与王云五向蒋介石报告改革办法。

蒋介石闻之大喜，立即宣布实行。结果，蒋介石通过这一敲骨吸髓的掠夺，从人民手中抢走了 3 亿 7 千多万美元的金条、银元和外币，而四大家族却已先期把他们握有的外汇存放到外国去了。到了 10 月上旬，国民党统治区有 20 余大中城市爆发大规模抢购风潮，伪金圆券随即急剧贬值，物价更形暴涨。11 月 11 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宣告原“改革币制”计划全盘破产。

蒋介石在经济上遭到致命挫折的同时，军事上也遭到了惨重失败。蒋介石

石在东北亲手丢掉了3个机械化兵团之后，于10月30日自北平飞回南京。蒋介石一下飞机，立即召集翁文灏、何应钦、张群等举行紧急会议。会上，“蒋以最阴郁和最悲观的腔调讲话”，描述目前的军事情势为抗日战争结束以来之“最严重者”。

这时，翁文灏的心情比蒋介石更阴郁，也更悲观。简直可以说，他的心情已经达到了彻底失望的顶点。不过，他终究和蒋介石不同。他与蒋介石的最大区别之一，恐怕就是他不但看到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完全失败，还勇于承认自己个人的完全失败。他无法再继续在行政院长的位置上干下去了。尤其是他亲眼看到了“金圆券”是“杀鸡取卵”，使国统区的广大人民更加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他始料不及，他痛悔异常。

痛悔之余，翁文灏终于决定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这一抉择，尽管不是他与蒋介石最后的分道扬镳，也无法改变他应负的罪责，但却称得上是悬崖勒马！

“拉郎配”式的行政院长长辞职了1946年，11月，蒋介石违背政治协商会的决议，单方面召集伪国民大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伪宪法。从此，蒋介石公开践踏中国人民要和平要民主的愿望，进一步发动全面内战。

一年多后，蒋介石于1948年4月又举行伪国民大会，自选为总统。同时，蒋介石又玩弄手段，使伪国民大会通过了所谓《勘乱时期临时条款》，加强他在国民党政权中的独裁统治。

依照伪宪法规定，行政院长人选应由总统提出，经立法院表决通过。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不同派系为此进行的激烈争斗，把蒋介石提政学系的张群任行政院长的预谋搅翻了。

1948年5月8日，所谓“行宪”后的第一届立法委员会首次在南京举行会议。这天中午，蒋介石约集CC系、政学系、朱家骅系和黄埔系的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立法委员的骨干分子陈立夫、张道藩、谷正鼎、赖琏、吴铁城、王启江、刘健群、黄宇人、倪文亚、汤如炎、白瑜等，聚到黄埔路官邸举行午餐会。

“醉翁之意不在酒”。何况，蒋介石本人并不喝酒，他所举行的宴会上，也从不备酒。蒋介石名为“征询”在座诸位关于立法院长和行政院长入选问题的意见，实际上是想在立法院选举正副院长和对新任行政院长行使同意权时，都应受“党”的约束，也就是唯蒋之意是从，不能有所异议。

席间，蒋介石首先提到行政院长的人选问题。蒋介石一本正经地说：“我想就张岳军（即张群）、何敬之（即何应钦）两人中选择一位担任行宪后的首任行政院长，希望大家表示意见。”

久之，席上竟无一人发言。又过了一会儿，黄宇人起立说：“何以不提胡适之？”

蒋介石听后，面色阴沉地说：“书生不能办事。”

席上的空气一时僵住了。半晌，赖琏战战兢兢地小声说：“我赞成何敬之先生。”

蒋介石点点头，又连忙摇着头说：“他要负责军事。”

至此，蒋介石的意图大白，就是要在座诸位赞成张群任行政院长。蒋介石见再无人发言，等得实在不耐烦了，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宣布表决：“造成张岳军同志的请起立！”“刷——”在坐的人都站了起来，蒋介石一见喜形于色：“好，好，请坐下。”蒋介石满以为这样一来，他的旨意就已贯彻



下去了。谁知，十几天后竟然挨了当头一棒。

5月20日，蒋介石穿着长袍马褂在国民大会堂宣誓就职首任总统。

第二天，蒋介石召集国民党籍的全体立法委员到丁家桥中央党部举行谈话会。会上，蒋介石板着脸说：“我准备提张岳军同志为行政院长，希望大家在立法院行使同意权时一致支持。”

蒋介石训话后，随即离席而去。谈话会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主持继续进行。这时，CC系的立委一致主张用投票的方式试行选举，以其结果供蒋介石作参考。吴铁城知道这些人的意图是借此来反对张群组阁，因而主张投票后不要当场开箱检票，由中央党部秘书处将投票结果提出报告。但是，参加投票的立委坚决要求当场开票。开票结果，何应钦得票最多。张群见此情形，一气之下，当晚离开南京去上海，表示决不就任行政院长。何应钦进退维谷，只得步张群后尘，也表示不任此职。

蒋介石闻讯后，火冒三丈，震怒异常，而又无可如何。不得已，蒋介石决定另拖一个人出来充任行政院长。

5月23日，蒋介石亲自打电话让翁文灏到黄埔路官邸面谈要事。见面后，蒋介石开门见山地说：“翁先生，依照宪法我有提任之权，乃组织部（即CC派）范围的立委反对张群，又并未预先得到本党总裁的同意，就在党部开会试行投票，这是违宪越权的行为，我决不能承认。”蒋介石恨恨地咬咬牙，喘了一口粗气，放缓语气说：“你向少派系关系，因此，我决定提议由你担任此职，请你不要推辞。”

翁文灏毫无思想准备，怔了一下才忙说：“蒋先生这一提议，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个性与才干都不能当此政务地位，决难勉任。”

然而，蒋介石主意已定，不管翁文灏推辞与否，即于次日径向立法院提任通过，由翁文灏任行政院长。

翁文灏在极度惶恐之中，同意“暂时试任”，并于6月4日走马上任，组成国民党政府的第一届“行宪内阁”。他虽然在国民党政府任职已久，却对这次担任行政院长极不情愿，但又不敢坚持不受，一走了之。同时，他还存在一种“顾全大局”的心理，怕自己坚辞不受，使蒋总统与立法院争执的僵局更难解决。在他的内心深处，与蒋介石政权包括蒋介石本人，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

5个多月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日益分崩离析。当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接到翁文灏递交的辞呈，知道翁内阁是拖不下去了，便不再挽留。不过，蒋介石还留了一个尾巴：“翁先生，我们共事多年，相处甚久，以后还需要你多多帮助。”

### “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翁文灏回到祖国后，因为年迈体弱等原因，不能回到地质工作中去了。但是，他每天在家中读书、写作、会客，仍然很忙碌。

他还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等职务，为祖国统一大业做了大量工作。

晚年的翁文灏，时时为祖国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所激动。1961年，他已72岁高龄，仍积极参加西北视察，对包头白云矿和稀土矿的开发与综合利用，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

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著名文章中，肯定他是“有爱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之一。十年动乱初期，翁文灏被“造反派”抄了家。不久，周恩来总理在中山公园见到了他，握着他的手说：“翁老，我们没有保护好你。”这件事，翁文灏记在心，深为周恩来代表党和国家给予他的关怀所感动。

1971年1月27日，翁文灏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临终前，翁文灏留下遗嘱。他在遗嘱中再一次追述了自己一生所走过的曲折的历程。对祖国早日完成统一大业寄予无限期望。

## 第四节 卫立煌归来纪实

### 丢失东北的替罪羊

第二位回归的国民党大员是原东北“剿总”总司令、国民党“五虎将”之一卫立煌。

卫立煌字俊如。189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县县卫杨村，祖父是一个贫农，父亲原先也在家务农，后来在合肥县衙门当册书。

辛亥革命爆发，年方15岁正在村内义学读书的卫立煌剪去了辫子，响应召募，到安徽庐州军政分府的队伍当兵。此后，长期不离鞍马，不叹“髀肉复生”。他曾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排长，旋在粤军和国民革命军中任职，参加了东征、北伐，勇谋兼备，青云直上，在“安内”、“攘外”的沙场上都立有战功。皖西大别山丛有个“金家寨县”，而在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之前，却叫“立煌县”。那是因为1932年国民党军在第四次围剿“鄂豫皖”区时得了势，蒋给卫的最高精神奖励（蒋的批文是“金家寨县准称立煌县”）。1938年初冬，国共合作，在山西五台山麓组织了一次抵抗日军南下的“忻口战役”，卫是该战役的最高指挥官。

抗战后期，为开辟“史迪威公路”，卫立煌曾率国民党军队远征。1949年，国民党在“辽沈战役”中的惨败，从根本上说，不是谁指挥不得力的问题，而是发起这场内战“不得人心”的问题。蒋介石笃信王阳明哲学，总是对“心”与“力”，即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如何才能取得一致这个根本问题，研究得不深不透，硬把该战役失败的责任一古脑推卸在卫立煌头上：

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贻误戎机，下令撤职查办，以为奉行军令不力者戒。

### 逃港途中被蒋扣留

卫立煌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以后，孤独的住在北平东城汪芝麻胡同孙连仲公馆，此间，除傅作义常与之晤谈，很少有人上门。

这时蒋介石匆匆忙忙飞往徐州，去作保卫南京外围——黄淮平原最后决战的准备去了；在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人人自危，害怕东北的解放军即将入关，谁也顾不上去注意他了。他就乘着这个混乱的机会，自己包了一架美国陈纳德“民航队”的飞机，由北平飞到上海，在上海住了一夜，次日又由上海飞往广州。行前没肩通知过别人，只给吴忠信发了一电报，说他要离平南下。

到了广州以后，卫氏一家及其随从下榻于当时广州最高级的旅馆爱群酒店，准备逃往香港。由于卫立煌本来有个对蒋介石不买帐的毛病，这次他们一家由北平到达广州，没有受到阻碍，不免有些粗心大意。进了爱群酒店以后，一下子开了十几个房间，来来往往，进进出出，排场很大，在旅客姓名登记本上，是用卫立煌的小儿子卫道然的名字登记的。哪里来的这么个卫道然，到了广州最豪华的酒店包了这么多的房间？他们这些人绝大部分又穿着军装，佩带了手枪，更引起人们的注意。保密局的特务就化装茶房前来探询。

卫立煌自己和夫人、儿子住在爱群酒店的九层楼，其他人员住在较低的

层次，卫立煌从第九层楼打电话给下面的青年副官，让他先到香港准备寓所，没想到这些话都被保密局的特务窃听去了，逐级向上报告，说：

“卫立煌到了广州，要往香港逃跑。”

这时南京的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也发现北平和南京均没有看见卫立煌，一听到他到了广州，便立刻向蒋介石报告，同时叫广州的特务们严加监视，不要让卫立煌活着跑掉。蒋介石闻知此事，即密电广东省主席把卫扣留。广东省主席即派宪兵和特务，将卫立煌所住的一层楼围住，跟着让宪兵团长出面，请卫暂住沙面卫的老部下某人的花园楼记内，外面由宪兵把守。接着由南京派来飞机一架，声称：“总统接你回南京，派专机来了。”

当时跟在卫立煌旁边的有二、三十个部下，看见监视在四周的特务们样子实在可恨，有的主张拔出手枪来拼一场，让卫乘乱逃脱，上那珠江边的轮船，或乘汽车由小路去香港。他们都知道卫立煌青年时期在广东打了几年的仗，熟悉道路，公推卫道然去征请父亲同意。卫道然是卫立煌的小儿子，幼年丧母，一直跟在他父亲身边长大的，自幼就由乃父教会使用枪支，这时虽然只有16岁，已是很高明的射手，平时和卫的随从人员很是投契。他把这些老部下的主意告诉卫立煌以后，卫立煌说：“不可轻动！开火必有伤亡，你就是神枪，寡不敌众，白流无辜的血，也是无用。我回到南京，他不敢拿我怎样，你要好好劝解大家。”次日卫立煌带着夫人及两名随从，乘专机飞回南京，留下的家属和随从人员撤到沙面旅馆内。

### 被幽禁南京住宅

卫立煌回到南京上海路他自家的住宅，门外已经来了一排宪兵，岗哨密布。卫的随从问：“你们这些人来干什么？”

宪兵们回答：“我们来保护总司令。”

卫立煌前脚踏进家门，宪兵司令张镇后脚就到了，装扮成挺恭敬的样子和卫立煌见面，随后向卫宣布蒋介石的面谕：

“你是听候查办的人，在未见到总统以前，不许出门，不许和任何人见面，不许通信、通电话。”

自此，卫立煌就失去了自由，电话线被掐断，卫宅和外界完全隔绝。

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是卫立煌的同乡、老朋友、老前辈，卫立煌初到广东时在吴忠信部下当兵。他过去是蒋介石的盟兄，现在是蒋介石总统府日常事务的负责人，对蒋很有影响。他认为卫立煌到东北是蒋介石亲自说过责任不由他负的，怎么现在又对他禁闭呢？跑去问蒋，蒋推不知道，吴忠信又询问张镇：“总统都不知道，你为什么派宪兵到卫家去呢？”张镇惶恐不知所措，也没有回答出一句话来。

蒋介石所以幽禁卫立煌，关键在于丢失东北数省责任由谁来负的问题。国民党军队如此惨败，是国民党前途不利行将崩溃的一个显明预兆。对于一些吸尽民脂尽膏、富贵尊荣的达官贵人来说，对于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来说，真是惶恐悲哀至极，他们在南京鼓噪起来：

“杀卫立煌以挽士气！”

“杀一儆百，为丧师失地者戒！”

这一股喧闹来势汹汹，看样子，蒋介石确实想枪毙他所不喜欢的卫立煌，发泄自己大打败仗的怨怒。要把东北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在卫立煌身上，让卫

立煌成为自己的一只替罪羊。但是蒋介石手下也有人看到：卫立煌杀不得。如果和战失利就落得这样一个下场，从现在整个形势来看，还有谁敢带兵打仗？卫立煌跟蒋介石 30 年，出生入死，立过不少汗马功劳，国民党全部军队有很大部分受过他的指挥，很多军官都和他熟识，有交情，现在明明不听卫的意见而失败就要杀他，将要引起很多军人离心离德，没有好处。蒋介石虽然恨卫，觉得这种意见也有道理，只好暂时不杀卫立煌，把他幽禁起来，先让他背着黑锅，以后再说。

这时卫家不但外边有宪兵包围，里面也钻进来十来个歪戴帽子敞开领口的保密局便衣特务。这些特务升堂入室，占了客厅当卧房不算，还嚷着要上楼，要把铺盖搬到卫立煌和卫夫人的套房外间来往。这时卫的上校副官丁志升出来交涉，坚持拒绝他们上楼。丁副官说：“楼上住着两位年轻小姐，你们上楼不方便。至于要进卫先生和夫人的套房外间，那就太过份了，我们身上的手枪都尝过人血。卫先生身上还佩着手枪，他的枪法杀你们像玩儿似的，不费事。他的脾气发作，你们先要出血，他也可以以自杀来抗议，将来总统追究责任，你们就吃不了兜着走。”特务们看见讹诈失败，只好不再谈上楼的事。从此卫宅逐渐变成这么一个阵线：卫立煌身外包围了三层人物，最外层是宪兵，中间是特务，最内层是卫的多年随从，还有从外地特意赶来保护他的。

睡到半夜，楼下鼾声如雷，没有别的声音了，卫立煌悄悄起来，在一个箱子里，找出一包他珍藏多年的心爱东西，走进卫生间。他揭开一层一层的包裹和锦盒，在微弱的灯光之下把这些东西仔仔细细地看了再看，读了又读……这是 40 多封信件和十几张照片，有在延安与毛泽东的合影，有和朱德总司令在山西前线的留念；有笔走龙蛇的狂草，那是毛泽东的亲笔信，有规规矩矩的正楷，那是林伯渠所写“黄河保卫中原，先生保卫黄河”的勉励之词；还有其他共产党重要领导人的信件，其中多数还是朱德总司令亲笔写的信。这些信凝结了珍贵的友谊，表达了浓厚的情感。这些大公无私的革命志士、真心救国的英雄豪杰曾经鼓励和指引过他。这些照片和墨迹都是应当送入历史博物馆的珍贵文物，卫立煌精心地保存了 10 年，到了今天无法再保留下去了，在夜深入静的时候与它们一一告别，付之一炬。

特务们一夜没有上楼，到了第二天早晨阳光照到楼上的时候，特务蹑手蹑脚沿着楼梯轻轻爬上来，在卫氏夫妇居住房间的房门钥匙孔中，往室内窥视。旧式门锁的钥匙孔比较大，在室内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钥匙孔中有一颗眼珠在滴溜乱转。卫夫人看了觉得害怕，等这个窥视者离去之后，问卫立煌：“他们老从钥匙孔里往里面看，是什么意思？”

卫立煌说：“这个意思你不懂？这是因为这些特务都是些年轻人，还不认识我，要是一天上面命令下来，叫他们执行任务，他们怕枪打错了，报不了功，领不到赏，所以一个一个都来看一下，验明正身。”

卫夫人听了这些话，看了一眼桌上放着的手枪，床上藏着的手枪，卫立煌身上揣着的手枪，手里捏着的手枪。卫立煌向来喜欢收集各种名牌手枪，现在都拿出来用以自卫了，实在紧张极了。卫夫人想到张学良从前也不过说是软禁一下，一软禁就没有出头的日子，我们今天到这一步，哪是人过的日子啊！

以前官盖如云车水马龙的卫公馆门前，出现了十分寂寞的景象。但是仍然有些不避嫌疑不怕沾惹是非的老朋友和老部下，要求进来看看卫。有的没

开口便被宪兵挡驾走了，有的交涉半天也进不了大门。其中有一个关麟徵，黄埔一期学生，飞黄腾达比较早，已成为兵团司令级的将领，也没有闯进来。关麟徵在一怒之下把他自己佩挂将军领章的军装上衣脱下来丢在地上说：“凭这个都进不了这个门，这个不值钱的东西，我不要它了。”

有资格自由进入卫立煌家中不受阻碍的只有一个参谋总长顾祝同，顾祝同来了之后没有别的事，只是叫卫快作准备，到台湾去。这时淮海战役已近结束，蒋介石几个精锐兵团相继被歼灭，最后一点本钱快要输完了，南京高级官员纷纷收拾黄金美钞和细软之物，飞往台湾。凡是不打算逃往台湾的大官都被认为想投降共产党，特务们要进行暗杀，一个不留，顾祝同自己家里东西已经搬完，连一床锦被也没有留下，他现在秉承蒋介石意旨并以老朋友的身份，来劝说卫立煌快走。卫立煌听了这话，不置可否，只是带他进入卧室先去看看卫夫人韩权华。

这正是韩权华休克躺倒的第3天，3天没有吃什么，奄奄一息，正在抢救。从她极度衰弱的病容上可以看出她的病情非常严重。顾祝同说：“横直是不行了，让她留在这里，你自己先走吧。”卫立煌说：“这样的病人能够长吗？我看她是活不了，等她死了，办了后事，料理一下就走，要是能够活过来更好，我带她一起走。”顾祝同见她面色像黄蜡一般，呼吸微弱，像个快死的人，医生也说病情严重，好歹很难说。顾祝同没说什么就走了。

特务们不管这些，按照他们上级的指示，要对不去台湾的大官进行暗杀，决不留情。说也侥幸，12月25日解放区电台上公布了战争罪犯名单，在43名国民党战争罪犯当中，卫立煌的名字赫然列在第13名。这就帮了卫立煌的大忙，使反动派最担心怀疑他“通敌”者，不能自圆其说。在特务看来，你敢不走？共产党来了也饶不了你。从此之后，特务们对于卫立煌的监视似乎有点松懈，听任他去抢救韩权华。

淮海战役的干净利落，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相继被歼灭；守在徐州的杜聿明、邱清泉非常天真的等待解放军在四郊合围。那么他们就能在空军配合之下，凭着钢骨水泥的工事和机械化队伍对解放军来一个大歼灭战，发挥最猛烈的火力，把来攻者杀光。事实上他们的梦想完全落空。徐州紧紧被围，完全孤立，城里没有吃的，蒋介石只好下令撤退，几十万人夺路而走，到了徐州以西的永城全部被包围，杜聿明被俘，邱清泉被毙，蒋介石所依靠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全部完蛋。在这种情形下，全盘战争的胜负已完全定局，蒋介石见大势已去，没法挽回，只好改变策略，演出另一幕丑剧，他自己宣告下野，退居奉化，让李宗仁出来当代总统，高唱和谈，企图用这种办法拖延时日，苟延国民党的统治。

### 李宗仁下令撤走宪兵

李宗仁登台宣称要采取几项进步措施，一新耳目，改变国人对于国民党的不良印象。其中比较迎合群众心理也比较容易做到的一项就是释放政治犯。1月24日，李宗仁代总统特饬行政院，取消戒严令，释放政治犯。这时候蒋介石本人虽然走了，但是实权并没有交给李宗仁，李宗仁想释放政治犯也释放不了。比如李宗仁有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意思，蒋介石连理睬也不理睬。李宗仁释放不了政治犯，但是他的有限权力也允许他做一件好事，就是下令撤走了卫立煌住宅外边的一排宪兵，把截断多日的电话线又给接通

了。

1月25日，卫家的电话铃声又叮叮地响了，拿起电话筒一听，第一个打电话来的仍是代总统李宗仁自己。这位代总统在电话中对卫立煌说：

“俊如兄，委屈你了！我已下手令恢复你的自由。”

卫立煌连忙道谢，表示对代总统的感激。此时卫立煌听说他家门外的宪兵已经撤走了，樊笼拆除了一半；但是大门以内的特务仍然没有走，仍然在执行监视任务，这些特务说他们只命于毛人凤，在毛人凤没有给他们以新的指示以前，他们不敢擅自撤离卫宅。所以卫立煌在电话中要求和李宗仁见一面，并请李宗仁派人派车来接他。片时之后，代总统的车子来到，车上坐有总统的参军，卫宅里的特务不敢阻挡，卫立煌便被接到傅厚岗李代总统的官邸中去畅谈一夜。10年以后，李宗仁在美国口述其生平历史，由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唐德刚帮助他笔录而成为《李宗仁回忆录》一书，其中记有卫立煌被“释放以后，卫氏感激涕零，特来向我拜谢，一夕长谈……”一段。《李宗仁回忆录》可议之处不少，但对于国民党在东北战败的经过和原因写得还是客观公正，描绘出了这一段历史的真实面貌。这本书中写道：

东北在大势已去之后原不应死守，而蒋先生一意孤行，下令死守到底，实犯兵家大忌，最后锦州之战，如蒋先生从卫立煌之议，不胡乱越级指挥，则国军在关外精锐不致丧失殆尽，华北亦不致随之覆没，则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或可再苟延若干时日。蒋先生不痛定思痛，深自反省，反将全部战败责任委诸卫立煌一人。

立煌不但被拘禁，几遭枪决。直至蒋先生下野后，我才下令将卫立煌释放。卫氏感激涕零，特来向我拜射，一夕长谈，我才明白东北最后战败的情况，原来如此！

卫立煌和李宗仁畅谈之后回家，看见在他家中的特务还在那里。不过在门外的宪兵们撤走之后，形单势孤，色厉内荏，神魂不定罢了。

门外没有宪兵，绿衣送信人就敲门而入，特务们拿到信件乱拆一气，随便看看又随手扔了。其中有一封信是江北第一大丛林扬州高寺某长老写给卫立煌的。20年前卫立煌参加龙潭之役，击退北洋军阀孙传芳，曾经驻扎在这个风景优美的第一大丛林里，与这个高僧结成了朋友，如今这位和尚听说卫立煌兵败回到南京，猜想他的心情一定不好，建议他重来高寺玩玩散散心。特务们看了之后，叫女仆把这封信送往楼上，并说“有人请卫总司令去当和尚”。卫立煌看了这封信以后心中明白，这分明是江北的朋友借用和尚名义劝他渡江，这时长江以北完全都在解放军的控制之下，渡江就到了解放区。这个写信的朋友的好意是可感的，但是这时江防严密，两岸之间不见舟楫，渡江是不可能的，他只有望江兴叹。

李宗仁在接见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时，把释放卫立煌的事当作他的一项德政，告诉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师大校长袁敦礼和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琇。三位校长离开傅厚岗李代总统官邸之后就来到卫立煌家，探访这个重新获得自由的老朋友。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为卫夫人韩权华的五姐。梅贻琦和卫立煌有连襟的亲戚关系，袁敦礼和韩家也沾一点亲戚关系。他们到了卫家便直接上楼，进入卫立煌的房间。寒暄之后，校长们就很关心地询问卫：“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卫立煌：“顾墨三（顾祝同）正在逼我去台湾，我不想去。”

梅贻琦说：“当然不能去，去没有好结果。你不像我们，我们只有跟国

民党殉葬了，没有办法。”

袁敦礼说：“你为什么不跑呢？”

卫立煌说：“楼下还有几个特务守在这里……”

顾毓琇说：“这些人还不容易打发？这是什么时候了，南京眼看守不住了，他们不想逃跑？我看啦，送几个旅费就打发走了。”

三位校长刚走，一个短小精悍、满口江北口音的汉子，昂首走进大门，略事招呼卫的随从，径直跑上楼去。此人乃是在北伐前就和卫立煌熟识的李明扬。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第三战区苏鲁皖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寒暄了几句以后，就直截了当地告诉卫立煌：“坚决不能去台湾，我们跟了蒋先生几十年还不了解他？到了台湾一定要下你的毒手！”

“那么你认为怎么办好？”卫立煌问。

李明扬附耳说：“快逃跑，外边的情况我知道，一出南京城，就脱离了危险。现在整个京沪沿线都有新四军，一路平静无事，你乘汽车到上海，只要上了外国轮船，就算脱了虎口。”

李明扬走后，卫立煌先和韩权华商议，然后又全家商议，订出逃跑的计划。吸取了前次在广州对蒋估计错误的教训，拟定了完整的脱逃方案，设想在哪些地方会遇到危险，考虑了应付这些危险的对策。

第一步准备工作是让张学诚副官向特务们发动进攻，压一压他们的气焰。这个张学诚副官从北伐以后，跟随卫立煌 20 多年，此时已经升至上校，也是一个身经百战、临阵骁勇、枪法娴熟的人。此时乘着李宗仁撤除宪兵的风势，在盛气之下去找特务领班说话。他开言道：“现在李代总统已有手谕，撤出总司令家的一切军警，包括你们，你们为什么不走？想在此地捞什么油水！”特务们见宪兵走后，人单势孤，本已心虚，见此架势更是心慌，硬着头皮说：“我们也听上级命令行事，大家都是在外面混饭吃的，没有命令怎么敢撤离。”

张学诚又说：“现在李代总统的命令就是最高命令，你们是不是军人？总司令已说，限你们 4 小时撤走。老子们打日本还不怕，枪林弹雨都经过，难道还怕你们？我一个人一发火就能把你们全都撂倒，你信不信？”

特务们住在卫家多时，对于卫家的随从都已熟识，知道从厨房里的大师傅到勤杂人等都是经过战争考验的军人，副官和卫士更是一些年富力强的射击手。特务领班衡量了一下力量的对比，他们 10 个顶不上卫宅 3 个能打的，要是冲突起来，自己要先送性命，立刻回答：“大家都是吃公事饭的，有事好商量。”这么一来，特务们都搬到一间汽车房里去住了，同时向某处上级请示。卫宅有几个汽车房，这是一间离正房较远的，把特务们挤入此处，就有活动的余地了。

第二步准备工作是试用汽车。司机借故把停放了多时的汽车开出去溜一圈，看看汽车有没有毛病。试验结果很满意，司机回来不动声色地将汽油加足，把一切准备工作做完。

转眼之间已经到了阴历除夕（1 月 29 日），蒋山青，秦淮碧，曾经做过六朝都会的南京城，向来都有热热闹闹过春节的风俗。每个家庭都要办些丰盛的食品，团聚全家的成员，共进春酒，预祝明年一切顺利。但是今年的卫公馆里，人家不像人家，冷冷清清，谁都无精打采，个个长吁短叹。到了这天晚上 8 点多钟，厨房里还没有开出饭来。剩下 8 个住在房里的特务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显得百无聊赖，有 4 个家住南京的特务自行离去，回到自己



家中和老婆孩子共吃年夜饭去了。最后剩下 4 个特务都是江北人，回不了家，也无处可去，等着开饭，可是厨房里到了九、十点钟还没有动静。不要说没有酒菜，就连平常的饭也没有开出来。他们饿得难受，自己叹息：“这一行真他妈不是人干的，”这时就由唱白脸的丁志升副官乘机和他们攀谈：“在家千里好，出外一时难，人总是家里过年合适。这个时候，能够和老老小小在一起，就是穷点，也比一个人在外头混强。”

特务说：“我们也是这样，谁愿意在外面过年？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共产党来了活不成；共产党不来，上面一不高兴就枪毙，也不是人过的日子，在外边死不如回家死，回家死骨头还能葬到祖坟里。”

丁副官说：“为什么不象你们那几位弟兄一样回家去呢？”

这 4 个小特务说：“不瞒你说，我们混到今天，混得买一张车票的钱都没有。”

丁副官看见这 4 个小特务的确没钱，就答应帮忙给他们筹钱买车票，并且想法子代他们找几个零花的。这样丁副官和他们最后达成协议：特务回乡。

一直到 11 点才开出晚饭来，特务们吃完饭马上便走了。

## 大年初一伪装出逃

特务走了之后，卫立煌才算解除了束缚，获得了相对的“自由”。

他们全家行动起来，看看附近有没有暗藏的特务，出门有没有人盯梢，卫立煌自己也进行化装，穿上蓝色棉袍子，头戴瓜皮帽，围上蓝围巾，足登老棉鞋。最重要的是在脸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把留了几十年的一撮胡须剃掉了，并且带上了眼镜，太阳穴上贴了一张头昏膏药，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 20 多岁在粤军当营长时，人称“小营长”，有轻视他年轻的意思。他为了表现老成，从那时起就留起了一撮胡须。从此，这一撮胡须便成了卫立煌的特征。今天，他打扮成这个样子，让人看了怎么也联想不到是卫立煌。

到了夜间 4 点钟，卫立煌带着几个随他久经战阵的亲信随同，另外还有一个到上海为他安排住处落脚的多年友人朱映霞女士，在夜深人静当中缓步走向他的汽车。上车后，卫立煌问道：

“都准备好了吗？”

在车上几个全副武装的随从都回答：

“准备好了。”

这是卫立煌的口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马达轻微一响，即刻转动，卫平素喜爱汽车，所以他的汽车性能最佳，总保持在最佳状态。汽车开出门口，凡是知道这一行动的旧部，都肃立在车旁，目送卫立煌上路，并且祝愿他一路顺利。这也许是最后见面了，卫立煌不觉热泪盈眶，挥手和这些多年共生死的部属告别。

汽车一出门，经过几条大街，即直奔公路，向着东方驶去。在平常的年代，按照旧风俗，元旦尚未天明之际，是市民们酒醉未醒，燃放鞭炮，忘其所以，或者是打了一夜麻将牌、倦极欲眠的时候；现在兵荒马乱，正在天翻地覆的紧要关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想法，或无限欢欣，或悲痛欲绝，家家关门，户户紧闭，显得十分沉寂。此时国民党的一些残兵败将，最害怕的是解放军强行渡江，沪宁一带的一些队伍都摆在沿江一线，非常恐惧地注视着烟波浩森的江面上的动静，对于背后公路上的交通则无暇过问，看见是

高贵的小汽车则更不去注意。后来汽车到了镇江以东，路上车马喧闹，行人擦背挨肩，卫立煌的车子无人查问，到了华灯初上之前，很顺利地进了上海市区。

这时上海也是乱纷纷，汤恩伯的队伍集中上海，骗人的说法是“保住上海半年，国际间就会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就能直接参战”。其实是争取一段时间，保卫上海这个码头，把储存在上海的大量黄金、白银及其它各种值钱的物资尽皆抢窃运送台湾。特务们此时在上海也准备要暗杀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如张澜先生等等，对于计划以外汽车中人则无暇多管，所以卫立煌的车子安然开到上海市区中朱映霞女士的亲戚家。朱映霞女士是什么人呢？她的丈夫江先生原是卫立煌的老部下，朱映霞自己则是卫立煌前妻朱韵珩青年时期在镇江崇实女校就读时的同窗好友，一向往来频繁。1939年，卫夫人朱韵珩因医疗事故卒于成都，朱映霞见卫立煌远在洛阳，她好友的子女幼小无人照顾，便在成都卫宅帮忙照顾过一个时期。1946年底卫立煌与韩权华远游欧美，又请朱映霞帮助看家，朱映霞实际上成了卫府上主持家务的负责人。卫立煌的汽车所开到的朱映霞的亲戚家，这是一所很宽敞的资本家的住宅，除去尚有一位老先生留守，其余的成员都已去香港，房屋空闲着。卫立煌暂时就在这里待避，同时由他的随从到码头上去买船票。

南京的卫公馆里，在元旦这一天，一切和平常一样，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之处。有个家庄南京的特务放心不下，大约在上午10点钟左右摇摇摆摆地来了，察看这里有何动静。丁副官听见电铃响前去开大门，这个特务和送报的同时进门，丁副官连忙招呼特务请坐喝茶，同时拿着报纸向女仆高喊：

“报纸来了，送到楼上总司令那里去。”

这个特务见到卫家安安静静，总司令还在楼上看报，就放了心，没坐稳就走了。

这天上午，卫立煌的长子卫道杰和平常人家的青年一样，穿上过年的新衣服到电影院看电影，遇到另一个昨晚回家的南京特务，点头问好。这个特务问道：“总司令好？”

卫道杰说：“很好，没事。”这个特务看到卫道杰悠然出处看电影而总司令又好，想必无事，就没有再来卫家。

下午3点，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打来电话，要卫立煌接。此时卫立煌不在，只好由卫夫人韩权华接。吴忠信传达蒋介石的指示，要卫立煌赶快去台湾。韩权华回答说：“我们正准备去台湾，俊如要和老太太一齐走，现在自己到芜湖去接老太太去了。”吴忠信知道卫立煌事母至孝，抗日战争期间曾把她接到成都，抗日战争胜利后，老太太思念故里，回合肥去了。现在卫立煌去台湾要接她同去，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吴忠信就没有再问。

不久，卫家的汽车由上海开回来，司机报告韩权华说：“一路平安，没出事情，船票也买好了。”当晚韩权华料理家务，让司机好好休息一夜，到了阴历初三的早晨，卫家的汽车再一次驶往上海，韩权华也告别了南京城。

卫夫人到达上海，卫立煌和她分头登上英国轮船，他们就算安全脱险，此时就是国民党特务发现，也不敢到外国轮船上捉人。不久，轮船启航，次日驶过台湾海峡，卫立煌和夫人庆幸，他们现在已经从罗网中飞出来了。

致电毛泽东

他们初到香港，用了假名字住在旅馆里，不敢出门。后来找到韩权华一位亲戚，是个当医生的，正好其寓所的楼上有一层楼房要出租，卫氏夫妇立刻租下这层楼安居下来。进出不敢走正门，凡有客人来访，都要先在后门上的了望镜中看一看，必须是认识的人才开门，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特务在香港非常猖獗。

卫立煌就这样韬光养晦在香港当上了海外寓公。他对于国内的时局变化仍然非常注意，一连写过三封信给他的老部下陈铁，叫陈铁当机立断，不要错过时机。他不知道这时陈铁在贵州已与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人员接上头，就要起义了。

1949年9月19日，天气很热，卫立煌夫妇到海边兜风去了。回来后，家人告诉他们，“有两个客人来访：一个客人高个子。方面大耳，一个客人留胡子，像日本人，都没有留下姓名。”卫立煌一想：方面大耳的高个子一定是杨杰，像日本人的一定是贺耀祖（号贵岩），就立刻到铜锣湾去访问这两位客人。杨杰是卫立煌的至交，盟兄弟，1945年他曾帮助卫立煌制订远征军收复滇西松山的战役计划，平日无所不谈。现在他从大陆上尚未解放的地区来此，一定带有不少那些地方的消息。

卫立煌到了杨杰的寓所，杨杰也不在家，只好给杨杰留下一张纸条。杨杰见了条子预备再来找卫，尚未出门，又有两个人来找杨杰。这两个人自称是云南总商会派来的，给他带东西来了，要求亲见杨杰的面。杨杰看见信封上笔迹像是他的熟人所写，就让这两个人进去。这两个人进去以后，一言不发，拔枪对准杨杰的胸膛射击，又复对准脑侧开了一枪，当场把杨杰打死于藤椅上，当时杨杰若是再到卫立煌家中去了，当天可以不死；卫立煌这一天若是久留杨寓，说不定也受波及。

卫立煌鉴于他的好友、思想接近的杨杰的受害，感到香港不是安全的地方，平日深居简出，很少和别人来往。他订了数十种报纸和杂志，不断买些新书，特别是北京出版的新书，每天在家中细细阅读，重要之处还加以圈点。

“民革”的同志中有人了解卫立煌和蒋介石的关系已经决裂，过去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八路军合作得不错，便告诉卫立煌：如果他本人愿意，“民革”可以介绍他到北京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商量国家大事，建设新中国。卫立煌谢绝了这一邀请，他说他现在去还不是时候。如果像他这样一个背着失守东北黑锅的国民党将领去北京，必然成为一件引人注目的新闻，而蒋介石正可以把他自己打败仗应负担的全部责任轻轻推卸到卫的身上，这样反给了蒋介石以反宣传的材料。卫立煌郑重地说：

“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一定要回新中国，等等再说吧。”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卫立煌非常兴奋，广播听了又听，报纸看了又看，政治纲领都符合人民的要求，人才尽皆一时的俊杰。想起11年前到延安和毛泽东主席见面，想起多少次和朱德总司令彻夜长谈，想到共产党的道理久已为他所折服，看到百年动乱，到今天才有一个真正独立自主、不受外人凌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出现，实高兴得了不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特买了几瓶好酒自己低斟浅酌。他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新中国要缉拿归案的“战争罪犯”，就自己拿起笔来起草了一份电报，经过香港的中共的有关组织，发到北京向毛泽东主席致贺，他是多么向往这个新的国家哟！

电报的原文是这样的：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国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卫立煌 江

“江”按韵目为3，此电是10月3日发的。

### “太原朋友”请他回来

卫立煌寓居在香港数年，小心谨慎，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呆在家里，看看书报杂志，除会见几个熟悉的老朋友外，与外界绝少往还。有时在家里实在烦腻，携带夫人和子女一齐出外散散步，听见道旁人道：“这不是卫立煌吗？”他连忙拉着家人走远，他说：“不要回头，一回头反而被人家认清了。”因为蒋介石所派遣的在香港的特务，一直对他盯梢、监视。

蒋介石部下的将领，尤其是嫡系的将领们，大多数都跟随他逃到台湾，唯有卫立煌这样一个高级将领不去台湾，使蒋介石非常不快。他几次派遣吴忠信做说客到香港，企图把卫立煌连哄带骗，引诱到台湾去，杜绝他返回大陆公开反蒋的可能性。卫立煌对吴礼老（吴忠信号礼卿）一向很尊敬，但是他们经过寒暄，谈过一些泛泛的闲话之后，酒酣耳热，卫立煌禁不住敞开心胸，当着吴礼老的面，历数30年来，蒋介石怎么对他无情无义，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卫立煌说：

“抗日战争要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八路军处在华北最前线。我主张分配给八路军的作战任务弹药补给，和各军一样，问问全中国人，这有什么不对呢？蒋先生不但不叫这么做，反而说我偏袒八路军，撤去我的职务，在成都两年，还派人监视。最后东北之战，陈诚完全没有办法了，蒋先生硬叫我去背黑锅，他向我保证，东北的得失不由我负责，保证这保证那，说了多少好话，我到了东北之后，他三次亲自到沈阳指挥作战，每个师的使用他都要管到，对于东北将领们的话一句不听，明明做不到的事情他硬要做，东北失败的责任完全在他自己，还能够怪别人吗？他把我无辜软禁在南京，我连自由都没有，家中被宪兵特务围上两层，你老都实在看不过去，亲自去问他，他还当面对你说他不知道，虚伪到这种程度的人，你一生见过第二个没有？……。”

吴忠信被卫立煌说得无从置喙，只好辞别而去。

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很多，暗杀过不少人。例如有一个曾被张恨水取作小说《虎贲万岁》题材的国民党将领余程万，后来被暗杀在离卫立煌寓所不远的地方。卫立煌深知蒋介石是个最残忍最不讲道理的人，担心蒋介石让他去台湾他不去这件事会激怒蒋，下毒手派人来刺杀他，所以平日小心门户，深居简出。有一个时期，他迁居到元朗地区的唐人新村，就有人猜测说香港新出版的《金陵春梦》一书出自卫立煌的手笔，香港只有他这样的人对于蒋家王朝的内幕才知道的最清楚。并讲他平常没有笔名，唐人二字，大概是他借用了他寓居地方的地名，就像寓居东坡的苏轼取名为东坡居士一样吧。事实上外面这些猜测都猜错了，《金陵春梦》一书出自老家住在浙江吴江县太湖中间洞庭东山岛上，当时担任香港《新晚报》总编辑的严庆澎手笔，这个新闻记者出身的唐人与卫立煌毫无关系。

后来据随卫立煌到香港的副官柴生春回忆：卫立煌在香港，长期是心情忐忑不安的。一面是怕蒋介石派人来下毒手；一面向往祖国，又怕新社会的人民对他不谅解。他常常对柴生春说：“老柴啊，我真想回去看看。一来怕腿痛发作，二来怕1948年去东北的真心没有事实表现，怕得不到谅解。”

他平日看报很仔细，对于中国解放后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最为高兴。百年以来，中国受尽各个帝国主义的凌辱，差不多每战必败。自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名义上成了“民国”，实际上受到列强势力的瓜分，为人鱼肉。后来日本公然侵略，铁蹄踏遍半个中国，血流成河。美国援助，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各种不平等条约，处处束缚中国，使中国为其殖民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独立自主，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戳穿了世界上最凶的美国纸老虎，被全世界尊为新兴大国，这不正是孙中山先生百年以来所企盼的吗？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真能扬眉吐气了。

卫立煌对于国内各地建设的消息，也非常愿意知道。数十年来，从广东到东北，他都留过许多足迹，他对于许多地方的风俗人情、地理环境非常熟悉。今天这些地方蓬蓬勃勃地建设起来了，他常常拿着报纸，或是开着收音机，神魂飞越，如同回到了这些地方一样。有时他还高声朗诵苏东坡的名句：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最有意思的是报上刊登鞍山三大工程完工的照片，使他惊奇。1948年春季，他到东北不久，视察沈阳外围各据点，曾经到过鞍山。那时候这个中国少有的工业基地一片荒凉，烟囱不冒烟。厂房被糟塌得七零八落，有点像《桃花扇》最后一出中苏昆生所唱的曲子：“残军归废垒，瘦马饿空壕，城廓萧条。”怎么今天变成这么雄伟的样子，出现这么多的劳动模范，出现这么多的英雄事迹呢？只有共产党能把中国治好，只有共产党能使中国富强，真是事实胜过雄辩。

1955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复浙江沿海的渔山列岛、披山岛等岛屿，最反动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吓得要命，为了要把台湾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公然出面进行干涉。1月18日，我国海军解放了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美蒋订立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企图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1月24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一个《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揭穿美帝国主义的阴谋，郑重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人干涉。

周恩来总理发表的严正声明，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受到广大海外华侨的拥护，也受到世界上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只有香港几家蒋记报纸跟在美国佬的尾巴后头，唱出不同的调子。这些报纸不但污蔑这个声明的本身，并且对中国报纸上报导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等人发表谈话也加以攻击，漫骂张治中等人是“传声筒”，听着中共当局说什么也跟着附和什么，是“奉命表态”，不是他们自己的真心话。卫立煌看了这种报纸以后，大大不以为然，当着一些朋友说：“这些话真是岂有此理！是非自有真理，我在香港也要发表和张治中同样的意见，我奉了谁的命呢？没有谁要求我怎么讲，我的话完全是出自一个中国人的内心话，爱国的中国人就应该这么说，解放台湾，完成统一大业有什么不好？”此时在香港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闻知此事，来和卫立煌见面，支持他的爱国行动，鼓励他仗义执言。同时告诫他，香港特务很多，可不能自由讲话，并和他商量，如果愿把这些意见写成文章公开发表，那于对解放台湾将会起到更大的作用。但是，在发表文章的

时候，卫先生本人必须要藏匿起来，不然定会遭到蒋介石特务的迫害。往哪里躲藏好呢？发表文章以后返回大陆如何？

此事传至北京，周恩来赞同卫立煌发表文章同时返回大陆的办法。周恩来认为卫立煌的爱国心思很好，现在是回来的时候了。但是恐怕韩权华不同意，周恩来和邓颖超大姐找韩权华的六姐韩循华来商议。此时邓大姐的秘书生病请假，由一个1948年进燕京大学读书的女青年韩德庄代理，这个韩德庄是韩权华的侄女，周恩来总理就叫韩德庄执笔给卫立煌写信，说是姨父曾在太原结识的朋友叫她写信的，请姨父和姨母回来。

卫立煌一见此信，非常高兴，知道是周恩来叫他回来，1937年忻口战役以前和以后，卫立煌在太原和周恩来有几次接谈，情形历历如在目前，他在周恩来的鼓励和教导之下，对于抗日建立不少功勋。长期以来，周恩来的音容笑貌，他记得非常清楚，报纸上时常发表有关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和消息，他总是细读一番，从中吸取一些新的知识。现在周恩来总理请他回去，那再好也没有了。

来洽谈的香港中共人员询问韩权华：“有顾虑吗？”

韩权华非常坦率地说：“有。我觉得我们已经成为无所作为的人了，不如流落香港，了此残生。”

韩权华接着说：“我们现在的地位，无论对于哪一方面说来都不好，对于台湾来说，是撤职查办，在逃的犯人；对于大陆来说，是没有归案的战犯。”

卫立煌充满信心地说：“不要紧，革命不分先后，这些都会改变的。”

韩权华又说：“在生活上我也有顾虑，在大陆上是不劳动者不得食，人人劳动，我一直有病，我怕到了那里劳动不了。”

来洽谈的同志详细介绍了大陆上人民生活的情形，解除韩权华的顾虑：大陆上的人都把劳动当作光荣的事情，各尽其力，共同来建造新社会；但是也要看各人不同的情形分配不同的工作。像你这样的情况，可以酌情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对于疾病我们是会照顾的，不像在香港看病要花很多钱。

卫立煌听至此处激昂地说：“我愿意用我的余年报效国家，我要革命，别的什么也不想。”因为卫立煌和共产党交往多年，知道共产党的政策，处处为人民着想，合情合理，不会有这样的或那样的难题。香港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所持的那些顾虑，他是没有的。

### 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

卫立煌返回大陆问题商量决定了之后，即接着研究如何越过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如何应付旅途中可能发生的问题。由于许多国民党特务都认识卫立煌，由香港坐火车经过广九铁路回来目标太大，是很危险；容易出毛病的；只有坐船到澳门，由澳门乘坐汽车到广州的办法比较稳妥。最后决定经由澳门这一条路线。

来洽谈的同志又告诉韩权华，东西尽量少带，以免引人注意，什么用品国内都有。随行者只带柴生春，汽车司机在香港有眷属，只好不帶他同行。此事对任何人都严守秘密。

卫立煌息影香港5年，行吟泽畔，眷怀祖国，不胜寂寞，今日由香港乘船到澳门，踏上归国的航程，重见南海上的波涛，珠江外的风云，都觉得另有一番神彩。回想他自己早年第一次乘海轮由上海到广州，离今天正好整整

40 个年头。这 40 年中，中国经过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任人欺侮的旧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的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骑在老百姓头上的旧军阀新军阀都一扫而光，而他自己在 40 年也历尽曲折，备尝甘苦，这一回再到广州参加革命，真是百感交集。他们在澳门登陆之后，即有人接送到一家商业公司里休息进餐，这天韩权华匆匆忙忙，连早饭都没有吃过呢。

他们又从这家商业公司门前乘上汽车，风驰电掣，驶往广州。这一天为 1955 年 3 月 15 日，是卫立煌新生的日子。

他们一到广州就受到中共华南局书记陶铸和华南局统战部长林李明的欢迎。卫立煌发电报到北京向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致礼，报告他已经回来了，同时将预先准备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交给新华社发表。他们在广州稍事休息，就接到毛泽东主席来电，那电报是：

卫俊如先生：三月十六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子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泽东

三月十七日

卫立煌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全文抄录如下：

台湾袍泽们、朋友们：

祖国近五年来，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凡百设施，突飞猛进，为有史以来所未有。对外在国际上国家声望日高，对内使各民族融洽共处，形成空前未有之大团结，以西藏数十年之离异，现在又重回祖国。祖国经济建设一日千里，达到从无到有，自少而多，如钢、铁、煤、油等重之筑成，宝成，陇海铁路之增筑，包兰、成昆铁路之测建，中蒙国境铁路之完成，以及自造飞机、火车头、轮船等等。尤其在人事方面不论过去如何，凡对国家有所贡献者，均能奖励扶植，一视同仁（如程颂示、翁文灏、张治中、傅作义、陈明仁、郑洞国等等）。以视蒋介石时期，在外交上俯仰随人，厚颜谄媚；在政治上视国为家，排除异己；经济方面则将国家命脉置于四大家族之手；人事上嫉贤忌能，非亲莫用，真乃泾渭分明，善恶立判。凡此铁的事实，无论为爱为憎，都是不能加以否认的。

现在蒋介石不惜出卖国家及民族，勾结美国力量，妄想反攻大陆，各位军政方面曾身当其冲的，所知当然深切，试想以他当年具有海陆空军四百万之声势与美国数十亿之军经援助，尚逃不了溃败逃台，目前以他几十万老弱残兵，而图反攻，岂不是痴人说梦，白昼见鬼吗？

台湾是中国领土，乃是历史上和外交上文件所具载，任何人不能歪曲事实，加以否认。美国欲以武力强据台湾，乃其别具帝国主义者侵略野心，无论他如何颠倒是非，混淆视听，也不能掩盖天下人的耳目。台湾之于中国，正如夏威夷之于美国，如有其它国家舰队霸占夏威夷领海，他们美国人民又将作何感想？何况解放台湾，是讨伐中国的罪人蒋介石，纯是内政问题，是世界上主持正义者所同情的。今蒋介石乃与美国订立美蒋防御公约，图借外力负隅拒抗，真是出卖主权，引狼入室，这种行为不但为六亿同胞唾弃，更为具有天良、心存爱国者所切齿！各位已看到了韩战时祖国坚强军力迫使美国停战之事实，台湾最后必定解放，无论按哪一方面说，都是必然之理，既成之势。

各位朋友，各位袍泽：我现在举两项个人亲身经历之事，使各位更知蒋

介石如何卑劣。抗战时期，我负第一战区责任，在黄河北岸，背水奋战，拒敌五年。因为我主张国共共同抗战，故凡八路军（解放军前身）担任之任务与补给，都主张公平办理，乃竟遭蒋疑忌，认为我偏袒八路军，破坏他攘外必先安内之阴谋，将我调离第一战区，并暗行监视。东北之战，完全由蒋三到沈阳亲自主持策定，虽经各将领一致陈述意见，认为不可，但蒋一意孤行，终至全军覆没。事后因受立法院及国人指责，乃竟向部下诿卸责任，诬为系我失职，派宪兵特务将我监视于南京私邸，并由宪兵司令张镇告诉我，未见蒋以前，最好不要接见其他客人。后经吴礼卿先生向蒋提问此事，蒋竟诿称不知。吴先生事后又问张镇何以总统不知道卫长官家中住有宪兵，不许见客，张镇闻言，惶恐不知所答。以上二事，不过就我亲身经历中较大者而言。我同蒋介石共事三十余年，他都肯作出这种丧心病狂，例行逆施，背信弃义，陷害部属的事来，诸位还不及早警惕吗！

我自辛亥投笔从戎以来，即决心献身革命，希望有所助益于改革腐旧社会，建设现代国家。只因蒋介石窃据领导地位，利欲迷人，背叛革命，只图千方百计巩固私人权势，置国计民生于不顾。以致数十年光阴虚耗，未能如愿以偿，既恨且愧。自从我在香港住了五年以来，闭门阅读各种书报杂志，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观察实际，寻求革命真理。回想过去蒋介石几十年的所作所为，比起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五年来的建树，使我更为明白是非功罪，何去何从。所以我觉得这几十年误随了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实在愧对国家、愧对国人。现在祖国正在进行解放台湾，于我们大家一个效忠革命，为人民尽力的机会，以赎前愆。遥念在台湾数十年共患难的袍泽们、朋友们还在蒋介石魔掌之下，不忍坐视诸位随蒋沉沦毁灭。故特掬诚坦告，深望诸位及早醒悟，对于有功于解放台湾者，在有形无形中，各自乘机量力而为，则台湾解放之日，祖国及国人必不有负于诸位，肺腑之言，敬希谅察！责任艰巨，诸维珍重！

卫立煌

1955年3月15日

## 开始新的生活

毛泽东的电报来到后，华南局统战部长林李明和卫立煌商量了一个旅行计划，先到杂花生树、草长莺飞的江南，散散心，解解憋在香港数年的郁闷，并慰卫立煌怀念旧游之地的渴望。他们在广州停留了两日，受到了广东省党政当局的欢迎，驱车游览五羊城。看到城市变化，看到许多革命历史古迹被保护起来进行修整，想到1948年他们曾经在这里被蒋介石派飞机送回南京，卫立煌和韩权华不禁相对苦笑了几声，之后又爽朗的哈哈大笑起来。

他们乘火车北出韶关，过大庾岭，卫立煌沿途对韩权华讲说当年几次北伐的故事。然后经过湖南和江西，车窗外的远山近水，雄关故垒，引起卫立煌更多的回忆，讲了更多的故事。南国春早，许多农民在田里辛勤耕作，太平年代的农民真是幸福，和过去兵祸连年民不聊生相对比，完全是两个天地。

他们到达浙江，在杭州稍事停留。绿波如缕，温风似酒，六桥三竺之间，湖光山色，令人心旷神怡。祖国的确是天堂，从海外流浪回来更觉得天堂可爱。在祖国的怀抱中欢度幸福的晚年，能够再尽力为国家做一点事情，实在是再美好不过的事情了。卫立煌想到自己的许多老同事老朋友，被裹胁到台



湾，疑惧不敢回来，实在是自己误了自己，不说别的，光是西湖莼菜和松江鲈鱼，就不引起你们的乡思吗？

他们在杭州停留数日，到达上海，略作参观游览，又到无锡，准备在太湖旁边多休息几天。他们下榻的地方是解放前民族资本家荣家的一所别墅，依山傍水，地位绝佳。绕屋都是高大的桂树，枝叶繁茂。生长在北方的韩权华过去没见过。虽此时不逢开花的季节，也引起她的喜爱。他们又乘船畅游太湖，想起“谁解乘寻范蠡，五湖烟水独忘机”之类的诗句，他们的情绪十分悠然，畅适。

4月4日，他们忽然接到北京的电话，说周恩来总理有要公即将出国，想在临行前会见卫立煌及夫人，他们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美丽的无锡。当晚即搭乘火车北上。此时他们两个人的心情都非常激动兴奋，卫立煌想到能和北伐及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朋友、现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见面，非常高兴。韩权华的心情更是非常激动，能够见到青年时代的老同学邓颖超大姐，这是以前从来没能预料到的事情。一路上，他们嫌火车跑得太慢。

4月6日上午火车到达北京时，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亲自到车站迎接，使他俩十分感动。当日下午5时，即蒙周恩来总理接见，并设家宴招待。周恩来亲切地询问他们的健康状况，回来的经过，并和卫立煌重叙了两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旧谊，邓大姐热情地和韩权华谈起往事，使得他俩毫不拘束，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

周恩来鼓励他们努力学习，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贡献力量。他们看到周恩来总理和邓大姐是那样诚挚、健谈，听说周恩来第二天就要动身出国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他们更是激动。在周恩来总理出国前夕，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和他们做长时间的谈话，而且是那么从容不迫，精力充沛，谁也想不到周恩来当时刚作了手术还不到一个星期呢。

在周恩来出国期间，邓大姐亲自过问卫立煌夫妇的住房、生活、参观等各方面的安排。总理从万隆会议胜利归来后，又和陈毅副总理宴请卫立煌，在席间谈到有关解放台湾的问题和一些党的政策问题。陈毅副总理还特别针对韩权华离开香港前的想法，解释从前宣布战犯名单时为什么把卫立煌也列入其中。1955年6月，卫立煌夫妇从北京饭店搬到政府为他们安排北京东单麻线胡同的新居，周恩来又亲自到他们家来看望他们。他们的新居是什么样子呢？据后来香港《文汇报》上中国新闻社记者杨木所写的报导中介绍：

那是一所富有民族风格的建筑物，画栋雕梁，髹漆鲜明。客厅前面，是一个花园，假山清池，有树有亭，……当大地春深、绿满枝头的时候，红亭一角，实具庭园幽趣。

卫立煌归来了。

卫立煌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人民的尊重。不久，党和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先后担任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担任了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务委员。

因长期患冠状动脉硬化心藏病和新患肺炎，经医治无效，卫立煌于1960年1月17日零时4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64岁。

## 第五节 李宗仁落叶归根

### “代总统”经香港流亡美国

在海内外引起大振动的，该是李宗仁的“叶落归根”了，李的去国与归国，整整绕了地球一圈，极具传奇色彩。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分三路渡过长江天堑。4月22日，身患小恙的蒋介石急忙飞抵杭州，召李宗仁、何应钦、汤恩伯、白崇禧、张群、吴忠信等人来杭州会晤，讨论如何应对危局。会议在杭州笕桥机场航空学校举行。会上，蒋介石听到的战况是：

沪宁线已被共军切断，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国军”不是被围，就是在后撤，南京危在旦夕。

蒋介石命令：

将南京城的火车站、码头、水电厂都炸掉，把所有部队，都撤到沪杭一带。这仍是持久坚守淞沪，重点经营台湾，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伺机反攻的方针。

会后，蒋介石问李宗仁：“德邻，你呢？”

李宗仁：“我？当然去广州啰”

蒋介石：“对于和谈还有什么打算？”

李宗仁：“我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谈一次。”

蒋介石：“不用了，不必再谈了，过去共产党因为军事上没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谈，现在他们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余地了。”

李宗仁：“你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破裂，南京马上就要失守，你看怎么办？”

蒋介石：“你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

李宗仁：“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可以万死不辞的。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

蒋介石诚挚万分似地说：“不论你要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

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说：

国之将亡，我们当国者的心境实有说不出的辛酸。

在这种情况下，蒋先生既然一再说明，全盘由我负责，我如逐条列举要他答应支出，反嫌小气。

李宗仁与蒋介石在杭州会议时，就已决定与蒋家王朝同归于尽了。

蒋介石随后拨给“华中长官”白崇禧银洋400万元（当时中央银行没有这么多的现洋，其中一部分就以15000两黄金折价，并派专机给白崇禧送到汉口）。这样，白崇禧率领桂系剩余的100多万军队，与解放军作战到底，做了蒋家王朝的殉葬品。

在杭州得到蒋介石许诺，“全盘负责领导国家”的代总统李宗仁，于4月22日傍晚返抵南京“坐镇”。这时南京城内已闻解放军机枪声。李宗仁在总统府的这最后的一夜，辗转反侧，未能入寐。4月23日清晨，李宗仁乘车抵飞机场时，载代总统逃离的专机马达已发动。李宗仁叫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了两圈（比蒋介石还多绕了一圈），飞机腾空，进入李代总统眼底的是：“东方已白，长江如练，南京城郊，炮火方浓。”驾驶员转完两圈后入坐舱

请示代总统：“往哪儿飞？”李：“桂林。”

桂系又归“桂”去了。虎踞龙盘的金陵古城，当日即获得了解放。风雨苍茫，世道沧桑，蒋家王朝已不复存在了。

大陆解放前夕，李宗仁的桂系军队及其他所谓地方实力派，都被我军歼灭或败逃溃散。1949年11月，李宗仁以“就医”为名，带着“代总统”的空头衔经香港流亡美国。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复职”，李宗仁失去“代总统”身分，遂与蒋介石公开决裂，大骂蒋此举“非法”，并声称他要用一切方法把蒋驱逐出台湾。1952年1月台“监察院”以李袒护原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毛邦初进行反蒋活动，对李实行“弹劾”。其后又开除了李的国民党党籍。1954年2月，第2届“总统”选举，李被“国大”罢免了“副总统”的职务。此段时期，李宗仁曾3次函蒋介石痛骂之，并上书艾森豪威尔，控蒋“违宪”。

李宗仁流亡美国后，即在国务卿艾奇逊和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下，进行所谓的“反共反蒋”的“第三势力”活动。后美国因李已无实力，遂对其“冷淡”。因此，李在1950年至1952年间，趋于沉寂。1950年李在给香港桂系分子黎蒙的信中曾悲观地说：

半生戎马，而今国破家亡……对美国已绝望……

国际上的外交活动，无论是国家或个人，都是实力在折冲表相，此时李宗仁手中无寸铁，足下无寸土，身边的文臣武将各自星散。一向讲求现实和实用主义的美国政府，有谁会理睬这样一位淡云漠漠空山寂寂的人呢！

李宗仁来到美国后，先是住在纽约，那时他还是一个“代总统”，应酬不少，开销也很大。后来为了省钱，在新泽西州北部购置一套私邸，当时报上曾有李宗仁买了一座花园洋房的新闻，且形容如何富丽堂皇，花园又如何美丽优雅。但李的一位朋友回忆：

我们在美国见到的却是一所毫不起眼的小平房，而且又小又窄成一字形。进门右边是睡房三间，中是客厅与餐厅，左边挖了一所厨房，与堂皇富丽沾不上边。听李宗仁说：“它是一泥水匠筑来自住的，图样也是他自己画的。后来他有钱，另造了一间大的搬走了，这间就卖给我，我因近纽约，交通便利，就买了下来。”

李宗仁的第二个夫人（即“代总统”夫人）郭德洁，曾向这位朋友说：

我们没有收入，你知道李伯（宗仁）的，他做了一世的官，但从不作经济打算的，这几年还是用我的积蓄来贴补家用！若不是出国时那个财政部长给了我们30万美元的外汇，更不得了，那部长是个好人，为了这30万，他丢了官，还挨老蒋一顿大骂呢！（李宗仁代总统虽仅一年，前后历三位财政部长即徐堪、刘攻芸、关吉玉，此处不知所指）

1951年《香港天文台报》：

李宗仁在美率妻儿经营餐馆，并以读英文、读报消遣。而其在港喽罗也多随之消沉。如李之亲信黄雪村即于1951年3月投奔台湾蒋介石，原随李在美活动的李汉魂、周锦朝等也逐渐与李疏远。

### 倦鸟归巢颇费周折

1965年6月初的一天，李宗仁匆匆驱车到原配夫人李秀文和儿子幼邻的住处，一脸兴奋之色。不等儿子开口，先说：

“我已决定回国，但那天走还没决定，也不可能定。我是随时都会碰到危险的，此时暗探一刻也不会放过我。不过，冒多大的风险我也要回中国去，作为我最后一个心愿。在此做寓公实非所愿。”

“过去，我对共产党理解不够，说了许多错话，做了许多错事，如今要想补偿过去，只有回国一条路。否则，终会老死异国，那是死也不会瞑目的。”

幼邻点头说：“父亲回国是明智的，不过太危险了，那些暗探会放过你吗？”李宗仁微笑说：“共产党欢迎我回去，还说可以来去自由，这个自由我可以不要，决心回去，就不会再出来了。国内总理周恩来为我做好一切安排。我的第一个行程先到欧洲小住，时机成熟，即便飞返祖国大陆。我的一生，出生入死不知多少遍都能够化险为夷，不信会死在暗探特务手上。何况有人暗中保护着。程恩远还亲到苏黎世接送。他是受命于周总理的。你们不必担心。但是，我的行动万万不可泄漏出去。”遂与其他人匆匆道别，登车而去，也来不及等儿媳珍妮母女回来再见一面。

李宗仁的学历，只是毕业于广西陆军小学，在政治舞台上几十年的阅历，却有很大的长进。抗日战争时期，他还亲手写过两篇泛论抗战战局的文章。但是他受到文化基础的局限，又长期生活在广西边陲地，胸襟眼界，应世器识，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十多年的居美生活，日无所事，读书看报，并接触一些知名学者，虽身居斗室，却胸怀天下大事。作为一个政治上的风云人物，失意下台，竟获机会闭户修养，纵观大势，十几年确有些进步。他出国初期那种坐观大局变化，以谋东山再起的想法，逐渐被无情的历史粉碎了。在他的思想领域里具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那就是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从1924年他在广西击溃北洋军阀陆荣廷、沈鸿英和滇军唐继尧的进攻，以至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进行北伐，参加抗日战争。最后以一个反对中国共产党而发展到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主要是这种思想意识起着主导作用。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任内，李宗仁拒绝了共和党拉他以对抗台湾；根据周恩来万隆会议对台问题的谈话精神，他在1955年发表反对台湾“托管”和“台独”，建议国共协商和平解决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这一切都是以这种思想意识为主导的具体表现。

1965年6月中旬，李宗仁先行飞抵瑞士苏黎世，十天后郭德洁办完了在美国的善后工作，飞抵瑞士。经过千险万阻终于离美返乡。这对李宗仁来说是他长期思想发展最后的变化。应该看到周总理为争取他回国，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还有中间人的穿针引线，搭桥传信。但最主要的是客观形势促进他内在的发展变化。李回大陆以后，有一天的晚上和老部下尹水彦闲聊天，尹曾问他：“在你思想上逐渐变化的过程中，触动你最大的事情是什么？”他说：“第一是中国爆发第一颗原子弹，大战以后，美国拥有原子武器，人们都认为凭着这个法宝就可以君临天下，后来苏联也拥有了原子弹，这两个大国以此称霸，大有平分世界的样子。中国有了原子弹，形成了原子大国新的三角平衡，这是多大的变化！我们统治国家多少年，连一部像样的单车（自行车）都造不出来，科学生产落后得不成样子，我们不但应该认输，而且应该五体投地地拥戴人家。第二件事就是对印度的反击战，我内心最激动的不仅仅是这一战争的胜利，主要是钦佩共产党为保卫国家领土主权这种大无畏的精神。”这几句话把他遗返祖国的决心，和盘托出了。

流亡美国达16年之久的“代总统”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女士，和由香港专程飞往瑞士苏黎世为迎接李宗仁回国的程思远一行，搭乘一架波音客机，

由西欧经由巴尔干半岛绕道中东，于 1965 年 7 月 13 日到达了巴基斯坦的克拉哧市。中国驻巴大使馆早已接到外交部的通知，所以大使以下的外交人员和克拉哧市代表及其保卫人员，均到机场照料招待。

周恩来接到巴基斯坦大使馆的报告之后，当即邀请了人大副委员长张治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人大常委邵力子、章行严，政协常委刘斐、屈武和政协委员黄绍竑、李蒸等人在紫光阁便餐。席间周恩来发表了李宗仁回来的消息，并且说明了李的回来，事先经过长时间的酝酿，颇费周折，最后他能决心回到祖国，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又说政府准备举行欢迎仪式，希望在座的人都到飞机场参加欢迎仪式。

7 月 18 日李宗仁夫妇搭乘的飞机到广州，稍事休息，即飞往上海，此时周恩来专程在上海候接李氏。他们作了长时间的交谈。

7 月 20 日的上午，周恩来先李 20 分钟飞回北京，在机场等候举行欢迎李的仪式。11 时李宗仁等乘坐的飞机，到达北京机场。欢迎的人群，摩肩接踵，李宗仁走下舷梯之后，周恩来、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郭沫若、陈叔通等，一一走上前去握手欢迎。李宗仁倦鸟还巢，握着国家领导人的手，真是一腔心事，百感交集，不禁潸然泪下。他在后来给美国的儿子的去信中曾写到：“这一切都是终身难忘的殊荣。”

在欢迎的人群中，他一眼看到了 40 多年的老友黄绍竑。他们激动之下，长久拥抱在一起。在统一广西的战斗中，那是以李宗仁为首的李、白（崇禧）、黄（绍竑）的共同事业，以后黄投向蒋，他和李、白虽然有合有分，长时期分道扬镳，但私人友情始终保持很好，这次北京的旧友重逢是谁也意料不到的。

在飞机场的大厅里，举行了欢迎仪式。李宗仁宣读了《归国声明》表示待罪海外多年，祖国在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国势蒸蒸日上，回国愿追随人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以有生之年报效祖国。声明中并对当初和谈时拒绝签字表示忏悔，对后来搞中间路线的“第三势力”运动，予以检讨。

这以后，李宗仁还得到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邓小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宴请。

李宗仁回国后，在北京饭店住了短时期，就搬入西总布胡同 5 号。那是一幢三层楼房，院内花园走廊，楼下有宽敞的客厅，李宗仁和郭德洁住进去颇为满意。在为李宗仁安置公馆的过程中，统战部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颇费苦心。看了几个地方都不理想，曾征询李氏夫妇是否愿意回住他在北长街 81 号的老公馆，他坚决表示绝不回到旧居。尹冰彦问他为什么？他说：“那个房子很窄小，回到老地方会造成人家对我的印象不好。”

西总布胡同的李公馆房间很多，大小客厅、餐厅、卧房和楼梯都铺有地毯，打扫卫生颇为麻烦。有一天服务员小牛用扫帚清扫地毯，李宗仁说：“在美国一般家庭都用吸尘器，用扫帚打扫是使灰尘搬家，很不卫生。”第二天的早晨，机关事务管理局就派人送来了吸尘器。

程思远爱人石泓，在程随李宗仁回到大陆以后，她也由港来北京，不久她即决定由港迁大陆定居。在石临行时候，郭德洁请她从香港多带些香皂回来。她说：“我看这里的日用品还是以前的样子，美国、法国这方面的东西，天天在变。”这话说后的两天，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请李氏夫妇吃饭，李宗仁和郭德洁分别坐在周恩来的左右。在席间的闲谈中，周总理说建国以后，政府还没有腾出手来抓生活日用品的生产，但也并不是这些年来毫无变化，完

全和以前一样。周边说边从口袋摘下身带的一支“英雄牌”的钢笔说：“这是我国上海生产的金笔，并不比外国货坏嘛，不少国家还争着进口我们这种笔，解放前我国就不能生产这种高级笔嘛。”郭德洁顺手从周手里把钢笔拿过来，在纸上划了两下说：“好的很，好的很，我还不知道我们能生产这么好的东西。这支笔我没收了。”说着就把钢笔放在手提包里。周连忙说：“不成，这支笔我用了多年已经者旧了。送人就送新的嘛。”说着就回过头去告诉警卫员到小卖部买两支高级“英雄”金笔。警卫员立即从楼下拿来两支笔交给了周恩来，周递给郭德洁说：“送你和李先生每人一支。”郭德洁收下后忙将那支旧笔还给周，连声称谢。

### 重游旧地夫人宿疾恶化

9月上旬，李宗仁和郭德洁以及陪同程思远、刘仲容等到东北参观访问，这是他回国后第一次亲眼目睹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感到十分高兴。9月中旬，他们回到北京，有一天邵力子去看李宗仁，邵问李在东北参观情况如何，李说：“在东北三省看了些工矿生产的情况，想不到短短的十八年，生产建设这样进步，现在长春汽车厂竟能生产那么好的卡车和轿车。再给20年的时间，不打仗，埋头建设，我们一定能在世界上赶到前面去。”邵说：“建设的成就很大，这是人所公认的，但是缺点不少，还存在许多问题，有些口号政策还阻碍着生产的发展。”李接着说：“邵先生，这话我们不能这样说，一个健康的人，总难免有点小毛病，这算不了什么，主要的还是健康嘛。”

1966年1月7日，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从北京飞广州访问，同行者有全国政协秘书长平杰三、刘仲容和程思远。

广东代省长林李明、广州市市长曾生、副市长罗培元到白云机场欢迎，把他们接到广东迎宾馆2号楼住下。林李明说：这是接待外国元首下榻的地方，但对德邻先生只收房费一元，表示优待。由此可见，一切都是象征性地收费。

李宗仁要到海南岛去看看。林李明说，这个问题要由陶铸决定，但他到外地去了。李及随行人员先去从化温泉宾馆住了几天。然后去江门和新会，还看了东江之水济香港的伟大工程。1966年春节前夕的广东，生机蓬勃，港澳同胞回乡度岁者，肩摩顶接，络绎不绝。

1月19日，陶铸来广东迎宾馆看望李宗仁，并设宴招待李氏伉俪，参加的还有林李明和曾生。李宗仁说，这十天来，看了珠江三角洲的城乡建设，发现农村生活富裕，港澳同胞回乡度岁的逐年增加。人们说，广东农业上去了，绿化也很有成绩，这是值得欢欣鼓舞的一件事，陶铸说，李先生旧地重游，应多看一看，并欢迎他去海南岛参观。

1月20日，是农历腊月除夕，陈郁省长在迎宾馆4号楼楼下大厅设狗肉宴，欢迎李宗仁夫妇，参加的有冯白驹、曾生。散席后去观赏广州迎春花市。这是度过三年困难以后首次恢复春节花市的壮观，也是政治经济形势日趋美好的标志。

1月21日，农历正月初一，陶铸请李宗仁等去体育馆看体操表演。之后，李宗仁一行去了广州东山向陶铸和他的夫人曾志拜年。那时寒潮南来，陶铸家里竟不生火，党的领导人的生活如此简单朴素，使李及随行人员有肃然起敬之感。

2月9日，李宗仁结束广州近郊的参观后，林李明在泮溪酒家宴客厅为李宗仁夫妇饯行。林李明说，海南岛一般是不开放的，这一次请李先生去看看，充分体现了以礼相待的精神。

平杰三因事返京，改由广东统战部秘书长罗理实陪他们去海南岛。罗理实原名李实，1937年7月初，曾陪同中共中央代表张云逸去桂林访问，与李宗仁进行过会谈。可惜，这是李宗仁最后一次与罗理实同游，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他竟不幸地被迫害致死。

海南岛也是中国一个宝岛。解放以后，开始建筑三条贯通南北的公路。从2月11日起，李宗仁等沿着川字形的公路漫游了一千多公里。那时祖国东北地区正是天寒地冻，万里冰封，而他们还在三亚湾下海游泳，可见中国地域面积的广大。海南岛自然条件优越，热带植物已经遍植全岛，工业和交通仍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

2月18日，李宗仁等从海口飞抵湛江。平杰三从北京回来，即在这里与李宗仁等会合。前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当时是该地驻军首长，他亦热烈欢迎李宗仁等的到来。雷州半岛在过去是所谓“下四府”的地方，意指钦廉雷琼经济落后，与“上四府”的广州、番禺等地不可等视齐观。可是现在形势不同了，茂名发现了油页岩，可提炼石油；海口对岸也适宜种植热带植物，真是前途无量。

2月28日，李宗仁等乘专机从湛江飞南宁，受到广西当地政府的热情接待。广西是李宗仁的家乡，李宗仁与旧朋友、旧同事李任仁、陈良佐、张光晔、尹承纲、莫树杰、黄启汉等会晤，谈谈别后情况，大家互有隔世之感。南宁与以前完全不同了，邕江上建了一座钢骨大桥，镇宁炮台下开了一所树池辉映的人民公园，过去的机场，现在已成为游人胜地南湖。江山依旧，而市区规模已焕然一新了。

此次两广之行，郭德洁始终同行。到了3月8日，她的乳癌宿疾日恶化，所以李宗仁就留她在南宁明园饭店，而自己继续去柳州、桂林参观，周总理关照有关方面把位于桂林文明路的李宗仁私邸修好，并重新设置家具。可是李因郭德洁生病不能同来，顿兴思念的幽情，所以宁愿在榕湖宾馆一号楼下榻。

## 夫唱妻随四十年

3月17日，李宗仁等还在桂林参观，傍晚接到南宁电话，说郭德洁的乳癌转为肝昏迷，这是一个病理上的名词，意指她的乳癌细胞把胆囊破坏了，以至面色腊黄，进入昏迷状态。她将不久于人世，李宗仁立刻从桂林赶回。19日，以专机把她送返北京，一到首都机场即由救护车送她入北京医院抢救。

说起郭德洁的乳癌病况，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郭抵美后，经常托程思远的好友李济欧医学博士注射荷尔蒙针药。李曾忠告他说，这种药对保持青春有一定作用，但用久了会冒致癌的风险，但郭不听，到60年代初期她果然感到右乳有硬块的存在，舍命保青春，后悔已为时晚矣。

郭德洁起初是讳疾忌医，以后又失时误事。1963年春，她入院诊治，医生主张把她右乳切除。原先已办好住院及手术手续，但她想来想去，割去一乳，岂不破相？在施手术的前夕，她竟偷偷地从医院溜掉了。如果她不是这

样，也许不致早死，1965年初，郭德洁发现情况不对，再度入院，这一次割治以后，发现她的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多只有8个月好活了。她返国以后，经过北京医院及广州中山大学附属医院采取中西医分治合疗的方法，至少延长了她6个月的生命，直至1966年3月21日零时3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

郭德洁在美国时期，出于生活的原因，她加入了美国国籍。在她生前回国的短短几个月，还没有顾得解决这一问题。可是在她死后，此事必须妥善处理。当时中美两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周总理和彭真市长又怎么能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参加她的追悼会呢！因此必须根据法律程序将郭德洁的美籍身份证明卡片交出，办理恢复原国籍手续，于是，翻箱倒柜，寻找郭的美籍身份证，最后终于在她另一支手提包里边同5千元美钞一起找了出来，当即将美籍身份证明递交国务院。3月28日上午在北京医院举行了有周总理和彭真市长等参加的向郭德洁遗体告别仪式。李宗仁噙着泪水，拥着郭德洁的遗体，作了最后诀别的一吻。

远在40多年前的1923年，李宗仁在扫荡广西军阀统一广西的过程中，这年冬他和黄绍竑合作打败了割据一方的陆云高之后，李将他的司令部由桂林移驻桂平，经人介绍，并取得李母亲的同意和桂平县一个16岁的女学生——郭德洁结婚了。当时李年为32岁。从那以后，他俩夫唱妇随，休戚与共为时40余年，一旦诀别，悼亡之痛，可想而知。

### 听刘少奇介绍“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总理示意统战部，邀一些老友陪他去江浙一游。藉此转移环境，休养身心。于是李宗仁便于1966年5月7日偕黄绍竑、黄琪翔、郭秀仪、刘斐、陈此生和程思远乘火车去南京，统战部负责人同行，到时受到江苏省负责人江渭清、彭冲的盛情接待，邀到中山门外原蒋介石公馆住下。

南京曾经是国民党政治中心。李宗仁重临江南故都，往事不禁在脑海泛起：1927年蒋介石被迫下台，他同何应钦，白崇禧紧密合作，打退了孙传芳的突袭，取得龙潭战役的胜利，使南京转危为安，建立了宁汉沪三方合作的委员会。但这个局面转瞬即逝，到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形势就为之一变。最值得他感慨是1949年1月蒋宣告下野，他出任代总统，以和谈号召天下，然而他以后屈于阻力，没有接纳和平协议。所以他在1965年7月20日发表的声明中，对此引为歉疚，这一切，俱往矣！他企望国共重新和谈，实现祖国统一，要看将来“形势比人强”，这是周总理对他说过有关台湾问题的话，但愿如此罢。

经过16年的建设，南京已成为一个工业城市，这里有汽车工业、化学工业和纺织工业，洋洋大观，不胜枚举。南京长江大桥的桥墩已在滚滚急流中矗立起来，以中山陵遥望雨花台，满目青翠，迄无涯际，这是多么壮观的景色！中山大道两旁的梧桐树枝叶交织，构成一个绿色长廊。行人从这里走过，不会看到烈日，南京成为江南三个绿化最好的城市之一，果然名不虚传。

5月下旬，李宗仁等经无锡至上海，住锦江饭店，受到曹荻秋市长的接待。上海在旧社会，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到了今天，已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基地。它支援全国经济建设，显示出无比的威力。最令人惊异的是解放前上海娼妓之多，全国第一，解放后经过教育改业，娼妓已经绝迹。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6月1日，李宗仁在上海看到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它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国兴起。”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动乱局面。当然，李宗仁在那个时候没有看到这一点。

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号召人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出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把陆平领导的北京大学称为“《三家村》黑帮一个重要据点。”

李宗仁感到政治气候有点异样，特在锦江饭店邀集同行举行一次座谈会，谈谈报上所称“文化大革命”问题，谈来谈去，谈不出什么结果。以李此生的政治水平，他只能说共产党在解放前搞的是“政治革命”，后来土改及工商业社会改造是“经济革命”，现在进行的是意识形态改造的“文化革命”。从此可以理解，大家都对此茫然无知。程思远问一位中共党内的负责人，“三家村”是指什么？他也说不上来。从这时候开始，黄绍竑、黄琪翔的面部表情都有点不很自在，因为他们对国内政治运动都富有经验，对报纸上出现的报道和言论，一天比一天激烈，感到一场灾难将到来。

6月10日，李宗仁等刚到杭州，便被召回参加“文化大革命”。但返京后，无所事事。直到6月28日，李宗仁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才被邀到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听刘少奇的讲话。刘少奇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他在讲话中介绍了这场“文化大革命”发生和发展的经过。

刘少奇指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从一篇文章引起的。他说：

去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起了各报的不同反应。12月2日，毛主席对彭真、康生等人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要把这个问题局限在学术上……

刘少奇在介绍上述情况时，他推许彭真有见解、有能力，在中央书记处实际上是副书记，他帮助邓小平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只因他对批判吴晗持消极态度，所以才犯了错误。刘少奇在说这些话时，康生忙坐到他的身旁来，并飞快地做纪录。

当刘少奇传达“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时候，运动还停留在北京各大学的校园里。形势正在发展，所以他说得简单。但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还是组织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了一次，李宗仁和程思远参加的一组，有阿沛·阿旺晋美和他的夫人。程在座谈会上说：“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我个人看来，主要是防微杜渐，遏患未萌，以巩固党的纯洁和促进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

会后，程同李宗仁去探访朱蕴山，朱当时是民革中央组织部长，熟悉个中情况。李宗仁问他：“‘文化大革命’究意是怎么一回事？”他也莫名其妙。

### 在301医院接受特别保护

1966年8月1日，程思远和刘仲容陪同李宗仁去北戴河避暑，下榻中海滩19号及附近的一幢楼房。那年北戴河显得特别冷落，在这里只有张治中一家住在隔壁，另外再无其他熟人来此度假。与去年情景恍如隔世，严峻政治

气候的一股冷风，也吹到北戴河海滨来了。

由于李宗仁等到了北戴河，完全不知道8月1日到12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直到8月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套红大字为标题全文刊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才知道“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以后的报道中，李宗仁知道中共中央领导的名次排列如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十分明显，林彪已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而将自七大以来就立为接班人的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转变。

8月18日，李宗仁在北戴河从收音机听到毛泽东在天安门见红卫兵的现场广播。广播员说：

今天七时许，从各地推选出来的红卫兵代表1千5百名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一同检阅参加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的游行队伍。会场上不时响起了“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

庆祝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他在开幕词中给毛泽东冠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三个头衔。接着林彪讲话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自此“四个伟大”同时并称，极个人崇拜之能事。

在会上，林彪煽动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全国人民支持红卫兵“敢闯、敢于、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从8月19日开始，在北京首先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随即神奇快速地遍及全国。

8月24日，李宗仁等在红卫兵“向旧世界宣战”的喊声中回到北京。这时“左”的思潮正直冲人们的脑海，一个主管李宗仁身边的服务班子的科长呼天顿地的说：“我们回来迟了10天，等于落后了20年。”意思是指他们已经落后于形势了。

8月25日，黄绍竑来访李宗仁，概括地追述了北京这几天所出现的动乱情况。他说，北京几所中学的红卫兵涌向街头，占领了“全聚德”，砸烂了“荣宝斋”。前天，红卫兵开始斗了一些著名作家，老舍不堪折磨，投下太平湖自尽。京剧老演员马连良被抄了家，其收藏的名贵古玩被砸得稀烂。这一切，不过刚刚开始。黄绍竑走时，程思远送他出去，看到他心情抑郁，不禁问道：“是不是你担心自己的安全？”他说：“我担心的是德公！”但过不了多少天，黄绍竑已被红卫兵揪斗致死。

8月27日，张治中请李宗仁和程思远到广东酒家参加一次晚宴。出席的主要客人是周恩来、陶铸、万里。周恩来看到李宗仁气色很好，与去年回国时大不相同，遂说：“德邻先生，你的身体好得多了。”“回国以后，心情愉快，因此身体就好起来了。”李回答说。张治中曾到过东四11条看过程思远。他对周说：“思远住的四合院很不错。”程思远说：“这都是总理的关照。”

广东酒家是广东省委向中央的献礼，厨师和服务员都由广东调来，所用菜色材料系按日用冻藏车厢从铁路运来，以盐鸡、脆皮鸡闻名于时。后来只因江青讲了一句：“广东酒家搞特务活动。”这样，一个享有盛名的餐馆便关门大吉了。由此可见当时江青讲话的权威性之大。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9月，红卫兵对党外人士包括宋庆龄在内开展了范围广泛的“冲击”，幸亏周恩来及时采取了保护措施，不致受到太大的影响。中央统战部为了预防万一，遂委派了一位负责人到李宗仁家里，对李宗仁和程思远说：“红卫兵到时，请他们进来谈谈，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后来李宗仁知道有“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是8月30日周恩来提出经毛泽东批准的。其中就列有李宗仁的名字。

尽管这样，李宗仁还是被送到一处不为人所知的地方给保护起来。

一天早上，一位穿军装的人走进程思远的家里，带来了李宗仁亲笔写的一张条子：

昨天晚上，管理局高局长来访，要我立即坐他的车子到一处住下，因临走匆忙，剃须刀和一些物品都未带来。请你到我住处将这些东西捡齐，并从书架上抽几本《文史资料选辑》一并交来人为盼。

至此，程思远才知道他受到保护了。当然，住在李宗仁那里的服务人员包括他的司机在内都不知道他的去处。

直到9月30日晚上，程思远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刚要散席，李宗仁匆匆走到程的跟前，他悄声说：“你把我找得好费时呀！我住301医院，你不要对别人说。”“你怎样来的？”程诧异地问道：“是高局长接我来的，现在还要等候他送我回去。”

10月中旬，红卫兵串连到外地去了，北京总算出现了一个短暂时间的平静。李宗仁又回到西总布胡同5号寓所。他对程说，10月1日晚上，他登上天安门城楼看焰火，毛泽东把他找去，对他说，尽管搞了“文化大革命”，统一战线还是要的。李宗仁认为，毛所以有此表示，不过是要他安心罢了。

后来李宗仁去看邵力子夫妇，开门进去，发现墙上贴有红卫兵批评邵力子的大字报。邵力子非常感慨地对李宗仁说：“统一战线有两条，一在国内，一在国际。红卫兵的过火行为，把我们国家的伟大形象完全破坏了！”说到这里，这位老人潸然泪下。

接着李宗仁去看张治中，发现他家中的古董陈设都没有了。李问是不是红卫兵拿走了？他说不是，但红卫兵认为现在“破四旧”，不应摆设这些东西。虽然，邵力子和张治中都是保护名单上的人物，仍不免红卫兵的光临。但李宗仁的西总布胡同5号以及程的住所，确实没有红卫兵来过。

李宗仁是不甘寂寞的人，不久，他又想请客吃饭，章士钊知道此事，忙来函制止，章函有云：“目前吾人应深自敛抑，不宜置酒高会，务请斟酌。”见此，李遂作罢。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前，李宗仁、黄绍竑、黄琪翔、余心清这几家轮流作东，大家相处得象火一样热，而今此种盛况已一去不复返了。

## 被扶下天安门城楼

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深入发展。12月25日，清华大学学生5千余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一时间，“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的大标语贴满了北京大街小巷。这样“文化大革命”便以“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为第一目标而向全世界展示出来了。

当“文化大革命”刚刚发生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给江青，说：“天

下大乱造成天下大治，七八年后再来一次。”言下之意，这场斗争只几个月到一年便结束了，以后每过几年就来一次，作为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体现。但因这场革命的主动权一入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手中，就非毛泽东所能控制了。

李宗仁虽是军人出身，但其生活体验丰富，看问题还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1965年8月，当李宗仁去北戴河的时候，他在专刊上看了林彪为“八·一”建军节写了一篇题为《人民战争万岁》的纪念文章。在文章中，林彪鼓吹世界各国革命应采取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发动人民战争，从农村包围城市以争取革命胜利。李宗仁当时对程思远说，世界形势变了，人民战争不是万应灵药。9月，李宗仁回到北京，一晚，周恩来为招待中外记者，约李宗仁到紫光阁一谈，李曾向周提及林彪这篇文章。周恩来说：“林彪是党的领导人之一，他的言论是有代表性的。”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运动越深入，林彪和江青的勾结就越紧密。李宗仁对此慨然叹曰：“一位是接班人，一位是第一夫人。两个人勾结在一起，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这断非国家之福，我们在旁边看到这种情况，只有干作急。”事实上，“干作急”的又岂止他一个人呢？！

1966年8月下旬开始，红卫兵“破四旧”的行动席卷神州。这期间，李宗仁的一些老朋友和熟识的领导人，有的遭到了不幸，有的亦远离人世了。

最先辞世的是黄绍竑。黄琪翔于9月2日去西总布胡同看李宗仁，不得其门而入，于是到11条胡同来看程思远，报告黄绍竑的死讯。

9月1日下午，有几个“八一”中学的红卫兵冲入黄琪翔的家里，对黄盛气地说：“黄绍竑今天上午自杀了，你是不是也要自杀？！”

黄琪翔说：“我意志非常坚强，无论受到任何凌辱，永远不会自杀”。但过了几天黄就被隔离了。究竟关在那里，程思远和他的夫人都不知道。

其次是余心清，他爱收藏字画和种植玫瑰，这些都是“破四旧”的对象。余受冲击后曾一度自尽，幸获救回。回家后，他便留书给周恩来，说“士可杀而不可辱”。接着，就用白兰地灌服速可眠，遂长眠不醒。

刘斐和陈此生被迫在北太平庄国务院宿舍扫街，经周恩来获悉后派人搭救始免。类此事件，不胜枚举。根据程思远回忆：知识分子不受冲击的，除我以外，几无一人。

有一次，章士钊找程思远去，说他事前知道了红卫兵要来抄家，就把他与毛泽东合影的照片悬在大厅上。可还是不济事，红卫兵入屋后，即把他的书房乱翻一番，随后更对他说：“章先生，为什么你收藏的书是线装书，而一本毛主席的著作也没有？！”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秘书打电话给周恩来。不久，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立刻派一个副局长来，把这些红卫兵半劝半拉地送走了，并建议他用红纸写一副对联：“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毛主席万岁！”分贴大门两边，果然，从此平安无事。

此后，章士钊把他的汽车送回机关事务管理局，并暗示程思远照办。程思远回家后便打电话给管理局，建议把他的汽车调回管理局去。过了几天，管理局才答应照办，还留下两句话，如果要车，请打电话。直到1972年初，汽车才重新由司机开回程思远的家里来。

中共中央统战部到1966年10月就瘫痪了，随之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也受到军管，局长高登榜亦要靠边站了。但过年过节，国管局杨书荣、胡振英二人总到程思远家来，问生活上有无问题。程说：“因我从海外带回来一

笔钱，生活费用还能自给，所以不必向国家伸手。”

1967年春节前后，张治中先生的女儿张素我和女婿周嘉彬来看程思远，问李德邻先生是不是如去年那样，到广东从化温泉避寒？意思是说，如果李宗仁去，张治中也去。程思远说还是在北京好，在北京有中央保护，况且从化温泉也很不安全，大字报说红卫兵曾到那里去揪人哩。

这段时间，张治中常到李宗仁那里聊天，对于当前局势，彼此只好摇头浩叹。原来这两家住得很近，张住新开路，现在他把前门关闭改走后门，就同李宗仁的西总布胡同住宅遥遥相对。当李宗仁回国时，张治中看到政府接待李过于隆重，认为可能刺激台湾当局，心中抱有抵触情绪，就在李宗仁进入国门之前，携眷溜到北戴河去了。即使是朱德夫妇在北戴河中央军委礼堂宴请李宗仁伉俪，他也拒绝参加。及张治中由北戴河归来，周恩来曾强令他宴请李宗仁一次。现在李、张会晤频繁，看来彼此前嫌尽释了。

从1967年到1968年这段日子，李宗仁所度过的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平静生活。在这两年里，邵力子和陈劭先相继因病逝世了。老成凋谢，势所必然。1968年8月，李宗仁经体检证实患了十二指肠癌，即披送入北京医院施行切除手术。虽然手术是成功的，癌毒也未扩散，但因他久患肺气肿，心脏发现有衰竭迹象。延长9月底，李便离开医院回家休息。

建国17周年的前夕，李宗仁参加了1968年9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10月1日，又登上天安门城楼与国家领导人在一起，检阅国庆游行队伍，当日下午即以体力不支从座椅上向前扑倒，得再度送院疗养。关于此事，周恩来曾经说：“当时发给李先生的两张清柬，我的意思是要他不参加国宴而上天安门城楼亮相，相信这一决定没有贯彻下去，以致出事。”言下颇有责备国务院军代表丁江之意。李宗仁住院期间，曾请中医国手周朴考前来会诊。他诊断后说，德邻先生体弱，需要大补才行，但怕他虚不受补，在药剂处方中用党参来试看疗效。周朴考所料果然不错，即使用了党参，他也未能受用，这证明李已病入膏肓，康复希望甚微。

1969年1月间，李宗仁自知不超，于是口授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感谢之意。1月25日，李又得一场肺炎，他在回国后曾害过几次肺炎，过去总是用青霉素把他治好的。但这一次不灵了，虽已改用他药仍未奏效。延至1月31日凌晨30分，李宗仁终于逝世，享年78岁。

李宗仁遗体的告别仪式（那时不举行追悼会）于2月1日下午3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周恩来也来参加仪式，他在休息室说：“康生同志答应也来参加，我们等他半小时吧。”由于“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大家很少见面，所以周恩来同每一个人握手时总会顺便讲几句话。他首先同张治中、章士钊打招呼，当轮到刘仲容时，不禁诧异地说：

“你怎么胖成这个样？”

“总理，我坐班房呀！”

原来刘仲容任外语学院副院长，“文化大革命”发生后，他被该院革命群众“专政”了。专政原来是个名词，现在通通作动词用，红卫兵惯用这两字来打击所谓“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说，现在我给你专政。意思就是把你关起来。刘仲容每天被指定于上午8时向该院革命群众报到。他一到就被关起来，直以晚时才被释放回家。他真多谢周恩来点名邀他来参加李宗仁遗体的告别仪式，以后他所受的待遇也比较好一点了。

李宗仁逝世以后，周恩来连召见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也感困难。后经

一番调查，才知道罗已被调到总参谋部某部当副部长去了。林彪、江青一伙颐指气使，独断专行，心目中完全没有周恩来的存在，于此可见一斑。事实上，自 1967 年 3 月“中央文革”把反击“二月逆流”的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后，国务院已经瘫痪了。后来毛泽东对江青说：“反周，人民必反。”因此，反周活动才未能进一步发展。

等了一会儿，康生终未出现，周恩来才宣布开始李宗仁遗体的告别仪式。康生对周心怀叵测，这时亦已为人察觉了。逾两月，张治中也寿终正寝。这一代留在大陆的国民党要人，至此已寥寥无几了。

